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第八章（上）

2020年9月

目录

文革简史。。。。。。。。。第 5 页

现在，让我们继续思考，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与精髓，及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比较。。。。。。。。。第 225 页

西方的发展。。。。。。。。。第 478 页

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境况。。。。。。。。。第 531 页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第 540 页

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第 585 页

科技发展与工业革命浪潮。。。。。。。。。第 656 页

美国、西欧、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地的经济腾飞。。。第 742 页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2020年9月

=====

.....

.....
.....
.....
.....
.....
.....
.....
.....
.....
.....

=====

第八章

1966年-1976年

文革简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5%A4%A7%E9%9D%A9%E5%91%BD%E5%B9%B4%E8%A1%A8>

文化大革命年表

前奏

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连续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社论。

1964年7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提议成立。

1965年1月，根据毛泽东意见写成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11月，姚文元于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6年

2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提交《二月提纲》，被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杭州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并批评了吴晗和翦伯赞等人。

5月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8月1日，《人民日报》摘要公布了这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五·一六通知》，严厉批评了《二月提纲》，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贴出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直指中共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回信被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下发。

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批评“某

些领导同志”在五十多天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俗称《十六条》）。

8月18日起，毛泽东、林彪等人在天安门先后八次接见1000万红卫兵。

8月，“红八月”期间，北京红卫兵开始到处“破四旧”，这种做法也传到其他地区。大量受害者被批斗致死或自杀。

8月24日，作家老舍不堪迫害，深夜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

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经毛泽东批准。被点名保护的人物免遭直接批斗与人身攻击。

9月6日，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首都三司”成立。

11月9日，上海“工总司”宣布成立，潘国平担任执行主席。

11月10日，北上赴京告状的“工总司”1000名成员，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20小时，被称为“安亭事件”。11月13日下午张春桥在“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五项条件上签字。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获悉后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由此废除。

11月12日，北京举行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

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9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工业十条》）。15日，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农村十条》）。由此文化大革命迅速蔓延到全国的工矿和农村。

12月5日，“联动”正式宣告成立，总部设在北大附中。

12月16日，“首都三司”举行了一次控诉“联动”的群众大会，有一万多人参加。

1967年

1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被夺权，全国夺权运动的序幕拉开；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后于2月24日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卷入各地文革。

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1月，清华大学、北航等校红卫兵捣毁“联动”的“据点”，举办“联动罪行展览”，抓捕139人。4月22日，“联动”成员被释放。

1月、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与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发生争执，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

2月，武汉、长沙、成都、重庆、青海等地出现支左部队镇压甚至杀戮造反派的问题，如青海二·二三事件、四川的二月镇反。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中共中央曾定性为没有问题的自首出狱重新定为“自首叛变”，即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4月6日，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军委十条》在执行上与《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存在矛盾，因此产生新的问题。

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

7月3日，北京举行“午门抗缅大会”，抗议此前中国驻缅甸使馆遇袭事件。

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

7月22日，江青重申“文攻武卫”，次日该口号登在《文汇报》上，之后全国武斗急剧升级，中国大陆进入全面内战[1]。

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

8月9日，北京发生红卫兵焚毁蒙古驻华大使专车事件。

8月22日，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殴打英国驻华代办柯利达，引发国际争端，周恩来向英方道歉。

8月26日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和王力、关锋一起被关入秦城监狱。此即“王、关、戚事件”。

10月1日，中国与印度爆发边境冲突，中国从锡金撤离。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学生返校复课，学校恢复招生，“边上课边闹革命”。

10月27日，九·三〇事件全面爆发，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断交并从印尼撤侨。

11月6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要点。

1968年

3月，杨、余、傅事件。

5月25日，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

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

7月底开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各学校和机关团体。

9月，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党政合一的革命委员会。

9月30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被撤销职务、下放江西。

12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填词人田汉被迫害致死。

12月22日，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1600多万青年人赴乡下劳动。

1969年

3月起，西藏尼木地区发生暴动，波及多个地区，即尼木事件。

中苏于珍宝岛爆发激烈武装冲突，即珍宝岛事件（另见中苏边界冲突）。

4月1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6月9日，十大元帅之一贺龙被迫害至死，追悼会上，周恩来连续七鞠躬。
1974年贺龙被平反。

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参加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葬礼途中过境中国北京，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谈，缓解了中苏冲突。

11月12日，刘少奇于开封病重死亡。

1970年

1月起，全国性“一打三反运动”展开。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会上就国家主席职务存废等问题，林彪与江青等人发生激烈冲突。

11月10日至1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访问中国，向周恩来转达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口信。

12月22日，华北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改组北京军区，免去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李雪峰政治委员的职务，由谢富治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吴德兼任政治委员。

1971年

乒乓外交，中美关系逐渐转暖。

4月—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全国大学开始通过推荐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学员。

7月9日，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秘密访华。

9月13日，林彪与妻子叶群等九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坠机身亡，即九一三事件。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通过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12月，开始发掘长沙马王堆汉墓。

1972年

1月6日，十大元帅之一陈毅去世，毛泽东出席葬礼，并表示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

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大陆。

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共同发表《中美联合公报》。

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 9月29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与日本建交，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

10月，北京发生王府井“围攻外宾事件”。

1973年

3月10日，邓小平复出，恢复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出现在众多外交场合。

4月，青年数学家陈景润的情况被写成新华社内参，受到江青、毛泽东批示。

7月、8月，“白卷英雄”张铁生被广为报道，1973年的文化考试很快作废。

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12月，黄帅事件。

1974年

1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开始。

3月29日，陕西临潼县村民在打井过程中发现碎片，导致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

4月6日至19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林批孔运动偃旗息鼓。

8月1日，中国首艘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09I型核潜艇服役。

1975年

1月13日至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发起。

3月1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3月19日，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特赦释放。

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7月，云南发生回族暴动，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后被武力镇压。

8月4日，广东顺德八四海难，432人死于珠江。

8月8日，河南“75·8”水库溃坝，大跃进时期修的水库排洪设计失当，在台风大雨下溃坝。最初官方数据8.56万人死亡，后来统计2.6万至20余万不等，上千万人受灾。

8月，评《水浒》运动。

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11月下旬，专门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邓小平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文章称：“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各地开始开展学习，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访华，在北京与毛泽东、邓小平会面。

1976年

1月8日，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逝世，随后由华国锋出任代总理。

2月25日，华国锋主持召开各地方、军区一把手会议，亦称“第二次打招呼会议”，传达《毛主席重要指示》，指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展对邓小平的点名批评。此后，全国各家媒体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全面否定邓小平1975年以来实行的各项措施，将邓小平定为“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演变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4月5日，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中共中央认为这是一场“反革命事件”，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7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去世。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唐山大地震，25万人死亡，16.4万人重伤。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怀仁堂政变，四人帮（指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姚文元四人）被捕。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文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即“揭批查”运动。

10月7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正式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

后续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永远开除四人帮的党籍，而邓小平则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

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

8月至9月，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访问中国。

12月10日，文革后举行第一次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1978年11月21日，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

11月，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开始出现已被查禁的《中国青年》，出现要民主、言论自由、反专制等呼声。魏京生张贴了文章《第五个现代化》。

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华国锋受到批判并失去最高权

力，邓小平成为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会后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恢复“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1980年11月20日，四人帮公开受审，1981年，江青和张春桥被判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其后被减刑为无期徒刑。其他人则分别被判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将文革定性为“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

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提出要清理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清理三种人开始。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5%A4%A7%E9%9D%A9%E5%91%BD>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称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政治运动，于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间发生在中国大陆境内。因其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故也被后世称为“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文革是一场由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自上而下动员成千上万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全方位的阶级斗争。

持续时间 1966年至1976年

地点 中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结果 经济活动与教育停顿。历史，宗教与文化物质遭到摧毁。

死亡 据估计数百万至二千万平民、红卫兵与军人死亡（具体死亡人数未知）

一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是于1966年5月16日出台的《五一六通知》；此前，三面红旗的挫败造成了三年大饥荒中数千万人的死亡，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文革初期毛以“反苏修、反美帝”为口号，以革命名义攻击“走资派”，尝试重回党核心。文革在此后的一两年内达到高潮，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委会以取代党政机关，大规模武斗导致全面内战，对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顶峰。中共右派人物的权力则多遭到剥夺，黑五类遭到广泛迫害，而当权左派亦有内斗，并导致原定接班人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死亡，四人帮势力逐渐扩大。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修订了宪法，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被废除，平息了之前的争议，“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四大等内容被写入《七五宪法》。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一举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

据各方估计，文革期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至2000万不等，从北京的“红八月”起，诸多地区发生了大屠杀，包括广西文革屠杀（及大规模吃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等，亦爆发了二十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人为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文革期间的武斗以及官方鼓励的批斗、抄家及告密等过激行为，使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沦亡、整体经济受严重影响、受迫害人数以千万计，亦有大量文物古迹在“破四旧”中遭红卫兵破坏。众多中共中央领导人被视为走资派而遭迫害，如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十大元帅彭德怀及贺龙、政治局常委陶铸等人被迫害致死，邓小平、陈云等人被下放，习仲勋、薄一波等人被打倒监禁，而半文盲农民陈永贵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此外，中国的科研教育也受到重大冲击，知识分子成为被首要打倒的对象之一，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两弹一星元勋”中，姚桐斌被毒打致死、赵九章受迫害自杀身亡，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熊十力、田汉、翦伯赞、吴晗等也受迫害身亡，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则因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名

单而受到保护。与此同时，文革期间高考停止，上千万知识青年进行了上山下乡运动。国际上，文革影响了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朝鲜、法国、埃塞俄比亚、荷兰和智利等一些左翼势力强大的地区；其中，受毛泽东和文革的影响并得到中方资助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于1975-79年初进行了红色高棉大屠杀，造成约200万人死亡、占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文革结束及一连串政治斗争后，中共中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启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进行改革开放，并修订了《八二宪法》，而藉毛泽东的权势推动文革的极左派多被整肃，逐渐消减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色彩。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并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全盘否定文革，并将其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全面而严重的危害”。至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问题和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世界各地仍然具有极大的争议性，文革遗毒残留，而中共并未彻底清算文革、同时限制反思也一直饱受争议；中国官方和自由派人士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且自由派人士认为毛泽东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

历史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斯大林模式作为中国国家建设的蓝本。1953年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人满怀信心以斯大林模式的蓝本进行中国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时，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共开始全盘否定斯大林，国际反共和去斯大林化的呼声迭起，中国受到苏联及美国的全面国际孤立。毛泽东遂以反右、阶级斗争扩大化、防修反修重新捍

卫斯大林模式。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讲到“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

1958年11月，在准备和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反复号召全党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澄清“大跃进”中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中，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四级党委的委员认真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每本用心读三遍。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年上半年，在学习斯大林著作的基础上，毛泽东把学习的重点转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上。毛泽东在所列“庐山会议讨论问题”中，第一条即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读者范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1959年7月，五省干部开始学习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1959年11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召集了九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学习讨论会，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问题时指出：“教科书没有分清专政和民主的方法，没有明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只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把国家组织和教育群众的职能叫做‘专政’，那么就可以对群众粗暴了。专政只能对反革命。从国家职能的发展趋势来看，专政的作用越来越少，组织教育的职能越来越多。国家专政对内的作用越来越缩小，组织教育群众的职能一万年也有。”“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这里只讲一致，不讲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无冲突，但可以减少冲突，预防冲突。没有对抗性矛盾，处理得不好，也会冲突起来的。”“社会主义是向着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这是对长期的共产主义而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几十年或者更长些，而共产主义可能有几万年、几十万年。这样看，思想就解放了。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利用许多资本主义的旧形式，如商品、价值、货币、银行等，都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同志在两个问题上，扭扭捏捏。一是矛盾问题，讲社会主义有矛盾，好像心虚得很；一是对采用资本主义的旧形式问题。他对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敢承认，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不承认剩余劳动时间，不讲有盈利。现在教科书承认了剩余劳动时间，不承认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剩余价值。自然，剩余价值的形式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的本质不是商品，也还是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剩余价值是有的，但不是个人占有，是社会占有，或劳动者集体占有。不要回避这些问题，回避了，反而讲不清楚。”1959年12月毛泽东组织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

大跃进及其批评

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进入了当时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结

束后被称为“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据各方估计有1500万-5500万人死于饥荒。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与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实行三自一包。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浮夸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公社开始退还社员自留地、粮食、房屋、农具、家具、生猪、家禽。1960年8月14日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六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所举行的报告会上讲话指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向工商界、知识界和各民主党派成员提出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的需要，同时也提供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的可能和条件。希望我们大家不做一个言行不一致的自由主义者，而做一个毛主席的老实学生。”

中国大陆人口数量变化图。可以看到在“大跃进”期间出生率的大幅降低和死亡率的显著提高。

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

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了一封“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要阻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给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党内具有压倒性趋势的肯定彭德怀的意见，认为信件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胡乔木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胡乔木引述恩格斯《论权威》中的相关文字，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是党和人民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这显然是指要维护毛泽东权威而言的。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罢官，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地党的地方委员会先后召开常委会、党委书记会、党支部书记会和工业战线上的党员厂长、支部书记会，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两个文件，采用大放大鸣大字报的方式，揭发、批判右倾问题。参加“反右倾”斗争的党员，从领导开始，个个作自我检查，搞人人过关，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提出的不同看法，作为右倾情绪加以批判。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中国大陆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指出，在1960年，中国大陆人民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1958年和1959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为了克服严重的

经济困难，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刘少奇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又称“七千人大会”。1月18日，彭真在发言时称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而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着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他说：“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毛泽东提到了国家变修

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毛泽东还讲道：“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刘少奇的报告表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1月27日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1月29日下午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于在大会上发言指出：“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在会上陈云做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刘少奇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的全面的调整：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城镇人口2600万。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现了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毛泽东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1962年7月，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五人不参加全会。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把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1960年以来我国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形势所作出的估计，说成是只讲“黑暗”、不讲“光明”的“黑暗风”，是右倾机会主义；把有些地区为了反对平均主义而采取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和邓子恢等支持这种责任制的意见，视为刮“单干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彭德怀为了澄清1959年庐山会议上强加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按照党的组织原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申诉和为受错误处分的干部平反，视为“翻案风”、“平反风”，是对1959年反右倾的“一风吹”。会上，康生首先提出，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曾为小说《刘志丹》提出过意见，是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是个“反党集团”。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的基本观点，并将它写进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公报指出：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外国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外国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公报还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中苏论战

在中苏论战中，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九篇对苏联共产党公开信的评论，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已经篡夺了苏联的党和国家权力，苏联“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在第九评中总结了十五条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其中第二条说：“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四清运动和毛刘歧见

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国国家主席斗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与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出现矛盾

文革的舆论准备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

《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当时负责中共文化宣传工作的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同时林彪则通过解除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一事，基本掌握了军队的主导权，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斗争做好了保障。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公报通过了《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在1966年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

“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据此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四个存在”理论，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发展过程

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结果是刘邓走资派被打倒下台，毛泽东重掌大权，其心腹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确立为接班人。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此间林彪因企图篡位而失势。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再度被四人帮批斗，华国锋在毛泽东生前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他粉碎四人帮，使得文革得以结束，华国锋成为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文革爆发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许多地方与大跃进的内容相似，其中所含的“社会大治”的设想，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16日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党内走资派篡权”的阴谋论在党内最高层已经到达一个顶点，已经达到严重妄想的程度。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原五人小组上报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批准，《二月提纲》也被废除。“五一六通知”发布和“二月提纲”被撤销，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不过对于他们犯下的

错误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公开。

5月18日，在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发表长篇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林彪还开始倡导个人崇拜，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同日，《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自杀，由康生接管改组这一共产党的喉舌。当年开始，教育部、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教育战线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113]由于原来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与此同时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赴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见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甚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称为“三旧”。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1966年8月《人民日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里尽朝辉》[116]。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

当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在此之前已经长期不在北京，由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中央一线工作。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6日的《解放军报》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提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逐步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想法。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对“有问题”下属机构进行接管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

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进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和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还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其中指出，不论高小或初中都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

学者认为，此时中国可能还没有人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对象是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人，而误以为只是反右四清等运动的延续，所以他

们的目标仅仅是中下层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等。日后“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在1967年5月承认，自己当时也绝对没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而副总理薄一波在当时对工作组讲话时，就认为目前已经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现在就可以一网打尽，显然也完全误读了当时的形势。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刊于报刊

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

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50天内执政的刘少奇。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从大连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发表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地言论，一起印发大会。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来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第十条“教学改革”提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条规定：中等学校放

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

1966年9月1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拥护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游行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则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现，成为毛泽东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资历更高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会议还正式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对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定，更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10月，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

红卫兵与大串联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接受红卫兵们“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

在中共高层权力大规模调整的同时，5月底出现的红卫兵于此同时大规模壮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學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

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会期间，北京市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7000人。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进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分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进行了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与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师、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五千五百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六十一万余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三百三十四万元美金、价值三百三十万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二百四十万万民国银元，以及三亿七千万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在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于天安门广场视察红卫兵

针对出现了许多人被打死的事件，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内容是：“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8月22日，毛泽东厌恶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

方统计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杀死了325人。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与此同时，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三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六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扣押并批斗（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

1967年3月上旬，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5月8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专门发出中共中央通知，说这篇文章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全面夺权与文攻武卫

1967年4月，《人民画报》刊登上海造反派庆祝游行情景

1966年11月以后，原来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年仅三十出头的工厂职工王洪文领导，很快取代了各种红卫兵组织。1967年1月3日，张春桥与姚文元从北京赶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运动的首脑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这次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也成为全国“夺权”行动的开始。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1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

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全国多个省区市的领导机构被“革命群众”夺权，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往往无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机关职能，导致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原则和规则，夺权的形式与内容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内被三股不同革命群众先后夺权，黑龙江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最后就是夺权前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还向康生写信申请批准被夺权。月中，原本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被红卫兵夺权。

文革时代艺术家并将毛泽东的形象应该是“红、光滑、发光”的表现方式来显示毛泽东本人是光的主要来源，无产阶级专政的代表：无产阶级专政为文化大革命主要的意识形态及口号之一，表现在数张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宣传海报中，在1949年文盲率为80%到1964年文盲率降为57%的历史背景下，以海报图文的方式去对大众宣传特定想法及口号。

1967年4月，《人民画报》刊登贵州革命派造反情景

与此同时，在中央，陈伯达、江青等开始将斗争对象转移到当时中央第四号人物、主要协助周恩来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的陶铸。此后虽然毛泽东对

于陈伯达、江青随意针对文革小组同僚的行为提出指责，并且要求他们在小组内自我批评，但是并未插手陶铸被“打倒”。

不过毛泽东对于陈、江的批评是这些在文革开始后权力日大的活跃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满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联手抗争。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中央碰头会议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七位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领导对当时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与张春桥等人当场发生激烈争论。此后张春桥召集姚文元、王力，先与请病假的江青会面，随后于当晚即会面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元帅副总理的发言。最终毛泽东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这次事件则被张春桥等称为“二月逆流”。此后虽然这些领导人并未立即被正式停职，但实际上国务院、政治局在少了他们以后已经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已经蔓延至南面受英国统治的香港，这种风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结束。

与此同时，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发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联活动。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开始抢军队的权。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由群体互殴升级为枪炮对打，全国进入内战状态。重庆大武斗中甚至使用了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军舰、重型登陆艇等重装武器。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九五命令》，规定不准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解放军对抢

夺行为有权自卫反击。大规模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份才渐渐平息下来。

上山下乡与清理阶级队伍

1967年，批判刘少奇的群众集会

196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其中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校。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统一规划建设毛泽东塑像外，还提到：“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

1967年4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戳穿〈修养〉再版的恶毒用心》：

一九六二年，国际国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异常激烈。《修养》的作者、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真的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吗？不！他是打着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幌子，来攻击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从而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毛主席

的正确领导，以便他篡党夺权，取而代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思想，反对毛主席，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掀起“抓叛徒”的恶风（这件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

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单位“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十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

1967年，北京大学校园张贴大字报，刊于1967年11月《人民画报》

196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 热烈欢

呼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伟大胜利》指出：“当前，中国亿万革命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特别是对他那本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阴险的《修养》——这本书被贩卖到全世界，取名为《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进行彻底的批判。这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个人当前在中国这个世界革命中心扛着修正主义和对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破旗的旗手，他的这本书就是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纲领。”

1967年，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书写大字报批评刘少奇，刊于1967年11月《人民画报》

196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指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在资产阶级方面，挂帅的人物始终是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的“理论”是他提供的，反革命的活动是他策划的，他是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后台。”

196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赫鲁晓夫的镇压群众运动、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仅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还打击广大要求革命的干部起来革命，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当他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总攻击面前，陷入穷途末路的时候，又施展故技，把他在土改运动中那一套“搬石头”，以及四清运动中要干部“大换班”、“统统罢官”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

义路线，全盘搬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了。他不仅到处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而且公然叫嚷要中央文革小组“退到二线去”。甚至丧心病狂地鼓动反革命分子“多活动一点，多写一点反动标语，多发表一些反动言论”，猖狂地直接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靠了边以后，还继续以各种形式，通过他安插在各地的爪牙，挑动武斗，制造混乱，同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较量。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继续。

1967年，北京二十三中“复课闹革命”，黑板上写有文字“控诉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刊于1968年2月《人民画报》

1968年春天，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浪潮，当时的口号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毛泽东已经被神化。《参考消息》转载的苏联“斯大林小组”《文化革命真相》的长篇文章指出：“文化革命是以毛泽东和林彪为首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原则性斗争。这场斗争是中共同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高岗、饶漱石集团；一九五八年彭德怀集团）长期斗争的合乎逻辑的继续和结果。这场斗争之所以困难和艰巨，是因为中国的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和国家里夺取了发号施令的岗位。”

不过此时的毛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接近于开始一场内战。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各高校，试图停止武斗，实际采取的正是两年前刘少奇、邓小平等因之获罪的措施。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无视工宣队，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

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

林昭，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敢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抗争的民间人士。她于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遭到监禁，并于文革时期中的1968年遇害。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新党章，提请接下来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将林彪正式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10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决定，攻击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时候，愤怒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建党路线上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他们指出，中国赫鲁晓夫大肆推行他的所谓“六论”，就是妄图用修正主义来腐蚀工人群众，腐蚀我们的党，扼杀党和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蜕化变质，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服务。他们表示，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引下，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纯洁，更加朝气蓬勃。

1967年，批判刘少奇的群众集会，打出“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罪恶流毒”

标语

随后人民日报揭露刘少奇攻击毛泽东的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刘少奇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派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走狗，反动派的帮凶。1969年3月15日《红旗》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一文中开宗明义写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粉碎党内修正主义派别的伟大斗争。这场政治大革命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尖锐反复斗争的必然结果……就可以知道苏修这次的武装挑衅不是偶然的，正同美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一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小撮美帝、苏修的代理人，使苏修妄图通过“和平”手段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梦想彻底破产。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邓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的一家拖拉机场工作、反省，而没有得到毛泽东维护的另外两名元老刘少奇、贺龙则不得不面对更加严酷的待遇。刘少奇被匿名关押，缺医少药，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后就未能与其见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继续关押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而元帅贺龙则连基本的饮食饮水都得不到供应，“贺龙专案组”还刻意造成错误用药，促使其于1969年6月9日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去世。这次全会从很大程

度上反映了文革对于中共政治局面的影响，中央委员会1966年十一中全会后仍然在世的87位正式中央委员中，仅有40人被邀请出席十二中（其余多数已经被“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选举的96名候补委员中，仅有19名参加了会议，其中10人被补选为正式委员，替换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员（其中两人自杀身亡），才使得出席人数达到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最高标准。而与此同时，又有74名非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被邀请参加了大会，主要来自文革开始后得势的中央文革小组、“夺权”成功的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局势的解放军机构等，也使得大会成为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与会非委员人数超过委员的奇观。

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这是鉴于青年情绪激动难以稳定控制的考虑，于是将这些人清除出城市，人选以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为主，中国上山下乡运动开始。

5月起，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数据认为，此间全国有3000万人被斗，50万人死亡。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由中共各级组织正式

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进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国家主席存废之争与九一三事件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和毛泽东的矛盾越来越大，最终关系破裂。

“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恩来在中共九大上的发言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九大正式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宣告“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列入《党章》。国家主席

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主席一职悬空，周恩来继续保持党内第三的位置且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担当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大权。

九大会议由林彪作政治报告。原政治报告草稿为陈伯达所写，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该题目遭到毛泽东反感，后由张春桥起草政治报告，林彪在会上宣读。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对张春桥起草的报告不满，宣读时磕磕巴巴，照本宣科。张的报告中不断引用毛泽东语录，再度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还赞扬了军队的作用。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泽东与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会议还选举了中共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团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至于陈云等一些中共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资料称，周恩来在九大期间地位上升，并几乎成为党的第二副主席。

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因刘少奇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国家主席职务空缺。到了1970年因面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宪法需要修改以容纳文革纲领。1970年3月，毛泽东在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后明确与汪东兴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央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整个过程中，林彪仅有一次单独表态，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

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周恩来向政治局转达了林彪的建议，“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

文革初期，林彪一度获得毛泽东的极度信任，从而掌握大权和担当要职。

由于按照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在除毛泽东外多数政治局委员要求设立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再度以个人权威压倒集体决议，以《三国志》中，孙权劝曹操称帝的故事为典故，声称“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九届二中全会上，事情再度出现转折，康生、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再度要求设立国家主席。周恩来建议设立国家主席是为了外事活动，如毛泽东不愿意参加外事活动，可以授权他人进行。宪法修改小组的康生对撤销国家主席反应激烈，他认为撤销国家主席违背民众愿望，但又不能违反主席的指示，导致他们修宪小组压力很大。陈伯达表示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是对人民的鼓舞。林彪仅表示附和。

有学者认为，国家主席问题涉及国家体制，多数政治局委员对于涉及国家大事的重大问题有激烈反应完全可以理解。而撤销国家主席职务这样的更改国家体制的提议，毛泽东应光明正大地说明原因和理由，但他一直未能做出解释，反而指责反对者有阴谋。中共的史料对此也指责反对者，即林彪觊觎国家主席职务而引起毛泽东怀疑，“林彪阴谋设立国家主席以篡党夺权”。

有学者认为，据中共承认，毛泽东最早公开指出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

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间，而中共迄今认定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证据是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对中央专案组揭发叶群对他的谈话。该学者认为，根据这两个时间可以得出毛泽东是在得到证据两个月之前就开始怀疑林彪阴谋夺取国家主席职务的结论。

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关系恶化的原因，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说法。中共官方说法是林彪觊觎国家主席，篡党夺权的野心引起毛泽东怀疑，后林彪袭击毛泽东专列未果，仓皇出逃。而有学者则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是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文人相斗，引起了大会成员对张春桥的怒讨。而偏袒张春桥的毛泽东则怀疑这种大规模声讨（毛泽东语“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运转之势”）是林彪背后指使，故引起毛泽东批判陈伯达，矛头对准林彪，毛林关系由此恶化。这个观点认为国家主席问题仅仅是为遮掩批斗张春桥事件引发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借口。

《五七一工程纪要》影印本封面，可见其被定义为“反革命政变纲领”

高文谦等学者则明确指出，毛泽东在1971年8月绕过党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干部揭发林彪问题，并采取“掺沙子”“抛石子”等办法斗争林彪，均成为后来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

受到挫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

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林彪的计划是要利用空军为主导武力夺权，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一举逮捕所有要员，获得全国的政权。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形成割据局面。

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迄今尚无任何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制订，甚至连林彪亲信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均不知道该纪要的存在。该学者提出一个论点，即“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

不过林彪的计划并没有实现，政变失败了。根据香港《明报》几星期后的报导，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上海险些遭到一系列袭击。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经接到情报，称林彪正在预谋一起重大政治阴谋，一批军中林彪的亲信正在接受特殊军事训练。而上海的袭击阴谋则完全证实了该情报。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传闻，称毛泽东在往北京的火车上险些遭袭，甚至有人到毛泽东寓所行刺。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不得而知。

据中共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等人仓促从隶属海军的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准备逃往苏联伊尔库茨克，飞机在没有副机长和领航员且跑道灯未开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在进入蒙古国领空几百公里后在温都尔汗坠落，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驾驶员潘景寅在事故中丧生，是为九一三事件。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林彪事件。

直到9月14日林彪坠机的消息才传到北京。当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国庆庆祝活动也被取消。

近年来，有学者发现林彪飞机的飞行轨迹是从山海关至苏蒙边境后折返蒙古，在蒙古坠毁。林彪出走事件因整个事情扑朔迷离，其出走原因，出走过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质仍然争议极大。

四人帮及文革后期

从1974年开始，中国大陆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

林彪之死，一方面使毛泽东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急剧变差；另一方面国家也失去了原定的接班人。

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1973年，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十大党章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强调“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语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苏联攻击批林批孔运动是“反对国内的国际主义力量”。在国际上宣传孔子是“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1974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孔老二的亡灵和新沙皇的迷梦——评苏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一文指出：苏修尊孔反法是为了反华。而林彪这个“超级间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重要时刻，一面大肆吹捧孔老二，一面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供认，他要投靠苏修，找“保护伞”，并肯定他们的反革命“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指责“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文史哲》杂志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把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抓好，就一定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更加蓬勃发展。”

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毛泽东曾经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赞扬秦始皇，并且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写了一首诗表示异议，而四人帮把此事提升为“儒法斗争”。批林批孔运动很快被篡改为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林彪死后，周已经成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获取政权的最主要障碍。“批林批孔运动”虽然是对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来却强调林彪“左”的错误，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失去了兴趣。四人帮的“批林批

孔”并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中央委员会委员邓小平获任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其后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实际负责政府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

1975年2月，毛泽东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重新推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来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支持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用意在于尽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损失，恢复经济和国家政权正常运转。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到后来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全面纠正“文革”错误的大动作。人民日报发表毛的指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到了9月，毛泽东也病重，毛泽东把他的侄儿毛远新由沈阳调回北京陪在身边当上传话人。

1976年，是文革关键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受到政府压制。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

2月，情况再度改变。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邓小平，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正是邓小平。经毛泽

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定性为反革命活动，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同时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文革结束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毛泽东逝世前的五个月给华国锋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四人帮在上海组织民兵，有夺取政权之意。

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

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社论发表以后，江青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6种报刊就登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9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从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就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达到了“四人帮”所要求的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报纸版面的目的。9月21日《文汇报》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针》；9月24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学习与批判》杂志在第10期刊出该刊记者写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10月2日，华国锋在乔冠华9月30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报告上批道：“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以下简称《永》），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1976年10月6日——《永》文发表的第三天，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开会为名，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就地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立即派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继而宣布对《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隔离审查，责成莫艾交代《永》文发表经过和他同姚文元的关系。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这次事件被称之为“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

文革后续

过渡时期

华国锋上台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一的领导人，并在同年10月发生的怀仁堂事变后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张春桥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1977年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华国锋先后接替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的职务，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中共十一大选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此次会议上，华国锋还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但仍以肯定的态度对待文革。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

华国锋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由于他的权力来源只是毛泽东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东兴等支持，面对着邓小平这一批元老，华

国锋的经验、政策、革命历史也比不上邓小平，故华国锋忧心会被这些元老夺去大权，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泽东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取代华国锋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逐渐夺回在中共内的领导权。

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对文革进行了1975年整顿。1975年11月起，毛泽东、四人帮等人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1976年4月，邓小平因为“四五天安门事件”被撤职。

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同年8月，邓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78年3月，邓小平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1978年5月，邓小平把握机会，由他最亲密的战友、当时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负责，在《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他

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为自己造势，当时凡是支持该文实用主义论点的，都是邓小平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并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确认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同时支持邓小平当权的陈云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9年1月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指出康生对毛泽东的四个存在理论进行了篡改，强调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

1980年2月，邓小平的亲信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被视为邓小平政敌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在会上辞职，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年9月，赵紫阳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接替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而抵制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陈永贵被解除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81年6月，华国锋迫于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中共元老的压力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本人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而华国锋仅象征性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至此邓小平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有限清算文革

对四人帮的审判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1981年1月，最后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狱），迟群18年，刘庆棠17年。对自1970年就被捕入狱的林彪集团成员的判决结果是：黄永胜、陈伯达、江腾蛟18年；吴法宪、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

拨乱反正

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开展了对文革的清理运动，譬如揭批查运动，对文革中积极参与的人进行了抓捕、审判。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积极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但是期间亦有打击面过大、冤假错案及选择性办案的情况。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迫于形势，辞去国务院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

1983年，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讲话要“清理三种人”，即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五月十日新华社报道，中共天津市委会同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党组等有关部门作出决定，解散由“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造反起家的人为核心的707所党委。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为这篇报道加的按语说，原中共707所党委，组织上严重不纯，政治上思想上顽固对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变质，完全丧失了一个党组织应有的作用。

198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4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1984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9号通知，明确强调要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八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各单位发出《关于在部队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见》。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根本问题。

争议及局限性

在拨乱反正期间，中国共产党并未彻底清算文革、同时限制反思文革也一直饱受争议。1980年代，中国大陆又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左倾运动。有学者认为这些运动是继文革之后再次发生的左倾运动、是文革的“回光返照”。也有人认为，虽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但该决议并未彻底清算文革的罪错、未能进行深度反思，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对文革彻底清算将会影响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故一直未能开展。

此外，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历来充满争议。1979年起，以魏京生为代表的异议人士发动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但受到了邓小平等人的打压。另一方面，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务虚会。在务虚会期间，会上会外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人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党内和社会上又产生了摆脱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3月29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通告：“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4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关于处理北京、上海等地七个由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指出，自1978年10月以来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中城市陆续出现了一些自发性组织，极少数组织为反革命分子和坏人控制。

文革中还发生了许多大屠杀事件，而其中的直接领导者和部分主要犯罪分子并未受到法律的审判，或者仅受到了轻度的处罚（如有期徒刑或开除出中国共产党），这在部分地区引起民愤，亦有民众前往北京上访。与此同时，1980年代起，巴金等知名学者曾公开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防止历史重演；该呼吁获得不少民间人士的支持，但一直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回应。

后果及影响

人道主义灾难

死亡人数

文革期间，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主要包括：大屠杀（包括官方处决）、武斗、私刑、自杀、批斗，等等；根据目前的资料，各方统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至2000万不等。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爆发了二十世纪世界最重大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据估计造成数万人至24万余人死亡。

根据中国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以及其它文献记录，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披露，文革期间“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依据美国知名政治学教授鲁道夫·拉梅尔于1991年所著的《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773万1千人，即每1万人口里死亡96人。

依据作家张戎和知名历史学家乔·哈利戴于2005年所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文革期间至少有3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依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于1996年联合编著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文革期间共有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万5千余

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另有703万余人伤残。

依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永发于2001年所著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保守估计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2万以上。

依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苏阳于2003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他们研究了1520份中国1987年后公开的县志，估计文革期间在中国农村地区：75-150万人非正常死亡、相似数量的人口永久伤残、3600万人遭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大屠杀和人吃人事件

文革期间的大规模屠杀包括：广西大屠杀（及大规模食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北京文革屠杀（红八月）、江西瑞金大屠杀、青海二二三事件、宁夏青铜峡事件，等等。广西和广东的屠杀情况较为严重，有学者指出广西65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43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15个县的屠杀人数超过1000人，而广东57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28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6个县屠杀超过1000人。这些屠杀多是地方共产党机构、政府机关、民兵甚至军队实施或组织实施的，屠杀的死者主要包括“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及其亲属，以及反对当地政府官僚的群众组织成员；而云南沙甸事件屠杀案的死者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据保守统计，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大屠杀造成至少30万人死亡。

在广西文革屠杀中，依据1981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成立的特别调查委

员会，官方最初承认的被屠杀者就不少于10万人，亦有干部和民众私下里认为是15万、20万或50万。1984年，依据中共中央特别调查组最终统计，广西文革期间有名有姓有地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8.97万人，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调查组发现，在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仅1968年，广西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至少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至少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

在云南沙甸事件的屠杀中，1975年7月底至8月初，解放军的镇压屠杀最终导致约1600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300名儿童。

在湖南道县大屠杀中，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7696人被他杀，1397人被逼自杀，2146人被致残。

在北京文革屠杀（红八月）中，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在1966年8-9月间，仅仅在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236][237]；而在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爆发了“大兴事件”，数天内先后有325人遭屠杀，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武斗、批斗及政治清洗

重庆文革墓群，埋葬着众多的重庆文革武斗的死亡者。

文革期间，自1967年“一月风暴”起，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党政机关，而后诸多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事件，中国大陆进入全面内战状态，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严重的武斗事件包括四川

泸州武斗事件、重庆大武斗、徐州大武斗、北京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新疆石河子事件及喀什武斗，等等。据估计，1967-1968年间，武斗共造成了30-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此外，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在文革期间遭到批斗，由群众组织的批斗大会时常举行，批斗方式包括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抄家、喷气式批斗等等。文革期间全国至少10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这些被赶出城市的人们，在农村没有住房，没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学，生活十分悲惨。批斗导致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或者自杀，其中有学者估计仅文革初期就有10-20万人自杀。

与此同时，政治清洗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大批人员受到牵连，除了在屠杀中直接死亡的人口外（包括官方处决），亦有许多人因遭受私刑而导致永久伤残、甚至被迫害致死。1968-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运动”）、1970年代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爆发了大量冤假错案，其中仅清队运动期间就有至少50万人非正常死亡。

1967-1969年，在内蒙古内人党事件中，上百万人被定性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成员，其中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依据1980年对于该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有34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死亡、81808人致残。

1968-1969年，在赵健民云南特务案中，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该案件导致138万7千余人受到牵连，1万7千余人被屠杀或遭私

刑迫害致死，另有6万1千多人致残。

在冀东“李楚离案”中，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被诬陷为叛徒，受迫害入狱七年，该案件牵扯8万余人，共有3000余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

1967年，在山东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又称枣庄“七·二五”、“七·二六”武斗事件）中，据官方数据，私设监狱共500多处，共有10万6百59人遭到毒打，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2425人、致残692人、被打死逼死至少94人。

红卫兵暴乱

文革时期宣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海报：“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文化大革命广泛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数量达数千万，而1966年8月起红卫兵进行了大串联，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全国铁路系统承载巨大压力。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而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

“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恐怖灾难。红卫兵武斗时期所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难以统计，而他们所带来的破坏不仅是对于中国历史文物及伦理道德的摧残，他们也影响了人民生活及社会秩序，交通、生产为之大乱。他们在各地互相串连，彼此交换经验，并免费供应食宿，分别建立了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组织”；为了“破四旧”，他们闯入了知识分子、

富人及官员们的家中，焚书、羞辱甚至毒打杀死屋主；学校也为他们所占据，教师成为他们批斗的对象，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寺院、宫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等也成为红卫兵的破坏对象。

文革初期由于当时的河北省会保定政局动荡，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署名向中央呈报《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情示报告》中提出把省会迁到石家庄，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同意河北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市。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市成立，石家庄从这一天起遂成为河北省会。省革委的成立和省会的确定，自申请到批准，再到完成，前后仅用七天时间，速度之快，是相当惊人的。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以后，中共中央从备战的角度考虑内蒙古的辖区过于狭长，就像南美的智利一样。北京军区防御不便，就决定把内蒙古的东三盟分别划给东三省归沈阳军区管辖、西三旗分别划给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归兰州军区管辖。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经过调整后，面积由118万平方公里变为4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大大缩小。这次行政区划变动主要是着眼于军事防御角度来考虑，再加上内人党事件的爆发。文革结束后，国务院1979年5月30日批准内蒙古自治区恢复1969年7月以前行政区划，以上行政区划于1979年7月1日起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经济状况

对于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各界的估计和评价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文革期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巨大冲击、企业生产和管理混乱，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时任副总理邓小平等人的努力对国民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保护和恢复作用。1977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估计，“文革”十年造成了5000亿元的国民收入损失，相当于建国30年内所有基建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依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文革期间中国有5年的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不超过4%，还有3年为负增长：1967年为负5.7%，1968年为负4.1%，1976年为负1.6%。对于文革后期1974-76年间的经济发展，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华国锋在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发布了《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道：“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的数据，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156美元，81%的人口为农民，全国文盲人数将近2亿、文盲率达25%。而在一同时期，在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中，人均GDP的平均值为490美元。1966年-1976年，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经济建设口号，期间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国家生产性建设投资占总投资的82.8%，远超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的投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由636元下降到了605元，全国居民的年平均消费水平十分低下，仅从125元增长到了165元，增长缓慢。

文革期间，以压缩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为代价，包括国防军事在内的生产性建设获得了一定的发展。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其中，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

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生产方面，1966年-1976年，钢产量增长33.5%，原煤产量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农业方面，1965年-1976年，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65年-1977年，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65年-1975年，全国机井数增长935.89%。此外，文革期间，华北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的扩建，刘家峡水电站投入使用，葛洲坝的开工；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以上。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

科学技术

1967年，民众庆祝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

反右运动和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甚至被贬低为“臭老九”。文革期间，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中国科研发展受到了重大冲击，许多科研项目停滞、科研队伍解散，仅在青海省核基地一处，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310多人伤残、40多名职工自尽、5人遭到枪决。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自杀身亡，而“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于1968年不幸空难逝世后，其太太李佩（中国语言学家）

被隔离审查、自杀未遂。此外，包括“两弹元勋”邓稼先、“氢弹之父”于敏在内的许多科研工作者及其家属受到政治迫害，钱三强和太太何泽慧一起被下放到陕西的五七干校，部分拥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污蔑为“间谍”或“特务”，只有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因为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名单而受到保护。

截止1968年底，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被打倒，全国范围内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而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就牵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其中被刑讯逼供、残酷迫害的科研人员和领导干部达607人，2人被打死、另有6人自杀。数学家熊庆来1969年被迫害致死，华罗庚被抄家3次、研究手稿散失，陈景润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曾跳楼自杀未遂。包括数理经济学家周华章、计算机学家周寿宪在内的至少8位曾留学美国的顶尖科学家被迫害而自杀，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熊十力、田汉、老舍、翦伯赞、傅雷、吴晗等因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而自杀或被迫害致死。

另一方面，在文革的困境中，科研人员和科学工作者依然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两弹一星”中的导弹、氢弹以及人造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以及初期杂交水稻的出现。其中，第一艘核潜艇于1958年起就开始研制，期间经历了大跃进、中苏交恶、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1960年初大多数科研人员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文革时期“白天养猪、修猪圈、接受批判”，晚上才有时间进行科研。而文革严重冲击了企业生产，导致送往核潜艇研究所的科研设备粗制滥造，可靠性差、达不到设计和使用不标准。

社会影响

文化教育

身穿红军军装的芭蕾舞剧演员出演样板戏《红色娘子军》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高考）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许多知名学者不堪羞辱，选择自杀。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在1966年8-9月间，仅仅在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被打死，其中包括许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33695户被抄家。

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强加到各大院校中。

青年与知识分子

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知识青年下乡，对农村开发建设起著微小的作

用，但是由于知识青年在乡间所受的教育不多，演化成知识青年务农的怪现象，对中国教育资源、人力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而由于农村的建设作用不大，20世纪中国大陆的农村依旧贫穷落后，其农村建设也不如邻近的日韩和台湾。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运动，曾经被苏联的一位评论家指为“师事托洛茨基的”，为了争权夺利，竟不择手段的利用青少年。

中华文化传统

在此阶段，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七五宪法》中提出的“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人身攻击。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工作者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

民族与宗教

文革期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限制，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发起武装起义，但受到镇压，譬如1975年在云南回族聚居区发生的沙甸事件。在西藏地区，红卫兵曾前往扎什伦布寺的佛塔将在该寺曾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挖出肢解抛弃。文革后，十世班禅大师只得把残存不齐的从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的灵骨聚集在一起。

文物古迹损毁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有大量文物被焚毁，古迹等也遭到摧毁破坏，给中

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文革中的千古暴政“破四旧”活动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古迹和遗产当成封资修的东西彻底破坏和毁灭。即使连“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迹也惨遭破坏。中国的许多名胜古迹没有在战争中毁灭，却在文革破四旧中破坏砸毁。而有部分古迹因时任总理周恩来派兵保护，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宫、西藏布达拉宫等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得以幸免。

对外关系

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大陆不仅对外输出革命，亦强硬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甚至认为“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导致与数十个国家关系紧张，与部分国家恶化到断交的地步，包括中非、印尼、加纳。譬如，文革期间，中国通过各驻外使馆、领馆，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并向当地华侨和国民强行散发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许多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甚至有外宾也被要求要面对毛泽东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进行“汇报”、“请示”。在国内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焚毁蒙古驻华大使专车事件、王府井“围攻外宾事件”等重大外交事件。

此外，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造反有理”这句口号被全世界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使用。

菲律宾：1968年菲律宾共产党按照毛泽东思想重建，其领导人活跃于菲律宾1970年的动乱时期一季风暴中。自那时起，菲共领导的菲律宾共产主义叛乱延续至今。

印度：1967年爆发了受中国革命道路鼓舞的纳萨尔巴里起义，由此开始的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及其前身领导的纳萨尔毛派叛乱对抗印度政府至今。

土耳其：1972年，崇尚人民战争思想的土耳其革命工农党左派正式组建土耳其共产党/马列，主要活动于土耳其东部，土耳其毛主义叛乱由此开始。

柬埔寨 民主柬埔寨：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和中国的资助下，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发起类似的大清洗运动，这场被称为“柬埔寨大屠杀”的种族灭绝运动最终在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后结束，据估计造成了150万至300万柬埔寨人的死亡，约占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日本：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引发了日本文艺界的强烈反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曾经居住于中国东北十数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石川淳四人于1967年联名发表声明反对文革。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长宫本显治在文革前夕访问中国，因拒绝与中共一同批判苏联而导致日中共产党决裂。部分支持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的日共党员独立或被开除出党，成立了日本新左翼中的数个毛泽东思想派别。新左翼领导下的日本学生运动中，有学生于东京大学事件期间在大学正门挂起毛泽东肖像并涂写文革口号“造反有理”，亦有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向防暴警察扔自制的燃烧弹。

英属香港：在文革期间爆发多次由共产党领导的激进左派工人罢工运动，之后演化成六七武装暴动，引发北京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葡属澳门：因澳葡政府拒绝氹仔坊众学校重建项目，发生一二·三事件

法国：1968年，发生全国性动乱五月风暴，工人、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游行[308]。

美国：各高校学生佩带红袖章示威[309]。成立于1966年的美国黑人民权组

织黑豹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之一，也曾高举《毛泽东语录》游行[310]。

澳大利亚：大学汉语系的学生自制红卫兵袖章卖钱，生意兴隆[311]。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于1966年11月以复兴文化之名义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抵制文化大革命，并组成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总统蒋中正则多次发表谴责演说，甚至已经指示中华民国国防部令五十万国军备战，战斗机天天升空演习，准备反攻大陆，据说蒋也以前黄埔军校校长身份与学生林彪保持信函联络；后因美国拒绝提供中华民国作战战略物资补给，趁大陆“文革”来“反攻大陆”作战之举方停。

朝鲜：在1964年秋，苏联勃列日涅夫上台之际，朝鲜与苏联恢复了关系。与苏联决裂的中国对此表示不满。1966年起，中国领导人以及红卫兵谴责金日成是修正主义者，朝鲜则批评中国的领导人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中朝两国甚至互相召回大使，两国关系跌至冰点。但是，中国对毛泽东的崇拜之风反而使朝鲜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加以强化，朝鲜和中国一样在强调独立思想体系。

改革开放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复苏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文革平反后，中共认为改革开放是完成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直接步入长期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来掩饰实质上的路线变动。

21世纪

文革至今仍没有得到官方清楚的过程呈现、事件记录，缺少多角度多主体的讲述，更遑论全面分析和吸取教训。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海外进行的。有关文革的记录和研究成果，大多在海外出版。中国国内的记录、研究特别是发表仍然是一个禁区，即使以个人回忆录方式呈现对那段历史有所涉及的作品，也是相当有限的。

2012年3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表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温家宝还表示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再次发生。

有学者指出，中国第五代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许多言论和举措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复辟，推崇个人崇拜、煽动民族情绪、背离宪政主义，还有人认为这有可能将中国推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

=====

=====

=====

=====

=====

=====

=====

Handwriting practice lines consisting of multiple sets of three horizontal lines (top, middle, and bottom lines) for letter formation.

Handwriting practice lines consisting of multiple sets of three horizontal lines (top, middle, and bottom lines) for letter formation.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ultural_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

期间 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10年143天）

地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

动机 通过从中国大陆的中国社会中清除残留的资本主义和传统元素，维护中国的共产主义。

结果 经济活动停止了，历史和文化遭到破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剧烈的社会政治清洗运动，其既定目标是保持中国共产主义，清洗资本主义和中国社会传统元素的残余，并重新提出毛泽东思想作为主要意识形态。革命标志着毛泽东从大跃进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之后重新回到了中国的中央权力地位。大跃进的失败仅在五年前促成了大中国饥荒。

1966年5月，在文化大革命组织的帮助下发起了运动；毛泽东不久就呼吁年轻人“轰炸总部”，并宣称“叛乱是正当的”。为了消灭中共内部以及学校，工厂和政府机构中的对手，毛泽东指责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渗透到政府和社会中，以恢复资本主义。他坚持要求通过暴力的阶级斗争来消除修正主义者；中国的青年以及城市工人对此进行了回应，在全国各地组成了红卫兵和“反叛团体”。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967年常分裂成对立派别的群体，并经常发生“暴力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派遣到各地以恢复秩序。

编制了一份毛泽东语录红宝书；这成为针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一个神圣的文本；林彪，中共中央副主席，被写入了宪法、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革命的活跃阶段将持续到至少1971年；当时林彪因对毛泽东的虚假政变而逃亡，死于飞机失事。1972年，“四人帮”上台，“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中国经济和传统文化，估计造成的死亡人数在数十万至两千万之间。“红八月”的北京发生了屠杀；大屠杀发生在中国大陆很多地区，包括广西大屠杀（发生了大量的人吃人事件）；内蒙古事件；广东省大屠杀；云南大屠杀；湖南大屠杀。红卫兵摧毁了历史文物，洗劫了文

化和宗教场所。1975年板桥水库崩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灾难之一。与此同时，数以千万计的人遭到迫害：高级官员，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邓小平，彭德怀和贺龙，等等，遭到清洗或流放；数以百万计的人被指控为“黑五类”成员，遭受公众羞辱，监禁，酷刑，强迫劳动，扣押财产，有时会被直接处决或骚扰为自杀；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臭老九”，受到了广泛的迫害；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如老舍，傅雷，姚同斌和赵九章被杀或自杀。学校和大学因高考取消而关闭。超过1000万的城市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的上山下乡运动。

1978年，邓小平成为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并启动了“拨乱反正”计划，该计划逐渐取消了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毛主义政策，并使该国恢复了秩序。邓小平通过发起历史性的改革开放计划，开始了中国的新阶段。1981年，中国共产党宣布文化大革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最严重的挫折和最大的损失负责”。

背景

大跃进

1958年，在中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毛泽东呼吁实行“基层社会主义”，以加快实现将中国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计划。本着这一精神，毛发动大跃进，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开始了大规模动员人们进行集体化改造。许多社区被分配生产一种商品——钢铁。毛发誓要把农业生产提高到1957年水平的两倍。

大跃进期间，农村的人们在夜间工作以生产钢铁

大跃进是经济上的失败。许多未受过教育的农民被迫从耕种和收割中撤出，取而代之的是指示他们大规模生产钢铁，部分依靠“土法炼钢”来实现当地干部设定的生产目标。生产的钢材质量低下，几乎没有用处。大跃进减少了收获的规模，导致除不合格生铁和钢铁外的大多数商品的产量下降。此外，地方当局经常夸大产量，隐藏并加剧了这一问题。同时，集体的混乱，恶劣的天气以及确保硬通货所必需的粮食出口，导致货币贬值。中国大饥荒。粮食极度短缺，产量急剧下降。饥荒造成超过3000万人死亡，特别是在更加贫困的内陆地区。

大跃进的失败削弱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声望。1959年，毛泽东被迫承担重大责任，辞去了中国国家法律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一职，由刘少奇继任；而毛泽东仍然担任党的主席和总司令。7月，党的高级领导人在风景秀丽的庐山召开会议，讨论政策。在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给毛的一封信中批评了大跃进的政策，称其管理不善和告诫不要将政治教条抬高到经济学定律上。

尽管彭的来信语气温和，毛泽东却把这当作对他的人身攻击。在会议之后，毛泽东将彭撤职，并指责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彭由另一位革命军将领林彪接任；林后来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变得更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庐山会议成为毛泽东最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彭的丧钟。它也导致权力转由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的温和派；他们在1959年后有效地控制了经济。

到1960年代初，由刘，邓和总理周恩来带头的倡议，扭转了大跃进的许多经济政策。这群温和的实用主义者对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并不热心。毛泽东由于在党内失去了尊严，过上了一种看似颓废而古怪的生活方式。到1962年，当周，刘和邓管理国家和经济事务时，毛泽东有效地退出了经济决策，并将大部分时间集中在进一步考虑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理论的贡献上，包括“继续革命”的思想。

中苏分裂与反修正主义

19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党国家。尽管起初他们是相互支持的，但在约瑟夫·斯大林去世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崛起成为苏联领导人之后，出现了分歧。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及其政策，并开始实施后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改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其他成员反对这些变化，认为它们会对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产生消极影响；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斯大林仍然被视为英雄。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没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修正主义者；毛泽东担心这会使资本家重新获得对国家的控制。中苏两国政府的关系恶化了。苏联拒绝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主张，并拒绝保持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承诺。

毛泽东在1960年4月公开谴责修正主义。在没有指责苏联的情况下，毛泽东批评了其意识形态同盟南斯拉夫联盟。反过来，苏联批评了中国的盟友阿

尔巴尼亚劳动党。1963年，中共开始公开谴责苏联，发表了九篇针对苏联的修正主义的论战，其中之一被称为《赫鲁晓夫的虚伪共产主义和世界的历史教训》；其中毛泽东指责，赫鲁晓夫不仅是修正主义者，而且增加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1964年的苏联政变导致赫鲁晓夫下台；这也加剧了毛泽东对自己的政治脆弱性的恐惧，这主要是由于在大跃进之后他在同事中的声望下降。

文化大革命序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cialist_Education_Movement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被称为四清运动，是毛泽东于1963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的运动。毛泽东试图消除中国共产党官僚中的反动派分子；他说，“治理也是社会主义教育的过程。”

中国研究人员指出，这一运动至少造成77,560人死亡，有5,327,350人受到迫害。在运动中，毛泽东与中国第二任国家主席、潜在继任者刘少奇之间的关系恶化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前身；在文革期间，刘被迫以“叛徒”和“走资派”之罪而死。

目标

该运动的目的是清洗政治，经济，组织和意识形态（四个清洗）；一直持续到1966年。这一运动的结果是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或在工厂和农民中工作。

后果

唐纳德·克莱因（Donald Klein）在《美国百科全书2007》（Grolier Online）中将该活动描述为“几乎完全失败”。毛泽东对此计划的低效率不满；毛的这种不满情绪也为“文化大革命”（1966–1976）奠定了一定基础。在红色八月期间，“破四旧”的运动始于1966年8月19日在北京举行。

针对罗瑞卿将军的大清洗据说巩固了军队对毛泽东的忠诚。

1963年，毛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前身。毛泽东通过“清理”驻扎在北京的忠诚度不高的可疑官员，为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他的方法不够透明，通过报纸上的文章，内部会议以及熟练地利用他的政治盟友网络来实现这一目标。

1959年末，历史学家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表了一部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剧中，一个诚实的公务员，海瑞，被腐败的皇帝撤职。尽管毛泽东最初称赞该剧，但是在1965年2月，他秘密地委托妻子江青和上海宣传员姚文元发表一篇批评该剧的文章。姚大胆宣称海瑞其实是一个攻击毛泽东的寓言；也就是说，毛泽东是腐败的皇帝，彭德怀是诚实的公务员。

姚的文章受到北京市市长彭真的阻碍。彭是吴晗的直接上级，是“五人集团”的负责人。“五人集团”是由毛泽东任命的委员会，负责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彭真意识到如果吴晗真的写一部“反毛”戏剧，他会受到牵连。他希望遏制姚的影响力。姚的文章最初仅在部分地区性报纸上发表。彭禁止在全国发行的《人民日报》和他控制下的其他主要报纸上刊登该文。毛一边部署针对彭真的“文学之战”，一边解雇了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基于一系列没有证据的指控）；毛用自己的安全保卫负责人汪东兴取代了杨尚昆。杨的解雇使毛泽东的盟友可能更加大胆地针对反对派开展斗争。

在此之前的12月，国防部长兼毛主义者林彪指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将军是反毛派，指称罗过于重视军事训练，而不是毛泽东的“政治讨论”。尽管毛最初对罗有罪的政治指控表示怀疑，但是毛泽东还是进行了“调查”，此后罗被批斗、解雇，并被迫进行自我批评。事件的压力导致罗试图自杀。罗的免职确保了军事司令部对毛的忠诚。

驱逐了罗和杨之后，毛泽东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彭真身上。1966年2月12日起，“五人小组”出台一个被称为“二月纲要”的报告。受党中央批准的《二月纲要》将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定义为建设性的学术讨论；这旨在使彭真摆脱所受的政治压力。但是，江青和姚文元继续谴责吴晗和彭真。同时，毛泽东还解雇了彭真盟友、宣传部主任陆定一。

陆的免职使毛派主义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新闻界。在忠实的政治局会议

上，毛泽东通过忠诚主义者康生和陈伯达对彭真施加最后一击。他们指责彭真反对毛泽东，称“二月纲要”是“彭真修正主义的证据”，并将他与其他三名被贬的官员归为一类，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一部分。5月16日，政治局通过发布正式文件，正式谴责彭真及其“反党盟友”，正式解散了他的“五人集团”，并以新的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早期：群众运动（1966–68）

5月16日通知

1966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不是关于政策的共同讨论（按照党的常规规范），而是一场动员政治局认可毛泽东政治议程的运动。会议充斥着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言论，并充斥着精心准备的关于刚被罢免的领导人如彭真和罗瑞卿的“起诉书”。其中的一份文件于5月16日发布，是在毛的亲自监督下编写的；其中说道：——

那些潜入党，政府，军队和各个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是一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将夺取政治权力，将无产阶级的专政变成资产阶级的专政。其中一些我们已经看穿了；其他还有很多隐藏的。有些人仍然受到我们的信任，并正在接受我们的关于继任者的培训，例如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他们仍然在我们身边。

该文本被称为“5月16日通知”；它概括了毛泽东对于文革的意识形态辩

护。实际上，这暗示着共产党内部有共产主义事业的敌人：阶级敌人；他们“挥动红旗反对红旗”。识别这些人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尽管党的领导层在批准毛泽东议程的总体方向上相对团结，但许多政治局委员并不特别热情，或者是对运动的方向感到困惑。在中国知识界和八个民主党派中，关于对像彭真这样的尊贵的政党领袖的指控，人们感到极大震惊，并意识到这敲响了警钟。

早期群众集会（1966年5月至6月）

彭真被清洗后，北京市政府实际上已经停止运作；这为首都的混乱铺平了道路。5月25日，在毛泽东心腹康生的妻子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聂元梓，撰写了一份大字报。聂攻击了北京大学的党政领导。聂暗示，像彭真一样，北京大学领导层正试图遏制革命的热情，包藏推动修正主义的“阴险”企图。

毛立即认可聂的《大字报》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大字报”。聂的呼吁，现在已经盖上了毛的个人认可印章，在中国所有教育机构中产生了持久的连锁反应。各地的学生开始反抗各自学校的党组织。北京中小学的课程立即被取消，随后于6月13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暂停上课。到六月初，成千上万的年轻示威者在首都的主要道路两旁排队，手持巨型的毛泽东画像，打鼓，喊着口号反对他的敌人。

6月初公开解雇彭真和市委领导时，引起了广泛的混乱。对于彭真被赶下台的原因，公众和外国使团一无所知。即使是党的其他最高领导层成员们也被突然的造反抗议浪潮搞得措手不及，并为下一步的行动而苦苦挣扎。

刘、邓试图寻求当时身居杭州的毛泽东的指导；随后，刘邓决定向基层派遣工作组、“思想宣传队”；工作组被派遣到各个学校、以及人民日报社；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某些秩序，恢复了对党的控制。

工作团队是匆忙派遣的，对学生的情绪了解甚少。与1950年代将知识分子直接作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不同，新政治运动的重点目标是成熟的共产党员干部，其中许多目标是工作团队本身的一部分。结果，工作团队越来越被怀疑，他们本身是另一个旨在阻挡和挫败革命狂热情绪的团体。随后，对于是否应保留“工作团队”，党的领导层出现了分歧。刘少奇坚持要继续让工作团队保留下来，并压制运动中最激进的因素，担心运动会失控。

“轰炸总部”（1966年7月）

毛刘冲突

1966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破裂。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目标，是党的所谓“资产阶级总部”。

7月16日，现年72岁的毛泽东主席来到武汉的长江，进行标志性的“跨越长江游泳”（这被中国报刊电影等广泛报道），以展示他的战备状态。随后，他返回北京展开斗争，批评该党领导层的处理工作团队问题。毛泽东指责工作组破坏学生运动，要求他们在7月24日全部撤出。几天后，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集会，宣布决定，并为大学和高中教师和学生树立新的运动基调。在集会上，党的领导告诉集会的群众“不要害怕”，并勇敢地展开运动，不受党的干涉。

工作团队问题标志着刘少奇主席在政治上的决定性失败。这也表明，在如何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不断发展的事件上的分歧，将使毛泽东不可逆转地脱离党的既有领导层集体。8月1日，第十一届全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仓促召开，推进毛泽东的激进的议程。在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表现出对刘的完全不屑一顾，在开幕日致辞时一再打断刘。几天来，毛泽东反复暗示党的领导违反了他的革命视野。毛泽东的思路受到了与会人员的冷淡反应。毛泽东意识到党的精英阶层不愿全面接受他的革命意识形态，于是继续发动了进攻。

北京红卫兵

7月28日，红卫兵代表写信给毛泽东，呼吁造反和动乱，以保卫革命。毛泽东随后通过写他自己的大字幅题为“炮打司令部”的海报来回应这些信件，召集人们以“反革命的指挥中心（即总部）”为目标。毛泽东写道，尽管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但“资产阶级”精英仍然在政府和共产党的“权威职位”中蓬勃发展。

尽管未提及任何名字，但毛泽东的挑衅性言论被解释为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据称是中国资产阶级总部）领导层的直接起诉。全体会议上的人事变动反映了党的层次结构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设计，以适应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格局。刘和邓在政治局常委上保持席位，但实际上在日常的党务工作中处于退位。林彪被提升为党的第二人物。刘少奇的排名从第二下降到第八，不再是毛泽东的继承人。

与最高领导层被撤职相比，共产党整个国家的官僚机构彻底瓦解了。负责党务人员的庞大组织部几乎不复存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革命卫队”在文化大革命小组中脱颖而出，以传播他的思想体系并获得民众的支持。原有的党的宣传部的高级官员被解雇，其许多职能都被纳入了新的革命卫队、文革小组。

红色八月和十六条（1966年8月）

《红皮书》（毛泽东语录）是导致红卫兵致力于实现其作为中国未来的目标的机制。这些直接来自毛的名言，导致红卫兵在其他毛主义领导人的观点下采取了相关行动；到1967年12月，已印制了3.5亿本书。毛泽东提供的《红皮书》后来被红卫兵用作指导的许多语录之一是：

这个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它是你们的。你们年轻，富有朝气和活力，正处在生命的绽放中，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属于你们。中国的未来属于你们。

在1966年8月8日北京红色八月期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来被称为“十六条”。该决定将“文化大革命”定义为“一场伟大的革命，将人们深深地动员起来；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更深，更广泛的阶段”：——

尽管资产阶级被推翻了，但它仍在试图利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文化，习俗和习惯来腐败群众，俘获他们的思想，并卷土重来。无产阶级必须做相反的事情：它必须直面资产阶级的每一个挑战……以改变社会的观念。当

前，我们的目标是与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作斗争，批评和否定反动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以及所有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并改变教育，文学，文化，艺术以及上层建筑中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符的所有其他部分，以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十六条”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将原本是学生为主的运动提升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这将激发工人，农民，士兵和下层党的工作人员崛起，挑战权威并重塑社会的“上层建筑”。

毛泽东主席在1966年与红卫兵举行了八次群众集会。

在1966年8月18日北京红色八月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万名红卫兵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与主席进行了个人交流。毛泽东亲自与红卫兵交往，并鼓励他们积极进取；他自己戴上了红卫兵臂章。林彪在8月18日的集会上也占据了中心位置，大声疾呼谴责阻碍中国“革命进程”的中国社会各种形式的敌人。随后，大规模屠杀在北京开始，红色恐怖迅速传播到中国其他地区。

1966年8月22日，中央发布了一项指令，以阻止警察干预红卫兵的活动，而在警察部队中违反该通知的人被标记为反革命分子。毛对叛乱的赞扬鼓励了红卫兵的行动。中央官员解除了对暴力行为的限制，以支持革命。国家警察局长谢富治经常原谅红卫兵的“罪行”。在大约两周的时间里，暴力事件仅在北京西城区就造成了约100名官员丧生。受伤人数超过了这个数字。

这场运动中最暴力的方面包括酷刑，谋杀和公众屈辱事件。被起诉为反革命分子的许多人死于自杀。1966年8月红色革命期间，仅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谋杀，许多受害者是老师；他们遭到自己学生的袭击甚至杀害。在上海，9月份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自杀有704例，死亡534例。同期，武汉有62起自杀案和32起谋杀案。彭德怀被带到北京、被公开羞辱和嘲笑。

破四旧

1966年8月至11月，举行了八次群众集会，来自全国各地的1200万人参加了这些游行，其中大多数是红卫兵。政府承担红卫兵在全国各地旅行、交换“革命经验”的费用。

在红卫兵集会上，林彪还呼吁消灭“四旧”，即旧有的习俗，文化，习惯和思想。一场革命性的狂热席卷了整个国家，而红卫兵则是最杰出的战士。其中，与“破四旧”运动有关的一些变化主要是温性的，例如为城市的街道，地方甚至人们分配新的名字。在此期间，数以百万计的婴儿出生时都带有“革命性”的名字。然而，红卫兵活动的其他方面更具破坏性，特别是在文化和宗教领域。全国各地的各种历史遗迹被摧毁。破坏在首都北京特别明显。山东省孔庙，和其他许多历史著名古墓和文物，都被破坏。充满历史和外国文字的图书馆被毁；书籍被焚烧。寺庙，教堂，清真寺，修道院和公墓被关闭，有时被改作其他用途，遭到抢劫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把佛教描述为迷信，宗教被视为敌对的外国渗透手段和统治阶级的工具。神职人员被捕并送往劳改营地；许多藏传佛教徒被迫在枪口下摧毁其修道院。

中央工作会议（1966年10月）

1966年10月，毛召集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说服尚未接受革命意识形态的党内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部分被起诉，并屈从于自我批评。会议结束后，曾经是统治阶层的有实力的温和派政治家、刘少奇在北京被软禁，然后被送到拘留所，在那里他被拒绝治疗并于1969年去世。邓小平被送去接受了三次再教育，最后被送往江西省的一家发动机厂工作、劳动改造。

激进分子夺取政权（1967）

中国的群众组织结成两个敌对派别，分别是支持毛泽东净化共产党的激进分子，和支持温和主义路线的保守派。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生日聚会上宣布了一场“全面内战”，以解决对峙问题，并要求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支持“左派”，但对于何谓左派尚无明确定义。解放军指挥官与党的既有建制派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许多军事单位反而压制了毛泽东路线的激进分子。

在北京活动的推动下，“夺权”运动遍布全国各地，并开始拓展到工厂和农村。在上海，一个名叫王洪文的年轻工厂工人组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革命联盟；这个联盟取代了现有的红卫兵组织并使后者被流放。1967年1月3日，在中央文革小组重量级人物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支持下，一群激进分子推翻了陈丕显领导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即所谓的“一月风暴”，并成立了上

海人民公社。

在上海举行的活动受到了毛的赞扬，毛在整个中国鼓励了类似的活动。省市县政府以及党的官僚机构的许多部门受到影响，以不同的方式被夺取权力。随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代替地方政府和共产党的分支机构。例如，在北京，三个互相独立的革命团体在同一天宣布夺取政权；而在黑龙江，省党委书记潘复生设法在自己的领导下从党组织“夺取了政权”。其他地方的一些领导人甚至主动给文革小组写信要求被推翻。

在北京，副总理陶铸成为江青和张春桥的攻击目标。夺权运动也在军队中掀起风浪。当年二月，著名将领叶剑英和陈毅，以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明确表达他们对当前激进运动的反对；有一些党内元老暗示文革小组的真实动机是去除革命老将。对此，最初态度不明的毛泽东于2月18日组织政治局会议，直接谴责老帅们的抵抗行动，并充分支持了激进分子的活动。老帅们这次短暂的抵抗被称为“二月逆流”；毛泽东对于“二月逆流”的反击，有效地保证了接下来几年中的反抗声音完全消失。

尽管革命者们在全国各地拆除了政府部门和党组织，但由于夺取政权缺乏集中的领导，现在还不清楚谁真正相信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以及谁是机会主义地利用混乱谋取自己的利益。敌对的革命团体的形成，是各地内部长期存在的互相仇恨的某些表现了；这导致全国各地的派系暴力斗争。群众组织和军队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越来越大。作为回应，林彪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军队援助激进分子。同时，军队控制了一些无法理清自己的权力过渡的省和地区。

像许多其他城市一样，在武汉这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出现了两个主要的革命组织；一个支持保守派，另一个反对。两个团体争夺城市的控制权。负责该地区的陆军将领陈再道强行镇压了由毛泽东支持的反建制示威者。然而，在动乱期间，毛泽东本人随同一大批中央官员飞赴武汉，以试图确保该地区的军事忠诚。1967年7月20日，当地的煽动者绑架了毛泽东的使者王力；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武汉事件。随后，陈再道将军被派往北京，并受到江青和文化大革命组织其他成员的审判。陈的抵制努力是解放军内部对于文革运动之抵制的最后一次公开展示。

“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本人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最关键的因素不是红卫兵、中央文革小组、或“造反派工人”组织，而是解放军的立场。当解放军当地驻军支持毛泽东激进分子时，激进分子们就能够成功接管地方政府；但如果他们不合作，夺取政权就不会成功。一位历史学家说，几乎所有城市都发生了暴力冲突。为了应对武汉事件，毛泽东和江青开始组建一支“工人武装的自卫队”，这是一支“群众性革命武装”，以反击毛泽东所估计认为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成员中75%的右倾”。

重庆是武器制造的中心，是两派之间激烈的武装冲突的地点；该市的一个建筑工地估计有10,000名战斗人员组织，其中包括坦克，机动火炮，高射炮，等等；实际上包含了“几乎所有常规武器”。1967年8月，重庆发射了一万枚炮弹。在全国范围内，总共有1877万支枪支，14828枚火炮，2719545支手榴弹最终落入平民手中，并用于暴力斗争中；这种斗争主要发生在1967年至1968年之间；在重庆，厦门和长春等城市，部署了坦克，装甲车甚至军舰进行战斗。

政治清洗和“下乡”（1968）

清理阶级队伍（5月至9月）

1968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发起了大规模的、称为“清理阶级阶级”的政治清洗活动。许多人被送往农村或劳动教养所工作。

1968年7月27日，红卫兵的统治正式结束。一年后，红卫兵各派被彻底瓦解。毛泽东预言，混乱的状态会与革命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利用红卫兵的目的已被基本实现。毛泽东已经和他的激进同事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建制派。

1968年9月，刘少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共产党开除，被贴上“资产阶级的司令部”的标签。

下乡运动（1968年12月）

1968年12月，毛泽东开始了“下乡运动”。在接下来的将近十年中，居住在城市中的年轻人被命令去乡下体验工作生活（在1970年代后期，这些学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城市）。文革初，许多曾是红卫兵成员的学生都支持文革运动和毛泽东的远见。因此，这一“上山下乡”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将红

卫兵从城市转移到乡村的一种手段，因为这将减少对社会的破坏。它也有助于在中国各地传播革命思想。

“芒果热”与毛泽东的人格崇拜（1968年8月）

1968年春，一场旨在提高毛泽东声誉的大规模运动开始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芒果热”。1968年8月4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锡德·沙里富丁·皮萨达向毛泽东赠送了40个芒果；这是一个明显的外交友好表示。8月5日，毛泽东让助手将这箱芒果送到清华大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该队驻扎在那里，在红卫兵各派之间保持和平、避免冲突。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5日下午，当毛主席把芒果送给“首都工人和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好消息传到清华大学校园时，人们立刻聚集在毛泽东主席的礼物下。他们热烈地高呼和歌唱。他们泪流满面，一次又一次地真诚地希望我们最心爱的伟大领袖生活一万年。....他们把这个好消息传遍了各自的单位，还整夜组织各种庆祝活动；尽管下雨，他们还前往中南海，汇报了好消息，并对伟大的领导人毛主席表示忠诚。

随后，政府官员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来宣传这个芒果礼物。《人民日报》上的一首诗说道：“看到那个金色的芒果/就像看到伟大的领导人毛主席一样.....一次又一次地令人感动的金芒果/金芒果太温暖了。”当时在中国很多地区，几乎没有人曾经见过芒果，而芒果被视为“一种极其稀有的水果，如不朽的蘑菇”。

其中一颗芒果被送到北京纺织厂；其革命委员会组织了一场纪念芒果的集会。工人们宣读了毛泽东的名言，并欢庆了礼物。圣坛竖起，显着地展示了果实。几天后，当芒果皮开始腐烂时，革委会将水果去皮并在一锅水中煮沸。工人随后排队依次上前，给每人一勺芒果水。革命委员会还制作了芒果的蜡像，并将其作为工厂的核心陈列展品。随后几个月，这场“芒果热”传遍了许多地方，因为这种水果成为对于毛主席“无限忠诚”运动的焦点象征。人们制造了更多的仿制芒果；这些仿制芒果被送往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巡回展出。许多革命委员会从边远省份来到北京，尊敬地瞻仰这些芒果仿制品。仿制品抵达成都时，约有一百万人前来向芒果复制品致意。数以百万计的标有芒果和毛泽东的徽章和墙贴被制作出来。

芒果成为了官方政治宣传战役的一部分；组织了许多大游行来庆祝这个珍贵的礼物。一个小城的牙医、韩医生看到了芒果，说芒果没什么特别的，看上去就像地瓜。他因恶意诽谤而受到审判，被判有罪，在全城公开游行，然后被枪杀。

有人声称，毛泽东用芒果来表达对工人的支持；工人们竭尽全力结束学生之间的派系斗争，这是“毛泽东的象征性支持战略的典范”。直到1969年初，来自全国各地的、在北京的毛泽东思想研究班的参与者都带着大量生产的芒果仿制品回到家乡，并在各省得到媒体的关注。

林彪阶段（1969–1971）

权力移交（1969年4月）

第九届全国党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举行；这是在前几年的斗争中摧毁了许多旧党员之后，以崭新的思想和新的干部“振兴”该党的一种手段。两年前的党的体制框架几乎完全崩溃了；本次大会的代表是由各地革命委员会产生的。军事代表与上届代表大会相比有很大增加（代表中有28%是解放军成员）；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更多的解放军成员数量反映了这一增加。许多提升到高级职位的军官忠于解放军林彪元帅，从而在军方和文职领导之间产生了新的派系鸿沟。

“我们不仅感到无限幸福，因为我们有伟大的领导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且因为拥有林副主席作为毛主席的继承者，而感到极大的幸福。”

—周恩来总理在第九届党代会上

林彪被正式提升为党的第二号人物，他的名字被写入共产党的党章，成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公认的继任者”。当时，世界上没有其他共产党或政府采用将现任领导人的继任者纳入其宪法或党章的做法；这种做法是中国独有的。林在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强硬派左派人士姚文元和张春桥起草了一份文件。该报告严重批评了刘少奇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并从《小红皮书》的引文中广泛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大会巩固了毛主义在党内思想中的核心作用，重新将毛主义作为党的官方指导思想纳入党章。最后，大会产生了新的政治局；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和康生成为新的政治局常委。林，陈和康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被降职的周在大会上表示了对林的明确支持。毛泽东还恢复了一些正

式的党政机构的职能，例如该党的政治局的运作；该局在1966年至1968年间停止运作，原因是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控制了该国。

解放军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970）

林彪元帅在1969年被宪法党章确认为毛的继任者。

毛泽东在重组党和国家机构的努力中产生了混杂的结果。虽然北京的政治局势稳定，但是许多遥远的省份仍然动荡不安。尽管宣称第九届党大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暂时的“胜利”，但地方上的派系斗争仍在进行，其中许多斗争是激烈而严重的。此外，尽管毛泽东努力在大会表现出团结一致，但林彪的解放军阵营和江青领导的激进阵营之间的派系分歧却在加剧。确实，对江青的个人厌恶导致了许多平民领导人，其中包括著名理论家陈伯达，与林彪更接近。

1966年至1968年，中国在国际上与世隔绝，宣布对苏联和美国都怀有敌意。1969年3月，随着中国领导人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乌苏里河上发生边界冲突后，与苏联的摩擦冲突加剧了。10月，高级领导人从北京撤离。10月18日，在紧张局势中，林彪在没有通过毛泽东的情况下，发布了一份行政命令，为解放军的11个军区的备战工作做准备。这引起了主席的愤怒；毛主席将其视为证明他的权力已被其宣布的继承人过早篡夺的证据。

战争的前景使解放军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以牺牲毛泽东为代价提高了林彪的地位。有证据表明，毛泽东被迫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

系，以此避免解放军在与苏联的军事对抗中在国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在1972年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晤时，毛暗示林反对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

国家主席职位

在林被确认为毛的继任者之后，他的支持者们集中于恢复国家主席的地位；这个职位在刘少奇被清洗后，暂时被毛废除了。他们希望通过允许林担任主席或副主席的宪法角色，使林的继任被进一步制度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共识是，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林任副主席；但是出于未知的原因，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恢复这一职位、并拒绝承担这一职务。

1970年8月下旬在庐山举行的第九届全国党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派系之间的争夺加剧。尽管毛泽东反对恢复国家主席职位，但现在与忠于林的解放军派别结盟的陈伯达激起了对恢复中国国家主席职位的支持声潮。此外，在关于毛泽东主义的评价总结上，陈还对引致文化大革命混乱的坚定的毛主义者张春桥发动了进攻。

对张的攻击在全体会议上获得了许多与会者的青睐；但是，这被毛泽东解读为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间接攻击。毛公开面对陈，谴责他是“虚假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把他从政治局常委中除名。除了清洗陈以外，毛泽东还要求那些追随林彪的将军部下们对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进行自我批评，以此警告林彪。毛泽东还招募了他的一些支持者进入中央军事委员会，并使忠于他的忠实分子成为北京军区的领导角色。

林彪叛逃（1971年9月）

到1971年，领导层的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之间的利益明显分歧。毛泽东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显著地位而感到烦心；对陈伯达的清洗，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渐减少政治参与度的开始。据官方消息说，林彪的支持者们意识到林的权力基础在减少，健康状况不断下降，因此策划动用军事力量推翻毛泽东。

林的儿子林立果和其他高级军事策划者在上海成立了政变组织，并将该计划称为“571计划大纲”——以武力驱逐毛泽东的计划，这听起来与汉语中的“武（装）起义”相似。林彪是否参与了这一过程，历史学家们对此有争议。尽管官方消息人士称林彪计划并执行了所谓的政变企图，但一些学者却将林彪描述为由其家人和支持者操纵的被动人物。他们争辩说，林彪从未亲自参与起草《571纲要》；有证据表明，林立果起草了政变计划。

据称，该计划主要包括通过使用空军进行空中轰炸的计划。它最初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为目标，但后来又以毛泽东本人为目标对象。如果计划成功，林将逮捕他的政治对手并掌权。据称曾于1971年9月8日至9月10日在上海对毛泽东进行暗杀尝试。据认为，关于毛泽东的安全隐患已被报告给主席。一份内部报告称，林计划炸毁毛到达北京时要穿过的一座桥梁。据报道，毛在收到情报报告后避开了这座桥。

林彪死亡

在关于1971年9月13日的官方叙述中，林彪，他的妻子叶群，林立果及其幕

僚试图逃到苏联寻求庇护。在途中，林的飞机在蒙古坠毁，机上所有人员丧生。这架飞机在前往苏联的途中显然没油了。负责调查该事件的苏联团队无法确定坠机原因，但认为飞行员正在低空飞行以逃避雷达、并错误判断了飞机的高度。

外国学者对官方说法提出了质疑，他们对林选择苏联作为目的地，飞机的路线，乘客的身份以及政变是否真正发生表示怀疑。

9月13日，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林彪。直到9月30日，林的死亡才在北京得到确认；这导致第二天的国庆庆典活动取消。中央一直保密，事件发生后两个月才向公众发布林的死亡消息。林的许多支持者在香港寻求庇护。那些留在大陆的人被清洗了。这一事件使党的领导层措手不及；林叛变毛泽东的行为使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言论丧失了合法性，因为林已经作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继任者”被载入党章。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中，党的政治宣传机构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正确的叙述方式”来构造事件以供公众使用。

“四人帮”（1972–76）

对周和邓的敌对行为（1972–73）

毛泽东的妻子，四人帮的一员江青与总理周恩来和康生在北京接见了红卫

兵。他们都手里拿着《小红皮书》（毛语录）。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变得沮丧，开始隐居。林走了，毛泽东没有谁能接任他。毛泽东感到突然失去方向，试图与他过去谴责的老同志们取得联系。同时，1972年9月，毛泽东从上海调动了38岁的干部王洪文到北京，并任命他为党的副主席。王，曾是农民出身，以前是工厂工人；他现在似乎是在作为接班人接受培训。林逃亡后，江青的地位也得到了加强。她在激进阵营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随着毛泽东健康状况的下降，很明显江青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她与王洪文以及宣传专家张春桥和姚文元结盟，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后来被称为“四人帮”。

到1973年，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斗争，许多下级机构，包括地方政府，工厂和铁路，都缺乏执行基本职能所需的能干人员。该国的经济陷入混乱；必须恢复被清除的下层官员。但是，该党的核心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和左翼激进分子所严密控制；他们的重点仍然是坚持意识形态的纯洁而不是发展经济生产力。经济大部分仍是周恩来的领域；周是少数几个“左派”温和派之一。周曾试图恢复经济的运行，但遭到四人帮的愤怒反对；他们认为周是后毛泽东时代之继任者的主要政治威胁。

1973年末，为削弱周的政治地位并清除林的明显背叛，在江青的领导下发起了“批判林彪、批判孔子”运动。它的既定目标是清除中国新的儒家思想，并谴责林彪的行为是叛逆和退缩的行为。这场政治战役是通过历史寓言进行的（这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尽管在这场战役中从未提及周恩来的名字，但总理的历史同名人物——周公是一个经常被攻击的目标对象。

邓的复兴与经济重建（1975）

由于经济脆弱，周患上癌症，邓小平回到了政治舞台。1973年3月，在毛泽东批准下，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这是对邓的一系列晋升计划的一部分。1975年1月，周退出政治活动后，邓小平在很短的时间内实际上被任命为政府，党和军队的负责人，并获得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共产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额外头衔。

邓小平的复兴速度，使激进派感到非常意外；他们将自己视为毛泽东的“正当”政治和意识形态继承人。毛泽东想用邓小平作为政府军事派系的镇压力量，以压制那些以前忠于林彪的人的剩余影响力。此外，毛泽东对四人帮的经济管理能力也失去了信心，并将邓小平视为有能力和有效的领导人；——让该国深陷贫困，对毛泽东努力保护的文化大革命积极遗产无济于事。邓的回归，为激进的四人帮与周和邓领导的温和派之间的持久派系斗争奠定了基础。

当时，江青及其同僚有效控制了大众媒体和党的宣传网络，而周和邓则控制着大多数政府机关。在某些决定上，毛泽东试图减轻四人帮的影响，但在另一些决定上，他默许或支持了他们的要求。四人帮在政治和媒体控制方面的重拳出击，并没有阻止邓小平恢复其经济政策。邓小平强烈反对党的派系主义，他的政策旨在促进团结，这是恢复经济生产力的第一步。

就像刘少奇领导的大跃进之后的经济重组过程一样，现在，邓小平改革重

组了铁路系统，钢铁生产以及其他重要的经济领域。然而，到1975年底，毛泽东看到了邓的经济结构调整可能会否定文革的精神遗产，于是发起了一场运动，反对“为右派人士辩护”，称邓小平是该国最重要的“右派”。毛泽东指示邓小平在1975年11月写自我批评，此举受到四人帮的称赞。

周恩来之死（1976年初）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死于膀胱癌。1月15日，邓小平在其葬礼上发表了对于周恩来的正式悼词；中国所有最高级领导人出席了葬礼；而毛泽东本人则明显缺席；毛泽东对此也越来越持批评态度。在周死后，毛泽东既没有选择四人帮也没有选择邓小平当总理，而是选择了相对鲜为人知的华国锋担任总理职务。

四人帮越来越担心，人民群众自发的、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的行动，会使政治潮流对他们不利。他们通过媒体采取行动，对悼念周的活动施加了一系列限制。多年来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以及对邓小平所受的公开迫害（邓被视为周的盟友）和对于公众哀悼的禁令的不满，导致民众对毛泽东和四人帮的不满情绪上升。

官方为执行哀悼禁令而进行的尝试努力，包括拆除公共纪念物和拆除纪念周恩来成就的海报。1976年3月25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周为“在党内的资本主义走资派；他想帮助邓小平这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重获权力”。然而，这些为抹杀周的形象而进行的宣传努力，只是增强了公众对周的记忆的依恋。

天安门事件（1976年4月）

1976年4月4日，在中国传统的哀悼日——每年的清明节前夕，成千上万的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以纪念周恩来。北京人民通过在纪念碑下放置花圈，横幅，诗歌，标语牌和鲜花来纪念周。这个纪念活动最明显的目的是悼念周；但四人帮也因攻击总理而遭到攻击。留在天安门的少量口号大字报甚至攻击了毛泽东本人和他的文化大革命。

4月4日，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参观了天安门广场。社会各阶层，从最贫困的农民到解放军高级军官和高级干部的子女都参加了活动。对周所受的待遇而感到不平，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抗以及对中国未来的忧虑，都引起了参与者的不满。这次活动似乎没有协调一致的领导，但明显地反映了公众的情绪。

中央在江青的领导下，将这一事件称为“反革命事件”，并在4月6日午夜之后清除了广场上的纪念物。试图镇压纪念者的事件导致了暴力骚乱。警车被放火；十万多人挤进了广场周围的几栋政府大楼。许多被捕者后来被判入狱。在其他主要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江青和她的盟友将邓小平判定为事件的“策划者”，并在官方媒体上发表了报道。邓小平于4月7日被正式剥夺了党内和党外的所有职务。这标志着邓小平十年来所受的第二次大清洗。

毛泽东之死和四人帮的逮捕（1976年9月）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对于毛泽东的支持者来说，他的去世象征着共产党中国革命基础的丧失。9月9日下午，当他的死亡被宣布为“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全党，全军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发出的通知”时，这个国家陷入悲痛和哀悼；人们在大街上哭泣；公共机构关闭了一个多星期。华国锋主持了丧葬委员会仪式并发表了致辞。

据称，临终前不久，毛泽东曾给华写了一条信息：“你办事，我放心”。华使用此消息来证实他作为继任者的地位。华被广泛认为缺乏政治技巧和野心；在继承争夺战中，他似乎对四人帮不会构成严重威胁。但是，四人帮的激进思想与有影响力的老师们和很大一部分政党改革者发生冲突。在军队的支持和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10月6日，8341中央警卫部队在一次不流血的政变中逮捕了四人帮的所有成员。

后果

过渡期

尽管华国锋在1976年公开谴责了“四人帮”，但他继续引用毛的名字来为毛时代的政策辩护。华人率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即“无论从毛主席那里提出什么政策，我们都必须继续支持”和“无论毛主席给我们什么方向，我们都必须继续遵循”。像邓一样，华想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但是他与邓小平不同；邓小平想为中国提出新的经济模式，而华却打算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朝着1950年代初期的苏联式计划体制道路进行努力。

对于华来说，越来越清楚的是，没有邓小平，就很难继续日常的国务。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要求恢复担任国家和党的职务。党的老师们也呼吁邓小平回归。随着各方压力的增大，华总理于1977年7月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后来又提拔邓小平担任其他各种职位，有效地将邓小平推向了第二有力人物的地位。8月，中共十一届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正式命名（按顺序）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邓小平使文化大革命终止

邓小平于1978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开始了使国家恢复秩序的“拨乱反正”运动，并发起了中国历史性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于1977年9月首先提出“拨乱反正”的思想，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8年5月，邓小平抓住这次机会，提升了门生胡耀邦的权力。胡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在赞扬邓小平思想的同时，巧妙地利用了毛泽东的名言。随后，华开始改变语气以支持邓小平。7月1日，邓小平发表了毛泽东1962年关于大跃进失败的自我批评报告。随着权力基础的扩大，邓小平于1978年9月开始公开抨击华国锋的“两个凡是”。

1978年12月18日，召开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关键性第三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在代表大会上呼吁“解放思想”，敦促党“从事实中寻求真理”，摒弃意识形态教条。该次全体会议正式标志着经济改革时代的开始；邓小平成

为中国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位最重要的领导人。华国锋进行了自我批评，称自己的“两个凡是”都是错误的。毛泽东的可信赖盟友汪东兴也受到批评。在全体会议上，该党推翻了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判决。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平反；对他进行了迟来的国葬仪式。彭德怀，中国十大元帅之一、第一位国防部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他于1978年在政治上平反。

在1980年举行的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彭真，贺龙和其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清洗的领导人在政治上得到了平反。胡耀邦出任党的总书记。9月，华国锋辞职，邓的另一个盟友赵紫阳被任命为中国总理。邓仍然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正式的权力却转移给了新一代务实的改革者，他们在拨乱反正时期大幅度地颠覆了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从1978年开始的短短几年内，邓小平和胡耀邦平反了300多万个“文化大革命”中不公正，错误的案件。特别是，针对四人帮的审判于1980年至1981年在北京进行；法院指出，有729,511人受到该帮派的迫害，据说其中有34,800人死亡。

1981年，中国共产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文化大革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最严重的挫折和最大的损失负责”。

人道主义危机

死亡人数

对包括平民和红卫兵在内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死亡人数的估计相差很大，

从数十万到2000万不等。然而，由于许多死亡事件未报告或被主动掩盖，因此可能永远无法得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或死亡的人的确切数字。当时中国的人口统计资料状况也很糟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1980年代以后、直至今今天、一直不愿允许对该时期进行正式研究。此外，发生在河南驻马店的板桥大坝失事系列事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灾难；1975年8月，这导致河南省的死亡人数达到85,600至24万人。

据《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2011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还有一些其他的文档，叶剑英（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和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一次工作会议上宣称“文化大革命中有2,000万人死亡，1亿人受到迫害，浪费了800亿元人民币。”

鲁道夫·鲁梅尔（Rudolph J. Rummel）（夏威夷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亡了7,731,000人，即每10,000人中有96人死亡。

Jung Chang和Jon Halliday：在文化大革命的暴力事件中，至少有300万人死亡。

陈永发（国立台湾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至少有172万人死亡。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G. Walder）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Irvine）的Yang Su：仅在中国农村就有3600万人受到迫害。150万人死亡，大约有相同数量的人一辈子残废。

丹尼尔·奇罗（Daniel Chirot）（华盛顿大学）：至少有100万人死亡，但有人估计高达2000万人。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估计

约有4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最低数字）。

屠杀和自相残杀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陆发生了大屠杀，其中包括：

广西大屠杀，发生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和吃人；

内蒙古事件；

广东省大屠杀；

云南大屠杀；

湖南大屠杀；

北京大屠杀（即红8月）

瑞金大屠杀。

这些屠杀主要是由地方革命委员会，共产党支部，民兵甚至军队领导和组织的。大屠杀中的大多数受害者是“黑五类”类别的成员及其子女，或者是“造反派”的成员。中国学者估计，这些大屠杀中至少有30万人丧生。广西和广东省的集体屠杀是最严重的。在广西，至少有43个县的官方纪事记录有大屠杀的记录，其中有15个县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而在广东，至少有28个县志有记录的屠杀，其中有6个县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

官方记录显示，在广西大屠杀中，死亡人数估计为100,000至150,000。根

据《毛泽东：未知的故事》，在周恩来总理派解放军介入之前，估计有100,000人死于1968年1月至4月间广西最严重的暴力斗争。郑义的《红字纪念：现代中国的食人故事》称“以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名义对个人进行的系统性杀戮和吃人”在此期间发生。

在云南的沙店事件中，1975年以解放军领导的针对回族的大屠杀导致1,600多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300名儿童，并摧毁了4,400座房屋。

在湖南道县大屠杀中，从1967年8月13日至10月17日，共有7696人死亡，1397人被迫害、自杀，2146人被永久致残。

在北京大屠杀（红色八月）中，1980年的官方消息显示，从1966年8月至1966年9月，至少有1,772人被红卫兵杀害，其中包括许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此外，还洗劫了33,695所房屋，并迫使85,196户家庭离开了这座城市。特别是从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大屠杀造成325人死亡；遇难者中年龄最大的是80岁，年龄最小的只有38天，而22个家庭被歼灭。

暴力斗争，斗争会议和清洗

中国重庆的文化大革命公墓。在暴力派系冲突中，至少有1,700人被杀，其中400至500人被埋葬在该公墓中。

在1967年，暴力斗争，或武斗，派系冲突（其中大多数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开始出现在上海，然后蔓延到中国的其他地区；这使该国的社会内战。在武装冲突中使用的武器包括约1877万支枪，272万枚手榴弹，14828门大炮，数百万其他弹药，甚至是装甲车以及坦克。著名的暴力斗争包括

重庆，四川和在徐州的斗争。研究人员指出，全国范围内暴力斗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在30万至50万之间。

此外，中国有数百万人遭到暴力迫害，特别是在斗争中。那些被认定为间谍的人，“流浪汉”，“修正主义者”或犯罪嫌疑人（包括与前地主或富农有关的人）受到殴打，监禁，强奸，酷刑，持续和有系统的骚扰和虐待，财产扣押，拒绝就医，等等迫害。知识分子也成为攻击目标；许多幸存者和观察人士指出，几乎所有技能超过普通人的人都以某种方式成为政治“斗争”的目标。至少数十万人被谋杀，饿死或劳动疲累致死；数百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城市中的年轻人被迫转移到农村，在那里他们被迫放弃一切形式的标准教育，以接受中共的“政治宣传教育”。有些人无法忍受酷刑，对未来失去希望，自杀了。研究人员指出，在文革初期，至少有100,000至200,000人自杀。最著名的因政治迫害而未遂自杀的案例之一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他在被红卫兵“讯问”后从四层楼高的建筑物上跳下（或被推下）。他没有死，而是成了截瘫。

同时，由于政治清洗，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除了大屠杀中的死者以外，还有许多人因私刑或其他形式的迫害而死亡或永久残疾。从1968年到1969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规模政治清洗活动“清理阶级队伍”导致至少50万人死亡。随后在1970年代发起了类似性质的清洗活动，例如“一打三反运动”和“打击516分子运动”。

在内蒙古事件中，1980年的官方消息来源称，有34.6万人被错误逮捕，1.6万人被迫害致死或处决，永久性残疾人数超过8.1万人。但是，学者们估

计死亡人数在20,000至100,000之间。

在云南的赵健民间谍案中，有138.7万人受到牵连和迫害，占当时云南总人口的6%。从1968年至1969年，超过17,000人死于大屠杀，61,000人终身残废；仅在昆明（云南省会城市），就有1,473人丧生，有9,661人永久性残疾。

在河北的李楚立案中，中共原组织部副部长、李在1968年被清洗，涉及约80,000人，其中2,955人被迫害致死。

少数民族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和种族造成了严重破坏。在内蒙古“内人党”事件中，约有790,000人受到迫害。其中22900人被殴打致死，120 000人被残害。在新疆，显然烧毁了《古兰经》和其他维吾尔族书籍。据报道，穆斯林阿訇被游街、身上涂满了油漆。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族地区，语言学校被摧毁。在云南省，也发生了针对少数民族的残暴事件。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一部分，取消了对少数民族的优惠。人民公社以前只在西藏部分地区成立，但在1966年在整个西藏自治区成立。在1959年西藏起义之后的镇压之后，对西藏的宗教影响尤为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的运动，在整个文革期间，导致几乎所有6000多个寺院被销毁；这往往是与当地藏族红卫兵的同谋一起进行的。到1970年代末，只有八个寺庙完好无损。

许多僧侣和尼姑被杀，普通民众遭受身心折磨。1950年，西藏估计有60万僧侣和尼姑，而到1979年，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死亡，被监禁或失踪了。西藏流亡政府声称，在1961–1964年和1968–1973年，许多藏人也由于强迫集体化而死于饥荒。尽管受到官方的迫害，一些地方领导人和少数民族习俗仍然在偏远地区幸存。

红卫兵和激进主义者的目标的总体失败主要是由于两个因素。人们认为，过分地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会损害中国的边境防御。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少数民族占中国边界人口的很大比例。在1960年代后期，中国经历了一段时期与一些邻国的紧张关系，——特别是与苏联和印度的关系非常紧张。文化大革命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目标实在太不合理了，无法实现。

文化影响

红卫兵暴动

1968年的北京地图，显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名的街道和地标。安定门内大街成为“大跃进路”，太极场大街成为“永恒革命之路”，东郊民巷更名为“反帝路”，北海公园更名为“工农兵公园”，景山公园更名为“红卫兵公园”。文革时期的大多数名称更改后来都被撤销。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触及了中国全体人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经济活动都停止了；无论其解释如何，“革命”都是该国的主要目标。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万事万物的中央执行指南。在一段时间内（文革初），红卫兵的权力超过了人民解放军，地方警察当局和整个法律。中国传统艺术和思想遭到忽视和公开抨击。在一段时间内（文革初），鼓励人们批评文化机构，并质疑他们的父母和老师；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严格禁止的。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将大量的红卫兵带到了北京，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支付，铁路系统也处于动荡之中。这场革命旨在消灭“四旧”（即古老的习俗，古老的文化，古老的习惯和古老的观念），并建立相应的“四个新”，其范围可能从改名，剪发，洗劫房屋，到破坏文化宝藏和亵渎寺庙。几年之内，红卫兵摧毁了无数的古建筑，文物，古董，书籍和绘画。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在中国的地位受到严重破坏，许多传统习俗被削弱。

革命的目的还在于“扫除”所有“牛鬼蛇神”，即在党，政府，军队，知识分子中以及在剥削者中间鼓吹资产阶级思想的所有阶级敌人。公开谴责，侮辱和殴打了许多被认为是“黑五类”的人，无论他们有罪还是无罪。在革命热情中，学生们特别是红卫兵谴责了他们的老师，孩子们谴责了他们的父母。许多人因虐待或自杀而身亡。1968年，红卫兵们被派遣去向农民学习，而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居民离开了城市，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最暴力的时期。

学术和教育

中国最重要的导弹科学家之一，姚桐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在北京被殴打致死。

学术界和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并受到广泛迫害。许多人被送往农村的劳教所，例如，五七干部学校。根据起诉“四人帮”的官方文件，教育界的142,000名干部和教师遭到迫害。截至1968年，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总部工作的171名高级成员中，有131人受到迫害；在中国科学院全体成员中，有229人被迫害致死。截至1971年9月，中国青海核中心的4,000多名工作人员受到迫害；其中有310多名永久性残疾，有40多人自杀，有5人被处决。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科学家仍然设法成功地测试了第一枚导弹，制造了第一枚氢弹，并发射了“两弹一星”计划中的第一枚卫星。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教育体系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学校和大学关闭了。小学和中学后来逐步重开，但各高校都被关闭，直到1972年。大学入学考试在1966年后取消。1972年以后，由工厂，村庄和军队推荐学员进入大学学习。正式大学入学考试直到1977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才得以恢复。传统教育中传授的价值观被抛弃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基础教育得到了重视并得到了迅速发展。虽然受教育的时间减少了，教育水平下降了，但完成初等教育的中国儿童的比例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不到一半增加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几乎所有适龄儿童；而初中毕业的学生比例从15%上升到超过三分之二。农村儿童的教育机会大大增加，而城市精英儿童的教育机会受到反精英政策的限制。

从196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上山下乡运动，使得城市“知青”们被送到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以更好地了解体力劳动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在最初阶段，大多数参加的青年都是自愿的，但后来政府采取了强迫行动。1968年至1979年之间，中国有1千7百万城市青年离开城市来到农村；而在农村地区，他们也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整整一代遭受折磨和教育不足的人通常被称为“失去的一代”。在后毛时代，许多曾经被迫迁徙的人强烈谴责该政策，认为这是对他们人权的侵犯。

尽管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成千上万的人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但对某些地区的人口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一些农村地区。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和对知识分子精英的敌视被广泛认为损害了中国的教育质量，特别是在教育体系的高端。但是，激进政策也首次为农村社区的许多人提供了中学教育，这被认为促进了70年代和80年代的农村经济发展。同样，许多医疗人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作为赤脚医生部署到农村。一些农民接受了非正式的医学培训，并在农村社区建立了保健中心。这一过程导致了普通人群的健康和预期寿命的显着改善。

标语和修辞

Huang Shaorong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是广泛使用政治口号的结果。黄认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言辞在联接

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中起着核心作用。例如，“造反有理”的口号成为一个统一的主题。

黄坚称，政治口号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无处不在，并印在汽车票，烟盒和镜子、桌子等日常用品上。工人应“抓住革命，促进生产”，而农民则应饲养更多的猪，因为“更多的猪意味着更多的粪便，更多的粪便意味着更多的谷物”。即使是毛泽东的随便的话，“地瓜味道很好；我喜欢”也在农村到处都成为了口号。

当时的政治口号有三个来源：毛泽东，《人民日报》等党的官方媒体和红卫兵。毛经常提出含糊而又有力的指示，导致了红卫兵的派系分化。这些指示可以被不同的人以适合其个人利益的方式进行解读，并进而有助于各派效忠于毛泽东的目标。红卫兵的口号具有最暴力的性质，例如“打倒敌人、再踩上一脚”，“红色恐怖万岁！”和“砸烂那些反对毛主席的人的狗头。”

汉学家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和Chen Ruoxi指出，汉语在历史上一直以微妙，细腻，温和，诚实和“修养高贵典雅的文学风格”来定义。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了变化。由于毛泽东在革命征途中想要一支好战的人民军，所以当时的言论都是好战而猛烈的词汇。这些口号是“思想改革”的有力和有效方法，动员了数百万人共同攻击主观世界，“同时改革了他们的客观世界”。

迪特默（Dittmer）和陈（Chen Ruoxi）认为，对政治的强调使语言成为非常有效的宣传形式，但“也将其转变为刻板印象的行话——浮夸，重复和无聊。”为了与时代保持距离，邓小平政府大幅削减了政治口号的使用。广泛使用标语的做法在江泽民的领导下于1990年代末略有回升。

艺术与文学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文革时期推广的样板戏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即1958年至1966年，戏剧被用作政治舞台上斗争的一部分，因为戏剧被用来批评或支持党的特定领导层。吴晗的一部戏曲《海瑞罢官》被解释为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它引发了姚文元对该剧的攻击，而这种攻击通常被认为是文革的开场白。它导致了作家吴晗以及其他参与戏剧活动的人的被迫害和死亡，例如田汉，孙维世和周信芳。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控制了舞台，并在她的直接监督指导下引入了革命样板戏。传统戏曲由于其封建和资产阶级化特征而被取缔，但以北京戏曲为基础但内容和形式都进行了修改的革命戏曲得到了推广。从1967年开始，八个样板戏（六个京剧和两个芭蕾舞剧）在三年中被制作出来；最显着的歌剧是《红灯记》。这些歌剧是唯一获得批准的歌剧形式，其他歌剧团也必须采用其曲目。样板歌剧还通过广播播放，制作成电影，用公共喇叭轰鸣，向学校的学生和工厂的工人传授，并作为一种普遍的娱乐形式而无处不在，并且是中国人唯一的戏剧娱乐形式。

1966年，江青提出了文艺界“黑线专政”理论，指出应该把那些被视为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者或反毛泽东的“黑线”的人抛诸脑后，并呼吁创造新的文学艺术。这将彻底消除“旧文化”的接受者、传播者、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大多数作家和艺术家被视为“黑线人物”和“反动文人”，因此受到迫害；许多人遭到“批评和谴责”，并可能在公开场合遭到侮辱和批斗，被监禁或送往劳改营，通过艰苦的劳动而得到改造。

1980年发布的有关起诉“四人帮”的文件显示，文化部及其下属单位迫害了2600多名艺术和文学领域的人。许多人因折磨和屈辱而丧生——1979年纪念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的200名知名作家和艺术家，其中包括老舍，傅雷，邓拓，巴金，李广田，杨朔和赵树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只有少数在新制度下获得许可或重新获得资格的作家，例如浩然和一些有工人或农民背景的作家，才可以发表或被转载他们的作品。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学的许可主题被严格定义；到1968年，该国所有文学期刊都停止出版。1972年以后，情况有所缓解，允许更多作家写作，许多省级文学期刊恢复出版，但大多数作家仍然无法工作。

在电影业中，效果是相似的。分发了一本题为“四百部电影批评”的小册子，电影导演和演员/女演员受到批评，并受到一些折磨和监禁。其中包括许多江青的对手和电影界的前任朋友，而在此期间去世的人包括蔡楚生，郑君理，上官云珠，王莹和徐来。除少数获批准的“样板戏”和高度意识形态的电影外，中国大陆七年来没有制作过故事片；在此期间制作并允许放映的少数电影的一个著名例子是“智取威虎山”。

在共产党接管中国之后，上海的许多流行音乐都被谴责为“黄色音乐”，并被取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黎锦晖等流行音乐的作曲者遭到迫害。而以革命为主题的歌曲得到了推广，诸如《祖国颂》，《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歌曲。尤其是《东方红》广受欢迎。

宣传画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最持久的图像来自海报艺术。海报中的宣传艺术作品被用作政治运动工具和大众传播工具，并经常成为人们的主要信息来源。它们被大量生产并广泛传播，并被政府和红卫兵用来教育公众，以了解党国所定义的意识形态价值。有许多类型的海报，包括“大字报”和“宣传画”。

大字报可能是口号，诗歌，评论和图形，常常由个人创作，并在公共场所，工厂和公社墙壁上张贴。它们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至关重要。毛泽东本人于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大学写了自己的《大字报》，呼吁人民“轰炸总部”。

宣传画是由政府生产和商店出售的作品，在家庭或工作场所张贴。这些海报的创作者可能是业余爱好者，也可能是没有名誉的专业人士，并且这些海报基本上都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视觉风格，并具有一定的惯例，例如，毛的图像应描绘为“红色，光滑且发光”。

传统的艺术主题被置于文化大革命的边缘，丰子恺，石鲁和潘天寿等艺术家受到迫害。许多艺术家被分配从事体力劳动，并且期望艺术家描绘美化与他们的劳动有关的文化大革命的主题。1971年，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痛苦；在周恩来的倡议下，数名顶尖艺术家被取消强迫体力劳动或取消被囚禁，以装饰被红卫兵口号所破坏的酒店和火车站。周说，这些艺术品是为外国人准备的，因此，“外部”艺术不受对面向中国公民的“内在”艺术的义务和限制。在他看来，山水画也不应该被视为“四旧”之一。但是，周恩来却因癌症而虚弱；1974年，江青派抓住了这些和其他画作，并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举办了展览，称这些作品为反动“黑画”。

历史文物

中国的历史古迹，文物和档案馆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旧思维方式”的根源。没收了文物，洗劫了博物馆和私人住宅；发现的任何被认为代表资产阶级或封建思想的物品都被摧毁。到底有多少被摧毁的总量的记录很少；西方观察家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短短十年中，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被摧毁，或者后来被偷运到国外出售。中国历史学家将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压制与秦始皇的针对儒家的大清洗进行了比较。由于宗教被视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义思想，这一时期的宗教迫害愈演愈烈。

尽管是由革命的一些热心追随者进行的，但对历史文物的销毁从未得到共产党的正式批准，共产党的官方政策是保护此类物品。1967年5月14日，中

共中央发布了题为《文革时期保护文物的若干建议》的文件。然而，中国的文化遗产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例如，1972年在北京对天坛和明十三陵等18个文化遗产的重要景点进行了调查，显示出广泛的损坏。在北京市的80处文化遗产中，有30处被破坏。在北京政府1958年的决定保护的6,843处文化遗产中，有4,922处受到破坏损毁。许多珍贵的旧书，绘画和其他文物也被烧成灰烬。

然而，在1960年代破坏性时期之后进行的、后来的考古发掘和保存受到了保护；在革命高峰时期之后发生了一些重大发现，例如兵马俑和马王堆。在1960年代最暴力的阶段结束之后，对传统文化的攻击在1973年继续进行；“批林批孔运动”被作为反对党内温和派斗争的一部分。

对外关系

文革期间，共产党中国出口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共产主义思想，被传播到多个国家；包括东南亚，对于印尼共产党的支持，对于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缅甸等地的输出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柬埔寨对红色高棉的支持；红色高棉是造成柬埔寨种族灭绝的原因。据估计，红色高棉受到的至少90%的外来援助是来自中国；仅仅在1975年，红色高棉就从中国得到十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两千万美元的礼物赠品。

在当时与中国建立外交或半外交关系的40多个国家中，约有30个国家与中国发生了外交争端；有些国家甚至终止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包括中非，

加纳和印度尼西亚。

在中国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中国共产党推出了多种形式的关于毛泽东的宣传活动，如发送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

许多中国大使和领事被召回中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等高级官员遭到迫害。

几名外国客人被“命令”站在毛泽东雕像前，拿着小红皮书，并像其他中国公民一样向毛泽东“汇报”。

公众意见

共产党的意见

为了在保持共产党的权威和合法性的同时，认识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所造成的大规模混乱，毛泽东的继任者需要给这次活动提供“适当的”历史判断。1981年6月27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若干问题的决议》，对1949年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正式评估。

该决议坦率地指出了毛泽东在这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左倾错误的主要责任是毛泽东同志的责任，这种错误的范围很广，持续时间长。它宣称运动是“由林彪和江青的反革命集团操纵和利用的”，他们造成了最严重的灾祸；这种对于林彪和四人帮的强烈指责，使得毛泽东所受的批评被稀释。决议确认文化大革命“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严

重的灾难和动荡”。

官方观点旨在将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行为与中国内战和中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的“英雄”革命活动区分开来。这也将毛的个人错误与他所创造的理论的正确性区分开来，以合理化文化大革命与官方宣称之毛泽东思想的精神相抵触之处；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党的官方指导思想。邓小平用“毛泽东的好是70%，坏的是30%”来概括这一点。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的原因，但在实践中主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学模型。

在中国大陆，该党的官方观点现在已成为该时期中国史学的主要框架。其他视角都被禁止。文革后，在后毛泽东政府的鼓励下，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称为“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主要由受过教育的青年如刘新华，张贤亮和刘心武撰写；他们以自己的观点和经验为基础，从消极的角度描绘了革命。

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遭到镇压后，党内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都互相指责对方；他们声称这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提倡使用军事力量的李鹏说，学生运动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基层民粹主义中得到启发的，如果不加以制止，最终将导致类似程度的大规模混乱。同情示威者的赵紫阳后来指责其政治反对派使用“文化大革命式”策略非法将他免职，包括“颠倒黑白，夸大人身罪行，诽谤，和谎言……报纸上充斥着许多重要文章，使我成为敌人，而无视我的个人自由。”

中国的其他意见

尽管中国共产党正式谴责了文化大革命，但仍有很多中国人对此持更积极的看法，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中，他们从中相对受益最大。自邓小平上台以来，政府逮捕并监禁了强烈支持文化大革命立场的人物。例如，1985年，一位年轻的制鞋厂工人在陕西咸阳的工厂墙上张贴了一张海报，宣称“文化大革命是好的”，并取得了“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等成就。该工厂工人最终被判处十年监禁，在那里他很快“无故”死去。

自从互联网问世以来，中国国内外的人们都在网上争辩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具有许多有益的特质，而毛泽东时代后的中国共产党和西方媒体都否认了这种文化。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通过“现代主义变革”将中国从迷信，宗教教条和过时的传统中“清洗”了出来，后来使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成为可能。在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使馆之后，这些情绪上升了，当时一部分人口开始将反毛派的观点与美国联系起来。

在网络时代，当代毛主义者也变得更有组织，部分是对学者对毛的批评的回应。一个毛派网站设法收集了数千个签名，要求对公开批评毛泽东的人进行惩罚。除了呼吁采取法律行动外，这一运动还要求建立类似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居委会”的机构，其中“公民”将向地方公安局报告反毛派分子。在薄熙来政治生涯中，毛泽东的修辞和群众动员方法在内陆的重庆兴起。

当代中国

在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公开讨论仍然很有限。中国政府继续禁止新闻机构提及“文化大革命”的细节，有关这一主题的在线讨论和书籍也受到官方审查。关于这一主题的教科书继续遵守有关事件的“官方观点”。从1960年代起，许多政府文件仍处于机密状态，不接受私人学者的正式查阅。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其历史展品中几乎没有提到“文化大革命”。尽管众多杰出的汉学家取得了进展，但中国政府仍不鼓励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有人担心，随着见证人的年老和死亡，可能会失去在中国进行深入研究的机会。

据报道，2018年，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典型做法——整个社区对所谓的反革命分子的公开批斗，正在经历着意想不到的复兴：但目前尚不清楚这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还是一种迹象。人们对革命典型的文化风格重新产生了兴趣。

中国大陆以外

在香港，以文化大革命为灵感的亲共反殖民罢工于1967年发起。在香港居民的眼中，过分的暴力破坏行为损害了这些积极分子的信誉，达一代人以上。在台湾，蒋介石发起了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以对抗他认为大陆共产党人破坏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情况。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国盟友恩弗·霍查（Enver Hoxha）发起了与文化大革命相同路线的“文化和思想革命”。

在世界上，毛泽东成为反建制，基层民粹主义和自决的象征。他的革命哲学影响到秘鲁的光明之路信徒，印度的纳萨尔派武装叛乱，尼泊尔各政治运动，美国黑豹党，等。

学术辩论

学者们继续争论着文革为什么发生，发生的方式，毛泽东的角色，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开始的以及它是什么。几十年来，随着研究人员探索新的来源，这些辩论发生了变化。

1960年代，尽管许多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倡议是意识形态的、和破坏性的，但另一些学者却对毛泽东对平等，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以及个人自私的关注表示同情。他们认为毛主义是坚持群众参与，群众批评和反叛权利的民粹主义，是消灭新统治阶级的决心。然而，到了1980年代，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写道：“该领域的意见发生了显著变化”。现在，该领域的大多数人“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人类的灾难，甚至是历史性的罪行，这在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恐怖中都是同样的”。瓦尔德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并非源于执行不力，官僚破坏，不忠诚或挥之不去的阶级对抗。瓦尔德总结说，如果事情与毛泽东的预期有所不同，“这可能是由于毛泽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他确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鉴于毛泽东主义的教义和目标，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效果不应当感到意外。”

尽管如此，辩论仍在继续，因为该运动包含许多矛盾：在一个无所不能的领导人的领导下，它主要是由一系列针对共产党建制派的基层民众起义推

动的。自1980年代以来出版的所有英语书籍都对这一运动进行了负面叙述。历史学家安妮·瑟斯顿（Anne F. Thurston）写道，这“导致文化和精神价值的丧失；希望和理想的丧失；时间，真理和生命的丧失”。

Barnouin和Yu将文化大革命概括为“一场政治运动，产生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分裂，大规模动员，歇斯底里，动荡，任意残忍，酷刑，杀戮甚至内战”，称毛泽东为“二十世纪最暴虐的暴政之一。”有些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描写提出了挑战，并提出从更积极的角度去理解它。高莫伯在《为中国的过去而战：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写道，该运动使数百万中国公民，特别是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受益，并认为这是平等主义者和真正的民粹主义者的运动，并指出毛主义在继续。今天在中国对文革的怀旧是其积极遗产的残余。有些人在意图和表现之间作了区分。尽管毛主席的领导在运动开始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Jin Qiu认为，随着事件的进展，它大大偏离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种分散化和多样化的运动，逐渐失去了凝聚力，催生了许多性质和目标各异的“地方革命”。

学术兴趣也集中在运动与毛泽东人格的关系上。毛泽东设想自己是战时游击队的领导人，这使他对和平时期施政的官僚主义性质保持警惕。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毛泽东只是在“恢复形式”，再次扮演了游击队领袖的角色，与制度化的党的官僚作风作斗争。罗德里克·麦克法夸（Roderick MacFarquhar）和迈克尔·舒恩哈尔斯（Michael Schoenhals）将这场运动描绘成既不是一场针对意识形态纯洁的真诚战争，也不是为消灭毛泽东的政治对手而进行的单纯的权力斗争。毛泽东的个人动机无疑对文化大革命至关重要，但他们认为，其他复杂因素也促成了事件的发展。这些因素包括中国与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地缘政治问题，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裂痕，赫鲁晓夫的下台以及大跃进的失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该

运动至少部分是为巩固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遗留项目，旨在提高毛泽东在世时的声望，并保持其死后思想的坚定性。

文革的群众歇斯底里的程度也很空前。历史学家菲利普·肖特（Phillip Short）认为，“文化大革命”包含类似于宗教崇拜形式的要素。在此期间，毛的神性地位使他对共产主义学说具有最终的定义权，但他的著作深奥而常常自相矛盾的性质导致对其解释的无休止的战争，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利用毛泽东的教义来实现其不同的目标。

Jung Chang和Jon Halliday在《毛泽东：未知的故事》中，将文化大革命的所有破坏归因于毛泽东；而对他的盟友和反对者则更具同情心。

=====

=====

=====

=====

=====

=====

=====

=====

=====

=====

Handwriting practice lines consisting of multiple sets of three horizontal lines (top, middle, and bottom lines) for letter formation.

关于文革的反思和总结

【A】谎言、虚伪、残暴、假冒为善的体系

文革，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绝非仅仅是毛泽东个人头脑发热、发昏，也绝非是仅仅什么“被林彪江青四人帮等所谓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这些，不过都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邓小平上台以后，中国共产党所描画的另一个谎言系统罢了。

今天、二十一世纪，当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近百年中国近现代史，当我们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建政的70多年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见，所谓文化大革命，正是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罪恶荒谬欺谎的理论体系的必然结果而已。

在文化大革命的自身内在逻辑、发生过程、衍生机制中，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清晰而鲜明地显明了它们的罪恶、愚蠢、荒谬、欺谎、虚伪、假冒为善。

【A. 1】 —— 谎言体系

正如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本身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根基、起源、内在逻辑、过程、衍生机制，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微妙、阴险、罪恶、恶毒的谎言体系的基础之上。

文革的发生动机和历史背景，即使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百姓来说，也是清晰和明显的。任何内心诚实、审慎思考的人，都会轻易地看见，文革恰恰是发生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大饥荒等重大经济灾难以后、毛泽东失去实权、退居二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掌握实权、实行经济整顿几年以后。从政治斗争权谋的角度而言，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尽管有许许多多冠冕堂皇的共产主义政治言辞，但其最表面层次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动机，其实只不过是从自私自利的角度出发、谋取自己的实权地位而已。

然而，发人深省、令人值得更加深刻思考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的更深层次的谎言体系、迷惑世人的歪理学说。

如果我们纵观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历史，就会看见，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动乱、荒谬愚昧的事情，绝非偶然、个别孤立的事件。事实上，它【或者类似的、频繁的、大规模社会政治运动、阶级斗争、造反革命、社会阶级革命运动、生灵涂炭的暴力镇压、大清洗、等等】也曾经发生在苏联、一些曾经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北朝鲜、越南、柬埔寨、古巴等地。甚至，直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文化大革命所代表的政治理念、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念，在共产主义革命理论观念盛行的中国大地，仍然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力。

任何成功地、大规模地影响社会政治环境与走向的谎言体系，都绝非仅仅是由于一些野心家、谎言家、政治权谋领袖的个人作用所导致的结果【尽管，在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荒谬谎言的运动中，无疑，革命领袖、革命导师的作用是极其重大、不可或缺的】。而是，这样的谎言体系，必然有着对于世人极大的迷惑性的作用和吸引力。

在这样的谎言体系中，必然充斥着很多看似很深刻、很有道理的东西。因此，关于这样的、对于历史、社会、政治、等等产生了大规模影响的谎言体系，我们就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深刻地思考和反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避免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真正地把谬误之事当作反面教材，并诚实地探索真理、深思人生与社会的真正价值和意义究竟在于何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七分钱的假币【因为没有七分钱的真币】；赝品往往会看起来与真品很相似。那些吸引人、迷惑人的谬误、歪理，常常会看起来与真理相似，甚至是其中真的会包含很多正确的逻辑、论述、要点、现象、依据、等等。

真正迷惑人的谎言体系，往往都会是半真半假、甚至三分假、七分真【在一些片面的论据上，对事实进行摘选，以偏概全，九句真话中夹杂着最关键的一句、结论性的谎话】。我们若要直面谎言体系、有力地击败它，那么，我们就应当对其抽丝剥茧、全面分析，思考事实的整体，深刻地认识到，那些谎言体系究竟是怎样半真半假、或究竟是怎样以偏概全、从而达到扭曲事实、欺骗天下人的目的。

所以，我们必须面对复杂的事实，面对像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面完备而大规模的谎言体系，进行深刻的反省、查考、抽丝剥茧，并明确地找出其中致命性的错误和虚谎之处。

我们要认真地查考和思索，谎言的内容要点是什么，其中半真半假的内容主旨是什么【何为真、何为假；为什么；其中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什么；等

等】。我们要反思，谎言体系的诱人之处在于什么。我们要仔细分辨谎言的记号与迹象是什么。我们要认真地看一看，欺骗者与被欺骗者都是谁；欺骗者为什么要行骗、其真正的动机、出发点、谬误症结在于什么；被欺骗者为什么愿意相信谎言；被欺骗者的利益、动机、动力、思维方式等等是什么。

。 。 。 。 。

显然，无可争辩的是，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地由毛泽东以个人领袖之力所发动起来的。但是，毛不是简单地以强迫性的蛮力而发动针对刘少奇等人的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性质的斗争。而是，毛泽东以极其微妙诡诈、极具煽动性的、完整而巧妙的谎言体系，并以极其高超的政治权谋运作手段，把整个国家社会拖入大规模的动荡之中，并以此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等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的目的。

在文革之前的几年中，中国社会从骇人听闻、举世震惊的大跃进、大饥荒、人吃人的大规模灾难中，刚刚恢复经济秩序不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虽然在口头上尊称毛泽东为无限伟大的革命领袖、但在事实上把毛泽东架空、把他供在神坛之上；而在私下里，刘少奇等人对于毛泽东在大跃进、大饥荒中所表现出的骇人的愚妄，都极度震惊和反对

【关于大跃进、大饥荒的发生的罪责，虽然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都负有严重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毛泽东的“大干快上、超英赶美、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等等愚蠢、左倾、冒进、幼稚的政治经济政策，是导致大跃进大饥荒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甚至，刘少奇曾经在私下场合里对毛泽东说过：“人相食，我们会上史书的”。刘少奇的这种态度和话语，深深地得罪了毛泽东。大跃进、大饥荒之后，毛泽东虽然不得被迫地、勉强地、假惺惺地作出自我检讨，并且不得不放弃党内日常管理工作的实权，然而，在1962-1966四年当中，毛泽东尽管看似远离中央日常工作，但仍然通过铁杆林彪牢牢掌控着军权，并酝酿在中共高层东山再起、掀起血雨腥风。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 。 。 。

文革开始前的两个重要事件

一件事是姚文元针对吴晗《海瑞罢官》所写的批判性文章。姚文元的文章深刻而直接地道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革命、阶级斗争的本质要旨。姚文元对吴晗的批驳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剥削阶级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内容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正是对于海瑞

罢官时代的封建社会的深刻针对；因而，尽管吴晗看似是以“海瑞罢官”历史故事来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被罢黜的事情鸣冤【彭德怀因在庐山会议上针对大跃进、大饥荒的事情，而措辞严厉地批评了毛泽东，并因此被毛泽东借用开国功勋林彪的军事实力，打倒了彭德怀、撤销了他的军事元首的职务】；但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本质，正是要推翻封建社会的那种帝王将相、剥削阶级的时代，并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时代。姚文元文章内容，深具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革命、阶级斗争理论的精髓；对于任何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来说，姚文元文章的论点都是无可辩驳的【更何况，站在姚文元背后的，是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本人所始终牢牢掌控的军队、中央警卫部队、首都卫戍区部队、和全国警察武装力量（毛泽东一生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此从未曾放松过对于军队力量的牢固掌控）】。

另一件事情是毛泽东在长江中公开游泳；此事并被拍成电影纪录片，在当时的全中国电影院放映，使得中国社会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新的高峰【从前的毛泽东，仅仅是报纸广播中的一个词语、一个符号；但是现在，亿万人民亲眼在电影中看见了毛泽东本人亲切和蔼的样子，更亲眼看见这样一个大约七十岁老人在长江中畅游的令人震惊的场面】。

在上述两件事情的背后，都显明了毛泽东的极端狡猾、诡诈与欺谎，以及欺骗天下人的愚妄枭雄心态。

在长江游泳的事件中，毛泽东利用了当时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于毛的架空、供在神坛上的措施，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宣传的毛主席游长江事件，不仅使得全国人民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新的高度，更使得全党全军、尤其是整个中共高层充分认识到毛泽东的身体良好、极具战斗力【在此之前的几年中，毛泽东自从大跃进大饥荒之后，灰头土脸地告别国家日常管理工作，一直称病住在杭州休息】。

在姚文元的文章事件中，尽管，吴晗《海瑞罢官》的寓意是明显的【大跃进与大饥荒的愚蠢和谬误，是如此清楚，以至于任何有良知的人，若知道庐山会议的详情，就其实一定会知道彭德怀（其本人固然耿直，但的确是一个武夫，政治上不周全，从而被毛泽东抓住其言语之间的小漏洞和小辫子）是被冤枉的】；但是，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却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本质所在。——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打江山、闹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难道，中国共产党干革命的目的，仅仅是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那样，跟旧的阶级社会一样，只是换汤不换药地发展经济吗？难道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只是要把社会中的经济和物资收入等等提高吗？——不是的。姚文元指出，（正如毛泽东在19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1920年代、当时，中国国民党为了讨伐北京的北洋专制腐朽政府，开始了从广州、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军官为主力的北伐军事革命行动；黄埔军校是在孙中山生前的苏联物资军事人员援助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国民党容忍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鸠占鹊巢一般的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大肆进行政治活动，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种鸠占鹊巢的诡诈行径，正如同十年前、1910年代苏联布尔什维克政治集团在列宁的领导下夺取俄国政权的过程一样）。正是在1920年代北伐过程中，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在前线与北洋军阀队伍浴血奋战的同时，混迹于中国国民党中间的中国国民党则在北伐军后方进行了混乱的、无法无天的“打土豪分田地”暴力行动。当时，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主旨，就是要提出，通过暴力阶级斗争，推翻原有社会的秩序、法治、公义，而建立起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农民革命占主导地位的、劳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治理想架构】——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目的，绝非是仅仅改善国家社会的物质生活面貌和水平，而是要在本质上，把原有的、阶级社会、旧社会秩序与制度连根拔起，建设一个崭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科学共产主义的理想国度。——这正是1966年以后即将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核心理想与理论基础。

因而，在姚文元的笔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滚滚洪流，如同不可阻挡的历史车轮一样；而吴晗《海瑞罢官》所代表的那种旧有的阶级社会、忠臣明君的梦想和理念是罪恶的、反动的、反革命的。

姚文元文章事件，使全国、全党很多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核心要旨是什么；因而，姚文元的辩论成功地、在一定程度上为毛泽东的大跃进大饥荒的愚蠢行为进行了强有力的开脱和辩护。【大跃进、三面红旗、

人民公社等等，正是为了要朝向实现无产阶级伟大革命目标而努力前行】。

姚文元文章的事件【毛泽东本人是姚文元文章背后的真正支持者、怂恿者】，展示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真实野心与革命动机、目标、等等。姚文元文章虽然是代表了毛泽东的一次文字自卫、辩护，但更是代表了毛泽东本人的一个真正的宣战檄文。不久之后，毛泽东就会亲自写下那封著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姚文元文章间接表明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本质与继续革命的理论、志向。而毛泽东长江游泳事件则向全党表明了，毛泽东身体健康、有着能够进行继续革命战斗的魄力、能力和决心。

这两件事情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告诉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们，毛泽东在1962-1965沉寂了四年以后，即将开始战斗了。

此时的中共省部级以上的高层领导，除了军队以外，基本上很多民事职务

位置已经被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的政治势力所把持。在这其中，那些政治感觉敏锐的人，例如周恩来等人，已经知道毛泽东即将动手【尽管此时或许没有人知道毛泽东将要怎样掀起革命波澜】、大事不妙，已经做好准备、掉转船头；但是，刘少奇等人仍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翻脸，他们自己已经大祸临头；或者说，刘少奇等人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政治手段来与他们进行斗争【刘少奇等人自认为没有什么错误和把柄，所以毛泽东也不能奈他们若何；但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将要不惜把整个国家都拖入巨大的内斗和内乱之中；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预想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轰轰烈烈地迅猛爆发】。

就这样，很快，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地大爆发了。先是，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红卫兵们，从全国各地涌入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他们此时已经狂热地把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当作成了上帝一样的人物；面对远远的毛泽东，他们顶礼膜拜、五体投地、热泪盈眶。紧接着，随着红卫兵运动、以及全国大学停办、取消高中等等，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被半胁迫、半引诱地送到了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全国兴起了如火如荼的造反派夺权运动，整个国家的各级政府机构瘫痪，并被造反派接管，或是被人民解放军接管。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等人被打倒，他们苦心经营的全中国民事政府体系彻底崩塌。毛泽东取得了彻底的、针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夺权胜利。

。 。 。 。 。

我们不得不指出，毛泽东的政治斗争手段是极其高超的，其政治魄力更是骇人听闻。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出发点，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革命、阶级社会改造进行到底。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所代表的政策立场，则恰恰是，务实主义、从实际出发、一切以经济稳定发展为目标前提，而不是要致力于公有化社会改造【因而，刘少奇等人在1962年大跃进大饥荒之后，采取了经济整顿、恢复经济发展、大力实施类似于市场经济的刺激活动，并且，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中在经济收入方面出现分层现象】。

所以，如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的原教旨主义而言，那么，毛泽东是正确的，而刘少奇等右派是错误的。这正是毛泽东在权斗阴谋中得以胜算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针对右派集团【即，那些思维正常、面对实际经济景况、处理实际经济事务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们。这些人被毛泽东在文革中称为是“资产阶级司令

A 10x20 grid of small circles, representing a 2D lattice of particles. The circles are arranged in 10 rows and 20 columns, forming a regular square pattern.

可是，不论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多么地冠冕堂皇，是多么地看似占据道德高位，看似是有着何等光辉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理想、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美好理论，等等等等，——其实，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能够轻易地看见一个基本的事实底线。——那就是，虽然，毛泽东有很多说得比唱的还好听的口号和说辞，但实际上，——毛泽东不过是在大跃进大饥荒之后，不甘寂寞、不愿意离开权力中心，而是要牢牢地掌握权力与私利，并严厉打击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等、威胁自己政治利益权势的“右派集团”而已。

Page | 156

杂的、大规模的、长时期的政治混乱阶段】，那么，这个词语就是：——谎言。

而且，文革的谎言，绝非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指鹿为马的、颠倒黑白、尽人皆知的愚蠢谎言而已。事实上，文革是一个非常微妙庞杂、精心编织、全面详实的谎言体系。——否则，它就不会掀起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风浪，更不会甚至直到今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然在很多中国人心中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与迷惑性【当然，这种巨大的诱惑力和迷惑性，更主要地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从未间断过的思想奴役、言论钳制、人身禁锢、信息禁锢等等原因】。

文革的谎言体系包含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部分。

第一，首先，如同上文所述，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谎言。即，毛泽东的真正用心，其实并非是真的为了什么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而不过是为了，——在1959-1962年的大跃进大饥荒惨败以后，在经过1962-1966年靠边站、沉寂以后，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彻底击溃刘少奇等政治势力集团，从而建立和壮大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教旨主义政治力量、获得自己的专制独裁政治利益。所谓无产阶级继续革命，不过是毛泽东的一个欺骗天下人的政治借口罢了。

第二，然而，文革的发动，并非仅仅是由于上述这样一个简单的谎言而已。事实上，在更深的层次上，文革更有着远远地更加深刻复杂的谎言体系。

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欺骗天下人、把整个国家亿万人民玩弄于鼓掌之中，更把无数中国共产党干部们如同宰杀牲畜一般随意清洗、而没有遇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反抗【大概除了林彪的歇斯底里的叛逃事件以外】，——与刘少奇等右派集团自身的政治谬误也有着直接的关系。事实上，刘少奇之所以能够在1930年代崛起于中国共产党内，而到1949年建国以后逐渐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恰恰正是因为刘少奇成功地在党内兴起针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更进一步说，许多党内右派政治势力集团，虽然在经济国策方面，比毛泽东更加务实一些【相比之下，毛泽东本人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张往往就如同疯狂愚蠢者、或是弱智者一样】，但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在政治理念上，与毛泽东一样，也都是笃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崇尚共产主义革命、阶级斗争的人【他们只是在具体的经济路径、国家治理的具体方针政策问题上，与毛泽东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毛泽东更倾向于左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教旨为借口；而右派集团则倾向于以务实主义为着眼点。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后、直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统治中国、并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正是这样一批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右派务实主义者。从历史长远的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右派比左派实际上会给中国、乃至全世界带来更大的危害与灾祸，因为他们把中国带入了如同希特勒纳粹时代的经

济发达、政治专制暴政的状态，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威胁和灾害】。

在这里，在讲述文革谎言体系的时候，我们应当指出的最重要的谎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共产主义革命、等等本身的谎言本质所在。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再次引述《论民主》一书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之谬误的记述，并以此指出，文革中最大的谎言体系，其实绝非仅仅是政治权斗阴谋等等而已，而更是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的谎言体系。

+++++

+++++

+++++

+++++

+++++

+++++

+++++

+++++

+++++

Page | 160

Page | 161

+++++

+++++

+++++

+++++

【引述 论民主 相关文字】

在一个社会中，有效的经济运行模式

=====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经济的本质

在近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文明大厦中，有三个人三本书，起到了重要的支

柱性、启迪性作用，就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三本书，分别从法治、民主、经济三个角度，勾画出了一个关于现代社会架构的蓝图，并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践中，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乃至全世界各国政治建制与运作，广泛地影响了许多现代人心中的人文政治经济思想。当然，在他们出版了那些相关著作以后，后人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又进行了许多细化、深化、系统化的思想理论建树。但他们三个人的著作都具有代表性、革命性、原创性、开启性的意义。

但是，我们想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在整个近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文明大厦中，如果除去了圣经、除去了基督教信仰的重要影响与深刻的文化土壤，那么，所谓《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国富论》等等思想所代表的现代法治、民主、经济架构中，就只剩下的是贪婪、争斗、战争、私利、一盘散沙、与慵懒、拖沓、低效。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简单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经过、结果，或是研究一下法国大革命的喧嚣混乱【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人曾经试图摆脱宗教信仰的“束缚”，但很快国家陷入无政府主义混乱之中，导致许多内战和屠戮；最后，法国领导人认识到宗教信仰对于国家社会稳定与道德状态的重要意义，才努力地重建曾经被短暂抛弃的基督教信仰】，以及今日法国、希腊、意大利等等政府的腐败与低效，或是环顾一下今天世界上的诸如华尔街、伦敦金融区的无休无止的贪婪与明枪暗箭，或是西方世界里民主政治中的剑拔弩张、互相吵骂，那么，我们会深刻地认识到，《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国富论》所表达和代表的法治、民主、经济制度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世人生命与心灵之中的真实光景是什么，世人是否在内心中有敬虔、诚实、恩慈、寻求公义的立场。

在本章，我们简要地讨论现代社会中经济运作机制与民主以及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在英国崛起之前，欧洲曾经先后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依次成为海上强国。在英国之前的海军大国西班牙，尤其看重世上的黄金，因此，西班牙的世界航海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之一，就是想要在世界各地寻找黄金等物质财宝、财富。

然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对英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间接使得英国的崛起走上了一条与西班牙等海上大国之崛起非常不同的经济道路。

亚当斯密的最大的启迪性贡献，就是正确地指出，所谓物质性、经济性的财富，究竟是什么。

根据亚当斯密的定义，所谓经济性财富是指，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在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与能力。

换言之，财富并非是有形的黄金或是土地等等，而是一个人、团体、社群、社会的劳动创造能力、生产率。

更进一步，根据亚当斯密的思想，真正地增进财富的途径，不是在于囤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在于贸易；因为人们在贸易中通过彼此交换商品，从而达到“术业有专攻”，生产能力与技术精益求精；从而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所最擅长的那一种工作。这样，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调合作基础上，整个人类社会就能够走上不断进步、繁荣兴旺的道路。

在亚当斯密的贸易经济思想中的本质是，人类应当、也可以通过相互协作、分工合作、社会化大分工，来共同增进富裕程度。这种思想，正是现

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根本性基础和精髓，也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过去两百年内、尤其是在二战以后所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在自由贸易经济思想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假设性前提条件，那就是，在人类社会、各个国家、世人心中，人们愿意敞开心扉地、没有嫉恨地、彼此信任、通商贸易，彼此平等地互相对待、相互合作、共同富裕。

如果这个假设性前提条件不成立，那么，就无法建立起一个公平、平等、公正的贸易法规环境，人们彼此之间也无法互通有无、进行自由贸易和商品交换。

自由贸易必须需要一个公正、成熟、稳定、可预期的、透明化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如果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动荡，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彼此猜忌、甚至剑拔弩张、发动战争、互相好勇斗狠、争强好胜、一定要拼得你死我活，那么，从根本上说、从长期而言，自由贸易就不可能进行。

而显然，这种公平正义而稳定的政治法律环境，唯有建基于世人心中的

公义、正义、平等、诚实、信实，以及对于法律、秩序、规则的遵守和敬畏。

在现代社会，这样的政治法律环境往往是在民主制度的政治框架下所提供的。

正如本书前文所述，一个公平正义、平等公义的法律规则秩序环境，从长期而言，唯有建基于整个国家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道德境况、以及内心深处的真诚信仰。

如果人们在信仰中是虚伪的、轻轻忽忽的、玩世不恭的；如果人们彼此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羡慕嫉妒恨；如果人们藐视规则与秩序，既贪婪、又喜欢偷窃；如果人与人之间不但没有诚信，而且蔑视那些说话算数、老实巴交的人；如果人们凡事都用计策，不是三十六计，就是孙子兵法的“兵者，诡道也”；如果世人的心中没有道德底线，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敬虔的信仰，信奉“厚黑学”、“人至贱则无敌”；如果在人间道德世界中，真的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么，所谓的自由贸易，不但不会大规模地发生、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反而，会激起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仇恨甚至战争，进而导致生灵涂炭的灾难。

在现代经济学理念中，人常常被看作是自私的、为了谋求自己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经济动物。

但是，从整个国家、社会、国际的层面而言，上述现代经济学理念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盲点，即，它看不到，个体的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选择待在秩序规则的笼子里面，以诚实守信的辛勤劳动、以宁可吃亏也不说谎的诚信态度，来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而不是以狂野不羁的、投机取巧的、坑蒙拐骗的、见缝插针的方式，来取得财富。

在一个秩序规则法治体系运转良好的国家社会中，或许，那些狂野的、投机取巧的、坑蒙拐骗的行为，会很快受到惩罚；因而，这样的违规行为并不常见。

然而，随着人类的经济活动愈来愈复杂，随着秩序法规越来越疏于坚守，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家社会中许多人信仰越来越不敬虔，越来越虚伪、徒有其表，终有一日，秩序规则体系就会岌岌可危、甚至崩解，从而，自由贸易也会随之消失。

在一个国家社会中，或是在国际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当中，如果大多数人都是没有敬虔信仰、没有对于法律规则秩序的遵守和敬畏、没有诚信与真挚的道德品格，那么，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就不会有开放式的、自由竞争式的自由贸易机制。

在一个自由贸易体制环境中，从国家、社会、国际层面而言，人们必须认识到、并深刻地尊重两点。

第一点是，人们必须由衷地、从心底深处，真诚地尊重、遵守、敬畏秩序规则体系，而不是——处处喜欢耍小聪明，把别人的诚实和诚信，当作是

愚蠢；把自己的诡诈，当作是智慧。

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也应当是如此。

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从根本层面、终极意义上而言，人们不应当把人类世界看作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所主宰的、枪杆子下面出政权的世界，而应当是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真诚相处、公义、正直、恩慈的世界。

第二点是，在国际关系之间、国家内部关系等等之中，大多数人们必须有一颗诚实的、信实的、“爱人如己”的心灵。

所谓“爱人如己”是指，在人类中间，在人与人之间，应当彼此有博爱的心。这种博爱的情感是，每一个人在心灵中应当关爱他人，就像关爱自己一样。

请注意这里，并非是否定、放弃我们自己的正当、合理的利益，而是强调，我们应当关爱别人，正如同我们关爱自己。换言之，这正是我们在本书开始之处所引用的圣经话语：“我们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上帝同行”。

弥迦书6章

6我朝见耶和华，

在至高的 神面前叩拜，当献上甚么呢？

我朝见他的时候，当献上燔祭，

当献上一岁的牛犊吗？

7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

或是万万的油河吗？

为我的过犯，我可以献上我的长子吗？

为我的罪恶，献上我亲生的孩子吗？

8世人哪！耶和华已经指示你甚么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又是甚么；

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谦虚谨慎与你的 神同行。

马太福音22章：

37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 神。38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39第二条也和它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40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

上述两点原则【即，第一，人们必须由衷地有一颗愿意谨守、敬畏、顺服的心灵；第二，人们必须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灵】都与基督教信仰内容有着深刻的联系。

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宗教信仰，其中又有许多迷信【即，以占卜性质观念看待世事与自然世界，并试图从中操弄、筹划，以期得到自己的属世利益；例如，风水、算卦、趋吉避凶、生辰八字、占星术、炼金术、交鬼、画符、拜拜并给神灵烧金纸、等等】以及偶像恶俗【即，把神灵物化为人手

所作的偶像，例如金、银、石、木、泥像等等；或是用雕像来代替上天、神鬼；或是把信仰的对象当作是人臆想出来的、属世性质的对象、或是人出于自义自傲而杜撰的、没有诚实完整事实根据的玄学深奥之理，例如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玄学主义，等等；即，人以属世之利或是自己的自义、自己的心思意念为偶像】。

在这个世上林林总总的宗教信仰中，只有三个宗教信仰体系，有着强大的历史渊源背景、相对而言完整的理论支撑、比较完全的组织体系、以及正规宗教经典系统为核心内容。它们是，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以可兰经为核心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以及以系列佛经为核心的佛教信仰体系。下面我们引述一些简单的比较和反思。

+++++

+++++

+++++

+++++

+++++

+++++

+++++

+++++

+++++

【【【引述 《从金刚经说起》前言】】】

前言

世上的宗教有很多。然而，在世上许许多多林林总总的、千差万别的宗教信仰、以及相应文化传统中，成体系的、有详尽而系统化的宗教经书与教义为支撑的，有强大理论背景支撑的，能够构成一个相对而言完整神学、信仰理论体系基础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宗教，或三个宗教体系，即，以圣经为中心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以及，可兰经为中心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还有，一系列佛经为中心的佛教信仰体系。

在本书中，我们以佛教经典中的一本最重要的核心教义性书籍《金刚经》为聚焦点（以后，我们也会讨论佛教经典中的其它重要典籍、书籍），从中分析、评介、剖析佛教的教义与思想，以及它在社会中、世人生命之中产生的相应影响。

无论是世上哪一种宗教信仰体系，它们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试图回答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

所以，如果，我们要分析、评介、剖析一个宗教的精髓与核心体系内容，那么，我们就应当来仔细地、认真地看一看，它们在关于上面五个方面的观念中，是如何阐述的。

正如《世界佛教共识宣言》中所说，也正如几乎每一本佛教经典中的思想核心所表达的，——在佛教信仰体系中，并没有那样一位全能的、创造宇宙天地的、终极的造物主。

由于在佛教中没有造物主、或不相信有造物主，因而，这一特征直接影响到佛教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等领域中的一系列深刻的理念与观点。这些理念与观点的特征往往是泛神主义哲学所共有的。

这些理念与观点的特征，就是：——在世界观上，它们往往把世界看作是无珍贵价值、无隽永意义的，而不是把世界看为瑰丽、奇妙、意义深刻的。它们往往强调，世事无常，人不应当被世事羁绊，而是应当醒悟，看清世界与世事的虚无等等。在人生观上，它们往往把人的生命、心灵、人格等等看作是并无深刻价值意义的。

这种泛神主义哲学体系，由于没有造物主为中心的世界观、人生观，所以总是会指出，物质世界的虚浮性、不可倚靠性。然而，即使，这样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错，并且是重要的；但是，它们却缺失了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它们不能看见世界被造的奇妙性、美丽性、智慧性，也看不见世人生命的珍贵与独特、心灵的奇妙、思想的可贵。人的这

种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是宇宙世界中一种最为独特、奇妙、珍贵的能力与品质，是来自于造物主、创造生命之主自己的无限能力与完美品质；这样的能力与品质，正是道德的基础，是爱的根源。

总而言之，它们把人生、世事、价值等等，往往都看为羁绊人的东西，提倡要离弃、舍得、放下，而不是要有满腔热忱的、执著的向往、盼望与信念。

究其原因，无论是人们在思考世界观、还是在思考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的时候，如果离开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全能之造物主，那么，世界就是冰冷、荒芜、混乱、无意义、虚浮的，而人生也就在本质上是苦的；因而，根据泛神主义哲学，这些就都应当被看破、看空、舍弃，放弃执著，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

在本书评析《金刚经》的过程中，我们会清晰地看见上述特征。

+++++

+++++

+++++

+++++

+++++

+++++

+++++

+++++

+++++

【【【引述 关于伊斯兰教的综述】】】

《关于基督教信仰证据的反思》

世上存在的谎言，并不能证伪真理。许多人相信谎言，这恰恰证明了，世人生活在轻忽、自私、满了罪性与罪行的生命之中。世上存在许许多多的骗子，这并不表明，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诚实”这件事。

世上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们，常常用伊斯兰教为例，以此说明——：“一个广泛传播、被许多人相信的宗教信仰，并非只有基督教信仰一个宗教；因而，人们就并不能说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基督教信仰是真实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信仰或者都是真实的，或者就都是虚假的。”

所以，我们在本章这里，仔细分析，看一看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究竟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我们承认，伊斯兰教在历史上也是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就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到了世界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我们也承认，穆罕默德的确是可兰经的著者（他或许有一两位助手帮助他写完此书）。我们也进一步承认，穆罕默德的确是一个非凡的人，以至于他能够以非同寻常的决心和毅力，把他的事业一直进行到底。我们也不否认，可兰经中讲述了很多关于上帝的完美性等内容，以及教导人应当道德高尚等。可兰经的语言看似优美，具有阿拉伯语的纯粹风格；这一点，许多伊斯兰教学者都同意，很多基督徒学者也都不反对。但是，穆罕默德声称自己得到了上天的特别启示；——关于这一点，却没有任何外在证据能够证实；并且，从可兰经的教义内容中，我们能够看见大量的证据，显明了，伊斯兰教绝非是来自上帝的启示。

为了让这一点能够得到更加清楚的说明，让我们公正无偏地考虑以下事实：

1. 关于穆罕默德的自我宣称，既没有任何神迹的支撑，也没有任何预言的证明。

事实上，穆罕默德经常性地被他的反对者要求提出确凿的证据，来显明他的身份与使命的真实性；但是，他总是以轻蔑的语气拒绝，并用一系列理由来推搪。可兰经里面写道：“真主对穆罕默德说：——完全可以差遣你，让到地上来行神迹；但是，以前的国家民族用谎言败坏了神迹，所以，你只是一个传道者。”“如果你行神迹，百姓不会相信你；因为从前摩西、耶稣、以及众先知行神迹的时候，百姓也弃绝了他们；所以，你不要行什么神迹。”

PALEY博士曾经列出了可兰经中至少十三处不同的地方，都以与上文相似的理由，来解释穆罕默德为什么没有行神迹的能力。的确，穆罕默德用很多华丽的辞藻，讲述了很多神奇的事情；但是，他本人却没有任何能力，来施行哪怕一点神迹。所以，他一生的传道都是空口无凭的。

在穆罕默德去世几百年以后，他的追随者们假意讲述了一些穆罕默德所行的神迹；但是，这些事情不但没有任何见证（即，在事情发生的当时，见证人的见证），更是与可兰经的内容直接违背的；因为可兰经多次重申，穆罕默德没有行神迹的能力。并且，那些几百年后追随者们所编造的神迹，本身也没有任何深刻或重大的价值与意义，而仅仅是一些虚浮的、博人眼球、哗众取宠的事情；这些类似的事情，世上有很多迷信的风俗与陋

品；比如，树木可以行走，石头可以向他打招呼，水泉可以说话，骆驼可以抱怨，羊肉说自己里面有毒，等等。

综上所述，伊斯兰教的教义本身中，并没有任何神迹的内容，而仅仅是一个自我谎称者的、空口无凭的宣称。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与伊斯兰教的教义有着深刻而本质的区别，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建基于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神迹（这是整本圣经内容的核心，是整个基督教信仰教义的中心与基础；此事有着深刻的价值和意义；有着斩钉截铁的、令人无可置疑的历史见证；基督使徒们为此而甘洒热血，走遍天涯海角传这和平的美好福音；整本圣经旧约，在跨越上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以令人无可推诿的清晰预言，证明了这件事情的历史真实性）；后者则没有任何证据的痕迹和影子；没有任何人能够显明，伊斯兰教教义是来自天上的启示。

2. 我们也可以从道德教导与特征的角度，来比较基督教信仰与伊斯兰教两者之间的不同。对此，我们有充足的历史和文献证据，能够显明我们的比较结果。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无害的、毫无罪污、毫无瑕疵；在他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罪性与罪行。基督的生命是纯洁的；即使基督的敌人，也无法找到他的任何罪与错。基督的生命，向我们展示了完美生命的榜样；他有着热忱的信仰，纯洁的爱心，柔和谦卑；这些无限美好的品格，都是世人所未见过的。

穆罕默德的生命品格则与耶稣基督的生命品格完全不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穆罕默德的生命中，充满野心、淫欲、残忍、不公不义；他的生命中充斥着许多最血腥、最残暴的罪行。亵渎、撒谎、谋杀、通奸、淫欲、掠夺，等等这些事情，对于他来说，几乎都是每天发生的家常便饭之事。而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护，避免其他人的效仿，他谎称自己的这些行为都是出于真主的直接启示、旨意。他无耻地宣称，是真主给了他那些特权，使他可以随意行那些丑恶的罪行。这些事情的数量如此大，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我不愿在这里过于详细地谈论它们的细节，免得它们玷污了本书的纸张，也免得玷污了读者的情感。

3. 对于一个公正不偏、心态诚实的人来说，可兰经本身的内容，与圣经新约的内容根本无法相比。可兰经的内容，基本就是一些所谓高尚情感、道德教导、宗法礼制的大杂烩、堆砌；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匪夷所思、荒谬的故事；处处显出谎言与自相矛盾的特征。穆罕默德自己也承认其中的内容包含许多矛盾；他自己对此的解释是，他的真主就是这样告诉他的；所以上一章的内容，有时在下一章就被否决掉。这种矛盾的内容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很难向一个穆斯林证明可兰经的内容是错的；因为他常可以找到相反的内容来为自己辩护。

可兰经的内容，并非是超出人的想象；它巧计地融合了当时阿拉伯地区流行的宗教信仰观念；它激励人心中的最强烈的、最暴戾的情感；它鼓励人

的野心、权力、复仇、战争；它打开淫欲的大门；它宣称人们在天国可以得到这方面的、属肉体的奖赏；这些，都是为了引发人心中不洁的动机。它不鼓励、拒绝、甚至禁止人们自由地发问；它禁止人们进行任何教义上的反思、思索、自由讨论。可兰经中的那些优秀的部分，都是由于抄袭、模仿了圣经；而可兰经中那些不同于圣经的部分，即，那些穆罕默德按着自己的判断或想象而添加的内容，则充斥着虚假、敬虔、荒谬。

4. 穆罕默德传教的方式，与福音传播的方式完全不同，天壤之别。

如果，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那么就是，这两者都在刚建立的短期时间内，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并且，两者都自从建立以后，就一直持续地存在下去，直到今日。

但是，当我们仔细认真地考察两者的传播方式的时候，就会更加惊讶地发现，两者之间不仅一点相似性都没有，而且甚至是完全相反，互相形成了鲜明对比。

穆罕默德在一开始传教的时候，的确想用劝服和计谋的方法；但是，他这样持续进行了十二年以后，收效甚微。前三年，他只有十四个门徒；七年中，他只有八十多门徒；十二年后，他从麦加逃走的时候，跟从的人数很少。

在这个时期的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基督教信仰的早期传播根本没有可比性。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是极其迅速的，如同闪电爆发一样，从天的一边照到另一边。在短短数年之内，没有什么属世的势力与权力的帮助，面对着重重阻力与反对的势力，基督教信仰却很快就传遍了罗马帝国的疆域，甚至传遍了当时已知世界的许多角落。但是，伊斯兰教却在十二年内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而且，与基督教信仰所针对的、文化程度高度发达的罗马帝国内的各地百姓（即，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人不会轻信一个外来的信仰）不同，伊斯兰教在公元六世纪，即，在其开始建立的时代，所针对的是无知、轻信、没有什么文化的阿拉伯地区人民。然而，在这个期间，伊斯兰教的拓展却极其缓慢。

事实上，若没有刀剑，这个宗教信仰根本就不可能在人类的社会与历史中泛起一点涟漪。当MEDINA的居民开始支持穆罕默德以后，穆罕默德改变了他的整个计划；他正式宣称，要用武力的方式开始传教。从这时起，穆罕默德就变成了一个军事战斗家。他开始频繁地袭击、劫掠商队；当武力增长以后，他开始征服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部落、国家。有时，他会大规模杀死战俘，或是把战俘卖为奴隶。起先，他的命令是杀死一切不皈依伊斯兰

教的人；后来，随着他武力征服的区域越来越多，他的命令逐渐变为：“可兰经，或死亡，或上贡”。

不过，我们不要产生误解，不要错误地认为穆罕默德的征服区域极广；其实，在穆罕默德的有生之年，他的统治区域从未超出过阿拉伯地区，除了叙利亚的一两个省份之外。是他的后继者、哈里发们，用刀剑与火，把伊斯兰教的疆域扩展到亚洲以及埃及的部分区域。在这些拓展过程中，除了血腥的杀戮，还能有什么事情呢？

因此，虽然伊斯兰教的传播速度很快、范围很广，但是，这些都是通过刀剑、杀戮、血腥、征服而达到的；这与基督教信仰的和平温柔的传播过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凭靠野蛮的武力，后者是来自天上的祝福。

5. 伊斯兰教的教义内容，及其在人生命中所带来的影响，与基督教信仰内容和影响相比，完全不同、天壤之别。

不论基督教信仰传播到哪里，它都给所到之处带来祝福与温馨；那些真正

贯彻实施基督教信仰教义原则的人，以及受到这些美好教义原则的影响的人们、国家、民族、或地区，都得到了极大的益处。如果我们放眼查看世界地图，就会清楚地看见，世界上的真正文明的国家、民族和地区，那些科学与文化发达、经济得到蓬勃发展的区域，都在哪里呢？什么地方，有真正的欣欣向荣的气象呢？相对而言，什么地方，有良好的道德风貌、和谐的社会秩序呢？穷人和受苦难的人，在哪里会得到最好的帮助、救济呢？人民在哪里能够得到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享有自由呢？妇女在哪里受到尊重，在社会中享有应得的、受尊敬的地位呢？针对年轻人的普及教育事业，在哪里得到最好的发展呢？人们在哪里最恩慈、良善、幸福呢？

显然，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以上问题的答案：——是在那些基督教信仰发扬光大、基督徒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有相对而言的很大影响力的地区。并且，在那些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国家 and 地区，当地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全、自由、和平程度，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的实质情况、敬虔的景况，有着直接的关系。

相反，我们如果仔细考察当今那些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地区，就能够清晰地看见，满目苍夷、民不聊生、极其荒凉的景况。在今天的中东地区，那曾经是艺术、文学、精致工艺都很繁荣的地区，现在早已凋零破败。许多古代的良好礼制都已经无影无踪。在中东各个国家中，到处是暴君与专制政权的铁腕统治；那曾经的安宁社会生活，已经变成了无知与奴役制度遍地的境况。

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各地禁止、或不鼓励教育、学识、做学问。人们不能自由地探索真理；国家的统治政权、伊斯兰教的统治，所要求于人民的，就是要像奴隶一样顺服。社会中没有正义；或是，正义常常被人们忽视。没有人享有生命与财产权的安全。伊斯兰教任何所及之处，人民就立刻失去了宝贵的自由。与此同时，整个伊斯兰教的传播运动就完全成为一个战争扩张的行为。根据可兰经，一个人最好的行为，就是为了伊斯兰教的扩张而投入战争；最高的荣誉，就是那些死于战争的人。无疑，可兰经的这些内容，直接导致了穆斯林的圣战士的战争原则，使他们在战争中不怕死亡；使他们期望在战场上战死，然后进入那个充满肉体血气满足之乐的“天国”。穆罕默德在可兰经中说道：“刀剑是进入天国的钥匙。为了真主而流出的一滴血，在战场上睡的一晚上觉，超过两个月的禁食和祷告。死在战场的人，罪得赦免。审判日的时候，他的伤口将要铺满玫瑰，香气扑鼻；他的残臂断腿，将要换成天使的翅膀。”

然而，当穆斯林在各个地区的征服战争取得胜利、结束以后，他们的生活就成了慵懒、愚昧、昏昏欲睡的样子。当别的国家在艺术、文化、科技方面取得进步的时候，穆斯林各个国家始终陷入停顿的状态，停滞不前；甚至常常倒退。他们在文学、文化方面，在绘画、科学探索、文艺等方面，再也没有优势。他们的人民常常俯伏在暴君政权的统治之下，没有自由与个人的权利。

+++++

+++++

+++++

+++++

+++++

+++++

+++++

+++++

+++++

【【【引述 基督教信仰与伊斯兰教信仰的比较，以及基督教信仰对于社会生活与体制的影响】】】

《基督教的证据》

基督教信仰给人类社会提供了什么

本章的题目主要局限于基督教信仰在人类社会道德方面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力。关于福音对于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将在下一章讨

论。另外，关于福音对于人生命更深层次问题的深刻作用，我们则将要在本书最后一章专门论述。在本章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福音对于人类社会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以及社会整体的生机勃勃、自由而团结的状态。这个题目虽然是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的讨论，但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广泛话题。而且，这个话题在很漫长的历史中都曾引起了许多人的深思。在这里，我只想进行一些言简意赅的、初浅的论述。我的这些论述其实相比于前人的相关著作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地方。如果说与前人的著作有什么稍微不同，那么我想，本章的文字大概更专门地针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缺乏以及所经历的很多具体事情。

我想要论述的一个重点是，关于人与人之间、乃至整个社会之团结状态的概念，在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群，与一个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天的人群之间，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差别。在后者而言，这些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天的人群所能够在一起组成的最好的团结状态，就是一个无中心的、散漫邈远的“共和国”。在前者而言，那些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的人群在一起则会构建起一个“有坚固根基的城”、一个有良好核心、众志成城的“上帝的国度”。

在我们考察基督教信仰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来注意看一下基督教信仰中一些重要的抽象原则，然后再看其在基督徒们的教导中、以及生命中的应用与体现。

当我们讨论基督福音中的抽象原则、及其与人类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的时
候，会立刻想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性与福祉
而言，我们最缺乏的、最需要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在福音的最根本
层面的真理中，社会的存在性与福祉之所需，如何得到了满足？

人类社会的根本性需要，取决于构成社会的所有组成分子的需要。社会是
由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每一个人都能够单独地站
立，面对自我，面对上帝。然而这些个体性的人却生活在一个社会中，通
过一个心灵的网络纽带，彼此连结在一起。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通过
一些外在的言语行为来彼此影响生活习惯，而且他们在内心的许多观念上
也会受到整个社会群体的相当程度的影响与改变。他们互相影响的程度和
力量，取决于社会的团结程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一个社
会的良好而健康的状态，取决于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自由程度与群体的团
结程度之间的平衡。但是实际上，这个平衡点是非常难于达到的。即使在
理论上，我们也很难判断，个人自由与群体团结之间的完美平衡点到底应
该在哪里。如果个人自由太多，则社会的状态会变得道德堕落、生活散漫
邈邈。如果群体团结程度太多，则每一个人在其中的生活可能会非常压
抑、束手束脚，人的幸福与创造力也会大大下降。当社会无法达到个人自
由与群体团结两方面之间的平衡的时候，社会就往往会陷入周期性的动
荡。个人自由散漫现象如果普遍地在社会中发生，社会就会逐渐陷入无政
府主义的混乱与堕落状态，并最终导致暴君专制主义的盛行，然后暴君专
制又被新一代的无政府主义者推翻。这样，社会就会如此周而复始地陷入

动乱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制主义政府的统治机器是针对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的手术刀。但是，这个手术刀总是在病人的伤口上刻下更深的伤痕，使病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对于正常的、健康的社会福祉而言，必须同时需要有两个原则得到满足：自由的原则，与团结的原则。这两个原则的建立，部分地取决于政府的官方治理，部分地取决于人民的自由意愿。

一方面，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来说，人们需要自由。自由的意思是，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一定的限度内、一定的范围内采取自由的选择和行动；以及，社会中的每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社团、群体能够自由地行动和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的团结状态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性是社会长久存在、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是社会团结状态得以维护的重要原则。社会稳定性的原则独立于、或先于，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原则。

如果没有自由原则，就不可能有人的社会生活，因为人人都成了奴隶，自由思想也更无从谈起。如果没有稳定原则、或团结原则，社会就不可能延续下去。

一个完美的、或相对而言比较健康的社会形态，我们称之为“文明”。这个词本身就蕴涵着这方面的意思。在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应当处事“文明”，享有自由、但要为集体做贡献，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为了社会的团结而愿意牺牲自己。

现在我们来思考，基督福音与上述两个根本性社会原则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换句话说，福音向我们启示的社会生活之真正原则是什么？

无疑，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重要内容就是，敬拜那位宇宙天地的造物主、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的永生真神。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主你的上帝”。“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的生命隐藏在他那里”。上帝的圣洁道德律法，要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人类的最好状态、最高理想、最大幸福，就应当是像上帝那样圣洁、公义、仁慈。显然，基督教信仰为上述社会两原则中的稳定性原则提供了重要的真理层面的支撑：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需要一个先于其自由意志之上的、社会成员所共有的道德基础。

有人会就此争辩说：“即使社会中的人们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帝，也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观察人类社会的历史，会看见我们自己的良心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每一个人只要随从自己的良知，就足以维护社会的基础了”。

但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社会“律法”的现实性。不论我们所说的律法是什么，总之，社会需要这样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治理，而这些律法、或规章制度总是要限制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自由意志。这种社会统治的权柄与社会个人自由意志之间总是存在这样一种张力，不论两者之间哪一个大，哪一个小。

对于无神论主义者或泛神论主义者而言，这种社会律法的来源是宇宙自然世界，或者基于人性自身的光景。事实上一般而言，无神论主义与泛神论主义【译者注：泛神论主义是指，认为世界本身就是神；这个世界之上并没有那样一位全能的、终极的、有着自由意志与自我认知的、自有永有的上帝、造物主。因而，在泛神主义者眼中，人在这个宇宙自然世界中，并没有什么终极层面的高贵性；人的自由意志、自我认知并没有什么本质层面的高贵源泉和永存价值】的理论家们，都往往是王权、专制政权的坚决推崇者、坚定拥护者、热烈鼓吹者，因为他们推崇社会的稳定要胜过社会的自由。在他们眼中，个人自由并没有那么珍贵，思想自由也没有什么特

别的价值；甚至，这些个人自由都会被看作是放纵与放荡的代名词；这些都可以为了社会稳定的原因而被裁减、践踏。这是因为，在他们眼中，人生命的意义并没有本质上的终极高贵性、尊贵性；在人与自然界宇宙之间的关系上，个人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译者注：人的尊严，按着圣经中所述，是来自于上帝自己的尊严与荣耀，因为人的生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他们的所谓和平与稳定，是压制自由的结果。他们所推崇的统治常常导致社会中属灵状态的荒凉。他们的和平往往是一种扭曲的、徒有其表的外在和平。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无疑，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理论上来分析，敬拜全能、全知、公义之上帝的信仰体系，能够给社会带来最坚固、最安全的稳定性环境因素。对于个人自由与意志的所划定的界限：“你只能走到这里，不能再向前逾越”这样的律法，必须是在终极层面意义上来自那位有位格的、能听能看的全能者上帝自己的话语。个人思想与生命就像是大海中匍匐向前的海浪潮水。对这潮水的限制力量，必须是来自天上的力量，来自那位创造和管理宇宙天地万物的上天、独一的真神。

然而一神主义本身却并不一定能够使社会在稳定原则与自由原则之间达成平衡。【译者注：一神主义是指，信仰这个世界是由一位独一的真神所创造和掌管的。在人类历史中，一神主义的宗教信仰有三个主要宗教形式：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后两者的起源都与犹太教的圣经旧约经典有密切关系。伊斯兰教否定旧约圣经的主要部分，认为犹太人的祖先篡改了

上帝的启示，于是穆罕默德就另起炉灶，另外创建出了伊斯兰教信仰】。这是因为，一神主义可能会导致人类社会生活中非常苛刻的管理，以至于达到完全排他主义的程度。比如，伊斯兰教的社会具有强烈的王权和专制政府的特点。在犹太教的社会中，这种专制倾向不那么严重，因为根据旧约圣经，“耶和华所膏的”人有君王、先知和祭司。君王负责国家政事，先知把上帝的启示向世人传讲，祭司则负责全国百姓与政府人员们的敬拜信仰和仪式。在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时代，这三个角色在某种程度上重合，结果导致百姓担负很重的轭。在地上的国家政权体系中，当君王、祭司、先知三个职事高度重合的时候，社会的统治权力就会很大，而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就会受到很大挤压与压制。

而在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一神主义中，社会里面的每一个个人完全沦为绝对命运下的被动受体，因为所有人的自由意志都要无条件地完全服从于穆罕默德在国家政权中的统治权力。在伊斯兰教的一神主义下，“一神主义”的概念就成为完全的“真主凌驾世人”。在这样的统治下，每一个个人都是微小的、盲目的、软弱的、罪恶的。真主是至高无上的律法颁布者，是全能的法官。在每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中，一切都要绝对服从真主的旨意。任何人都不能有任何质疑的权力。在这种一神主义统治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在外在言语行为上的服从与顺服，看起来是最重要的。人们不应当有，也不需要有任何自由。在这样的一神主义社会中，个人的自由生活无法在社会的纽带关系中立足。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在政府绝对统治权力之下往往失去了权利与自由的空间，不再有活力和创造力。整个社会变成了一种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状态，直到下一次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政府权力与国王被推翻。然后社会进入下一个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周期循环。

有时，上述弊病也成为一些现代人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他们认为，如果基督教信仰在国家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国家社会也会像伊斯兰教社会那样，变得死气沉沉、没有活力、没有创造力，社会大众就会失去个人生活的自由以及思想上的自由。

但是，基督教信仰与简单的、伊斯兰教那样的一神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中，上帝的启示表明了，上帝与世人的关系不是“上帝凌驾世人”，而是“上帝与人同在”，即，“以马内利”。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使人有思想、有自由、有意志。正是在这样的基督教信仰核心教义中，人的自由才有了真正高贵的、终极的、本质性的根基。虽然人是软弱的，虽然人应当谦卑地承认和悔改己罪，虽然人不得不面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在人的生命本质当中，应当本有自由的属性。正是在这样的、与生命自由息息相关的、基督教信仰核心教义中，上帝才真正是世人的天父，人才真正是上帝的儿女。圣灵在人的心里面作工，不是把人当作无意识的机器，也不是把人当作被压制的奴隶，而是，圣灵净化我们的心灵与灵魂，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更使我们重生、得到崭新的生命，使我们由内而外地、由衷地、忠心地、自由地来到公义圣洁之上帝的面前。福音的奥秘在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与赎罪之祭。在福音中，包含着最令人震惊的事实与真理。保罗把这福音看作是上帝的奇妙大能，看作是基督教信仰最本质、最核心、最深刻的内容。人与上帝是朋友、是同工、是亲人、是至爱。这不是冷冰冰的、抽象的哲理，而是真实的、热忱的、生命的信仰。

这正是福音的奥秘与最迷人、最甜蜜的精髓，正如耶稣基督在圣经中所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因为真理必使你们得到自由”。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世人的救恩，是使人得到自由的恩典之约，而不是使人处于被奴役之境地的律法之约。恩典之约使人真正地、衷心地愿意来寻求上帝、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和圣洁的律法典章，因而真正成就了、完全了上帝的律法。这恩典之约使人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因为人之所以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自己有任何优点，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白白地赐下的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使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和接受他救恩之人的罪债被偿清，使我们的罪得到上帝的赦免和饶恕，因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永远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救恩的人是谦卑的，因为我们真心地承认自己本都是该死的罪人。这样的人是诚实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和悔改自己的罪。这样的人是真诚而热忱的，是自由的，因为不再有灵魂之中、罪恶权柄之下的奴役和羁绊。

正是在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之下，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应当拥有之自由的价值。这自由是尊贵的，是高尚的，而不是放纵与放荡的代名词。正是在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之下，在欧洲古代历史上，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被逐渐废除了，中世纪的农奴制度逐渐消失了，以及在我们当代，美洲境内的奴役制度也这样被最终取消了。

请注意，圣经本身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解放人类奴隶制的“解放神学”，而是指出世人普遍的罪的光景，指出世人对于上帝的背离，以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福音救恩与大能。人灵魂所处的被奴役光景，真正根源不是外在的奴隶制，而是内在的、人生命处于罪的奴役之中的光景。每一个世人在其生命的本质中都有着倾向于罪的性质。这也正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所在。他使我们的生命脱离了罪的辖制和捆绑。我们的真正自由，其核心不是在于外面的、肉体上的自由，而是在于里面的、灵魂之中的、脱离了罪恶捆绑的自由，是脱离了死亡恐惧、有永远生命、天国盼望的自由，是能够过一个圣洁公义之生活的、热忱地爱上帝、完全地归向上帝的自由。

但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福音之中所包含着的这种最根本的关于人生命之真正自由的思想，的确对于社会学中的个人自由具有重大影响和价值意义。这以生命自由为中心实质的教义，这以自由为基础的信仰、思想、行为、规范，是对任何专制政权、暴君统治、强迫压制、寡头政治、强奸民意等等社会暴虐法权机制的本质性的反对。

基督教信仰的这种特点，正是导致世上的那些想要奴役人民的政权讨厌、排斥、压制基督教信仰的原因。比如，TRAJAN以及MARCUS AURELIUS等等专制政权，都极力想要反对和排挤基督教信仰。在基督教历史上，在历世历代中，在各个国家的历史里面，都曾经有许多基督徒殉道者。这些殉道的事情，尤其发生在福音刚刚传到一个国家的时候，或是那里正在经受信仰

上的逼迫的时候。每一位基督徒殉道者，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自由而死的殉道者。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谦卑而和平的信仰，为了心中所敬畏的上帝，为了在耶稣基督里所得到的恩典，为了对于上帝的爱，而宁肯丧失性命，也不愿放弃这宝贵的信仰。他们愿意在一切世事上温和地、和平地、恩慈地、勤劳、谨守地生活，愿意在一切世事上遵从在上掌权者，尊重政府权力和法律，遵守社会中的一切法律典章制度。但是在信仰之事上、属灵之事上，他们却绝不愿意在任何属世的权力面前卑躬屈膝、苟延残喘，绝不愿意听从人而不听从上帝。他们知道，有一个属天的、终极的律法赐予者，要远远地高于世上一切立法者；上帝的典章，要远远地高于世上一切的规章制度与法律。

这种既谦卑温和、又坚毅稳定的信仰，不仅仅是历史上那些无数基督徒殉道者们的信仰，也更是历世历代以来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平凡而真诚之基督徒的信仰。每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仰都应是如此。这种信仰中包含着一种与世俗中的好勇斗狠的英勇主义完全不同的、谦卑温和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中，有着对于人灵魂自由的高尚本质的追求和尊重。在人的心灵土壤上，在人的信仰之中，只有上帝自己才能亲自来掌权。上帝以道成肉身的、舍命牺牲的、救赎性的爱，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因此，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上，以任何属世的人为我们灵魂之主。

在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革命；但至少在名义上，这些

革命更多地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要真诚地、按着圣经所教导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为了信仰的自由，而不是完全为了属世的政治权利的自由。在一个国家的基督教信仰中，如果没有对于个人自由的尊重和重视，那么，这个国家可能就已经偏离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真理。

所以，我在这里想要提出这个论述的结论和论点，即，基督教信仰是最适合人类社会健康蓬勃发展的宗教信仰，因为它不仅满足了一个正常健康社会所需要的团结稳定原则，也满足了这个正常健康社会所需要的个人自由原则。正是因着基督教信仰，社会才能够有真正的长治久安，因为人们在其中的生活可以生机勃勃、充满创造力、勤奋谨守、享有自由和尊严，但却不会滑入道德堕落、无政府主义、刁酸尖滑、彼此猜疑、毫无信任、好勇斗狠的混乱与败坏的深渊。当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渐渐失去基督教信仰、沉迷于饮酒宴乐、骄奢淫逸、彼此争斗不休的时候，就是他们逐渐走向败坏与崩塌的时候。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基督教信仰本身并没有在社会团结稳定原则与个人自由原则两者之间试图进行某种调和，或是给出某种明确的界限和公式。圣经福音书中，当有人来问耶稣基督是否要纳税的时候，耶稣给出了一个在历世历代以来非常著名、人所熟知的回答。他并没有像许多人期望的那样，在什么是属世、什么是属天的事情上，划出一个明确的、楚河汉界一般的界限，而就是说：“凯撒的当归给凯撒，上帝的要归给上帝”。当然，耶稣对那个具体问题的回答意思是说，应当纳税。但是从更广泛的角度

说，在这一点上、在这方面的本质性问题上，耶稣基督的有限度的沉默，以及有限度的澄清，给了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教导。

无疑，在历史上我们常常会看见，基督教的教会、团体、会众要起来，以和平的精神，为社会公义而发声；在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上，常常需要挺身而出、为弱者呼吁、秉公行义、抵挡罪恶，无论这罪恶是来自高举稳定大旗的政府权力、还是来自高举自由主义的社会个人、甚至暴民。然而，无论基督教信仰、福音针对社会具体问题所采取的具体立场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那种具体立场本身，并不是永恒的价值原则，而仅仅是此时此地的、福音之永恒价值与原则的一个具体应用。只有福音原则本身才是永恒的。在福音中，既包括了对于自由主义的强调，也包括了对于集体主义、团结主义的强调。这两者虽然看似矛盾，但却都是重要的、高尚的，因为都是来自上帝的律法：“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主你们的上帝，并要爱人如己”。

更进一步说，究其本质，基督徒们的真正终极的归宿和盼望，不在于这个地上的繁荣与富强、或是公义与和平，而是在于天上的永远国度，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盼望，那没有死亡和眼泪、没有痛苦与别离的属天国度，那个与上帝同在的、永远的、真实的家园。所以，无论是贫是富、是显赫还是卑微，基督徒们都能在这个世上和平地、谦卑地、忍耐地度日。基督教信仰不是遁世的信仰，而是积极入世的信仰；基督徒们要在这个世上作光和盐，发光发热，竭尽全力、毕其一生爱上帝、爱世人。

然而同时，基督教信仰也不是以这个世界为归宿、倚靠、终极价值的思想体系。

所以，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中，基督教信仰都会把真正的福祉带给那个社会，并渐渐地也把个人自由和长治久安带到那里。无论是在稳定不动的东方，还是在活泼变化的西方；无论是在早期的、以家庭为单位与核心的、简单社会中，还是在现代的、复杂社会纽带所连接的、庞杂社会环境中；基督教都能够把人心灵所饥渴的、渴慕的信仰与精神支柱带给人。并且，因着基督教信仰的广传与普及，社会道德风貌得到大大提高，社会更加稳定和谐，人民同时享有更多丰富美好的自由。

如果，在历史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基督教只强调稳定原则或是自由原则中的一方，而不强调另外一方，那么很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某种特定社会形态中，稳定与自由这两个原则因素之间不平衡，一方太大太多、而另一方太小太少。

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是，许多国家的社会随着个人主义的解放而导致道德失序、社会混乱。但是，当那些国家的社会从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中经过重整、进入法律秩序状态中的时候，结果往往是，专制主义政权上台，公民自由被一扫而光。当今，在许多没有基督教信仰

的国家中，或是许多明确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中，专制极权主义常常被当成针对社会淫乱放荡、混乱、失序、道德败坏的解药。他们的国家社会形态如同钟摆一样，在极权与放荡之间摆来摆去，总是不能停歇、不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在他们的社会中，或是没有自由，或是没有稳定，二者总是不能兼得。

综上所述，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类社会有着极其重大的益处。从久远的历史层面来说，从漫长的时间见证来说，在人类历史中，只有真正的、以圣经为唯一根基的基督教信仰，才能给人类带来一个这样的社会：——既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自由、充满温馨博爱、同情弱者、鼓励强者、彼此平等、满怀热忱情感的社会；又是稳定繁荣、长治久安、和平安宁、不断奋进地进取的社会。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如此独具特点的基督教信仰，居然成为了千古以来无数哲人志士所苦苦思索的、一直找不到答案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极其惊奇诧异的事情。关于人类究竟应当怎样才能彼此和谐相处，历史上无数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都曾经对此思索不已。许许多多的人都在这方面有汗牛充栋的著述。世上也有许多流派和学院，不断在探讨这些事情。但是，他们或是流于一些象牙塔内的文字游戏、而对真实的社会影响微乎其微；或是导致一些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但做起来却尽是假冒为善的虚伪之辈所组成的社会。而基督教从诞生到发展，从卑微的开始到逐渐的增长，看似平淡无奇、和平温柔，

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无数世人的生命，改变了许许多多的国家、民族、与文化，这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迹。没有什么，比这些历史更加坚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十字架救恩，我们永生与天国的盼望，等等这些教义，即使是最没有文化的文盲，最简朴的公众也都能够理解。我们如果否认这些教义，就不能理解基督教信仰在人类历史上的奇妙作为，不能理解教会的永存性，不能理解圣经的教导。

```
+++++  
+++++  
+++++  
+++++  
+++++  
+++++  
+++++  
+++++  
+++++  
  
+++++  
+++++  
+++++  
+++++  
++
```

让我们继续讨论和阐述，在自由贸易体制系统内，其中重要的两点前提性

原则【即，第一，人们必须由衷地有一颗愿意谨守、敬畏、顺服秩序法规法律体系的心灵；第二，人们必须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灵】都与基督教信仰内容有着深刻的联系。

以圣经为核心基础的基督教信仰，对我们的教导是：——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就是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无限全能、公义圣洁、慈爱恩典、无限智慧的、上天、上帝、造物主。并且，我们应当爱人如己。

人与人之间的爱，唯有是建基于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的根基与源泉，是来自于神。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爱里面，既应当包含着，对于良善、公平、正义、公义的追求和秉持，也应当包含着，对于罪恶的憎恶和离弃。我们的爱的本质，应当是憎恨罪，爱罪人。

哥林多前书13章：

现在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 1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2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3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

4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5不作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6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7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爱是永存不息的。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9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10等那完全的来到，这部分的就要过去了。11我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既然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12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象主完全知道我一样。13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马太福音5章：

43“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47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甚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48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什么是良善？遵从那永生之神、上天、上帝、造物主就是良善。

什么是罪恶？悖逆那永生之神、上天、上帝、造物主就是罪恶。

上帝自己是分别良善与罪恶的根基与基准。分别善恶的终极权柄，唯有是属于神。他是道德律法的终极颁布者，更是道德律法的终极审判者。

人在内心中，若没有在上帝面前的真诚信仰、谦卑顺服，就也不会在他人的面前诚实、信实【宁肯吃亏也不愿说谎；宁肯吃亏也不愿违反规则与承诺】，也不会秩序、法律、规则、法规面前由衷地顺服、敬畏、谨守。

【许多世人在这个世上之所以暂时表面上遵纪守法，仅仅是因为他们害怕受到世上法律的惩罚。如果有法律的空子，或是如果人们意识到，违反法律规则、撒谎、占便宜、玩弄规则等等不会受到立刻的、严重的惩罚，——那么，我们会看见这世上许许多多人的内心真实光景如何；看见他们以欺骗、虚伪度日；看见他们肆无忌惮地破坏规则、玩弄秩序，毫无真诚

敬畏之心。】

人在内心中，若没有在上帝面前的真诚信仰、倚靠、热忱，就也不会真正地爱人如己。在这个世界上，在一切被造的世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没有瑕疵、没有罪污的。在我们的生命与心灵深处，充满着深刻的、本质性的罪性与罪行。我们对于他人的真诚之爱，唯有是建基于我们首先的、对于上帝的爱中。这正如，在一个大家庭中，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都有着许多的缺点）之间的爱，首先是建基于他们对父母的爱。只有在我们心里对于上帝的热忱真挚之爱，才使我们有力量去真诚地饶恕别人、接纳别人。

在现代的世界，自由贸易是经济的基础与根本支撑。自由贸易的本质是整个人类进行社会化大分工、大生产；在人类社会中间，各样不同的人群各司其职、各专其长、各尽其事，从而每一个人都能够为整个社会做出最大的、最高效的贡献。

在各种不同的、五花八门的劳动生产活动中，都往往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熟能生巧；即，如果我们大批量地专门做同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人类）就能够便于发明出极其快捷甚至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模式，从而使得商品的成本变得极低、价格变得非常便宜。例如，今天的大规模汽车生产线工厂，可以平均不到一秒钟就能够生产组装完成一辆汽车，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正是在此。

在过去五百年来，近现代化工业文明，除了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诞生与爆炸性发展以外，其巨大成功的奥秘就是在于，自由贸易所导致的人类整体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分工模式。

但是，上述的人类整体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分工模式，必须依赖于良好运行的经济秩序与规则体系。否则，从长期而言，所谓自由贸易体系就是不可能的。

现代经济学中所常常忽视、甚至无视的，就是我们在本章前文中所阐述的重要前提性假设。那就是，在整个自由贸易体制系统内，所涉及到的人们、社会、各个国家，必须应当有着谨守和敬畏秩序规则法律法规体系的心灵，以及，必须应当有着爱人如己的心灵【在这些背后，就是公平、正义、公义、顺服、谦卑、敬畏与敬虔的信仰】。否则，所谓自由贸易，不但不会给人类带来福祉，反而会引发巨大的冲突甚至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有着很复杂的原因和许许多多的直接间接因素，但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德国体系与英法体系等等之间因贸易冲突而逐渐激化所导致的深刻结构性矛盾。今天，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随着中国得益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而得到飞跃性发展、但却不愿意遵守许多承诺和世界贸易规则秩序，很可能会愈演愈烈，甚至导致战争。这种冲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政治经济背景环境，在某些角度，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源自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经济理论与思想，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它在一百年前开始在俄国付诸实践，并直接导致了世上许多的专政暴政，导致了数以

千万计、甚至数以亿计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因专制统治者人为谬误国家政策而引致的大规模饥荒，以及数以百万计人被关进劳改营、集中营、监狱、强迫下放劳动、甚至被直接屠杀等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甚至直到今天，在中国、北朝鲜、以及南美等国家地区，这样的思想仍然还很有市场、很有号召力，仍然得到许多人在内心的真诚信从。

那么，社会主义的错误根源在于什么呢？为什么它这样具有迷惑性，以至于在二战以后、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鼎盛时期，曾经席卷了世界上俄罗斯、中国、东欧各国、越南、北朝鲜、柬埔寨、古巴、南美洲【当然，许多东欧等国家往往都是在苏联的武力逼迫之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国家内部、包括曾经的东德内部，都有很多真心拥护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等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呢？甚至，直到今天，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西方高等学校的文科院系中，在西方左派政治势力中，甚至在西方（包括美国）的选举政治中，仍然很有市场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究竟在于什么呢？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着真理吗？为什么？社会主义思想的致命性错误是什么？

有人说，在马克思主义与希特勒纳粹主义之间，有以下两个共同点。

第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否认、或远离对于上天、上帝、造物主的信仰；它们都推崇人自身的伟大性、光辉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劳动人民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光辉的。在纳粹主义中，日耳曼人民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光辉的。然而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上，由于它们所推崇的劳动人民或是日耳曼人民需要一个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代表、反映者，于是，它们就必然推举出一位伟人，来真实地体现它们的推崇对象。因而，它们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都聚焦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以及不可避免的专制暴政。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卡斯特罗、金日成等领袖独裁人物。在纳粹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希特勒这样的领袖独裁人物。

它们所诞生的文化土壤，都与其文化思想氛围中的无神主义影响有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德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纳粹主义思想的兴起，是德国十九世纪无神主义哲学兴起的直接结果。在十九世纪，当年在德国最优秀的大学中，盛行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种族优越论思想、无神主义思想；以至于著名哲学家尼采在著作中写道：

“上帝死了”。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德国主流哲学界，盛行着自然神主义、泛神主义思想【即，否定上帝的位格性，否定上帝是能听、能看、能言的，否定上帝的自由意志，或是把上帝与世界本身看为同等，或是把上帝看作是无知无觉、没有意志的一种超自然之理、意识流、规律、因果逻辑、等等；或者，认为——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以后就撒手不管了；除了用自然规律管理世界以外，上帝并不干预和涉入这个世界中的事务和自然现象；等等】。这些思潮【也包括德国以外、诸如法国思想界许多学者、英国学术界的一些教授，等等】，终于导致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突然流行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纳粹主义者。

正是因为他们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以及其中万有、创造世人生命的上天、上帝、造物主、那生命之主，那无限全能、全知、全在、全备，那能听、能看、能言的，那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帝，那圣经中所启示的救赎主；——所以，他们才把心灵的眼目转向地上的被造之人，把对于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当作是自己的生命的倚靠、心灵之锚、心灵的归依。

在世人的心灵中有一个空洞，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填满。然而可叹的是，世人却常常离弃和悖逆那创造天地、创造我们生命的主，那道德律法的根源与终极颁布者，那对于世人生命之道德价值的终极监察者、终极审判者。这正是世人生命与心灵深处所充满的、本质性的、普遍性的罪性。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罗马书1章

1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作使徒，奉派传 神的福音。2这福音是 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3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4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5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6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7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 神所爱，蒙召为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8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 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9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事奉的 神，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地记念你们，10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11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12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安慰。13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民族中间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14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15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17 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

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18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20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21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22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23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

24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25他们用虚谎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26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27同样地，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28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 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29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30毁谤人的、憎恨 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31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32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 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伟大劳动人民，还是纳粹主义所推崇的伟大日耳曼人民，都显明了，世人在内心深处的自以为义、自高、自傲。

我们绝不是在这里说，劳动人民就不好，或是日耳曼人民就不好。固然，在劳动人民的身上，在日耳曼人民的身上，从世事的角度而言，有着许多美好的优点、品格、道德素养、聪明、富有才干、智慧、勤劳、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而谦卑地认识到，从根本的本质层面而言，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人群、任何团体、任何阶级、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是完美至善的，都不可能是没有瑕疵与本质性罪污的；也都不应该被当作是一种心灵的偶像，供世人来顶礼膜拜。恰恰相反，在人类中间，我们彼此之间在本质上应当是平等的，应当彼此是兄弟姐妹，应当一同地把我们的心灵归向那公义圣洁、慈爱恩典的天父，应当单单地仰望和敬拜事奉他。

凡自高的，必降卑

马太福音23章

1那时，耶稣对群众和他的门徒说：2“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3所以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行和谨守，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去作。4他们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5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要作给人看：他们把经文的匣子做大了，衣服的缝子做长了；6他们喜欢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7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8然而你们不要被人称为‘拉比’，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都是弟兄。9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10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师傅，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傅，就是基督。11你们中间最大的，必作你们的仆人。12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

第二个共同点是，关于人类社会事务层面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之事，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都认为，人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不可调和的、不可原谅的矛盾；这些矛盾，只能通过一方彻底地消灭另一方，来得到解决。

在马克思主义中，这种深刻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阶级斗争的矛盾。在纳粹主义中，这种深刻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种族斗争的矛盾。因而，马克思主义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联合起来，进行本质性的、暴力性的社会政治革命，彻底地、暴力性地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正如毛泽东先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画画绣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而纳粹主义的种族灭绝行动以及专制暴政就更加令人震惊、举世皆知、臭名昭著，我们就不在此赘言。

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在世上其它思想体系、伦理系统或是宗教信仰体系（例如伊斯兰教等）中，我们也常会见到，——这种推崇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消灭敌人、打倒敌人的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文化，就像是在中国共产党中有一段著名的话，说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上述思想文化的背后，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特征，即，在世上的许多道德伦理体系或是宗教信仰体系中，往往是“因行为称义”、而不是“因信称义”的。

所谓“因行为称义”是指，这样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的道德价值，从终

极性、根本性而言，是通过他的外在的、言语行为等等来决定的。

所谓“因信称义”是指，这样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的道德价值，从终极性、根本性而言，不是因他外在的言语行为而决定的，而是因他在心灵与灵魂深处、对于上帝之救赎恩典的信靠，而决定的。

因行为称义与因信称义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是在于，人究竟是自以为义，还是以上帝（以及他的救赎恩典）为义。如果人自以为义，即，人自己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自己认为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能力、道德、品格，而得到正义，甚至成为正义的化身，——那么，在这样人的内心深处，就必然是骄傲自高的。当人信奉因行为称义的思想文化、伦理体系的时候，人就会在行为上互相攀比、比较，并进而俾倪他人、藐视他人、甚至憎恨他人、互相争斗不息。

相比之下，因信称义的思想，不是以人自己的义为中心，而是恰恰相反，从谦卑承认和悔改人自己的罪性为基点，寻求和倚靠上帝的救赎恩典，完全全地信靠上帝的救赎、饶恕与赦免。

罗马书3章

9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10正如经上所说：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11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12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13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他们嘴里有虺蛇的毒，

14满口是咒骂和恶毒；

15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

16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

17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

18他们的眼中也不怕 神。”

19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 神的审判之下。20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 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

21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話可以證明： 神的義在律法之外已經顯明出來，22就是 神的義，因着信耶穌基督，毫無區別地臨到所有信的人。23因為人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24但他们却因着 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穌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25 神設立了耶穌為贖罪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顯明 神的義；因為 神用忍耐的心寬容了人從前所犯的罪，26好在現今顯明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又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27这样，有甚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甚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28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29难道 神只是犹太人的 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 神。30 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31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

請注意，因信稱義的教義思想體系並不是說，我們的行為就不重要。恰恰相反，我們外在的言語行為，正是我們內在真實信心的寫照與表現。然而從根本上、終極角度說，我們的義並不是出于我們自己，更不是由我們的外在行為所決定和體現【否則人就在心中自以為義，自高自傲，倜儻、藐

视他人，甚至憎恨他人、争斗不息】。我们的义，唯有是建基于上帝自己所赐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为我们所成就的、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之人的永生恩典。

雅各书2章

14我的弟兄们，人若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甚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15如果有弟兄或姊妹缺衣少食，16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那有甚么用处呢？17照样，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就是死的。

18也许有人要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请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19你信 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就连鬼魔也信，却是战兢。20愚昧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21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不是因行为称义吗？22你看，他的信心与行为是一致的，信心就因着行为得到完全了；23这正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也被称为 神的朋友。24可见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仅是因着信心。25照样，妓女喇合接待了探子，又从另一条路把他们送走，不也是因行为称义吗？26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照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正是由于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因信称义的信仰，我们才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义，不是在于我们自己，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完完全全地在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完全全地是出于他的圣洁无罪，出于他为我们而死、承担了我们所本应承受的罪债与刑罚、所成就的赦罪之恩典。因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对我们的饶恕，所以，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才得到赦免，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他和好。因此，我们在任何世人面前，就无以自夸，更无法自以为义。因而，我们才深刻地知道，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应当以饶恕的心，去对待他人。

马太福音18章

21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吗？”22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23因此，天国好象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帐，24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六千万银币的人来。25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26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27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28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了他一百个银币的仆人，就抓住他，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29那和他一同作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30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31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事情。32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

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33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象我怜悯你一样吗？’34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35如果你们各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的两点共同点的比较中，我们能够看见，其根本性的、本质性的症结就是在于，人在心灵与灵魂深处，背离、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上天、上帝、造物主，背离了那道德法则的终极基准与颁布者、那道德律法的终极审判者；因而，人在内心中自以为义；从而，人在面对世上他人的时候，——（1）或是以之为自己心灵生命的归依【即，对于领袖、对于权力的无限个人崇拜】，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独裁；（2）或是以之为自己的敌人、死敌，甚至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地对待敌人，直至彻底消灭对方，而心中没有本质性的谦卑、饶恕与恩慈的态度。

请注意，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就应当逆来顺受、与世无争、消极遁世。恰恰相反，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倚靠那天地之主、我们生命救主的人，应当以热忱而勤勉的人生态度，在这个世上努力地生活、去做好一切当作之事，而不应当慵慵懒怠、更不应当唯唯诺诺、胆小懦弱。我们应当努力地秉公行义，寻求正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

我们应当憎恨罪，但是要爱罪人。我们所争战的对象，不是世人，而是罪。在这个世上，我们所爱的对象，不应当是罪，而是罪人。

以弗所书6章

10最后，你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刚强。11要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12因为我们的争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13所以要穿起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在这邪恶的时代里可以抵挡得住，并且在作完了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稳。14因此，你们要站稳，用真理当带子束腰，披上公义的胸甲，15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了，当作鞋子，穿在脚上，16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17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 神的道，18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随时在圣灵里祈祷，并且要在这事上恒久警醒，为众圣徒祈求。

马太福音5章

43“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47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甚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48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现在，让我们继续思考，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与精髓，及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是一种建基于无神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以及人类共同享有和均分财富的乌托邦社会思想。【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以地上的财富和国度为世人生命与心灵的终极归依；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讨论、阐述上帝之国与地上之国之间的异同与关系。】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子集，所强调的是：——社会经济财产分配原则，倾向于公有制、计划经济、平均分配、劫富济贫等等特征。

我们应当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思想并非是完全彻底错误的。其所重视的关于社会财产尽量平均分配、避免贫富分化过于严重、等等，是有其道理与价值的。事实上，西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就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极其强调了避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福利政策等。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西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中，直到今天，一直有着强烈的造福于大众的主旨和内涵，这并非是受到什么马克思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是受到自古以来基督教信仰思想的巨大推动和深刻影响。

公道地说，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避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的内容，并非是错误的。

但是，社会主义思想与体制的致命错误在于，（1）过于强调集体主义、否定人的生命独特价值与人的生命自由；（2）思想控制与言论控制；（3）专制主义思想，邪恶与欺骗；（4）社会经济发展上的乌托邦主义，以及国家经济道路的荒谬性；（5）无神主义内核；否定公平竞争；平均主义、大锅饭；丑恶的社会管理机制与控制；思想层面、理念层面的空洞、荒芜、荒谬、谎言；统治者的自私、腐败、欺谎。

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在一个经济体制中，通过经济资本的置配、自由流动、分配管理、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等等机制，促进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与高效化，从而为人类社会整体创造更大的物质性财富。

相对而言，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大一些范畴的政治经济词汇，因为它不仅包含了经济运作思想与原则，也包含了政治思想理念、社会思想理念体系等。在社会主义框架下，由于其对于集体主义的强调、对于个体主义的践踏和压制，因此，其政治思想理念与社会思想体系往往是专制独裁的，因

而往往是邪恶、欺骗的；并且，它会千方百计地控制人们的思想，消灭个体的生命与思想自由，试图把所有人都变成国家机器上的某一个无知无觉的零件与螺丝钉。所以，社会主义往往与专制主义有着强烈的姻亲关系。

资本主义则往往具有民主主义的色彩，尽管两者之间并不一定严格划等号。资本主义往往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术语，仅仅包含经济运作范畴的含义，而不像社会主义这个术语那样，既包含了经济、又包含了政治性意涵。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由于其对于自由竞争、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公开竞争的鼓励，因此，资本主义往往最终会强烈地倾向于民主主义制度，倾向于社会整体的公开化、自由化、民主化、去中心化、平民化。

然而请注意，正如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本身一样，资本主义本身并不一定具有道德好坏、善恶的意涵。

正如本书所开宗明义地指出的，民主制度本身并不一定适用于任何人民。譬如，在圣经创世纪中所记述的所多玛、俄摩拉，虽然看似是由主流民意所驱动的社会结构，但是，他们所行的事情却是恶事；他们所作的，在耶和華永生之神的眼中是罪大恶极。严格地说，从长远、长期的稳定状态而言【而不是从短暂的、短期不稳定的状态来看】，民主制度是圣洁自由之民所进行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换言之，如果人民、百姓不是自由而

圣洁的，如果人民中的大多数不愿意寻求真相、渴望真理，没有行公义、好怜悯的心灵，那么，在这样的人民中，所谓民主制度并不能长期地存在；在这样的人民社会中，即使短暂地出现民主政治制度形式，也会是昙花一现、很快会陷入无政府主义混乱喧嚣状态、并很快会因此被专制主义野心家政治集团和政治势力革命、篡权、推翻。这就是十九世纪法国革命中混乱喧嚣的历史，也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混乱喧嚣的历史。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鼓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公平竞争、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机制和经济制度，与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一样，严格地说，从长远、长期的稳定状态而言【而不是从短暂的、短期不稳定的状态来看】，也应当是建基于自由圣洁之民所组成的社会体系之上。

这是因为，如果，在一个国家社会中，人民大多数成员在社会事务上、公共世事上都没有正直之心，不愿意行公义、好怜悯，——那么，若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利用、欺压、坑蒙拐骗、尔虞我诈、贫富严重不均。在这样的国家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不能长久而稳定地运行；饥饿之民就会常常起来造反、打家劫舍，或是像马克思主义所煽动的那样，——政治集团利用所谓无产阶级来推翻资产阶级。

这正如，马克思在著名的《资本论》中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的这句话，虽然是夸张的、偏颇的、别有用心的；但是，却也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

在这里，我们且不说马克思本人的不道德的私生活，也不说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所推崇的狂风暴雨般暴力革命中的不义、不公、欺谎、罪恶、甚至邪恶，及其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所引致的数以亿计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与苦难。而是，我们在这里仅仅指出，作为一个在整整一个多世纪中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暴力征服与谎言欺骗的形式达到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思想意义上的影响性】了人类几乎四分之一人口的思想家，马克思【以及他所代表的、启发的无数后世思想家、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的致命性漏洞和谬误。

的确，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缺陷与弊病；但是，他却无视、甚至故意忽视了，从十七世纪以来，一直到他所生活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巨大益处和福祉。

马克思的思想既是浅薄的【因为它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缺陷与弊病的真正病根与医治之法】，也是偏颇的【因为它忽视、无视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带来的巨大益处；更重要的是，它没有看到，也并不深刻理解，这种巨大益处是来自于何处以及为什么，其本质原因和机理究竟是在于什么。换言之，它并不真正理解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公平竞争体制的本质精髓与益处所在】。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性谬误，也正是它邪恶所在之处，就是在于，它完全地误解了、谬解了、错待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在于什么。

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像是一个庸医，看见战场上一个战士的胳膊上中了箭伤，箭杆露在皮肤外面，箭头插在肉里面；于是，这个庸医拿出剪刀，剪断箭杆，并用一个锤子在那受伤的胳膊上狠狠地砸下去，让箭头在肌肉里面陷得更深；然后，庸医自豪地大声宣布说，这个人的箭伤被治好了，因为露在皮肤外面的箭杆已经看不见了。

马克思主义思想正确地看见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彻底地扭曲了、玷污了、糟蹋了文明的真正价值，彻底地毁坏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个体生命价值本身是没有终极意义的；人的个体生命和价值，唯有能够在集体中体现、实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专制主义、国家集权主义、独裁主义、甚至纳粹主义异曲同工的本质原因】。

马克思主义决绝地宣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救赎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它公然地、厚颜无耻地宣告，无神主义思想是伟大的、光辉的。它欺谎地、诡诈地对世人说，这世上并没有什么救赎主、没有神仙皇帝，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然而在政治现实主张中，它却剥夺人的自由与生命的高贵价值，把人置于思想奴役、身体奴役、经济奴役的铁链之下。

请注意，我们并没有在这里说，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是不好的。事实上，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重要优秀道德品质之一。但是，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建基于公平、正义、平等、公义、良善的基础之上，必须建基于公义圣洁的道德法则基础之上，必须建基于我们对于那无限全能、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天、上帝、造物主的信仰的基础之上。

当人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上天、造物主、上帝的时候，人就会迷失在世事的喧嚣之中，就会看不清人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在于何处，看不见人的心灵与灵魂的隽永价值和意义。

当人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永生之神的时候，世人良心中的道德法则也就失去了隽永的价值和意义，真理就成为了强权的丫鬟，政权就成为了枪杆子的机器，国家就在本质上与黑社会无异。在死亡面前，任何以属世之事为根基和归依的道德说教，都是苍白的，甚至是滑稽的。

只有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全能与无限智慧，看见他的公义圣洁与恩典慈爱，我们才能够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是在于什么。

我们都不仅是被上帝所造的，而且是被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因此，在人的里面，有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的能力，有心灵和灵魂，有思想、智慧、意识、理性、情感、爱、等等的美好能力。

正是因此，人的生命与自由才是高贵的。

人的生命与自由是珍贵的，因为那本是能够指向永远的、圣洁属神的生命。

在这个被罪所充满的世界上，在世人生命的里面，都普遍性地、本质性地遍满了罪。在每一个世人的心中，都是背离神、不愿意寻求公义的；都是自以为义的，是自高而自傲的；都是在为了属世之利而活着，以属世之事为自己生命与心灵的归依。但是，那内心谦卑、看见己罪、承认己罪、并真诚愿意悔改己罪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马太福音5章

1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2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3“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4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6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7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8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 神。

9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10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11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12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

在一个国家社会中，如果人们都是敬虔而真诚地信靠上帝，倚靠他的救赎与恩典，饥渴慕义，勤勉而公义圣洁地生活与工作，——那么，这样的国家中就根本不会出现马克思主义眼中所看见的那些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缺陷。

然而，在这个地上的世界是复杂的；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世事中，常常看见好坏参杂的因素、泥沙俱下的局面。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也是如此。

一方面，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信仰在思想与文化上，对于西方各个国家产生的深刻影响，早已经在许许多多历史记忆与文化土壤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整个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的蓬勃发展，包含着深刻广泛的博爱之心，包含着对于社会全体大众、乃至全人类的巨大福祉。任何看不见这一点、或是故意无视、忽视、蔑视、否认这一点的——人、思想、主义，就像是马克思主义一样，——不但是浅薄的、虚伪的、欺谎的、自私的，而且是罪恶的、邪恶的。

另一方面，虽然，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的蓬勃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性利益与许多精神文化方面的福祉，但是，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些近现代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乃至现代民主主义制度，并非是终极的真理，并非是我们心灵的归依和倚靠。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无论是近现代科学技术、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或是自由贸易经济，当被应用于一个没有信仰、没有敬虔、没有敬畏的社会大众文化土壤中的时候，那么，它们所带来的，就很可能不是福祉，而是灾难，甚至是巨大的灾祸。

在满清末年、民国初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曾经喊出“德先生”【即民主】“赛先生”【即科学】的口号。他们以为，用民主和科学，就能拯救中国脱离愚昧、落后、黑暗、败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局面。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民主与科学本身，并不能向我们指明，人生命与自由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它们本身，也不能带给我们敬虔的信仰、良善的道德、恩慈的心灵、公义的信念。固然，现代民主主义的诞生，正如现代科学的起源一样【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书】，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以及相应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等有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它们本身却不能代替：——那真正的、诚实的、真挚热忱的，对于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上帝的敬拜与信仰。

单从经济制度角度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由贸易制度是好的，但它们必须应当被置于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则、体系之下。

这样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则、体系，应当是保障和重视人的生命与自由的。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应当是鼓励公平竞争、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的。但同时，它不仅是应当“行公义”的，而且更应当是“好怜悯”的；应当是注重避免社会贫富严重分化，避免贫穷百姓得不到照顾。

当年，在十六世纪下半叶、以及十七世纪，那些伟大的现代科学开启者们、基督徒思想家们，正是认识到了科学【即他们当时所说的自然哲学，或第二哲学】的内在局限性【即，科学本身，应当是人以谦卑的心态对于自然规律与现象本身的、基于客观事实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而不应当是：——（1）人凭着自己的骄傲自义之心所进行的主观臆想、（2）或是

牵强附会的关于人生意义与自然现象之间关系的生搬硬套、生拉硬扯、人为地进行瞎联系，（3）或是占卜性质、“万物有灵”性质的臆测；——就像是占星术、炼金术、星座性格属相、或是亚里斯多德的主观臆想之宇宙论，或是中国的风水、算卦等等。——因为，关于人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是在于上帝自己的话语、启示和旨意之中，是在于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之救赎恩典之中，是在于上帝所放置在世人的良知之中的圣洁公义的道德律法之中】，从而深刻地批驳了罗马天主教廷所秉持的、与圣经本身没有关系的、古希腊罗马的亚里斯多德与托勒密等人的主观臆想、玄学主义等等试图在自然世界中赋予臆测性、占卜性、万物有灵涵义【就像占星术、炼金术、星座属相、或是中国的风水与算卦那样】之系列思想的根深蒂固的谬误，进而导致了现代科学思想体系与方法论的诞生和爆炸性发展。【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书。】

简言之，现代科学之开启的重要原因，正是在于那些现代科学开启者们、基督徒思想家们认识到了科学本身的内在局限性，才纠正了从前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根本性错误与方向性偏差，从而导致了现代科学思想体系与方法论的起源、诞生与成功发展。这个重要原因，正是来自于、建基于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中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正是由于基督教信仰的巨大而深刻广泛的影响，才使许许多多的世人认识到，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意义，应当到哪里去寻求；同时，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和研究自然世界，应当到自然世界中去寻找什么，——更重要的是，不应当到自然世界中去寻找什么。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导致了现代科学体系的诞生、成功与发展。

与此类似地，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以及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由贸易制度，它们的诞生、成功与发展，也是如此。它们的成功原因，正是在于它们首先认识到了它们自己的局限之处的本质在于什么。

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成功，正是因为它在制度体系化设计中，不是假设人是有罪的、无辜的，而是恰恰相反，它清醒地看到，在世人的心中，普遍地存在着罪性。因而，它在体系设计与规划中，处处尽量实现和体现权力分散化、制衡化、去中心化的原则，同时尽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尽量保障政府行政部门的有效性、有力性。

请注意，这并不与我们在本书的主旨中所反复申明的内容——“民主是圣洁自由之民在这个世界上进行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相矛盾。

一方面，一个成功的民主主义制度，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人心中普遍的罪性，并从而在制度体系设计上不好高骛远、不好大喜功、而是从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地进行权力制衡的规则化设计。

另一方面，一个成功的民主主义制度，必须建基于人民诚实的心态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体系中，虽然，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被罪所羁绊，但是，在人民大多数成员心中，必须愿意寻求真理和公义，必须愿意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必须有饥渴慕义的心，有真诚与敬畏的情感。

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公平竞争制度，也是同样如此。

一方面，它们应当在公平正义的规则秩序体系的约束与制衡框架之下。另一方面，它们应当建基于人民普遍诚实的心态基础之上。

一方面，它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世人心中所普遍存在的、本质性的罪【所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采取规则秩序体系与制衡机制框架】。另一方面，它们应当认识到，人生命与自由的高贵价值和意义【所以，尊

重和推崇人思想与生命的珍贵价值和自由】。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思想体系的致命性症结根源，就是在于，它们没有看到上述两个方面的精髓本质，因而望文生义地、彻底地误解了、扭曲了、歪曲了现代民主主义政治、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竞争经济制度。

更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思想体系的致命性症结根源，就是在于，它们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它们的出发点，与现代民主主义政治、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竞争经济制度的出发点，是完全相反的。在上述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现代民主等政治经济制度完全南辕北辙。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假设人性是无罪的、无辜的，劳动人民是伟大光荣的；它们看见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的不完美，于是提出，彻底砸烂那些制度，重新建立一种建基于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所谓完美制度；然而，在这样的所谓完美制度中，却既不尊重人的生命与自由的高贵价值意义，也不明白，人生命与自由的真正珍贵意义，究竟来自何处。

上文所述，现代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平等竞争的经济制度之中，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它们应当在公平正义

的规则秩序体系的约束与制衡框架之下（换言之，它们清醒地认识到人心灵中普遍存在的罪性）；另一方面，它们应当建基于人民普遍诚实、愿意寻求公义的心态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生命与自由所本来应有的高贵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这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都与基督教信仰有着深刻的关系，是直接地来自于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

这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应当认识到，在世人的生命与心灵深处所普遍存在的本质性的罪；也应当认识到，人生命与心灵本所应有的高贵价值和隽永意义。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是创造我们的生命之主。我们都是上帝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因此，人的生命在这个宇宙天地之中，是最高贵的、最奇妙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的生命本所应有的圣洁与高贵价值意义，所以，我们才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世人常常说谎、占便宜、自私自利、冷漠无情、没有信仰与敬虔人生态度、等等，从本质而言，是多么地污秽鄙陋、罪恶不堪。

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良心之中都无可置疑地知道自己在本质上的罪污、撒谎、不义，所以我们才珍视那来自于上帝所启示的救赎恩典、圣洁信仰，更在内心深处为罪而忧伤痛悔、饥渴慕义，真心真意地愿意悔改己罪、完全归向我们的生命之主、救赎之主，得着那真正圣洁没有瑕疵的、能够直到永远的属神生命。

因此，我们在这里清晰地指出，现代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平等竞争的经济制度，正如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样，——它们之所以诞生，正是由于直接地受到了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的深刻影响而导致的。它们是来自于上帝所启示的、那真实的、指出

世人生命之罪、并赐下救赎恩典的信仰。

然而，我们却不应当把它们当作是我们思想的偶像，而是恰恰相反，应当深刻地、清醒地认识到，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和隽永的意义。它们绝不应当是我们的心灵所期盼、归依和倚靠的终极真理。它们绝不应当是我们所信靠的对象。

我们的生命、心灵与灵魂所期盼、归依、倚靠的对象，应当是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就是那全能、全知、全在、全备的、至善至美的、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帝。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生命之主；只有在他那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在他那里，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良善与公义。他是我们的永生之神，是那属天国度的君王，是把饶恕与赦罪恩典赐给我们的伟大救赎者。他就是圣经里所启示的那位伟大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永生真神。圣经是他的完全而全备的话语、启示和旨意。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谦卑诚实地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真挚地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恩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是属乎天国的百姓，必将进入那无限幸福美好的永生国度之中。

自由贸易与社会分工

自由贸易经济的本质，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精诚协作、共同生产、共同致富。自由贸易经济的成功正是在于，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化的大分工、大生产。在今天的经济产业链中，有数以亿计的、甚至更多的不同产品、零件、食品、用具、硬件、软件、服务。在整个人类社会中，一般性而言，每一个人都勤勉地工作，并专注于各自擅长的事项，从而在国家社会整体上，乃至在整个人类世界的国际合作中间，人们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精细分工、深度协作。

这种大规模的、大分工的社会机制所必需的，正是公平、正义、平等、公义的政治制度、秩序、法律、规则体系框架。固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完美的，也没有什么政治制度、秩序、法律、规则体系框架是完美的，但是，一般性而言，就主流性质来说，整个国家社会、乃至整个国际秩序，应当是基本上公平正义的，是互助互利的；一般性而言，人们应当基本上彼此诚信、信任、以善相待；人们应当以宽容良善的心、而不是仇恨的心态看待彼此；——否则，从长期性、根本性来说，自由贸易制度就不会真的成功。

财富的定义

在人类经济体制中，如果人们在心底以此世的物质性财富为心灵的终极性归依，那么，人们就往往会为自己积聚财物、金钱、房屋等等；而不愿意走出去与人交换商品、或是消费商品、促进商品经济流通。从而，繁荣发达的自由贸易经济就往往不会发生。如果人们的心灵沉浸于积聚此世的物质性财富与黄金等等，如果人们在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中自满自足、裹足不前，以之为自己的心灵的归依、生命的归宿，而不思进取，那么，除非迫不得已，人们就往往不会愿意主动地去与他人进行分工合作，更不会想到去与异国他乡的人进行大规模产业协作。

因而，亚当斯密所开创的现代经济理论所作出的划时代贡献，正是让世人看到，财富的定义，不是在于有形的、物质性的东西，而是在于生产物质商品的能力、生产率、知识技巧。换言之，财富不仅是一件关乎身体的事情，更是一件关乎心灵的事情。

正如本书上文所言，现代经济制度本身并不应当被我们看作是终极真理，因为它是有所局限的。如果说，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它对人类社会有益，那么，它之所以有益，其益处正是因为它来自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并深刻地受到了基督教信仰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某些正面性的、积极性的影响。正是因此，现代经济制度虽然是讲述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但是，从一般性、整体性、主流性而言，它迄今为止并没有把西方世界拖入自私自利的彻底混战局面之中，而是相反，通过国家社会的大规模协作，使数量巨大的世人脱离贫困之境。

然而如果有一天，当人们忘记了上述这一点的时候，当人们离弃了敬虔真挚的信仰的时候，当人们心中的罪愈来愈泛滥，而不是谦卑真诚地悔改己罪、寻求公义、行公义、好怜悯，——那么，自由贸易等等现代经济制度，就会显明其深刻内在局限性，显明人心中之罪的丑恶，甚至给许多国家地区带来更深的冲突、混战与灾祸。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不是那地上的财宝、那些必朽坏的东西；而是我们生命、心灵、灵魂中的那属天的品质，是我们在天上的基业与幸福，是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悦纳与恩赐。

+++++

+++++

+++++

+++++

+++++

+++++

+++++

+++++

+++++

【引述圣经 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语】

马太福音6章

19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侵蚀，也有贼挖洞来偷。20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锈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21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22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都明亮；23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都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24一个人不能服事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事 神，又

服事金钱。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19-24节

除了虚伪之外，另一个常常在人的灵魂中得逞的撒旦试探、诡计是——贪恋世界。没有什么其它事情，比“虚伪”和“贪恋世界”这两件事情，更能够经常地掩藏在表面敬虔信仰的面纱之下。所以，基督在上文中警告了我们关于信仰虚伪之人的事情以后，在这里继续警告我们，不可贪恋世界。我们必须不可像那些信仰虚伪之人一样；他们的根本性错误，其实就是：——他们把这个世界当作是他们的奖赏；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世人的称赞，就是属世的利益和好处。在我们选择财富、目标、主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这里的这两个罪——虚伪的信仰，以及贪恋世界的心。

I。我们应当以什么为我们真正的财富。一个人，总会在生命中、在心底深处，把一些东西当作是他的财富、他的份、他的倚靠。他会尽力地去积累

这些财富，并把这些财富积累当作是为未来所需而进行的预备。传道书2章3节：“我心里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在我们的灵魂中，总会把一些事情当作是最好的事情；总会把那些事情当作是我们的喜乐、满足和倚靠。基督在这里所说的话，并不是要剥夺我们的财富，而是要指教我们，应当选择什么为我们真正的财富。

1. 这里警告我们，不要把那些可见的、暂时的东西，当作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不要把那些东西，当作是我们幸福的所在。不要为你们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基督的门徒们已经抛弃所有、来跟随他；他们应当一直持守着这样的心态。财宝，是那些丰富的、在我们眼中极其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必须不能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就是说，——（1）我们必须不能把这些东西当成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最有价值的东西、最有用的东西：——我们不能称这些东西为“荣耀”——就像拉班的儿子们那样。而是，我们要把它们看成是没有荣耀的东西。那真正的荣耀，远远超乎它们之上。（2）我们必须不能贪图这些东西的丰富，不能无止境地、没完没了地搜刮这些东西、加添这些东西。一个人如果把那些东西当成是心里的财宝，就会这样贪婪地去做。（3）我们必须不能信靠、倚靠这些东西，把它们当成是为我们的未来遮风挡雨、给我们带来安慰与安全感的東西。我们必须不能对黄金说：——你是我的盼望，是我的心系所在。（4）我们必须不能在这些东西中得到满足；必须不能把它们当成是我们的渴望与祈盼。我们应当安于简朴，但不以这个世界为我们的分。这些东西不能是我们的慰藉（路加福音6章24节），不能是我们的喜笑和饱足（路加福音6章25节）。我们真正需要积攒的，不是这个世界中的繁华与财富，而是在另一

个世界中的东西。在我们的面前，面临着抉择；我们努力积攒的东西，就是我们看为至宝的东西。我们应当智慧地作出选择；因为无论你自己选择了什么样的东西，你自己也就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知道、明白、思想，在我们的里面是何等大，我们的生命是何等长久，那么，我们就会看见，在地上积攒财宝是一件多么愚妄的事情。

2. 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应当在地上积攒财宝：——因为这些都是将要丢失和朽坏的东西。（1）这些地上的财宝，会从里面败坏。世上的财宝总是这样，被虫子咬，从里面锈坏。那些我们以为储藏得最稳妥的属世财宝，最后都会变得破败不堪。路加福音12章16、17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传道书5章10-12节：“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雅各书5章2、3节：“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注意——世上的财物，在它们之中，有一个朽坏与败坏的律——它们总是逐渐枯萎凋残。

（2）这地上的财宝，也会面临暴力的抢夺而失去。贼进来，会把财宝偷走、抢走。强盗、小偷的眼睛，总是会盯着那些积攒财宝的房屋和家庭；在这世上的任何属世的财宝之中，没有什么真正能够安全稳妥的。我不应当把我的信心和倚靠放在属世的财宝上，即使它们看起来华丽炫目；不

论这世上的财宝、虚荣、繁华，似乎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少属世的暂时好处，我都应当轻看这一切——因为它们都是必将朽坏、轻易失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上那些属世的、轻易会失去的、随时被抢夺的东西，当成是我们的财宝，那么，我们就真是太愚妄了。

3. 我们应当把那些永恒的、属天的、不可见的东西，当成是我们的真正财宝，当成是我们最美好的东西，当成是我们的幸福、喜乐与荣耀。你们要在天上积攒财宝。（1）是的，在天上的的确确有财宝，是比地上的财宝更真实、更美好、更久远的。我们在天上的拥有，才是我们真正的财宝、富足、荣耀、与喜乐。我们的财宝，在神的右手中；神使我们成为圣洁与完美，也使我们的财宝成为圣洁与完美。（2）只有真正智慧的人，才知道应当在天上积攒财宝；勤勉地为天上的财宝而努力地劳作；我们应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永生的确据，并把我们的幸福完全地倚靠在他的身上，仰望他的名；用圣洁的心，轻看这世上的一切——因为，这世上的一切，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基督美好的救恩相比。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在天上有我们永远的幸福和盼望；并且，以那里的一切为我们的满足；不以这世上的任何事物为我们的满足和慰藉。如果我们是以那天上的东西为我们的财宝，并且勤勉地为我们自己积攒那天上的财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信靠神，相信他会安全稳妥地保守着我们的财宝。我们的一切心思、意念、渴望、情感、努力、勤勉，都应当是以那里为目标。我们不要被世界的钱财所缠累；那些东西只会欺骗我们、压垮我们；而是应当积攒那真正稳妥的财富。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每一个真诚信从基督之人，在天上都有丰富的财宝；这是关乎我们的未来的永久归宿。（3）这是对我们的极大鼓励——我们在天上的财宝，是安全的。只有我们天上的财宝才是安全的。在那里，没有虫子咬；财宝不会朽坏；我们不会被欺诈；也没有人来偷盗或

是抢夺。这是那天上的幸福，是超越时间的限制的；是不能朽坏的基业。

4. 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因此，我们对财宝的抉择，必须是正确而智慧的。我们的心意，生命的意义，都是取决于此的——或是属世的，或是属灵的；或是属地的，或是属天的。心总是跟随着财宝，正如向日葵总是跟随着太阳。财宝，是我们的价值和眼目的归宿，是我们的恋慕和情感的归宿（歌罗西书3章2节），是我们的渴盼与追求的归宿，是我们的目的与意图的方向，是我们的心所属的地方。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关切和顾虑也在哪里——是我们急切恳求、期望、相信、喜悦、朝思暮想的；是我们心里牵挂、割舍不下、得着慰藉、专注凝思、常常挂念的事情。箴言18章10、11节：“耶 和 华 的 名 ， 是 坚 固 台 。 义 人 奔 入 ， 便 得 安 稳 。 富 足 人 的 财 物 ， 是 他 的 坚 城 ， 在 他 心 想 ， 犹 如 高 墙”。诗篇119篇111节：“我 以 你 的 法 度 为 永 远 的 产 业 。 因 这 是 我 心 中 所 喜 爱 的 。” 箴言23章26节：“我 儿 ， 要 将 你 的 心 归 我 。 你 的 眼 目 ， 也 要 喜 悦 我 的 道 路 。” 我们的心，应当是属于神的；我们的财宝，必须是在神那里；这样，我们的灵魂才能归向他。

这里所教导的关于财宝的事情，是与前面的警告教诲紧密相连的。我们的信仰，必须是真正的、真诚的；必须是寻求真神的，而不是寻求人的赞誉以及属世的好处。我们的财宝，就是施舍奉献、祷告、禁食，以及这些事情给我们所带来的赏赐。如果我们做奉献、祷告、禁食这些事情，仅仅是

为了人的赞誉和称许，那么，我们就是在积攒地上的财宝，因为我们只看重这个世界中的利益与好处。这样做的人是愚妄的，因为，我们所贪图的别人的赞誉，就像是那些地上的财宝，很快就会朽坏，被虫子咬，（传道书10章1节），被别人偷走、夺去。诋毁和谤渎就是像小偷强盗一样，偷走我们为自己积攒的财宝——我们在别人眼里的名誉地位。若我们把心放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的努力就终将是徒劳的。虚伪的人，在天上没有任何财宝（以赛亚书58章3节：“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睬呢？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作苦工”）；当他们的灵魂被收去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资财能够带走，没有任何价值能够存到永远。（约伯记27章8节：“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但是，如果我们以真诚而正直的心，来奉献、祷告、禁食，并仰望神、渴盼他的悦纳，那么，我们就是在天上积攒财宝；在神那里，有纪念册记录我们的一切（玛拉基书3章16节）；而且，将要有我们的赏赐。当我们来到死亡与坟墓的另外一面的时候，我们就必会得到安慰。虚伪之人的分，是在这个世界上（耶利米书17章13节）；然而属神的信实百姓，他们的名要记录在天上（路加福音10章20节）。神对我们的悦纳，就是我们在天上的财宝；这财宝是不会朽坏、不会被偷抢的。我们的财宝如果是积攒在神那里，我们的心如果是系在神的身上，那么，还有什么其它地方能更好呢？我们必将在神那里永远站立。

II。在我们的信仰中，必须警惕虚伪之罪，以及贪恋世界之罪。这里有两种人的眼睛，一种是好的，一种是不好的（22、23节）。眼睛是身体的灯——因为眼睛寻找、发现对象，并引领着身体的行动。如果没有身体的

灯，那么，外面世界的光就对我们没什么用处。箴言15章30节：眼 有 光
使 心 喜 乐 。 好 信 息 使 骨 滋 润 。

1. 你 的 眼 睛 若 了 亮 ， 全 身 就 光 明 。 如果我们的眼目看重的，
是良善之事，那么，我们的心就趋向于那些事情，我们的生命，就会在基
督里有完全的光、确据和真诚；我们就会有良善的行为，如同光一样照在
人前；我们的信仰在天父的面前，就是纯洁、没有玷污的。但是，如果心
里面是罪恶、贪婪、苦毒、嫉妒、怨恨——这些东西常被描述为罪恶的眼
目（马太福音20章15节）（马可福音7章22节）（箴言7章22节）——那
么，我们的身体和生命就会是黑暗而昏花不明的；我们的言语行为中就会
充满罪恶。以赛亚书32章6-8节：“因 为 愚 顽 人 ， 必 说 愚 顽 话 ，
心 里 想 作 罪 孽 ， 惯 行 褻 渎 的 事 ， 说 错 谬 的 话 ， 攻 击
耶 和 华 ， 使 饥 饿 的 人 ， 无 食 可 吃 ， 使 口 渴 的 人 ， 无
水 可 喝 。 吝 嗇 人 所 用 的 法 子 是 恶 的 。 他 图 谋 恶 计 ，
用 谎 言 毁 灭 谦 卑 人 。 穷 乏 人 讲 公 理 的 时 候 ， 他 也 是
这 样 行 。 高 明 人 却 谋 高 明 事 ， 在 高 明 事 上 ， 也 必 永
存”。 如果我们里头的光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地大呢——如果，
在我们里面的、本应该引领我们的那些良知、情感完全败坏了、丧失了，
那么，我们的生命该是多么黑暗而可怕！

2. 我们的眼睛，对应的也是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和明白——我们的认知、判
断、引导，等等。如果我们的眼睛了亮，如果我们有真诚而正确的判断，

如果我们能够明辨是非——尤其是能够辩明，我们真正的财宝应该是在哪里——那么，我们的情感、行动就会得到正确的引领；我们就会有完全的、恩典的、安慰的光。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目是邪恶的、败坏的、被世俗所羁绊的，那么，我们的世界观就会是错误的、昏花不明的；我们的心与生命就会充满了黑暗；我们的整个生命就会是败坏的。诗篇82篇5节：“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人的灵本应是为神燃亮的蜡烛；但是，生命如果昏花了，将是多么可怕。以赛亚书5章20节：“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

3. 我们的眼目，也对应了我们人生的目的与目标。我们用眼睛来为自己设定当前目标、寻找前进方向；并专注地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我们的眼目，引领着我们在信仰中所作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追求的，总是我们眼睛所瞩目的什么东西或是事情。如果我们的眼睛是单纯而明亮的，那么，我们就能诚实地设定正确的目标，并正确地向着那个目标努力——我们会纯洁地、单单地仰望神的荣耀，寻求神的名、神的恩惠，在一切事情上都单单地倚靠他。这样，我们的眼目就是纯洁的。保罗说，我活着，是为基督而活。这样，我们的整个身体就是在完全的光中；我们所有的言语行为就会充满了恩典，讨神的喜悦，也令我们自己得到安慰。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目是邪恶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单单注目于神的荣耀，我们也不会得到神的悦纳；我们会看重人的称许与掌声——甚至，即使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当我们表现得想要荣耀神、寻求基督之事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却也仍然是寻求我们自己的荣耀和属世利益。我们的整个生命就会是败坏的、不安稳的；我们的根基就摇曳不定。在我们的心里，就会充满了

迷乱和罪恶的心思意念。如果你里面的光昏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地大呢。在你的生命中，会有根本性的错误；你所作的一切，都会被这根本性的错误毁掉。目标，决定了行动。在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事，就是确定正确的目标——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信仰虚伪之人，就像是风筝，虽然飞了上去，但是却被地上牵着，随时要落到地面。真诚的基督徒，就像是美丽而自由的云雀，在天空中飞翔得越来越高，把地上的事情放在脑后。

III. 我们必须要小心警惕虚伪之罪、以及贪恋世界之罪；我们要谨慎地选择自己的主（24节）。没有人能事奉两个主。服事两个主的人，眼目不是单纯的。一个信仰真诚的人，会像诗篇123篇1、2节所讲述的那样——“坐在天上的主阿，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華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严厉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虚伪之人的欺谎。他们以为，可以在神与世界之间骑墙——既有地上的财宝，也有天上的财宝；既讨人的喜欢，又讨神的喜欢。这些虚伪之人说：为什么不呢？一石两鸟总是好的。他们期望，他们的信仰既可以给他们带来属世的利益，又给他们带来天国的利益。正如那个伪装的母亲，愿意把孩子分成两半；或是，像那个撒玛利亚女子，在偶像与真神之间踌躇。但是，基督说，不，这样绝对不行。提摩太前书6章5节：“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

1. 这里，有一个非常一般性的、根本性的原则：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假如一个仆人有两个主人，那么，当这两个主人彼此一致的时候，仆人会高高兴兴地跟随着他们；但是，当这两个主人彼此分开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仆人到底是属于谁的。他不可能同时爱两个主人、遵从两个主人、忠诚于两个主人。不是爱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这就是真实而实际的局面。

2. 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代表的是财利等一切属世的利益。腓立比书3章7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在这个世界中，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生命的骄傲，等等，都是玛门。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玛门就是肚腹；这就是他们服事的对象（腓立比书3章19节）。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的玛门则是安逸、睡眠、运动、消遣（箴言6章9节）。有的人把世上的财富当作玛门（雅各书4章13节）；有的人把荣誉和进阶当作玛门；有的人把别人的赞扬和掌声当作是玛门，就像法利赛人那样。总之，自我、感官、世俗、等等，就是这个世界的玛门。我们不能同时又事奉这些，又事奉神。否则的话，世界的利益一定会与神相冲突、相争竞。基督没有说，我们必须不要，或是不应该事奉神和玛门。而是，基督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可以事奉这两个主；我们不可能两者都爱。约翰一书2章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雅各书4章4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淫乱的人原文作淫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

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我们不可能两者都遵从、都服事、都信靠、都事奉。因为他们二者是彼此矛盾的。神说：“把你的心给我”。玛门说：“不，把你的心给我”。神说：“你要满足于你现在已有的东西”。玛门说：“你要利用一切机会去抓取。钱，钱，你要不择手段地去获取财富”。神说：“不要欺谎，不要欺诈，不要说谎言。在你所说所作的一切事情中，都要诚实”。玛门说：“如果你能够得着什么利益，那么，连你自己的父母都可以欺骗”。神说：“要有慈善、慷慨的心”。玛门说：“你要抓紧自己的东西，不要给别人”。神说：“不要为各样事情而忧虑”。玛门说：“你要为每一件事情忧虑”。神说：“要谨守主日、安息日”。玛门说：“你要利用每一天来为自己赚取利益”。在神与玛门之间，是有着本质性矛盾的，因此，我们不可能两个主都事奉。让我们不要在神与巴力之间骑墙，而是要作出选择；你要单单地遵从神，并事奉他。

+++++

+++++

+++++

+++++

+++++

+++++

+++++

+++++

+++++

经济贸易与民主社会

在自由贸易经济体系中，往往需要的是自由、开放、平等、公平竞争的政治经济环境；这样，世上的人们才不会被人为的、逼迫性的政治权力所羁绊，而是各自发挥主动积极性，把自己所擅长的生产劳动、工作技能、服务技能做到最好。因此，自由贸易经济体制常常是与民主社会制度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的。

信仰，政治与经济

如本书前文所反复重申指明的，在一个公平、公正、平等、公义的政治经济体系背后，——对于那创造宇宙天地与世人生命之主的上帝的敬虔信仰，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上文所引用的圣经经文和马太亨利圣经注释告诉我们，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处于某种政治、经济制度中，但是，我们的心灵的真正归依，应当是上帝，而不是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属世之利。我们所真正服事的对象，应当是神，而不是玛门。我们所应当事奉的，不应当是自己的财物，而应当是我们的生命之主。我们真正的财宝，不是在这个地上，而是在那永远的天上。我们的生命，应当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我们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

+++++

+++++

+++++

+++++

+++++

+++++

+++++

+++++

+++++

+++++

+++++

+++++

+++++

[illegible]

+++++

继续讲述，文化大革命的谎言体系。

上文讲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之中，包含着深刻的、巨大的谬误与谎言。如果从本质层面看，那么，我们就应当知道，文化大革命的谎言体系中，最深层次的基础，就是在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共产主义、社会改造理念、等等本身就是谬误、谎言的体系。这样的理论、主义、理念本身，必将把一个国家、亿万人民带入痛苦混乱动荡的深渊。

第三，文革的谎言体系中，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关于西方政治文明、以及关于民主自由理念的谎言体系。

无论是在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的夺取政权以及统治阶段，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以及其统治阶段中，西方政治文明的优异成分、以及民主自由理念等等，都被刻意地忽视、无视、掩盖、扭曲、抹杀。在苏联和中共的眼中，西方国家都往往被看作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等。共

产主义者对它们满怀着极端的仇视，并且时刻渴望着——能够推翻那些“资产阶级政权”，并进而建立起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政权团体，乃至建立起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

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仇视西方政治文明、民主自由政治体系的态度，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建立起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就开始的。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资本家们被看作是剥削工人剩余劳动价值的恶魔们，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则被看作是腐朽的、落后的、罪恶的、必将被先进的无产阶级统治、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等等。

固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中国共产党所仇视的资本主义、西方经济体系等等，的确包含着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包含着许多不公不义的层面，包含着许多不完美的、甚至腐败、腐朽、骄奢淫逸、剥削等等不好的方面；——但是，一个人、政治集团、政党、主义、理念体系，如果，看不到【或故意地无视、忽视、蔑视】西方文明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看不到自由贸易、市场经济、自由公平竞争、资本自由流动、等资本主义核心理念的重要意义；看不到它们对于劳动生产力、科技创新、生产效率、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等等方面的重大益处；看不到自由、创意、选择、等等价值的重要性与可贵性；——那么，这样的人、政治集团、政党、主义、理念体系，就不但是愚蠢的，而且是欺谎的、诡诈的、谎言的。

马克思主义——不是要通过认真、耐心、良善的态度，去改革那些问题和弊病；不是要公道务实地面对好坏参杂的复杂政治经济局面；而是要——欺谎地、强暴地、嗜血地，彻底推翻旧社会、旧制度、旧思想、旧阶级。这正如，纳粹主义看到种族斗争的问题，不是要以认真、耐心、良善、公道、务实的谦卑态度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例如，犹太人民族的一些金融垄断获利等事情），而是要大规模地杀死犹太人。

这正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一样，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不是对于既有问题的解决，而是远远地、更大规模的罪恶、生灵涂炭、灾难祸患。它们都是出于愚蠢的、厚颜无耻的、罪恶的谎言体系。

+++++

+++++

+++++

+++++

【引述 《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下）》 应当如何看待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比较】

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化的优异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给人类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看不到现代人要在何等广泛而深刻的程度上，感谢——培根、波义耳、牛顿、等等无数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现代医院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现代经济法律制度等等；看不到在西方的无数的、大批的、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们，在科学、文化、政治、法律、医疗、教育、服务、信仰领域，为社会、为人类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杰出贡献；看不到在西方各国那么多、数量巨大的信仰敬虔、谦卑诚实、热忱真挚、敬老爱幼、爱人如己、勤奋工作、热心服务于大众和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真诚基督徒们；——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没有良知、没有诚实态度的人。

另一方面，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明中的错误、缺憾、谬误成分，比如，在诸如法国为首的、遍及西方各国的、打着人文主义旗号、放荡不羁的淫乱主义、性解放主义；在诸如德国为首的、遍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自大主义、好战主义；在诸如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信仰虚伪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起源于英国等国学术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盛行于德国的唯物主义、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不是仔细思考与观察、真诚寻求真理的人，而仅仅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武力与物质繁荣，而在心中没有正义、没有饥渴慕义之心的人。

+++++

+++++

+++++

+++++

。 。 。 。 。

仅仅在中国发生了大跃进、大饥荒的四、五年之后，就爆发了毛泽东所掀起的“炮打司令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文革发动过程中，毛泽东的立即、直接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1962年以后刘少奇的政治经济治理卓有成效，并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毛泽东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毛泽东担心，自己在大跃进大饥荒中的谬误，将会终有一天受到彻底责难甚至清算），从而彻底夺权、彻底掌握中国政权、实现完全彻底的专制独裁统治；同时，其长远、或借口性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彻底进行阶级革命、阶级斗争，所谓“消灭剥削”等等】。

不论毛泽东的冠冕堂皇的言辞、理论、概念、口号是多么好听，任何有诚

实和良知的人，都能够看出，毛泽东的谎言、记号、迹象、欺骗的内容，是多么明显。但是可叹的是，在中国政坛，无论是欺骗者还是被欺骗者，都往往为了一己之私、或是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为了自己心中的欺谎，而“违心”地跟随欺谎者、革命领袖起舞。在这其中，既包括了像姚文元、江青、张春桥等等这样的左派欺谎者【所谓左派，即那些在口头言辞上、高举乌托邦理想、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等等的人士】，也包括了像周恩来、林彪等等这样的右派投机者【所谓右派，即那些虽然在理念上也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思想、但在实际工作中仍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正常务实思维的人士】【1949年以后，周恩来毕自己的余生，成为了毛泽东的忠实有效打手、甚至不可或缺的帮助者、穷凶极恶的帮凶；固然，周恩来对于194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能够勉强运行、没有彻底崩溃，居功至伟；但是，如果没有周恩来，或许就不会有数百万红卫兵来到北京，也或许文革根本就不会延续十年的痛苦时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助纣为虐，帮助毛泽东打倒彭德怀，使得毛泽东成功地逃避了关于大跃进大饥荒的党内严重责难；并且，林彪随后在全中国范围内把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动到了前所未有、甚至荒谬的地步】。

文革的谎言体系，不是简单地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那样的谎言体系，而是建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谎言体系之上。这样的谎言体系，具有着极大的诱人之处；以至于，无论是那些欺骗者还是被欺骗者，都深深地沉溺于其中、无法自拔。他们自欺欺人，被自己的聪明所绊倒、戕害；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是在从事于有益于国家、社会、甚至人类的伟大事业，以至于，他们罔顾自己的良知、诚实、心灵与灵魂。

This image shows a full page of primary-ruled paper. It features multiple sets of horizontal lines designed for handwriting practice. Each set consists of three lines: a solid top line, a dashed middle line, and a solid bottom line. These sets are repeated down the page with small gaps between them. The paper is otherwise blank, with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A. 2】—— 虚伪体系

当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理念体系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思想还仅仅是在法国、德国、等一些国家的左翼知识分子小圈子内流行，而对那里的大多数社会人群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力。那时，在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还没有什么明显的个人崇拜倾向。

然而，对于革命领袖、政治元首的个人崇拜运动，必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倾向和结果【正如同纳粹主义一样】。

自从列宁、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通过武装暴动、利用俄国沙皇政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处于极其脆弱的时机、一举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起布尔什维克专制政府以后，——在整个二十世纪中，甚至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政权、政党，都具有了一个普遍的特征，即，对于革命领袖、政治元首的个人崇拜。而这种个人崇拜运动，又反过来、雪上加霜地给那些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社会带来更加深重的痛苦和灾难。

无论是苏联的列宁、斯大林，还是北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南斯拉夫的铁托、古巴的卡斯特

罗、中国的毛泽东，都成为了其各自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全体社会的个人崇拜的对象。这种个人崇拜，正如同纳粹德国时期全体德国人民对于希特勒的个人崇拜一样。

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崇拜呢？

这是因为，当世人在内心深处背离了那对于上天的敬虔信仰的时候，当一个社会中的普罗大众普遍地沉浸于无神主义思想的时候，当一个人的内心深处背离了那伟大、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的时候，——人们就会在这个世界上，在心灵中，用被造之物、被造之人去代替那无限全能的造物之主。

当人的内心离开上帝的时候，世人就会把眼目和心灵的寄托，放在那些世上所谓的“伟人”“超人”的身上。他们明明知道，一切世人都是有限的，但是，他们自欺欺人地在那些领袖、超人面前顶礼膜拜，以之为自己心灵与生命的归宿。

+++++

+++++

+++++

【引述 圣经 罗马书1章】

罗马书.

1.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作使徒，奉派传 神的福音。

这福音是 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

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

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

（“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或译：“以大能显明他是 神的儿子”）。

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

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 神所爱，蒙召作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 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

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事奉的 神，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地记念你们，

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

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安慰。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民族中间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

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

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

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神的荣耀。

因此，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

他们用虚谎取代了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

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

同样地，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

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谰言的、

毁谤人的、憎恨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

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

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

+++++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这种个人崇拜，与其说是真诚的、狂热的、痴迷的，不如说是虚伪的、诡诈的、撒谎的。

当周恩来、林彪等人在文革中热情地挥动红宝书、毛泽东语录的时候，他们与其说是在真诚地表达对于毛泽东的敬意，不如说是在“违心”地做着自己明明知道的滑稽表演。然而，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乐此不疲。——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念中，他们可以为了任何目的而采取任何手段；他们不但在欺骗别人，也在欺骗自己。他们的价值观念，包含着强烈的虚

伪、虚假的色彩。

当毛泽东在接受万众瞩目、顶礼膜拜的时候，毛泽东自己的心中也充满了虚伪、欺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扭曲价值观念。

其实，不论是欺骗者、还是被欺骗者，他们在内心最深处、最终——什么都不信；他们所信的，不过是自己的私利、利益，不过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强权即真理”而已。

在普罗大众中间，很多人沉陷在个人崇拜的思想泥坑之中、而不能自拔。一方面，他们明明知道，毛泽东也仅仅是一个人，一个血肉之躯，一个有性欲、有私利、有诡诈的人；然而另一方面，他们被世事所裹挟、随波逐流，自欺欺人地、跪倒在毛泽东的威望、权力、能力面前，俯伏在地，把毛泽东当作是神一样去敬拜。他们的内心也是虚伪的，——他们所看重的，其实不是北京天安门、中南海里面的那个毛泽东，而是他们自己的理念、自义、名利、柴米油盐、蝇营狗苟的私人利益而已。他们以为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甚至情绪激动地、狂热地，把自己当作是保卫毛泽东的英勇战士，把自己当作是正义的化身】，然而他们的内心却故意无视、忽视、否认自己内心深处的罪的本质。他们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不愿意看见己罪、悔改己罪、祈求神恩。

他们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公义、平等、正义的道德法则，离弃了道德法则的终极根基与审判者，就是那无限伟大的上天自己。他们的良知变得浑浑噩噩；他们的心灵与灵魂成为了自己内心中罪的奴隶。

。 。 。 。 。

当人在内心深处离弃那宇宙天地造物之主的时候，往往不是首先、立刻滑入那些杀人放火的、罪恶昭昭的犯罪之中；而是，他们先往往在自己的内心设立偶像，并且，把自己、也把自己的偶像当作是良善的化身、正义的使者【他们常常在理想主义的光辉旗帜下，在自以为义的心态之中，做着最可耻、最残暴、最罪恶的事情】。他们在内心中自以为义，却不愿意在内心中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在中国古时，许多文人哲士自高自义地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1949年以前，毛泽东狂傲、大气地在诗中写道，欲与天公试比高；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文革期间，无数人气吞山河地想要改造世界、改造社会、解放人类。——但是，他们中间却没有人愿意谦卑诚实地在内心深处面对自己的生命真实光景，没有人愿意谦卑诚实地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寻求真正的真理、寻求那创造世人生命之主。

+++++

+++++

+++++

【引述 圣经 马太福音5章】

马太福音.

5.

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 神。

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

“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盐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结果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

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

人点了灯，不会放在量器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

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

因此，无论谁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这样教导人，他在天国中必称为最小的；但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称为大。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必不能进天国。

“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

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人若说弟兄是‘拉加’，

必被公议会审判；人若说弟兄是‘摩利’，必难逃地狱的火。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供物的时候，如果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满，

就当在坛前放下供物，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供物。

趁着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快与他和解，免得他抓你去见法官，法官把你交给狱警，关在监里。

我实在告诉你，除非你还清最后一分钱，否则决不能从那里出来。

“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不可奸淫。’

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

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地狱里。

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进到地狱里去。

“又有这样的吩咐：‘人若休妻，就应当给她休书。’

可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如果不是因她不贞，就是促使她犯奸淫；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奸淫了。

“你们又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背约，向主许的愿都要偿还。’

可是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着天发誓，因为天是 神的宝座；

不可指着地发誓，因为地是 神的脚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发誓，因为它是大君王的京城；

也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

有人要告你，想拿你的衬衫，就连外套也让他拿去。

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就陪他走两里。

有求你的，就给他；想借贷的，也不可拒绝。

“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

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

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什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
++++
++++

【A. 3】 — 残暴体系

文化大革命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二战以后的国共内战、1949年以后的暴力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等运动一样，充满了暴力、残暴的特征。

在人类的历史上，尤其是在近现代历史中，有两种不同的残暴行为的对比。一种是个别案例的残暴行为；另一种是系统性的、广泛流行的、甚至理论化的残暴行为。前者是罪人杀人放火、奸淫偷窃等等个体化的犯罪行为；后者则是行动上的残暴与思想上的冷血与残暴的结合。前者的欺骗性往往很小，因为世人都普遍地能够直接认识到他们的罪恶；后者却可能会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对于普罗大众极其具有迷惑性、诱惑力。前者罪恶昭昭；后者却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被社会中许多人看作是好的事情。前者可能是浑浑噩噩的犯罪者；后者却可能会是清醒故意的犯罪者。前者是明确地出于偷鸡摸狗、坑蒙拐骗、杀人越货的目的；后者却可能是以“对他人的利益好”为名、为了所谓光辉的理想主义，而实际上犯下反人类的罪行。

文化大革命，正是属于上述后者的这种系统化、思想化、暴力理论化的残暴运动。在文革中，无数人遭受迫害、被强迫劳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丧失性命。文革剥夺了整整十年中的、一代人的受高中以上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文革使得中国全社会进入了强化的思想桎梏、人身桎梏、经济桎梏的困境之中；相比于世界而言，中国处于极度停滞和落后的悲惨状态之下；以至于，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时候，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人均收入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经济近乎崩溃；全中国人只有一两份报纸、一两个电台、几个电影。全中国人生活在愚昧、欺骗、落后、残暴、万马齐喑、匮乏、饥饿的可悲社会人文经济环境之中。

文化大革命的残暴的暴力体系，是建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的残暴暴力体系基础之上；是思想化、制度化、系统化、理论化的残暴暴力体系。

文革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的残暴特征，正是在于，它们以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为借口，以“对于敌人如同严寒冬风一般冷酷无情”的革命主义气概，来对“阶级敌人”实行严酷的打击。它们把自己当作是正义的化身，把自己的对手当作是万恶的仇敌；它们的“地动山摇”的革命气概中，毫无谦卑、同情、怜恤、饶恕、恩慈之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关于论语的联想》 怎样真正能够赢得人的心灵】

4.13

“统治”、“强迫”、与“以心换心”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孔子说：“能以礼让治国吗？没问题！不能以礼让治国，怎么实行礼法？”

=====

所谓国事，从根本层面而言，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关于统治、治理、协调、合作的事情。

其实，关于统治、治理、协调、合作的事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中很普遍的、甚至无处不在的一种关系，而不仅仅体现在国家治理的方面。

比如，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是否包含着顺服与爱护的关系呢？父母与儿女之间，是否也有着这种尊敬、孝顺、与尊重、爱惜之间的关系呢？上级与下级之间，是否更是如此呢？

推而广之，人有着社会性的属性；只要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就往往在各样事情、方面，表现出许多这种具有统治、治理、协调、合作等等色彩的特征。

=====

丈夫与妻子之间，或是父母与儿女之间，或是上级与下级之间，或是任何人际、街坊、邻里之间的关系，综合起来，不外乎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以力量、势力、威慑、强迫、违背对方意愿等等手段，来压服对方。

第二种方式是，以尊重、礼让、真情、深挚情感、智慧、知识、技巧等等手段，来以心换心，真正赢得对方的心，使大家彼此内心一致、齐心协力地去做某一件事情，使大家同心同德地彼此相处。

=====

在现实生活中，以上这两种方式我们都常常能够看到，因此，大家对它们之间的区别、异同一定也都非常明白。

那么，真正能够得到良好、持久之人际关系的方式，应当是以上哪一种方式呢？

显然，答案是第二种。

第一种의 强迫方式，虽然有时看起来效果立竿见影，但是，由于它是在强迫、压服对方，因此，对方的心灵之中并不服气。所以，当一旦有机会的时候，就会引起激烈的反弹，甚至导致激烈的冲突、武力、暴戾、战争。

而第二种方式，唯有是出于由内而外的、真心的爱。

只有以心换心，才能够赢得一个心。只有以真情与尊重，甚至是牺牲性的爱，才能够得到对方的真心相随。

究其原因，其实理由非常简单；这是因为：人，不是木偶、不是机器人、不是可以被他人随意呼来喝去的没有灵魂的奴隶；而是，有着心灵、灵魂的，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

所以，真正的和平，在于从心中所发出的和平，而不是在于外在的、被压服的、被强迫的和平。

真正的长治久安，在于从百姓心中所发出的、由衷的喜乐与和平。

这些不是在于物质上的利益，而是在于心灵之中的信仰与道德的法则。

=====

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上下级之间、邻里之间、任何的人与人之间，难道不都是如此吗？

=====

那么，上帝不也是这样对待我们吗？我们的信仰不也是如此吗？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也是如此吗？

上帝是创造宇宙天地、创造我们生命的造物主；他有着无限的能力，智

慧，知识。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缺。

然而，他没有以电闪雷鸣、暴风骤雨来威吓我们、强迫我们，而是以圣灵、用微小温柔的声音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说话；他以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耶稣基督卑微地来到世上，道成肉身，降身为人，出生在伯利恒的马槽中。

他不争闹、也不喧嚷，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烛火他也不吹灭。

他把天父上帝的爱告诉我们；他把自己的生命舍给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使我们因而能够得到永生、再也不惧怕死亡。

这是何等的爱、何等的牺牲、何等奇妙的救恩。

【引述：为仁人死，是少有的；为义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

罗马书5章7、8节：

7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有敢作的；8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

圣经所向我们启示的，是何等美好的信仰！

=====

4. 15

忠与恕

根据孔子自己在《论语·卫灵公》中的解释，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要恶待他人，因为自己也不想被人恶待）。忠就是对人真心、真诚。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说：“曾参啊！我的思想是用一个基本思想贯彻始终的。”曾子说：“是。”孔子走后，其他学生问：“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思想，就是忠恕。”

=====

【引述圣经经文：你们若想要怎样被别人对待，就也要怎样对待别人】

路加福音6章31节：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应当怎样待人。

上面的圣经经文与论语这里的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相同、也有不同。

在世人的心里，都有公平、正义、平等的观念，都先天性地知道公义的法则、道德的法则、是与非、对与错。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本是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标准；否则，人与牲畜还有什么区别呢？

然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绝不仅仅是人际关系中的全部，更重要的，是爱，是己所欲、施于人。。。

【引述 圣思录 中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索】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第一部分】

己所欲

(1)

我们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们以为，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的道德品质和境界。

但是，在这样心态的背后，不是极大的冷漠吗？如果，人与人之间所谓的彼此友善，仅仅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那么，人与石头、树木、野草的关系不也是如此吗？又有什么区别呢？

路人之间、陌生人之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们，漠然相视的人们，“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人们，不就是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和理念之下，浑浑然度过一

生、一代又一代，而且还心中毫无愧疚的吗？

是的，我们的确不应该彼此伤害、彼此欺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被欺凌、被伤害。所以，我们自己不愿意遭受的事情，我们也不应该以此来对待别人。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难道不是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入门标准吗？

然而，在人与人之间，却有着远远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加重要和意义深远的事情。那就是——爱。

爱是这世上、人生之中最困难、最迷人、最美丽之事；是人生之中，最大的迷。

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被爱；因此，我们要努力去爱我们身边的、世上的每一个人。

我们固然渴望不被伤害、不被欺凌、不被歧视、不被看不起，然而，我们更加渴望被爱、被殷殷关怀、被重视、被挂念、被关心、被想念、被思念、被向往。我们渴望我们的人生，不仅是匆匆一个过场，而是有着令人怀念、肯定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说，在人类之中，真的是天下一家，皆为弟兄；那么，在人与人之间，就绝非仅仅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更要是——己所欲，施于人。

在这世上，只有当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爱心、关切、热忱和温暖时，才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否则，就不过是一片广袤的墓地和荒场。

(2)

“己所欲”；我们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寻求的公义、公平、仁爱，是什么呢？

固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社会和他人在我们生活、家庭、事业等等各个方面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但是，这就是我们所要的全部吗？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中、在人类的社会中，想要的绝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上的帮助和惠顾；我们更渴望的，是在灵魂、精神层面的真正的尊重、关心和爱护。

有谁会心底深处，真正喜欢嗟来之食呢？

有谁不渴望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尊重呢？有谁不向往幸福与被爱呢？有谁不渴望理解、原谅与饶恕呢？

在社会中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街道上人来人往的川流不息中，在家家户户的人情冷暖中，在少壮老幼的长吁短叹里，我们的耳朵，如果柔软、敏感、敏锐，就会听见人们灵魂的呼喊、生命的追寻、内心深处的挣扎、迷茫中的省思——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

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一无安息土

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一无安息土

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

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
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
哦我心中多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
我心紧紧跟随他，我唇还要赞美他
朋友你今在哪里，四处奔跑何时已
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
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使你得饱足

(3)

什么样的益处，才是我们真正的益处？

难道不是灵魂之中的益处吗？难道不是永远之中的益处吗？

是的，对一个人好，就应该真正地对他的灵魂好，就应该努力地把神的爱带给他；用生命和温柔，而不是强迫与欺哄，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到天国之中、神的国度之中；就应该是，让他看见神的救恩。

——因为，我们本是弟兄，本都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自己也曾渴望追寻人生的意义，寻求那造物主的救恩与恩惠。

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像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

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版上。

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第二部分】

施予人

(1)

我们应当怎样把我们自己喜爱的、想要的，也施给别人呢？

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上随便说说一些关于“爱”的言词，却没有付上我们的全部生命与汗水，那么，我们的言辞就是空洞无力、苍白虚伪的。

而且，虽然，人在物质上的和切身上的利益，相对于灵魂之中的利益而言，其实并不同等重要；但是，我们仍然应当尽心尽力地服务于人在物质上的和切身上的利益需求。

真正的关心，必是在心里真正的尊重对方，想对方所想，急对方所急。

(2)

如果，我们认真查考我们今天生活中许多习以为常之事的起源，并且内心诚实而谦卑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其中，在历史长河中有着无数基督

徒的生命、汗水、泪水和奉献。

现代科学，系统性地、体系性地探索自然、认识世界，是从十七世纪时起源，直至今天的发展，其目的是为了造福社会、消除贫困，是从培根、牛顿、波义耳等等等等许多现代科学方法之父、物理学之父、化学之父、电磁学之父、现代医学之父开始的。他们的心里，或许没有悬壶济世的雄心壮志，但却绝对是抱着满腔热血和谦卑，为了见证神的大能，见证神的救恩，而奉献自己的一生的。

现代医学、医院、医护的体系和制度，是从基督徒机构、教会组织开始的。那历史长河中的一代一代人，为了改变无数人的健康状况，为了医治无数人的疾病，为了把温暖与关爱带给千家万户，他们克服千关万难，历尽重重险阻，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建立起今日的医院与医护系统。直至今日，我们从医护专业的学生在医学院和护理学院毕业时的誓言中，还能窥见历史的痕迹。

现代公共教育体系，从小学到大学，从幼儿园到博士班，针对普罗大众，而不是少数人的私塾，也是从基督徒的努力和传统开始的。

现代婚姻制度的起源，从一夫多妻制的破除，到一夫一妻制的建立，也是从基督徒们按着圣经的教导和原则开始建立的。

这样的事例，千千万万，其影响反映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然而我们却都习以为常，而很少去想其来源和源头。然而，若我们是认真和诚实的，若我们愿意勤奋查考，我们就必会在这些无数事例中看见神的作为，看见人的谦卑、见证和奉献。我们更会在其中，被引向神的救恩与恩慈。

(3)

这并不是说，我们把现代社会的一切，都归因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科技

体系；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世俗的世界中，我们看见的是许许多多因素互相角力的结果和效果。在西方社会中，也是如此；若认真查考历史，我们就会看见，在无数的、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奉献一生的生命和汗水的同时，也同时存在着国家之间、政经混杂、教会内外的私利、腐败、倾轧在同时进行着的事情。（而且，在敬虔的基督徒们自己的身上也时时存在着软弱和谬误。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自己；只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就是基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在他里面，是完全圣洁而没有罪恶）。

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甚至，敬虔的亚伯被罪恶的该隐所杀，专诚的大卫被嫉妒的扫罗追索；在这个世界上，罪恶，将要一直持续到神的终极审判之日、基督再来之时。（在基督的救恩之中，死亡的毒钩已经被拔去。对神百姓的救赎，已经成就。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他借着死亡胜过了死亡，战胜了撒旦的权势。我们在基督里面，每一个倚靠主救恩的人，已经得到了永远的胜利）。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若我们内心诚实谦卑、仔细分辨，我们就会看见那些为了爱而甘洒热血、甘愿献上一生的人们，是他们，把许许多多的益处带给了今天的我们。我们会思想，是什么影响了他们、改变了他们的一生；在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在他们的信仰之中，是怎样的爱与恩典。

那么，我们自己也应当通过努力和辛勤的劳动，来服事于我们的世代；用我们的一生，见证神的爱与恩慈。

（4）

这并不是说，物质上的利益和切身上的益处，就应是我们服事人、服务人的终极目标——

不，我们内心渴盼的：是人人都认识基督，看见、明白、接受基督的救恩；是人人都归向神，进入神的国度。

毕竟，人真正的益处，在于他灵魂之中所得的益处；人真正的利益，在于其永远境况之中的利益；人真正的幸福，在于那永生国度之中的幸福。

若我们得到了后者，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几十年中的短暂、匆匆的际遇，我们的那些转瞬即逝的地上产业与利益，又算得了什么呢？！

人即使得到了全世界，若他的灵魂丧失了，那么，也是日光之下的最悲惨之事。

反之，人的灵魂若得救，若他失去了全世界，那么，也是值得幸福而欣慰的——毕竟，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谁能把我们与基督的爱相隔绝呢？

但是，人的敌人，就是他自己——在于他自己里面的罪；在于他的灵魂之中，自己戕害自己；背离神，自己把自己卖给了罪，作罪的奴仆，作肉体、血气、私欲的奴隶。

(5)

然而，我们只有通过极大的谦卑、忍耐和耐心，温柔和恩慈，而不是势力与强迫，才能把人从罪中唤醒，使之内心谦卑下来，看见、承认、悔改己罪；我们只有自己谦卑，才能作神的器皿，才能使人谦卑、并看见神的恩典。——因为，我们自己同样是蒙恩的罪人；是基督的爱，使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那永远的生命、永不衰残的信心与盼望。

在这世上，人心是最柔软、最脆弱、最复杂、最深邃的。甚至，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

若想要赢得人的心，唯有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这就是我们“己所欲、

施于人”的根本所在。

这是一件美丽而激动人心的事情，是一件我们值得、并应当付出一生的汗水和努力去行的事情，更是一件有着极其重大影响、意义和价值的事情；然而，却是一件世上最难、最耗人心魄、最令人伤心愁苦的事情。

在这件事情上，也最能检验出我们的本质和心中光景——我们是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死；我们是看重世界，还是看重恩典；我们思想、惦记的是地上之事，还是天上之事；我们看重的是地上的国度，还是神的国度；我们是否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我们的神，我们是否爱人如己。

主阿，求你赐给我们一颗传福音的焦急和渴望之心，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和能力；因为你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第三部分】

爱人如己的根基——信心，盼望，与热爱神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

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你们要慈悲，象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

（饶恕原文作释放）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我们所能给予别人的，实在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的生命都是神赐予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像不是领受的呢？

我们爱人如己的根基，不在我们自己，而在于神。

若有人以为自己行善、仁爱，是一件功劳，是一件自己值得称道的功德，是一件以自己为根基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人，无论多么巧言、理论高深，其内心必是居高临下的心态，必是虚伪的心情。

如果，在我们的信仰之中，没有了造物主、那宇宙天地的创始成终者、那

决定一切的主宰，那么，我们的所谓信仰，就不过成了自己的装饰和描画。

我们爱人如己的根基，在于我们对救主的信心、盼望和热爱。

唯有这样的人，才真正不计得失，不算计成本，不功利主义，不留意功劳；唯有这样的爱，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爱；唯有这样的奉献一生，才是对人真正的怜恤、敬重与热忱。

=====

忠

我们只有在神面前敬虔，才有可能在人面前忠诚。我们只有爱神，才有可能真正地爱人。

没有人是完美的，也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完全配得我们的忠诚。

人与人之间的饶恕，根基在于什么？是什么，使我们有力量能够面对他人的缺点、不足、甚至罪，却仍然愿意以爱心对待他们，以饶恕原谅的心对待他们？

如果，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没有敬虔的信仰，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以真正的忠诚之心，来对待别人，来面对别人的误解、错误、缺失、缺憾、等等。

人与人之间的饶恕的根基，不是在于人自身有什么优点、好处，而是在于，我们首先能够得到神的饶恕、赦免。

【引述，那个欠了两千万银子的人的故事】

马太福音18章21-35节：

21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吗？”22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23因此，天国好象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帐，24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六千万银币的人来。25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26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27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28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了他一百个银币的仆人，就抓住他，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29那和他一同作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30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31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事情。32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33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象我怜悯你一样吗？’34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35如果你们各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

=====

【引述，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你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我们对人忠诚，不是为了讨好对方，也不是为了给自己赢得什么好处，也不是因为对方完完全全地值得我们忠心耿耿；而是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敬虔，在世人面前单纯地见证上帝的荣耀、圣洁、恩典，归荣耀于神。

=====

14.5

躬稼而有天下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奭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宫括问：“羿善于射箭、奭善于水战，都不得好死；禹、稷都亲自种庄稼，却取得了天下？”孔子不回答。南宫括出去后，孔子说：“此人是君子啊，此人崇尚道德。”

=====

禹从事稼穡，而拥有天下。禹与另外那两个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呢？不是在于他擅长稼穡，不擅长射箭、行舟等，而是在于，他内心谦卑温和，不以武力、力量自夸，而是辛勤劳作、谦卑作人、怜恤他人疾苦。

=====

什么才能够赢得人心呢？是武力、力量、势力吗？不是。而是：温柔、温和、怜恤、道义、和平、忍耐、辛劳、等等。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正是如此吗？

他是天父上帝的独生子，是那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是生命的源头，是世界的光；然而，他道成肉身、降身为人、生在马槽中，谦卑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甚至，他为把我们这些罪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自己死在了十字架上；并在死后第三日复活，使我们每一个信靠他救恩的人，都能够与他一同复活，并进入那永生的国度。

耶稣基督不是以势力、武力、威胁赢得我们的心，而是以爱、牺牲、恩典而赢得我们的心，把我们从罪恶中挽回。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

庄与敬（用庄重来对待百姓，他们就恭敬）

孝慈与忠（孝顺长者、爱护幼小，百姓就忠诚）

举善而教不能，与劝（努力）（举用善者、而教诲无能的人，百姓就努力）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问：“怎样使人尊敬、忠诚、勤勉？”孔子说：“举止端庄，能赢得尊敬；敬老爱幼，能赢得忠诚；任用贤良、培养人才，能使人勤勉。”

=====

政事、国事是人际关系事务的扩展，是人际关系事务在更大规模上的反映。

人际关系是人的内心、心灵光景与状态的反映。

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本质，是在于“互相性”；即，双方互相如何彼此对待，以及：榜样，以身作则，秉公行义，等等重要因素。

若要得到对方的尊敬，首先要自己可敬。若要得到对方的忠信态度，首先要自己配得。若要对方为国事、为大家而共同努力，首先要自己行公义、好怜悯。

然而，人际关系究竟应当建立在什么最本质的基础上呢？是人们彼此的良知吗？谁来定义什么可敬、忠信、公义、怜悯之事呢？谁来惩罚那些口中行诡诈、言行虚伪的人呢？

以庄来得到对方的敬，以孝慈来得到对方的忠，以“举善而教不能”来得到对方的认真努力，又怎么样呢？

对于国君、官员、臣宰、等等掌握国家各级政府权力部门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着极大的诱惑，就是以权谋私，骄奢淫逸，鱼肉百姓；在华盖云集的簇拥下，享受他人的诚惶诚恐。

那么，是什么因素能够带来巨大的力量，使他们在私利面前却步，并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呢？仅仅良知、良心，显然是不足的。

那么，是人间的法律吗？但是，人间的法律无论多么完善、详细、缜密，却只能管理和惩罚人的行为，而不能“诛心”。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在不触及法律红线的时候，或是在可以躲避红线、隐藏自己犯罪的情况下，腐败仍然可以遍地横行。严刑峻法并不能阻止人心中充斥着骄奢淫逸。

政事、国事、以及一切人际关系的真正基础，首先是在于信仰，在于每一个个人与上天之间的关系。那宇宙天地的造物之主，能够监察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的真实光景，更能够以无限的圣洁和公义，终极地审判与惩罚这世上的一切罪恶。

在世人的心中，只有信仰中的敬畏与热忱之爱，才能够使人真正愿意以庄重、尊敬对待他人，以孝慈对待长幼，以忠心对待在上掌权者，以公义怜悯对待百姓，秉公行义，努力工作。

人只有当看见、认识到那位宇宙天地造物主的伟大、全能、全知、全在，才能够真正明白自己人生的意义，才能够勤勉地、热忱地、执著地、不畏困苦艰难地，去从事各项工作，以谦卑、谨守、敬重的心，对待各种各样世上的人，无论是对待官员、臣宰、还是百姓。

=====

3. 25

夏与周的比较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评论《韶乐》：“尽善尽美。”评论《武乐》：“尽美不尽善。”

=====

这两个上古朝代，在初期时都是处于和平繁盛的时期；然而两者也有不同。

舜：是来自于和平的禅让。

周武王：以征伐取天下。

因此，前者的颂歌美善，后者的颂歌虽然美，但却不尽善。

=====

以和平、恩慈而赢得人心，胜过以武力、强迫而赢得人心。圣经中所启示的、讲述的信仰不也正是如此吗？

上帝的公义、圣洁、全能

上帝的能力胜过一切罪人，他的公义胜过一切罪恶

然而，上帝更是恩典慈爱的；他不愿意人沉沦，而愿人人都悔改。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引述：腓立比书2章关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经文】

腓利比书2章6-11节：

6他本来有 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 神平等的地位，7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8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9因此 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名之上的名。10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11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 神。

【引述：以赛亚书53章全部】

以赛亚书53章：

1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

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2他在耶和華面前如嫩芽生长起来，

像根出于干旱之地；

他没有佳形，也没有威仪，

好叫我们仰慕他；

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被他吸引。

3他被藐视，被人拒绝，

是个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

他像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样；

他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

4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

被 神击打和苦待了。

5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

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

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

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

6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

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7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时候，

他并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去屠宰，

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面前寂然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8他受拘禁和审判以后被带走；

至于他那个世代的人中，有谁想到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被击打，是因我子民的过犯呢？

9虽然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

他的口里也没有诡诈，

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

但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10耶和華却喜悦把他压伤，使他受痛苦；

耶和華若以他的性命作赎罪祭，

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得享长寿；

耶和華所喜悦的，必在他手中亨通。

11他受了生命之苦以后，

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

我的义仆必使许多人

因认识他而得称为义，

他也必背负他们的罪孽。

12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人同分，

他必与强盛的均分掳物，

因为他把自己的性命倾倒，以致于死。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却担当了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

耶稣基督以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把我们这些愿意谦卑己心、承认自己之罪的罪人，从罪恶中救赎出来，把我们带回到天父的面前。

这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这是何等美善的恩典。这是多么美丽的和平。

【引述：耶稣基督论八福】

马太福音5章1-11节：

1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2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3“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4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6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7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8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 神。

9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10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11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12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

=====

【引述 哥林多前书13章 爱的真谛】

哥林多前书.

13.

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

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存不息的。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

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部分的就要过去了。

我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既然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

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像主完全知道我一样。

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引述 圣思录 爱的初探】

1. 《爱的初探》：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罗12：9）。

【第一部分】对人来说，这世上最难的事是什么？是工作吗？是生活吗？是旅行吗？是时空的间隔吗？这世界上有几种所谓“难”：

1. 知道该怎样做，但做起来很费力；
2. 知道该怎样做，但做起来很耗时间；
3. 不知道该怎样做，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去做，没有固定的具体章程或是程序，但却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去做，付出极大的心情去做；而且，在做之前，甚至不知道能否成功；

4. 知道肯定做不成的事情。

第一种，需要勇武的力量，需要勇气。第二种，需要顽强的毅力和恒心。

第三种，唯有出于爱。第四种，反而心无牵挂，无憾无悔。

【第二部分】这世上最难的事，是爱。不是吗？人与人之间，家庭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路人之间，最难的，是爱。不是吗？

那么，什么是爱呢？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13:5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13:6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13:8 爱是永不止息

爱，不但是这世上最难的事，而且，更是使这世上因此而有了颜色与意义的事情；爱，使人的生命而美丽。爱，使人的生命而成其为生命。

【第三部分】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在爱的里面，包含着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恨恶恶，亲近善。也正是因此，而使爱成为这世上最难的事。

在对方的身上，善意地指出缺点和恶的方面，鼓励地看待对方正确的、良好的品行。不为对方的恶而气馁，不为对方的善而高山仰止。不卑不亢；因为我们都是在神面前的受造之物。朋友，夫妻，亲人，恋人，同事，邻

舍，路人的相处之道，应当是怎样的呢？

【第四部分】爱的源头是什么呢？爱的本质是什么呢？爱的归宿是什么呢？爱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神是爱。

他的公义高及诸天，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基督的舍命之爱：——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15:13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15:14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15:15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
++++
++++
++++
++++
++++

Page | 323

+++++

+++++

+++++

继续反思和讲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要特征。

【A. 4】 — 假冒为善的体系

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口号、理想，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革命、阶级斗争等等核心理念为基础。这些口号、目标、理想，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对于许许多多的民众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其重要主旨包含了，平等主义，劫富济贫，公有制产业，消灭剥削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推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打倒小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等等。简而言之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者们自己的理想，要在人间社会实行良善、公平、正义、平等之事。

但是，怎样才能真正地在人间社会打倒剥削呢？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平等

呢？怎样追求和实现真善美呢？什么是真正的平等？什么是真理、良善？

什么是真正的良善？什么是人真正的利益？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善与义？

+++++

+++++

+++++

【引述 圣思录 人的义与神的义】

12. 《人的义与神的义》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10:3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 10:4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10:5 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 10:6 惟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

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10:7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10:8 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10:9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10:10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10:11 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第一部分】

人的义

如果说，有人认为世上的宗教都是彼此相似、劝人向善，那么，这样的人实在是谬大矣。

因为，究竟什么是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人人皆知；但实际上，却深奥无比。

(1)

比如，善意的谎言，是善吗？为了良好的目的，而采取手段上的变通，算是善吗？如果算是善，那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善吗？目的之善，手段之恶，其中的界限在哪里呢？这样的界限又是由谁来定的呢？这样的裁判者，他的权力的来源和凭据又是什么呢？

还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又比如，如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善的话，那么，人也应当“己所欲，施于人”吗？这样，人应当怎样对待那些遇见的一切世人，以及未曾遇见的所有世人呢？

人是否就应该变卖自己的一切，施舍给别人；否则就算为恶呢？如果不算为恶，那么，冷漠与怜恤、博爱之间的界限是什么呢？又是由谁来决定这样的区别呢？

而且，“己所不欲”的事情，一定就是错的事情吗？“己所欲”的事情，一定就是对的吗？这对错又是由谁决定的呢？这样的裁判者，他的权力的来源和凭据又是什么呢？

再比如，“善”就是对人友好、满足对方的要求和心愿吗？对方的要求和心愿，可能是不合理、不公平的。那么，谁又来决定什么是公正的、公平的、合理的呢？这样的裁判者，他的权力的来源和凭据又是什么呢？

人们常说，“公道自在人心”。那么，是否公众认为对的事情，就是对的呢？

人云亦云、从众的心理，就是正确的吗？那么，“众口铄金”、“法不责众”等等，就是对的吗？道德的审判，是否就可以通过投票、民主的形式来完成呢？（尚且不说，这里还需假设，人们能够、并且愿意努力地去仔细查明真相和事实）。

谁能保证，私利的影响，血气的愚拙，迷信的虚妄，不会蒙蔽亿万人的眼睛呢？难道很多罪行，不就是在爱国主义、理想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吗？难道战争的基础、乃至打群架、群体闹事的原因，不就常常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哥们义气、族群主义、以及私利和血气所驱动的吗？我们难道不是常常地、义愤填膺地，把自己当成正义化身，以恶报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吗？这样的仇恨、鄙睨、血泪、暴力、凶杀，不就是人类的历史吗？

可是，难道我们在恶的面前，就只能退避三舍、苟延残喘、胆怯懦弱、趋利避害吗？

在报复与懦弱无为之间，在“霹雳手段”与“菩萨心肠”之间，其中的“度”，又该怎样掌握呢？

更重要的是，谁来决定这样的标准是正确与否呢？这样裁决的人，他的权柄的来源和凭据是什么呢？

(2)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怎样看待生死、以及意义呢？

我们相信善人死后会有好报，恶人死后会有惩罚。但是，对究竟什么是“善”，以及究竟怎样才是足够的“善”、才能达到满意的标准，其实我们并没有把握。

如果我们内心诚实，我们也一定会心里承认，我们完全没有权柄，来裁决这些关乎生死、意义、死后结局之事。那些事情，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和认知之外。

若没有神的启示，凭我们自己的私意猜测和臆想，我们也更不知道——死后的奖赏，究竟是什么、有多么美好，以及奖赏的条件是什么；死后的惩罚，究竟是什么、有多么严重，以及惩罚的条件是什么。

所以，是不是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呢？还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呢？亦或是，“心诚则灵”呢？

(3)

如果连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不确定，或是凭着人的标准去妄自揣测，那么，我们的所谓宗教信仰，就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呓语而已。

这样的凭着人的标准的妄自揣测，以及在宗教信仰中依据、强调任何“人的义”、“人的智慧彻悟”、“人的修行”——无论那是关公、妈祖、观

音、罗汉、圣徒、清真、蒋公、还是毛公；无论是怎样的至圣先师；无论是人的彻悟，还是缘分、菩提；无论是人的行为、饮食、言语的戒律规条；无论是人的修炼、修行，自我灵修，还是修身养性——这些，或许看似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道理和优点，但是，这样的宗教信仰的人，却实际上是、并终将是遗害无穷的无神论者——

因为，他们（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整体）必终极地是以自己为自己的神；以自己的认知和智慧为权威和主宰；以自己的领悟和判断本身，作为判断的凭据和权柄的来源。

他们在内心深处，潜在性地，把自己与那宇宙天地的造物主看为平等。他们用自己的义，自己的好行为，自己的牺牲，自己的优点，自己的刻苦修行，自己对他人的无私表现，自己的智慧、大彻大悟，自己的坚忍，自己的容让、博大胸怀，自己的清洁、圣洁，等等等等，来当作基石，当作根本，当作可以凭据的、努力追求的目标和基础。

【第二部分】

神的义

敬畏神，是人智慧的开端。

神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他的权柄遍及全地，他的能力胜过一切，他是独一无二的，是自有永有的，是全备的，是无限的。

他创造了天地，那么，他自己岂不在天地之上？他的能力，岂不远远胜过天地？

他创造了海洋和其中匍匐的巨浪，那么，他自己的能力岂不远远胜过风暴和大海？

他创造了大地，那么，他的大能与智慧岂不远远胜过全地之中的一切？

他是有位格的。

他既造了人的耳，那么，他自己岂不能听见？

他既造了人的眼睛，那么，他自己岂不能看见？

他既造了人的口，那么，他自己岂不能说话？

他造了人的头脑，他自己岂不能思想、岂没有自己的意志和旨意？

他造了人的心灵，他自己岂没有感受、喜悦、忿怒、判断、选择、憎恨、厌恶？

他造了一切世人，把生命赐给他们。

他的圣洁、公义、慈爱，岂不远远地胜过世上一切的世人？

然而，在神那里，不会有我们人身上的罪、软弱、污秽、疾病、虚谎、朝三暮四。

人，作为全地之上最独特的受造之物，有着心灵和理解的能力，能够明晓神的旨意和法则。他们是按着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

但是——可叹，他们生活在罪中，活在血气、虚谎、诡诈和自义之中；他们离弃了他们的造物主，离弃了神的恩典与恩惠。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天空的飞鸟知道来去的定期，燕子、斑鸠、白鹤也守候着当来的时令。然而——人却不知道敬畏神、遵从神。

【第三部分】

信主的道，在我们的口里和心里

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为我们的罪责以及应受的永远惩罚，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清了罪债——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他三日后复活，使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复活——

把我们从罪中挽回，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

与神和好，得到真正的平安和永远的幸福。

这是神的应许，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盼望。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是神的恩典，赐给那谦卑、悔改的罪人。

这是叫人无以自夸的恩典——

因为，人若想要来到那无限之神的面前，

从根本性上说，人所能靠的，必不是人的优点，

而是神的恩典与饶恕；

靠的是人的信，

而不是人的立功和功德。

这样的信心与信靠，

必是完全的委身和倚靠；

必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热爱和敬拜；

必是在心灵和诚实之中，

敬拜与遵从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

+++++

+++++

【引述 圣思录 “神的律法，与人间的法律”】

31. 《与弟兄和平》

6/7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5:22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有古卷在凡字下添无缘无故地五字）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

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5:23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5:24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5:25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5:26 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第一部分】

先与弟兄和好

(1) 神的律法，和人间的法律

(1. A)

人的良善，应是从心里、由衷的，是由内心而至外在的言语行为的，而不是相反：——

因为神是监察人内心的神；也更因为，人的本质，是由其内心决定；人的行为和言语，只是其内心真实光景的反映。

这世上的法律，只看人的言语和行为，只看人的外在表现。所以，一个内心罪恶的人，仍然可以通过伪装和约束，在这世上不触犯刑律，庸庸碌碌，终其一生。而另一方面，一个无辜的人，则可能会由于马虎大意，犯了过失之罪，承担刑责。

世上的法律，只以人所能查究核实的证据、证人或证言、供词为基础；关注的，只是世上的秩序、公平等。

换言之，人间法律所管辖的范围，是那些属世的、可见的、可把握的、可查究的、可测量的、非永恒的事情。

(1. B)

然而，这并不是说，世上的法律就没有价值；也不是说，世上的法律，与神的律法就没有关系。

只不过，这两者之间，绝非等价。

在世上的法律中，所言及的“公平”，“平等”，“公义”，“正义”，“罪行”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建基于神放在人良知之中的、先天性的，关于公义、公平、圣洁、正直、诚实、真实等的认知。

在这世上，若没有信仰、若没有对永生真神的敬畏，那么，人间的法律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如果人的心里，对宇宙天地主宰、造物主、神尚且没有敬畏，对自己的灵魂尚且毫不关心；那么，人也不会在内心深处，尊敬世上的法律。

人间的一部一部法律，无论多么完善，无论条款多么多么详细，都无法完全全囊括人类生活中的复杂微妙、变化多端的方方面面；也无法事先预见各种各样纷繁的情境。

人间的法律，必须假设，它所针对的对象，是能够、且愿意诚实地，理解并应用抽象概念和原则的；是愿意尽力去诚恳待人的；是愿意诚实守信、遵守契约的。否则，任何人间法律，都会成为一纸空文，如沙子筑成的城堡，瞬间塌垮。

然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如果人想故意逃避惩罚、规避人间法律、钻法律漏洞、破坏规则、为自己走捷径找理由，那么，他一定很快就能学会怎样把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

他也许不一定敢于堂而皇之地杀人放火，直接与法律和国家公器对抗，但是他知道，怎样利用法律、规避法律、玩弄法律，来满足自己的私利和罪

恶之心。

很多时候，人们不杀人放火，并非因为他们不愿意，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法律的惩罚。他们的罪恶之心是一样的。

所以，当一个社会的法律越看似健全，越复杂全面的时候，人们的心往往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成了更加虚伪和狡猾。

(1. C)

但是，世上的法律，并不能诛心，——不能仅仅根据人心里的想法和动机，来定一个人的罪。对于隐藏在人心里深处的罪恶想法，和自私、猥琐、残暴、暴怒的意念，世上的法律无能为力。

实际上，若有任何的人间法律，要管束、定罪人的自由内心，那么，这样的法律，往往不是“善法”，反而很可能是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恶法”。

这样的恶法，以及制定这样诛心之法律的人，是愚妄地想要取代神的权柄，愚妄地试图篡夺神的荣耀；正如圣经《但以理书》中记述的，尼布甲尼撒下诏，要求全地的人都跪拜他，把他当作天地之主来敬拜。

主耶稣说：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

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1. D)

事实上，人间法律之所以不能够针对人的内心定罪，不仅是因为那终极审判的权柄在于神，也因为，我们世人往往不能看透人内心之中的真实光景。我们常常会冤枉一个软弱犯错的无辜之人，也常常会被一个罪恶虚伪之人的甜言蜜语和伪装所蒙蔽。

神是监察人内心的神，他的旨意纯全，他的判断是按着真实；人的心在他面前是完全敞开的，没有任何秘密和隐秘之事能够在他眼前隐藏；

而世人，则往往只能看见、也只看重，人的外表和表现，而看不见人的本质。

(1. E)

如果，世界上、人心之中，没有神的律法，没有神的权柄和主宰，那么，任何的人间法律（不论多么貌似公正、貌似完善）也就毫无意义，毫无作用，毫无价值——

因为，决定人行为的，是他里面的喜好、兴趣、倾向、口味、价值、欲望、思想、理念和选择；决定人言语、行为及其一切外在表现的，是他里面的本质和灵魂的光景。

虽然：——人间的法律，在人的内心面前，无能为力；或者，像现代民主社会里面的法律那样，强调人的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对人的内心毫不关心、毫不在意，只注重外在行为层面的证据，以及外表行为层面的管理和管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心就可以像脱缰野马一般，在罪恶、诡诈、虚伪、狡猾、贪婪的世界里任意驰骋；更不意味着，人的灵魂，就不在神

律法的管束和审判之下。

(1. F)

主耶稣说：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蠓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

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1. G)

世上人间的法律和刑罚，可以把人捆锁在监狱之中，甚至可以判处人死刑。但是，尽管人的身体可以被杀死，世上却没有任何势力和权威，能够审判灵魂、把灵魂投在地狱里、永远地刑罚灵魂。

这宇宙天地和其中的万有，都随时在神的掌控和主宰之下；其中的任何事情及其发展，都是按着神的允许和安排，要成就神至善至美的旨意。顺从神的人，将要兴旺；悖逆神的人，必将衰亡。落在永生神的审判和惩罚之中，何其可怕。

然而，神更在那永恒之中，在终极的审判之日，对人的灵魂有着最高的审判和刑罚的权柄。那些活在罪中、死在罪中的世人，终将面临神的永远审判和刑罚；他们要在不灭的地狱之火中，永远地痛苦哀号。

神的审判，永远的、终极的审判，不是按着外在的虚浮与功利，而是按着人心的真实光景，按着人灵魂的真实面目。

(2)

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

拉加与魔利的意思，类似于“蠢货”“傻冒”等恶毒辱骂人的名词。

也许，一句脏话，尤其是辱骂、咒骂自己弟兄的话，在人眼里，在人间法律之中，并不算什么，也不会受到什么严厉惩罚。然而，在神的眼中，这却与杀人的罪同罪。因为，其背后的心境和动机是一样的。其本质和性质也是一样的。都是出于暴怒和仇恨。都是沉浸于罪中之人灵魂的外在表现。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谦卑自己的心，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灵魂的主，遵从他的吩咐和教训。我们要从自己的口舌上，悔改自己的罪。把罪中的故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里面，有一个崭新的、重生的、洁净的生命生长起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

俗。

（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耶杜顿。）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時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

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

耶和华阿，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细拉）

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主阿，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

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

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
（的笑容或作所喜爱的）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
虚幻。（细拉）

耶和華阿。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
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
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

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
原。

【第二部分】

偿还对人的亏欠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
怨，5:24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
后来献礼物。5:25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
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
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5:26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
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1）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真的愿意来寻求神，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

在我们心里，与弟兄反目、对人苛刻、不怜恤人，是一件严重的向神犯
罪、得罪神的事。

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讨神的喜悦，真的愿意寻求神的饶恕，

那么，我们就必会寻求同弟兄的和好。

若要来神的祭坛前，向神献礼物，我们必须首先与弟兄和好。

(2)

我们也要偿还人的亏欠，否则，就必不得神的喜悦。

要与人和息。

【第三部分】

真诚的敬拜

神是灵，因此，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God is spirit, and his worshipers must worship in the Spirit and
in truth.

不要自欺欺人；更不要，以为神是可以欺哄的！

=====

=====

+++++

+++++

+++++

继续反思和讲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特征。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狂热分子们、以及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真正核心谬误，正是在于，他们在内心与信仰之中，抛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造物主、上天、上帝，而高举人性、自以为义；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情，是在人间行良善，但是，他们却从未在内心深处思考过，——什么是真正的良善、圣洁，道德法则的真正根基是在于什么。他们的内心并没有真正的谦卑、诚实；他们并不愿意深思自己生命中的罪错，更不愿意承认己罪、悔改己罪；他们把自己当作是正义的化身；然而他们所做之事，却是给这个世界带来深深的痛苦和悲哀。

Handwriting practice lines consisting of multiple sets of three horizontal lines (top, middle, and bottom lines) for letter formation.

Handwriting practice lines consisting of multiple sets of three horizontal lines (top, middle, bottom) for letter formation.

【B. 1】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正面积极效果

中国共产党的自从1949年以后的统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许多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包括负面的事情，也包括正面的事情。这里，我们分别对正面与负面的影响效果，以及其内在机理和深刻原因，进行一些简单初浅的分析与思考。

在这里，我们先列举和分析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科学、技术、经济、医疗、文化、教育的进步；这些进步，在许多方面，都与西方文明的五百年近代史有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些进步、或是正面的积极进步影响效果，大致地表现在四个类别。以下简单举例。

第一类：现代科学技术的直接果效。由于1949年以后、直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基本上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所以，这些所谓现代科学技术，其实大多数是源自于1949年以前的西方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在1927-1937年的、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领导下的、“十年建国”黄金发展阶段，以江浙湖广为中心的中国经济建设，在大幅度引进了当时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成果以后，取得了非常长足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效果。1949年以后、包括文革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力统治政策下，那些几十年前的科学技术被大规模地推广到、或是影响到，——中国社会城乡的几乎每一个角落。

例如，——由于基本西医医疗技术的推广，婴儿夭折率被普遍地、大幅度地降低。农业化肥的大规模推广，以及农业机械化的有限程度的推广应用，使得中国农业种植收割等等技术得到长足的提高。重工业、铁路、钢铁、化工，等等方面的建设，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展；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发展基础培育了较好的潜力。轻工业、汽车、卡车、拖拉机、自行车、缝纫机、纺织、手表、等等方面的工业发展建设，改变了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生活面貌，进一步使得中国人从古代社会生活结构向现代社会转变。1949年以前的许多近现代工程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隧道建设；桥梁建筑；道路建设；公众洗浴设施；锅炉建造；北方暖气管道建设；城市自来水管网建设；电网建设；发电站建设；水利设施建设；煤炭石油等能源系统建设，等等等等。

第二类，现代文明与平等观念的普及化理念影响。例如，这些影响包括，——广泛的识字教育；人口识字率大幅度提高；初中以下的基本文字教育与文化教育大幅度普及；平民教育；一夫一妻制婚姻法律观念普及化；妇女地位大幅度地提高【相比于旧社会文化而言】；平等主义观念；等等等等。

第三类，政法体系以及经济体系、文明秩序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与司法统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中国社会的活力，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力统治体系，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遏制了土匪、流寇、响马、强盗、窃贼、妓女、鸦片毒品、等等旧社会中所常见的一些社会混乱失序现象、以及猖獗的不公不义之事，遏制了许多杀人放火、奸淫抢劫等等罪恶昭彰之事。

第四类，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对于迷信主义、腐朽文化、剥削文化、不平等主义的批判【姚文元对吴晗的批判文字之中，虽然包含着许多虚谎、假冒为善，但是，也包含着针对传统文化中的迷信主义、腐朽文化、剥削文化、不平等主义等等成分的正确谴责】【孔子的君臣父子社会伦常，虽然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建设，但是，这种人与人之间本质上不平等的人伦理念，却是与以基督教信仰之文明为根基的西方文明内核存在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以唯物主义为其内在根基，但是，它对于人与人之间平等观念的推崇（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目标，就是想要建设一个没有阶级差别的理想社会；然而，马克思主义却并没有真正地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平的真正根基，究竟在于何处），——却是

脱胎于西方文明体系本身】【文化大革命运动，促使每一个认真严肃思考的人，去深刻反思：反剥削主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的根基，究竟在于什么】。

如果我们要认真深刻地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内在机理，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认真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起源、以及其内在机理。

如果我们要认真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起源与内在深刻机理，那么，我们就必须需要深刻地了解西方知识分子界【尤其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界；——所谓“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是指，那些逐渐背离基督教信仰体系，推崇人文主义为本之理念的西方知识界人士；这些人士们往往认为，人性是光辉而伟大的，世人并不是在本质上生命充满了罪性与罪行的；世人并不需要从罪中悔改、寻求上天、信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恩典；人类能够凭着自己的理性、骄傲、自义、能力、荣耀而不断地发展进化、优胜劣汰、发扬光大，等等等等】在过去的西方五百年近现代历史中发展和演变的历史。

其中包括，——【随着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开始以后，一方面，敬虔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在欧洲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无数普通人的生命和心灵被彻底翻转和改变，成为敬虔、谦卑、真挚、热

忱的基督徒；清教徒运动、敬虔主义运动、等等风起云涌、影响广泛；另一方面，包括许多知识分子们在内的众多欧洲人士，大幅度地、速速地背离了基督教信仰本身；例如，在德国、法国等地区，其知识分子界中的很多人们，都逐渐地、慢慢地、一步一步地，产生了背离基督教信仰本身、背离圣经的倾向】——（1）德国的自然神主义哲学发展历史【例如康德】，泛神主义哲学发展历史【例如黑格尔】，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历史之起源【例如尼采】，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2）西方左翼思想在过去五百年中的起源、发展以及其影响；——（3）法国的宗教战争历史【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以后，西欧、北欧各地对于天主教体系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改革；英国产生了清教徒主义运动，并随之发生了光荣革命等重要性的政治性影响事件；然而，在法国，由于天主教人士与宗教改革人士之间的激烈冲突，导致了十六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宗教战争，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丧生；在这些纷争与战争之中，包含着许多人心之中的罪恶、虚伪、欺谎、自义、争竞、好勇斗狠】；——（4）德国的宗教战争历史【德国在十九世纪俾斯麦时代以前，一直是由许许多多小的邦国所组成的非常松散的政治集团。十七世纪上半叶，如同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法国一样，德国也发生了长达数十年的宗教战争；在这个过程中，也导致了数以百万计人口死于战争；同样地，在这些纷争与战争中，包含着许多人心之中的罪恶、争权夺利、自义、欺谎、争竞、好勇斗狠、等等之事】；——（5）以人文主义为本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背离基督教信仰的思想倾向】、理性主义【同时伴随着人心中的自义、没有谦卑、没有敬虔信仰、冰冷与无爱、冷漠与无情】、盲信主义【但却缺乏真正的敬虔、儆醒、奋进、热忱、敬爱、信仰、信靠】；——（6）天主教的迷信主义【拜偶像；天主教的谬误、偏离圣经、封闭圣经；——什么是真正的敬拜神；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从心底所发出的信、望、爱；来自于圣灵与恩典；敬畏上帝是人智慧的开端；谦卑与热忱；心灵以什么为真正的依归】；——（7）法国的所谓启蒙运动、人文主义、放荡主义；政治局势的动荡混乱、骄奢淫逸；——（8）德国

的民族主义、好斗主义、自大主义；——（9）俄国的信仰虚伪主义；东正教的宗教和教会国家化主义【自从彼得大帝以后，东正教的教会组织在俄国就成为了国家政府的附属机构；俄国的基督教信仰的状态愈发地变得形式主义、冷漠、徒有其表】；——（10）意大利与天主教的慵懒懈怠；——

（11）德国的自由派神学、圣经高等批判【所谓自由派神学、以及德国“圣经高等批判”是指，他们逐渐偏离圣经的教导，对圣经进行裁剪、扭曲，而不是以圣经为上帝的、超自然的、权威无误的话语；他们仅仅是想要一般性地接受圣经中关于道德教导的部分内容，但是，却不愿意接受圣经中关于超自然的启示和真理，不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超自然的公义圣洁和救赎恩典】；——（12）欧洲的上述思想、运动、历史，——与平等主义、造反有理、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例如，法国的政治腐败，以及自从拿破仑时代以后的混乱动荡的喧嚣政治历史与社会暴力革命运动】、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思想、等等之间的关系；——（13）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伪面目与实质

【所谓的客观主义、唯物主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伪规律主义、革命主义与进化论主义；对于“公义、正义、平等、仁慈、良善、道德”等等概念的扭曲、欺骗、误解；出身论；罪恶论；阶级论；成分论；人生命的真正价值与社会的目的究竟在于什么；什么是自由；什么是道德的根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本质以及价值；剥削主义与平等主义；以及：——关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为地设想和杜撰的人类历史进化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内容是不准确、大而化之、甚至人为杜撰的；其中存在着许多谬误、偏离真相、或不符合事实之处；——例如，实际上，中国自从秦始皇时代以后，就是基本上以高度中央集权、中央皇权政府架构为主要政治特征，而与欧洲中世纪的许多小邦林立的封建主义时代具有着极其不同的特征；而中国或欧洲的政治历史局面为什么会如此，——与它们的思想、精神、信仰历史有着重要的、决定性的关系）；虚幻乌托邦理论】。

[illegible]

【引述 《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下）》 麦子与稗子的寓言故事】

麦子与稗子

在西方世界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好坏参杂的情况。

马太福音

13:24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13:25 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13:26 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

13:27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阿，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

13:28 主人说，这是仇敌作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13:29 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

13:30 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13:36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13:37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13:38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13:39 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13:40 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13:41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

13:42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13:43 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
++++
++++
++++
++++

【【【引述 《从金刚经说起》中的内容 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不能划等号】】】

虽然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影响如此广泛，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简单地当成了基督教信仰本身，或者，如果我们简单地仅仅把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划等号，那么，我们就犯下了严重的、望文生义、不认真负责、偏离事实的错误。

事实上，我们只要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近三百年来，虽然有很多好的事情，比如现代科技革命的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民主自由制度、法治、自由经济、平等贸易、社会大分工协作、医疗、教育等等，还有无数的、具体的科学技术发明，都是来自西方；但是，也有很多坏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神论主义、进化论哲学、性解放、放荡主义、离婚泛滥、家庭破碎、甚至同性恋等等，也都是来自西方。

显然，如果我们刨根问底、认真查考、追本溯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明白，西方世界绝不是铁板一块，西方人也绝非全都是纯洁无辜的、敬虔谦卑的圣徒。

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化的优异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给人类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看不到现代人要在何等广泛而深刻的程度上，感谢——培根、波义耳、牛顿、等等无数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现代医院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现代经济法律制度等等；看不到在西方的无数的、大批的、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们，在科学、文化、政治、法律、医疗、教育、服务、信仰领域，为社会、为人类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杰出贡献；看不到在西方各国有那么多、数量巨大的信仰敬虔、谦卑诚实、热忱真挚、敬老爱幼、爱人如己、勤奋工作、热心服务于大众和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真诚基督徒们；——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没有良知、没有诚实态度的人。

另一方面，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

文明中的错误、缺憾、谬误成分，比如，在诸如法国为首的、遍及西方各国的、打着人文主义旗号、放荡不羁的淫乱主义、性解放主义；在诸如德国为首的、遍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自大主义、好战主义；在诸如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信仰虚伪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起源于英国等国学术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盛行于德国的唯物主义、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不是仔细思考与观察、真诚寻求真理的人，而仅仅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武力与物质繁荣，而在心中没有正义、没有饥渴慕义之心的人。

事实上，即使我们撇开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哲学史等历史领域的角度不谈，单单从宗教信仰、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与现状来看，西方文明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甚至分裂的、内部景况；——这也从侧面再次证明了，西方文明体系绝非简单地、直接地等于基督教信仰本身。

基督教会的简史

在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与教会历史中，在大约公元15世纪以前，基督教会一直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由来

东方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是从大约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归依基督教信仰以后，把罗马帝国从罗马迁都至当时的拜占庭市开始的。拜占庭市位于欧洲与亚洲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节点。它后来被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这个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基督教信仰为国教的帝国，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拜占庭帝国；她从公元四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十五世纪，存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没有改朝换代的重要国度之一。公元八世纪左右，这个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基督教国家，开始不断地把信仰传播到后来称为俄罗斯等、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各个国家。俄罗斯这些国家曾经在很长时期一直处于农奴制度状态（俄罗斯的农奴制度一直到后来十七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效法西方工业革命等等的时候，才开始被完全消除）；然而从公元八世纪开始，基督教信仰已经逐渐把社会文明和人道关怀制度带给俄罗斯等的广袤土地。

西方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在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君士坦丁堡以后，延续和保持了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注：耶稣基督于大约公元元年左右降生，于公元三十三年左右被钉十字架）、使徒彼得时代以后建立的教宗制度。在从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的上千年历史中，以罗马教宗制度为核心、以拉丁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西方众教会，与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拜占庭帝王为政权中心、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东方众教会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在公元一千年以前，东西方教会基本上是兄弟般的关系。他们——都以圣经新旧约全书为共同的信仰根基与中心教义的基础；都相信和承认，圣经、也只有圣经，是上帝的全备话语、是上帝亲自的、超自然的启示与默示；都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都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

但是，在公元一千年之前，在东西方教会之间，也一直存在着既合作、又有纷争的状态。两者在各自教会权威、教义细节等等方面都有很多争议、互相对对方不服气。这种状态持续到公元一千年，终于矛盾完全爆发，互相之间彻底决裂，互相否认对方的信仰合法性。

中世纪

公元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被后来称为土耳其人的突厥民族攻陷。君士坦丁堡为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是源于突厥人的伊斯兰信仰。从此，拜占庭帝国正式覆灭。然而，东方教会，此时已经自称为东正教，逐渐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迁移、直至后来以莫斯科为其中心，继续与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天主教会体系分庭抗礼。大约在同时，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体系（自称为天主教系统），于公元十五世纪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一种近现代文化革命运动。

值得指出的是，从大约公元四、五世纪至十五、十六世纪的一千年，被后世称为的所谓“中世纪”，其实并非人们所常常误以为的、专制主义压迫的黑暗时代。事实上，任何诚实的历史学家都会承认，尽管在这期间发生了几次针对中东的十字军东征、回击伊斯兰的进攻和劫掠，但是，总体而言，在这大约一千年的漫长历史年代中，整个欧洲，包括西方教会影响下的西欧，和东方教会影响下的东欧，在政治与军事上，基本上是属于和平时期，几乎很少有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很少有兵荒马乱、生灵涂炭、改朝换代的时期。在许多乡间、市镇、经贸中心，人民安居乐业，许多地

方治安良好、常常夜不闭户。

在中世纪的长达一千年中，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与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各有特色、短长、优缺点。

东方教会所处的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帝王及其家族笃信基督教信仰。东方教会分成各个教区，众教区的各级牧者、长老等等围绕着拜占庭帝王，彼此和谐，处于互相和平、长达几乎一千年的安稳状态中。事实上，拜占庭帝国这个名称，是后世的历史学家给起的；当时的人们从未曾这样称呼。他们这个国家，一直自称为“基督之国”、或“东罗马帝国”。

而在西方教会，随着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时代在公元四世纪、公元五世纪的解体与破败，罗马教宗体系饱经风霜、生死存亡、无数的患难、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一本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著名的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以及他的《上帝之城》。这本书讲述了，根据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所谓上帝的国度、上帝之城，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长达上千年的中世纪历史中，西欧从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但是，却有一个统一的教会体系，就是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天主教教会体系。

我们会在其他文字中，继续深入讨论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历史之间的比较，以及他们两者之间的短长、利弊、得失；并从中反思，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以及，基督教信仰与世上国度、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文明体系之间的深刻关系，应当是怎样的。

中世纪与近现代之间的分水岭

公元十五世纪是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正式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近现代历史的开始。此时，一方面，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的突厥人攻陷，因而，整个欧洲大陆与东方地区之间的贸易枢纽、中枢节点被强行隔断。从此，西欧各国开始大兴海上贸易，从而使得曾经位于西欧文明边缘地带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成为海上强国，纷纷在经济政治上依次崛起。

另一方面，从公元十五世纪，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邦为中心，因着一个开始于美第奇家族的长达约两百年左右的统治，开始了一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艺术文化运动，以及，与此同时的、罗马天主教体系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美第奇家族供养了许多后来极为著名的艺术家，包括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人。这些艺术家回归基督教信仰临到欧洲之前的时期的希腊艺术风格，以绘画和雕塑人体为美、为荣。美第奇家族积极地涉足政治与宗教领域，甚至有的家族成员自己成为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教皇。美第奇家族的奢靡与腐败之风，加重了罗马天主教本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的弊病。

天主教与东正教的谬误

自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当圣经新旧约全书被从原文（旧约是希伯来文，新

约是希腊文)翻译成罗马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以后,罗马教宗系统就开始逐渐把圣经束之高阁,使普通人无法轻易接触到、阅读到圣经。在公元十六世纪以前的长达一千年中,西欧各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只能从教会的神职人员那里聆听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没有机会自己去阅读圣经、上帝的话语。

在教义方面,天主教系统添加了许多圣经本身没有、甚至是圣经明文反对的内容,例如,不恰当地高举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地位,甚至称之为圣母、上帝之母,以及,把历世历代的许多基督教使徒们、圣徒们当作偶像崇拜、向他们顶礼膜拜、祈祷、祈求庇佑(在这些方面,东正教与天主教存在着同样的谬误,即,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圣经本身的教义和教导,而在后世添加了一些违背、偏离圣经内容的教导、信条)。而且,天主教还在后世自行添加了一些伪经、次经,以及向圣母玛利亚祈祷、敬拜的玫瑰经,等等。

好在,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纷争与分裂状态,虽然是一件很不好、极其令人伤心的事情,但是,这种状态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可信地保证了,圣经新旧约全书本身,一直被精心地、忠实地保存着,直至后世,因为天主教与东正教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互相监督、有力督责的效果。

并且,尽管天主教与东正教中存在许多谬误和偏差,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他们的主流信仰、主干教义、主要信条,例如“使徒信经”等对于基督教信仰教义的总结,是正确的。所以,在天主教与东正教里面的信众,如

果真心地、真诚地、热忱地寻求和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以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说，他们是良善的、真诚的基督徒——尽管，我们应当诚实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圣经的广泛翻译传播，以及近现代时代的开始

公元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君士坦丁堡被突厥人攻占、拜占庭帝国灭亡，东方教会保存的希腊文的圣经原典以及许多其他希腊文写成的著名基督教历史文献和著作，被教会人士抢救、传播到西方教会体系。这些希腊文的文献以及圣经原典，开始让西欧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罗马教会的圣经拉丁语译本，在一些重要教义方面的词汇概念上，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失误或偏差。

几乎与此同时，欧洲发生了许多历史意义影响深远的事情。我们仅举以下三件极其重要而著名的事情为例。

第一件事情是，金属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大规模、迅速地、廉价地印刷、传播纸质书籍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第二件事情是，罗马教宗的教义上的谬误，以及财物方面的奢侈腐败作风，终于激起了教会各级神职人员以及普通基督徒们的反抗。以德国的马丁路德为代表，一大批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反抗教廷、传播圣经、

传播真正纯正的福音与基督教信仰教义。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为德语，极大地推动了圣经在社会中的普及化、广泛传播。

第三件事情是，英国的丁道尔开始把圣经翻译成英语。这些圣经翻译运动本身，直接导致了现代德语书面语、现代英语书面语等等的诞生，因为在那之前，西欧的书面语言只有一种，就是拉丁语。

圣经的广泛传播，使得欧洲的无数普通人开始真正地、详尽地明白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原则、精髓；这些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深刻地革新、更正了欧洲各国人民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方面的许多认识与观念。这样的革新与更正，直接地推动了一现代科学的开启；以及，现代民主自由政治运动、法律、经济等等许多方面的变革，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开。

这些事情，推动了、构成了过去五百年来的欧洲近现代史，并进而，对于全世界的文明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影响作用。今天，每一个出门坐火车汽车飞机、早上吃牛奶面包、上班穿西服革履、住在高楼大厦或四季温暖如春之庭院别墅里的人，都要感谢培根、牛顿、波义耳等现代科学的开启者们，更要感谢那些舍生忘死地传播圣经、传播基督福音的敬虔基督徒们。

基督教会简史的总结与反思

从上面的简史中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基督降生以来两千年的历史中，每当人们贴近圣经、寻求圣经、明白圣经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展现出热忱、敬虔、谦卑、真挚、积极的信仰，他们的生命就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与国家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也发生极其巨大的改变；上帝的祝福就极大地、温暖地、令人震撼地临到他们。

反之，当人们沉浸在自己的罪性与私欲中，沉浸在彼此的纷争中，当人们没有真诚地、认真地、热忱地寻求上帝的话语、信仰的真理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生命就显出冷漠、消极、惰怠的样式，他们的道德就不断滑坡，他们整个社会与国家就充满了许多动荡、败坏之事。

从基督教会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反思。

一，上帝的国度，虽然表现在地上的教会中，但是，从终极的意义与层面而言，基督的国度不属于这地上的任何地方，而是属灵的、属乎天上、那永远的国度与家乡。

二，然而，这并不是说，基督教信仰在这个地上就没有：——确定的、明晰的、任何人都无可否认的见证。事实上，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道主义、人的生命与自由被极其重视，到艺术文化、经济与科学的大发展等等，——在无数的层面上，现代人类文明都被深深地刻下了基督教信仰的烙印。（读者可以阅读《基督教的果实》《基督教信仰之大众证据》《基督教信仰之证据的反思》等系列书籍，进一步查考这些方面的事实与

信息。)

三，但是，在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之间，是无法划等号的。前者固然在极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了后者，但是，后者中包含着许多其他方面的成分与因素，甚至包含了无数的糟粕、不义、败坏、奢侈、贪婪、淫乱，等等。

那些感叹“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没有全部改变欧洲人、使全体西方人都成为基督教圣徒，或是为什么没有彻底消灭那些罪恶的恶人”的人们，并不明白：——上帝是公义、圣洁、慈爱与恩典的，他的终极道德审判必将来临，他的终极惩罚是永远的；然而，他以恩典与慈爱，给世人悔改己罪的时间与机会，使他们真心地、真诚地、而不是被强迫地，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上帝的无限公义与权柄，到那终极的审判日，必将昭然地显明在一切世人的眼前。

四，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对于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明不太了解、不求甚解的人，常常把这两者看为同等呢？

这一方面是由于，许多世人并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福音的真正涵义：——“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人在世上应当勤勉而敬虔地生活、工作，但是却不应当把心系于这个世界，以这个世界、或其中任何被造之物为心灵的归依”；尤其是不了解基督教信仰、与世上之国关系的教义：——“基督的国度属乎天上，而不属乎地上；真诚、谦卑的基督徒应当在这个世上作盐、作光，把基督的爱带给世人，见证福音的

真实，见证耶稣基督伟大、圣洁的爱；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温柔的福音，是圣洁的福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烛火他不吹灭。”

另一方面是由于，世人因着自己生命中的罪性，因着自己的心系于这世上的国度与荣华，所以，常常误以为，神的作为和果效，是要终极地显示在这个地上的世界中。他们把世上的荣华璀璨、建筑物的宏伟绚丽、人群的花盖云集，错误地当成了天国里的永远荣耀。他们总是以为，非得要通过外在的、表面光鲜的“荣光”，来看待那些属灵的、属天的、属乎道德的事情。

五，基督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影响最大，特点也最独特的宗教信仰。它虽然指出，我们不应当以这个被造的世界或是其中任何被造之物、被造之人为我们心灵的依归，而是要单单地敬拜那位创造宇宙天地、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但是，它不是像佛教那样抱着虚无、万事皆空、不垢不净、不生不灭、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诸相皆虚妄的态度，以否定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世事。它告诉我们，应当积极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谦卑、温柔、真诚、和平的心，以勤勉、专诚的工作，去面对一切事情、一切世人。

它虽然指出，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的造物主、生命之主、永生之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上帝是我们道德律法的颁布者、是圣洁公义而全能的终极道德审判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谦卑地降身为一人，生在马槽里，生在律法下，取了奴仆的样式，甚至谦卑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恩，使一切相信他、接受他救恩的

人，得到永生，得以进入那永远的天国、得享那永远的幸福与美好。

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用火与剑传教、荼毒、劫掠，而是用谦卑、慈爱、怜恤与和平的方式，把福音向世界分享。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推行、奉行政教合一的教义与制度，更不是要在地上建立起什么伟大的、属世的国家；它不是要以严刑峻法来统治臣民，更不是要让整个社会万马齐喑、丧失活力与创造力。在圣经福音书中，耶稣基督清楚地说道：“我的国属乎天上，而不是属乎地上”。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基督教信仰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良善影响是最大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

+++++

+++++

+++++

+++++

【引述 哥林多前书1章 这个世界并不能凭智慧认识上帝；他们所作的，只是费尽心力地失去了神】

哥林多前书.

1.

奉 神旨意蒙召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苏提尼弟兄，

写信给在哥林多 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被分别为圣，蒙召为圣徒的人，和所有在各地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我因着 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恩典，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 神，

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都富足，很有口才，知识丰富，

就如我们为基督所作的见证在你们中间得到坚立一样，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殷切盼望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

他也必坚定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摘。

神是信实的，他呼召了你们，是要你们与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连合在一起。

弟兄们，我凭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大家要同心，在你们中间不要分党，只要在同一的心思、同一的意念上团结起来。

我的弟兄们，革来氏家里的人向我提到你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我是保罗派的，我是亚波罗派的，我是矶法派的，我是基督派的。

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受洗是归入保罗的名下吗？

我感谢 神，除了基利司布和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任何人施过洗，

所以你们没有人可以说是受洗归入我名下的。

我也给司提反一家的人施过洗；此外，有没有给别人施过洗，我就不记得了。

基督差遣我，不是要我去施洗，而是去传福音；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论去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效力。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 神的大能。

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经学家在哪里？今世的辩士在哪里？ 神不是使属世的智慧变成了愚笨吗？

因为在 神的智慧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能认识 神， 神就乐意借着所传的愚笨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

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找智慧，

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

但对那些蒙召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基督是 神的能力， 神的智

慧。

因为 神的愚笨总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

弟兄们，你们想想，你们这些蒙召的，按人来看有智慧的不多，有权势的不多，出身尊贵的也不多。

但是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使那些刚强的羞愧。

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

使所有的人在 神面前都不能自夸。

你们因着 神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和救赎，

正如经上所说的：“夸口的应当靠着主夸口。”

【引述 圣经箴言 敬畏神，是人智慧的开端】

箴言.

9.

智慧建造自己的房屋，凿成七根柱子。

它宰杀牲口，调配美酒，摆设筵席。

它差派几个使女出去，自己又在城里的高处呼喊：

“谁是愚蒙人，可以到这里来！”又对无知的人说：

“你们都来，吃我的饼，喝我调配的酒。

愚蒙人哪！你们要丢弃愚蒙，就可以存活，并且要走在智慧的道路。”

纠正好讥笑人的，必自招耻辱；责备恶人的，必遭受羞辱。

你不要责备好讥笑人的，免得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

教导智慧人，他就越有智慧；指教义人，他就增加学问。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

因为借着，你的日子就必增多，你一生的年岁也必加添。

如果你有智慧，你的智慧必使你得益；如果你讥笑人，你就必独自担当一切后果。

愚昧的妇人喧哗不停，她是愚蒙，一无所知。

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向过路的人呼叫，就是向往前直行的人呼叫：

“谁是愚蒙人，可以到这里来！”又对无知的人说：

“偷来的水是甜的，在暗中吃的饼是美味的。”

人却不知道她那里充满阴魂，她的客人是在阴间的深处。

+++++

+++++

+++++

+++++

+++++

+++++

【引述 《论民主》人的真正利益是在于什么；社会的真正价值和目的意义在于什么】

社会契约、人生价值与目的

=====

教会与社会

基督教会是上帝百姓子民的集合体。社会是世上人群的集合体。在这两者之间，一个是上帝之国度，一个是地上的国度。在地上可见教会中，有时，也常会有虚伪之徒。在世上万国之中，有神所呼召的、必将要属他的人。那全知的永生之神，知道每一个属他的百姓子民。

教会是神的百姓、上帝子民在地上的见证。在人类历史上，基督教会对于无数的国家社会、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塑造作用。在这方面，有无数的事例。比如，一些简单的例子包括，今天，在我们生活中的一夫一妻制法律【不到一个世纪以前，在中国、以及世上许多其他国家，一夫多妻制还是一件合法的事情，而且还是一件让很多男人感到羡慕和荣耀的事情。直到今天，在中东、非洲等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地区，一夫多妻制还仍然非常流行，因为伊斯兰教的可兰经明文允许人可以同时娶四个妻子。一百年前，在中国古代的许多个世纪历史中，中国妇女还裹小脚；直到西方传教士在一个半世纪以前进入中国，并大声呼吁阻止这样的事情，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改变】、公共医院体系【现代医学的诞生本身，以及公共医院的建立、医护院校的建立、等等，都是在基督教会的推动下而导致产生的。在中国，所有的医院门上都有红十字的标记，因为中国的公共医院系统的建立是始于西方传教士来华所建立的】、公共教育体系【一百多年前，在中国还没有公共教育体系，

没有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小学、中学、大学。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体系，一开始都是来自于一百多年前西方来华传教士所首先创立的诸多学校。在西方国家历史上，小学、中学、大学的建立，也都是由于基督教会的直接推动而导致的】，等等，都是来自于基督教会的大力推动和影响。

事实上，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也是从基督教会开始的。自从十六世纪初马丁路德所代表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以来，在基督教会内部组织结构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革新。基督教会的组织形式从天主教体系内的各级主教与神职人员所组成的金字塔式组织治理结构，逐渐演变为基督徒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平等的会众主义组织结构。在今天的基督教会中，例如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教会等体系内，教会的执事、长老等组织结构人员基本上都是由教会的会众选举产生的。这种教会组织结构的变革，最终深刻影响了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导致了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建立。【例如，读者可以参考《五月花号之天路者的故事》一书，从中可以看见美国的最初起源。】

以弗所书5章

22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象顺服主一样，23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象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24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25你们作丈夫的，要爱妻子，好象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26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27可以作荣耀的教会归给自己，甚么污点皱纹等也没有，而是圣洁没

有瑕疵的。28丈夫也应当这样爱妻子，好象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了。29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好象基督对教会一样，30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31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32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33无论怎样，你们各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象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敬重丈夫。

=====

契约与联合

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彼此相处在一起，就像是互相以契约的形式，共同处于一个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之下。这种社会契约，是建基于彼此信任、诚信、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从根本上说，社会契约的根基，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仁爱，更首先是在于人对于上帝的敬畏与热爱。我们人生的目的与终极价值，不是在于地上的荣华，而是在于得到上帝的悦纳，进入那无限幸福美好与永生的国度之中。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祂，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当人与上帝和好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才可能真正地和好。只有当人的心中对上帝的敬畏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才可能有真正的诚信。只有当人得到了上帝的饶恕恩典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才能

够真正地彼此饶恕、包容与原谅。

=====

社会契约论

当我们认识到信仰的真正价值与意义的时候，当我们明白——应当怎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怎样持守和见证我们的信仰、怎样面对世事、怎样与人相处、怎样思考社会与人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认真地思考，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与制度中的一些重要而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并在社会制度层面上，进行科学而仔细的设计与规划。

卢梭所著的《社会契约论》描述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些基本运作原理和原则。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究其根本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真正根基，应当是爱。只有在爱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彼此包容、饶恕、接纳、信任、合作、协调。人与人之间，本应当是兄弟姐妹。这样的弟兄之爱，唯有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慈爱、圣洁公义。

=====

人怎样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当以热忱的信仰与生命，荣神益人。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我们的神，并爱人如己。我们应当在一切事情以及言语行为中，仰望我们的造物主、救赎主。我们所作的一切事情，都应当是为了归荣耀于神。因此，我们应当爱人如己，应当尽一切力量与生命，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之中的恩典与大能。

++++
++++
++++
++++
++++
++++
++++

+++++

马太福音5-7章

1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2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3“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4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6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7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8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 神。

9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10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11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12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

门徒作盐作光（可9:50；路14:34~35）

13“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盐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结果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14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15人点了灯，不会放在量器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16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

论律法

17“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18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19因此，无论谁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这样教导人，他在天国中必称为最小的；但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称为大。20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必不能进天国。

不可恨人（路12:58~59）

21“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22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人若说弟兄是‘拉加’，必被公议会审判；人若说弟兄是‘摩利’，必难逃地狱的火。23所以你在祭坛上献供物的时候，如果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满，24就当在坛前放下供物，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供物。25趁着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快与他和解，免得他抓你去见法官，法官把你交给狱警，关在监里。26我实在告诉你，除非你还清最后一分钱，否则决不能从那里出来。

不可动淫念

27“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不可奸淫。’28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29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地狱里。30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进到地狱里去。

不可休妻（太19:9；可10:11~12；路16:18）

31“又有这样的吩咐：‘人若休妻，就应当给她休书。’32可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如果不是因她不贞，就是促使她犯奸淫；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奸淫了。

不可发誓

33“你们又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背约，向主许的愿都要偿还。’34可是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着天发誓，因为天是 神的宝座；35不可指着地发誓，因为地是 神的脚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发誓，因为它是大君王的京城；36也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

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37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不可报复（路6:29~30）

38“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39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40有人要告你，想拿你的衬衫，就连外套也让他拿去。41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就陪他走两里。42有求你的，就给他；想借贷的，也不可拒绝。

当爱仇敌（路6:27~28、32~36）

43“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47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甚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48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1“你们小心，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让他们看见；如果这样，就得不到你们天父的赏赐。2因此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到处张扬，好象伪君子在会堂和街上所作的一样，以博取众人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3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4好使你的施舍是在隐密中行的。你父在隐密中察看，必定报答你。

如何祷告（路11:2~4）

5“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像伪君子；他们喜欢在会堂和路口站着祈祷，好

让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6但你祈祷的时候，要进到密室里去，关上门，向在隐密中的父祈祷。你父在隐密中察看，必定报答你。7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重复无意义的话，像教外人一样，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8你们不可像他们，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先，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9所以你们要这样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10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一样。

11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

求你今天赐给我们；

12赦免我们的罪债，

好象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

13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14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15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禁食不让人知

16“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伪君子那样愁眉苦脸，他们装成难看的样子，

叫人看出他们在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17可是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18不要叫人看出你在禁食，只让在隐密中的父看见。你父在隐密中察看，必定报答你。

积财于天（路12:32~34）

19“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侵蚀，也有贼挖洞来偷。20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锈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21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里面的光（路11:34~36）

22“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都明亮；23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都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

不要为明天忧虑（路12:22~31）

24“一个人不能服事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事 神，又服事金钱。25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甚么喝甚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甚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26你们看天空的飞鸟：牠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牠们；难道你们不比牠们更宝贵吗？27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28何必为衣服忧虑呢？试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它们不劳苦，也不纺织。29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30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 神尚且这样妆扮它们；小信的人哪，何况你们呢？31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甚么？喝甚么？穿甚么？’32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34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1“不可判断人，免得你们被判断。2你们怎样判断人，也必怎样被判断；你们用甚么标准衡量人，也必照样被衡量。3为甚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4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弟兄说：‘让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5伪君子啊！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才可以看得清楚，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6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免得牠们用脚把珍珠践踏，又转过来猛噬你们。

祈求就必得着

7“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8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9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儿子向他要饼，反给他石头；10要鱼，反给他蛇呢？11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更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12所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

13“你们当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14但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路6:43~44）

15“提防假先知！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当中，里面却是残暴的狼。16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里怎能摘到葡萄？蒺藜里怎能摘到无花果呢？17照样，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18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19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被砍下来，丢在火中。20因此你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21“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22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过许多神迹吗？’23但我必向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听道要行道（路6:47~49）

24“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就像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盘石上。25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盘石上。26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遵行的，就像愚蠢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27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

28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29因为耶稣教导他们，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

+++++

+++++

+++++

+++++

+++++

+++++

+++++

+++++

+++++

人生的价值与目的

【引述：马太亨利圣经注释序言】

信仰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认识、热爱、敬畏我们的造物主、神，并在我们一切的事情、行动和交谈中以热忱的情感仰望他，遵守他的诫命（传 12：13）；无疑地，这才是一个人的全部意义；这是一个人的全部价值所在。在《传道书》中的许多讲述之后，得出的最后结论，就在于此；所以，我也把这个原则当作是整件事情的根本基础。一般性地，这是对一切人类所必需的；这世上如果没有信仰，那么，人的荣耀也就无处得以保守；人类社会的秩序也根本无法得以保持。具体地，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也必需要有敬虔的信仰；否则，我们就无以回应我们受造的目的所在，无以回应我们造物主对我们的恩惠，我们的内心也不会安稳轻省，更永远也不会有幸福。一个人，被造物主赋予了心灵和理解的能力，能够明晓、服事、享受自己的造物主；但是，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眼目和心中却全然忘记了神，那么，他就是日光之下的一只最可鄙、最可悲的

动物。

=====

上帝之国

约翰福音18章36-38节：

36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就要作战，使我不至被交给犹太人。不过，我的国不是这世上的。”37于是彼拉多问他：“那么，你是王吗？”耶稣说：“我是王，你已经说了。我要为真理作见证，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凡是属于真理的人，都听我的声音。”38彼拉多问他：“真理是甚么？”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基督在接下来的回答中，对彼拉多的前一个问题，即“你是王吗”作了更完全和直接的回答，解释在什么意义上他是王，但不是在任何方面危及罗马政府的王，不是一位世俗的王，因为他的利益不是用世俗的方法支持，约18:36。请留意，

[1.] 对基督的国的本质与构成的叙述：它不属这世界。这是用否定的说法纠正当前人对它的错误看法；但这隐含了肯定的事，它是天国，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基督是一位君王，有一个国，但这国它不属这世界。第一，它不是从这世界兴起；人的国从海里从地中上来（但7:3；启13:1, 11）；但圣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启21:2。他的国不是通过继承，选举或征服而立，而是藉着神旨意和计划直接和特别任命。第二，它的本质不是属世界的；它是在一个在人心里的国（路17:21），建立在他们心里和良心里（罗14:17），它的财富是属灵的，它的能力是属灵的，它一切的荣耀在于内。基督国中的国务大臣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林前2:12。第三，守卫和支持它的不是这世上的；它的兵器是属灵的，它不需要、也不使用世俗的势力来维持和扩展，也不是用与列王和各省有害的方法治国；它丝毫不干预君王的特权或他们臣民的财产；它不是为了改变在世俗之事方面任何国家的建制，除了罪和撒但的国以外，不与任何国作对。第四，它的趋势和目的不是这世上的。基督不追求，也不容他的门徒追求地上的尊贵人的排场和权柄。第五，它的臣民虽然在这世上，却不属世界；他们从世界中蒙召被拣选，从另一个世界生，往另一个世界去；他们既不是这世界的学生，也不是它的宠儿，既不受这世界智慧的规管，也不因这世界的财富致富。

[2.] 提出基督的国属灵本质的一个证据。如果他要反抗政府，他就会用他们自己的武器反对他们，就会按同样性质以暴制暴；但是他没有走这条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我的国被他们败坏。”但是，第一，跟从他的人没有提

出要争战；没有暴动，没有拯救他的企图，虽然此时城里满了加利利人，他的朋友和同乡，一般他们都有武装；但在这重大时刻他门徒和平的表现足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第二，他没有命令他们争战；并且他禁止他们争战，这证明他既不依靠世界的帮助（因他本可以传召十二营天使为他服务，这表明他的国是从上头来的），也不惧怕世界的拦阻，因为他非常愿意被交给犹太人，因为他知道，他的国要是推进和建立，任何世上的国就会如何被毁；所以他正当地得出结论，现在你可以看到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在这世界，但不属这世界。

(5.) 他回答彼拉多进一步的提问，就更直接加以回答，约18:37，我们在当中看到，[1.] 彼拉多直截了当的问题：“这样，你是王吗？你说你有一个国；到底你是谁，你是王吗？对这样的宣告，你有什么说法？你自己解释吧。”[2.] 作为对此的回答，我们的主耶稣在本丢彼拉多面前作美好见证（提前6:13）：“你说我是王，就是，按你说的，我是王；因为我来给真理作见证。”第一，他承认自己是王，但不是按照彼拉多所指的意思。弥赛亚是按照王，弥赛亚王的身份受人期待；所以，他向该亚法承认了他是基督，就不会面对彼拉多，不承认他是王，免得他似乎自己前后不一。请注意，虽然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但即使这样，他仍有充分根据宣告拥有王的尊荣与权柄。第二，他解释自己的话，表明他如何是王，就是他来给真理作见证；他通过真理的大能在人心中作王。如果他要宣告自己是世上的王，他就会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作万民的王，征服诸王，占有诸国；”不是的，他来作见证，见证创造世界的神，见证反对败坏世界的罪，通过他见证的道，他建立并维护他的国。圣经预言他要作万民的见证，并且作为这样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赛 55:4。基督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世界诚实少见（赛59:15, *Qui nescit dissimulare, nescit regnare* — 人不能作假，就不知如何作王），而是属于真理永远作王的那世界。基督到世上来的使命，他在世上的工作，就是给真理作见证。 1. 启示真理，向世人显明关于神、他的旨意和他对人的美意，约

1:18; 约17:26, 而没有他给真理见证, 人是不可能认识这一切的。2. 证实真理, 罗15:8。通过他行的神迹, 他为信仰的真理, 神的启示、神的完全和护理的真理, 以及他的应许和约的真理作见证, 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通过如此行、他是王, 建立起一个国度。(1.) 基督的国的根基和权柄, 精义和特征, 是真理, 属神的真理。当他说, “我是真理”, 他实际上是在说, 我是王。他用真理那说服人的证据征服; 他用真理命令的权柄统治, 为真理, 赫然坐车前往, 无不得胜, 诗 45:4。他要用他的真理信实审判万民, 诗96:13。真理是他国的权杖; 他以慈绳吸引人, 以向我们启示, 因对他的爱被我们接受的真理吸引人; 就这样他将人心意夺回顺服。他到世上来乃是光, 就像日头用光线作王一样作王。(2.) 这国的臣民是属真理的人。被神的恩典从说谎人的父的权势下拯救出来, 所有被改变来领受真理, 服从真理的权柄和影响的人, 都要听基督的声音, 要成为他的臣民, 要相信他, 真正忠心于他。每一个对真信仰有任何真认识的人, 都要接受基督教信仰, 他们属于他的国度; 使用真理的大能, 他要使他们甘心, 诗 90:3。所有爱真理的人, 都要听基督的声音, 因为除了在基督里, 哪里都找不到更伟大、更美好、更确实和更甜美的诸般真理, 真理和恩典由他而来, 因着听基督的声音,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 约壹 3:19。

(6.) 彼拉多为此向他提了一个好问题, 但不等回答, 约18:38。他说, “真理是什么呢?” 说了这话, 又出来。

[1.] 肯定这是一个好问题, 是向一位无人比他更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发问。真理是那颗重价的珠子, 人的悟性愿意并追求要得到它; 因为不得到它, 或至少那被认为是真理的, 悟性就不能歇息。当我们查考圣经, 领受神话语的事奉, 这查考一定要这样询问, 真理是什么呢? 并带着这祈求, 求你带领我进入你的真理, 进入一切的真理。但是很多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并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 在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中坚忍到底, 或者没有足够的谦卑和真诚, 在找到真理的时候领受, 提后3:7。就这样, 许多人

面对他们自己的良心，问良心这些不可缺的问题，“我是谁？”“我做了什么？”但却不花时间寻求答案。

[2.] 不肯定彼拉多问这个问题有何目的。第一，也许他说这话，就像一个开始对基督有好感，带着某种敬意看他的人那样，为要学习，希望了解在信仰和学问方面他可以进一步有的新观念，自称可以有怎样的进步。但虽然他希望从他那里听到一些新的道理，就像希律希望从他那里看见一些神迹一样，但在他门口祭司们的暴徒的喧嚷和大怒，让他不得不突然中止这谈话。第二，一些人认为他是作为一名审判官说这话，进一步查问现在被带到他面前的这案情：“让我看看这神秘的事，告诉我它有什么真理在其中，这件事真实的情况。”第三，其他人认为他是讥笑着说这番话，是一个嘲笑的人：“你说到真理；你能说什么是真理吗，或者给我一个真理的定义？”就这样他取笑永远的福音，大祭司仇恨和逼迫，基督现在为此作见证和受苦的那伟大真理；他就好像喜欢讥笑所有信仰的无信仰之人那样，对双方发出嘲笑；所以基督不回答他。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但是，虽然基督不愿告诉彼拉多真理是什么，他却已经告诉了他的门徒，并且通过他们告诉了我们，约14：6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不，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7如果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了他。”

+++++

+++++

+++++

+++++

+++++

[illegible]

【B.2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负面效果、影响、以及机理】

文革期间的负面行为与效果，以及其分别各项的根本原因：——举例：

——道德沦丧（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原因：实用主义】；

——唯物主义【原因：没有对于上天的信仰】；

——人格崇拜【原因：见 圣经罗马书1章】；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

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

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神的荣耀。

因此，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

他们用虚谎取代了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

——经济政策的愚昧（与建基于“人民伟大”的错误观念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根源所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根源之一就在于，它仅仅看到集体主义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看到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重要性，也没有看到“创意”、“发明”、“投资”等等，对于社会中的瞬息万变、百般复杂的动态经济活动的极端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的眼中，经济活动只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模式化劳动【所以才有“再生产”、“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劳动剩余价值”、等等大而化之的、并不完全准确的、描述经济生产活动的一

系列粗糙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个体主义的精神、灵魂、思想活力、创意发明、投资冒险、等等，都远远没有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人类被被过于简单化地、大而化之地、人为地、被划分成“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剥削阶级”、“劳动阶级”等等粗糙的类别和区分符号。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却欺谎地、虚浮地，故意无视、忽视、蔑视——在人类之中，各种思想活动、创造发明、诚实探索、投资收获、等等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愚蠢地把人类经济活动的理想，硬性地规定成一种无私奉献、全民为公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不公不义地、没有公正之心地，藐视、蔑视、无视那些创造发明者、承担投资风险者、为人类经济生产活动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们的重要价值。固然，人类的经济生产活动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必须应当兼顾公平、仁慈、怜恤、扶助贫困者；但是同时，公正、公义、效率、创意、投资、收获、责任、“责权利”紧密结合，也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详情请见本章前文所引述的《论民主》中，关于“在一个社会中，有效的经济运行模式”。】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暴政【善与恶的分别、概念、定义】；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给中国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空前的暴政。自从秦始皇以后，在1911年晚清灭亡之前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中国社会一直处于高度中央集权、高度皇权统治政府架构之下，但是，中国古代的那种专制主义制度，与1949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专制统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1911年以前的中国古代，一直有着“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即，皇权中央政府的权力，仅仅是延伸于、掌控县级以上的

政府运作、官员任免、选拔调配等等；而在县级以下，中国各地主要是依据当地的乡绅、凭着传统儒家文化、族亲治理，而进行经济文化自治。但是，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对于中国社会进行了铁桶一般的强悍治理，以至于，人身桎梏、思想桎梏、经济桎梏、官本位文化、知识分子犬儒化、等等，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遍及程度。这种变化，固然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现代科技使得这种高度集权统治成为可能（例如，高效的通信和交通手段都是古代社会所无法实施的），但更在本质层面上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念、专制主义意识形态，远远地超过了古代中国社会传统文化思想。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直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虽然，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体系在经济方面实施了很多自由化改革措施，但是，——从社会生活的总体层面而言，——言论桎梏、思想桎梏、人身桎梏、经济桎梏等等，在很多方面不但没有减弱，甚至，——在某些方面，由于现在的专制政府实力更加强大、经济资源更深厚，所以反而更加变本加厉、有着更加严酷的、密不透风的专制暴政统治特征。

马克思主义暴政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它没有正确地看到，什么是真正的良善，什么是真正的罪恶。固然，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是，要进行阶级斗争、解放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等等；但是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看到，在人类社会中，道德法则的真正根基是在于什么，什么是对于他人的真正良善。马克思主义愚妄地否认上天、上帝，愚妄地推崇唯物主义、无神主义；它杀气腾腾地振臂高呼，劳动人民是伟大光荣的，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应当被彻底消灭。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盲点正是在于，什么是公义？公平正义的法则，究竟在于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地爱主我们的上帝。第二，我们应当爱人如己。

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法则、公义、公理、平等、正义、公正，必须建基于那源自于造物主的公义圣洁之道德法则的基础之上。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是道德法则的颁布者、更是终极的审判者、鉴察者。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他把公义圣洁的道德法则放置在每一个世人的良知之中。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欺骗、谎言、强暴、贪婪、偷窃、奸淫、嫉妒、公平、诚实、仁慈、怜恤、温柔、和平、仁爱、等等等等。然而，世人却常常活在罪中；他们的生命本质中充满了罪性与罪行；他们自以为义，内心没有谦卑与悔改之情。

人与人之间的良善，必须建基于人在内心深处对于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的敬畏。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法则，必需是建基于超自然的起源、权柄、价值、意义、归宿。如果离开了那伟大、公义、圣洁的上天、上帝，如果离开了超自然的、永恒的权柄、价值与意义，那么，道德就成了功利主义的奴隶，真理就成了强权的丫鬟。任何人，无论多么伟大、良善，或是多么卑鄙、罪恶，都终将要面临死亡。在死亡面前，任何属世的

道德说教，不论多么冠冕堂皇、美丽动听，都是软弱无力的、甚至是滑稽的。

什么是善？遵从神、倚靠他、寻求那真理的泉源、寻求和倚靠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道德法则之终极根基，就是善。什么是恶？背离神、不信靠他、不寻求那真理的泉源、不寻求和倚靠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道德法则之终极根基，就是恶。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想是，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建立起公有制经济的、消灭剥削阶级的、平等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然而，极端讽刺的现实是，正如二十世纪世界上那些很多其他的共产党政权一样【例如，苏联的大清洗、大饥荒、残酷的劳改营、等等；北朝鲜的大饥荒、整个国家社会的极度贫穷落后；古巴的长期经济桎梏、思想桎梏；柬埔寨的大屠杀导致本国三分之一人口被杀、知识分子消亡殆尽；越南战争中的惨烈与残酷；等等等等】，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空前的暴政，带来了巨大的、罄竹难书的痛苦、灾难、祸患、罪恶、道德沦丧、死亡、等等等等。并且，由于中国社会的庞大人口，因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造成最大规模人员丧生的政权；毛泽东本人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导致了最多人数的非正常死亡的暴君独裁者。仅仅在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权的几年之内，在暴力土地改革、以及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就有数以百万计人员被野蛮地杀害、法外处决【即，没有经过公正公开的司法审判，就在混乱

喧嚣的政治运动集会中，展开公然屠杀和处决行动】；后来，——在反右运动中，有数以百万计知识分子、右派分子等等被强迫劳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朝鲜战争中，为了帮助独裁者金日成的侵略南韩的战争、挽救金日成不被联合国军击败，数十万被送到朝鲜半岛的中国士兵死于惨烈的战争；在大跃进大饥荒中，有4000万至5000万平民百姓死于饥饿，很多人甚至易子相食【互相交换吃对方的孩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数百万人死于武斗、内战、批斗、等等；全国人民处于长期的赤贫状态之中，甚至到1970年代末的时候，全国经济近乎崩溃。1980年代以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那么，中国共产党或许很可能像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那样，早已经垮台了。然而，从198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至今的四十年中，虽然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采取了开放和自由化改革措施，但是，在其他领域、尤其是思想领域、言论领域、人事领域，中国共产党仍然牢牢地实行铁桶一般的暴力统治；直至今日，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地区不平等、行业不平等、官本位文化、犬儒主义、等等；而且，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中的许多人，在七十年的严密谎言思想灌输和洗脑之下，甚至更加变本加厉地仇视西方文明、拒绝民主自由普世价值观念、拒绝敬虔真挚谦卑热忱的真正信仰。今天的中国，距离一个成熟、公正、自由的现代民主主义政治制度，还有非常非常遥远的路程。

——平等的幻象与不平等的现实【例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出身差距、性别差距、经济差距...】【原因：乌托邦、现实主义、与欺谎者】；

—人身禁锢、思想禁锢、经济禁锢【原因：什么是真正的爱；憎恨罪与爱罪人】；

人与人之间的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也是最美的事情，而且，爱首先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尊重。那种在口头上高呼“爱”、但却在实际行动上不尊重对方的自由、心灵、选择权利的人，并不懂得什么是爱。这样的人，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所做之事是在为对方好，但是，他们仅仅是欺骗地、虚伪地凌驾于他人意志之上，越俎代庖地为对方做选择、做决定。这样的人、思想、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中往往会导致专制暴政，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意志强加于人，并在肉体上消灭、打击、禁锢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或是思想观念。

我们作为上天的儿女，活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彼此为弟兄姐妹，应当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应当憎恨罪、但是爱罪人。真正的爱，应当是满有恩慈、并且“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引述 哥林多前书13章】

哥林多前书.

13.

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

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存不息的。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

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部分的就要过去了。

我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既然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

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像主完全知道我一样。

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贫穷与奴役【富裕来自于什么；自由来自于什么；顺服与奴隶，自由与放荡】。

在一个社会中，只有当人们处于朝气蓬勃、自由、充满活力的时候，只有当人们群策群力、勤劳奋进的时候，这个社会才会进入发达富裕的经济状态。反之，若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没有自由，而是处于思想禁锢、人身禁锢、经济禁锢、言论禁锢等等状态中，那么，从长期而言，这个社会也必然沉陷在贫穷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真正的自由，必然是来自于敬虔真挚谦卑热忱的真正信仰。当一个社会中失去了那对于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的敬虔信仰的时候，人们就往往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喧嚣混乱、或是专制主义的万马齐喑状态中。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真正的顺服，只有奴隶；没有真正的自由，只有淫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圣经 “你们必晓得真理，因为真理必叫你们得到自由”】

约翰福音8章32节：于是耶稣对信了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必定认识真理，真理必定使你们自由。”

【引述 《基督教的果实》 关于社会富裕】

原著者：CHARLES CROSLEGH

原著出版日期：1884年

原著第五章 基督教信仰与物质繁荣

马太福音6章24-34节：“一个人不能服事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事 神，又服事金钱。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你们看天空的飞鸟：它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们；难道你们不比它们更宝贵吗？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何必为衣服忧虑呢？试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它们不劳苦，也不纺织。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 神尚且这样妆扮它们；小信的人哪，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

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心系于世上的繁华与物质的享受，也不要为那些事情而心中忧虑。基督来到这世上，就是要把我们罪中拯救出来。我们心所向往与渴慕的对象应当是上帝的国与上帝的公义。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大奖赏，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物质利益，而是天国中那真正的、不能朽坏的、不能衰残的、不能玷污的永远奖赏。

然而，另一方面，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不仅把圣洁带入我们的生命之中，不仅把永生的应许与恩典赐给我们，而且，也让我们在此生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更加充满希望。那看顾着野地百合花之荣耀的天父，也必定会看顾我们的身体与饮食的需要。

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清楚而明确的应许：那渴慕天上奖赏的人们，也不会在这个地上匮乏、困窘。

这个应许成就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当仅仅看个例。一般性的事实，不当仅仅由个别例子来检验，而是要看普遍性、看共性。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不是基督教信仰怎样影响了个别人的物质财富，而是基督徒群体的物质财富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在基督教信仰到来之前，古人的物质财富其实很少很少。即使是他们最繁华的皇宫，在今天看来也是简陋污秽不堪。如果你熟悉史料中所记载的罗马人的那些物质生活，你就会得出结论，在古代文明中，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物质上的丰富。现代历史学家们常常发现，导致古代的众多国家贫穷混乱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其道德风貌的败坏、及其引致的社会失序、经济混乱、生产活动低效而浪费。这是许多历史学家们都认识到、都同意的古代社会的痼疾。然而，在基督教之前的古代社会，对于这种道德低下、社会混乱的痼疾，却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法。看似唯一有效的，就是专制君主的武力压迫的手段，以严刑峻法来强迫老百姓遵守帝王们制定的繁琐法律。

古代政治家们常常蔑视老百姓的素质，把他们看作是刁民、看作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认为必须要以严厉的统治手段来严加管理国民，要惩治各种道德败坏、奸淫、偷盗、贪污、腐败等等事情，否则社会就会混乱无序、

腐烂堕落。在这个过程中，统治者们视百姓为小人、猪狗，完全不考虑老百姓有什么权利。

统治者们从直觉、必需性、经验、逻辑思考为出发点，制定各种规定来用强力管理国家与社会。他们的统治目标就是维护国家与社会的稳定，生怕老百姓的骚动导致社会与国家秩序的瓦解。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查考古时的那些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就会惊讶地发现，人们是如此缺少权利与自由，以至于，古代社会根本不可能有物质上的繁荣，因为，社会的繁荣必需是建基于社会所有成员的权利与自由之上。

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古代社会从一开始的建立原则就失败了。我们今天社会中所视为理所当然的人身权利、安全、自由，以及无论是男女老少、长幼尊卑都享有的安全，在古代的时候都是闻所未闻的概念。

比如，在古代无论是欧洲、亚洲、非洲、美洲、还是太平洋岛屿上的部落，杀婴都是一件非常普通不过的事情。人们或是出于献祭，或是出于贫乏，或是出于奢侈、骄傲、迷信、等等各种稀奇古怪的理由，就会杀死一些刚刚出生的婴儿。在古罗马的一种非常常见的社会风俗就是订立婚前约定，将来生了女儿就杀死，生了男孩才把那个孩子养大。而社会上的那些孤儿则常常被人害死。丈夫为了取悦姘妇，就毒死自己的妻子。妻子为了

另嫁，就害死自己的丈夫。在奥古士都等凯撒大帝统治期间，罗马帝国非常流行买凶杀人，以至于医生常常被雇佣来给人下毒药、害死人。在罗马帝国的史书上记载，凯撒大帝曾经一次性地处死三千多个这样的罪犯。不仅平民百姓常常是这样被人谋杀害死，即使是皇帝们也不能幸免。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罗马帝国的君王们有百分之八十都是这样死于非命、或是死于战乱之中。而且，在古代每年还会举行野蛮的杀人献祭活动。古人通过杀人、献祭来向他们的神祇献媚、取悦它们、试图得到它们的保佑。这种野蛮行径不仅是在那些野蛮的、蛮荒部落中才有，而是遍布古代希腊与罗马社会。

除了上述这些事实以外，我们还要强调指出，古代社会的人们持续不断地生活在战争与动荡之中。而那些战败的族群则面临着被杀戮或是流放的命运。古代历史充斥着许许多多的冷血屠杀和无止息的战乱，以至于人们根本不能有长期安宁的生活。并且，在一个社会内部，成千上万的人们会被不经审判地杀死，没有正义，也没有公正的法律裁判系统。

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身自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事实上，古代人类社会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奴隶制度。社会人口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奴隶身份。不仅如此，即使那些不是奴隶身份的所谓自由人，其实也没有真正的自由。

整个社会的结构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之上。不论是君主制、寡头制、还是民主制，其实都是基于一个追逐强权的原则。社会统治依赖的是暴力国家机器。对于今天现代社会中、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而言，古时的那些社会统治原则都极其残酷而无情。在古时诸国中，雅典城邦最有民主作风，其统治最有温情和人道。但即使在雅典国内，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其统治制度中也充满了自私、怀疑、压迫、恐怖等等特性。在雅典，富人会受到众人的嫉恨，好人会被排挤，正直的人甚至会被驱逐、流放出去。

在罗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因普遍流行的罪恶而变得十分脆弱，自由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言辞，而没有实际意义。随着凯撒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政府的治理就像是拴在百姓脖子上的一套枷锁。

百姓失去独立与自由的这种状态，绝非仅仅是由于残暴君主的意志所导致的结果。这是由于社会架构的基础原则而导致的自然后果。

在这种社会组织形态中，所有的结构与管理状态都是一个“人为的”、强制性的、牵强的结果。人们彼此聚集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社会，但是，这种聚集形态并非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彼此真心相待、自由选择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个人、家庭、以及每一个人的权益都没有价值。

社会的终极价值在于国家整体的利益与稳定。在专制君主统治下，公民的身份和权利，因着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而被公然剥夺。而专制君主又反过来向臣民们提供各种生活所需，导致社会中的所有人都不得不倚靠专制政权的供应与保护而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公民对于国家的依赖，就像是妻子倚靠丈夫，孩子倚靠父母，奴隶倚靠奴隶主一样。

在这样的社会与国家中，所有人都要为集体献身，所有人都要接受国家的奴役与捆绑。在这样的国家与社会中，人们失去自由、彼此被捆束在一起。这种社会管理的方式如此系统、如此无处不在，以至于在其中生活的人们甚至都意识不到、或是故意忽视了这些事情。然而，在他们被这种奴役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他们却对那些外部社会的人群抱着仇视的态度。对于生活在他们社会之外的一切人类，他们都视之为野蛮人、“外国人”、与自己本质不同的人。无论是斯巴达人、雅典人、还是罗马人都有着这样强烈的仇外心理。他们把那些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不与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城邦的人看成是野蛮人，把那些生活在遥远地区的人群看作是没有开化的部落。他们把从那些国家劫掠来的人们当作俘虏和奴隶，把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变成是给他们朝贡的民族。这一系列的政策只能导致奴隶制越发稳固，而在本国中的人民则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压迫与剥削。这样的进程又反过来促使国家社会的道德风貌越来越败坏、腐朽、堕落，人民越来越穷困，直到陷入彻底绝望之境。

在这样的国家社会中，那些需要勤奋劳动的工作，往往被交给奴隶们、或

是下层人群去做。渐渐地，那些工作越来越被整个社会看作是下贱的工作，并受到“上等人”“自由人”的鄙视和轻蔑。在这样的国家社会中，如果号召大家去保家卫国、参与战争、或是好勇斗狠，人们往往会一呼百应。但是，一旦短暂的风头和兴奋劲过去了，人们就又会回到浑浑噩噩、情绪低沉、好吃懒做的生活状态之中。

古代的人们很少会去想，通过勤奋而诚实的劳动，通过智慧的发明与创造，来把生活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富裕。人类古老历史向我们展现的画面，是没完没了的改朝换代、征服与被征服、侵略与被侵略、战争连绵不断；在社会与国家的民情之中，也充满了贪婪、懒惰、屈枉、欺压、不公不义。在人与人之间，强权即真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世人的眼中所看见的，只有力量和武力，却没有正义情感。整个罗马帝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故事，一个武力征服与压制的巨大画面。

为了防止国民的好吃懒做、庸庸碌碌、情绪低沉，国家政权就不停地向外斗争、扩张，向内不断制造冲突。即使到了罗马共和国后期的时候，国民们以及权贵们除了热衷于内部党争以及不断政变之外，就是忙碌于各种虚浮的娱乐、醉酒宴乐的活动。而社会底层的贱民们则越来越穷困潦倒、无助、没有希望、自怨自艾。

在这样的环境里，根本不可能有我们现代社会所推崇的人与人之间的弟兄之爱，也更不可能有对于真理、自由、正义的热爱和追求。古代社会的组织原则与我们现代社会文明制度完全背道而驰。在那时，虽然人们的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虽然人们还没有完全灭亡，但是，人的良知在社会普遍的败坏堕落面前，根本无能为力。在基督到来之前，社会的腐败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充满了奴役与放荡。在那样的社会中，没有真正的顺服，却只有奴隶；没有真正的自由，却只有淫荡。

从基督教一开始的时候，基督教信仰就教导我们，所有世人都有那同一位父，就是那位上帝、我们的天父。因此，我们应当全身心地、全心全意地来热爱他、事奉他，并且，我们要以我们对世人的爱，来显明我们对上帝之爱，因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在基督教信仰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观念上被根本改变。从此，我们有了一个最高的动机，来彼此相爱，因为这是我们人生最高的职责。福音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职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着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责任：我们应当爱人如己。因此，我们每一个人的观念、秉性、品格都要发生根本的变化。每一个个体，不仅仅是国家政府统治下的一员，不仅仅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零件，不是一个无名无姓的兵卒。人，应当首先属于一个更高的国度。人应当首先是天国的子民，有着尊贵的身份和权利，有着崇高的职责和自由。在国家事务的混乱纷争之中，人应当以谦卑、忍耐、勤劳的态度，审时度日，努力行善、避免作恶；凡事遵从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与命令，以纯真的心灵与自由来事奉上帝，过一个圣洁、属神的生活，作一个天国的子民，爱邻舍，以恩慈、公正、正义、怜恤的方式对待世人。

人不应当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浑浑噩噩，要以良心和尊严而努力去做一切可行的良善之事，要使自己的生命成为这世上一个有益的见证，要成为一个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人，更要努力敬虔地生活、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上帝。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首先要认识到人生命的价值是多么宝贵。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自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为了我们的罪而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罪债，一次而永远地献上了那圣洁的挽回祭，所以，我们每一个相信并愿意接受他救恩的人，都能够被上帝悦纳，得到永远的生命，成为属天的圣洁之民。在基督教信仰的深刻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暴力与不公事件逐渐减少，弃婴被收养，君主权力受到限制，妇女地位大大提高，劳动者享有尊严，奴隶被解放，角斗士的残酷游戏被停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大大减少，世人推崇并渴慕和平，人的行为举止变得温柔、有同情心，人们开始喜欢并向往那些高尚的情感、激情、热忱、与慷慨的品格。人们的灵魂仿佛逐渐苏醒了一样。

上述所有事情，我们都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在罗马帝国的腐败社会环境中，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震撼性影响和作为。此时，罗马帝国在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以后，其道德堕落之病已经是快病入膏肓了。罗马人在数

百年前所建立的共和国，已经被社会的骄奢淫逸之风消耗得元气几乎快要丧尽。但即使在公元一世纪那样的社会风气败坏的氛围下，基督教信仰也给社会的衰败带来了巨大的缓解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整个社会所遭受的许多痛苦。基督徒们在品行、人格上所发生的许多变化，惠及他们的家人与朋友。基督教徒家庭对于社区的有益影响，像涟漪一样辐射、影响到更大的人群范围。进而，公众对于很多事务的观点也受到许多正面的影响。结果，不仅社会风俗习惯发生了很多变化，甚至连国家的一些法律和规章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今天的现代社会从不讳言，西方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罗马帝国的很多司法制度的积极影响。今天，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不要忘记，这些所有好的事情，都是来自于基督教信仰在历世历代中对于社会国家制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从公元一世纪就开始不断持续地在人类历史中彰显。

基督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洗除了这个世上的许多腐败与堕落之事。而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信仰并没有教导人看破红尘、遁世逃避，而是直面人生，保持热忱的情感，以真诚地激情作出生命的见证，爱上帝、爱世人，爱亲情、儿女、父母、朋友。这是基督教信仰的第一个胜利。基督教信仰的另一个胜利也绝不可令人小觑。一方面，基督教信仰深刻地改变了罗马帝国和哥林多等地区这些人口稠密、经济活动相对发达的地方。基督教信仰大大地提升了那些地区的道德面貌，洁净了那里的人心与风气。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也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罗马帝国北方的欧洲诸族。那些北方人很多还处于茹毛饮血的年代。在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下，他们暴戾嗜血的性格有很大的收敛。现代社会无论在道德方面、智力方面、还是工业等等各行各业的方面，都是基督教信仰在历史上深刻影响的结果。当我们追溯这些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成长的历史的时候，历史学家们无不看见基督教在

历史上每一个阶段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力。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没有基督教信仰，就没有现代社会的文明的点点滴滴。前人所渴望的许多美好梦想，在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下，今天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与品格。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国家与社会应当对老弱病残、孤寡贫困的人施以援手，人与人之间应当平等互助，等等等等，这些都曾经是多少代人所渴望的目标。基督教导我们，应当怜恤、清心、虚心、饥渴慕义、使人和睦，应当为良善之事而挂虑、哀恸，应当为义的缘故而甘愿受逼迫，为了对上帝的爱而甘愿受人辱骂与迫害。这些品格方面的教导，给世界历史带来了最伟大、最深刻、最持久、最广泛的革命。

在基督教以外的文明与文化之中，人们的爱与尊重总是选择性的。世人的座右铭总是：“要爱憎分明；要旗帜鲜明地热爱朋友，憎恨仇敌”。在基督教以前的那些希腊或罗马的最伟大哲学家们，总是对于外族人、下层人、下等人表露出明显的蔑视之心。然而，基督教信仰却告诉我们，应当以谦卑的心去热爱一切世人，尤其是热爱那些穷人、以及一切亟需帮助的人们。在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下，社会开始推动要让所有人都从事文化学习的运动，无论是贫还是富，上等人还是下等人。而社会中那些有较高学识的人，则热衷于针对普罗大众的服务事业，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在人类的历史上，广泛公共教育与学校的设立，正是在基督教的推动下而产生的。关于这方面的历史，有非常多的细节故事可以讲述。囿于本书的篇幅，我们不能在这里一一列举。不过，作为本章的结束，我们在这里仅举一些简单例子。

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七十年以后，基督徒的数量增长到大约五十万人。再过两百年以后，这五十万人增长到五百万人。这个数字在又一个世纪以后倍增到一千万人。之后的四百年中，基督徒的数量继续稳步增长。到公元800年的时候，基督徒的数量成为三千万人。在那以后，基督徒数字虽然继续增加，但也因北方蛮族的入侵而时时有一些间断性的停滞。到公元1000年的时候，基督徒的数字增长为五千万人。再过五百年，到公元150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又翻了一倍，达到一亿人。在我们当今十九世纪，这个数字甚至增长得更快。本世纪初的时候，为两亿人。而到了今天的1880年，这个数字已经变为四亿四千万人。

然而，即使这些数字本身也无法说明基督国度在地上的、令人震惊的发展。如今，这四亿四千万人生活在基督教为主的国家中。但是，这些国家对全世界的影响要涉及到人数更多的范围。一百八十年前，基督教国家所影响到的人口是一亿五千五百万人。到了1876年，这个数字是六亿八千五百万人。

九十年前，许多人都说，再过两代人基督教信仰就要消失了。然而事实是，基督教信仰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更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即使在今天，我们听到许许多多其他文化中的人们也都愿意真心地接受和相信基督教信仰。

[illegible]

Handwriting practice lines consisting of multiple sets of three horizontal lines (top, middle, bottom) for letter formation.

继续反思和讲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特征和影响意义。

【C】怎样看待中共建政的前后三十年

1976年，毛泽东逝世；江青等四人帮被打倒；在华国锋短暂过渡时期以后，邓小平全面掌握中国政权。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以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大力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政策。从此，中国经济在逐渐融入世界经贸体系的过程中，在西方科学技术经贸体系的帮助下，在中国人民的勤劳工作中，实现了长达四十年的飞速发展时期。到二十一世纪的202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人均收入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一般的变化。

但是，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自从1980年代以后实现了腾飞，然而，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却一直停滞；尤其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中国就一直严酷地保持着专制主义统治制度，直到今日。甚至，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政府的实力越来越大，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70年洗脑愚民统治政策下，变得越来越民族自大主义、仇视西方文明、敌视世界民主自由政治；很多人对于世界的政治、历史、经济局面更是一无所知。

自从1980年代初、文革结束、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否定文革、批判四人帮、承认毛泽东的错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仍然保持着其1920年代成立以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仍然保持着所谓“人

民民主专政”的专制独裁政治制度。文革之后，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对其历史错误道路、主义、理论、意识形态进行深刻的、本质性的反思、反省，而是，用所谓“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糊里糊涂的实用主义立场，在政治体制上顽固地抱残守缺，顽梗地拒绝任何政治改革。1980年代以来的四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对文革历史详细信息进行严密的封锁，禁止历史学家对其进行全面的、深入的、整体的研究和探讨，更禁止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罪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谬误进行深刻的研究和探讨。不但如此，在1980年代以后的四十年中，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共产主义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坚决反对真正的议会民主自由政治制度【而是用所谓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政治协商会议等挂羊头卖狗肉的谎言来欺骗天下世人】、坚决与西方国家在政治上为敌。

在1980年以后的四十年中，尤其是自从201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流行一种所谓的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前后三十年”的说法。即，前三十年（1949-1979年）有错误，也有成绩、有功绩；后三十年（1979-2009年）有成绩，也有错误；不应当用前者否定后者，也不应当用后者否定前者。

。 。 。 。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仔细比较1979年为分水岭的、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的“前后三十年”，那么，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在这两个三十年阶段中，既有着鲜明的共同点，也有着鲜明的不同点。

在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9）与第二个三十年（1979-2009）之间，两者的共性是：

——（1）实用主义、唯物主义、无神论哲学为主流意识形态和信仰内容。

无论是在毛泽东当政时期，还是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坚持以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为其指导思想。在中国社会中，他们都坚持反对、敌视、蔑视、藐视宗教信仰；在这两个时期，很多人们都在内心深处离弃那伟大公义圣洁的上天；他们的思想根基，就是在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功利主义、成败论英雄。在这样的社会人文环境下，高尚成了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

—（2）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两者都与西方文明体系、民主自由体系、现代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等等深刻地为敌。

—（3）在政治、文化、思想领域，两者都奉行“道德自义”，唯我独尊，鼓吹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用谎言、欺谎、愚民政策来掩盖历史、掩盖真相、掩盖真理、污蔑西方文明体系、污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等等。

—（4）两者都系统性地、大规模地实行谎言和压制政策；在政治上用高压、专制政策来统治人民。

—（5）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两者都大力宣传集体主义思想的道德意义，压制或是丑化个体主义的道德意义与价值。

—（6）在政治现实与实践上，两者都奉行功利主义哲学，并具有专制主义、诡诈、虚伪、残暴、假冒为善的特征。

在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9）与第二个三十年（1979-2009）之间，两者的不同是：

—（1）197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更具有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教旨、阶级斗争、消灭剥削阶级、建设共产主义的特征。197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体系则更加务实地面对实际问题【即，着重于进行现实主义的经济建设】。

—（2）197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完全沉浸于对于革命领袖的个人崇拜情节之中。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专制独裁者、一代枭雄。毛泽东在中国成为了无所不能的革命领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史无前例的独裁者、屠杀者。毛泽东的权力，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帝王。毛泽东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痛苦、灾难、祸患，也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位血腥的独裁者、屠杀者所带来的苦难和灾祸【至少就死亡人数而言】。毛泽东拥有着极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和统治技巧，通过各种手段驾驭着每一个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乃至全国人民，并把那些反对者赶尽杀绝。

197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努力避免个人崇拜的问

题。但同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把已故的周恩来等人进行神化，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的偶像、符号，以此加强中国共产党统治之合法性。

——（3）1979年以前，中国的时代特征是“左”，即，以乌托邦理想为特征，不计代价地寻求建设公有制、人民公社、国有工厂、等，并采取和实施了大量的极其愚蠢的经济措施和政策。1979年之后，中国的时代特征是“右”，即，以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唯物主义为出发点，通过专制主义政权来进行市场经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许多不公不义、谎言诡诈之事。

——（4）在1979年的前后三十年的两个历史阶段之间，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激进主义与务实主义的路线之争。在实际的国家政权统治过程中，前者往往歇斯底里地发动各种各样名目繁多、扰民的政治运动；后者则往往推崇唯利是图的政治经济路线和政治现实。

——（5）在1979年的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阶段之间，就精神领域、信仰领域而言，前三十年反映的是盲信主义【即，人们对于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内容，并不愿意去深刻地咀嚼、反省、反思、思辨，而是盲目地跟随伟大领袖、革命导师的“教导”，人云亦云，而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更没有敬虔、深挚、真诚、谦卑、热忱的、发自内心的真正信仰】；后三

[illegible]

继续反思和讲述，文化大革命运动历史的一些重要特征。

【D】

最后，我们在这里对于以上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之特征的反思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1) 谎言【半真半假、真假参杂、好坏参杂的谎言】的最大危险以及诱惑之处就是在于，其中看似半真半假、真假参半，但是，那些“真”的部分往往是外围性的，而“假”的部分则是核心性的。文革的谎言，正如马克思主义的谎言一样，它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即，它指出在人间道德世界中，存在着不平等、剥削等等现象】，但却提出了致命性的错误解决方法【即，它没有看见世人心灵与生命中的普遍罪性，没有看到道德法则的真正永恒根基是在于什么，没有看到针对“罪”的真正医治之法究竟是在于什么】。文革的立场，正如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立场一样，以道德的自义，用“寒冬的严酷”、“杀气腾腾”的态度来针对“敌人”。它们给世人所带来的，根本不是什么“解放”、“拯救”，而是赤裸裸的奴役、残暴、谎言、虚伪、假冒为

善、专制主义、以及挂羊头卖狗肉的“人民民主专政”。

(2) 诚实的重要性在于什么。——直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仍然在封锁历史，使人不知道——二十世纪的抗日战争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历史、中国共产党内战历史、以及暴力土地改革、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门事件、等等等的历史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七十年中，中国共产党用谎言和暴力建国，用谎言和暴力治国，直到今日。在欺骗之人的心中，并没有真诚深挚的信仰，也没有对于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的敬畏。他们以为，真理只是强权的丫鬟，真相只是可以任人摆弄的工具。愚顽人在心里说：“没有神”。那在无限公义圣洁之神面前顽梗悖逆的罪人，必将面临上帝的公义审判与永远的刑罚。他们必将在那永远的祸患中哀哭切齿。

诗篇。

53.

大卫的训诲诗，交给诗班长，调用“麻拉”。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败坏，行了可憎的不义；没有一个行善的。

神从天上察看世人，要看看有明慧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

他们各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作恶的都是无知的吗？他们吞吃我的子民好像吃饭一样，并不求告神。

他们在无可惊惧的时候，必大大震惊；因为 神把那些扎营攻击你的人的骨头击散了；他们蒙羞受辱，因为 神弃绝了他们。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 神给他子民带来复兴的时候（“ 神给他子民带来复兴的时候”或译：“ 神把他被掳的子民带回来的时候”），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

（3）敬畏上天、寻求真理、信靠那永生之神的人是智慧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真正的利益，不是在于属肉体血气的得失，而是在于那永远的生命、永恒的国度。而那些以功利主义、虚谎之心生活在世上的人，是愚顽的，因为他们掩耳盗铃、用自己的罪恶戕害自己的灵魂。聪明的人，明白自己所应当寻求的是什么。在灵里面愚蠢的人，以自己的属世聪明为自己寻求属世的利益。然而，——“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又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4）在文革历史中，我们处处可见令人叹为观止的权谋之术。其中尤其包括，毛泽东本人的高超权谋之术以及巨大的政治魄力【无所不能的领袖，通过一系列运筹帷幄的阳谋与阴谋手段，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全国性群众造反运动】；毛泽东的宣传与欺骗之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政治理论；指鹿为马一般地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等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并不是说，刘邓等人的治国政策本身就是无可指责的；而

是，毛泽东完全信口雌黄地“炮打司令部”，却不谈大跃进大饥荒本身的罪恶，以及刘邓等人整顿经济、重建秩序的巨大功绩与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权谋之术【例如，周恩来的见风使舵、及时抛弃刘少奇、并成为协助毛泽东实现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助手】；左派的权谋之术【姚文元的强词夺理的诡辩；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冠冕堂皇的言辞】；右派的权谋之术【助纣为虐；腾挪辗转；“活着”就是最高目的；现实主义；势利主义；功利主义】；林彪的权谋之术【打击彭德怀；助纣为虐地帮助毛泽东；阳奉阴违地试图推翻毛泽东】；等等等等。

（5）在文革中，我们能够看见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平等主义的理想；纵横捭阖的政治权谋；——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和光景，体现在他面对非此即彼的选择的时候；体现在当他经受试炼和磨难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有多少是真的渴望平等主义理想的人呢？又有多少是生活在诡诈、谎言、暴戾、愚昧、荒谬之中的人呢？

马太福音.

5.

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 神。

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

（6）在文革的历史中，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既是在欺骗别人，也是在欺骗自己。他们并不愿意去认真地思考和寻求，什么是真正的公义平等；他们仅仅是人云亦云地、狂热地跟随着伟大革命领袖的教导和指挥；他们在心灵中为自己铸造起偶像，用以代替那全能的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天。他们被自己的谎言绊倒；他们不仅自己喜欢罪、喜欢谎言，而且也喜欢别人也这样去行。

(7) 民粹主义、平等主义、反剥削主义、等等，如果离开了敬虔、真挚、谦卑、热忱的对于那创造天地之主的信仰，如果离开了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道德法则，那么，它们所带来的革命、造反，就不是世人的福祉，反而会成为人类巨大的灾难。

+++++

+++++

+++++

【引述 圣思录 顺服在上掌权者】

=====

2. 《顺服掌权者》：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13）

【第一部分】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人。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13:5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13:6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

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13:8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13: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13: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1）正义是什么？正义的源头在哪里呢？正义是来自这个世界的吗？我们又应当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寻求正义呢？在这个世上能够得到完全的、真正的正义吗？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2）这世上有多少罪恶，是在伸张正义的借口之下发生的。有多少人，看

见不平，拍案而起；但是，他们却不过是在用一种罪恶来代替另一种不义。

许多人，想要伸张正义，但是他们的心中，却不过是在自以为义。

许多人，口中喊着替天行道（这话本身就是对神的亵渎），心里面热乎乎地热血沸腾；但是，他们心中，却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狂傲之心。他们内心的罪恶和污秽，遮盖在光辉理想的旗帜之下。

（3）敬畏耶和华，是人智慧的开端。

在人们口中，无论是哪种所谓的正义，无论是哪种情境；如果，在人的心中没有对永生真神的敬畏，没有对神的圣洁、公义、主权、主宰、创造、救恩、恩慈的敬畏，没有人内心中发自心底的真正谦卑，没有摒弃自己心中的固执、愚顽、刚硬，那么，在人们中间的任何所谓“正义”都是枉然。人们所谓的革命，造反，战争，斗争，等等，都不过是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的野心、贪婪、罪恶、欺谎、虚空、狡诈、诡计、虚荣、负气、情仇、自义所充斥着、包裹着、裹胁着、淘汰之下的恶性循环。

那么，又该怎样呢？敬畏耶和华，是人智慧的开端。顺服在上掌权者。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退后，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使自己的生活圣洁；以爱对待人；祈求神，不乞求人；敬畏神；对掌权者应当恭敬而惧怕，但是，不要在灵里畏惧人；倚靠神，而不要倚靠人；活出基督的圣洁生命与爱，作基督救恩的见证；以彻底地的谦卑和爱，来对待所有的人，包括在上掌权者。

【第二部分】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13: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13:10 爱

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这是人应当如何在世上立足、与人相处的一个基本原则。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第三部分】13:11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13:12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13:13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13: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我们真正的正义和公义，应该到哪里去寻求？是在那些“在上掌权者”那里吗？也是，也不是。关键是，我们的源头、归宿和倚靠，应该是在何处。我们应当以这世界为我们的源头、归宿和倚靠吗？不，决不是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11:13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11:14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11:15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11:16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我们在这世上，都是作寄居、作客旅的。这世界不是我们最终的家。坟墓更绝不是我们的归宿。以这世界为家的人，想要在这世上找到终极的公

正；可是，他们无论是贫是富，无论是渺小还是伟大，都只能是品尝到真正的失望、眼泪、痛苦、无奈、疾病、衰残和死亡的滋味。在这世界中寻找正义的归宿的人，必然要空手失望而回。更何况：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又能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

我们更应当警醒自己，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13:13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13: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只有当有了倚靠神的信、圣洁的生命、基督的救恩时，才能够在这世上真正地见证出神的爱、公义和圣洁。

+++++

+++++

+++++

+++++

+++++

+++++

+++++

+++++

+++++

+++++

继续总结，关于文化大革命历史特征的反思。

(8) 文革期间的业绩【根据什么评价一件事情的好与坏、对与错】

在1980年代中国共产党否定文革、实行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以后，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中国人顽固地认为，文革是有道理的；他们怀念毛泽东的平等主义时代，而痛恨今日、改革开放四十年以后的中国贫富分化、分配严重不均的社会局面。

这种怀念文革、肯定文革的现象，固然，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代以来，实际上仍然在实行欺骗性的暴力统治，禁止人们对于文革进行全面诚实的历史研究和反思；然而，也是由于很多世人在内心中并没有对于真理和真相的执著真诚寻求，没有对于上天的敬虔信仰，没有真正的饥渴慕义之心。

的确，文革十年本身，从经济角度而言，并非是完全没有任何业绩【尽管

文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并使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使得中国在1970年代末成为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地区】。然而，这些业绩【例如，识字率的大幅度提高；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的大规模普及；基本医疗的普及；婴儿夭折率的大幅度下降；人口出生率以及总人口的大幅度提高；工业与水利基础建设的开展；等等】往往并非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或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本身的原因，而主要是在本质上是由于，近现代五百年西方文明大发展的历史中所带来的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重要性认识之广泛普及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二战以后的七十年世界和平时期内【尽管有局部性的小规模军事冲突，但总体而言世界大国之间没有进行热战】，世界各国的经济与科学技术面貌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进步。

更进一步说，从根本的层面而言，我们根据什么而评价一件事情的、道德意义上的好坏对错呢？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如果我们真的是饥渴慕义、寻求真理、渴望公义、正义、平等、公正，那么，我们看一件事情的道德意义，就不应当是从功利主义、势利主义的角度出发，而是看这件事情本身是否是诚实、还是诡诈的，是否是圣洁公义恩典慈爱的，还是充满罪污、暴戾、残酷、不公不义的。

（9）文革损害的是什么（是对于人的迫害，更是对于公义、正直、真理的悖逆）

文革不仅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动乱，而且，它严重地荼毒了无数世人的心灵；它更是对于公义、正直、真理的悖逆。它用平等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冠冕堂皇的、欺谎性的语言，给中国社会带来一场极其深重的灾难。

（10）我们的爱，不应当包含罪，也不应当包含诡诈；而应当是出于一颗真诚而纯洁的心。

文革的平等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思想是，消灭世间的剥削阶级、剥削现象，并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一个没有阶级差别的、充满了平等与恩慈的理想社会。它们的核心口号是，要让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不平等、压迫，要让那些高高在上的剥削阶级，那些不怜恤——劳动人民、贫苦百姓、“无产阶级”们——的资产阶级们，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至少在字面上，我们可以看见，文革、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动机是，——对于劳动人民的热爱，对于公平、平等主义的向往，等等。

是的，的确，人与人之间应当是在本质上彼此平等的、应当是互相尊重的；不应当有人与人之间的欺压、剥削、压榨、欺谎、等等。这是因为，我们都本应当是天父的儿女；人与人之间本应当是兄弟姐妹。

人与人之间的爱，应当是公正、公义的，而不应当包含“罪”的情感和动机。人与人之间的爱，更不应当包含诡诈，而应当是出于一颗真诚而纯洁的心。人与人之间的爱，必需是建基于，人在内心深处对于上天的敬畏。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地爱主我们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如果离开了我们在内心深处对于上天的敬虔而谦卑的信仰，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就失去了根本性的根基。在爱之中，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应当是人在内心深处的谦卑，以及饶恕之情。这样的谦卑与饶恕的情感，只有是来自于那公义圣洁慈爱之上帝的救赎恩典。

【引述 哥林多前书13章】

哥林多前书.

13.

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

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存不息的。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

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部分的就要过去了。

我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既然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

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illegible]

=====

=====

=====

=====

=====

=====

=====

=====

=====

=====

=====

=====

=====

=====

=====

虚伪、假冒为善之罪，不仅是最坏的一种罪，而且也是导致其它一千种罪
的直接因素。它毁掉了道德感，剥夺了人灵魂中诚实向善、寻求真理的动
力。

这样的信仰虚伪之人，把自己关在了天国门外，使自己成为了“地狱之子”
（马太福音23章15节）。

马太福音6章2-8节：

2因此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到处张扬，好象伪君子在会堂和街上所作的一样，以博取众人的

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3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

所作的，4好使你的施舍是在隐密中行的。你父在隐密中察看，必定报答你。

5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像伪君子；他们喜欢在会堂和路口站着祈祷，好让人看见。我实

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6但你祈祷的时候，要进到密室里去，关上门，向

在隐密中的父祈祷。你父在隐密中察看，必定报答你。7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重复无意义

的话，像教外人一样，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8你们不可像他们，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先，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正如，我们必须在避免心里的罪、心里的奸淫、心里的杀人方面，应当比文士法利赛人做得更好；同样，我们在心里真诚的信仰上，也更要比文士法利赛人做得更好。我们的信仰，必须是从心里面、真诚地发出的，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神的悦纳；——我们所要得到的称赞，是神的，而不是人的。我们必须警醒，不可虚伪。虚伪的态度，错误的教导，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酵。路加福音12章1节。奉献、祷告、禁食，这是基督徒的三个重要职分。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向神表示尊崇。祷告，是关乎我们的灵魂。禁食，是关乎我们的身体。奉献，是关乎我们的财物。所以，我们不仅要远离恶，而且，更要努力行善。

在这里的经节中，警告我们，要小心在奉献施舍上的虚伪之罪。1.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罪，因为它是一种很微妙的情境——在这之中，我们必须注意到，虚荣心在作祟。门徒们将要做很多奇妙的事情；很多人将会鄙视他们，然而也会有很多人仰慕他们；这两者都将是很大的试探，使他们贪图虚名，沉浸在肉体血气的虚荣心之中。2. 我们很容易会落入这样的罪中。要小心虚伪之罪；因为这个罪会管辖你，会毁了你。一盒宝贵的香膏，会被一个死苍蝇毁了。

这里有两件事。

I。奉献、施舍，是所有的基督门徒们的重要职分；他们要按着自己的力量，多多地施舍。这是在摩西律法中的，也是在我们的良知里面的；是在先知书中所经常强调的。诗篇112篇9节：“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角必被高举，大有荣耀。”箴言10章2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惟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3章27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我们不能由于有虚伪之人的存在，就轻视或是放弃奉献与施舍的职分。是的，我们奉献施舍的行为，并不能因而使我们进入天国；但是，我们若没有这样的行为与心意，就没有真正的信心。这是纯洁的信仰（雅各书1章27节）。这也是对我们的检验。基督在这里，把门徒们的奉献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些不愿意奉献的人，也不会得到基督的接纳。

II。但是，如果人的施舍与奉献的行为，是出于虚伪、虚荣，那么，他就失去了本应有的奖赏。有时，这样的施舍与奉献，会在此世得到丰富的奖赏（箴言11章24、25节；19章17节）；免于贫乏（箴言28章27节；诗篇37篇21、25节）；困苦中得到救助（诗篇41篇1、2节）；荣誉和名声（就是那些最不愿意贪图名声的人所得到的；诗篇112篇9节）。但是，那真正的赏赐，更是在义人复活的时候（路加福音14章14节）所得到的永恒的财富。——你现在所捐献的货财，使你得到那永恒之中的财富。

1. 然而，虚伪之人在这件事情的作为却使他们失去了这些赏赐。他们确实捐献了；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是出于顺服神的心，也不是出于怜悯人的心，而是出于骄傲与虚荣。不是同情穷人，而是为了自己的显耀。他们的捐献，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为了要引起人们的尊敬，并带来自己的私利。因此，这些人在会堂里，或是街市上，大张旗鼓地进行捐献活动，好让大家都注意到自己，称赞自己的慷慨。但是，他们却不觉得，自己的高傲姿态，是多么令人厌恶。并非是，我们在捐献的时候，别人就不能看见；但是，我们捐献的目的，决不能是为了别人的看见和注意。在捐献事情上，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他人的注意。而那些虚伪之人，却在捐献的时候，故意吹着号角；他们假意声称是来服务大家，实际却是宣扬他们自己，让他们自己成为别人谈话和称赞的中心。

现在，基督讲到他们这些人的结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乍看起来，像是一个应许——如果他们得到了他们的赏赐，那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这里有两个词，使这句话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威胁性的警告。

（1）这是一个赏赐，但是，这是“他们”的赏赐。这不是神对于他们行善的赏赐，而是，他们自己给自己的赏赐；而且，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赏赐”。他们想要让众人注意自己；于是，众人的确注意到了他们。他们想要用那些虚荣、虚浮、虚谎来自欺欺人；于是，他们的确自己被自己欺骗。属肉

体血气的虚伪信仰者，想要在神那里，得到他们自己的虚荣、财富、骄傲之心的满足；于是，他们的肚腹里就充满了这些事情；但是，他们所得的，就只有这些了；这就是他们的慰藉，这就是他们“享福”；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得。诗篇17篇14节：“耶 和 华 阿 ， 求 你 用 手 救 我 脱 离 世 人 ， 脱 离 那 只 在 今 生 有 福 分 的 世 人 。 你 把 你 的 财 宝 充 满 他 们 的 肚 腹 。 他 们 因 有 儿 女 就 心 满 意 足 ， 将 其 余 的 财 物 留 给 他 们 的 婴 孩 。” 路加福音16章22-25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哪，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阿，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

（2）这是一个赏赐，但却是在现世的赏赐。虚伪之人，只能得到这些；除此以外，在那将来的永远之中，他们没有份。他们现在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对于未来，他们并没有任何盼望。属神之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得到的财富，与他们将来所将得到的相比，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虚伪之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得到的，是他们的全部的份；因而，他们在永远之中的结局就这样已经确定了；这就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是他们自己想要的。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财富，对于圣徒来说，是他们用来花费和使用的；但是，对虚伪之人来说，却是他们所积聚的目标，是他们自己所看重的报酬。

2. 主的命令（3、4节）。基督自己是谦卑的；他对门徒们的要求，也是如此。“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我们的右手，可以帮助穷人，救助他们，做各种善事。但是，不管我们的右手做什么良善的事情，不要让左手知道——尽量地隐藏，不要声张。你做善事，应该是为了善行本身，而不是为了有好名声。（1）我们不要让他人知道、注意我们所做的事情。站在我们左手边的人，不要看见、注意到我们右手所作的善事。（2）我们自己也不要注意自己所作的善事。左手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不要太去在意自己所作的好事，更不要在心里面自己赞赏自己、敬佩自己。自欺、自满、自爱、自恋、自怜，这些都是内心骄傲自高的表现，都是和虚荣心一样危险的事情。若有人注重自己的善事和荣耀，那么，他们就不会是被神纪念的人：——启示录3章17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3. 对于那些在捐献的事上真诚而谦卑之人的应许。你若在暗中捐献，天父会在暗中察看你。当我们最不注重自己所行的善事的时候，就是神最注重这些事情的时候。这正如，当我们不注重自己所遭遇的苦情的时候，就是神最注重那些事情的时候（诗篇38篇14、15节：“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耶和華阿，我仰望你。主我的神阿，你必应允我”）。当我们看不见自己所行的良善之事的时候，就是神看重我们的良善的时候。神在暗中察看我们——这是令那些虚伪之人胆战心惊的，但却正是令圣徒们喜悦和慰藉的。不仅如此，神不只是

在暗中察看、称赞，而且，神必将亲自公开地奖赏那些真诚而谦卑的人。那些拼命想要得到荣耀的人，却反而得不到；——虚伪之人所追逐的，不过是自己的影子；义人真正寻求的，才是真正的实质。看这里的强调语气——神自己会奖赏你；他自己就是那奖赏者。希伯来书11章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让神自己成为对我们的奖赏。创世纪15章1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神的奖赏，并非是像一个主人对仆人那样的，而是像一位父亲对儿女的赏赐。他将要大大地、公开地赏赐你；即或不是在此世，但却一定会在那终极的审判日；那时，全地的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审判，而你则要在人前，被主接纳。若你的良善工作不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但，你的赏赐一定会是在公开的情境下给予的。

=====

=====

5-8节

在祷告中，我们与主的关系要比在捐献的事情上更加直接，所以，就要更

加谨慎而真诚。基督的门徒们必须要祷告。保罗一信主以后，就祷告。一个基督徒不祷告，就如同一个活人不呼吸一样。如果我们没有祷告，那么，我们就没有恩典。“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如果我们不想做一个虚伪的人，我们就不要在言语行为上效法那些假冒为善的人。

这里讲到了，祷告中有两件极大的错误，就是，虚荣（5、6节）与虚浮的重复（7、8节）。

I。在祷告中，我们必须不可追求虚荣，也不可看重人的称赞。

1. 那些虚伪之人的祷告方式。他们的言语行为，都处处显明了，他们所关心的首要之事，不过是要得着别人的称赞，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与私利。当他们在祷告中扬声的时候，眼睛却是在俯视。

（1）他们祷告的地点。他们故意在会堂里面大声祷告（尽管在会堂里面祷告的确是可行的），但在私下的时候，却根本不祷告。他们假意在会众面

前表现得很敬虔，但是实际上，他们所寻求的却是他们自己的荣耀。他们在街市上祷告也是如此。他们故意选择那些人多的地方，好引起众人的得着荣耀。

（2）他们祷告的姿势。他们总是站着祷告；尽管这个姿势并没有什么不可以（马可福音11章25节——你站着祷告的时候），但是，跪着祷告却是更谦卑而敬重的方式（路加福音22章41节；使徒行传7章60节；以弗所书3章14节）。他们站着祷告，似乎表现出他们的骄傲与自信（路加福音18章11节）。

（3）他们故意选择那些公众的地方祷告。【1】他们喜爱在那里祷告。他们喜爱的原因，并非是祷告本身，而是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机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有时，我们的良善之事不得不要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但是，如果我们喜欢别人的称赞和仰慕，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的危险——因为这些东西会使我们愈加骄傲起来。【2】他们祷告的时候，喜爱被人看见。他们所重视的，并非是神的接纳，而是人的敬仰和称赞。这样，他们就可以侵夺寡妇而孤儿的财产（谁不会信任这些看起来似乎很敬虔祷告的人呢？）（马太福音23章14节）；——他们把自己的这种公开的、虚伪的敬虔行为，用来当作是奴役人的手段和方式。

(4) 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赏赐”，因为他们所看重的，就只是来自于人的接纳。如果我们这些主的仆人，没有得着主自己称赞说“做得好”，那么，其他的任何事情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在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中，我们所看重的，当然应当是神自己。可是，那些只重视人的称赞的，他们所得到的赏赐，也就仅是人的称赞而已。想要在信仰中、真诚地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不可重视人的脸面和称赞。我们所祷告的对象，不是人，而是神；人并非是我们的审判官；他们是像我们一样的灰尘；因此，我们不应着眼于他们——在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应当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私密之事。我们在会堂中敬拜神的时候，应当避免仅仅是在外表上表现得很敬虔的样子；更要避免虚伪的敬虔。

2. 基督对我们的教导。谦卑和真诚，是基督教导我们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你们在祷告的时候，应当如此如此（6节）。

(1) 基督的指示。

【1】我们不要在会堂和街市上，而是要在私下的密室里，认真而敬虔地祷告。以撒去到旷野（创世纪24章63节），基督上到山上，彼得到屋顶上祷告。我们应当在私密的场合中认真祷告，这样我们才不会被人们看见，并

避免虚荣；不受人打搅，避免分心；不被人听见，因而有更多的自由。但是，我们也要如果由于外界环境条件的原因，我们的祷告无法避免被人看见，那么，我们也不应放弃自己祷告的职分。

【2】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人，而是那在暗中察看我们的神（撒迦利亚书7章5、6节）。法利赛人祷告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神；不管他们祷告的形式是什么，他们祷告的目的，都是要取悦于人，赢得人的称赞和掌声，得到人的恩惠。“但是，你们要向神祷告，单单祈求他的恩惠。把他当作你的父亲；他愿意听你的祷告，愿意恩典地怜恤你、帮助你、救助你。你要向那在暗中察看你的神祷告”。我们要在暗中祷告；我们的眼目，要单单地在神的身上；神是无所不在的；在我们的密室里，在没有人的地方，神却在那里；在那里，神与那呼求他的人更加亲近。我们应当在暗中祷告；这样，我们就归荣耀于神，承认他是天地的主，是全在的；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他的安慰。使徒行传17章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2）这里给我们的鼓励。

【1】你的父要在暗中察看你。他的眼目要在你的身上；他要接纳你——虽然别人没有看见你，也没有称赞你。基督对拿但业说，在无花果树下，我就

看见你（约翰福音1章48节）。神看见保罗在祷告（使徒行传9章11节）。在神面前，没有任何隐藏之事。

【2】神要公开地赏赐你。那些虚荣地、公开地祷告的人，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是人的称赞，而不是神的接纳；但是，那些在暗中祷告的人，将要得到来自于神的真正的赏赐。这被称为是赏赐，但是，这更是一个恩典，而不是神欠人的债；这赏赐，并非是人所配得的。这个赏赐是公开的；他们不仅要得到神的赏赐，更要得到神所赐的荣耀。虚伪人所看重的，也是荣耀，但是，他们没有真诚、敬虔和忍耐。信仰真诚的人，所得的赏赐是在天上。有时，人在暗中的祷告，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到神的公开回应；但是，在那终极的审判日，所有敬虔祷告的、信从基督的人，都将要在那位伟大的中保那里，得到永恒的荣耀。法利赛人在这个世界上，在他们周围的人中间，已经得到了他们应得的“赏赐”，就是别人的称许和重视；然而，那些仅仅是肉体 and 血气，是虚浮的影子。真正的基督徒却将要在一切的世人面前，在天使面前，得到神的接纳与荣耀；那是何等巨大而光辉的荣耀。

II。在祷告中，我们不应当有虚浮的重复话语（7、8节）。祷告，是从我们的心灵里面发出来的；然而，祷告中的言辞也很重要——尤其是在众人联合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在联合祷告的时候，说话的人，会容易被试探，去讲说那些华丽的词藻——因此，基督在这里警告我们：不要说许多虚浮的重复话语（不论是自己祷告还是和别人一起祷告的时候），像那些法利赛人

一样（马太福音23章14节）。

1. 这里，虚浮重复话语的错误是，把祷告变成了嘴上的事情、舌头上的事情，而不是灵魂之中的事情。（1）虚浮的重复。【1】传道书10章14节：“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在人与人之间的交谈中，那些虚浮、没有意义的重复话语就非常令人厌烦；在与神的交谈中，这样的虚浮重复岂不更加不好吗。【2】并非是在祷告中不能有任何重复的话。基督自己的祷告，也曾说同样的话（马太福音26章44节），并极其恳切（路加福音22章44节）。但以理的祷告也是这样发自肺腑心肠（但以理书9章18、19节）。诗篇136：1-26节的话语，也是非常诗意而美丽。有时，简单而少许的重复，可以表达我们的强烈情感，激励其他人的心。但是，在祷告中许多的重复话语就是不好的。有的人迷信地以为，这些特定的重复话语有什么特异功能。又或者，有的人像念经那样，嘴里不断重复，心里却根本没有任何情感。——这些都是虚浮的、重复话语，都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当我们说着一些口是心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在令神不喜悦，也是在惹人厌烦。（2）冗长的祷告。那些出于骄傲、愚妄、不耐、不当或是迷信的祷告，是不对的。人若以为神不得不倾听冗长的祷告，也都是不对的。这并不是说，不应该有长时间的祷告。基督就是常常彻夜祷告（路加福音6章12节）。所罗门的祷告也非常长。有时，尤其是当我们身处困境、或是当我们内心情感澎湃的时候，我们都应当长时间地祷告。但是，人若仅仅是为了拖长祷告时间本身、而进行冗长的祷告，并以为这样就会得到神的喜悦，那就是错误的，是应当受到责备的。祷告本身并不是错误；不，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职分。错误在于，冗长、虚浮的重复；这个错误的危险是，我们变成了仅仅是在嘴上说那些无意义的话语，而不是在心里面真诚

地祈祷。传道书5章2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何西阿书14章2节：“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净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约伯记9章14节：“既是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应当言语谨慎、发自肺腑、真心实意、态度恳切。

2. 这里进一步告诉我们错误的原因。

(1) 虚浮重复、冗长祷告，这些都是外邦人所做的事情。基督徒们敬拜上帝，不应当像外邦人敬拜神那样。外邦人按着自己虚浮的想象，在敬拜神的过程中，关注的是方式，而不是实质；他们以为神会和他们一样，需要他们说很多话才能明白他们的意思；又或者，他们以为若说很多话，就能让他们的神听命于他们；就好象他们的神是软弱的、无知的，很难打交道。巴力的祭司们就是这样，从早到晚不断地重复他们的祷告说辞；然而，相比之下，以利亚的祷告则是肃穆、镇静、简短，因而，先是从天上有火下来，接着是有雨降下（列王记上18章26节、36节）。口舌上的功夫，就算是说的再好听，也仅仅是口舌的功夫而已。

(2) 你们不应该像外邦人那样，因为你们的天父在你们祈求之前，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所以，你们并不需要作那些冗长而重复的祷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你们不需要祷告；因为神愿意你在祷告中，承认你对神的需要、信赖和倚靠，承认你喜悦和盼望神的应许。在你祷告的时候，你要完全地打开你的心，把你的心事倾倒在神的面前，交托在神的手中。

【1】我们所祷告祈求的神，是创造我们的天父，是与我们立约的神。所以，我们对他的祈求应该是自然的、轻省的、真情流露的。孩子不需要向父母说很多冗余的、没完没了的话，而只需要简单地把自己的心事和需要告诉父母。让我们都带着一颗儿女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带着对神的爱、尊敬和信靠。这样，我们就不用说很多无用的、重复的话；我们就会在圣灵的感动下，称呼我们的神为“阿爸、父”。【2】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的情况和需要，比我们自己知道得更多。他知道我们所真正需要的一切事情；他的眼目监察全地，看见他百姓的境况（历代志下16章9节）；他常常在我们祈求以前，就把恩惠赐给我们（以赛亚书65章24节）；他所赐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远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以弗所书3章20节）。如果神没有听允他的百姓的祷告，那是因为神知道他们并不需要那些所求之事，或者那些事情并不真正有益于他们的利益；所以，神比我们自己更知道，什么是真正对我们好的。我们不需要讲很冗长的话语，或是用很多华丽的词藻来向神祷告、陈情；神对我们所知道的，超过我们能够用语言讲述的。只有他是真知道我们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心意全都放在神的面前——主啊，这就是我们的所想所求（诗篇38篇9节）。神不是我们的仆人，也不会被我们的冗长祷告所贿赂或是胁迫；最有功效的祷告，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祷（罗马书8章26节）。我们不能指使神，而必须听命于神、信靠于神。

马太福音25章

十个童女的比喻

25 “那时，天国好象十个童女，拿着她们的灯出去迎接新郎。 2 她们中间有五个是愚蠢的，五个是聪明的。 3 那些愚蠢的拿着灯，却没有带油； 4 但那些聪明的拿着灯，也把油装在瓶里带来。 5 新郎很晚还没有到，她们都打瞌睡，而且睡着了。 6 半夜，有人喊叫：‘新郎来了，快出来迎接他。’ 7 那些童女都醒过来，整理她们的灯。 8 愚蠢的对聪明的说：‘请把你们的油分一点给我们，我们的灯快要灭了。’ 9 聪明的回答：‘这些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吧！’ 10 她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准备好了的童女就和他一同进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 11 后来，其余的童女也来到，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 12 新郎却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13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

1-13节

I。这个比喻一般性地讲述了，天上的国度，福音的本质，基督国度的外在表现、治理、以及成功。基督的一些其他比喻（比如马太福音13章）讲述了福音怎样在当前的时候，进入人的心里。而这里的比喻，则告诉我们，当神的奥秘完全显明、神国度完全彰显的时候，是怎样的。在这个比喻中，记述了两种人——那些为最后审判以及基督再来而预备好的人、以及没有预备好的人；神的国度，已经为神国的臣民显明。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就像是这个比喻中的十个童女，在这里被区别开来。

II。这个比喻的背景，是一个婚礼。按着犹太人婚礼的习俗，新郎要在朋友们的陪伴下，在晚上来到新娘的家里；新娘以及陪伴的童女们要在家里等待新郎的到来；等新郎来的时候，她们要拿着手里的灯烛，到外面把新郎迎进屋来，一同庆祝婚礼的正式进程。在这个比喻中——

1. 新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诗篇45篇，雅歌，以及新约的很多处，都明确地讲到了这一点。基督爱他的教会；基督的爱是卓越的、无与伦比

的；基督与他百姓之间的恩典之约，是信实的、不可改变的、忠贞的。所有信从基督的人，都归入基督的恩典之约（何西阿书2章19节）。在那基督再来的日子，是神圣婚礼完成的日子；那时，新娘、羔羊的妻，将要是完美的、完全的（启示录19章7、9节）。

2. 十个童女代表了一切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是教会的成员；不过这里称他们为陪伴的人（诗篇45篇14节），就像在其他地方被称为儿女（以赛亚书54章1节）、教会的装饰（以赛亚书49篇18节）一样。那跟从羔羊的，被称为童女（启示录14章4节）；这代表了他们的纯洁和美丽；他们在基督面前如同贞洁的童女（哥林多后书11章2节）。新郎是王；而这些童女是荣耀的女子，是不计其数的（雅歌6章8节）；不过这里被称为十个。

3. 童女们的职分，就是要迎接新郎；这是一个极其幸福的职分。当新郎来到的时候，她们要前来事奉他；为此，她们要切切地等候、盼望他。这就是基督教的本质。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1）服事基督，把荣耀归给他、我们的荣耀新郎；我们要称颂他的名，尤其是当他要来把荣耀归给属他之圣徒的时候。我们必须跟随他，正如仆人跟随他们荣耀的主人一样。约翰福音12章6节。我们要高举基督的名，称颂基督的名；这就是我们的职分。（2）我们要切切地等候主盼望基督的再来。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要相信基督的再来，并为之预备好；而且，我们更应当热爱、渴慕基督的再来；我们一切的行动、言谈、生命，都要聚焦在这一点上。基督之再来，是我们信仰中的各项教义的汇聚点；我们的生命，都应当以对此的盼望为

核心。

4. 她们最大关切的事情，应当是，时刻保持手上的灯烛是燃亮着的；只有这样，在她们等待前来事奉新郎的时候，才能归荣耀于他，才能真正地服事他。基督徒们应当是光明之子。福音是光；那接受福音之光的人，不仅要自己被光照亮，而且，要像光一样闪耀出来（腓立比书2章15、16节）。

关于这十个童女，我们看见——

（1）她们的品格非常不同，并各自相应地显出明显的证据。

【1】她们的品格是，其中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蠢的（2节）。智慧胜过愚蠢，正如光明胜过黑暗。传道书2章13节。在同样的外在信仰形式下、在同一个信仰组织内，人们的品格在神的眼中会非常不同。那些真诚的基督徒，是聪明的童女；虚伪的基督徒，则是愚蠢的童女；——正如基督在另一个地方用聪明的、以及愚蠢的、盖房子的人来比喻他们。一个人是否真正地聪明，或者，是否真正地愚蠢，——通过他如何对待自己的灵魂之

事，可以清楚地显明出来。真正的、真诚的、热忱的、衷心的信仰，是真正的智慧。罪是愚蠢的；虚伪之罪尤其是最愚蠢的，因为虚伪之人总是用自己的聪明来自己欺骗自己。虚伪之人是最恶的罪人，因为他们把自己伪装成正直的人。当我们评判自己的时候，要知道，天国的门是窄的，进去的人很少——因而我们要谨小慎微，谦卑谨守，不可自觉安稳；当我们评判别人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救恩的元帅领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

【2】她们品格显出的证据，就是在她们职分的工作里面；她们也要按着内心的真实光景而受到审判。

（第一），愚蠢的童女手里拿着灯，却不预备灯油（3节）。她们的灯油仅仅够现在用一会儿的；仅仅是为了现在的表现；——显得她们看起来好像是要等候新郎、服事新郎似的；但是，她们却不预备多一些灯油，以防新郎耽延——从而显出她们虚伪的内心，即，心中并不是真地愿意迎接新郎。

——1. 她们的生命里面，并没有真实的、根深蒂固的、坚实的原则。她们手上虽有表现出她们信仰外在形式的灯盏，但是，在她们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储藏健全的知识、根深蒂固的挚情、决心、定意。只有那些内心深处、灵魂深处的东西，才能使人经历服事与试炼。她们行事是凭着外在的影响和诱惑，但里面却没有属灵的生命；就像一个商人，没有仓库；或像

一个落在石头地里的种子，没有根。

—2. 她们对未来没有打算、也不作预备。她们手上的灯只是为了现在好看，却没有灯油为以后做准备。这种对于未来的、缺乏预备的状态，毁了许多只有表面信仰的人。他们关切的事情，仅仅是在邻舍的身上；他们现在可以时时与邻舍交谈，但是，他们却并不在意要得到基督的悦纳；—尽管，他们未来要面对基督自己。他们看一件事情是否有益处，完全取决于此事在当下是否有价值。如果对他们讲述未来的事情，那就像是罗得对女婿讲说今夜以后要发生的事情；— 一定会被他们以为是戏言。他们不为以后着想，就像蚂蚁不为冬天预备一样。提摩太前书6章19节。

（第二），聪明的童女，手上拿着灯，器皿里面预备着灯油（4节）。她们在生命深处有着良善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对她们信仰的巨大支撑。—1. 心灵就是我们的器皿；我们要把智慧装在那里面；心里面有良善的宝藏，从那里发出良善的言语行为。根若腐烂了，花朵也会很快变成灰尘。—2. 神的恩典，是我们装在器皿里面的灯油；以色列的会幕中总是要常备着灯油（出埃及记35章14节）。我们的灯光必须要借着我们的良善行为在人的面前燃亮；但是，若我们的心中沒有穩固、堅定、活潑的原則——沒有在基督的里面坚定的信心，沒有對神、對我們鄰舍的愛；那麼，我們的好行為就不能持久。我們所作的每一件事情，必須是出自我們堅定的信仰；我們的眼目，必須要注目於那將要來到的事情。—3. 聰明的童女在器皿里面预备了灯油——这意味着，她们设想，新郎有可能会耽延。我们应当为持久的等

候盼望而做好打算。但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灯油必须是来自耶稣基督的金灯台，来自那伟大的、良善的橄榄树；这是撒迦利亚书4章2、3、12节所表明的异象；约翰福音1章16节也对此作出了解释。我们从基督的完全里得到一切，从基督的恩典里得到恩典。

（2）她们共同的错误：当新郎耽延的时候，她们都打盹睡着了（5节）。

【1】新郎耽延了；即，新郎没有像童女们所想象的那么早来到。当我们看一件确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那很快会发生；在使徒时代，有很多人以为基督很快就要再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基督虽然在我们的眼中看似耽延，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耽延（哈巴谷书2章3节）。新郎没有像童女们所想象的那样很快就来到——这是有良善原因的；有许多心意和目的要成就；——选民要被呼召和招聚；神的忍耐要彰显出来；圣徒的坚忍品格要经受试炼；正如地上的收获，要等待庄稼成熟——同样，天国的收获也要等待禾稼的成熟。然而，虽然按着我们的时间，基督看似耽延；但是，他的再来一定不会晚于神所定的最佳时间。

【2】当新郎看似耽延的时候，那些等候他的童女们开始变得不专心，忘记了她们所应当事奉的事情；她们都打盹睡着了；——就像她们不再等候新郎了一样。因而，当人子来的时候，他没有找到忠信的人（路加福音18章8

节)。那些认为事情很快就发生、心情急躁的人，当意识到事情没有很快发生的时候，当觉得事情耽误的时候，往往会失去信心。聪明的童女打盹了，愚蠢的童女睡着了；这之间有一点区别；不过，她们都犯了错误。聪明童女的灯还是亮着的，但她们自己却打盹了。许多良善的基督徒，当他们在信仰中很长时间以后，会渐渐冷淡了为基督再来而作的预备之心；他们的爱心变小了，热情变淡了，恩典不再那么突出地显明在他们的生命里；他们的工作，在神面前也不再那么好；虽然他们还没有失去全部的爱，但是，起初的爱心已经失去了很多。如果说，门徒们等候基督一个时辰都是很困难的事情，那么，等候一生就更为困难了。“我想睡一会儿，尽管我的心还是醒着的”。他们先是打盹，然后睡着了。轻忽、松懈的心态，会导致更大程度的疏忽。打盹的人，很难不继续睡着；因此，属灵之中的松懈，在一开始的时候要尤其小心。

(3) 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要来了(6节)。【1】虽然基督的再来看似耽误很长时间，但却最终一定会来到。虽然基督的再来看似缓慢，但却是确定无疑的。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以色列民、神百姓、属神之人的漫长的盼望、等待以后才来到的；虽然等待和盼望的时间是漫长的，但是，在所定的时间成就的时候，基督必定就来到。同样，在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也将会如此；虽然看似耽误很久，但主却一定不会忘记。基督的仇敌会发现，神的忍耐，并不等于免罪；基督的朋友会满心安慰地知道，神所定的时间，一定会成就，绝无虚谎。得赎的日子是确定的、不会改变，一定将要来到。【2】基督的来到，是在我们半夜的时间，是在我们最没有想到的时候，也是在我们最想休息睡觉的时候。对于神的百姓而言，基督的安慰与救赎是在那看似最不可能的时候来到的。对于基督的仇敌而言，基督的到来、审判惩罚，是在他们最不以为然的时候来临的。当

年，埃及头生长子被杀、以色列得赎的日子，也是在半夜的时候（出埃及记12章29节）。死亡，常常在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临到；路加福音12章20节记述了，那个半夜被神收取灵魂的人。神来到的时间，是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和意志，而不是按着人的意思；这显明了神的主权；神不告诉我们他来的时间，这是要把我们的职分教导我们。【3】当基督来到的时候，我们必须出去迎接他。基督徒们必须要跟随基督的所有行动，在基督的事工中，与他相遇。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基督与我们在死亡中相遇；我们必须从我们的身体出去迎接他，从世界中出去迎接他；我们要以深挚的情感、灵魂中的作为去迎接他；这样，我们才能看见他的恩典与荣耀。【4】“你们要出去迎接他”——这是强有力的呼召，是对预备好之人的有效呼召。这个呼召，使人惊醒。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什么人太注意；那时，基督到世界来，世人却不认识他；然而，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一切世人都将看见、都将注意；每一双眼睛都将看见他。从天上将要有大喊的声音；他将在巨大的声音和荣耀中降临；死人也要从坟墓中起来，接受神终极的审判；地上也要有呼喊的声音，有对山和岩石呼喊的声音（启示录6章16节）。

（4）童女们对喊声的回应（7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1】聪明的童女为迎接新郎做好恰当的预备工作。那预备好离世见主的人，当最后时刻的时候，仍然有工作要做；他们要切实地预备好，这样，才会有平安（彼得后书3章14节），才会被主看见他们是在辛勤工作（马太福音24章46节），才不会显得赤身露体（哥林多后书5章3节）。那将是鉴察的日子；我们应当思想，在我们见主的日子，我们想让主怎样鉴察我们；我们应当让主看见我们在做什么。当我们看见那日临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以郑重的心来做好我们离世前最后的工作；我们要再次清

理我们的心，悔改我们心中的罪；更新我们与主的约；向这个世界道别；我们的灵魂要恰当地交在主的面前。【2】愚蠢的童女，错误地以为自己也可以迎接主；她们的心里，是虚浮的、虚伪的信心；她们处于自欺欺人的状态，以为自己是良善的；她们以为自己已经为那另一个世界做好了准备。虚伪的信心，使人们装作是好像也得到了神的恩典；在他们离世的时候，也表现得好像可以见主似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生，都是活在这样的虚伪信仰之中。虚伪信仰之人的虚浮盼望，在他们面临死亡的时候，会燃烧得更加旺盛，就像死前的回光返照一般。

（5）愚蠢童女所面临的困境：她们没有灯油了（8、9节）。这说明了，【1】即使在死亡的这边一侧，虚伪信仰之人也会面临悲惨的困境；神会让他们看见自己的愚妄；他们将要在自己右手的谎言之中灭亡。【2】更重要的是，在死亡的那边一侧，在终极审判的日子，他们将要面临真正的悲惨困境。在那审判日的时候，他们的虚伪信仰——虽然在此世中看起来似乎不错，然而，却不能给他们在神的审判下带来任何真正的益处。

（第一），她们的灯要灭了。虚伪信仰之人，即使在此世中，灯也会常常熄灭；他们的信仰，开始于“认识”基督耶稣，然而却被世界的肉体血气缠住，以至于在内心离开了真正的信仰（彼得后书2章20节）。他们的信仰枯萎了，他们的价值丢失了；他们的盼望淡去了；他们的安慰消失了；恶人的蜡烛，常常在这个世界上被熄灭（约伯记21章17节）。然而，还有许多信仰虚伪之人，就像这些愚蠢的童女一样，伪装到最后一刻；他们信仰中

的盼望与安慰，似乎一直在伴随着他们；可是，当神要取去他们灵魂的日子，会怎么样呢？约伯记27章8节。虚伪之人的蜡烛，即使在他们去世前、一直没有熄灭，那么，也会在他们离世、死亡的时候，与他们一同灭亡（约伯记18章5、6节）。他们将要倒毙在无尽的痛苦之中（以赛亚书50章11节）。当面临终极审判的时候，虚伪之人的信仰，并不能对他们有任何帮助（马太福音7章22、23节）。“她们的灯要灭了”——这就是虚伪信仰之人的真实光景；他们的虚伪信仰，就像是蜘蛛的网（约伯记8章11节等），就像是恶人气绝（约伯记11章20节），就像是押沙龙的骡子把他留在橡树那里。

（第二），她们的灯要灭了，是因为她们没有灯油。那些生命中没有真正的神恩典的人，迟早会自己认识到这一点。外在的信仰形式，或许会使一个人伪装得很久，并能陪伴一个人走很远的路程；但是，却不能使人经过那最后的审判；虚伪的信仰，能够使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显得很光鲜耀眼，但是，当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他们的灯却要熄灭。

（第三），愚蠢的童女，此刻迫切地想要从聪明童女的器皿那里分得一些灯油。“请给我们一些你们的灯油”。当审判日来临的时候，属肉体血气的信仰虚伪之人，会非常想要表现得与信仰真诚之人一模一样。那些在此生中憎恨信仰的严格要求的人，在死亡与审判的时候，会非常想要得到信仰的真实安慰。那些不想像义人一样生的人，却非常想要像义人一样死。那些在此生中藐视、轻看谦卑圣徒的人，在审判日的时候，却会非常想要和

他们拉近乎，想要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最好朋友、最好帮助者；——尽管，在此生中的时候，他们常常虐待这样的人。“请给我们一些你们的灯油”；可是，——1. 她们的要求，是出于感官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内心真实的深处。许多人在末日、不得不哀求的时候，会想要得到神的恩典来救自己的肉体血气的生命；然而，他们在此生的时候，却不愿意因着那恩典而成圣、并接受福音的管辖。——2. 她们的要求，已经太晚。如果虚伪信仰之人，在此生中及早悔改，在来得及的时候，接受救恩，那么，神愿意把恩典的膏油赐给他们；但是，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当末日的帷幕降下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再得到救恩了。

（第四），愚蠢童女们的要求，被聪明童女们拒绝了。良善之人对她们的拒绝，是一个令人悲哀的预兆，显明了，她们也将要被神自己拒绝。聪明童女没有武断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拒绝说：“不可以”；而是，她们宁愿给出理由，表明她们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力。“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吧”。——1. 人若想要得救，必须要自己的生命里面有神的恩典。尽管，我们会在与圣徒的交通中得益，别人的祷告与信心会使我们得到极大的益处；但是，我们自己的成圣必须是出于我们自己灵魂中所得的神救恩。义人必要因信得生。每一个人都要交出自己的账；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显明自己的信心与工作；当审判日的时候，人不能请别人来给自己添加神的恩典。——2. 那有最多神恩典的人，却一点也不能把这恩典分给别人。我们所有的一切，并不能足以使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站立；最良善的人，也必须要从基督那里得到白白的救恩；最良善的人，也无法把这恩典越俎代庖地分给别人。罗马教廷以为，可以通过额外的工作、以及归罪于圣徒的义，来使普通人得到救赎；但是他们却忘了，那些聪明童女都能够明白的事情——

她们的灯油，只够自己用的，并没有办法分给别人。——3. 不过我们注意这里，聪明童女并没有指责愚蠢童女说，“你们为什么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疏忽、忘记了”；她们也没有夸口、说自己事先很有预备；或者，她们也没有告诉愚蠢童女，很可能将要临到的绝望状态。而是，她们把最好可能的建议告诉愚蠢童女：“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那在灵魂之事上愚蠢的人，应当值得我们的同情；但是，我们不可欺辱他们；因为，“是谁使你不同的呢？”牧师传道人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不真正认识神、也不在意自己灵魂的人；他们要到临死之前、在病榻上，才会想起要来忏悔、归主；传道人仍然应当引导他们悔改、祈求神的救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在基督面前，只要人内心的悔改和祈求是真诚的，那么，真诚的悔改就不会太迟；不过，人在临死前的忏悔、悔改、归主，很少是出于真心诚意的相信；因而，传道人应当像这些聪明童女在这里所说的话一样，一把最好可能的建议告诉他们。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尝试着，努力得到最好的结果。倘若能行的话，假若不是太晚的话，牧师传道人就要把当行的事情告诉人：“到神自己那里，去得到神恩典的膏油”。但是，人若故意拖延、不去神那里寻求救恩；那么，人是否能够在天国之门关闭之前、在死亡之门打开之前、仍然抢在最后的时刻、得到基督救恩，那就是一件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危险之事了。我们应当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趁还有时间的时候，到神自己那里去，得到圣灵的恩典与灯油。人若想要得到恩典，就必须自己到神的面前，得到那来自于神自己的救恩，并服事于那拯救的福音。见（以赛亚书55章1节）。

（6）新郎的到来，以及聪明童女和愚蠢童女的境遇。

【1】她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故意拖延信心与服事、想要把救恩推到最后一刻的人，最大的可能性是，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得到恩典，是一件严肃的事、一件花费心神和时间的事；不能够草率忙慌地、轻轻忽忽地完成。罪人在病榻上，通过忏悔和祷告，在慌忙迷乱之中想要得到救恩的时候，很难说目的是什么、应当做什么；死亡迅即来临了，神的审判临到；罪人就这样面临永远的沉沦与惩罚。我们需要灯油的时候才去买、需要恩典的时候才去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处的。

新郎来到了。当那终极审判日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他的百姓这里来，就像是新郎一样；他来的时候，将要穿着圣洁华贵的衣服，被朋友们环绕着、事奉着；现在，新郎不在这里、我们当禁食（马太福音9章15节），但到那日的时候，我们将要有永远的筵席。那时，新郎将要把新妇带到家里，使她与他永远同在（约翰福音17章24节），并要永远悦纳她（以赛亚书52章5节）。

【2】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第一），我们与基督进入那永远的荣耀，就是与他一同永远地坐席，与他亲密地在一起，与他在永远的安息中交通，并得到无限的、永远的喜乐与丰富。（第二），那些预备好了的人、也只有那些预备好了的人，才能够进去与他一同坐席；——就是那些有圣灵凭据的人（哥林多后书5章5节）。（第三），如果我们预先准备好了的人，那么，死亡的突然临到，基督的出人意外的来

到，并不会成为我们得到幸福的阻碍；反而，会使我们进入那永远的幸福。

【3】“门就关了”。——正如：在婚礼上、当所有宾客都到齐以后，大门就关了一样。（第一），门关了，使里面的人安稳、安全；他们是神殿的柱子，再也不会出去（启示录3章12节）。亚当在乐园里的时候，门是开着的，因而他的灵魂离开了；然而，当荣耀的众圣徒进入天国的时候，他们会永远地在里面，幸福而安稳。（第二），门关了，使外面的人再也不能进来。圣徒的性质、与罪人的性质，将要处于永远也不会改变的状态；那些被关在外面的人，将要被永远地关在外面。现在，天国的门虽然是窄的，但仍然是打开的；但是那时，天国的门将要关闭；在天国与地狱之间，是永远也不可跨越的鸿沟。这正如挪亚的日子，当挪亚方舟的门被关闭的时候，挪亚一家被保全在方舟之中，而外面的人则被永远地弃绝。

【4】愚蠢的童女来的时候，已经太晚（11节）；门关了以后，那些其余的童女才来。（第一），当时间已经太晚了的时候，将有许多人来到天国的门口，想要进去；正如褻渎的以扫，当他放弃了长子名分以后，才想起来要到父亲那里继承祝福。这些罪人们在时间太迟了的时候，才想起来乞求神；这固然更加彰显神的荣耀、显明了信仰的宝贵价值，然而，太迟了的乞求，并不能使这些罪人得救。那些现在藐视信仰、轻看祷告、不愿祈求的人，当时间已经太晚的时候，飞速地想要跑到神的面前来乞求，可是，却没有用处。（第二），虚伪信仰之人，有一种错误的乐观想法；他们以

为自己能够得到幸福，能够进入天国。但是，当他们来到天国的门口、要求进去的时候，却被拒绝、被关在外面。在这地上，他们以自欺欺人的心态，仰望天国，以为自己将来会进去；但最后，他们却被投进地狱。

【5】他们被弃绝，正如以扫当年那样（12节）；“我不认识你们”。当我们还可以寻求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应当来寻求他，祈求他的恩典和救恩；因为时候将到，——等到太迟的时候，主就不能再被寻求得到了。现在的时间是，主仍然向我们敞开怀抱，并把应许赐给我们——“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而，时候将到，当终极之日来临的时候，就不再有救恩的机会；对于这些在外面的童女们来说，已经太迟了。这个审判是庄严而严肃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对于在此生不悔改的刚硬罪人以及虚伪信仰之人来说，这就是神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得进入神的安息。这里的经文，显明了神坚决的定意；一切的罪人，在神的审判面前都要哑口无言。

最后，在这个比喻的结尾，再次警告我们：“所以你们要儆醒”（13节）。我们在前面的马太福音24章42章曾看见这个警告，这里，再次郑重地警告和劝诫我们。1. 我们最大的一个职分，就应当是儆醒；我们要以最大的勤奋和谨慎，来对待关乎我们灵魂的事情。要醒起，要谨守。2. 我们之所以要儆醒，是因为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主来的日子，对我们而言，是不确定的；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日子，什么时辰。因此，我们在每一天、每一刻都应当儆醒、预备好；不可在任何时刻、任何日子松懈、忘乎所

以。在每一天中、在年年日日中，都应当敬畏主。

=====

=====

=====

智慧胜过愚蠢，正如光明胜过黑暗。传道书2章13节。在同样的外在信仰形式下、在同一个信仰组织内，人们的品格在神的眼中会非常不同。那些真诚的基督徒，是聪明的童女；虚伪的基督徒，则是愚蠢的童女；——正如基督在另一个地方用聪明的、以及愚蠢的、盖房子的人来比喻他们。一个人是否真正地聪明，或者，是否真正地愚蠢，——通过他如何对待自己的灵魂之事，可以清楚地显明出来。真正的、真诚的、热忱的、衷心的信仰，是真正的智慧。罪是愚蠢的；虚伪之罪尤其是最愚蠢的，因为虚伪之人总是用自己的聪明来自己欺骗自己。虚伪之人是最恶的罪人，因为他们把自己伪装成正直的人。

愚蠢的童女，错误地以为自己也可以迎接主；她们的心里，是虚浮的、虚伪的信心；她们处于自欺欺人的状态，以为自己是良善的；她们以为自己已经为那另一个世界做好了准备。虚伪的信心，使人们装作是好像也得到了神的恩典；在他们离世的时候，也表现得好像可以见主似的；他们在这

个世界上的一生，都是活在这样的虚伪信仰之中。虚伪信仰之人的虚浮盼望，在他们面临死亡的时候，会燃烧得更加旺盛，就像死前的回光返照一般。

=====

=====

=====

罪的本质：一人以自己为义，却不以神为义；从而，人为自己所做的各样事情做出各种辩护，却不愿意谦卑地承认、悔改己罪，不愿意归向那圣洁公义的永生之神；人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就这样在错误的、罪恶的轨道上越行越远，不断地、持续地堕落败坏下去。

=====

=====

=====

=====

=====

=====

=====

=====

=====

=====

=====

=====

=====

=====

=====

=====

=====

=====

西方的发展

1966至1976年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在处于一个相对动荡的年代。一方面，性解放、民权运动、反种族主义歧视、女权运动、文化解构主义、背离传统、等趋势在法国、西德、英国、美国等地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在美国内部，出现了基督教信仰复兴的一个高潮时期；以葛培理为代表的布道家的讲道，在美国国内以及国际上许多国家地区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在经济科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计算机时代的来临、电子通信技术

革命、工农业自动化革命、现代交通工程的普及、等等，西方国家继续引领着人类科学技术飞速地向前进步。1960年代和1970年代见证了，现代生活的许许多多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进入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

在国家政策与社会文化方面，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开始实行了大量的社会福利主义政策；公共医疗、公共教育、养老保险、针对社会低收入人群的食品与房屋免费补助、残疾人救助、等等大规模社会福利政策措施，开始得以实行。社会中的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城市化、通信化、交通便利化、等等进一步飞速进步。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美欧自由世界与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处于持续的冷战状态中。一方面，在美欧内部，人们面临着核战争的危险，许多人内心变得谦卑，而愿意寻求信仰与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在美欧国家内部，自从十七世纪以来的世俗化力量也变得愈加强大；许多人道德颓废、信仰丧失、堕落化、自由化愈发严重。在经济科技进步的同时，很多人热衷于赚钱发财，而忘记了信仰与精神的重要性；也有很多人沉浸在物质的丰富与骄奢淫逸的生活之中。在美国内部，——愈来愈形成了对垒鲜明的左右政治阵营；国家内部的文化撕裂、地域撕裂也变得愈发明显；中部广袤的地区，以及南方文化，以传统、保守、信仰为重；而在纽约、加州、东西海岸各地，则以自由派、左翼思想、世俗化社会气氛为主。【详情请见《美国故事》】。同时，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地，许许多多人们

继续飞速地奔向世俗化社会文化、离弃基督教信仰；在英国，教会聚会的人数持续减少。二十一世纪的美欧，已经与十九世纪以前的美欧在信仰领域与精神文化方面变得迥然不同。

196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件里程碑的事件。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公立学校不能在校内举行【基于学生自愿的】祷告活动【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这样的事情违反了美国宪法中关于“政教分离”的规定；美国最高法院的这项判定，至今仍然极具争议；很多宪法学者、以及美国各界一些人士至今仍然认为，最高法院的该项裁定是错误的】。美国学校内的这样的公共祷告活动，自从1620年代的美国清教徒时代以来，就一直在进行，持续了三百多年，但在1960年代嘎然而止。自从1960年代以后，美国公立学校飞速地实现世俗化；许多中学生道德沦丧、滥交、早孕；1960年代以后的美国中学生成绩【例如大学入学考试平均成绩】以及自律程度，相比于1960年代以前，大幅度降低。

1960年代，是西方文化的一个转捩点时期。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等西欧国家，开始在很大的范围内盛行性解放文化，甚至换妻游戏，并且同性恋开始大行其道。

回首近现代西方历史，马克思【及其所深刻影响的西方左翼思想】、佛洛

伊德【及其推崇的性学；即，性心理是人做事的根本动机，等等】、达尔文【及其所影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哲学观念】对于西方文明的道德沦丧、革命、纷争、动荡、等等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

+++++

+++++

【引述 《美国故事》】

=====

属灵争战的历史

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社会的现状、以及美国国家社会的历史，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属灵争战的历史，是基督徒在这个世上谦

卑而勤勉努力生活的历史，也是属神的百姓与罪相争战的历史。自从1620年五月花号登陆北美以来，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三到四次的属灵大复兴运动。往往，每一次属灵复兴都是因着当时基督徒们信仰普遍地趋于冷淡的时候而发生的。那些向神大发热心的基督徒牧者们、无数基督徒们，在新英格兰，在整个北美大地，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热潮，使人心回转、悔改、归向上帝、归向救主耶稣基督。

然而，近七八十年以来，从很多方面看起来，美国的世俗主义力量、自由派、不信派、无神论、无原则的包容主义、怀疑派等等力量却在不断地崛起，而基督徒们的思想阵地却看似是在不断地退缩。这些美国的世俗主义力量常常占领了大中学校的课堂与教科书，尤其是在美国历史教学中，充斥着否定清教徒、否定基督教信仰、否定基督徒思想的各种趋势。在很多当代历史学家、当代经济学家、当代政治学家的眼中，人仅仅是一种社会属性的存在体、是一种以私利、物质性利益、经济性利益为原始驱动力的行为体；甚至，他们用佛洛伊德所开启的精神分析法、性心理分析法、达尔文竞争生存思想、等等，来看待一切世事与世人，看待历史中的一切事情的发展机制。

=====

近代一百五十年以来，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由于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等方面强大，而对全世界各个国家与民族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在西方、在美国的深刻影响下，整个人类的生活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二战以后的七八十年来，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影响下，开始实行了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在世界各地，好莱坞电影，美国影视、文学作品、文化社会观念、人生观念等等，也都对全世界的许许多多的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这些影响中，很多是负面的。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例如在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日本、中国大陆等地，我们常常会看到英美流行歌曲、舞曲、影视、文学、文化观念的影响。固然，这些影响内容中，包含了很多关于真善美的文化价值观念，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其中也包含了很多玩世不恭、嬉皮士、享乐主义、性解放、一夜情、同性恋、藐视婚姻、放荡主义、道德沦丧等等观念成分。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东西是来自所谓西方发达国家的，因此，被亚洲等地的很多年轻人看作是很酷的观念；他们误以为，这就代表了人类先进文化与文明精神。殊不知，美国、或整个西方，决不能被简单地、一刀切地看作是一切文明先进的代表。在现代美国文化中，有许多肮脏龌龊的文化思想成分；正如在中国，也会有很多敬虔真挚的基督徒。

=====

正面现象与影响

当面对世界与历史的时候，一个人若是内心诚实而谦卑热忱的，——就会饥渴慕义、寻求真理；并且，在这样之人的心中，会反复思筹、仔细咀嚼、认真思想，而不是人云亦云、囫圇吞枣。例如，当我们身处中国、放眼西方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不应当抱着简单、愚昧而盲目排外的心理，误以为凡是来自于西方的东西就是洪水猛兽、就是不好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当抱着盲目崇洋媚外的心理，囫圇吞枣地全盘接受、不加鉴别地接受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一切东西。我们应当在美国以及西方的社会、文化、思想、风俗、历史、传统、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等之中，认真地咀嚼和思想，思考其中的机理和演变历史以及逻辑；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接近事情的本来面目，真正地接近真理，真正地认识真理。最重要的是，我们既应当在他们的历史与见证中，看到那些好的方面，也应当认识到，那真正的真理与生命的源泉，只有是来自于上天、上帝、造物主自己，而不是来自于任何被造之人；只有耶稣基督自己，只有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才是我们所应当单单地敬拜、信仰、寻求的对象。我们的心灵归依之处，应当是上帝的救赎恩典，而不是这个世上任何国家、或是任何国家的政经法律制度等等。

+++++

+++++

【引述 《论民主》】

Page | 486

世界人权宣言的作用和意义

二战以后的七八十年，是人类发展与繁荣的七八十年；在绝大多数国家中，经济都已经实现了很大的腾飞。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教育文化水平、物质环境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民主制度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传播。如今，在世上大多数国家内都已经建立起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已经转型成为民主国家。在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现在只有很少的一些国家还不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

二战以后的七八十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也是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民主制度的传播和建立，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相比于二战以前的时代，或是相比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在二战以后的世界中，尤其是在过去二十年内，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是处于空前的繁荣时期。

在过去七八十年中，由于世界人权宣言的广泛影响与传播，“人权”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政治概念。在各个国家中，民主制度的伟大意义，常常与“人权”联系在一起。世界人权宣言在联合国的通

过，对于民主制度的广泛传播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概念基础。

然而，当我们在这个地上的世界中寻找理想与完美的目标的时候，就总是会其中看到失望与败坏之事。虽然，世界人权宣言本身是好的，但是，其中却有一个最大的缺失与盲点之处，那就是，它忽视了人生命本质层面的罪性。如果在人的生命和心灵本质中是纯洁无罪的，是有着圣洁真挚信仰的，那么，基于世界人权宣言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就是人类历史中最完美的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然而，正如本书中开宗明义所说的，所谓民主制度，是圣洁自由之民所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因而，当我们观察和反思世界历史与现状的时候，就会轻易地看到，由于世人生命与心灵本质层面中的罪性，民主不但不能够完全解决人类社会中的问题，反而，在某些条件下、某些范围中，反而会加剧人类社会中的问题与缺陷的严重性。

这些不好的问题与缺陷之处，首先是从西方社会自身内部所产生并广泛发展起来的。对此，我们在下文中进行冷静的分析和反思。

=====

西方国家现状与内部矛盾

上述五件重大历史事件，与其背后所代表的无数历史进程，以及相关的深远意义与影响，对于整个人类从古代的愚昧贫穷、生产力极度落后、战争动荡不惜的局面，进入到繁荣、和平、发展、进步的近现代时代，产生了决定性的、催生性的作用。正是在这些积极而巨大的影响作用下，现代科学技术产生了爆炸性的发展，现代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等等架构相比于古代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除了上述五件重大历史事件之外，过去几百年来，还有很多事件，例如法国大革命、德国社会变革、意大利社会变革、苏联解体、日本社会变革、印度等许许多多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国家独立、东欧剧变、东亚现代化、等等，也对于世界民主大潮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指出，在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艰难发展以后，虽然全世界在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今天，世界又仿佛走到了十字路口。

今天，在西方世界内部，在美国内部、英国内部、以及其他西方各个传统民主国家内部，正在衍生着愈来愈严重的内部分裂与矛盾。在全世界许多地区，虽然很多国家之间仍然在维持着表面的和平，但是，在人们内心，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正在继续产生着、繁衍着许许多多的矛盾。

一方面，在很多西方先进国家的引领下，科学技术仍然在继续飞速地向前发展、进步，经济仍然在快速地前行，人们的财富、经济发荣景象仍然在不断地扩大、遍及许多国家地区。

另一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几乎所有西方“先进”国家中，正在处于一种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在对外关系上，这些国家与以穆斯林世界为代表的中东人口存在着深刻的撕裂关系。西方世界与俄罗斯、中国、亚洲许多地区之间，也有着深刻的隔阂，并存在着一些潜在的战争危险。

但最重要的是，西方国家所处于的内部环境恶化、撕裂的严重局面，愈演愈烈。一方面，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基督教信仰仍然是主流的信仰。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中，仍然有着数量巨大的、信仰真诚、心态谦卑的基

督徒们。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就平均状况而言，人们的信仰愈来愈缺乏敬虔热忱的情感；在人们的心中，普遍地流行泛滥着许多诡诈与欺谎；尤其严重的，就是所谓的“白左”现象。

所谓“白左”，即白人中左派的简称。在海外华人中，常以此称呼那些观念迂腐，缺乏真理、正义和常识，主张无原则的容忍主义，主张无原则的加税、平均主义、“政治正确”、乌托邦主义思想等等的，西方自由派政客、思想家、文人、演艺界人士、知识界人士、美国的左派激进民主党成员等。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许多范畴内，这些白左早已经登堂入室、占据主流、甚至已经发展到了几乎令很多人深恶痛绝的程度。我们仅以美国内部国情为例，简要总结归纳。

在美国今天的美国主流媒体界（包括主要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美联社等主要纸面媒体与新闻社，以及CNN，ABC，CBS，NBC等主要电视频道），以及美国主要的人文学术界（包括所有的常青藤大学，以及全国几乎所有大学的历史系、文学系、哲学系、法律系的教授们等等），文化界，出版界，硅谷科技界，等等，到处都充斥着左派、自由派、反保守主义、反传统、解构主义思想的主流势力。这些左派势力，往往是以无神主义为内核，以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劫富济贫为经济理念，大力地提倡同性恋合法化，毒品合法化，性解放，贬低信仰的价值，贬低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等等重要意义和价值，大力贬低基督教信仰传统价值、重要意义、历史积极作用，等等。

如果我们追本溯源，就会发现，这些白左们的思想，与历史上的三个人，即，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们的深刻思想影响，很有渊源。马克思的思想代表了，经济上劫富济贫和平均主义、政治上阶级斗争、信仰上无神主义的深刻思想观念。达尔文的思想代表了，认为人不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而是来自于自然的进化，并且不但如此，这个世界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达尔文思想为现代无神主义者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尽管，并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有效的科学证据能够证明物种之间的进化。弗洛伊德的思想则为罪、性淫乱等等给出了貌似科学的、中性、“理性”的解释；正是在佛洛伊德为代表之思想所开的先河的影响下，现代社会的自由化、性解放、同性恋、双性恋、性与毒品泛滥与合法化等等主张，到处漫延，并且不断地撕裂西方主流社会观念，激化左派、右派之间的争斗，带来深刻矛盾与纷争。

=====

+++++

+++++

+++++

+++++

+++++

+++++

+++++

+++++

+++++

圣经启示录中的预言

启示录16章

1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圣所里发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 神烈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2第一位天使去了，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性的毒疮，生在那些有兽的记号和拜兽像的人身上。

3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水就变成好象死人的血，海里的一切生物都死了。

4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了血。5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

“今在昔在的圣者啊！

你这样审判是公义的，

6因为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

现在你给他们血喝，

这是他们该受的。”

7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

“是的，主啊！全能的 神，

你的审判真实、公义！”

8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太阳上，太阳就得了能力，可以用火烤人。9人被高热烧烤，就亵渎那有权柄掌管这些灾难的 神的名，并不悔改，把荣耀归给他。

10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为痛苦就咬自己的舌头。11他们又因为所受的痛苦和所生的疮，亵渎天上的 神，并不为自己所作的悔改。

12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为了要给那些从东方来的王预备道路。13我看见三个污灵，好象青蛙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14他们原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牠们到普天下的众王那里去，叫他们在全能 神的大日聚集作战。1516污灵就把众王聚集在一个地方，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

17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圣所的宝座上发出来，说：“成了！”18于是有闪电、响声、雷轰和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发生过这么大的地震，19那大城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它。20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21有大冰雹从天上落在人的身上，每块重约四十公斤。由于这冰雹的灾，人就亵渎 神，因为这灾太严重了。

启示录13章

1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里上来，有十角七头，十角上戴着十个皇冠，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2我所看见的兽，样子好象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龙把自己的能力、王位和大权柄，都交给了牠。3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致命伤，但那致命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很惊奇，跟从那兽。4因为龙把权柄交给了兽，大家就拜龙，也拜兽，说：“有谁可以跟这兽相比？有谁能与牠作战呢？”

5龙又给了那兽一张说夸大和亵渎话的嘴巴，也给了牠权柄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6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他的名和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7牠得了允许能跟圣徒作战，并且能胜过他们；又有权柄给了牠，可以管辖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各邦国。8所有住在地上的人，名字没有记在创世以来被杀的羊羔之生命册上的，都要拜牠。

9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10如果人应该被俘掳，

就必被俘掳；

如果人应该被刀杀，

就必被刀杀。

在这里圣徒要有忍耐和信心！

11我又看见另一只兽从地里上来。牠有两个角，好象羊羔，说话好象龙。

12牠在头一只兽面前，行使头一只兽的一切权柄。牠使全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受过致命伤而医好了的头一只兽。13牠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14牠得了能力，在头一只兽面前能行奇事，迷惑了住在地上的人，吩咐住在地上的人，要为那受过刀伤而还活着的兽做

个像。15又有能力赐给牠，可以把气息给兽像，使兽像能够说话，并且能够杀害那些不拜兽像的人。16那从地里上来的兽，又要所有的人，无论大小贫富，自由的和作奴隶的，都在右手或额上，给自己作个记号。17这记号就是兽的名字或兽名的数字，除了那有记号的，谁也不能买，谁也不能卖。18在这里要有智慧。有悟性的人，就让他计算兽的数字，因为这是人的数字，它的数字是六百六十六。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启示录16章 启示录13章】】】

亨利马太圣经注释简本

启示录

第十六章

第一位天使把碗倒在地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1-7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第五位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8-11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12-16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17-21节）。

V。 1-7

我们应当祷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记述了，一系

列的可怕灾祸、神的可畏惩罚与意旨安排。这些灾祸，映照了埃及的那些灾祸与惩罚。罪是相似的，因而惩罚也相似。全地，空中，海里，江河，城邑，都要因他们的罪孽而被毁灭。神的圣洁、公义和真实，是可称颂的。神的审判与惩罚，是何等可畏。那些逼迫属神圣徒和先知的恶人，他们将要落入永远的悲惨之境。

V。8-11

人的心如此罪恶，以致于他们在最严厉的惩罚面前也不知悔改；若没有神的特别恩典，所有人就都这样坠入灭亡之中了。地狱本身，里面就充满了亵渎神、憎恨神的人；若我们熟悉人类的历史、人的本性，熟悉圣经，熟知人的心，我们就会知道，当人越经受痛苦的时候，当人越清楚地看见神手的作为的时候，他们就常常越对神充满愤怒和憎恨。罪人们应当到基督这里来，悔改自己的罪，寻求圣灵的恩典；否则，他们就会带着这颗不谦卑、不悔改、绝望的心，承受永远的痛苦和恐惧了。黑暗是与智慧和知识相对立的；人的心在黑暗和罪恶之中，充满了愚妄和慌乱，他们敬拜偶像、跟随兽。他们丝毫没有欢乐和喜悦，而是内心充满煎熬和烦忧苦痛。

V。12-16

这或许是在表明，东方各国的民将要进入到基督的教会之中；道路已经为他们准备。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与基督为敌的敌人们，想要招聚力量，在毁灭之前作垂死的挣扎。神警告属他的百姓，将会有试炼和患难；神鼓励、激励他们，要为此预备好。

将会有极大的引诱和试探；因此，基督借着使徒约翰，呼召他的仆人们，要儆醒。那 儆 醒 ， 看 守 衣 服 ， 免 得 赤 身 而 行 ， 叫 人 见

他羞耻的，有福了。

耶稣基督，主的荣耀，会突然临到，并审判世界。那是一切信从基督之人所喜乐地盼望的。

V。17-21

第七位、最后一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罪恶的世界、巴比伦彻底地倾倒了。属天的教会，看见而欢喜，得胜的喜悦充满他们。那些沉溺在罪中、自觉安稳的人有祸了。许多人为灾祸而亵渎神、憎恨神：即使是在最大的灾祸面前，他们也不愿意悔改、谦卑。人若在神的面前心地刚硬，在神的公义审判惩罚面前刚硬顽梗，那么，这就是清楚的记号，表明那人必将承受确定的、永远的、彻底的惩罚与毁灭。

亨利马太圣经注释简本

启示录

第十三章

从海里有一个兽出来；龙将自己的能力给了那兽（1-10节）。又有一个兽，两角如同羊羔，说话却像龙（11-15节）。它让众人都拜他，并在额上受印记（16-18节）。

V。1-10

使徒约翰站在岸边，看见一个恶兽从海里出来；这是一个残暴的、充满偶像罪污的、迫害人的势力；它的能力来自于前面的那龙。这是一个何等可恶可怕的怪兽！它似乎代表了那些属世的、逼迫人的统治；多少年来，甚

至从巴比伦被掳时期，它就对神的百姓充满敌意。从那第一个兽开始，就欺压、逼迫义人；而义人们更受到但以理所述的第四个兽（罗马帝国）的压迫；他们用许多残酷的迫害来逼迫圣徒们。这些黑暗罪恶的权势是来自于那龙。这权势，是出于魔鬼，并被魔鬼支撑着。受伤的头，或许是代表那所废弃的偶像罪污；头被医好了，代表着偶像之罪又卷土重来；那虽然是新的形式，却是同样的罪，为满足魔鬼的恶计。世人崇拜权力、计谋和成功。他们归荣耀于魔鬼，并顺服于魔鬼的统治和伎俩。魔鬼使用卑鄙的能力和诡计，让人把本属于神的荣耀归于受造之物。然而，魔鬼的能力和成功是有限的、是被约束的。基督有属于他所拣选的余民，是被他的血所救赎的，记在他的生命册中，是有圣灵的封印的；虽然魔鬼和敌基督的势力能够胜过他们的身体，能够夺走他们的性命，但是，它们却不能够战胜他们的灵魂，不能够使真正的信从基督之人放弃他们的信仰，不能够使他们离弃救主、去和这些神的敌人同流合污。在这极大的患难试炼和试探引诱之中，他们仍然持守着福音的信仰，仍然持守在对真神的敬拜之中。那些患难和试探引诱，虽然使地上的人、除了神的选民以外，都顺服了魔鬼；然而，那些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却一直持守着贞德。这是何等大的鼓励，是何等大的激励；使我们能够始终如一地持守在基督里，忠心到底；这，就是整本《启示录》的主旨。

V. 11-18

前面的那个兽，代表的是属世界的权柄；而这第二个兽，则是在虚伪信仰的外衣下，藏着同样的恶意、迫害和权力。它伪装着作出对人灵魂慈善的样子；它要在属灵的层面管辖人；它假装是出于基督的；它先是用温柔的方式和样子欺哄人；但是很快地，它就显出龙的本像。它所说的话，暴露出它的本像；从它的口中，说出虚假的教义和残酷的命令；显明它本属于龙，而不是属于羔羊。它行使前面那只兽的所有权力。它包含着前面那只兽的所有恶意；即，使人偏离对真神的敬拜，使人离弃神，使人的灵魂顺

服在罪恶的意愿和控制之下。这第二只兽，用诡计使人敬拜那死伤医好后的头一个兽。它把欺哄人的希奇之事，伪装成神迹。它迫害、杀死那些不拜兽像的人。它使那些所有拜兽的人都受印记；而且只有这些人才能作买卖，得属世的利益。他们要给那个受伤还活的兽做一个兽像，并且要俯伏敬拜在它的脚前，顺服于它的罪恶与命令，顺服于这恶兽的品性。这里给出兽的数目，就是人的数目，是666。这个数目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谁，没有明言；但是，我们若有属神的智慧、知识，就会明白，神的任何敌人都已经被数算过、都被标出印记，即将被毁灭；他们罪恶的权势即将转瞬即逝；万国都将要俯伏于我们公义与和平之君的宝座前。

+++++

+++++

+++++

+++++

+++++

+++++

+++++

+++++

+++++

=====

反思在民主起源历史中的五件重要事件的本质、影响与意义，正确与缺失之处

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世界范围中发展的进程，是一个漫长、曲折、远远还没有结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里程碑事件，正如本文上面所述的五个重要里程碑事件。在这五个事件中，十三世纪英国大宪章的通过，是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第一道曙光。十七世纪的五月花号事件与英国光荣革命，则预示了民主制度在英国和美国将要生根发芽、成长结果。二十世纪的大西洋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则代表了民主制度将要在整个欧洲以及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来。

其中，大西洋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都是对于二战中希特勒法西斯所代表的专制主义思想的针对性反应。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都集中地反映了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一些严重错误思想的结果。这些错误的思想，集中性地体现在以德国等国家的思想学术界为代表的许多社会人文哲学观念体系中。在这些社会人文观念体系中，在信仰上以泛神主义【即，否认上帝是能听、能看、能言的；把上帝仅仅看作是世界本身，或是无知无觉的一种因果关系、能量等等】、自然神主义【即，认为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以后就撒手不管了；上帝与世人今天具体的生活事务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为表现形式，在政治上以专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争霸、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等等为表现形式。例如，自从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以来，德国等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就受到诸如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一大批泛神主义者与自然神主义者的深刻影响，以至于发展到了尼采的“上帝死了”，以及马克思的“一个幽灵在欧洲大陆的上空飘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让全世界人民的主流观念痛定思痛，深刻认识到专制主义等等思想的深刻危害性。因此，以大西洋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所代表的政治理念，反映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大西洋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的政治思想内容的精髓，简而言之就是，在这个世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随意选择自己所相信的内容，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生活方式，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政治制度，等等。

大西洋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所代表的思想框架本身，并非是不好的。如果它们被应用于一个在生命心灵本质中没有罪性的世人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么，它们所代表的，就是最好的思想与政治体系。

但遗憾的问题是，在这个世上，在每一个世人的生命与心灵的本质层面中，不但不是纯洁无辜的，反而是充满了深深的罪性。这里所说的罪性，并非仅仅是言语行为等外在的表现，而更是人生命与心灵的一种重要本质层面的性质，是人在内心深处对于上天、造物主、生命之主的背离，是：——人以自己为生命、生活、世界的中心，而不愿意去寻求真理、公义、圣洁，不愿意去谦卑而真挚地寻求和倚靠上帝。

因此，我们在现代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必须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在大西洋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之中所代表的思想观念体系，并非是一个绝对

真理，而仅仅是对于专制主义的针对性反应而已。固然，专制主义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对于专制主义的反对，就是绝对正确的。

如果我们认识不到大西洋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思想中的缺失，如果我们认识不到现代世界所流行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概念中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就必然会陷入今天西方世界中“白左”所陷入的怪圈和困境，必然会在民主的道路上，遭遇失败和重大的挫折。

对于世人生命与心灵本质层面之罪性的忽视、无视，正是大西洋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所代表之思想精髓中的最大缺陷，也正是现代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观念中的最大漏洞。

那么，在建设现代民主主义政治的道路上，我们应当怎样做呢？我们应当怎样弥补上面所述的那些缺陷和漏洞呢？我们应当怎样面对世人生命与心灵本质层面之中的罪性呢？我们又应当怎样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罪呢？

请注意，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说，专制主义就是对的，或者，应当以专制主

义的强力手段，来面对世人生命与心灵本质层面中所普遍存在的罪性。

我们如果想要明白上述问题的答案，就必须要深刻地明白在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的深刻关系，也必须要深刻地明白人间法律与上帝律法之间的深刻关系。

+++++

+++++

+++++

+++++

+++++

+++++

+++++

+++++

+++++

【【【引述 圣思录 人间法律与上帝的律法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是罪人》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决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

3:10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3:11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3:12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3:13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 3:14 满口是咒骂苦毒。

3:15 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 3:16 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 3:17 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

3:18 他们眼中不怕神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 3:20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第一部分】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在罪恶之下。我们自己的心思里面，是谗言，嫉妒争竞，虚谎自高；我们对待他人的心态里，总是含着骄傲自义；我们在面对他人的恶时，常常沉默不言，避之不及，没有勇气去在那些看起来事不关己的事情上，为了正义挺身而出。我们生活的一个箴言就是，少管闲事。我们的舌头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污言秽语、咒骂苦毒和花言巧语。

(1)

世人之间的差别，常常其实微不足道。

我们彼此相看的时候，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真是相差万里——无论是在地位上，才能上，财富上，成功上，所处环境上，起跑线上，成就上，道德品质上，业绩上，性格上，体质上，外表上，等等等等。我们常常以为，在这世上，有的人轻如鸿毛，有的人重于泰山。

或许，的确如此。然而，要看我们说话的参照系是什么。

就好象我们看世上的亭台楼宇，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低不同，风貌万千。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地上的角度看，而是从天上看，从永恒看，从那无限、极远的光辉之处看，那么，这些楼阁亭台的彼此之间的差别，可以说真地是微乎其微了。

同样，若我们从神的角度看，人心之中的尔虞我诈、迷魅魍魉、彼此勾陷，大概也的确是彼此类似。不同的，是量；相同的，是质。

(2)

神的律法是什么？律法的总纲第一是爱主你的神，第二是爱人如己。这写在圣经的十诫当中，也写在世人的良心里面。

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里面，都知道，那满天的繁星、浩渺的大地的背后，那繁杂的世事、波澜壮阔而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背后，有一位无限大能的造物主、“老天爷”。他是独一无二的，是自有永有的。他是全备而充足的。他能听、能看。他公义、慈爱——虽然，我们看不见他，因己罪而不认识他；但是，他从来离我们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他。

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里面，也都知道，我们应当敬畏、遵从这位宇宙天地的造物主；因为，他是良善的源头，是一切生命的赐予者，是一切价值和意

义的归宿与基点。阳光雨露，出于他。苦难中的甘霖，也是来自他。

我们也知道，这世界中的一切事情，善恶一定有报。这并非科学所研究的物理定则和规律，而是，超自然中的赏善罚恶，来自于那位超自然的上帝本身。

我们的良心更知道，应当以善待人，爱人，就如同爱自己一样。不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己所欲，施于人。

我们渴望怜悯和同情，因此我们要怜悯和同情他人。我们渴望理解和关怀，因此我们要努力理解和关怀他人。我们期望别人对我们耐心忍耐，原谅我们的错，饶恕我们的过犯；因此，我们要对别人耐心忍耐，原谅别人的错，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们憎恨、厌恶别人的罪恶、不义、不公、说谎；因此，我们自己不应当罪恶、不义、不公，并要诚实。我们愿意别人为帮助我们而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也当为帮助别人而牺牲自己。

这，就是人生的真谛。

【第二部分】

平安的路是什么？

也许，有的人在财富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亲情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哲理中找到顿悟和平安。有的人在工作和事业的自我实现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人与人之间的武力与威胁对峙中，找到和平与平安。有的人在健康和长寿之道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清心寡欲的生活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一生一世、山盟海誓、相濡以沫的爱情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放下”的心境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知足常乐的平凡人生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天下可笑之人”的智慧中找到平安。

以上这些，无论好或不好，却都没有触及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自己生命中的罪（自以为义、自以为是、自私、自我、自利、不公、不义、虚谎、懦弱、不怜悯、不宽容——无论是从前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正如被通缉的逃犯无论逃到哪里、逃了多久，都终将不得不面对法庭的审判）怎么办？我们怎样才能挣脱罪的网罗，洗清我们的罪责，逃脱罪的惩罚，躲避死亡的咒诅，改变我们被罪恶所玷污、所充满的生命？

无论我们自己怎样觉得——问题是，对善恶的裁决和审判，对罪的惩罚，对善的奖赏，权柄并不在我们手中。

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是永恒中的审判。

=====

《与弟兄和平》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5:22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有古卷在凡字下添无缘无故地五字）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5:23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5:24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5:25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

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5:26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第一部分】

先与弟兄和好

(1) 神的律法，和人间的法律

(1. A)

人的良善，应是从心里、由衷的，是由内心而至外在的言语行为的，而不是相反：——

因为神是监察人内心的神；也更因为，人的本质，是由其内心决定；人的行为和言语，只是其内心真实光景的反映。

这世上的法律，只看人的言语和行为，只看人的外在表现。所以，一个内心罪恶的人，仍然可以通过伪装和约束，在这世上不触犯刑律，庸庸碌碌，终其一生。而另一方面，一个无辜的人，则可能会由于马虎大意，犯了过失之罪，承担刑责。

世上的法律，只以人所能查究核实的证据、证人或证言、供词为基础；关注的，只是世上的秩序、公平等。

换言之，人间法律所管辖的范围，是那些属世的、可见的、可把握的、可查究的、可测量的、非永恒的事情。

(1. B)

然而，这并不是说，世上的法律就没有价值；也不是说，世上的法律，与神的律法就没有关系。

只不过，这两者之间，绝非等价。

在世上的法律中，所言及的“公平”，“平等”，“公义”，“正义”，“罪行”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建基于神放在人良知之中的、先天性的，关于公义、公平、圣洁、正直、诚实、真实等的认知。

在这世上，若没有信仰、若没有对永生真神的敬畏，那么，人间的法律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如果人的心里，对宇宙天地主宰、造物主、神尚且没有敬畏，对自己的灵魂尚且毫不关心；那么，人也不会内心深处，尊敬世上的法律。

人间的一部一部法律，无论多么完善，无论条款多么多么详细，都无法完完全全囊括人类生活中的复杂微妙、变化多端的方方面面；也无法事先预见各种各样纷繁的情境。

人间的法律，必须假设，它所针对的对象，是能够、且愿意诚实地，理解并应用抽象概念和原则的；是愿意尽力去诚恳待人的；是愿意诚实守信、遵守契约的。否则，任何人间法律，都会成为一纸空文，如沙子筑成的城堡，瞬间塌垮。

然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如果人想故意逃避惩罚、规避人间法律、钻法律漏洞、破坏规则、为自己走捷径找理由，那么，他一定很快就能学会怎样把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

他也许不一定敢于堂而皇之地杀人放火，直接与法律和国家公器对抗，但是他知道，怎样利用法律、规避法律、玩弄法律，来满足自己的私利和罪恶之心。

很多时候，人们不杀人放火，并非因为他们不愿意，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法律的惩罚。他们的罪恶之心是一样的。

所以，当一个社会的法律越看似健全，越复杂全面的时候，人们的心往往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成了更加虚伪和狡猾。

(1. C)

但是，世上的法律，并不能诛心，——不能仅仅根据人心里的想法和动机，来定一个人的罪。对于隐藏在人心里深处的罪恶想法，和自私、猥琐、残暴、暴怒的意念，世上的法律无能为力。

实际上，若有任何的人间法律，要管束、定罪人的自由内心，那么，这样的法律，往往不是“善法”，反而很可能是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恶法”。

这样的恶法，以及制定这样诛心之法律的人，是愚妄地想要取代神的权柄，愚妄地试图篡夺神的荣耀；正如圣经《但以理书》中记述的，尼布甲尼撒下诏，要求全地的人都跪拜他，把他当作天地之主来敬拜。

主耶稣说：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

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1. D)

事实上，人间法律之所以不能够针对人的内心定罪，不仅是因为那终极审判的权柄在于神，也因为，我们世人往往不能看透人内心之中的真实光景。我们常常会冤枉一个软弱犯错的无辜之人，也常常会被一个罪恶虚伪之人的甜言蜜语和伪装所蒙蔽。

神是监察人内心的神，他的旨意纯全，他的判断是按着真实；人的心在他面前是完全敞开的，没有任何秘密和隐秘之事能够在他眼前隐藏；

而世人，则往往只能看见、也只看重，人的外表和表现，而看不见人的本质。

(1. E)

如果，世界上、人心之中，没有神的律法，没有神的权柄和主宰，那么，任何的人间法律（不论多么貌似公正、貌似完善）也就毫无意义，毫无作用，毫无价值——

因为，决定人行为的，是他里面的喜好、兴趣、倾向、口味、价值、欲望、思想、理念和选择；决定人言语、行为及其一切外在表现的，是他里面的本质和灵魂的光景。

虽然：——人间的法律，在人的内心面前，无能为力；或者，像现代民主社会里面的法律那样，强调人的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对人的内心毫不关心、毫不在意，只注重外在行为层面的证据，以及外表行为层面的管理和管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心就可以像脱缰野马一般，在罪恶、诡诈、虚伪、狡猾、贪婪的世界里任意驰骋；更并不意味着，人的灵魂，就不在神律法的管束和审判之下。

(1. F)

主耶稣说：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蠓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

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1.G)

世上人间的法律和刑罚，可以把人捆锁在监狱之中，甚至可以判处人死刑。但是，尽管人的身体可以被杀死，世上却没有任何势力和权威，能够审判灵魂、把灵魂投在地狱里、永远地刑罚灵魂。

这宇宙天地和其中的万有，都随时在神的掌控和主宰之下；其中的任何事情及其发展，都是按着神的允许和安排，要成就神至善至美的旨意。顺从神的人，将要兴旺；悖逆神的人，必将衰亡。落在永生神的审判和惩罚之

中，何其可怕。

然而，神更在那永恒之中，在终极的审判之日，对人的灵魂有着最高的审判和刑罚的权柄。那些活在罪中、死在罪中的世人，终将面临神的永远审判和刑罚；他们要在不灭的地狱之火中，永远地痛苦哀号。

神的审判，永远的、终极的审判，不是按着外在的虚浮与功利，而是按着人心的真实光景，按着人灵魂的真实面目。

(2)

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

拉加与魔利的意思，类似于“蠢货”“傻冒”等恶毒辱骂人的名词。

也许，一句脏话，尤其是辱骂、咒骂自己弟兄的话，在人眼里，在人间法律之中，并不算什么，也不会受到什么严厉惩罚。然而，在神的眼中，这却与杀人的罪同罪。因为，其背后的心境和动机是一样的。其本质和性质也是一样的。都是出于暴怒和仇恨。都是沉浸于罪中之人灵魂的外在表现。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谦卑自己的心，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灵魂的主，遵从他的吩咐和教训。我们要从自己的口舌上，悔改自己的罪。把罪中的故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里面，有一个崭新的、重生的、洁净的生命生长起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耶杜顿。）我曾说，我要谨

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

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

耶和華阿，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细拉）

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主阿，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

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

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的笑容或作所喜爱的）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细拉）

耶 和 华 阿 。 求 你 听 我 的 祷 告 ， 留 心 听 我 的 呼 求 。 我
流 泪 ， 求 你 不 要 静 默 无 声 。 因 为 我 在 你 面 前 是 客
旅 ， 是 寄 居 的 ， 像 我 列 祖 一 般 。

求 你 宽 容 我 ， 使 我 在 去 而 不 返 之 先 ， 可 以 力 量 复
原 。

【第二部分】

偿还对人的亏欠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5:24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5:25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5:26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1)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真的愿意来寻求神，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

在我们心里，与弟兄反目、对人苛刻、不怜恤人，是一件严重的向神犯罪、得罪神的事。

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讨神的喜悦，真的愿意寻求神的饶恕，

那么，我们就必会寻求同弟兄的和好。

若要来神的祭坛前，向神献礼物，我们必须首先与弟兄和好。

(2)

我们也要偿还人的亏欠，否则，就必不得神的喜悦。

要与人和息。

【第三部分】

真诚的敬拜

神是灵，因此，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God is spirit, and his worshipers must worship in the Spirit and
in truth.

不要自欺欺人；更不要，以为神是可以欺哄的！

=====

=====

+++++

+++++

+++++

+++++

+++++

+++++

+++++

+++++

+++++

=====

民主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我们从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历史中，会清楚地看见，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不仅发源于欧洲，而且，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般性而言，在西方各国中间，如果，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得越广泛，人民的基督教信仰越真挚而热忱，那么，在这个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就越容易建立起来，并且，民主制度在这样的国家中就发展得越快、越稳定；反之，当一个国家中的基督教信仰越来越不受到人们重视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混乱喧嚣、内耗内斗；甚至，当这个国家中大多数人民都离弃了敬虔信仰的时候，也就必然会导致，民主制度终将引向彻底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并最终被专制主义野心家所推翻、篡权。

其中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民主制度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人民群众内部之间相互协商、共同决策的复杂过程。在这样的复杂过程中，在一个社会中，尤其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世界主要国家中，必然会存在许多

多多不同的利益冲突、不同的观点角度、不同的意识理念等等。那么，在这些不同的、甚至激烈的力量角力过程中，怎样能够达到和平安祥的、团结一心的、众志成城、稳定牢固的政治结果呢？

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民主制度若要成功【而不是逐渐滑向无政府主义以及专制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和面对以下这样的一般性困境：——在民主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过程中，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复杂社会环境中，必然会有很多人成分、很多政治力量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甚至，政策方向是被很多人所彻底反对的。【——尽管，当然，政策方向之所以被决定下来，是因为社会中超过半数的政治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那些在某个政策决策上意见少于半数的人群；但是，由于社会政策决策有许许多多的方面，因此，这些在每一个政策决策上意见少于半数的人群，加在一起，人数就反而会占据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例如，有的人反对某些医疗方面的政策决策，而另外有些人则反对某些教育方面的政策决策；虽然那些人在每一项具体政策决策上都少于半数，但他们在不同政策决策相关方面上相应的人数加在一起，却超过了社会人口中的大多数。】

于是，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怎样避免扯皮、庸碌无为、无法决策？怎样避免决策结果导致国家动荡、不稳定、怨声载道？

核心问题就是，如果“我”是民主社会中的一个成员，那么，当面对某个不符合“我”利益、违背“我”意识形态的、然而却是民主程序下所制定的决策结果的时候【例如，民主决策的某个政策结果是：——减少某个地区的、面向某类职业的教育经费，增加某种医疗的收费，针对某种行业加税，增加某些方面的军费，甚至是堕胎，毒品合法化等等】，——在“我”的内心中，怎样还能有和平安宁的心情呢？“我”怎样还能够平静地、和平地遵守那些既定的民主秩序和政策法律结果【即，和平地等到下一次投票的时候再去表达意见；甚至，——“我”心里明知道自己是少数派，无论再投多少次票也没用，根本不可能改变某种政策决策结果】，而不是心怀怨言、鼓噪喧嚣、甚至图谋用非法手段推翻既定政策法律结果呢？

本书必须在这里清晰地、大声地、毫不含糊地指出，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正是民主制度本身的生死成败之关键所在。

如果在社会中的千千万万个“我”，在各种不同的民主决策结果面前，都忿忿不平地面对上述困境【例如，有的人是在医疗决策结果上，非常不满；有的人是在教育政策决策结果上，充满愤怒；等等】；那么，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就一定没有和平、平安和幸福；在这样的人民之中，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失败。

请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各种具体政策决策结果本身，就公义、平等、公正而言，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人们心中的各种怨言、不满、甚至愤怒本身，并不一定没有道理的，并不一定是不对、不合理的。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关键问题是，虽然有这样许多的、甚至看似很严重的不合理之处，虽然有这样许多的、看似合理的不满之处，但是，——民主制度本身怎样才能够，保持稳定、和平、长治久安，而不是被动辄轻易推翻、政权总是处于动荡更替的无序混乱之中？

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民主制度本身的局限性、有限性，如果我们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上述问题，应当怎样面对上述困境，那么，——我们国家社会中的民主制度就必然不会成功，就必然会跌入无政府主义混乱之中，并必然最终被专制主义所取代；我们就必然无法挣脱专制主义的欺骗、愚民、诡计、邪恶、与枷锁。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在各样的复杂政治角力过程中，在人民群众中间，如果没有一种深挚真诚的、敬虔热忱的、谦卑虚己的、以对于造物主上帝之

敬拜为中心的信仰，——来调和、引领、协调民主决策过程，并在民主过程中起到根基性的作用，——那么，从几个世纪以上的长远眼光来看，所谓民主制度就一定会面临失败，跌入无政府主义混乱，并被专制主义取代。

基督教信仰对于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成功，具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当人们以那属天的国度为心灵的归依，以造物主上帝自己为心灵归依的时候，那么，——就会在生命品格中有以下重要特征。一方面，这样的人会积极热心地投身于公共事务的讨论、投票、决策过程之中，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冷眼旁观。另一方面，当民主决策的结果是违背自己的愿望和观念的时候，这样的人并不会要死要活，以为自己是绝望的；——因为，他内心的倚靠，从终极的、根本的层面而言，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天上，在那上帝永恒的国度里。

最重要的是，在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为中心的信仰中，人们不会把自己当作是世界的中心，更不会颐指气使地把自己当作是绝对真理的化身，甚至要“替天行道”、唯我独尊等等；而是，在内心深处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因此，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心灵深处一定是真正谦卑的，因为他的心灵之锚，他的一切盼望与期待，究其根本层面而言，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那永恒的天上国度里。正是因此，他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既勤勉地生活、一丝不苟地努力去做好一切所当行之事，以热忱的心灵和情感，去面对一切世事和世人；但同时，他并不以这个世界为依归，而是把

心灵的眼目单单地瞩目于那天上的国度，就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盼望所在。这一点，正是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中马丁路德、加尔文以及无数英国清教徒们、和过去漫长历史中一代又一代无数敬虔基督徒们的深挚信仰和坚定信念。这种信仰和信念用一句简单的英文总结就是：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意思就是，勤勉热诚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以这个世界为归依。

正是这样的以圣经为核心、为根基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导致了现代民主主义革命的诞生。正是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能够使得民主制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稳定地、平安地、和平地持续下去，并使得其中的人民看见世事真理、享有幸福。

正是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使得无数人们以敬虔的心去顺服“在上掌权者”、顺服于世上的法律体系、政权秩序、决策过程；使得人民群众在民主决策过程中，无论决策结果是否如己所愿，都能够和平地彼此相处。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基督徒们在关于各项公共政策事务的协商与决议过程中，会主动而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会为了公共的利益而努力地献计献策；但是，若自己的一些主张和意见建议没有得到全体社会的采纳，那么，基督徒们的心里仍然是有平安的，因为他们在心灵深处的盼望与归依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

+++++

+++++

+++++

+++++

+++++

+++++

+++++

+++++

【【【引述 圣思录 顺服在上掌权者】】】

《顺服掌权者》：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13）

【第一部分】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人。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

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13:5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13:6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

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13:8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13: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13: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1) 正义是什么？正义的源头在哪里呢？正义是来自这个世界的吗？我们又应当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寻求正义呢？在这个世上能够得到完全的、真正的正义吗？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2) 这世上有多少罪恶，是在伸张正义的借口之下发生的。有多少人，看见不平，拍案而起；但是，他们却不过是在用一种罪恶来代替另一种不义。

许多人，想要伸张正义，但是他们的心中，却不过是在自以为义。

许多人，口中喊着替天行道（这话本身就是对神的亵渎），心里面热乎乎地热血沸腾；但是，他们心中，却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狂傲之心。他们内心的罪恶和污秽，遮盖在光辉理想的旗帜之下。

(3) 敬畏耶和华，是人智慧的开端。

在人们口中，无论是哪种所谓的正义，无论是哪种情境；如果，在人的心中没有对永生真神的敬畏，没有对神的圣洁、公义、主权、主宰、创造、救恩、恩慈的敬畏，没有人内心中发自内心的真正谦卑，没有摒弃自己心中的固执、愚顽、刚硬，那么，在人们中间的任何所谓“正义”都是枉然。人们所谓的革命，造反，战争，斗争，等等，都不过是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的野心、贪婪、罪恶、欺谎、虚空、狡诈、诡计、虚荣、负气、情仇、自义所充斥着、包裹着、裹胁着、淘汰之下的恶性循环。

那么，又该怎样呢？敬畏耶和华，是人智慧的开端。顺服在上掌权者。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退后，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使自己的生活圣洁；以爱对待人；祈求神，不乞求人；敬畏神；对掌权者应当恭敬而惧怕，但是，不要在灵里畏惧人；倚靠神，而不要倚靠人；活出基督的圣洁生命与爱，作基督救恩的见证；以彻底地的谦卑和爱，来对待所有的人，包括在上掌权者。

【第二部分】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13: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13: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这是人应当如何在世上立足、与人相处的一个基本原则。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第三部分】13:11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13:12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

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13:13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13: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我们真正的正义和公义，应该到哪里去寻求？是在那些“在上掌权者”那里吗？也是，也不是。关键是，我们的源头、归宿和倚靠，应该是在何处。我们应当以这世界为我们的源头、归宿和倚靠吗？不，决不是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11:13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11:14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11:15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11:16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我们在这世上，都是作寄居、作客旅的。这世界不是我们最终的家。坟墓更绝不是我们的归宿。以这世界为家的人，想要在这世上找到终极的公正；可是，他们无论是贫是富，无论是渺小还是伟大，都只能是品尝到真正的失望、眼泪、痛苦、无奈、疾病、衰残和死亡的滋味。在这世界中寻找正义的归宿的人，必然要空手失望而回。更何况：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又能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

我们更应当警醒自己，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13:13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

荡。不可争竞嫉妒。13: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只有当有了倚靠神的信、圣洁的生命、基督的救恩时，才能够在这世上真正地见证出神的爱、公义和圣洁。

++++
++++
++++
++++
++++
++++
++++
++++
++++

++++
++++
++++
++++
++++
++++
++++

Page | 530

+++++

+++++

+++++

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境况

本书前文已经简述了苏联以及其他一些东欧国家的二战前后历史。这里简述苏联在斯大林、赫鲁晓夫以后的一个重要领导人勃烈日涅夫的简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7%E6%98%82%E5%B0%BC%E5%BE%B7%C2%B7%E4%BC%8A%E9%87%8C%E5%A5%87%C2%B7%E5%8B%83%E5%88%97%E6%97%A5%E6%B6%85%E5%A4%AB>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906年12月19日—1982年11月10日），苏联领导人、苏联元帅，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4-1966年间为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掌权共18年。

他是苏联的第五位/第四代领导人，从1964年到1982年去世，一直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生于俄罗斯帝国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卡缅斯科耶的一个工人家庭。苏联在1917年10月革命后成立后，勃列日涅夫于192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在1929年成为正式的苏联共产党党员。当纳粹德国于1941年入侵苏联时，他加入了苏军并升为二战期间的少将。勃列日涅夫于1952年加入至中央委员会，于1957年成为政治局的正式成员。1964年，他突然发动政变，罢黜了赫鲁晓夫，并自命为总书记。1976年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恶化，长期服药控制，愈来愈淡出了国际事务。随着多年健康状况的下降，他于1982年11月10日去世，由安德罗波夫继任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在党内人士的评价比赫鲁晓夫民主，赫鲁晓夫当政时经常“圣心独断”，无视政治局的其他人，勃列日涅夫则通过协商以减少高干之间的分歧。在争取两个冷战超级大国间缓和的同时，勃列日涅夫实现了美国与苏联的核子武器恐怖平衡。勃列日涅夫政权领导下的大规模军备建设和霸权

主义扩大了苏联的军事干预（尤其是在中东和非洲）。但是苏联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不再如古巴危机前那般有效，苏联的探月成就在人们印象中被美国阿波罗计划登月取代。

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提供更高的社会福利，但政策缺乏自由化，经济分配效率依然低下，二战时美国对苏援助带来的技术优势不复存在，苏联与西方的技术差距迅速扩大，经济地位也被拥有高科技的西德与日本超过，国内产生了怀念赫鲁晓夫的年轻一代与特权阶层。勃列日涅夫对上一任政治改革的敌意换来了一个社会衰落的时代，被称为勃列日涅夫停滞。除了普遍存在的腐败和经济增长下降外，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扩大，使得共产党民心渐失。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上台后，谴责勃列日涅夫政府的无能且不灵活，然后实施了苏联开放政策。

早年经历

儒略历1906年12月6日（公元1906年12月19日），勃列日涅夫出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卡缅斯科耶（今乌克兰卡缅斯科耶）。1935年5月5日，勃列日涅夫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获得了热力工程师的证书。1935年至1936年间被征入兵役，在坦克学校学习后，被派到一所坦克工厂担任政治委员。1939年成为联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书记，主管该市的重要军事工业。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勃列日涅夫被征入军队，在多支部队内担任政治职务。1944年升为少将。1946年退役，二战期间他在军中的全部时间是负责政委工作，而不是当军队指挥官。

进入领导层

他在乌克兰的重建项目工作，后来再次成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第一书记。后来调任摩尔达维亚的党第一书记。1952年当选苏共中央书记。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改任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苏共中央第二书记。1955年兼任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积极推行赫鲁晓夫的垦荒政策（处女地运动）。1956年留任为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1957年开除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成员后，升任主席团正式委员。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与阿列克谢·柯西金、苏斯洛夫、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等人一起发动推翻赫鲁晓夫的十月政变，逼迫赫鲁晓夫提前退休并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之后与众人一起解除谢列平职务。1966年4月8日勃列日涅夫改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执政之初他待人温和，遇事总是与周围人商量后才决定，并不大权独揽，与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等人一起实现了“列宁之后第一次集体领导”。进入1970年代后期，勃列日涅夫的专权才渐渐浮现。

在结束了赫鲁晓夫的无序而带有自由化色彩的改革之后，勃列日涅夫的政策总体趋向于保守和僵化，其领导期间腐化和裙带风盛行。他在任期间，苏联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核武器的数量超过美国。在他统治后期，由于超高的军费开支和失败的计划经济，苏联经济已经停滞。

总书记任内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通过政变推翻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实行“静悄悄的斯大林化”，开始发表言论肯定斯大林之历史作用，并于1966年初决定终止“非斯大林化”。著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因在国外发表反斯大林作品，而被控犯“诽谤”罪投入劳改营，《古拉格群岛》作者索尔仁尼琴被流放，《让历史来审判》作者罗伊·麦德维杰夫被开除出党，《斯大林大清洗内幕》作者列夫·费尔德宾受到克格勃追杀。勃列日涅夫时代拍摄之电影《解放》（1972年上映）和《围困》（1977年上映）中，都出现了斯大林的形象，赞美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指挥中的功绩。勃列日涅夫还在1978年斯大林诞辰100周年时发行照相纸年历纪念册，并在1968年斯大林诞辰90周年时，在列宁墓背后的克里姆林宫城墙下中立了一座斯大林半身铜像，与基洛夫、伏罗希洛夫等人并列。但勃列日涅夫并没有重新把伏尔加格勒恢复为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之前的名字—斯大林格勒，所有被赫鲁晓夫改名的城市、工厂、企业也都没有恢复原来带有斯大林的名字。勃列日涅夫也承认“苏共二十大对破除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贡献”，除了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的哥里和首都莫斯科，苏联其他城市没有保留任何斯大林塑像。

赫鲁晓夫在1964年被勃列日涅夫罢黜之后，虽然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和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看来是延续修正主义，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朝鲜是在内部文件中谴责苏联为修正主义，但在公开场合中于苏联和中国之间左右逢源，来回摇摆，保证自身的最大利益。直到邓小平和阿利雅于1980年代分别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上台执政并进行经济改革，苏修这一说法才被废止不用），但在西方各国和苏联国内主流观点看来，勃列日涅夫上台却被视为恢复斯大林主义，主要体现在勃列日涅夫主义和苏联共产党官僚“干部队伍的稳定”，直到1980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最后苏共下台为止。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府与东正教会的关系比之斯大林时代的变化多端（在1930年代的打压消灭、卫国战争期间为打败希特勒进行的结盟）渐趋成熟，由于马列主义的宗教观点是无神论，苏联共产党党员仍旧严禁信仰宗教，但苏联政府对非党员的人民宗教信仰的干涉已大为减少，此时苏联政府与东正教会的关系被称为“处于十月革命以来最好的时期”。

对外方面他注重外交，推行“主权有限论”，声称当华沙条约成员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受到威胁时，苏联可以进行武力干涉，此为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他在1968年派军队镇压捷克斯洛伐克。1976年5月，他成为苏联元帅。1977年至1982年他去世前最后五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79年，由于阿富汗新政府取消了亲苏联的政策，他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成为导致苏联衰落和最终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尽管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极力在中东地区扩张，扩大了苏联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但当苏联支持的埃及和叙利亚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再次败给以色列之后，借助战后亨利·基辛格在以、阿之间的穿梭外交谈判，哈菲兹·阿萨德领导下的叙利亚开始谋求在美国与苏联之间进行平衡外交，不再专一依赖苏联。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领导下的埃及与苏联彻底闹翻、反目成仇。

任内他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69年在珍宝岛、铁列克提等地爆发了中苏边界冲突，之后苏联与中国关系在其任内长期没有改善，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逐渐成为对苏联来说仅次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死

敌。但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紧临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塔什干讲话”，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被认为是勃列日涅夫政府的对外政策变动的讯号，但是勃列日涅夫生前并没看见中苏和好，就在同年11月10日病逝了。

1955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铁托与苏联恢复正常外交关系。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一度又有恶化，后来随着中苏交恶与决裂，苏南关系又迅速升温。苏联政府在1968年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后，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一度又出现紧张，铁托派特使爱德华·卡达尔到北京面见毛泽东，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改善。为防止中国与南斯拉夫亲密，勃列日涅夫宣布勃列日涅夫主义宣称的苏联可以为了安全武装干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任何一国”的范围不包括南斯拉夫，苏南关系才再度改善。尽管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改善，但在内部文件中中国仍然谴责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直到邓小平上台，这一说法才停止使用。

逝世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在苏联首都莫斯科逝世，享年75岁。死后苏联经历长达三年的政治斗争、领导人更替的混乱局面。

11月12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俄共勃列日涅夫死亡，苏俄本质不至骤变，但终必于世界局势产生影响。而匪俄关系之纵横诡谲，尤其值得密切注意”。

影响

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的经济改革在1968年勃列日涅夫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后陷入停滞。进入1970年代，在对市场社会主义掀起批判浪潮的情况下，苏联的经济改革从强调改革传统体制到强调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由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加强对企业的控制，改革重心由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转移到合并企业，建立联合公司。但改革在苏联在东欧的卫星国（傀儡政权），如卡达尔的匈牙利、盖莱克的波兰仍有延续；如卡达尔的匈牙利政府在1979年进一步允许把亏损的国营小型工商企业改由职工承包或租给私人经营、把私营企业的合法雇工人数限制放宽到30人、除税收外政府不干预企业资金的流动、允许企业自主在社会上公开招聘管理人员等等。1983年，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710美元，是美国同时期的三分之一，而其卫星国东德则达到了5670美元，是全世界最富裕的自称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国家。但当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命令下入侵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导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对苏实施粮食禁运后，尤其是在苏联耗费大量财力应对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后，加之苏联石油出口也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落而缩水，苏联人民的日用品消费和副食（如奶酪、黄油）等的采购都受到明显影响，生活质量下降，1985年苏联人民每人每天要耗费2个小时的时间排长队购买食物。戈尔巴乔夫改革也因此开启。

勋章

勃列日涅夫晚年开始大搞个人崇拜，并嗜好勋章成癖，具有浓重的“勋章情结”，有“勋章大王”之戏称，一生获得至少114枚勋章。

所获勋章

二战时，曾获两枚红旗勋章、一枚红星勋章和一枚波格丹·赫麦里尼茨基勋章。

获得苏联英雄勋章4次，1976年12月，70岁生日时获得“苏联英雄”（一般只授予在军事上为苏联国家和社会做出伟大贡献的人士，苏联历史上只有朱可夫及勃列日涅夫本人先后4次获得该勋章）以及苏联元帅军衔。

获得列宁勋章（苏联最高国家勋章）8次，同样出于庆生。

金星奖章5枚。

1978年获得军队最高勋章“胜利勋章”，成为二战结束后唯一获得该勋章人士。他死后，1989年苏联取消了他的这枚勋章资格。

勇士勋章，波兰颁发，死后被剥夺。

联合国授予爱好和平奖章，世界工会联合会授予提供人民福利奖章。

居里夫人和平奖章。

1981年，“在苏共党内五十周年”纪念章。

1977年获得苏联记者协会的会员证，与此同时获得佩戴记者协会证章之权。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引述 论民主】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经济的本质

在近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文明大厦中，有三个人三本书，起到了重要的支柱性、启迪性作用，就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三本书，分别从法治、民主、经济三个角度，勾画出了一个关于现代社会架构的蓝图，并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践中，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乃至全世界各国政治建制与运作，广泛地影响了许多现代人心中的人文政治经济思想。当然，在他们出版了那些相关著作以后，后人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又进行了许多细化、深化、系统化的思想理论建树。但他们三个人的著作都具有代表性、革命性、原创性、开启性的意义。

但是，我们想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在整个近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文明大厦中，如果除去了圣经、除去了基督教信仰的重要影响与深刻的文化土壤，那么，所谓《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国富论》等等思想所代表的现代法治、民主、经济架构中，就只剩下的是贪婪、争斗、战争、私利、一盘散沙、与慵懒、拖沓、低效。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简单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经过、结果，或是研究一下法国大革命的喧嚣混乱【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人曾经试图摆脱宗教信仰的“束缚”，但很快国家陷入无政府主义混乱之中，导致许多内战和屠戮；最后，法国领导人认识到宗教信仰对于国家社会稳定与道德状态的重要意义，才努力地重建曾经被短暂抛弃的基督教信仰】，以及今日法国、希腊、意大利等等政府的腐败与低效，或是环顾一下今天世界上的诸如华尔街、伦敦金融区的无休无止的贪婪与明枪暗箭，或是西方世界里民主政治中的剑拔弩张、互相吵骂，那么，我们会深刻地认识到，《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国富论》所表达和代表的法治、民主、经济制度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世人生命与心灵之中的真实光景是什么，世人是否在内心中有敬虔、诚实、恩慈、寻求公义的立场。

在本章，我们简要地讨论现代社会中经济运作机制与民主以及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在英国崛起之前，欧洲曾经先后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依次成为海上强国。在英国之前的海军大国西班牙，尤其看重世上的黄金，因此，西班牙的世界航海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之一，就是想要在世界各地寻找黄金等物质财宝、财富。

然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对英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间接使得英国的崛起走上了一条与西班牙等海上大国之崛起非常不同的经济道路。

亚当斯密的最大的启迪性贡献，就是正确地指出，所谓物质性、经济性的财富，究竟是什么。

根据亚当斯密的定义，所谓经济性财富是指，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在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与能力。

换言之，财富并非是有形的黄金或是土地等等，而是一个人、团体、社群、社会的劳动创造能力、生产率。

更进一步，根据亚当斯密的思想，真正地增进财富的途径，不是在于囤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在于贸易；因为人们在贸易中通过彼此交换商品，从而达到“术业有专攻”，生产能力与技术精益求精；从而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所最擅长的那一种工作。这样，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调合作基础上，整个人类社会就能够走上不断进步、繁荣兴旺的道路。

在亚当斯密的贸易经济思想中的本质是，人类应当、也可以通过相互协作、分工合作、社会化大分工，来共同增进富裕程度。这种思想，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根本性基础和精髓，也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过去两百年内、尤其是在二战以后所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在自由贸易经济思想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假设性前提条件，那就是，在人类社会、各个国家、世人心中，人们愿意敞开心扉地、没有嫉恨地、彼此信任、通商贸易，彼此平等地互相对待、相互合作、共同富裕。

如果这个假设性前提条件不成立，那么，就无法建立起一个公平、平等、公正的贸易法规环境，人们彼此之间也无法互通有无、进行自由贸易和商品交换。

自由贸易必须需要一个公正、成熟、稳定、可预期的、透明化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如果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动荡，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彼此猜忌、甚至剑拔弩张、发动战争、互相好勇斗狠、争强好胜、一定要拼得你死我活，那么，从根本上说、从长期而言，自由贸易就不可能进行。

而显然，这种公平正义而稳定的政治法律环境，唯有建基于世人心中的公义、正义、平等、诚实、信实，以及对于法律、秩序、规则的遵守和敬畏。

在现代社会，这样的政治法律环境往往是在民主制度的政治框架下所提供的。

正如本书前文所述，一个公平正义、平等公义的法律规则秩序环境，从长

期而言，唯有是建基于整个国家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道德境况、以及内心深处的真诚信仰。

如果人们在信仰中是虚伪的、轻轻忽忽的、玩世不恭的；如果人们彼此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羡慕嫉妒恨；如果人们藐视规则与秩序，既贪婪、又喜欢偷窃；如果人与人之间不但没有诚信，而且蔑视那些说话算数、老实巴交的人；如果人们凡事都用计策，不是三十六计，就是孙子兵法的“兵者，诡道也”；如果世人的心中没有道德底线，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敬虔的信仰，信奉“人至贱则无敌”；如果在人间道德世界中，真的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么，所谓的自由贸易，不但不会大规模地发生、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反而，会激起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仇恨甚至战争，进而导致生灵涂炭的灾难。

在现代经济学理念中，人常常被看作是自私的、为了谋求自己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经济动物。

但是，从整个国家、社会、国际的层面而言，上述现代经济学理念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盲点，即，它看不到，个体的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选择待在秩序规则的笼子里面，以诚实守信的辛勤劳动、以宁可吃亏也不说谎的诚信态度，来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而不是以狂野不羁的、投机取巧的、坑蒙拐骗的、见缝插针的方式，来取得财富。

在一个秩序规则法治体系运转良好的国家社会中，或许，那些狂野的、投机取巧的、坑蒙拐骗的行为，会很快受到惩罚；因而，这样的违规行为并不常见。

然而，随着人类的经济活动愈来愈复杂，随着秩序法规越来越疏于坚守，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家社会中许多人信仰越来越不敬虔，越来越虚伪、徒有其表，终有一日，秩序规则体系就会岌岌可危、甚至崩解，从而，自由贸易也会随之消失。

在一个国家社会中，或是在国际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当中，如果大多数人都是没有敬虔信仰、没有对于法律规则秩序的遵守和敬畏、没有诚信与真挚的道德品格，那么，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就不会有开放式的、

自由竞争式的自由贸易机制。

在一个自由贸易体制环境中，从国家、社会、国际层面而言，人们必须认识到、并深刻地尊重两点。

第一点是，人们必须由衷地、从心底深处，真诚地尊重、遵守、敬畏秩序规则体系，而不是——处处喜欢耍小聪明，把别人的诚实和诚信，当作是愚蠢；把自己的诡诈，当作是智慧。

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也应当是如此。

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从根本层面、终极意义上而言，人们不应当把人类世

界看作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所主宰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世界，而应当是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真诚相处、公义、正直、恩慈的世界。

第二点是，在国际关系之间、国家内部关系等等之中，大多数人们必须有一颗诚实的、信实的、“爱人如己”的心灵。

所谓“爱人如己”是指，在人类中间，在人与人之间，应当彼此有博爱的心。这种博爱的情感是，每一个人在心灵中应当关爱他人，就像关爱自己一样。

请注意这里，并非是否定、放弃我们自己的正当、合理的利益，而是强调，我们应当关爱别人，正如同我们关爱自己。换言之，这正是我们在本书开始之处所引用的圣经话语：“我们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上帝同行”。

上述两点原则【即，第一，人们必须由衷地有一颗愿意谨守、敬畏、顺服的心灵；第二，人们必须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灵】都与基督教信仰内容有着深刻的联系。

以圣经为核心基础的基督教信仰，对我们的教导是：——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就是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无限全能、公义圣洁、慈爱恩典、无限智慧的、上天、上帝、造物主。并且，我们应当爱人如己。

人与人之间的爱，唯有是建基于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的根基与源泉，是来自于神。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爱里面，既应当包含着，对于良善、公平、正义、公义的追求和秉持，也应当包含着，对于罪恶的憎恶和离弃。我们的爱的本质，应当是憎恨罪，爱罪人。

哥林多前书13章：

现在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 1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2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3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

4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5不作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6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7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爱是永存不息的。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9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10等那完全的来到，这部分的就要过去了。11我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既然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12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象主完全知道我一样。13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马太福音5章：

43“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47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甚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48

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什么是良善？遵从那永生之神、上天、上帝、造物主就是良善。

什么是罪恶？悖逆那永生之神、上天、上帝、造物主就是罪恶。

上帝自己是分别良善与罪恶的根基与基准。分别善恶的终极权柄，唯有是属于神。他是道德律法的终极颁布者，更是道德律法的终极审判者。

人在内心中，若没有在上帝面前的真诚信仰、谦卑顺服，就也不会在他人的面前诚实、信实【宁肯吃亏也不愿说谎；宁肯吃亏也不愿违反规则与承诺】，也不会秩序、法律、规则、法规面前由衷地顺服、敬畏、谨守。

【许多世人在这个世上之所以暂时表面上遵纪守法，仅仅是因为他们害怕受到世上法律的惩罚。如果有法律的空子，或是如果人们意识到，违反法律规则、撒谎、占便宜、玩弄规则等等不会受到立刻的、严重的惩罚，——那么，我们会看见这世上许许多多人的内心真实光景如何；看见他们

以撒谎、虚伪度日；看见他们肆无忌惮地破坏规则、玩弄秩序，毫无真诚敬畏之心。】

人在内心中，若没有在上帝面前的真诚信仰、倚靠、热忱，就也不会真正地爱人如己。在这个世界上，在一切被造的世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没有瑕疵、没有罪污的。在我们的生命与心灵深处，充满着深刻的、本质性的罪性与罪行。我们对于他人的真诚之爱，唯有是建基于我们首先的、对于上帝的爱中。这正如，在一个大家庭中，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都有着许多的缺点）之间的爱，首先是建基于他们对父母的爱。只有在我们心里对于上帝的热忱真挚之爱，才使我们有力量去真诚地饶恕别人、接纳别人。

在现代的世界，自由贸易是经济的基础与根本支撑。自由贸易的本质是整个人类进行社会化大分工、大生产；在人类社会中间，各样不同的人群各司其职、各专其长、各尽其事，从而每一个人都能够为整个社会做出最大的、最高效的贡献。

在各种不同的、五花八门的劳动生产活动中，都往往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熟能生巧；即，如果我们大批量地专门做同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人类）就能够便于发明出极其快捷甚至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模式，从而使得商品的成本变得极低、价格变得非常便宜。例如，今天的大规模汽车生产线工厂，可以平均不到一秒钟就能够生产组装完成一辆汽车，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正是在此。

在过去五百年来，近现代化工业文明，除了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诞生与爆炸性发展以外，其巨大成功的奥秘就是在于，自由贸易所导致的人类整体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分工模式。

但是，上述的人类整体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分工模式，必须依赖于良好运行的经济秩序与规则体系。否则，从长期而言，所谓自由贸易体系就是不可能的。

现代经济学中所常常忽视、甚至无视的，就是我们在本章前文中所阐述的重要前提性假设。那就是，在整个自由贸易体制系统内，所涉及到的人们、社会、各个国家，必须应当有着谨守和敬畏秩序规则法律法规体系的心灵，以及，必须应当有着爱人如己的心灵【在这些背后，就是公平、正义、公义、顺服、谦卑、敬畏与敬虔的信仰】。否则，所谓自由贸易，不但不会给人类带来福祉，反而会引发巨大的冲突甚至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有着很复杂的原因和许许多多的直接间接因素，但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德国体系与英法体系等等之间因贸易冲突而逐渐激化所导致的深刻结构性矛盾。今天，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随着中国得益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而得到飞跃性发展、但却不愿意遵守许多承诺和世界贸易规则秩序，很可能会愈演愈烈，甚至导致战争。这种冲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政治经济背景环境，在某些角度，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源自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经济理论与思想，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它在一百年前开始在俄国付诸实践，并直接导致了世上许多的专政暴政，导致了数以

千万计、甚至数以亿计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因专制统治者人为谬误国家政策而引致的大规模饥荒，以及数以百万计人被关进劳改营、集中营、监狱、强迫下放劳动、甚至被直接屠杀等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甚至直到今天，在中国、北朝鲜、以及南美等国家地区，这样的思想仍然还很有市场、很有号召力，仍然得到许多人在内心的真诚信从。

那么，社会主义的错误根源在于什么呢？为什么它这样具有迷惑性，以至于在二战以后、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鼎盛时期，曾经席卷了世界上俄罗斯、中国、东欧各国、越南、北朝鲜、柬埔寨、古巴、南美洲【当然，许多东欧等国家往往都是在苏联的武力逼迫之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国家内部、包括曾经的东德内部，都有很多真心拥护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等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呢？甚至，直到今天，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西方高等学校的文科院系中，在西方左派政治势力中，甚至在西方（包括美国）的选举政治中，仍然很有市场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究竟在于什么呢？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着真理吗？为什么？社会主义思想的致命性错误是什么？

有人说，在马克思主义与希特勒纳粹主义之间，有以下两个共同点。

第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否认、或远离对于上天、上帝、造物主的信仰；它们都推崇人自身的伟大性、光辉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劳动人民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光辉的。在纳粹主义中，日耳曼人民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光辉的。然而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上，由于它们所推崇的劳动人民或是日耳曼人民需要一个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代表、反映者，于是，它们就必然推举出一位伟人，来真实地体现它们的推崇对象。因而，它们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都聚焦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以及不可避免的专制暴政。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卡斯特罗、金日成等领袖独裁人物。在纳粹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希特勒这样的领袖独裁人物。

它们所诞生的文化土壤，都与其文化思想氛围中的无神主义影响有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德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纳粹主义思想的兴起，是德国十九世纪无神主义哲学兴起的直接结果。在十九世纪，当年在德国最优秀的大学中，盛行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种族优越论思想、无神主义思想；以至于著名哲学家尼采在著作中写道：

“上帝死了”。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德国主流哲学界，盛行着自然神主义、泛神主义思想【即，否定上帝的位格性，否定上帝是能听、能看、能言的，否定上帝的自由意志，或是把上帝与世界本身看为同等，或是把上帝看作是无知无觉、没有意志的一种超自然之理、意识流、规律、因果逻辑、等等；或者，认为——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以后就撒手不管了；除了用自然规律管理世界以外，上帝并不干预和涉入这个世界中的事务和自然现象；等等】。这些思潮【也包括德国以外、诸如法国思想界许多学者、英国学术界的一些教授，等等】，终于导致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突然流行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纳粹主义者。

正是因为他们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以及其中万有、创造世人生命的上天、上帝、造物主、那生命之主，那无限全能、全知、全在、全备，那能听、能看、能言的，那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帝，那圣经中所启示的救赎主；——所以，他们才把心灵的眼目转向地上的被造之人，把对于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当作是自己的生命的倚靠、心灵之锚、心灵的归依。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伟大劳动人民，还是纳粹主义所推崇的伟大日耳曼人民，都显明了，世人在内心深处的自以为义、自高、自傲。

我们绝不是在这里说，劳动人民就不好，或是日耳曼人民就不好。固然，在劳动人民的身上，在日耳曼人民的身上，从世事的角而言，有着许多美好的优点、品格、道德素养、聪明、富有才干、智慧、勤劳、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而谦卑地认识到，从根本的本质层面而言，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人群、任何团体、任何阶级、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是完美至善的，都不可能是没有瑕疵与本质性罪污的；也都不应该被当作是一种心灵的偶像，供世人来顶礼膜拜。恰恰相反，在人类中间，我们彼此之间在本质上应当是平等的，应当彼此是兄弟姐妹，应当一同地把我们的心灵归向那公义圣洁、慈爱恩典的天父，应当单单地仰望和敬拜事奉他。

第二个共同点是，关于人类社会事务层面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之事，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都认为，人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不可调和的、不可原谅的矛盾；这些矛盾，只能通过一方彻底地消灭另一方，来得到解决。

在马克思主义中，这种深刻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阶级斗争的矛盾。在纳粹主义中，这种深刻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种族斗争的矛盾。因而，马克思主义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联合起来，进行本质性的、暴力性的社会政治革命，彻底地、暴力性地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正如毛泽东先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画画绣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而纳粹主义的种族灭绝行动以及专制暴政就更加令人震惊、举世皆知、臭名昭著，我们就不在此赘言。

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在世上其它思想体系、伦理系统或是宗教信仰体系（例如伊斯兰教等）中，我们也常会见到，——这种推崇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消灭敌人、打倒敌人的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文化，就像是在中国共产党中有一段著名的话，说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请注意，因信称义的教义思想体系并不是说，我们的行为就不重要。恰恰相反，我们外在的言语行为，正是我们内在真实信心的写照与表现。然而从根本上、终极角度说，我们的义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更不是由我们的外在行为所决定和体现【否则人就在心中自以为义，自高自傲，俾倪、藐视他人，甚至憎恨他人、争斗不息】。我们的义，唯有是建基于上帝自己所赐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为我们所成就的、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之人的永生恩典。

正是由于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因信称义的信仰，我们才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义，不是在于我们自己，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完完全全地在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完全全地是出于他的圣洁无罪，出于他为我们而死、承担了我们所本应承受的罪债与刑罚、所成就的赦罪之恩典。因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对我们的饶恕，所以，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才得到赦免，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他和好。因此，我们在任何世人面前，就无以自夸，更无法自以为义。因而，我们才深刻地知道，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应当以饶恕的心，去对待他人。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的两点共同点的比较中，我们能够看见，其根本性的、本质性的症结就是在于，人在心灵与灵魂深处，背离、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上天、上帝、造物主，背离了那道德法则的终极基准与颁布者、那道德律法的终极审判者；因而，人在内心中自以为义；从而，人在面对世上他人的时候，——（1）或是以之为自己心灵生命的归依【即，对于领袖、对于权力的无限个人崇拜】，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独裁；（2）或是以之为自己的敌人、死敌，甚至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地对待敌人，直至彻底消灭对方，而心中没有本质性的谦卑、饶恕与恩慈的态度。

请注意，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就应当逆来顺受、与世无争、消极遁世。恰恰相反，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倚靠那天地之主、我们生命救主的人，应当以热忱而勤勉的人生态度，在这个世上努力

地生活、去做好一切当作之事，而不应当慵懈怠息、更不应当唯唯诺诺、胆小懦弱。我们应当努力地秉公行义，寻求正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

我们应当憎恨罪，但是要爱罪人。我们所争战的对象，不是世人，而是罪。在这个世上，我们所爱的对象，不应当是罪，而是罪人。

以弗所书6章

10最后，你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刚强。11要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12因为我们的争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13所以要穿起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在这邪恶的时代里可以抵挡得住，并且在作完了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稳。14因此，你们要站稳，用真理当带子束腰，披上公义的胸甲，15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了，当作鞋子，穿在脚上，16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17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 神的道，18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随时在圣灵里祈祷，并且要在这事上恒久警醒，为众圣徒祈求。

马太福音5章

43“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47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甚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48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

现在，让我们继续思考，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与精髓，及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是一种建基于无神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以及人类共同享有和均分财富的乌托邦社会思想。【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以地上的财富和国度为世人生命与心灵的终极归依；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讨论、阐述上帝之国与地上之国之间的异同与关系。】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子集，所强调的是：——社会经济财产分配原则，倾向于公有制、计划经济、平均分配、劫富济贫等等特征。

我们应当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思想并非是完全彻底错误的。其所重视的关于社会财产尽量平均分配、避免贫富分化过于严重、等等，是有其道理与价值的。事实上，西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就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极其强调了避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福利政策等。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西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中，直到今天，一直有着强烈的造福于大众的主旨和内涵，这并非是受到什么马克思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是受到自古以来基督教信仰思想的巨大推动和深刻影响。

公道地说，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避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的内容，并非是错误的。

但是，社会主义思想与体制的致命错误在于，（1）过于强调集体主义、否定人的生命独特价值与人的生命自由；（2）思想控制与言论控制；（3）专制主义思想，邪恶与欺骗；（4）社会经济发展上的乌托邦主义，以及国家经济道路的荒谬性；（5）无神主义内核；否定公平竞争；平均主义、大锅饭；丑恶的社会管理机制与控制；思想层面、理念层面的空洞、荒芜、荒谬、谎言；统治者的自私、腐败、欺谎。

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在一个经济体制中，通过经济资本的置配、自由流动、分配管理、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等等机制，促进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与高效化，从而为人类社会整体创造更大的物质性财富。

相对而言，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大一些范畴的政治经济词汇，因为它不仅包含了经济运作思想与原则，也包含了政治思想理念、社会思想理念体系等。在社会主义框架下，由于其对于集体主义的强调、对于个体主义的践踏和压制，因此，其政治思想理念与社会思想体系往往是专制独裁的，因而往往是邪恶、欺骗的；并且，它会千方百计地控制人们的思想，消灭个体的生命与思想自由，试图把所有人都变成国家机器上的某一个无知无觉的零件与螺丝钉。所以，社会主义往往与专制主义有着强烈的姻亲关系。

资本主义则往往具有民主主义的色彩，尽管两者之间并不一定严格划等号。资本主义往往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术语，仅仅包含经济运作范畴的含义，而不像社会主义这个术语那样，既包含了经济、又包含了政治性意涵。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由于其对于自由竞争、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公开竞争的鼓励，因此，资本主义往往最终会强烈地倾向于民主主义制度，倾向于社会整体的公开化、自由化、民主化、去中心化、平民化。

然而请注意，正如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本身一样，资本主义本身并不一定具有道德好坏、善恶的意涵。

正如本书所开宗明义地指出的，民主制度本身并不一定适用于任何人民。譬如，在圣经创世纪中所记述的所多玛、俄摩拉，虽然看似是由主流民意所驱动的社会结构，但是，他们所行的事情却是恶事；他们所作的，在耶和华永生之神的眼中是罪大恶极。严格地说，从长远、长期的稳定状态而言【而不是从短暂的、短期不稳定的状态来看】，民主制度是圣洁自由之民所进行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换言之，如果人民、百姓不是自由而圣洁的，如果人民中的大多数不愿意寻求真相、渴望真理，没有行公义、好怜悯的心灵，那么，在这样的人民中，所谓民主制度并不能长期地存在；在这样的人民社会中，即使短暂地出现民主政治制度形式，也会是昙

花一现、很快会陷入无政府主义混乱喧嚣状态、并很快会因此被专制主义野心家政治集团和政治势力革命、篡权、推翻。这就是十九世纪法国革命中混乱喧嚣的历史，也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混乱喧嚣的历史。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鼓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公平竞争、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机制和经济制度，与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一样，严格地说，从长远、长期的稳定状态而言【而不是从短暂的、短期不稳定的状态来看】，也应当是建基于自由圣洁之民所组成的社会体系之上。

这是因为，如果，在一个国家社会中，人民大多数成员在社会事务上、公共世事上都没有正直之心，不愿意行公义、好怜悯，——那么，若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利用、欺压、坑蒙拐骗、尔虞我诈、贫富严重不均。在这样的国家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不能长久而稳定地运行；饥饿之民就会常常起来造反、打家劫舍，或是像马克思主义所煽动的那样，——政治集团利用所谓无产阶级来推翻资产阶级。

这正如，马克思在著名的《资本论》中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的这句话，虽然是夸张的、偏颇的、别有用心的；但是，却也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

在这里，我们且不说马克思本人的不道德的私生活，也不说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所推崇的狂风暴雨般暴力革命中的不义、不公、欺骗、罪恶、甚至邪恶，及其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所引致的数以亿计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与苦难。而是，我们在这里指出，仅仅作为一个在整整一个多世纪中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暴力征服与谎言欺骗的形式达到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思想意义上的影响性】了人类几乎四分之一人口的思想家，马克思【以及他所代表的、启发的无数后世思想家、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的致命性漏洞和谬误。

的确，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缺陷与弊病；但是，他却无视、甚至故意忽视了，从十七世纪以来，一直到他所生活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巨大益处和福祉。

马克思的思想既是浅薄的【因为它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缺陷与弊病的真正病根与医治之法】，也是偏颇的【因为它忽视、无视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带来的巨大益处；更重要的是，它没有看到，也并不深刻理解，这种巨大益处是来自于何处以及为什么，其本质原因和机理究竟是在于什么。换言之，它并不真正理解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公平竞争体制的本质精髓与益处所在】。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性谬误，也正是它邪恶所在之处，就是在于，它完全地误解了、谬解了、错待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在于什么。

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像是一个庸医，看见战场上一个战士的胳膊上中了箭伤，箭杆露在皮肤外面，箭头插在肉里面；于是，这个庸医拿出剪刀，剪断箭杆，并用一个锤子在那受伤的胳膊上狠狠地砸下去，让箭头在肌肉里面陷得更深；然后，庸医自豪地大声宣布说，这个人的箭伤被治好了，因为露在皮肤外面的箭杆已经看不见了。

马克思主义思想正确地看见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但是，

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彻底地扭曲了、玷污了、糟蹋了文明的真正价值，彻底地毁坏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个体生命价值本身是没有终极意义的；人的个体生命和价值，唯有能够在集体中体现、实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专制主义、国家集权主义、独裁主义、甚至纳粹主义异曲同工的本质原因】。

马克思主义决绝地宣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救赎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它公然地、厚颜无耻地宣告，无神主义思想是伟大的、光辉的。它撒谎地、诡诈地对世人说，这世上并没有什么救赎主、没有神仙皇帝，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然而在政治现实主张中，它却剥夺人的自由与生命的高贵价值，把人置于思想奴役、身体奴役、经济奴役的铁链之下。

请注意，我们并没有在这里说，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是不好的。事实上，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重要优秀道德品质之一。但是，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建基于公平、正义、平等、公义、良善的基础之上，必须建基于公义圣洁的道德法则基础之上，必须建基于我们对于那无限全能、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天、上帝、造物主的信仰的基础之上。

当人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上天、造物主、上

帝的时候，人就会迷失在世事的喧嚣之中，就会看不清人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在于何处，看不见人的心灵与灵魂的隽永价值和意义。

当人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永生之神的时候，世人良心中的道德法则也就失去了隽永的价值和意义，真理就成为了强权的丫鬟，政权就成为了枪杆子的机器，国家就在本质上与黑社会无异。在死亡面前，任何以属世之事为根基和归依的道德说教，都是苍白的，甚至是滑稽的。

只有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全能与无限智慧，看见他的公义圣洁与恩典慈爱，我们才能够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是在于什么。

我们都不仅是被上帝所造的，而且是被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因此，在人的里面，有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的能力，有心灵和灵魂，有思想、智慧、意识、理性、情感、爱、等等的美好能力。

正是因此，人的生命与自由才是高贵的。

人的生命与自由是珍贵的，因为那本是能够指向永远的、圣洁属神的生命。

在这个被罪所充满的世界上，在世人生命的里面，都普遍性地、本质性地遍满了罪。在每一个世人的心中，都是背离神、不愿意寻求公义的；都是自以为义的，是自高而自傲的；都是在为了属世之利而活着，以属世之事为自己生命与心灵的归依。但是，那内心谦卑、看见己罪、承认己罪、并真诚愿意悔改己罪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马太福音5章

1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2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3“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4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6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7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8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 神。

9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10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11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12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

在一个国家社会中，如果人们都是敬虔而真诚地信靠上帝，倚靠他的救赎与恩典，饥渴慕义，勤勉而公义圣洁地生活与工作，——那么，这样的国家中就根本不会出现马克思主义眼中所看见的那些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缺陷。

然而，在这个地上的世界是复杂的；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世事中，常常看见好坏参杂的因素、泥沙俱下的局面。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也是如此。

一方面，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信仰在思想与文化上，对于西方各个国家产生的深刻影响，早已经在许许多多历史记忆与文化土壤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整个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的蓬勃发展，包含着深刻广泛的博爱之心，包含着对于社会全体大众、乃至全人类的巨大福祉。任何看不见这一点、或是故意无视、忽视、蔑视、否认这一点的——人、思想、主义，就像是马克思主义一样，——不但是浅薄的、虚伪的、欺谎的、自私的，而且是罪恶的、邪恶的。

另一方面，虽然，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的蓬勃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性利益与许多精神文化方面的福

祉，但是，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些近现代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乃至现代民主主义制度，并非是终极的真理，并非是我们心灵的归依和倚靠。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无论是近现代科学技术、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或是自由贸易经济，当被应用于一个没有信仰、没有敬虔、没有敬畏的社会大众文化土壤中的时候，那么，它们所带来的，就很可能不是福祉，而是灾难，甚至是巨大的灾祸。

在满清末年、民国初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曾经喊出“德先生”【即民主】“赛先生”【即科学】的口号。他们以为，用民主和科学，就能拯救中国脱离愚昧、落后、黑暗、败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局面。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民主与科学本身，并不能向我们指明，人生命与自由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它们本身，也不能带给我们敬虔的信仰、良善的道德、恩慈的心灵、公义的信念。固然，现代民主主义的诞生，正如现代科学的起源一样【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书】，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以及相应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等有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它们本身却不能代替：——那真正的、诚实的、真挚热忱的，对于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上帝的敬拜与信仰。

单从经济制度角度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由贸易制度是好的，但它们必须应当被置于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则、体系之下。

这样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则、体系，应当是保障和重视人的生命与自由的。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应当是鼓励公平竞争、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的。但同时，它不仅是应当“行公义”的，而且更应当是“好怜悯”的；应当是注重避免社会贫富严重分化，避免贫穷百姓得不到照顾。

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成功，正是因为它在制度体系化设计中，不是假设人是有罪的、无辜的，而是恰恰相反，它清醒地看到，在世人的心中，普遍地存在着罪性。因而，它在体系设计与规划中，处处尽量实现和体现权力分散化、制衡化、去中心化的原则，同时尽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尽量保障政府行政部门的有效性、有力性。

请注意，这并不与我们在本书的主旨中所反复申明的内容——“民主是圣洁自由之民在这个世界上进行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相矛盾。

一方面，一个成功的民主主义制度，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人心中普遍的罪性，并从而在制度体系设计上不好高骛远、不好大喜功、而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权力制衡的规则化设计。

另一方面，一个成功的民主主义制度，必须建基于人民诚实的心态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体系中，虽然，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被罪所羁绊，但是，在人民大多数成员心中，必须愿意寻求真理和公义，必须愿意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必须有饥渴慕义的心，有真诚与敬畏的情感。

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公平竞争制度，也是同样如此。

一方面，它们应当在公平正义的规则秩序体系的约束与制衡框架之下。另一方面，它们应当建基于人民普遍诚实的心态基础之上。

一方面，它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世人心中所普遍存在的、本质性的罪【所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采取规则秩序体系与制衡机制框架】。另一方面，它们应当认识到，人生命与自由的高贵价值和意义【所以，尊重和推崇人思想与生命的珍贵价值和自由】。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思想体系的致命性症结根源，就是在于，它们没有看到上述两个方面的精髓本质，因而望文生义地、彻底地误解了、扭曲了、歪曲了现代民主主义政治、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竞争经济制度。

更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思想体系的致命性症结根源，就是在于，它们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它们的出发点，与现代民主主义政治、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竞争经济制度的出发点，是完全相反的。在上述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现代民主等政治经济制度完全南辕北辙。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假设人性是无罪的、无辜的，劳动人民是伟大光荣的；它们看见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的不完美，于是提出，彻底砸烂那些制度，重新建立一种建基于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所谓完美制度；然而，在这样的所谓完美制度中，却既不尊重人的生命与自由的高贵价值意义，也不明白，人生命与自由的真正珍贵意义，究竟来自何处。

上文所述，现代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平等竞争的经济制度之中，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它们应当在公平正义的规则秩序体系的约束与制衡框架之下（换言之，它们清醒地认识到人心中普遍存在的罪性）；另一方面，它们应当建基于人民普遍诚实、愿意寻求公义的心态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生命与自由所本来应有的高贵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这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都与基督教信仰有着深刻的关系，是直接地来自于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

这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应当认识到，在世人的生命与心灵深处所普遍存在的本质性的罪；也应当认识到，人生命与心灵本所应有的高贵价值和隽永意义。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是创造我们的生命之主。我们都是上帝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因此，人的生命在这个宇宙天地之中，是最高贵的、最奇妙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的生命本所应有的圣洁与高贵价值意义，所以，我们才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世人常常说谎、占便宜、自私自利、冷漠无情、没有信仰与敬虔人生态度、等等，从本质而言，是多么地污秽鄙陋、罪恶不堪。

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良心之中都无可置疑地知道自己在本质上的罪污、撒谎、不义，所以我们才珍视那来自于上帝所启示的救赎恩典、圣洁信仰，更在内心深处为罪而忧伤痛悔、饥渴慕义，真心真意地愿意悔改己罪、完全归向我们的生命之主、救赎之主，得着那真正圣洁没有瑕疵的、能够直到永远的属神生命。

因此，我们在这里清晰地指出，现代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

制度、自由平等竞争的经济制度，正如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样，——它们之所以诞生，正是由于直接地受到了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的深刻影响而导致的。它们是来自于上帝所启示的、那真实的、指出世人生命之罪、并赐下救赎恩典的信仰。

然而，我们却不应当把它们当作是我们思想的偶像，而是恰恰相反，应当深刻地、清醒地认识到，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和隽永的意义。它们绝不应当是我们的心灵所期盼、归依和倚靠的终极真理。它们绝不应当是我们所信靠的对象。

我们的生命、心灵与灵魂所期盼、归依、倚靠的对象，应当是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就是那全能、全知、全在、全备的、至善至美的、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帝。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生命之主；只有在他那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在他那里，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良善与公义。他是我们的永生之神，是那属天国度的君王，是把饶恕与赦罪恩典赐给我们的伟大救赎者。他就是圣经里所启示的那位伟大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永生真神。圣经是他的完全而全备的话语、启示和旨意。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谦卑诚实地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真挚地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恩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是属乎天国的百姓，必将进入那无限幸福美好的永生国度之中。

自由贸易与社会分工

自由贸易经济的本质，是在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精诚协作、共同生产、共同致富。自由贸易经济的成功正是在于，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化的大分工、大生产。在今天的经济产业链中，有数以亿计的、甚至更多的不同产品、零件、食品、用具、硬件、软件、服务。在整个人类社会中，一般性而言，每一个人都勤勉地工作，并专注于各自擅长的事项，从而在国家社会整体上，乃至在整个人类世界的国际合作中间，人们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精细分工、深度协作。

这种大规模的、大分工的社会机制所必需的，正是公平、正义、平等、公义的政治制度、秩序、法律、规则体系框架。固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完美的，也没有什么政治制度、秩序、法律、规则体系框架是完美的，但是，一般性而言，就主流性质来说，整个国家社会、乃至整个国际秩序，应当是基本上公平正义的，是互助互利的；一般性而言，人

们应当基本上彼此诚信、信任、以善相待；人们应当以宽容良善的心、而不是仇恨的心态看待彼此；——否则，从长期性、根本性来说，自由贸易制度就不会真的成功。

=====

财富的定义

在人类经济体制中，如果人们在心底以此世的物质性财富为心灵的终极性归依，那么，人们就往往会为自己积聚财物、金钱、房屋等等；而不愿意走出去与人交换商品、或是消费商品、促进商品经济流通。从而，繁荣发达的自由贸易经济就往往不会发生。如果人们的心灵沉浸于积聚此世的物质性财富与黄金等等，如果人们在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中自满自足、裹足不前，以之为自己的心灵的归依、生命的归宿，而不思进取，那么，除非迫不得已，人们就往往不会愿意主动地去与他人进行分工合作，更不会想到去与异国他乡的人进行大规模产业协作。

因而，亚当斯密所开创的现代经济理论所作出的划时代贡献，正是让世人看到，财富的定义，不是在于有形的、物质性的东西，而是在于生产物质商品的能力、生产率、知识技巧。换言之，财富不仅是一件关乎身体的事情，更是一件关乎心灵的事情。

正如本书上文所言，现代经济制度本身并不应当被我们看作是终极真理，因为它是有所局限的。如果说，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它对人类社会有益，那么，它之所以有益，其益处正是因为它来自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并深刻地受到了基督教信仰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某些正面性的、积极性的影响。正是因此，现代经济制度虽然是讲述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但是，从一般性、整体性、主流性而言，它迄今为止并没有把西方世界拖入自私自利的彻底混战局面之中，而是相反，通过国家社会的大规模协作，使数量巨大的世人脱离贫困之境。

然而如果有一天，当人们忘记了上述这一点的时候，当人们离弃了敬虔真挚的信仰的时候，当人们心中的罪愈来愈泛滥，而不是谦卑真诚地悔改己罪、寻求公义、行公义、好怜悯，——那么，自由贸易等等现代经济制度，就会显明其深刻内在局限性，显明人心中之罪的丑恶，甚至给许多国家地区带来更深的冲突、混战与灾祸。

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

【引述 论民主】

什么是民主？从根本层面而言，我们的回答是，所谓民主应当是指，自由、圣洁之民所进行的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

从抽象的概念而言，民主并不能适用于任何百姓中间。这是因为，显然，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人都是暴民、好勇斗狠之辈、自私自利之徒，如果人人都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厚黑学”等等为人生的根本法则，甚至公然地杀人放火、荒淫靡乱、坑蒙拐骗、以罪恶为荣、毫无底线，那么，这样的人民所组成的所谓“民主”社会，就会像圣经创世纪中所记述的所多玛、俄摩拉等古城一样，其中充满了荒淫、暴力、欺压等等喧嚣混乱罪恶之事，并最终必将灭亡，面临那无限圣洁公义之上帝的终极审判与刑罚。

不过好在，今天的现实世界中，毕竟，世上的各国各民族大概还没有糟糕到像所多玛、俄摩拉一样败坏的那种程度。

然而，我们必须反复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民主本身，并非是绝对的、终极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更不是解决人类社会与政治经济中任何问题的万灵药。

在这一点上，一百多年前当满清灭亡、民国政府成立的时候，当后来的五四运动很快爆发的时期，甚至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或许都对于民主的价值和意义有着深深的误解。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许多开明知识分子、许多拥抱西方文明的人士们，以极其渴慕的心态，期望把德先生（即民主）与赛先生（即科学）引进到中国来，希望——使近代史上多灾多难的中国得到拯救，使许多贫穷落后、精神愚昧的中国亿万百姓能够得到救助、更新，使中华民族能够真正走上

民主富强自由之路。但是，过去一百年的中国近当代史显明了，当年那些知识分子们的梦想，今天并没有完全实现。固然，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而言，科学教育的普及早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人们的心灵与信仰却仿佛仍然是空的。今天的中国人，似乎离民主、自由、和平仍然很远。即使有一天，假如在中国大陆实现了民主制度，可是，人们是否会在民主体制下和平相处、互相尊重，而不是互相争斗、剑拔弩张、苦毒暴戾——这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

因此，我们在谈论民主之目的、途径、方式、等等之前，首先应当谨慎、认真、深入地思考，究竟什么是民主，民主意味着什么。既然我们已经着急了一百年了，那么，就让我们再多有一些耐心，来冷静、客观、深入地思考一下：我们所追求的、梦想的目标，所谓民主，究竟是什么。

民主的一个核心精髓，也是一个核心难度性的挑战在于，人们怎样能够和平而智慧地处理彼此之间的不同意见。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社会很快就会跌入吵吵闹闹、混乱不堪、甚至失序的无政府状态。事实上，在社会政治中，民主所面临的两大敌人，正是这两个极端败坏的社会政治形式：专横暴力的专制主义，与混乱无序的无政府主义。

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人是这个宇宙自然世界中最为复杂、微妙、珍贵的存在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事情之一。在人与人之间，有一件似乎存在着内在本质性矛盾的事情，就是，我们既应当坚持正义，又应当宽容待人、并愿意常常妥协。换言之，我们既要有公义，又应当有恩典。在某些事情上，我们应当坚持己见；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我们则要愿意常常妥协、后退。常常地，在坚持与妥协之间，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不仅取决于我们所面对之事情的性质本身，也取决于社会中其他相关人士们对于此事的意见。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既要学会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又要不失灵活性，时刻准备放手、时刻准备妥协、让步。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统一的、一成不变的公式，来决定什么情况下应当坚持，什么情况下应当妥协；因为世上的万事之中，都存在着长期、短期、全局、局部、主流、支流、大环境、小气候、大目标、小阻碍等等数不胜数的变量与因素，决定了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每一件具体的世事。

=====

民主的关键，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所谓“人民当家作主”；而是，民主的关键在于，在一个庞大的、由许许多多个体之人所组成的复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究竟怎样能够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在各样的事情上最大程度地达成一致意见。换言之，民主的核心涵义是在于，由数量巨大的个体之人所组成的人民，究竟怎样才能够自己治理好自己。

在一个国家、社会中，在人民自我治理的这种过程中，若想要达成顺利的民主进程与民主制度，人民至少需要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大多数人民中间，人们应当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异同，并且愿意重视公共利益的重要性。

第二，在大多数人民中间，应当有起码的是非、公义、平等、诚实、和平、仁爱、等基本的道德法则与道德品质。

第三，在大多数人民中间，人们应当愿意以诚实谦卑、实事求是的心，寻

求事实真相，寻求真理。

第四，在大多数人民中间，人们的生活、生命、心灵应当是基本上自由的，而不是如同奴隶一般，眼睛被蒙蔽，耳朵被堵上，嘴巴被捂住，既无法知道世事真相，也无法发声。

我们如果深思以上条件，就会认识到，上面的四个条件虽然看似简单、基本，但却实际上非常复杂、深邃，而且很难量化、测量、验证、校准。

不过，至少，正如上面所引述的所多玛、俄摩拉那样的情况所显明的，我们无可置疑地知道，民主本身，并非是没有前提条件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强调指出：所谓民主应当是，自由、圣洁之民所进行的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

这并不是说，民主社会中的人民，就非得要完美、毫无瑕疵不可。事实上也绝非如此。在这个地上世界中，在人间社会中，不可能有完美的国度，也不可能有完美的、毫无任何缺点的百姓。从本质上说，只有上帝的国度才是那完美的、能够持续到永远的国度；上帝之国是属乎天上、而不是属乎地上的。上帝的国度要在那属他的百姓中间建立起来；上帝的百姓要有着成圣的生命；上帝的国度是指向永恒、永生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地上之国与上帝之国之间，就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世上的法律，还是世人的心灵；无论是情感、理性、灵魂，还是关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之中的真理；在地上之国与上帝之国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绝不可忽视的关系。敬畏上天，是人智慧的开端。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你的上帝，并要爱人如己。

我们若要深刻而全面完整地回答“民主是什么”这个问题，那么，就必须要深刻而全面完整地明白，地上之国与上帝之国之间的关系。

另外，关于上面所列出的、民主社会中人民所应当具有的“四个条件”，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是否有这样的条件和特点呢？我们又能够做什么事情，来加强或改善那些特点呢？难道，是通过行政命令和威逼等手段吗？那不岂不是又成了专制主义政府了吗？那么，是非、对错、好坏、善恶、等等，到底又是由谁来决定呢？我们又怎样避免所谓“多数暴政”的暴民主义政治呢？

我们若要对民主有深刻的理解，就必须要从反面来思想这个问题，即，民主的障碍、敌人、反对力量，在于什么？是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民主的失败？这些障碍、阻拦、因素背后的机理，又在于什么？民主与人性、民情、社情、国情，与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信仰观、等等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深刻而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将会深入地思考上面的这些问题。

=====

为什么要进行民主

民主的目的，绝非仅仅是为了人们在物质经济文化生活等等事务上的安宁昌盛，或仅仅是为了社会政治与权力更替的稳定等等，而是，为了正义、公义、平等、自由等等道德与心灵领域的重要原因。圣经告诉我们：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

从本质层面上说，所谓民主政治制度，必须与道德价值深深相联。

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是以信仰为根基、以对于上帝的敬拜与信靠为中心，这样的国家才是真正被上帝所祝福的。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在地上进行所谓的“神权统治”，或是，“唯我独尊”地把基督教信仰立为所谓的“国教”。

这样说的人，显然是根本不了解基督教信仰，不了解圣经。

+++++

+++++

+++++

+++++

+++++

+++++

+++++

+++++

+++++

马太福音22章15-22节：

15法利赛人就去商量，怎样找耶稣的话柄来陷害他。16他们派了自己的门徒和希律党的人一同去问耶稣：“老师，我们知道你为人诚实，照着真理把神的道教导人，不顾忌任何人，因为你不徇情面。17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呢？”18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虚伪的人，为甚么试探我呢？19拿纳税的钱币给我看看。”他们就拿了一个银币给他。20耶稣问他们：“这是谁的像，谁的名号？”21他们回答：“凯撒的。”他就对他们说：“凯撒的应当归给凯撒，神的应当归给神。”22他们听了，十分惊奇，就离开他走了。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15-22节

基督常常受到许多罪人的反对；他们常常愚妄地想要把基督陷于网罗之中；对于基督来说，这是多么令人悲伤、忿怒、苦难的事情。这里我们看见，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用关于向该撒纳税的问题，来攻击、试探基督。

I. 他们的计谋与试探。迄今为止，在圣殿这里都是一些掌管权力的人来向基督问话；那些祭司长老们看重自己的权柄，更胜于看重神的道；所以，他们从权柄的角度，来质疑基督（马太福音21章23节）；而现在，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攻击基督。这世上最好的人、最智慧良善的人，不论多么勤勉、多么有智慧、多么无辜、多么诚实正直，仍然无法躲避罪人的诘难，或是口舌的纷争。我们在这里看见，基督的敌人是多么不知疲倦地来反对和抵抗基督以及基督的国度！

1. 他们一同商议。诗篇2篇2节预言了，世上的掌权者们一同商议，怎样来对抗神；从前，他们也是这样迫害神的先知。来，让我们用计谋陷害耶利米。见（耶利米书18章18节）（耶利米书20章10节）。人们在罪中的谋划与商议越多，他们的罪恶就愈加深重。那些谋划罪恶的人有祸了（弥迦书2章1节）。人在罪恶中的谋划越多，所行出来的事情也就越罪恶。

2. 他们谋划商议的目的，是试图要用基督所说的话来陷害他。他们看见基督讲了很多话语，于是希望，用计策趁着基督不注意的时候，引诱他说出一些不经意的话来，好以此来陷害他。这就是撒旦的古老计谋，使人在言语中犯罪，或是在言语中勾陷人；以赛亚书29章21节：“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冤枉义人。”这些犹太人，把以色列人中最伟大的教师，当作是麻烦制造者；他们就是这样以恶谋来对待义

人（诗篇37篇12、13节）。

这些基督的敌人，可能通过两种途径来陷害基督、除掉基督——或是借用法律，或是借用暴力。如果用法律的话，他们没有什么办法能使基督顶撞民事政府部门；因为，犹太人自己没有处死人的权力（约翰福音18章31节）；而掌管权力的罗马人则不在意那些关乎言辞和名目上的问题（使徒行传18章15节）。如果通过暴力的话，他们没有什么办法使百姓憎恨基督；那些百姓、或暴民，总是他们煽动暴力的工具——但百姓都以基督为先知，所以，这些基督的敌人们也无法煽动百姓来与基督对立。现在（正如那古蛇比田间的百兽都更加狡猾），他们的计谋是，把基督置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使他不得不在百姓与罗马政府之间做一个选择；这样，他们就可以抓住基督的把柄，以此来对付他。

II。他们问基督的问题（16、17节）。他们在私下的场合商议了计谋，就立刻要来实施了。

1. 他们所打发的人。他们没有自己前来诘问基督，免得基督会怀疑他们的动机；而是，差遣他们的门徒们前来，这样，可以让他们假装是来向基督虚心求教、学习的样子。恶人总是不会缺少作恶的器具。法利赛人有他们的那些门徒们在随时待命，奉差遣去做各样的恶事、狡猾诡诈的事情。

另外，法利赛人还打发门徒们与犹太人中的希律党人一同前来。这些希律党人，是在犹太人中间、那些热衷于效忠于罗马政府及其代理人希律的人们。他们总是在一个劲地劝人们效忠政府，向罗马人纳税。虽然希律党人主张纳税，法利赛人反对纳税，然而此时，他们两者却结合在一起，来诘问基督，并要以此勾陷基督。希律得到罗马人的授权，向犹太人收税；希律党人则帮助希律，劝服犹太人纳税。而另一个方面，法利赛人却狂热地想要追求犹太人的自由，因此尽可能地煽动犹太人对罗马政府不满，使他们厌烦罗马人的统治，而挣脱罗马人的轭。现在，如果基督主张向罗马人纳税，那么，法利赛人就可以借此煽动百姓，使犹太人憎恨基督；如果基督主张犹太人应当拒绝向罗马人纳税，那么，希律党人就可以借机撺掇希律政府来迫害基督。那些反对基督、反对基督国度的罪人们，虽然他们彼此为敌，但是，他们却能够彼此联合统一起来，一同与基督作对。见（诗篇83篇3、5、7、8节）。如果，这些基督的敌人彼此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基督；那么，我们岂不更应该联合起来，捍卫福音吗？

2. 他们在问基督问题之前，所说的话。他们假意地称赞基督（16节）：——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徇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通常，那些最诡诈的计谋，往往用最假意的外表包装着。如果他们是真地想来请教基督，带着真诚的目的，那么，他们求问时所说的话，不可能比这里所说的话更好听的了。仇恨，常常用欺谎来伪装；奸恶的心，常常伴随着火热的嘴（箴言26章23节）。正如犹大，一面亲吻，一面却在背叛；约押，

一边亲吻，一边杀人。

(1) 他们所说的关于基督的话，是正确的——不管他们自己是否知道这一点；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都知道，这里的话的确确是真的。

【1】基督是一位信实的老师；他所教导的内容，都是诚实的，是关于神的道路与真理。基督自己是诚实的；他是阿们，是信实的见证者；他自己就是真理。基督的教义，是神的道路，是神所要求我们的道路，是我们职分的道路，是通向我们幸福的道路。那道路，就是真理；基督把正确的道路指给我们——那是我们应当走的道路。基督是智慧的老师；他知道神的方式与法则；他是信实的老师，没有欺谎，会完全把事实告诉我们，把神的道路诚实地告诉我们。箴言8章6-9节。这是那良善的、伟大的教师的品格；他所教导的内容，唯有真理，完全的真理，除了真理、没有任何其他别的。他不会掩盖真理、扭曲真理、伸缩真理，或是为了好恶、恣意、或是对任何人的情感，而在任何程度上改变那些真理。

【2】基督是一位勇气的指责者。在基督的讲道中，他不在意任何人的情面；他不看重人的脸面，不畏惧人的恼怒，也不在意人的私情；他不看重人的身份高低和地位，也不在意人的私意。在基督的福音中，在基督所警告的神终极审判中，他也不看人的情面；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不因任何

人而改变他的教训，也不因任何人的情面而偏离他的真理、作为、工作；他也不会畏惧任何人。箴言30章30节。在他指责人的时候，他是公正的，并没有偏向；以赛亚书11章4节。

（2）虽然这些法利赛人的门徒们和希律党人所说的关于基督的话语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目的，却仅仅是虚情假意的溜须拍马和蓄意勾陷与陷害。他们嘴上称基督为夫子，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把基督当作是罪犯和恶人；他们假装尊敬基督，但实际上内心里却想要迫害他；他们不仅藐视基督的智慧，而且更藐视基督作为神的全知与全能——基督已经显出许多清晰的证据，显明了他的神性。他们以为，自己能够用这些假装的态度来欺骗基督；他们以为，基督不能够看透他们这些把戏。罪人在这世上最大的愚妄，就是以为没有神；任何以为能够欺骗基督的人都是愚妄的；基督能够监察人的内心最深处（启示录2章23节）。那想要欺哄神的人，不过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加拉太书6章7节）。

3. 他们提的问题。请 告 诉 我 们 ， 你 的 意 见 如 何 。 纳 税 给 该 撒 ， 可 以 不 可 以 。 这个问题还包含着一个意思是，该撒有权利向犹太人收税吗？这个时候，犹太人的国家已经被罗马人的刀剑征服，有一百年之久了；以色列和别的国家一样，伏在罗马帝国的轭下，成为罗马帝国中的一个省；因此，罗马人向他们征税。这已经清晰地显明，主已经离开了犹太（创世纪49章10节）；因此，他们若知道这时代的记号，就会知道，这已经是细罗要来到的时间。

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向该撒纳税，是否是一件合理、应当的事情；还是，他们应当坚持守护自己作为犹太人国家应有的自由，拒绝服从罗马帝国？他们的怀疑理由是，作为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不应当受人的拘束和捆绑（约翰福音8章33节）。神曾给他们律法，在他们中间，不可立一个外人；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不应该顺服于任何君王、国家、当权者的统治——如果那掌权者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宗教？这是一个犹太人古时就有的错误，是出于他们心中的骄傲和自高；这错误曾经导致了他们的亡国和败坏。当年，耶利米曾经奉神的名告诉犹太人，应当伏在巴比伦王的轭下；可是，他们的顽梗刚硬却导致了他们的毁灭（耶利米书27章12、13节）；而现在，他们又在同一块石头上面跌倒；就是这件事情，短短几十年之后，就引致了他们国家最终毁灭于罗马帝国的手中。他们错误地理解神给他们的吩咐，也错误地理解了神给他们的权益；他们以神的名义，与神在给他们的环境条件中的意旨安排相争——他们本应当顺服于神惩罚的杖下，接受神对他们罪恶的惩罚。

可是，他们阴谋想要用这个问题来勾陷基督；不管基督的回答是怎样的，他们都可以——或是煽动犹太人百姓，或是罗马政府，来反对基督。他们一定在洋洋得意地想，他们肯定赢定了；就像当年法老一样，以为把以色列陷在了网罗之中。

III。基督的智慧，冲破了这些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的网罗。

1. 基督看出他们的阴谋（18节）；他看出了他们的罪恶。如果我们识破了罪的引诱，那么，我们的胜利就成功了一半；我们最大的危险，是那只藏在绿草地中的毒蛇的口中谎言。现在，基督质问他们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虚伪的人，为什么要试探我？”无论虚伪之人多么狡猾，基督都能识破他们的诡计；基督能够看透任何假冒之人的内心真实光景与罪恶，并且，能够把他们的罪清晰地指明出来。我们常常会被人欺骗，并容易上当；别人对我们说奉承的话、好听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了儆醒和警惕；但是，没有什么人，能够哄骗得了基督。那鉴察人心的，能够按着虚伪之人的本来面目称呼他们。正如列王记上14章6节。虚伪之人，想要试探基督；他们是在试探基督的认识能力，看基督能否识破他们的伪装；他们也是在试探基督的圣洁与诚实，看基督是否愿意接受像他们所言所行的这些事情；不过，他们的试探失败了；正如，从前撒旦对基督的试探根本没有得逞，现在，他们的试探在基督福音的光与爱面前，更不能够得逞！那些想要试探基督的人，一定会看到，基督的眼睛能够穿透人心，他的眼目纯洁而没有罪；那些罪恶掩盖恶意的虚伪者，那些虚情假意的人们，在基督眼前无可逃遁。

2. 基督没有陷入他们所设的网罗。基督已经指出了他们的假冒为善以及恶意；他们的问题不配得到回答，而只配得到指责；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完全而深刻的回答，并且指出了这个回答的背

后原因；这个回答，给历世历代的教会奠定了一个重要的治理原则。因而，基督冲破了他们的网罗，也避免了冒犯。

（1）基督要求他们承认、并顺服于该撒的权柄（19、20节）。当我们面对挑刺、挑衅之人的时候，我们应当给出我们说话的理由，这样，就可以使我们说话的效果更有说服力。从而，真理的证据能够堵住反对者的口。基督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看起来，基督自己的身上没有任何钱；他为了我们的缘故而倒空了自己，成为贫穷；他鄙视世界的财富，因此也教导我们不可过于看重这世上的金钱；基督的身上没有金银，那么，我们岂能贪图那些厚厚的尘土呢？罗马人要求犹太人用他们制作的银钱上税；这银钱此时在犹太人中间流通；因此被称为税银；基督没有指出具体的币值，显明他的心根本不在意这些金银；他的心思意念总是聚焦在那天上更美的事情、神的国度、以及其中的丰富与公义；——所以，我们的心也应当如此。他们拿来一个税银，上面有罗马皇帝的像和印。在钱币上面刻上掌权者的记号，这通常是那些在上执政掌权者的权力之一；因而，全国使用这些钱币的人们，也是在以此承认并顺服于执政掌权者的权力与治理。今天，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的宪法规定，虽然我们的钱币上面是国王的像和印，但我们的财产却是真正属于我们的；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基督问他们，钱上的像是谁的？他们承认是该撒的；因而，他们也就承认他们之前曾经说过的“我们不受任何人的拘束”不过是一句谎言；也因而，他们确认了之后他们将要说的话“除了该撒，我们没有别的王”。

（2）从这里，基督得出结论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21节）；这里强调的，不是向该撒纳税，而是，“归给”他。既然税银是该撒制作的，就应当归给该撒；在这件事情上，权柄是属于该撒的。现在来跟该撒争议是否应该纳税，已经太晚了；你们已经成了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省；这样的关系已经建立，因此，你们就应当尽这样的职分。谁的物，应当归给谁；对人，应当尽需要尽的职分。

【1】这里，基督并没有冒犯罗马政府。基督的荣耀和教义显出，他并不干预这样的事情，因为基督的国度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在这里，基督也给一切牧师传道人建立了一个榜样；那些从事圣洁之事的人们，不应当缠绕在这些世俗的事情当中，也不应当陷入其中的纷争，而是要把这些事情留给有恰当职分的人们去处理。传道人们要心系于当作的事情，讨主的喜悦，而不是要缠绕于此生的世俗之中；否则，他们就会失去圣灵的指引，失去神意旨安排的呵护。基督没有在这里讨论该撒的称号，而是强调，应当和平地顺服于那执政掌权者的权柄。罗马的执政掌权者，不应当在此感到受冒犯；事实上，反而应该感谢基督，因为基督的教导在犹太人中间强化了罗马政府所应得的权益——犹太人百姓以基督为先知。但那些控告基督的人，却是出于彻头彻尾的谎言；他们诬告基督，说他禁止百姓向该撒纳税（路加福音23章2节）。而对于百姓来说，法利赛人也不能向他们煽动，使他们起来反对基督；因为基督所说的，不过是他们已经一直在做的事情，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见，真理固然不需要虚谎的掩盖，但有时，我们需要特别小心的谨慎处理，免得带来错误和冒

犯。

【2】基督的敌人在这里受到指责。（第一），其中有些人想要让基督说，给该撒纳税是不合理的；这样，他们就可以有借口省下自己的钱。许多人为了避免自己所当作的事情，就总是会竭力试图辩论说，那事情是否应该去做。（第二），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把神的物归给神；因而，基督在这里指责他们；他们原来所要争论的，是民事上的自由，但是，他们却罔顾自己所失去的信仰的生命与大能；所以，他们应该在心里更看重的，是要把那本属于神的，归给神。

【3】基督这里也是在教导门徒们，以及历世历代的教会们，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基督徒的信仰，并非是民事政府的敌人，而是朋友。基督的国度并不与地上的执政掌权的政府、国家冲突，也不是要干预民事的纳税；地上的国度，只有靠着基督，才能有和平的统治。

（第二），臣民的职分，就是顺服于在上执政掌权的；遵守国家的法律。地上的政府，应当有职责来管理公共的财物与福祉，保护国家的臣民，维护和平，所以，政府应当在公共的财产中有分。因而，我们有纳税的义务，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与此有关的（罗马书13章6节）。无疑，欺骗政府是比欺骗个人更大的罪。尽管人间的法律和宪法决定了，究竟什么是属于该撒的物，但基督教导我们说，凡当属该撒的物，就应当归给该撒。

（第三），当我们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把神的物归给神。若我们的钱包是属乎该撒，那么，我们的良知和心灵就是属神的；神对我们说，我儿，你要把你的心给我。神所要的，是我们生命中最深处的核心本质，是我们心灵中最高的位置所在；我们必须要把本应当属于神，归给神；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产业，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都应当归给神。当该撒的命令与神的命令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遵从神，而不是遵从人。

最后，法利赛人门徒们和希律党人的反应，是非常惊奇；——他们就都离开基督走了（22节）。他们敬佩基督的智慧，能够识破、看透他们精心设计的网罗与计谋；基督现在是，也将要是，一切世人所惊奇的；不仅神百姓对基督的作为大为震惊而惊奇，那些基督的敌人们也会对基督的作为大大震惊而惊奇。我们或许可以设想，他们对基督的智慧非常惊奇，所以就跟随他；不，事实正好相反；他们虽然惊奇，但是却不顺服、更不愿意跟随。许多人的眼中，看基督为可惊奇的；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跟随基督的

引领，也不愿意顺服于基督的大能。他们走自己的路，离开耶稣走了；他们就像是一些垂头丧气的败兵之将，满面羞惭地撤退了。他们的计谋被打败，就只好撤退了。人若想要与基督争论，那就是毫无用处的。

+++++

+++++

+++++

+++++

+++++

+++++

+++++

+++++

+++++

=====

继续讲述为什么要实行民主

一方面，民主政治必须应当具有深刻的、深切的道德内涵，否则，任何没有信仰根基、没有道德意义的、所谓的民主，就一定会渐渐滑向——自由散漫、混乱失序、骄奢淫逸、喧嚣躁乱的状态之中，并最终一定会进入溃败、甚至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的局面。

另一方面，民主政治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深切的道德内涵，不应当是通过强力、强迫、压制、勉为其难、差强人意的方式来体现和实现；更不应当是以虚伪的形式主义、口号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的方式来体现和实现。

正是以上两个方面在本质层面上决定了，建立、健全和发展民主政治的道路，必定将会是一个极其艰辛、漫长的过程，需要巨大的耐心、韧性、决心、毅力，甚至需要很多代人的时间、过程、心志、努力。并且，不但如此，若要保持正确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民主制度，也同样需要整个国家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一同彼此心意合一地、居安思危地、谨守于敬虔的信仰与道德之中，否则，民主的成果也将会前功尽弃。

民主制度建立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长久、缓慢、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乃至生命与鲜血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虽然漫长、虽然需要巨大的代价、花费、忍耐与耐心，但却都是极其值得的；因为，民主制度如果得到正确的实现与运行，那么，它就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政治制度；更重

要的是，它就将带给人间正义、平等、自由、繁荣、幸福，并使得普罗大众能够更加深切地明白道德、真理、信仰等等许多关乎生命、心灵与灵魂的事情。

这一点，正是民主所应有的真正目的所在。这个目的，绝非通过强迫的方式来实现，也不能通过统治者、或是被统治者中的个别人的一厢情愿的方式来实现，而是必须通过人们巨大的耐心和毅力，通过无数人、甚至许多代人的艰辛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我们可以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来说明这样的过程。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的过程，很像是一个揉面的过程。众所周知，在做馒头、花卷、面包等面食过程中，需要在干面粉中加水、牛奶等，然后揉面、发酵、等等。在揉面的过程中，需要很有耐心的、力量适中的、精心而均匀的、不断搅拌、翻搅等动作；这样，面团才会逐渐被揉得均匀圆润；做出来的面食才是柔软可口、味道好吃的。

换言之，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发展，绝非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缓慢的、漫长的、耗尽心血、耗费巨大代价的过程。

建立一个暴君制度、或是一般性的专制主义制度是容易的，只要一夜之间、或是短短的几十年内，就可以在一个国家社会中建立起来。因为，这样的制度是以压迫人民为手段和目的；所以，只要用强力、武力、不管三七二十一、不分青红皂白，对人民一律通通压制、禁声，对异议人士抓捕、监禁、甚至杀害，从而杀一儆百，让全天下人变成万马齐喑，就行了。这样，整个国家就变成了一言堂的天下；人民就变成了像是机器人一样的奴隶，他们的思想、头脑、心灵就变得一文不值；国家就变成了机器；统治者就变成了舵手、或是工程师。从治理方法上来说，这样的专制制度是容易的，并不需要耗费什么脑筋，更不需要耗费什么心情、耐心、耐力、心志等等去做。

建立一个自由散漫的、“多数暴力”的、暴民政治的、或是荒淫糜烂的、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体制制度，也是容易的，也可以在一夜之间、或是短短的几十年内，就能够在国家社会中建立起来。只要在国家社会中，通过大规模而快速的煽动，通过暴民中间的鼓噪和喧嚣，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那么，暴民政治或是无政府主义就会很快在国家社会中占为上风，甚至统治国家、左右国家大局与走势。

或者，建立一个骄奢淫逸的、世俗主义的、奢靡之风的拜金主义国家政治体系也是容易的，也可以在一夜之间、或是短短的几十年内，就能够在—个国家社会中建立起来。只要在国家社会中，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和鼓动，让人民都投身于发财、赚钱、辛勤经营的活动，把人民都变成世俗主义的经济动物，那么，这种拜金主义人生哲学、伦理、以经济动物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理念，很快就会在国家社会中占上风，并统治国家、用金钱和属世之利牢牢地拴住人民，使人民成为被精神枷锁所捆束的、钱财的奴隶。

从本质层面上说，上述各种国家政治机制，无论是专制主义、暴民政治、无政府主义、还是拜金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其实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一些拆毁性、破坏性、负面性的力量，而不是建树性、创造性、正面性的积极健康力量。

简言之，它们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都是消极性质的。它们给人类所带来的，是许许多多的不公、不义、不平等、凶残、暴戾、散乱、醉生梦死、荒淫、压榨、压制、洗脑、灌输、欺骗、谎言、丧失诚信、礼崩乐坏、等

等负面后果。

它们或许会在一些短平快的经济目标上、或是某些具体的国家政治目标上，在短时间内、暂时地取得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从长远看来，它们却都无法给人类带来任何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幸福安宁的局面。

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它们不像是一个长跑健将，——长久地、不急不徐地、持之以恒地、几个世纪如一日地、坚韧不拔地，沿着正确而健康积极的轨道和路线图，不断地向前奋进，向着固定的正确目标不断努力、不断前行；而是，——它们像是一些无头无脑的苍蝇或是疯子一样，疾速地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踉踉跄跄、东跑西颠、一会蹦高、一会摔跤、很快就满目苍夷、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全身是伤。这样，几个世纪以后，甚至几千年以后，它们仍然是使人类社会原地踏步、无法前进，甚至给人类带来无数的苦难、战争、生灵涂炭、心灵荼毒。这正是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中的绝大部分内容。

更进一步说，最重要的、最核心、最本质的是，它们都蔑视、忽视、无视、否定、甚至践踏世人的心灵、思想、灵魂的珍贵价值。这正是它们的根本错误根源所在。在它们的眼里，国家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人，只是像一个巨大机器中的一颗小小螺丝钉一样，或仅仅是像一栋巨大楼房中的一

块砖头或瓦片一样。在它们的眼里，人的生命仅仅是需要像一个螺丝钉、砖头、瓦片一样、或是像猪一样活着。

在它们的体制中，或是，推崇集体主义；或是推崇享乐主义、或是推崇拜金主义，等等。在它们看来，人生的价值，就仅仅是为了爱国主义、为了社会集体而活着。它们说：“没有国、哪来家，没有祖国、哪来个人”。或者，在它们看来，人生的价值，就仅仅是像经济动物一样，追求发财、赚钱、功成名就、等等。或者，在它们眼中，人生的价值就是纵情享乐，或是好勇斗狠等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人是什么？人是有着思想、心灵、情感、智慧、灵魂、信仰的，有着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信仰观的存在体。人的真正价值，究其根本而言，不是在于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情况、寿命情况、性别、高矮、胖瘦、相貌美丑、皮肤颜色、头发长短、等等，而是在于人生的内在与本质的内容。人与世间万物不同之处，与一切牲畜飞鸟昆虫等等的根本不同之处，不是在于力量、肌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等，而正是在于人的理性、思想、智慧、情感、心灵与灵魂。正是因此，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取得巨大的发展，以及作出无数科学技术的发明，并深刻地改造和利用这

个自然的世界，使之更加美好、整洁、舒适、等等。

在人的生命本质中，一个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关乎道德的性质。我们不会审判一把菜刀或一支手枪，给它们判定杀人罪；而是会审判使用菜刀或手枪的人，给他们判定杀人罪；因为菜刀和手枪本身是无知无觉的，并不具有任何道德的属性。

自由是道德的必需；只有当一个人拥有自由意志的时候，他才具有道德的意义。正是在人里面的自我认知和自由意志，才使他成为一个人。

换言之，在这个宇宙世间，人的最独特之处就是在于，人是有着“人格”或称为“位格”的存在体；即，在人的里面，有着自我认知、自由意志、以及智慧、思想、理性、情感等等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是独特的，是在这个默然无言的、无知无觉的、甚至荒芜的宇宙世间万物本身之中所没有的。这样的能力，只能是来自于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造物主、上天、上帝。

在这个世界之上，有那样一位无限全能的、全知、全在、全备的造物主。

对于上天、上帝、造物主这样的概念，其实在每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中，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世人心中，都存在着。例如，在中国老百姓心中，都会知道“老天爷”、“天”、“上天”、“青天”、“上苍”这样的概念和词语。在汉语里面，“天”这个词汇，虽然也是指物理性的天空，但是，在“上天”“青天”“苍天”“老天爷”这些词语中，却总是清晰地指向那位能听、能看、并且是公义圣洁、赏善罚恶、主持公道、无远弗届的超然存在者。

事实上，类似于“上天”“上帝”【上帝这个词本身，是出于中国最古老的古书之中，用以专指上天、那全能的宇宙天地之主】这样的词汇，存在于世上人类之中的任何一种语言、方言里面。我们如果深思细想这个现象，就应当非常震惊、讶异，因为在这个世上，并没有哪一个世人见过那位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天、上帝、永生之神。

正如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却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称为美好，又将永生（永远）放在人的心里。

在佛教、道教等泛神主义者的眼中，究其终极意义而言，这个世界之上并没有那样一位全能的创造者、掌管者（所谓佛祖，只是那样一位觉悟者、智慧者、引领者）；这个世界，仅仅是被那样一种没有“位格”的因果、轮回、规律、“道”等等“掌管”着。它们并没有看到，那位永生之神、上天，不仅是超然于世界之上的，而且更是我们世人的天父。

上帝不仅是创造宇宙、掌管宇宙的超然者，而且，他更是创造我们每一个世人生命的主。上帝有着“位格性”，即，他不但是无限全能、全知、全在的、智慧的，他不但创造了一切、掌管着一切，而且，——他更是能听、能看、能言的；他有着完美的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他有着无限完美、至为良善的、公义圣洁、慈爱恩典的道德品质。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父；他把那美好而甜蜜的生命赐给我们。他创造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他所创造的光明；他创造了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见声音；他创造了我们的口，使我们能够说话；他更创造了我们的心灵与灵魂，使我们能够有思想、情感、智慧、理性与爱。我们每一个世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我们本当是他的儿女。

自由不仅是道德的必需，更是爱的必需。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有着“位格”的存在者，才有爱的性质和能力。我们每一个世人，正是因着我们里面的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因此，我们才不仅有道德的能力，更有爱的能力。正是因着爱，我们的生命才成其为生命。上帝是爱与良善的源头。上帝是爱。

【引述 哥林多前书13章 爱的真谛】

现在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 1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2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3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

4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5不作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6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7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爱是永存不息的。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9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10等那完全的来到，这部分的就要过去了。11我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既然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12我们现在

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象主完全知道我一样。13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

民主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说到民主制度，人们往往会想起美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度之一、但却是现代社会中最早的民主制国家。实际上，今天的现代世界中之所以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民主政治制度，与美国和英国等国在过去一百年来、尤其是二战以后的榜样和影响力，有着很大程度的关系。

说到美国，人们往往会想到基督教信仰，因为，在美国的早年那批开拓者、建国者中间，很多都是清教徒、信仰虔诚的基督徒们。可以说，今日的美国，正是被当年那样一大批追求信仰纯洁、信仰自由的清教徒们、虔诚基督徒们所建立起来的。直至今天，在美国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在美国

政府各级官员就职、法官就职等等仪式上，他们都是以手按圣经宣誓而就职。

显然，任何对于历史稍微留心的人都无可否认，现代民主制度正是从基督教信仰国家发源而来的；现代民主制度不仅诞生于西方的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中，而且，现代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的蔓延、传播和发展，也与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有着直接而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多数的中国人其实对于美国所谓的基督教信仰立国，存在着很多的误解。这是因为，很多中国人并不明白：——基督教信仰与民主制度之间到底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及什么是真正的政教分离的本质含义；以及，为什么在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中才会有“政教分离”这样的提法。【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政教分离”的这个提法，仅仅是出于五百年前的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以后；尤其地，这是出现于英国清教徒运动以后】。

由于上述误解、不解，人们常常会对于基督教信仰与民主的关系有两种不正确的心态反应。

一种是，一味地排斥基督教信仰与民主制度的关系，甚至反对基督教信仰。持有这样观点的人们认为：——民主制度与基督教信仰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或是必不可少的关系；民主制度可以、也应当完全摆脱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应当“敬鬼神而远之”，与基督教信仰体系保持越远越好的距离。他们认为：——现代民主制度，最好应当是彻底的世俗化主义，而不要与宗教信仰发生任何瓜葛。

另一种是，认为应当“以基督教立国”，即，把基督教信仰当作成所谓的“国教”，并在此基础上来推行民主制度。

显然，上述两种态度与立场都是偏颇的、不正确的、不恰当的。关于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本质、内涵、外延等等，我们将会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进一步深入讨论。在这里，我们仅仅简单地做一些一般性的陈述；简言之就是：——（1）基督教信仰是因信称义的信仰，是建基于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信仰，而不是建基于逼迫、强迫、勉强人意的基础之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世人的恩典与救赎，是要人甘心乐意地、由衷地、而不是被迫地、相信与接受。（2）正是因此，所谓政教分离，只有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才是有其真实意义的。在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中，政教合一本质性的内在教义关系。在许多佛教小国中，也存在着强烈的政教合一的色彩。而流行于中国的大乘佛教，则强调悟道、出世、消极、四大皆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等等，不仅与政治毫无瓜葛，而且甚至反对一切执著的人生态度；因此，

其本身并不存在政教分离的问题。（3）基督的国度不是属乎地上，而是属乎天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们应当消极遁世、不问政治、不问世事等等。相反，基督徒们应当以热忱敬虔的心，在这个世界上、在世人面前，以自己的生命见证出上帝的恩典与慈爱。简单而言就是，“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

关于基督教信仰与民主制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深刻、极其重要、具有核心性意义的问题。对此，我们在本书后面专门章节中深入思考。

=====

怎样建立民主

如上所述，民主制度不仅是一个极其深刻、意义重大、涵义复杂的社会政治治理体系，而且，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极其困难、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甚至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够达成的事情。尽管如此，民主制度是一件非常值得花费巨大的代价和心志去努力达成的事情；因为，正确的民主制度、正确的民主道路，将会随之带来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政治治理体系，将会给一个国家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幸福与繁荣。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建立起民主制度，怎样实行民主制度呢？我们应当怎样设计出一条从实际出发、从大局着眼、紧贴道德与信仰原则、紧贴现实政治情况的、中国现代民主主义革命的真实路线图呢？我们又应当怎样借鉴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实践经验，并结合普通中国人思想文化观念实际情况，来提出一条实现民主、符合民主道路原则的路线原则地图呢？

这也将是本书后文中所思索的重点。在这里，我们先给出一些鸟瞰性质的、简略的思考要点。

第一，首先，我们必须清醒而现实地认识到，民主革命的正确目标，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实现。正如，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包含着许多极其艰巨的任务，都需要极其巨大的代价、极其辛勤的努力、甚至舍生忘死、甘洒热血的精神；同样，民主革命的事业更是如此。我们必须完整、深刻、全面地认识到，民主事业的极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才有可能取得民主事业的成功。

民主制度，要远远地比“人民当家作主”、“一人一票”等等简单口号更加深刻、更加复杂。那些简单的口号，在很多时候不仅无益于民主制度的真实实现，反而会因其过度简化真实世界的问题，而在实践中容易导致民主制度的失败，并进而使得许多人以此为借口、推翻民主、实行专制、甚至挂羊头卖狗肉等等。

那么，民主制度的目标内涵，具体章程、法则、规律、条例、组织、架构等等，在一般原则的层面上而言，到底应当包括什么内容呢？为什么要包含那些内容呢？对此，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与仔细的筹划。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民主制度与道德和信仰之间的深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一种法律、规章层面上的关系，而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

在国家层面上、政治层面上，民主制度与宗教信仰之间，尤其是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原则？很多人挂在口头上的、所谓的政教分离原则，究竟是什么意思？所谓的政教分离原则，与道德信仰作为民主制度的基石的“表里”原则，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换言之，众所周知、无可否认的是，民主制度需要建基于世人心中的道德的信仰；然而，民主制度则是关乎法治、自由等；那么，在国家政治层面，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推动、鼓励、支持道德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与发展，并反过来，民主制度从道德信仰的发展中深受益处呢？政治与信仰之间，怎样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的关系呢？是通过法律、政策等强行的手段吗？还是通过鼓励、允许、支持等柔性的手段呢？为什么？这些原则又怎样在具体行动和事务中体现出来呢？

更深一步说，虽然，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民主制度是诞生于、来源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但是，一般性而言，在世上一个民主自由制度的国家中，应当怎样面对、处理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事务呢？其中的原则、原因、机理是在于什么？

在本书后文，我们还会进一步讨论、深思，为什么说，基督教信仰的文化

土壤，对于民主制度有着重大的、积极的、推动性的意义。

第三，实现民主制度的渐进性。

我们不要设想、或是期待，民主制度是一件一夜之间就能够一蹴而就地建立起来的事情。因此，我们在思考建立民主制度的路线图原则的时候，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渐进性”原则的重大意义。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更何况，建立民主制度这样的伟大事业，更是何其艰难、又更将何其收获巨大、深刻改变无数人的生活、生命与心灵。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殚精竭虑地来面对这件事情。

在考虑具体的渐进措施与路线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清醒地、智慧地取得共识，使大家都明白，渐进性的原则在关于建立民主制度过程中的一般性意义上，是多么重要。

一方面，建立民主制度过程的渐进原则，绝非是原地踏步、口是心非、甚至推搪阻塞、挂羊头卖狗肉。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诚实客观、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地认识到，渐进性原则与过程，是一定不可或缺的，否则，急功近利就一定会给建立民主的过程带来巨大的损害，甚至使历史开倒车，导致民主的梦想变得更加遥远。

为了凝聚共识、保持耐力、长久稳定地前进，必须应当有一个公开的、实际的、深思熟虑的渐进原则路线图，以及具体的、可操作的、诚实的方法步骤。

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本书后文中深入思索。而且，我们也将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思考渐进性原则。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哪里、怎样去寻求那终极的真理与正义？作为基督徒，我们又应当怎样以敬虔的信仰原则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为民主自由正义事业添砖加瓦？自由的本质是什么？正义的本质是什么？渐进性原则的本质与信仰根基是什么？民主是革命，而不是改良，但却是渐进性的革命；——为什么？我们又应当怎样去渐进行？

第四，政治治理的可操作性。

如前文所述，所谓民主，是自由、圣洁之民进行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

我们如果深思这件事情，就立刻会意识到以下问题。

A。我们怎么判定人民是否真正是自由的、有着起码的道德品德？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起码的道德品德？谁来判定？谁来制定标准？难道，就像那些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专制政权国家中，给人民中每一个成员所制定的道德档案吗？显然，这不仅是荒谬的、行不通的（在实际操作中，一定会被人为操弄、并成为腐败与权力滥用的滋生之地），而且是罪恶的、残酷的、不公的。（为什么是荒谬、行不通、甚至是罪恶、残酷、不公的？）

但是，难道在民主社会中，就对关乎人的道德这些事情不闻不问吗？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或是任何人类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中），人们并不应当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任意而行。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想一个深刻而本质的问题：人是什么？人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人的思想与心灵中，所追求的、所渴望的是什么？在人的生命本质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罪性吗？什么是罪？罪的表现是什么？什么是自义？我们又应当怎样面对罪？怎样处理罪性？怎样除去罪污？怎样防止人心灵中的罪性在外在言语行为上的表现，以及给社会与他人所带来的伤害？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关乎道德领域的事务上，法律规章制度是重要的，但却是不足的。原因很简单，在法律规章层面，世人无法真正地去、也不应当去制定那些“诛心”的法律。“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那么，究竟什么是凯撒的？什么是上帝的？

什么是自由？

B. 怎样实行选举制、代议制？怎样了解民意？怎样取得共识？

所谓人民自我治理的政治组织形式，必须要解决几个关键性的问题。统治者怎样产生？统治者的权力包括哪些？统治者的权力怎样分配？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应当基于什么原则？为什么？

究其本质而言，到底什么是人民的“自我治理”？这与专制主义的治理有什么实质性上的异同？怎样避免和防止多数暴政？多数暴政的定义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多数暴政？

怎样了解民意？什么是民意？民意一定是公平、公正、正义的吗？怎样确保民意是公平、公正的？当民意不公正、不公平、不正义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办？

民意的特征、优点、缺点、规律、本质、等等，是什么？所谓民意，就是每一个个人的心思意念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的集合反映。然而，如果说，人的生命在本质上是背离上帝、背离道德法则、充满罪性和罪行的，那么，我们又怎能相信民意、依靠民意呢？

什么是人民？人民是伟大的吗？什么是人性？人性是光辉的吗？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等政治伦理哲学观念中的优点、缺点、盲点、正确之处、缺失之处、值得肯定之处、以及谬误之处、等等是什么？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在一个充斥着各行各业、喧嚣嘈杂、利益纷争的社会中，在处于各种不同社会条件环境、不同人生光景之中的大千世界中的世人中间，在一个庞大的、幅员辽阔的国家里，我们可能在人民中间取得共识吗？我们怎样取得共识？我们怎样在长期的年月中，在漫长而繁杂的事务之中，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在人民之中不断地取得共识、不断地前进和进步、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地众志成城？

C. 怎样实现公平与制衡的原则？何谓平衡的原则？以参议院与众议院为例（或，上议院与国民代表大会）。

所谓立法、司法、执法等权力的三权分立政治结构，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具有极其重大而深刻意义的认知：即，在世人的生命本质之中，并非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在人的心灵与灵魂深处，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遍及的、本质性的、根深蒂固的罪性。

这个浩大的宇宙世界，是来自于那无限全能、智慧、圣洁、公义的造物主的创造。我们每一个世人的生命，也更是来自于他、那伟大的上天、上帝、造物主、永生之神。我们都是被他所造的，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万物之中是独特的、高贵的、珍贵的，因为在人的里面，有着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有生命、道德、爱的能力。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唯有是在上帝、上天那里，才能够得到满足、得到实现。在人的里面，有着一颗指向永远的灵魂。

然而，世人的生命却在本质中背离了他。世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以属世之利、以被造之物为自己心灵的归依，却不寻求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主。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但是，人却背离那上帝所放置在世人良知之中的道德法则，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上的世人，没有一个未曾说过谎言，未曾做过违背良知的事情，未曾在内心中有不当的愤怒，未曾在内心中没有犯过奸淫。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人做事可以不用受到惩罚，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任何后果，那么，我们会深为震惊地看见，在世人心目中，隐藏着多么普遍的、多么丑恶的罪恶与污秽。

从严格意义上说，现代民主制度，不是建基于“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

不切实际的、甚至自高自大的主观幻想之中，而是建基于这样的谦卑认知：——人类自身是充满罪性与缺陷的。

上述原因，是民主制度中权力分立、平衡、制衡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仅仅在概念上讨论权力分立与制衡是容易的，但在实际实行中却是困难、甚至危险的。这是因为，正如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一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在权力分开、制衡的民主架构中，最常见的弊病，就是那些政客们彼此的吵闹与互相掣肘，而缺乏团结、妥协、宽容、同心同德的精神。关于民主制度中的重要妥协特征，以及其相应的重要文化土壤条件，我们将会在本书后面章节中讨论。

在具体操作与体制设计中，民主制度里面的权力制衡以及权力集中、责权利对应机制等等，会表现在很多方面、表现在政府的很多组成部分中。在权力制衡体系背后，最重要的考量就是，怎样既能够达成尽量多的公平、稳定、制约、平衡，又同时尽量地避免政府机构之间的内耗、敌意、互斗。为了使民主制度能够顺利运行，就必须尽量同时兼顾两个相互矛盾的方向，即，稳定与效率；平衡与专注；公正筹划、集思广议，与果断执行力；等等。

比如，在这其中，立法机构的两个组成部分——成员任职期较长（即，每名成员的重新竞选时间的间隔较长）的上议院或参议院，与成员任职期较短（即，每名成员的重新竞选时间较频繁）的众议院之间的平衡与协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这种两院制度，能够避免国家权力过度地倾斜于某些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区，从而使得国家能够尽量均衡而公正的发展，并使得国家发展在整体的层面上更加健康有序。这是因为，参议院的成员选举产生，倾向于以地理省份为单位，而众议院的成员选举产生，则倾向于以人口分布为单位。这样，在权力分配、社会资源分配等等方面，那些地广人稀的地区，就不会被人口稠密的地区所挤压。

这种参众两院制度的设计，也是基于这样一个深层的隐含原因，即，始终保持这样一种谦卑的认知，即，在世人心灵的深处，遍及着自私之罪，因此，人的决策应当通过适当的制衡来加以协调，避免权力与资源的不公正分布。（否则，逐渐地，大都市地区的人口就会以人多势众的优势，而欺负小地方、地广人稀地区之人的发展；久而久之，人口就会越来越向大都市集中，最后使得全国人人都辛苦不堪）。

关于这些权力均衡的具体事项，我们也会在后文深入探讨。

D. 民主与自由。

民主与自由两者虽然本质内涵截然不同，但是却彼此互为补充，缺一不可。若没有民主，自由也必终将失去。我们在世上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会看到这样的事例。另一方面，没有自由的民主则往往是虚假的、形式主义的民主，或是很容易演变成乌烟瘴气的多数暴政。

那么，在一个民主政治体系里面，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以及相应的一般性原则，来尽力保障自由呢？从政治意义而言，自由的内涵、外延、范畴等等，又是什么呢？

自由的本质是在于，人的思想、心灵、灵魂、信仰等等的珍贵价值。正是因为人是有着这些宝贵的属性和能力，所以，人才有言论、集会、结社、就业、迁徙等等的自由。然而，自由本身并非是没有方向的，也并非是没有限度的。自由的限度，就是在于，不能对他人造成切实的伤害；而且，自由的限度也包括，不应当超越道德的底线。关于道德底线的定义，不应当被扩大化，而是要以人良知中的是非之心、以那来自于上帝放置在普世

之人心中的道德法则为准。

E. 法治、平等、公义，与民主。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为什么要实现民主”这个问题，那么，最好的回答就是来自于圣经中的这样一句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上面圣经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圣洁属神的社会中的重要原则是在于，应当有公正、正义、平等，并应当有恩典、慈爱、怜悯、良善；在人的心里应当充满谦卑，在爱中要常以为亏欠，而不是自高、自大、自傲、自以为义；最后，最重要的是，在人的心中，应当有敬虔的信仰；世人应当有对于那创造宇宙天地之主、创造世人生命之主、那伟大的上帝、上天有真诚的敬拜、倚靠之心。

从上可见，真诚的、对于造物主的信仰，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民主制度的诞生的重要前提条件，而且，也是使得一个美好的民主制度能够得到成功发

展的文化土壤背后的重要动机和动力。

如果离开了对于造物主、上天的敬虔信仰，那么，平等、公义、公正等等概念，就失去了根基和基础。如果离开了那敬虔的信仰，那么，所谓民主制度就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久而久之，就必将陷入乌烟瘴气的喧嚣吵闹之中，并最后一定会被专制者、阴谋家所推翻。

第五，组织架构的可经营性。

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实行高效公正的民主制度，最大的挑战，不仅在于怎样满足政治治理的可操作性的要求，而且还在于，怎样建立起一个稳定可长久持续的、可经营的组织架构体系。

这样的组织架构体系，不仅仅在于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机制以制衡、保持公正、防止世人心中之罪所带来的伤害与混乱，而且，更加要针对从各级地方政府到联邦中央政府的组织结构的多样化特点、特征、需求和适应性。

在一个幅员辽阔国家所推行的民主制度，即，“自由圣洁之民所进行的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必须要考虑到地方的省、市、县、乡、镇、村等不同的自我管理特点。

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一个最大区别是在于，后者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在金字塔权力架构中，所有人都是向上级负责，直到金字塔的顶端。而在民主制度权力架构中，内部权力之间的关系则要远远地复杂得多、微妙得多。

A。首先，一般性而言，所有的各级政府首长都是由本地人民选举产生，而不是被上级政府任命。因而，每一级政府成员都是向下负责，而不是向上负责。换言之，村长不是镇长的下级，镇长不是县长的下级，县长不是市长的下级，市长不是省长的下级，省长不是国家主席的下级。因为每一级官员首长都是被辖地的人民所选举产生的。

那么，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又怎么能保持整个国家，或是每一个省市县等等，仍然是一个有机的、协调的、生机勃勃的机体呢？在各村、各镇、各县、各市、各省之间，怎么能保持协调关系，而不是互相争竞、好勇斗狠、一盘散沙呢？

换言之，究其本质而言，所谓“人民的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应当怎样保持人民之间和谐融洽、彼此互助合作的关系呢？

在这里，我们再次地看见了世人心中之信仰与谦卑的重要性。

B。在民主制度内部的复杂组织架构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尽量清晰地定义各个政府组织部门之间的权力界限以及重合部分关系等等。例如，整个联邦国家体系内的司法权、执法权、立法权，以及各省市县不同层级内，各级地方的司法权、执法权、立法权等等，应当如何进行不同的区隔与联接。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以及各省市县等范围内，应当分别有不同的章程、宪章等，以作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级政府组织结构与运作的指导方针和原则。

这些不同层级的宪法、章程、宪章、政府组织架构运作指导原则等等，以及，其本身如何产生、如何修订、如何制定产生与修订的程序等等，都是关乎整个民主制度成败的关键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得好，那么，就会建立起一个公正稳定高效的、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反之，如果这些问题解决得不好，那么，整个民主制度就会失败，就会落入一盘散沙、纷争不断、互相扯皮的状态，并会不断地被野心家、革命家、暴民运动所搅扰、推翻、打断。

再一次地，在建立民主制度革命的这整个过程中，必须要非常谨慎地采取渐进性原则，并有清晰的路线图、规划设计图纸，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这些清晰的路线图、规划设计图纸包括，民主制度建立的程序、步骤、时间表，以及，在每一个程序、步骤、时间表中，相应的选举机制、成立机制、权力组织架构定义等等。

对于一个从未有过真正民主制度的文明体系、国家社会来说，这样的关于建立民主制度的清晰路线图、规划设计图纸等等的好处和重要性在于，它们使得整个国家社会的人民对于民主制度的渐进性建立过程有方向感、目标感，并且会不断地凝聚和增强人民内部心灵之中的共识与民主认同感。

同时，这样的时间表、路线图不应当过于漫长，而最好应当尽量在一代人之内（例如，十年至二十年内）就可以完成。否则，如果时间表过长，路线图过于遥远，那么，就可能会催生专制主义的土壤，并且会把所谓的民主梦想变成谎言、变成挂羊头卖狗肉，从而使得真正的民主制度并无法得到建立。

关于这样的民主建设路线图应当包括哪些内容，我们会在本书后文继续讨论。

第六，执行力的集中性与长期法治规划的分散性。

正如前文所述，民主制度的两个最大敌人就是专制主义与无政府散漫主义。专制主义者们偏颇地强调权力与执行力的集中性，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却故意忽视、无视、蔑视国家社会人民的平等、公正、公义。无政府

主义者偏颇地强调权力的分散性、去中心化，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却故意忽视、无视、蔑视，一个国家社会中、人民内部之间的协调合作、统一行动的必需性。

无论是专制主义思想还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如果得不到谨慎的处理、平衡、妥善考虑、回应，那么，它们最后都会导致民主制度的彻底失败，并把整个国家社会带入灾难祸患的深渊之中。

一方面，在专制主义社会中，由于统治者不具有合法道德性、公义性，因而，统治者们往往是陷入恶性循环中，往往是以强制、挤压、逼迫的手段来统治社会，并会以各种各样的谎言来欺骗人民、钳制人民。这种统治，终将给国家与社会带来灾难，并最终导致革命、战争、生灵涂炭、心灵荼毒、等等。

另一方面，在无政府主义者所带来的喧嚣混乱之中，国家社会失去秩序与法制，整个社会处于一盘散沙之中。在各个省市县乡镇等等之间，充满了互斗；在社会不同阶层、团体、职业、以及持有不同理念的人群之间，也充满了互斗、内耗、不和谐。这样的局面，必然导致社会中有一些人会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替天行道”、“主持正义”，最后，野心家们、无耻下作的政党集团、打家劫舍的流氓无产者们夺取权力，劣胜优汰，从而进入

下一个专制主义社会的循环。

就这样，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道路就像是一个钟摆一样，不断地、持续地在专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来回变换交替、不断死循环。在这样的败坏动荡、充满谎言的国家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个智慧、敬虔、道德、谨慎、渐进的、现代民主主义革命过程，那么，民主制度就永远也不会实现。

从反方面来说，具体而言就是，是否能够保持政府权力执行力的集中性与长期法制规划的分散性之间的正确平衡，是决定民主制度成败的重要关键因素之一。

所谓权力执行力的集中性是指，政府行政长官（例如总统、总理、省长、市长、县长等等）以及其相应的政府内阁、组织部门、执法部门、检察机关、等等下辖部门，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权威，在治理政事的过程中，政令统一、有力、集中、有效、集结迅速；而不是拖沓敷衍、人浮于事、怨声载道、等等。

所谓长期法制规划的分散性是指，在关于国家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长期性本质问题层面，决策机制不应当是由少数人、精英阶层、寡头政治、少数统治者集团来完成，而必须是以恰当的、分散性质的、甚至去中心化的组织决策机制来完成。这样的过程，往往是由参众两院的协调和协作来完成。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体现在联邦国家层面、以及各省市县区级的立法工作的程序设置等等。

所谓立法工作是指，由人民定期选举产生的各级参众两院的成员们，在国家层级、以及各省市县等级别，制定关于各地长远发展规划方面的民事、政事、经济、刑事、教育、医疗、移民等影响人民与社会发展状态的非短期的、非急迫的、但却是长期性的、本质性的、重大性的、深远性的问题的法律、规章、措施等等。

这样的立法性质的工作，由于是“非短期”的、“非急迫”的问题，因此，可以进行相对而言缓慢的思筹以及激烈的反复辩论过程。同时，由于所面对的问题是深远长期、影响广泛的重要本质性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涉及尽可能多的社会动员，使得尽可能多的声音、思想与建议过程参与进来。这也是为什么立法权与执法权应当分开的一个重要原因。前者倾向于处理长期深刻本质问题，后者倾向于处理雷厉风行的问题、以及探索性、尝试性、试错性、表面性的问题。

而以各级法院所代表的司法权体系，则兼具集中性与分散性的原则。一方面，联邦各级法院、乃至各省市县的法院、以及国家最高法院，应当具有超然性、超脱性，冷静地处理各样法律争讼案件，原原本本地根据既定的立法，来裁定案件是否吻合还是违反了某项既有法律。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的民事、刑事案件中，以来自于民间成员的、具有审定案件权力的陪审团，对于案件进行裁定。在上述两个方面中，前者具有权力的集中性原则，后者则具有权力的分散性原则。两者都是为了满足于共同的目的，即，“行公义、好怜悯”。在地方各级法院的法官，应当由选举产生。在联邦各级法院的法官，应当由联邦民选长官（总统、总理等）任命与民选参议院成员认证，以及某些复合方式产生。

第七，再思基督教信仰对于民主制度的巨大有益作用；以及，应当怎样发挥、促进、体现这些有益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看见，民主制度的致命弱点，与民主制度的明显优势，都与基督教信仰的文明体系与文化土壤有着重要的、直接的、对应性的关

系。

我们绝非是说，一个民主制度的政体必须要与基督教信仰完全结合，甚至进行所谓的“政教合一”。我们也绝非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以基督教信仰为主要信仰，就根本无法进行民主。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述，任何稍微对历史留心的人都会无可否认，现代民主制度是诞生于基督教信仰的文明体系与文化土壤中；现代世界的民主制度的大发展，也是在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的大力推动下所导致的结果；包括台湾、韩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是在西方的保护和支持下才得以建立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基督教信仰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呢？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摆正基督教信仰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呢？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深刻地反思、认识到，基督教信仰，就其内在教义而言，相比于世上的其他宗教信仰体系而言，为什么是正确的、是真理性的信仰？为什么耶稣基督福音是真理、是真实的？——这涉及到许多关于基督教信仰护教学方面的书籍与思考，本书就不在这里赘述。读者可以参考《基督教之大众证据》《基督教信仰的证据》等等书籍。

更进一步说，我们必须深刻地反思、认识到，基督教信仰，就其内在教义为而言，相比于世上的其他宗教信仰体系或是道德伦理体系而言，对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具有什么样的、独特的、深刻的、甚至从长远来说不可或缺的有益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有益作用，并非是时刻不可缺少的作用。例如，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政体虽然不是在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国家 and 地区，比如印度、台湾、日本、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某些非洲国家、个别中东国家等，但是，它们也能够一定程度上、部分地实行民主制度。

但是，我们要在这里强调，那些国家往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而导致的民主制度，例如整个印度曾经被英国统治了上百年；台湾是在二战以后美国的特殊保护之下；日本是在西方的军事力量胁迫之下建立的民主；等等。

换言之，对于民主制度而言，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虽然不是时刻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就长期性、主流性、原发性、等等而言，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宗教信仰体系与道德思想伦理体系之中，基督教信仰具有着极其独特的地位，对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保持有着极其特有的、强烈的、大有

功效的有益作用。

至于，这些有益作用都有哪些，以及，这些有益作用与基督教信仰自身的内在教义有什么深刻的关系，等等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只有当我们深刻明白了这些有益作用具体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有益的作用，我们才能够知道，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怎样在现实世界中、在实践活动中，摆正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民主制度政治事务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本书后文中，会继续对上述问题深入探讨。在这里，我们仅仅是提出一些鸟瞰式的思路。简单地说，基督教信仰的内在教义包含了以下重要内容要点。

1. 所有人都是被上天、上帝所造的。他是我们的天父。世人的生命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所造的。世人生命的本质与心灵和灵魂中的真实光景是什么。2. 什么是罪。3.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4. 谁是那位伟大的永生真神、上天、上帝、造物主？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却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5.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6. 圣经是上帝的全备、无误、权威的启示、话语和旨意。7. 耶稣基

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祂，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8. 上帝是爱；祂是圣洁、公义、慈爱、恩典的；祂是全知、全在、全能、全备的；祂有着无限的智慧；祂有着完美的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祂是至善至美的。9. 耶稣基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祂是天父的独生爱子，是神的儿子，是我们世人的救赎主；祂道成肉身、降身为人、来到世上；祂死在十字架上，并第三日复活，成就了那无限美好的救恩，使一切相信和接受祂恩典的、谦卑承认己罪、悔改己罪的人，都能够得到上帝的饶恕、赦免、救赎，得到那无限美好幸福的永生，进入那无限美好的天上国度。等等。

上述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有着什么内在的、深刻的关系呢？上述基督教信仰教义，对于现代民主制度有什么巨大的有益作用呢？简单地说，这些重要的有益作用包括以下方面。

【1】基督教信仰教义使得民主制度不是建基于人类自高自大、自傲自义的乌托邦空想主义，而是建基于这样一种谦卑的认知：人内心之中有着深刻的内在缺陷、罪；人需要从罪中悔改、寻求真理、归向真神；人需要有敬虔的、超越生死的、执著的、以上天为人之心灵归依的真挚信仰。

【2】在世人良知之中，关于是非、真假、善恶、诚实、虚谎欺骗等等的道

德法则与道德标准，不仅在人的心灵中应当有着重要的权威，而且必须以上帝自己为道德的终极根基。上帝是无限完美、圣洁公义的；他更是监察世人生命与道德的终极审判者。如本书前文所述，道德基础，正是民主制度的重要软肋所在，也正是决定民主制度成败的关键点之一。关于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却实际上非常复杂而深邃。（主要难点在于：——在民主制度社会中，怎么可能针对道德事务进行立法、强制、或是采取某种要求性的措施呢？如果真的那样，岂不成了专制主义社会了吗？或是变成空洞的口号了吗？道德与法律、政治之间的本质关系，究竟在于什么？）我们在本书后文会继续深入思考。

【3】基督教信仰教义指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在于爱。爱的本质是在于，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处之道应当是，憎恨罪、爱罪人。这样的根基，是在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之中。上帝正是以这样的爱来对待我们；他以怜恤、慈爱、恩典的心对待我们，但是，他恨恶我们生命之中的罪；甚至，他愿意为我们的罪而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以把我们从罪中挽回。人与人之间彼此饶恕的根基，正是在于人首先得到了上帝的饶恕与赦免。

马太福音18章

21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吗？”22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23因此，天国好象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帐，24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

一个欠下六千万银币的人来。25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26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27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28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了他一百个银币的仆人，就抓住他，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29那和他一同作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30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31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事情。32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33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象我怜悯你一样吗？’34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35如果你们各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

【4】基督教信仰教义指出，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应当努力、谦卑、勤勉、热忱、专诚地把各样事情做好，但是，人不应当以这个世界上的受造之物为自己心灵的归依，而是应当单单地倚靠那创造天地与世人生命的主。正是因此，唯有因此，人才能够在各样世事中既有执著热忱的态度（而不是像佛教徒那样出世、厌世、看破红尘、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反对生命的执著），又有谦卑的心，并能够彼此之间求同存异、谋求妥协。这种既努力坚持真理、又努力谋求妥协的精神，正是民主制度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生命线所在。

【5】基督教信仰教义对于个人崇拜、对于崇拜人间领袖的偶像化思想倾

向，有着内在性的反对。人与人之间在本质上是平等的，都是被造之物。我们彼此本应当是兄弟姐妹，因为我们本是天父的儿女。

马太福音23章

1那时，耶稣对群众和他的门徒说：2“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3所以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行和谨守，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去作。4他们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5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要作给人看：他们把经文的匣子做大了，衣服的缝子做长了；6他们喜欢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7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8然而你们不要被人称为‘拉比’，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都是弟兄。9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10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师傅，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傅，就是基督。11你们中间最大的，必作你们的仆人。12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

马太福音20章

20那时，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儿子前来见耶稣。她跪在耶稣面前求他。21耶稣问她：“你想要甚么？”她说：“求你下令，使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22耶稣回答：“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甚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能。”23他对他们说：“我的杯你们固然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

可以赐的；我父预备赐给谁，就赐给谁。”²⁴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就向他们兄弟二人生气。²⁵耶稣把他们叫过来，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元首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²⁶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要作你们的仆役；²⁷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作你们的奴仆。²⁸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而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许多人的赎价。”

【6】基督教信仰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倾向，也有着内在的反对。

罗马书13章

1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应当服从。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 神来的；掌权的都是 神设立的。²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反对 神所设立的；反对的人必自招刑罚。³执政的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惧怕。你想不怕掌权的吗？只要行善，就会得到称赞；⁴因为他是 神的仆役，是对你有益的。但如果你作恶，就应当惧怕；因为他佩剑，不是没有作用的。他是 神的仆役，是向作恶的人施行刑罚的。⁵所以你们必须服从，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的缘故。⁶因此，你们也当纳税，因为他们是 神的差役，专责处理这事的。⁷你们要向各人清还所欠的；应当纳税的，就要给他纳税；应当进贡的，就给他进贡；应当敬畏的，就敬畏他；应当尊敬的，就尊敬他。

爱是成全律法的

8不要欠人的债；但在彼此相爱的事上，要觉得是欠了人的债。爱别人的，就成全了律法。9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10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是成全律法的。

总要披戴基督

11还有，你们知道这是甚么时期了，现在正是你们应该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加接近了。12黑夜已深，白昼近了，所以我们要除掉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武器。13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好象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放荡纵欲，不可纷争嫉妒。14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7】类似于上述的各项要点，我们还能够举出很多。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要点本身，并非是彼此孤立的、或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而是有着内在的机理、原因、体系；它们互相都是融会贯通的，都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在本质层面上紧紧相连。这些要点，都与圣经整体所显明的基督教信仰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息息相关。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会在后面章节进一步总结归纳。

=====

社会的目的、国家的目的、人生的目的

正如本书一开始所说的，所谓正确的民主制度，并非是人生、社会、人类的终极真理，而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圣洁之民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虽然我们可以说，民主可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一种组织形式，但是，这绝非意味着，民主就是人类社会所应有的、终极的、完美的样式。

最关键之处是在于，人类【——如果，人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具有自由、圣洁的属性（请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圣洁，并非意味着完美，而是意味着真诚、诚实、而没有诡诈）】虽然可以通过民主来进行自我管理，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人类的心灵、生命与灵魂，就不需要君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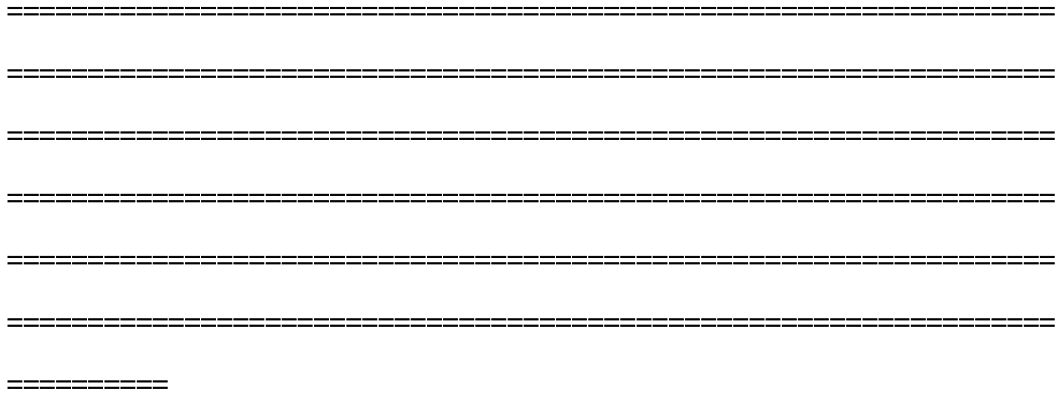
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人在心灵中有了真正的君王【对于基督教信仰而言，对于基督徒而言，这君王就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军之耶和华，那创造宇宙天地与世人生命的造物主、上天、上帝；（——事实上，对于普世之人也都应当是如此；然而，关于基督徒应当如何在民主政体中对待那些非基督徒人士、与他们相处，则绝不应当是歧视、蔑视、打压等等态度；对此，我们会在后文中深刻反思）】，所以，人才不应当以地上的世人为君王。反之，当人不寻求那造物主的荣耀、不愿意真心归向那上天的

无上权柄，那么，人就必然会臣服在世上那些所谓伟人们的脚下，对他们顶礼膜拜，而无法真正地进行民主制度中的自我管理，从而沦落入专制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灾难之中。（这并不是说，在人群、社会中就不可以有领袖；而关键是在于，众人怎样看待他们中间的领袖；在尊敬、崇拜、敬拜、敬畏之间，在服从、顺从、五体投地之间，有着微妙的、但却是极其重要的区别）。

从终极层面而言，社会的目的是什么？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国家是为了人而存在，还是人为了国家而存在？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却实际上很难回答，因为答案绝非是非此即彼的选项。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思考，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在于什么？人为了什么而活着？人又为了什么而死亡？人生中真正的幸福、利益、福祉在于什么？

只有在这些问题上找到正确的、符合真理的、真实的答案，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社会的目的与国家的目的和价值。而那些答案，都是建基于正确的、符合真理的、真实的信仰基础之上。

科技发展与工业革命浪潮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dustrial_Revolution

工业革命是指从约1760年到1820年（或1840年）之间，发生于欧洲和美国的新的制造工艺技术与制造过程的革命。在此期间，手工制造转变为机器制造；新的化学品制造和铁的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蒸汽和水力；

机床的发展和机械化工厂系统的兴起，开始普遍出现。工业革命还导致人口增长率空前提高。

就就业，产出价值和投资资本而言，纺织品是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在纺织行业也是率先使用现代生产方式。

工业革命始于英国，许多技术创新都起源于英国。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是世界领先的商业国家，是控制着全球贸易的帝国；它的殖民地遍及北美和加勒比地区，并与印度次大陆上的主要的军事和政治霸权进行贸易，特别是通过东印度公司的活动与原始工业化的莫卧儿·孟加拉（Mughal Bengal）进行合作。贸易的发展和商业的兴起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

工业革命标志着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平均收入和人口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持续增长。一些经济学家说，工业革命的最重要影响是，西方世界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持续的增长，尽管另一些经济学家说，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它才开始有意义地提高。

在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之前，人均GDP基本稳定，而工业革命则开始了资本主义经济中人均经济增长的时代。经济史学家一致认为，工业革命的爆发是自动物和植物驯化以来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工业革命的确切开始和结束仍在历史学家中争论，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步伐也是如此。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工业革命始于1780年代的英国，直到1830或1840年代才被完全感受到，而TS阿什顿（TS Ashton）则认为工业革命大约在1760年至1830年之间发生。快速工业化首先在英国开始，始于1780年代的机械化纺丝；在1800年以后蒸汽动力和铁的生产出现了高增长率。在19世纪初期，机械化的纺织品生产从英国传播到欧洲大陆和美国；重要的纺织品，钢铁和煤炭中心出现在比利时和美国；后来纺织中心又出现在法国。

从1830年代末到1840年代初发生了经济衰退，当时工业革命早期对机械化纺纱和织布等创新的采用速度减慢，市场成熟。在此后期发展的创新，例如机车，汽船和轮船的采用不断增加，高炉铁水冶炼以及诸如电报等新技术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被广泛采用，但其不足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1870年以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了一组新的创新，从而开始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些创新包括新的炼钢工艺，批量生产，装配线，电网系统，大型机床制造以及在蒸汽动力工厂中使用越来越先进的机械。

词源

1799年7月6日，法国特使路易斯-纪尧姆·奥托（Louis-Guillaume Otto）写了一封信，宣布法国已进入工业化竞赛，该书似乎最早记录了“工业革命”一词的使用。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1976年出版的《关键字：文化与社会词汇》一书中指出：“在1811年至1818年之间，绍斯和欧文明确地提出了基于重大工业变革的新社会秩序的构想；在1790年代的布莱克（Blake）和19世纪之交的华兹华斯（Wordsworth）也曾隐晦地指出这一点。”到1830年代后期，技术变革的应用变得越来越普遍，正如

耶洛姆·阿道夫·布兰基（Jérôme-AdolpheBlanqui）在1837年对工业革命的描述中所指出的那样。

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谈到“工业革命同时改变了整个公民社会”。但是，尽管恩格斯在1840年代就写了该书，但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它才被翻译成英文；直到那时他的表达词句才进入日常语言。推广该术语的功劳可以归功于Arnold Toynbee，他在1881年的演讲中对该术语进行了详细介绍。

一些历史学家，例如约翰·克拉彭（John Clapham）和尼古拉斯·克拉夫斯（Nicholas Crafts），都认为经济和社会变革是逐渐发生的，而革命一词是不恰当的。这仍然是一些历史学家争论的话题。

要求

促进工业化的六个因素：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力，以提供过多的人力和粮食；丰富的管理和创业技能；可利用的港口，河流，运河和道路廉价地运输原材料和产出；煤炭，铁和瀑布等自然资源；政治稳定和支持企业的法律体系；以及可供投资的金融资本。

一旦英国开始工业化，就可以添加新的因素：——英国企业家渴望出口工业专业知识以及愿意开展进口贸易。英国从18世纪开始就达到了上述要素，并逐渐实现了工业化。19世纪初，英国将工业革命出口到西欧（尤其是比利时，法国和德国）。

重要的技术发展

工业革命的开始与一些技术创新紧密相关；这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到1830年代，重要技术取得了以下成就：

纺织工业——机械化棉纺以蒸汽或水力为动力，增加工人的输出达到500倍左右；动力织机增加的一个工人的输出生产率超过40倍；轧棉机去除棉花种子的生产率提高达到50倍。羊毛和亚麻的纺纱和织造也显著提高了生产率，但不如棉花的生产率提高的程度高。

蒸汽动力——蒸汽机的效率提高了，因此它们消耗的燃料量降低为原来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固定式蒸汽机被改造、使其适应旋转运动的特点、因而更加适用于工业用途。高压发动机具有较高的功率动量比，使其适合运输。1800年后，蒸汽动力迅速发展。

炼铁——用焦炭代替木炭极大地降低了生铁和锻铁生产的燃料成本。焦炭还可以适用于更大的高炉，从而带来规模经济。在1750年代中期，蒸汽机开始用于抽水和驱动鼓风；通过克服水力的限制，使铁的产量大大增加。铸铁吹瓶技术于1760年首次使用；后来通过对其双重作用进行了改进，从而使高炉工作温度更高。在炼铁过程中的水化技术，使得炼铁的成本和质量都被显著改善。轧机技术比锤击熟铁快15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热风（1828年）大大提高了炼铁生产的燃料效率。

机床的发明——发明了第一批机床。其中包括螺丝切割车床，圆柱镗床和铣床。机床使精密金属零件的廉价制造成为可能；尽管开发有效的机床技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纺织制造

1750年，英国进口了250万磅原棉，其中大部分是由兰开夏郡的家庭手工业纺织。这项工作是在工人的家中手工完成，或偶尔在织布大师的店厂中完成。1787年，纺织技术革命开始以后，原棉消耗量为2200万磅，其中大部分经过清洁，梳理和机器纺纱。英国纺织业在1800年使用了5200万磅棉花，到1850年增加到5.88亿磅。

英国棉纺织业增加值的份额在1760年为2.6%，1801年为17%，1831年为22.4%。1801年英国羊毛产业的增加值为14.1%。1797年，英国的棉花工厂约有900家。1760年，英国制造的棉布约有三分之一出口，到1800年增加到三分之二。1781年，棉纺的总产量为510万磅，到1800年增加到5600万磅。世界棉布是用英国发明的机器生产的。在1788年，英国有50,000个纺锤，在接下来的30年中上升到700万锭。

1770年，兰开夏郡是家庭手工业的核心地区，后来成为工厂纺纱和织布中心；其工资约为印度的六倍，而英国的整体生产率约为印度的三倍。

棉布

印度，中国，中美洲，南美和中东的部分地区拥有手工制造棉纺织品的悠久历史，在公元1000年后的某个时候，棉纺织品就成为主要产业。在种植它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大多数棉花是由小农在种植粮食作物的时候一道种植的；农民们在家庭中纺制和编织棉花，主要用于家庭消费。在15世纪，中国开始要求住户用棉布缴纳部分税款。在印度，大量的棉纺织品是为远方的市场生产的，通常是由专业的织布工人生产；一些商人还拥有小型织造作坊。印度生产各种棉布，其中一些质量特别好。

早期的西班牙探险家发现，美洲原住民种植着未知品种的优质棉花：海岛棉和绿色棉籽棉。海岛棉生长在热带地区以及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隔离岛上，但内陆地区却表现不佳。1650年代从巴巴多斯开始出口海岛棉。陆地绿色种子棉在美国南部的内陆地区生长良好，但去除种子的过程困难而不经济；不过，后来的棉花轧花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1806年，从墨西哥带到密西西比州纳奇兹的一株棉花种子成为当今世界90%以上棉花生产的父本遗传物质；它产生的棉铃捡起来的速度快了三到四倍。

贸易和纺织品

继葡萄牙贸易路线、印度各地、南部非洲的发现，荷兰成立了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或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跨国公司和第一个向公众发售股票的跨国企业。英国后来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以及一些其他地区的较小公司；这些公司建立了贸易站、并雇用了代理商从事整个印度洋地区以及北大西洋、欧洲之间的贸易。

这种贸易的最大部分之一是棉纺织品；在印度购买棉纺，并在东南亚包括印度尼西亚群岛销售；反过来，在印度尼西亚群岛购买香料出售给东南亚和欧洲。到1760年代中期，布料已占东印度公司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在欧洲的北大西洋地区，印度的纺织品需求旺盛，以前那里只能买到羊毛和亚麻。然而，直到19世纪初，西欧的棉花消费量仍很小。

机械化时代之前的欧洲纺织品生产

到1600年，佛兰德难民开始在英国城镇编织棉布；那里的家庭纺纱和羊毛与亚麻编织业已很成熟。欧洲早些时候棉纺和编织的尝试是在12世纪的意大利和15世纪的德国南部，但是这些行业最终在棉花供应中断时就结束了。西班牙的摩尔人在10世纪左右开始种植棉花，纺纱和编织棉布。

英国对较重织物的需求由位于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一个国内行业满足；该行业生产了花呢织物（fustian），这种织物具有亚麻经线和棉纬线。亚麻用于经纱是因为轮纺棉没有足够的强度，但所得的混纺棉不如

100%棉柔软，更难于缝制。

在工业革命前夕，纺纱和织布的工作大多是在工人家庭内进行。有时，工作是在织布的车间完成。在推销制度下，家庭工人按合同生产棉织布，把成品卖给商人；后者为生产者提供棉花等原材料。在农业淡季，妇女（通常是农民的妻子）进行纺纱，而男子进行编织。他们使用纺车轮；需要四到八个转子设备来配合一个纺织工人。

纺织机械的发明

飞梭的发明始于1733年约翰·凯的专利技术；该发明技术后来又经过了一系列改进，包括在1747年的一个重要技术进步；这使得织布的生产率被提高了一倍。1760年，约翰的儿子罗伯特（Robert）发明了可方便更换线色的设备技术后，它在兰开夏郡（Lancashire）周围得到了广泛使用。

刘易斯·保罗（Lewis Paul）申请了滚筒纺纱框架和梭芯系统的专利；该专利用于将羊毛拉伸到更均匀的厚度。该技术是在伯明翰的约翰·怀亚特（John Wyatt）的帮助下发明的。保罗和怀亚特（Paul and Wyatt）在伯明翰（Birmingham）开设了一家工厂，该工厂使用了他们的由驴驱动的新型轧制机。1743年，他们在北安普敦开设了一家工厂，该工厂在Paul和Wyatt的五台机器上，每台都有50个主轴。它一直运行到1764年左右。丹尼尔·鲍恩（Daniel Bourn）在莱明斯特（Leominster）建造了一座类似的工厂。Lewis Paul和Daniel Bourn都于1748年为梳棉机申请了专利。它基

于两组以不同速度行进的滚筒。刘易斯的发明后来由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在他的水力结构框架中，和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在其旋转的转子中，进行了改进。

1764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在兰开夏郡的斯坦希尔（Stanhill）村发明了纺纱詹妮（Jenny），并于1770年申请了专利。这是第一台实用的多锭纺纱机。Jenny的工作方式与纺纱轮相似，先将纤维夹紧，然后将其拉出，然后再加捻。Jenny生产的轻捻纱仅适用于纬纱，不适合经纱。

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与两个合作伙伴共同发明了旋转框架与水框架，该框架于1769年获得了专利。该发明技术部分是基于钟表匠约翰·凯（John Kay）为托马斯·海德（Thomas High）制造的纺纱机；后者由阿克赖特（Arkwright）使用。对于每个锭子，水架使用一系列四对辊子，每对辊子以更高的旋转速度运行，以拉出纤维，然后将纤维通过锭子进行捻合。间距太小会导致纤维断裂，而间距太远则会导致线不均匀。顶辊用皮革覆盖，并用重物施加在辊上作为负载。配重块防止扭力在辊子之前退回。底辊是木头和金属，沿长度方向有凹槽。这些发明技术最终使100%的棉布能够在英国制造。一匹马为第一家工厂提供动力，以使用纺纱机。阿克赖特（Arkwright）和他的合伙人于1771年在德比郡克罗姆福德的一家工厂开始使用水力。

塞缪尔·克罗姆普顿（Samuel Crompton）的旋转子于1779年问世。它使用一种混合动力，因为它是旋转的Jenny和水车架的组合；其中将锭子放在滑

架上，在此过程中，滚筒停止运转的同时，锭子开始旋转，托架从拉纸辊上移开，以拉出纤维。这比手工纺丝能够生产出更细的线，并且成本更低。它具有合适的强度，可以用于生产经纱，最终使英国能够大量生产具有竞争力的纱线。

埃德蒙·卡特赖特（Edmund Cartwright）意识到阿克赖特（Arkwright）专利的到期将大大增加棉纺纱的供应并导致织布工人的短缺，于是他开发了一种立式动力织机；他于1785年申请了专利。1776年，他为两人操作的织机申请了专利。Cartwright的织布机设计有几个缺陷，最严重的是断线。塞缪尔·霍罗克斯（Samuel Horrocks）在1813年获得了相当成功的织机的专利。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Roberts）在1822年改进了霍洛克的织机，这些织机由罗伯茨·希尔（Roberts, Hill & Co.）大量生产。

对棉花的需求为美国南部的种植者提供了机会；他们认为，如果可以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来去除收获的棉花中夹杂的种子，陆地棉将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作物。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埃利·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了轧棉机。使用这个机器，工人的生产率大大提高，一天的工作产出相当于以前两个月的工作产出。

这些技术进步被企业家利用，其中最著名的是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他以一系列发明而著称，但这些发明实际上是由Thomas Highs和John Kay等人开发的；阿克赖特（Arkwright）资助了发明者，为这些思想申请了专利，为这些计划提供了资金，并保护了机器开发过程。他创建了一家将工厂的生产流程整合在一起的棉纺厂，并开发了新动力的

使用方式（首先是马力，然后是水力），这使棉花制造成为机械化产业。其他发明人提高了纺纱各个步骤（梳理，加捻和纺纱以及轧制）的效率，从而大大提高了纱线产量。不久之后，蒸汽动力就被用于驱动纺织机械。曼彻斯特（Manchester）在19世纪初因其纺织工厂的庞大而获得了绰号“纺织之城”。

尽管机械化极大地降低了棉布的成本，但到19世纪中叶，机织布仍无法与印度手工编织的精致布匹媲美，部分原因是由于印度使用的精致棉花类型质量更好。然而，英国纺织业的高生产率使低档次的印度粗纺布无法与之竞争。

羊毛

欧洲最早的机械化纺纱尝试是用羊毛。然而，事实证明，与棉相比，毛纺更难机械化。工业革命期间羊毛纺纱的生产率提高也是显著的，但远不及棉花纺织生产率的极其大幅提高。

丝绸

可以说，第一个高度机械化的丝绸纺织工厂是约翰·隆贝（John Lombe）在德比（Derby）的水力丝织厂，该厂于1721年投入运营。但是，由于意大利丝绸业严密保护其秘密，当时的生丝行业状况还不得而知。尽管Lombe的工厂在技术上取得了成功，但意大利的生丝供应被切断（意大利人想要以此消除竞争）。为了促进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英国王室为在伦敦塔展出的

Lombe机械模型买单。

钢铁行业

利用开采的煤在反射炉可以生产铸铁。燃烧的煤与铁保持分离，因此铁不会被硫和二氧化硅等杂质污染。这为增加铁产量和铁质量开辟了道路。

世界第一座铁桥是在英国什罗普郡于1781年开通的。

棒铁是铁的商品形式，用作制造钉子，金属丝，铰链，马蹄铁，马车轮胎，链条等五金产品以及结构形状的原材料。少量的棒状铁被转化为钢。铸铁被用于锅，火炉和其他易碎的物品。大多数铸铁都经过精炼并转化为棒状铁。

在1720年的英国，木炭生产的铸铁为20,500吨，焦炭生产的铸铁为400吨。1750年，木炭铁产量为24,500吨，焦炭铁为2500吨。1788年，木炭铸铁的

产量为14,000吨，而焦炭的产量为54,000吨。1806年，木炭铸铁产量为7800吨，焦炭铸铁为25万吨。

1796年，英国用焦炭生产125,000吨铁条，用木炭生产6400吨。进口3.8万吨，出口2.46万吨。1806年，英国没有进口铁条，但出口了31,500吨。

铁工艺创新

工业革命期间钢铁行业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用煤炭替代了木材和其他生物燃料。对于给定的热量输出，开采煤炭所需的劳动要比砍伐木材和将其转化为木炭要少得多；煤炭比木材要丰富得多；在铁的生产大量增加之前，木材的供应在18世纪后期已经变得稀缺。

到1750年，焦炭在铜和铅的冶炼中已普遍取代木炭，并已广泛用于玻璃生产中。在铁的冶炼和精炼中，由于煤中的硫含量，煤和焦炭产生的铁比木炭产生的铁低。低硫煤是众所周知的，但它们仍然含有有害成分。

工业革命之前限制钢铁行业的另一个因素是，水力动力不足以鼓起风箱。蒸汽机克服了这一限制。

煤炭在使用铁冶炼工业革命前有所启动的基础上，通过克莱芒·克拉克爵

士等人的创新，开始被广泛应用。从1678年，使用煤反射炉（被称为冲天炉）。这些是通过在矿石，木炭或焦炭混合物上燃烧的火焰来进行的，从而将氧化物还原为金属。这样做的好处是，煤中的杂质（例如硫灰）不会迁移到金属中。这项技术从1678年开始应用。它在1690年代也应用于铸造厂，但在这种情况下，反射炉被称为空气炉。

1709亚伯拉罕·达比在Coalbrookdale用焦炭燃起他的高炉。但是，他制造的炼焦生铁不适合制造锻铁，而主要用于生产铸铁商品，例如锅和水壶。他比竞争对手具有优势，因为通过专利工艺铸造的锅比他们的锅更薄，更便宜。

直到1755年至1756年，新的熔炉配备了由水驱动的波纹管；水由Newcomen蒸汽机泵送。Newcomen发动机未直接安装在吹瓶上，因为单独的发动机无法产生稳定的鼓风。亚伯拉罕·达比的孙子（Abraham Darby III）在1768年取得控制权时，就在戴尔公司（Dale Company）上安装了类似的蒸汽泵，以及水力吹瓶。戴尔公司（Dale Company）使用了几台Newcomen发动机，并制造了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的发动机零件。

蒸汽机使高压和大风量的使用成为现实。但是，波纹管中使用的皮革更换起来很昂贵。1757年，钢铁大师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获得了用于高炉的液压动力吹气发动机的专利。高炉用吹瓶于1760年间世；第一个用铸铁制成的吹瓶被认为是约翰·史密顿（John Smeaton）在1768年在卡林顿使用的吹瓶。

与活塞一起使用的铸铁气缸很难制造。气缸必须没有孔，并且必须光滑，必须笔直地加工以消除任何翘曲。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很难为他的第一台蒸汽机制造汽缸。1774年，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为其铸铁厂制造了一个铸铁吹塑缸；他发明了一种用于镗缸的精密镗床。威尔金森（Wilkinson）在1776年为博尔顿（Bulton）和瓦特（Watt）蒸汽机成功钻出第一个成功的汽缸后，他获得了提供汽缸的独家合同。瓦特（Watt）在1782年研发出旋转式蒸汽机后，将其广泛应用于吹，锤，滚和纵切。

解决硫问题的方法是在炉中添加足够的石灰石以迫使硫进入炉渣，并使用低硫煤。使用石灰或石灰石需要较高的炉温以形成自由流动的炉渣。通过改进吹炼可以提高炉温，也提高了高炉的能力，并可以增加炉高。除了降低成本和提高可用性外，焦炭相对于木炭还具有其他重要优势，因为它更坚硬，并使从高炉流下的物料（铁矿石，燃料，矿渣）柱更加多孔，且并没有在19世纪后期的、常出现的熔炉破碎现象。

随着铸铁变得更加便宜和广泛使用，它开始成为桥梁和建筑物的结构材料。一个著名的早期的例子是建于1778年的铁桥。该铁桥中的铸铁由亚伯拉罕·达比三世生产。但是，大多数铸铁已转换为锻铁。

铸铁的转换是在高级锻造厂中完成的。开发了一种改进的精制工艺，称为灌封和压印，但被亨利·科特（Henry Cort）的混泥工艺所取代。科特开发了两个效果显著的铁制造工艺：轧制（1783年）和搅炼（1784）。

搅炼是通过用长棒手动搅拌它、使之在反射炉通过缓慢氧化脱碳的熔融生铁的手段。熔点比铸铁高的脱碳铁被水坑磨成小球。当水珠足够大时，将其移除。水坑是繁重的工作，而且非常辛苦。

直到19世纪末，铁被钢置换时，一直使用泥浆法。轧制是制浆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开槽的辊子排出了大部分的熔渣并巩固了热锻铁的质量。滚动比跳闸锤快15倍。轧制的另一种用途是在生产铁片和后来的结构形状（例如梁，角钢和钢轨）时，在比用于排渣的温度更低的温度下进行制造。

1818年，鲍德温·罗杰斯（Baldwyn Rogers）改进了混泥工艺，他用氧化铁代替了反射炉底部的一些砂衬。1838年，约翰·霍尔（John Hall）获得了对窑炉底部使用烤制自来水煤渣（硅酸铁）的专利，这种方法大大减少了由于衬有砂衬的底部导致炉渣增加而导致铁的损失。自来水煤渣还束缚了一些磷，但是当时还不知道。Hall的工艺还使用了铁鳞或铁锈，它们与铁水中的碳发生了反应。霍尔的过程称为湿法制浆，将渣中铁的损失从近50%降低到了8%左右。

1800年以后，水坑被广泛使用。到那时，英国的钢铁制造商已经使用了大量从瑞典和俄罗斯进口的铁矿来补充国内供应。由于英国产量的增加，进口在1785年开始下降，到1790年代英国取消了进口，成为棒材的净出口国。

热风，由詹姆斯·博蒙特·尼尔森（James Beaumont Neilson）于1828年申请专利，是19世纪最重要的发展，用于节约生铁的能源。通过使用预热的燃烧空气，制造生铁的燃料量首先减少了三分之一（使用焦炭）或三分之二（使用煤）。随着技术的改进，效率继续提高。热风还提高了熔炉的工作温度，提高了熔炉的容量。使用更少的煤或焦炭意味着将更少的杂质引入到生铁中。这意味着较低质量的煤炭或无烟煤可用于无法获得焦煤或价格太昂贵的地区；然而，到19世纪末，运输成本大幅度下降。

工业革命之前不久，钢的生产有了改进，钢是一种昂贵的商品，仅在铁不能加工的地方使用，例如用于尖端工具和弹簧。本杰明·亨斯曼（Benjamin Huntsman）在1740年代发展了他的坩埚钢技术。其原料是通过渗碳工艺制成的泡罩钢。

廉价钢铁的供应为许多行业提供了帮助，例如制造钉子，铰链，金属丝和其他五金制品的行业。机床的发展使铁更好地被加工制造，从而使铁越来越多地用于快速发展的机械和发动机行业。

蒸汽动力

瓦特蒸汽机。James Watt将蒸汽机从用于泵送的往复运动转变为适合工业应用的旋转运动。瓦特等人大大提高了蒸汽机的效率。

固定式蒸汽机的发展是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工业革命初期，大多数工业动力是由水和风提供的。在英国，到1800年，蒸汽估计可提供10,000马力。到1815年，蒸汽功率已增至210,000马力。

1698年，托马斯·萨弗里（Thomas Savery）首次成功地在工业上使用了蒸汽动力。他在伦敦建造了低升程真空和压力联合水泵，并为其申请了专利；该泵产生了大约一马力的功率，并被用于许多自来水厂和在少数几个矿山中（因此称为“矿工之友”，即“矿工之友”）。Savery的泵在小马力范围内比较经济，但是在较大尺寸的锅炉上容易发生爆炸。节能泵一直生产到18世纪后期。

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在1712年之前首次采用了成功的活塞式蒸汽发动机。英国安装了许多纽科门发动机，用于深层矿井。这些都是大型机器，需要大量资本来建造，并且产生的功率高达5马力（3.7 kW）。它们还用于驱动市政供水泵。按照现代标准，它们的效率极低，但是它们使得矿井可以更深，从而极大地扩展了煤炭开采业。

尽管有缺点，但Newcomen发动机可靠，易于维护，并一直在煤田中使用，直到19世纪初期。到1729年，纽科门去世时，他的引擎在1722年（首先）

传播到匈牙利，德国，奥地利和瑞典。到1733年联合专利到期时，已知总共建造了110座工厂，其中14座在国外。在1770年代，工程师John Smeaton建立了一些非常大型的工程示范，并进行了许多改进。到1800年，总共制造了1,454台发动机。

Newcomen的蒸汽动力大气发动机是第一台实用的活塞式蒸汽发动机。随后的蒸汽机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

苏格兰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带来了工作原理的根本变化。在他的商业伙伴英国人Matthew Boulton的财政支持下，他在1778年成功地完善了自己的蒸汽机；它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进，特别是关闭了气缸的上部，从而使低压蒸汽驱动活塞的顶部，并使用了蒸汽夹套和著名的单独的蒸汽冷凝器室。单独的冷凝器消除了直接注入到钢瓶中的冷却水，冷却水冷却了钢瓶并浪费了蒸汽。同样，蒸汽夹套可防止蒸汽在气缸中冷凝，从而提高了效率。这些改进提高了发动机效率，因此Boulton和Watt的发动机，相比于Newcomen发动机，每马力小时仅消耗20-25%的煤。

到1783年，瓦特蒸汽机已经完全发展为双作用旋转式，这意味着它可以用于直接驱动工厂内的任何旋转机械。这两种瓦特的基本发动机在商业上都非常成功，到1800年，布尔顿和瓦特公司已经建造了496台发动机，其中包括164台往复式驱动泵，24台用于高炉的设备以及308台为磨机提供动力的设备。大多数发动机的功率为5到10马力（3.7到7.5 kW）。

直到大约1800年，蒸汽发动机最常见的模式是梁式发动机，它是石头或砖砌发动机舱的组成部分，但很快便开发出了多种形式的自足式旋转发动机（易于拆卸，但不能装在车轮上）。大约在19世纪初，Boulton和Watt专利到期，康沃尔的工程师Richard Trevithick和美国的Oliver Evans开始制造高压的非冷凝式蒸汽机，排空了大气。高压使发动机和锅炉变得紧凑，足以在移动的公路或铁路机车上、以及汽船上使用。

机床的发展，例如由这些发动机提供动力的发动机车床，刨床，铣床和整形机，使发动机的所有金属零件都能轻松地、准确地切割，从而有可能制造更大，功率更大的发动机。

直到20世纪初广泛的电气化之前，仍然需要动物和人的肌肉来提供少量的工业动力。其中包括曲柄动力，脚踏动力和马力车间以及轻工业机械。

机械工具

工业化前的机械是由各种工匠建造的，其中包括：水利设备和风车，木匠

制造的木制框架，铁匠和车工制造的金属零件。木制部件的缺点是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而改变尺寸，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各种接头往往会变松。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带有金属零件和框架的机器变得越来越普遍。金属零件的其他重要用途是在枪支和螺纹紧固件中，例如机器螺钉，螺栓和螺母。需要精确地制造这些零件。精度将导致更好的工作机械，零件的互换性和螺纹紧固件的标准化。

对金属零件的需求导致了几种机床的发展。它们起源于18世纪钟表制造商和科学仪器制造商开发的工具；这些工具使他们能够批量生产小型机械。

在机床问世之前，金属是使用锤，锉，刮刀，锯和凿子等基本手动工具手动加工的。手工生产非常费力且昂贵，并且难以达到精确度。

第一台大型精密机床是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于1774年发明的汽缸镗床。它用于在早期蒸汽机上对大直径汽缸进行镗孔。威尔金森（Wilkinson）的镗孔机与早期的用于钻加农炮的悬臂式机床的区别在于，切削工具安装在横穿于钻探的圆柱体上的横梁上，并且两端都支撑于外部。

刨机，磨粉机和成型机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被开发出来。尽管铣床是在此时发明的，但直到19世纪后期才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车间工具。

亨利·莫兹莱（Henry Maudslay）于19世纪初在一家机床制造商学校接受培训，是一位能力卓越的机械师，曾在伍尔维奇（Woolwich）的皇家阿森纳（Royal Arsenal）任职。他在Jan Verbruggen的皇家枪械铸造厂当学徒。1774年1月，韦布吕根（Jan Verbruggen）在伍尔维奇（Woolwich）安装了卧式镗床，这是英国第一台工业尺寸的车床。约瑟夫·布拉玛（Mr. Joseph Bramah）聘请莫兹莱（Maudslay）生产高安全性的金属锁，这种金属锁需要精湛的工艺。Bramah获得了一种与滑动式车床相似的车床专利。

Maudslay完善了滑轨车床；它可以通过在主轴和丝杠之间使用可换档齿轮来切削不同螺距的机加工螺钉。在其发明之前，工厂无法使用各种较早的车床设计将螺钉切割到任何精度，其中一些只能是从模板复制而来。滑枕车床被称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尽管这并不是Maudslay的全部想法，但他还是第一位结合丝杠，滑架和变速齿轮等已知创新技术来制造功能性车床的人。

莫兹莱（Maudslay）离开了布拉玛（Bramah）的工作，并开设了自己的厂店。他曾在朴茨茅斯街区磨坊（Portsmouth Block Mills）从事制造用于皇家海军的轮滑轮组的机械的制造。这些机器是全金属的，并且是第一批用于批量生产和制造具有一定互换性的零件的机器。莫兹莱（Maudslay）的经验教训使他了解了稳定性和精度的需要，他推动了机床技术的发展。在他的工作室中，他培养了一代人来继承自己的工作，例如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Roberts），约瑟夫·克莱门特（Joseph Clement）和约瑟夫·惠特沃斯（Joseph Whitworth）。

德比的詹姆斯·福克斯（James Fox）和利兹（Leeds）的马修·默里（Matthew Murray）一样，在本世纪的前三分之一都拥有兴旺的机床出口贸易。罗伯茨（Roberts）是高质量机床的制造商，并且是使用夹具和量具进行精密车间测量的先驱。

工业革命期间机床的影响不是很大，因为除了枪支，螺纹紧固件和其他一些行业外，几乎没有大量生产的金属零件。具有足够精度的、可大量生产的、金属零件的、可互换的技术，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战争部的一项计划；该计划在19世纪初期完善了枪支的可互换零件的标准。

从基本机床的发明开始，半个世纪以来，就增加值而言，机床行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大的工业部门。

化学制品

化学品的大规模生产是工业革命期间的重要发展。首先是由英国人约翰·罗巴克（James Watt的第一任合伙人）于1746年发明的铅室工艺生产

硫酸。

大规模生产碱也是一个重要目标，尼古拉斯·勒布朗（Nicolas Leblanc）在1791年成功引入了生产碳酸钠的方法。勒布朗通过硫酸与氯化钠的反应，得到硫酸钠和盐酸；通过加热石灰石（碳酸钙）和煤，得到碳酸钠的混合物和硫化钙；然后，加水将可溶性碳酸钠与硫化钙分离。该过程产生大量污染（最初将盐酸排入空气，而硫化钙是无用的废物）。然而，与燃烧特定植物或海带（以前是纯碱的主要来源）以及从硬木灰烬中产生的碳酸钾相比，这种合成的纯碱被证明是经济的。

这两种化学物质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引入许多其他发明，用更具成本效益和可控制的工艺代替许多小规模生产。碳酸钠在玻璃，纺织，肥皂和造纸工业中有许多用途。硫酸的早期用途包括对钢铁进行酸洗（除锈），以及对布进行漂白。

苏格兰化学家查尔斯·特南特（Charles Tennant）在大约1800年开发了漂白粉（次氯酸钙）；这是基于法国化学家克劳德·路易斯·贝特霍尔特的发现；通过显著地减少所需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天），这彻底改变了纺织工业中的漂白工艺。Tennant位于格拉斯哥北部圣罗洛克斯的工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厂。

1860年之后，化学创新的重点是染料；德国占领了世界领先地位，建立了强大的化学工业。有抱负的化学家在1860–1914年期间涌向德国大学，以学

习最新技术。相比之下，英国科学家缺乏研究型大学，也没有培训高级学生。相反，英国工厂的惯例是雇用受过德国培训的化学家。

水泥

1843年，在建设泰晤士隧道的过程中，水泥被用于世界上第一条水下隧道。

1824年，约瑟夫·阿斯普丁（Joseph Aspdin）成为英国瓦工改建商，该公司为制造波特兰水泥的化学工艺申请了专利，这是建筑行业的重要进步。此过程涉及将粘土和石灰石的混合物烧结至约 $1,400^{\circ}\text{C}$ （ $2,552^{\circ}\text{F}$ ），然后将其研磨成细粉，然后与水，沙子和砾石混合以生产混凝土。几年后建造泰晤士河隧道时，著名的英国工程师马克·伊桑巴德·布鲁内尔（Marc Isambard Brunel）使用了波特兰水泥。一代人以后，在伦敦的污水处理系统的建设中大规模使用了水泥。

气体照明

后来工业革命中的另一个主要工业是燃气照明。尽管其他人在其他地方进行了类似的创新，但这种大规模的应用是伯明翰蒸汽机Boulton & Watt的员工William Murdoch的开拓性工作贡献。该过程包括炉中煤的大规模气化，气体的净化（去除硫，氨和重烃）及其存储和分配。第一家天然气照明设施于1812年至1820年在伦敦成立。它们很快使得英国成为主要的煤炭消费国之一。天然气照明影响了社会和工业组织，因为它使得工厂和商店的营业时间比使用牛脂蜡烛或石油更长。它的引入使在城市和城镇中的夜生活蓬勃发展，因为室内和街道可以比以前更大规模地被点亮。

玻璃制作

玻璃是在古希腊和罗马首先制造的。在19世纪初期，欧洲开发了一种新的玻璃生产方法，称为圆筒法。1832年，Chance Brothers使用此工艺制作了平板玻璃。他们成为窗玻璃和平板玻璃的主要生产商。这一进步使得可以不间断地创建更大的玻璃窗格，从而释放了内部空间规划以及建筑物的开窗。水晶宫是在创新的结构中使用平板玻璃的最高典范。

造纸机

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Nicholas Louis Robert）于1798年申请了专利，该机器用于在金属丝织物的线圈上连续制造纸。造纸机的连续生产方法影响了铁和后来的钢的连续轧制以及其他连续生产工艺的发展。

农业

英国的农业革命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因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经济的其他部门可以使用数量更多的工人。英国律师Jethro Tull于1701年发明了一种改良的播种机。它是一种机械播种机，可将种子均匀地分布在一块土地上，并以正确的深度播种。Joseph Foljambe的Rotherham犁在1730年是第一个商业上成功的铁犁。苏格兰工程师安德鲁·米克尔在1784年发明了打谷机。

工业革命期间开发的机床和金属加工技术最终导致了19世纪后期用于大量生产农业设备的精密制造技术，例如收割机，粘合剂和联合收割机。

矿业

在英国，特别是南威尔士，煤矿开采很早就开始了。在蒸汽机之前，煤坑通常是沿表层煤层的浅钟形坑，随着浅层煤层的开采完毕而被废弃。在其他情况下，如果地质条件有利，则可以通过平巷或巷道开采煤炭。在某些地区进行了竖井开采，但限制因素是除水问题。

托马斯·萨弗里（Thomas Savery）于1698年引入了蒸汽泵；1712年由于纽科门（Newcomen）蒸汽机的引入，极大地促进了水的去除，并使井筒更深，从而可以提取更多的煤。这些都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开始的发展，但是采用John Smeaton对Newcomen发动机的改进，随后采用James Watt从1770年代起使用的更高效的蒸汽发动机，降低了发动机的燃料成本，使矿山更有利可图。康沃尔的发动机在1810年代被开发，比瓦特蒸汽机更有效。

运输

工业革命初期，内陆运输是通过通航的河流和道路，沿海船只被用来通过海上运输重物。货车曾被用来将煤炭运到河里作进一步的运输，但运河尚未广泛建造。动物在陆地上提供了所有动力，而帆则在海上提供了动力。最早的铁路是在18世纪末引入的，蒸汽机车是在19世纪初期引入的。在1750年至1830年之间，不断改进的航行技术使平均航行速度提高了50%。

工业革命通过收费公路网络，运河和水路网络以及铁路网络改善了英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原材料和制成品的运输比以前更快，更便宜。改善的交通运输也使新创意得以迅速传播。

运河和改善的水道

因商业上的成功而闻名的布里奇沃特运河穿越了曼彻斯特船舶运河，这是最后修建的运河之一。

在工业革命之前和期间，通过消除障碍物，拉直曲线，加宽和加深以及建造航海设备，改善了英国多条河流的交通运输网络。到1750年，英国拥有超过1000英里的可通航河流。

运河和水路使散装物料得以经济地进行远距离内陆运输。这是因为一匹马可能会拖拉一艘驳船，其载重量比可能在马车中拉动的载重量大数十倍。

在英国，运河始建于18世纪后期，以连接全国主要的制造中心。到1820年代，已经建立了国家网络。运河建设是后来用于铁路建设的组织和方法的模板。从1840年代开始，铁路的普及最终取代了运河网络。在英国建造的最后一条主要运河是曼彻斯特船舶运河，该运河于1894年开放，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运河，并使得曼彻斯特成为一个开放的港口。然而，在这个以铁路为主导的时代，铁路速度更快，而且价格通常更低廉。

英国的运河网络及其幸存的工厂建筑物，是英国早期工业革命最持久的象征之一。

道路

在英国，从1720年代（有时是更早）起，收费公路信托基金开始建立，以收取通行费并维护一些道路。自175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主干道实行收费，以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几乎每条主干道都由收费托拉斯信托负责。美国第一条碎石路是1823年在黑格斯敦和马里兰州的博恩斯伯勒之间的“布恩斯伯勒收费公路”。

主要的道路网络从伦敦辐射开来，是皇家邮政得以到达该国其他地区的手段。这些道路上的重物运输是通过慢速，宽轮，马车拖拉的推车来进行的。较轻的货物由较小的推车或成群的马运送。

在工业革命期间，公路运输的生产率大大提高，旅行成本急剧下降。在1690年至1840年之间，长距离货物公路运输的成本效率几乎提高了两倍，旅客运输的成本效率提高了4倍。

铁道

与公路货车相比，减少摩擦是铁路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1800年后广泛引入廉价的铁粉铸铁，制造铁轨的轧机，以及大约在1800年开发了高压蒸汽机，铁路才变得实用。

在矿区运煤的车道始于17世纪，通常与运河或河流系统相关联，以进一步运煤。这些都是用马拉或依靠重力，用固定的蒸汽机将货车拖回斜坡的顶部。直到19世纪初期，马拉的公共铁路才开始兴建，当时锻铁生产的改善降低了成本。

在1800年Boulton和Watt专利到期后，引入高压蒸汽机后便开始建造蒸汽机车。高压发动机将用过的蒸汽排到大气中，从而消除了冷凝器和冷却水。对于给定的马力，它们的重量也比固定式冷凝发动机轻得多，尺寸也更小。这些早期的机车中有一些是在矿山中使用的。蒸汽运输的公共铁路交通始于1825年的斯托克顿铁路和达灵顿铁路。

罗伯特斯蒂芬森的成功机车设计和1828年高炉的发展，大大降低了炼铁的燃料消耗和高炉的能力。

1830年9月15日，世界上第一条城际铁路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铁路开通，首相惠灵顿公爵出席了开通仪式。这条铁路是由约瑟夫·洛克和乔治·史蒂芬森设计的，将迅速发展的曼彻斯特工业小镇与港口城市利物浦联系在一起。铁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可以运送乘客和货物。城际铁路的成功，特别是在原材料货运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成功，导致了铁路建设狂潮。

连接大型城市和城镇的主要铁路建设始于1830年代，但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时才获得发展。许多工人修完铁路后，他们不再回到乡村生活，而是留在城市，为工厂提供更多的工人。

其他发展

其它发展包括更有效的水轮，复杂机器产业的开端，混凝土技术的再发现，等。

=====

社会影响

工厂体系

在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劳动力都以农业为单位，以个体经营者的身份成为土地所有者或佃农，或作为无地农业工人。在世界各地，家庭纺纱，织

布和制作自己的衣服是很普遍的。家庭也为市场生产纺纱和编织品。工业革命初期，印度，中国和伊拉克地区以及亚洲和中东其他地区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棉布，而欧洲人则生产羊毛和亚麻制品。

生活水准

一些经济学家，例如小罗伯特·E·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 .）说，工业革命的真正影响是“历史上第一次，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开始持续增长... 古典经济学家几乎没有提到这种经济行为，甚至没有理论上的可能性。”

在工业革命期间，儿童的预期寿命急剧增加。在伦敦出生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的百分比从1730年至1749年的74.5%下降至1810年至1829年的31.8%。

食物和营养

直到19世纪末，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是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人口的普遍习惯。直到大约1750年，法国人的预期寿命大约是35岁，而在英国大约是40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尽管到19世纪中叶美国的预期寿命下降了几年，但当时的美国人口有足够的食物，平均更高，预期寿命为45至50岁。

在英国和荷兰，由于更好的农业做法，在工业革命之前，粮食供应有所增加；然而，正如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指出的那样，人口也在增长。这种情况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并最终开始通过交通改善来克服，例如运河，道路和轮船的改善。在工业革命快结束时引入了铁路和轮

船。

扫盲与工业化

现代工业化始于18世纪的英格兰和苏格兰，那里的农民识字率相对较高，尤其是在苏格兰。这允许招募有文化的工匠，熟练的工人，工头和管理人员来运行新兴的纺织工厂和煤矿。英国工业向高档化发展，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和熟练工人来处理技术说明并处理复杂的情况。扫盲至关重要。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在1870年告诉国会：“工业的繁荣取决于基础教育的迅速提供。没有基础教育就试图向我们的公民提供技术教学是没有用的。”

造纸机的发明以及蒸汽动力在印刷工业过程中的应用支持了报纸和小册子出版的大规模发展，这导致了读写能力的提高和大众政治参与的需求。

服装和消费品

消费者受益于服装和家用物品（例如铸铁炊具）的价格下跌，以及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用于烹饪和空间取暖的炉灶。咖啡，茶，糖，烟草和巧克力已成为欧洲许多人的负担得起的东西。手表和家用钟表成为流行的消费品。

陶艺家和企业家Wedgwood精美瓷器的创始人Josiah Wedgwood满足了消费者革命和英国中产阶级的增长的需求，创造了许多精美餐具等产品，这种餐具开始在餐桌上变得很普遍。

日益增长的消费文化也使人们开始在娱乐上花更多的钱。识字率的提高，工业化的发展以及铁路的发明，为大众提供了廉价大众文学的新市场，并使其得以大规模传播。

1861年，威尔士企业家普莱斯·普莱斯·琼斯（Pryce Pryce-Jones）创立了第一家邮购公司，这一想法将改变零售业的性质。出售威尔士绒布后，他创建了邮购目录，使客户第一次能够通过邮购进行订购。英国的任何两个地方之间的运输和交付，而不论距离如何-货物都是通过新建立的铁路系统在整个英国交付的。随着铁路网络向海外扩展，他的业务也随之扩展。

人口增长

工业革命是历史上第一个人口和人均收入同时增加的时期。

根据《致命海岸》中的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的说法，从1700年到17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一直稳定在600万，但在1740年之后急剧上升。英格兰的人口从1801年的830万增加到1850年的1680万，增加了一倍以上。1850年到1901年又几乎翻了一番，达到3050万。生活条件的改善导致英国的人口在1800年代从1000万增加到4000万。欧洲人口从1700年的大约1亿增加到1900年的4亿。

城市化

自18世纪末以来，现代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新的大城市的兴起，首先是在欧洲，然后在其他地区，因为新的机遇将大量的农村社区移民带入了城市。1800年，世界上只有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今天（21世纪初）则接近50%。

劳动组织

工业革命将劳动力集中到工厂和矿山，从而促进了联合组织或工会的组织，以帮助促进劳动者的利益。工会的力量可以通过撤回所有劳力并导致生产停顿来要求更好的条件。雇主必须在自己付出代价或屈服于生产损失的代价之间做出决定。熟练工人很难替代，这些人是通过这种讨价还价成功提高自己条件的第一批人。

工会用于改变的主要方法是罢工。对于工会双方和管理层而言，许多罢工都是痛苦的事件。在英国，《1799年合并法》禁止工人组建任何种类的工会，直到1824年废除为止。即使在此之后，工会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

1832年，《改革法案》扩大了英国的投票范围，但没有给予普选权。那年，来自多塞特郡托普德德尔的六名男子成立了农业劳动者友好协会，以抗议1830年代工资的逐步下降。他们拒绝每周工作少于十先令。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宪章运动是第一个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政治运动，其运动是争取政治平等和社会正义。它的《改革宪章》获得了超过300万个签名，但被议会拒绝，未经审议。劳动人民还建立了友好的协会和合作社，作为抵御经济困难时期的相互支持团体。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等开明的实业家也支持这些组织改善工人阶级的条件。工会慢慢克服了罢工权的法律限制。1842年，通过宪章运动组织了一次涉及棉花工人和煤矿工人的大罢工，该运动停止了整个英国的生产。最终，通过工会建立了有效的工人政治组织，工会在1867年和1885年扩大后，开始支持社会主义政党，后来这些政党合并成为英国工党。

生产重心的转移

按照制造业产出的份额来衡量，工业革命还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而空前的经济分工。

在世界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百分比：

	1750	1800	1860年	1880年	1900年
欧洲	23.2	28.1	53.2	61.3	62.0
美国	0.1	0.8	7.2	14.7	23.6
日本	3.8	3.5	2.6	2.4	2.4
世界其他地区			73.0	67.7	36.6
				20.9	11.0

英国以外的工业化

欧洲大陆

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晚于英国。它始于比利时和法国，然后在19世纪中叶传播到德国。在许多行业中，这涉及在新地方应用英国开发的技术。通常，该技术是从英国购买的，或者英国的工程师和企业家为了寻求新的机会而移居国外。到1809年，由于与英国的工业区相似，威斯特伐利亚州鲁尔河谷的一部分被称为“微型英格兰”。大多数欧洲政府为新兴产业提供了国家资助。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铁），本地资源的可用性不同，这意味着仅采用了英国技术的某些方面。

比利时

比利时是第二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欧洲大陆的第一个国家：瓦隆（比利时南部讲法语的州）处于领先地位。从182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在比利时于1830年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后，在列日（Leège）和沙勒罗瓦（Charleroi）附近的煤矿区建造了许多工程，包括炼焦高炉以及水磨和轧机。领袖是一位移民的英国人约翰·科克里尔（John Cockerill）。早在1825年，他在Seraing的工厂就集成了从工程到原材料供应的所有生产阶段。瓦隆（Wallonia）代表了工业扩张的根本演变。得益于煤炭，该地区迅速成为继英国之后的第二大工业大国。

法国

法国的工业革命遵循了特定的路线，因为它与其他国家所遵循的主要模式不符。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法国历史学家认为法国并未经历明确的起飞。相反，在18和19世纪，法国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缓慢而稳定。但是，莫里斯·莱维·莱博耶（Maurice Lévy-Leboyer）确定了一些阶段：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89–1815），

工业化（1815–1860），

经济放缓（1860年至1905年），

1905年以后恢复增长。

德国

基于其在大学和工业实验室中化学研究的领导地位，德国于1871年统一，

在19世纪后期成为全球化学工业的主导者。起初，基于苯胺的染料生产至关重要。

德国的政治不统一（拥有三个州）和广泛的地方保守主义使1830年代的铁路建设变得困难。但是，到1840年代，主干线将主要城市连接起来。每个德国州都应对其自己境内的界线负责。起初，德国人缺乏技术基础，从英国进口了他们的工程和硬件，但很快就学会了运营和扩展铁路所需的技能。在许多城市，新的铁路车间是技术意识和培训的中心，因此，到1850年，德国已经能够自给自足地满足铁路建设的需求；铁路成为新钢铁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观察家发现，甚至到1890年，他们的工程技术还不如英国的工程技术。然而，1870年德国统一促进了合并，国有化和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与法国的情况不同，其目标是支持工业化，因此重型运输线路纵横交错在鲁尔区和其他工业区，并为汉堡和不来梅的主要港口提供了良好的联系。到1880年，德国拥有9400辆机车，运送43000名乘客和30,000吨货运，并领先法国。

奥地利-匈牙利

1867年，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变成了奥地利-匈牙利。1870年人口增长到3600万，仅次于俄罗斯。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村人。从全国来看，1818年至1870年之间，人均工业增长率平均约为3%。但是，地区间存在很大差异。铁路系统始建于1850-1873年。在铁路到达之前，运输非常缓慢且昂贵。在高山和波西米亚地区，原始工业化始于1750年，并在1800年后成为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中心。纺织工业是利用机械化，蒸汽机和工厂系统的主要因素。许多机械是从英国购买的。在波西米亚地区，机器纺纱开始较晚，直到1840年才成为主要因素。1750年以后，高山地区的钢铁业得到了发展。匈牙利-君主立宪制的东半部，农村人口稠密，1870年以前工业很少。

技术变革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从1870年到191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每年增长约1.76%。与英国（1%），法国（1.06%）和德国（1.51%）等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这一增长水平非常有利。然而，与德国和英国相比，由于持续的现代化开始得很晚，整个奥匈帝国的经济仍然远远落后。

瑞典

在1790年至1815年期间，瑞典经历了两次平行的经济运动：一场农业革命，带来了更多的农业庄园，新的农作物和农具，农业商业化；以及原始工业化。在农村建立了小型企业，工人在工业与农业之间转换；夏天农业工作，冬天工业生产。这导致经济增长使大部分人口受益，并导致了1820年代开始的消费革命。在1815年至1850年之间，原始工业发展成为更加专业化和规模化的产业。这一时期见证了Bergslagen采矿业的区域专业化发展，Sjuhäradsbygden的纺织厂和Norrland的林业发展。在此期间发生了几项重要的制度变化，例如1842年开始实行免费和义务教育（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1846年废除了国家对手工艺品贸易的垄断以及1848年的股份公司法。

从1850年到1890年，瑞典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出口爆发性增长，主要是农作物，木材和钢铁。瑞典在1850年代废除了大多数关税和其他限制自由贸易的壁垒，并于1873年加入了金本位制。在此期间，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扩大的铁路网络，部分由政府提供资金，部分由

民营企业提供资金。从1890年到1930年，新兴产业以国内市场为重点发展：机械工程，电力，造纸和纺织。

日本

1870年左右，明治时代的领导人决定赶上西方，工业革命开始了。政府修建了铁路，改善了道路，并启动了一项土地改革计划，为该国的进一步发展做好了准备。它为所有年轻人开创了一种新的以西方为基础的教育系统，把数千名学生派遣到美国和欧洲，并雇用了3,000多名西方人在日本教授现代科学，数学，技术和外语。

1871年，一群名为“岩仓使团”的日本政治家前往欧洲和美国学习西方的方式。结果是有意识的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政策，以使日本能够迅速赶上。日本银行，成立于1882年，使用税收以及基金模式投资钢铁和纺织工厂。教育得到了扩展，日本学生被派往西方学习。

现代工业首先出现在纺织品上，包括棉花，尤其是丝绸，这种纺织品是基于农村地区的家庭作坊。

美国

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英国和西欧部分地区开始工业化时，美国主要是农业和自然资源的生产和加工经济体。在这个人口稀少的大国，修建公

路和运河，引进汽船和修建铁路对于处理农业和自然资源产品非常重要。

在工业革命时期，美国的重要技术贡献是轧棉机和可互换零件制造系统的开发，后者得益于美国铣床的发展。机床的发展和可互换零件系统是19世纪末美国崛起为世界领先工业国的基础。

奥利弗·埃文斯（Oliver Evans）在1780年代中期发明了一种自动化面粉厂，该面粉厂使用了控制设施和输送机，因此从将谷物装载到升降机铲斗直至面粉倒入货车之前，都不需要人工。这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物料搬运系统，是向大规模生产迈进的重要一步。

美国最初将马力机械用于谷物研磨等小规模应用，但在1790年代开始建造纺织工厂后，最终转向了水力驱动。结果，工业化集中在河流水力快速发展的新英格兰和美国东北部。事实证明，较新的水力生产线比马力生产更经济。在19世纪末，蒸汽动力制造超越了水力制造，使该行业得以传播到中西部。

托马斯·萨默斯（Thomas Somers）和卡伯特兄弟（Cabot Brothers）于1787年成立了贝弗利棉花制造厂，这是美国第一家棉纺厂，是该时代最大的棉纺厂，也是未来棉纺厂研发的重要里程碑。1793年，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 1768-1835年）在罗得岛州的波塔基特（Pawtucket）创立了斯莱特磨坊。他在英格兰德比郡（Derbyshire）作学徒时就已经了解了新的纺织技术，并于1789年前往纽约。创立Slater's Mill后，他继续拥

有13家纺织厂。丹尼尔·戴（Daniel Day）于1809年在马萨诸塞州乌克斯布里奇（Uxbridge）的黑石谷（Blackstone Valley）建立了一家梳棉厂，这是在美国成立的第三家毛纺厂（第一家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第二家在马萨诸塞州的沃特敦）。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是美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其高峰期在该山谷经营着1100多家工厂，其中包括斯莱特（Slater）的工厂，也是美国工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早起点。

来自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的商人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在1810年访问英国工厂时就了解了纺织机械的设计。他成立了波士顿制造公司。洛厄尔和他的合伙人在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建立了美国第二家棉布纺织厂，仅次于贝弗利棉花工厂。他于1817年去世后，他的同事们建立了美国第一个计划中的工厂城，他们以他的名字命名。该企业通过公开发行股票进行了资本化；它是美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

美国对工业化的主要贡献是开发了用金属制造可互换零件的技术。美国战争部开发了精密的金属加工技术，以制造用于小型枪支的可互换零件。开发工作在斯普林菲尔德军械库和哈珀斯·费里军械库的联邦军火库进行。使用机床进行精密加工的技术包括使用夹具将零件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使用夹具来引导切削工具以及使用精密的量块和量规来测量精度。另一个重要的发明是Thomas Blanchard发明的Blanchard车床。Blanchard车床或图案追踪车床实际上是一种成型机，可以生产木制枪支的复制品。使用机械和生产标准化和可互换零件的技术被称为美国生产系统。

精密的制造技术使制造机械化制鞋业的机器成为可能。钟表工业的工业化

也始于1854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市的沃尔瑟姆钟表公司开始运作，其机械，量规和装配方法的发展适应了手表所需的微精度。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5%B7%A5%E4%B8%9A%E9%9D%A9%E5%91%BD>

第二次工业革命，也称第二次科技革命，是指1870年至1914年的工业革命。其中西欧（包括英国、德国、法国、低地国家和丹麦）和美国以及1870年后的日本，工业得到飞速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紧跟着18世纪末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并且从英国向西欧和北美蔓延。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大规模应用为代表，电灯的发明为标志，用上了石油作为能源。

工厂

工厂将生产集中至单独特定的区域，并受专家指导（而并非在家进行生产）。劳动分工使得技术或非技术劳动更具生产效率，使得工业中心的人口迅速增长。钢铁厂，铁路，煤炭，纺织工厂等起着推动性作用。工业与科技的迅速发展刺激了更多产业的发展。就像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支持人口增长，且许多政府（不包括英国）利用关税来保护本国经济。这两次大范围的革命使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人阶级开始受到关注；人数众多、逐渐有专业知识的中产阶级的出现；童工人数下降以及以消费者为基础的物质文化的发展。

到了1900年，美国占全球工业生产的24%，之后是英国（19%），德国（13%），俄国（9%）以及法国（7%）。欧洲共占62%。

科技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新技术展现出更大的重要性，特别是电力，内燃发动机，新材料与物质，包括合金和化学品，以及如电报和无线电等通信技术。炼钢的关键发明，比如“贝塞麦转炉炼钢法”和“西门子平炉”，都在1871年的前十年间出现。生产钢铁变得更便宜，使得蒸汽机运输更加便宜和快捷。这次革命集中围绕着钢铁、铁路、电力和化学品的发展。

化学、电器、石油生产和钢铁行业等领域都有巨大的创新。具体的成就包括燃油蒸汽涡轮机和内燃驱动的船的出现，飞机的发展，汽车的实际商业

化，消费品的大量生产，机械制冷和其他保鲜技术以及电话的发明。

铝及合成纤维（19世纪20年代以前称作“人造丝”）花了许多年来降低它们的价格和提高其质量。这是由专业科学家的贡献才得以实现，通常体现在1914年以前个人的成就以及之后的商业研究实验室。

英国

新的产品与服务措施的出现大大激增了国家贸易。蒸汽机的改进与低廉的钢铁使得传统的船只逐渐被速度更快的蒸汽船所替代，使得能让更少的人来进行更多的贸易。化工业也进入了重要地位。

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他有关电磁旋转装置的发明成为后来电动机科技的基础。贝塞麦转炉炼钢法是第一种低廉的大规模从生铁制钢的技术。此炼钢法由其发明者亨利·贝塞麦命名，它的出现使得本需每1英吨40英镑的钢铁降到每英吨只要6~7英镑，随之大大提高了这一基础原料的生产规模与速度。此炼钢法也减少了劳工的需求。贝塞麦转炉炼钢法引入后，钢铁与熟铁的价格也不相上下，大部分生产者转而开始生产钢铁。廉价的钢铁使得大桥的建造和一些铁路，高层建筑和大型船只的建造变为可能。其他重要的钢铁产品——用平炉炼钢法——造出的钢缆，钢线材和钢板都足够大，高压锅炉和高强钢丝的生产可以满足大机械所需。大量的钢铁可以用来建造更具力量的枪支和车辆，坦克，装甲战车和海军战舰。钢铁也使建造用于水力发电和蒸汽发电巨型涡轮发动机变为可能。1884年，查理斯·帕森斯发明了蒸汽涡轮发动机，几乎完全取代了往复式发动机，这是因为其更高的热效率以及马力荷重比。因为涡轮的旋转作用，特别适

合用来驱动电力发动机，世界上80%的电力发电机是由蒸汽涡轮机驱动的。
亨利·贝塞麦的炼钢法的引入为大规模工业化铺平了道路。

更复杂和高效率的机械的发展，随着大量生产技术（1910年后）使得商品大量出口，而费用却明显降低。因此，生产出的商品往往大过需求。英国的情况最为明显，作为欧洲工业国先驱，长期受到1871~1896年间“大萧条”（Long Depression）的严重影响，使得随后的15年，受到巨大的经济动荡。几乎每个工业企业都受到长时期的冲击。1873年后，产品的利用率和价格出现紧缩。

比利时

比利时提出铁路对于加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价值的模型。在1830年以后，当比利时摆脱荷兰的统治成立新的国家时，决定开始刺激工业。它计划和资助了贯穿大城市，港口和矿区的十字路系统，并且与邻近国家相连。比利时因此成为此地区的铁路枢纽。

美国

美国的镀金时代是以重工业为基础的。1869年“第一条贯穿大陆的铁路”开通为标记，从美国东海岸到旧金山仅需6天。

在镀金时代，美国的制造业生产超过英国，成为世界领先。1880年的铁路长度跟1860年相比，增加了三倍，到了1920年又增加了三倍，在商业农业开拓了新领域，建造真正的全国市场并且使煤炭开采和钢铁生产繁盛。铁路雄厚资本促进了华尔街金融市场整合。到了1900年，经济集中发展已经

扩展到大多数称之为“托拉斯”的工厂和一些大公司，占据了全国钢铁，石油，糖，肉类加工和农业机械的制造。第一家10亿美元公司由金融家J·P·摩根于1901建立，叫做“美国钢铁公司”，其收购或合并了安德鲁·卡耐基等人的企业。

工业的机械化增加是镀金时代研究如何更廉价生产产品的重要标志。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发现工人的工作效率可以通过机械来减少操作从而得到提高。他对机械的重新设计使机器速度和工厂生产率提高，同时削弱了对于熟练劳工的需求。机械化使得非技术工人只需由技术人员简单指导下就可重复操作。无论是技术工人还是非熟练工人数量都在增加。工科院校的建立满足了对专业知识的重要需求。一个全新的中产阶级正在增长，特别是在北部城市。

美国在应用科学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1860年至1890年，500,000件发明是过去70年的10倍。乔治·威斯汀豪斯发明铁路空气制动（使其更快更安全）。威斯汀豪斯帮助尼古拉·特斯拉研发交流电的远距离传输。西奥多·韦尔建立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托马斯·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有争议），他建立了通用电气公司。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建立了标准石油公司来合并石油工厂——在汽车需求石油之前，其一直生产煤油。

在19世纪结束之际，工人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其涉及大量生产，科学管理和技能快速增长。新技术对于年轻人来说很难掌握，使得（1890年至1930年）对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工人的需求急剧下降。从而导致高中学生人数的急速扩大。

德国

在这段时期，德意志帝国与英国成为欧洲主要的工业国家。自从德国工业化后，它就模仿英国建造工厂，从而更加有效利用资金。德国比英国投入更多在科研，特别是化学，电机和电力方面。1871年阿尔萨斯-洛林被德意志帝国吞并，其中法国一些工业基地也归德意志帝国所有。

到了1900年，德意志帝国的化工业靠染料主导全球市场。当时三个大公司：巴斯夫，拜耳和赫斯特公司（Hoechst AG）和五个较小的企业生产出了上百种染料。在1913年，这八间公司几乎提供全球90%的染料供应，其80%主要销往国外。这三家大公司还集成生产基本原料并且往化学其他领域扩展市场，比如医药，农业化学和电化学。其高层由受薪专业经理人作管理。德国染料公司被称为世界第一间专业管理的工业企业。当时的研究还有许多分支，比如从化学研究引伸出的制药业。

著名人物

安德鲁·卡耐基，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与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都是镀金时代的最有实力的几个企业家。卡耐基出生在一个贫困的苏格兰家庭里，青少年时期的他去了匹兹堡。在1870年，卡耐基建造了自己的第一个高炉，并在1890年主导了快速增长的钢铁工业。他宣扬“财富的福音”，说富人有道义责任去从事大规模的慈善事业。卡耐基放弃了自己的财富，建造了许多像“卡耐基科技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现在属于卡内基梅隆大学）等研究机构，将工匠训练成有素质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卡耐基建造了上百个公共图书馆和一些主要的研究中心与基础设施。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成为美国垄断企业，之后于1897年退出石油行业，并在其后40年里通过系统性的慈善捐款方式捐出了自己的资产，特别是在加强教育，医疗和民族关系方面。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起初还是个穷困农家男孩，但通过自己的才智和独到的商业见解，在航运与铁路建设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成为当时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他也大力从事教育等方面的慈善事业。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cond_Industrial_Revolution

第二次工业革命，也被称为技术革命，是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迅速的

标准化和产业化的一个阶段。在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第一次工业革命由于重要发明的放缓而中断。第二次工业革命通常可追溯到1870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许多事件可以追溯到制造业的早期创新，例如机床行业，用于开发可互换的部件的制造方法，和贝塞默尔（Bessemer）发明的生产钢铁的过程。

随着生产和技术的进步，电报和铁路网络，煤气和水供应以及污水处理系统等技术系统得到了广泛采用；这些系统早先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1870年后，铁路和电报线路的巨大扩张，促成了人员和思想的空前流动，最终导致了新一波的全球化。在同一时期，引入了新的技术系统，最重要的是电力和电话。第二次工业革命延续到20世纪（包括工厂早期电气化和生产线的推广），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结束。

概述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主要在英国，德国和美国，但在法国，低地国家，意大利和日本也是如此。在此之前是18世纪末在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然后在整个西欧蔓延。第一次革命是由蒸汽机，可互换零件和批量生产技术的有限使用等等而推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特征包括，水力驱动（尤其是在美国），大规模铁路建设，大规模钢铁生产，机械在制造业中的广泛使用，蒸汽动力的使用大大增加，电报，石油和电气化。在那个时期，开始使用现代组织方法在广阔的地区经营大型企业。

Landes强调了新技术的重要性，特别是内燃机，石油，新材料和新材料，

包括合金和化学制品，电力和通讯技术（例如电报，电话和无线电）。

瓦茨拉夫·史米尔（Vaclav Smil）将1867年至1914年称为“协同时代”，在此期间，由于发明和创新是基于工程和科学的，因此大多数伟大的创新都得到了发展。

工业和技术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钢铁，铁路和煤炭之间就产生了协同作用。铁路导致廉价的材料和产品运输，从而发过来导致廉价的铁路建设以及更多的道路。铁路的蒸汽机车也从廉价煤炭中受益。这种协同作用导致1880年代在美国铺设了75,000英里的道路，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最大的。

铁

热风是高炉燃料效率方面最重要的一项进步，因为它大大降低了生铁的燃料消耗，并且是工业革命期间开发的最重要的技术之一。生产锻铁的成本下降与1830年代铁路的兴起相吻合。

热风的早期技术是将铁用作再生加热介质。铁引起膨胀和收缩的问题，从而使铁受力并导致故障。爱德华·阿尔弗雷德·考珀（Edward Alfred Cowper）于1857年开发了考珀火炉。该火炉使用耐火砖作为存储介质，解决了膨胀和破裂的问题。Cowper炉还能够产生高热量，从而导致高炉的通量很高。Cowper炉在当今的高炉中仍在使用。

随着使用热风法用焦炭生产生铁的成本大大降低，需求急剧增长，高炉的规模也急剧增加。

钢铁

贝塞麦冶炼法的发明导致大规模生产的钢材，提高了生产这一关键材料的规模和速度，并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关键原理是通过吹过铁水的空气进行氧化，从生铁中去除多余的碳和其他杂质。氧化还会提高铁块的温度并使铁块保持熔融状态。

“酸性”贝塞麦工艺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因为它需要磷含量相对较低的赤铁矿。西德尼·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开发出更复杂的过程，以得到消除磷的铁。

炼钢的下一个重大进步是西门子-马丁工艺。查尔斯·威廉·西门子爵士在1850年代开发了蓄热炉，为此他在1857年声称能够回收足够的热量以节省70-80%的燃料。

法国工程师Pierre-ÉmileMartin于1865年率先获得了西门子炉的许可证，并将其应用于钢铁生产。西门子-马丁工艺是对贝塞麦工艺的补充而非替代。它的主要优点是它不会使钢暴露于过量的氮气中（这会使钢变脆），易于控制，并且可以熔化和精炼大量废钢，从而降低了钢的生产成本并回收原本麻烦的废料。到20世纪初，它已成为领先的炼钢工艺。

廉价钢材的可用性导致可以建造更大的桥梁，铁路，摩天大楼和轮船。其他重要的钢铁产品（也使用平炉工艺）是钢缆，钢棒和薄钢板，它们使大型高压锅炉成为可能，而高抗拉强度的钢则使机械，发动机和齿轮的功率大大提高。车轴比以前可能的要大。利用大量的钢铁，就可以制造出更强大的枪支和战车，坦克，装甲战车和海军舰船。

铁路

从1860年代开始，钢铁产量的增加意味着铁路最终可以用有竞争力的成本由钢铁制成。作为一种更加耐用的材料，钢稳步取代了铁，成为铁路的标准材料，并且由于其更高的强度，现在可以轧制更长的轨道。

Mushet的第一根钢轨被送到了德比·米德兰（Derby Midland）火车站。六年后的1863年，尽管每天有700多列火车经过，但铁路似乎仍然像过去一样完美。这为十九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内加快铁路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第一个商用的钢轨在1867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坎布里亚铁厂被制造。

钢轨的使用寿命是铁的十倍以上，并且随着钢价的下降，可以使用重量更重的钢轨。这导致可以使用功率更大的机车，从而可以拉长火车和长铁轨车，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铁路的效率。铁路成为整个工业化世界中运输

基础设施的主要形式，使得本世纪余下时间的运输成本稳步下降。

电气化

科学家和实验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奠定了利用电力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通过对载有直流电的导体周围的磁场的研究，法拉第为物理学中的电磁场概念奠定了基础。他的电磁旋转设备的发明是技术中实际使用电的基础。

1881年，第一个可行的白炽灯泡的发明者约瑟夫·斯旺爵士向伦敦威斯敏斯特市的萨沃伊剧院提供了约1200盏白天鹅灯，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用电点燃的剧院和公共建筑。白炽灯泡已于1879年用于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莫斯利街上照明，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电气街道照明装置。这为工业和家庭电气化奠定了基础。1882年，第一家大型中央配送供应厂在伦敦的霍尔本高架桥开业；后来在纽约市珍珠街电站也开业了。

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电站是由英国电气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德费兰蒂（Sebastian de Ferranti）在德普特福德（Deptford）建造的。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建造，并开创了使用高压（10,000V）交流电的先河，产生了800千瓦的电能，并为伦敦市中心供电。1891年竣工后，它提供了高压交流电，然后随变压器“降压”，供各条街道上的消费者使用。电气化使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制造方法（即装配线和批量生产）有了最后的重大发展。

电气化被美国国家工程院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工程成就”。工厂的电气照明极大地改善了工作条件，消除了由气体照明引起的热量和污染，并减少了火灾隐患，以至于照明用电的成本通常被降低的消防保险费所抵消。弗兰克·J·斯普拉格（Frank J. Sprague）于1886年开发出第一台成功的直流电动机。到1889年，110条街道电气铁路正在使用其设备或进行规划。直到1920年代，家庭电气化才开始普及。荧光灯在1939年的世界博览会上进行了商业推广。

电气化还导致可以廉价生产电化工产品，例如铝，氯，氢氧化钠和镁。

机床

机床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机械化的增长需要更多的金属零件，这些零件通常由铸铁或锻铁制成，而且手工加工精度不高，加工过程缓慢且昂贵。最早的机床之一是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的镗床；该镗床在1774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第一台蒸汽机上打了一个精确的孔。机床精度的进步可以追溯到亨利·莫兹莱（Henry Maudslay）的发明，并由约瑟夫·惠特沃思（Joseph Whitworth）加以完善。螺纹的标准化大约在1800年始于Henry Maudslay的发明。

1841年，约瑟夫·惠特沃思（Joseph Whitworth）创造了一种设计，该设计通过许多英国铁路公司的采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机床标准，称为英国惠特沃思标准（British Standard Whitworth）。在1840年代至1860年代，除无数公司内部和公司间标准外，该标准还经常在美国和加拿大使用。

福特T型汽车的生产使用了32,000台机床，其中大部分由电力驱动，这一事实表明了机床对大规模生产的重要性。亨利·福特说，没有电力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生产，因为它允许按工作流程的顺序设置机床和其他设备。

造纸

第一台造纸机是Fourdrinier机，由伦敦的文具商Sealy和Henry Fourdrinier制造。1800年，在伦敦工作的马蒂亚斯·库普斯（Matthias Koops）研究了用木材造纸的想法，并于一年后开始从事印刷业务。但是，由于当时的成本过高，他的企业未能成功。

19世纪40年代，查尔斯·费纳蒂和弗里德里希戈特洛布凯勒发明了从木材提取纤维的新方法，并成功地制造了相应的机器。这开始了一个新的造纸时代。在同一时期，钢笔、铅笔的发明，以及旋转式印刷机的发明，在工业化国家引起了19世纪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随着廉价纸张的引入，到1900年，逐渐出现了教科书，小说，大众书刊和报纸。廉价的木质纸张还使得写日记或写信成为普遍的行为，因此，到1850年，文秘、书记员不再是高地位的工作。到1880年代，用于造纸的化学工艺开始使用，到1900年成为主流。

石油

1848年在苏格兰第一次开始是由生产和提炼。化学家詹姆斯·杨（James Young）于1848年成立了一家精炼原油的小公司。杨发现，通过缓慢蒸馏，他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用的液体，他将其中一种称为“石蜡油”，因为在低温下，它们会凝结成类似于石蜡的物质。1850年，杨在巴斯盖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商业炼油厂，利用从当地开采的页岩和烟煤中提取的石油生产石脑油和润滑油；直到1856年才出售用于燃料的石蜡油和固体石蜡。

尽管在19世纪中叶为钻探石油做出了许多努力，但埃德温·德雷克（Edwin Drake）185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蒂图斯维尔附近的油井却被认为是第一座“现代油井”。德雷克的油井引发了美国石油生产的繁荣。第一个主要产品是用于灯和加热器的煤油。巴库周围的类似发展推动了欧洲市场的发展。

化工

合成染料由英国化学家威廉·亨利·珀金（William Henry Perkin）于1856年发现。确定化合物中元素的排列仍然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而化学工业仍处于起步阶段。珀金的偶然发现是，苯胺可以部分转化为粗混合物，当用酒精提取时，会生成深紫色的物质。他扩大了新的“mauveine”的生产规模，并将其商业化为世界上第一种合成染料。

发现紫红色之后，出现了许多新的苯胺染料（其中一些是珀金本人发现的），并且在欧洲各地兴建了生产苯胺染料的工厂。到本世纪末，珀金

（Perkin）和其他英国公司的研发工作越来越被德国化学工业所超越；德国化学工业到1914年已成为世界主导。

航海技术

这个时代见证了现代船舶的诞生，因为不同的技术进步齐头并进。

弗朗西斯·佩蒂特·史密斯在1835年推出了螺旋推进器。第一艘海上铁汽船由霍尔里铁厂建造，命名为亚伦曼比。它还使用了创新的振动发动机作为动力。随后进行了其他技术革新，包括发明了冷凝器，该冷凝器使锅炉能够使用纯净水而不是盐水运行，从而无需在长途航行中停下来对其进行清洁。由工程师Isambard Kingdom Brunel建造的Great Western 是世界上最长的船，并且是最早证明跨大西洋轮船服务是可行的。该船主要是用木头建造的，但布鲁内尔增加了螺栓和对角铁加强件，以保持龙骨的强度。除了其蒸汽驱动的明轮，船上载着四根帆柱。

第一艘由金属而非木材建造的现代船于1843年下水，由发动机而非风或桨驱动，使用螺旋桨而非桨轮。布鲁内尔（Brunel）的远见和工程创新使建造大型、螺旋桨驱动的全金属轮船成为现实。

高效多膨胀蒸汽机开始在船上使用。摆动式发动机最初由亚伦·曼比（Aaron Manby）和约瑟夫·莫兹莱（Joseph Maudslay）于1820年代建

造，旨在进一步减小发动机的尺寸和重量。摆动式发动机的活塞杆直接连接到曲轴，无需连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发动机汽缸不是像大多数发动机那样固定不动，而是通过耳轴固定在中间，该耳轴使汽缸本身随着曲轴旋转而来回枢转，因此称为摆动式。

皇家海军的工程师约翰·潘恩（John Penn）完善了摆动引擎。1844年，他在不增加重量或占用空间的情况下，用双倍动力的摆动式发动机替换了海军游艇HMS Black Eagle的发动机，这一成就打破了Boulton&Watt和Maudslay, Son&Field在海军供应方面的主导地位。佩恩还引入了用于在战舰上驱动螺旋桨的箱式发动机。HMS Encounter（1846）和HMS Arrogant（1848年）是第一批装有这种发动机的船；直到1878年佩恩去世时，这些发动机已被安装在230艘船上，并且是第一批大规模生产的高压和高功率发动机。

海军设计的革命导致了1870年代的第一艘现代战舰诞生，它是从1860年代的铁板设计演变而来的。其整个主武器首次安装在船体的顶部，而不是在它里面。

橡胶

约翰·博伊德·邓洛普（John Boyd Dunlop）于1887年在南贝尔法斯特开发了第一款实用的充气轮胎。威利·休姆（Willie Hume）在1889年展示了邓洛普（Dunlop）新发明的充气轮胎的高效性。邓洛普对充气轮胎的开发技术正值公路运输发展的关键时刻；其商业化生产始于1890年后期。

自行车

现代自行车是由英国工程师哈里·约翰·劳森（Harry John Lawson）在1876年设计的，尽管几年后，约翰·肯普·史塔利（John Kemp Starley）才生产了第一款商业上成功的安全自行车。它的受欢迎程度很快增长，引起了1890年代的自行车热潮。

在此期间，公路网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采用了苏格兰工程师约翰·劳登·麦克亚当（John Loudon McAdam）倡导的Macadam方法，并且在1890年代自行车热潮前后修建了坚硬的路面。

汽车

德国发明家卡尔·奔驰（Karl Benz）在1886年为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申请了专利。它的特点是线轮（不同于马车的木制车轮），后轮之间带有他自己设计的四冲程发动机，线圈点火非常先进。动力通过两个滚子链传递到后桥。奔驰于1888年夏末开始销售该车辆（广告称其为“奔驰专利汽车”），使其成为历史上第一款商用汽车。

亨利·福特（Henry Ford）于1896年制造了他的第一辆汽车，并成为该行业的先驱，直到1903年福特汽车公司成立。福特和公司中的其他人都在努力寻找方法扩大生产规模，以符合亨利·福特（Henry Ford）对按比例设

计和制造的汽车的愿景，从而使普通人负担得起购买汽车。福特汽车公司开发的解决方案是完全重新设计的工厂，其中机床和专用机器按工作顺序进行了系统定位。通过将所有工作工具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并在输送机上可行的地方形成装配线，消除了所有不必要的人为运动。这个完整的过程称为批量生产线。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每年生产数十万个大型复杂产品，其中包含5000个零件。大量生产方法的节省使T型车的价格从1910年的780美元下降到1916年的360美元。1924年，生产了200万辆T-福特汽车，每辆零售290美元。

应用科学

应用科学创造了许多机会。到19世纪中叶，人们对化学有了科学的了解，对热力学有了基本的了解，到本世纪后半叶，这两种科学都接近了当今的基本形式。热力学原理被用于物理化学的发展。对化学的了解极大地帮助了基础无机化学生产和苯胺染料工业的发展。

亨利·克里夫顿·索比和其他人促进了冶金科学。索比首创的在显微镜下研究铁和钢的方法，导致了对于金属的科学理解，铺平了大规模生产钢的道路。1863年，他使用酸蚀刻技术研究了金属的微观结构，并且是第一个了解少量但精确的碳使钢具有强度的人。这为亨利·贝塞默（Henry Bessemer）和罗伯特·弗雷斯特·穆斯特（Robert Forester Mushet）开发大规模生产钢的方法铺平了道路。

在此期间还涌现出了其他工艺来纯化各种元素，例如铬，钼，钛，钒和镍，这些元素可用于制造具有特殊性能合金，尤其是钢。例如，钒钢强度高且抗疲劳，并且已用在一半的汽车钢中。合金钢用于球轴承，该球轴承在1880年代用于大规模的自行车生产中。球轴承和滚子轴承也开始在机械中使用。其他重要的合金也用于高温技术，例如蒸汽轮机叶片和耐腐蚀的不锈钢。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和奥古斯特·威廉·冯·霍夫曼的工作奠定了现代工业化学的基础。Liebig因发现氮作为一种植物必需营养素而被认为是“肥料工业之父”。霍夫曼（Hofmann）以皇家化学学院（Royal College of Chemistry）的名义领导伦敦的一所实用化学学校，引入了分子建模的现代范式，并教给珀金（Perkin）发现了第一种合成染料。

Sadi Carnot, William Rankine, Rudolf Clausius, William Thomson, James Clerk Maxwell, Ludwig Boltzmann和J. Willard Gibbs将热力学科学发展为现代形式。这些科学原理已应用于各种工业问题，包括提高锅炉和蒸汽轮机的效率。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和其他人的工作对于奠定现代关于电力的科学理解的基础至关重要。

苏格兰科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特别有影响力-他的发现开启了现代物理学的时代。他最杰出的成就是制定了一系列方程，将电，磁和光学描述为同一现象（即电磁场）的表现形式。光和电现象的统一导致对无线电波的存在预测，并且是休斯·马可尼（Hughes, Marconi）无线电技术未来发展的基础。

麦克斯韦本人于1861年发明了第一张耐久的彩色照片，并出版了第一个关于控制理论的科学方法的书籍。控制理论是过程控制的基础，过程控制广泛用于自动化领域，尤其是过程工业以及控制船舶和飞机。控制理论得以发展，以分析离心式调速器在蒸汽机上的功能。这些调速器于18世纪后期在风水磨和水磨中投入使用，以正确定位磨石之间的间隙，并由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改装成蒸汽机。改进版本用于稳定望远镜的自动跟踪机制并控制船舶螺旋桨和舵的速度。詹姆斯·克莱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撰写了一篇论文，对数学上的稳态行动进行了分析，这标志着控制理论正式发展的开始。控制科学不断进步，并发展成为一门工程学科。

肥料

Justus von Liebig率先了解氨作为肥料的重要性，并推广了无机矿物质对植物营养的重要性。在英格兰，他试图通过用硫酸处理骨粉中的石灰磷酸盐生成的肥料来商业化实施他的理论。另一位先驱者是约翰·本内特·劳斯（John Bennet Lawes），他于1837年开始尝试研究各种肥料对盆栽植物的影响，最终产生了一种用硫酸处理磷酸盐的肥料。这是新生的人工肥料行业的第一个产品。

发动机和涡轮

蒸汽涡轮机由查尔斯帕森斯爵士于1884年开发。他的第一个模型连接到一个发电机生成的电力为7.5千瓦（10马力）。帕森（Parson）的蒸汽轮机的发明使廉价而丰富的电力成为可能，并彻底改变了海上运输和海战。到帕

森（Parson）逝世时，他的涡轮已经为所有主要的世界电站所采用。与早期的蒸汽机不同，涡轮机产生的是旋转动力，而不是需要曲柄和重型飞轮的往复动力。涡轮机的级数众多，可实现高效率并将尺寸减小90%。该涡轮机的第一个应用是在运输行业，随后在1903年用于发电。

第一台被广泛使用的内燃机是1876年的奥托（Otto）型。从1880年代到电气化时代，它在小型设备中很成功，因为小型蒸汽机效率低下，且需要操作员过多注意。奥托发动机很快开始用于为汽车提供动力，并且仍然是当今的普通汽油发动机。

狄塞尔和赫伯特·阿克伊德·斯图尔特在19世纪90年代使用热力学原理设计了高效柴油发动机。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高效的原动力机械。

电信

在整个世纪中，电报网络都在迅速扩展，约翰·沃特金斯·布雷特（John Watkins Brett）在法国和英国之间建造了第一条海底电缆。大西洋电报公司成立于伦敦，在1856年进行跨大西洋商业电报电缆的建设。1866年7月18日，该项工程由詹姆斯·安德森爵士（James Anderson）率领的SS大东方号（SS Great Eastern）轮船成功完工，途中发生许多不幸事故。从1850年代到1911年，英国海底电缆系统主导了世界体系。

电话于1876年由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申请专利，与早期的电报机一样，它主要用于加快业务交易。

如上所述，整个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进步之一就是通过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将光，电和磁统一起来。对电力的科学理解对于开发高效的发电机，电动机和变压器是必要的。戴维·爱德华·休斯和海因里希·赫兹都证实了麦克斯韦预言的电磁波现象。

意大利发明家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在世纪之交成功地将收音机商业化。他于1897年在英国成立了无线电报和信号公司，并于同年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传输摩尔斯电码，在公海进行了首次无线通信，并进行了第一次跨大西洋交流。马可尼（Marconi）在大西洋两岸建造了大功率电台，并于1904年开始提供商业服务。

约翰·安布罗斯·弗莱明爵士（John Ambrose Fleming）在1904年对真空管进行了重要开发，为现代电子和无线电广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Lee De Forest随后发明的三极管可以放大电子信号，这为1920年代的无线电广播铺平了道路。

现代企业管理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等学者称赞铁路导致了现代商业企业。与以前相比，铁路涉及复杂的运营，并且动用了大量的资本，经营的业务也更为复杂。因此，他们需要更好的方法来跟踪成本。例如，要计

算费率，他们需要知道一吨英里的货运成本；还需要跟踪机车。这导致了所谓的“铁路会计”，后来被钢铁和其他行业所采用，并最终成为现代会计行业。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期，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和其他美国人提出了科学管理或泰勒主义的概念。科学管理最初集中于通过使用诸如时间和运动研究之类的分析来减少执行工作（例如砌砖或铲土）的步骤，但是这些概念逐渐演变为工业工程，制造工程和业务管理等领域，完全重组工厂的运作，以及后来的整个经济领域。

泰勒的核心原则包括：

用基于对任务的科学研究的方法来代替经验法则的工作方法

科学地选择，培训和发展每位员工，而不是被动地让他们自己训练

提供“对每个工人在执行其离散任务中的详细指导和监督”

在经理和工人之间几乎平等地划分工作，以便经理运用科学管理原则来计划工作，而工人实际执行任务

社会经济影响

从1870年到1890年，经济增长是以往历史上最短的时期。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商品价格急剧下降，因此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这导致了失业和工商业的大动荡，许多劳动力被机器取代，许多工厂，轮船和其他形式的固定资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淘汰了。

作物歉收不再导致通过运输基础设施与大型市场相连的地区的饥饿。

公共卫生举措带来了公共卫生和卫生设施的大幅度改善，例如1860年代伦敦污水处理系统的建设以及规范过滤水供应的法律的通过。这大大降低了许多疾病的感染率和死亡率。

到1870年，蒸汽机完成的工作已超过了动物和人力完成的工作。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即将结束之前，内燃拖拉机的发展之前，马和骡子在农业中仍然很重要。

蒸汽机效率的提高使船舶运载的货物比煤炭多得多，从而大大增加了国际贸易量。更高的蒸汽机效率导致蒸汽机数量增加了几倍，导致煤炭使用量增加，这种现象被称为“杰文斯悖论”。

到1890年，已经有了一个国际电报网络，允许英国或美国的商人向印度和中国的供应商下订单，以便将货物用高效的新轮船运输。加上苏伊士运河的开放，导致伦敦和其他地区的大型仓储区的衰落，并消除了许多中间商。

生产力，运输网络，工业生产和农业产出的巨大增长降低了几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这导致了许多企业倒闭时期，被称为萧条，它随着世界经济的实际增长而发生。

工厂系统将生产集中在由专家资助和指导的独立建筑物中（而不是在家工作）。分工提高了非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的生产率，并导致了工业中心人口的快速增长。在1730年代，英国发生了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当时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比例下降到50%以下，这种发展只会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在其他地方（低地国家）发生。到189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不足10%，绝大多数英国人口已城市化。低地国家和美国在1950年代达到了这个里程碑。

像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第二次工业革命支持人口增长，并看到大多数政府通过关税保护其国民经济。在此期间，英国一直保持着对自由贸易的信念。两次革命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包括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而对工人阶级的改造。这些变化导致了更大，越来越专业的中产阶级的建立，童工的减少以及以消费者为基础的物质文化的急剧增长。

到1900年，工业生产的领导者是英国，占世界总量的24%，其次是美国（19%），德国（13%），俄罗斯（9%）和法国（7%）。欧洲合计占62%。[93]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伟大发明和创新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一部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一直是经济的驱动力。重大创新发生在战后时代，其中包括：计算机，半导体，光纤网络和Internet，蜂窝电话，燃气轮机（喷气发动机）和绿色革命。民航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存在，更在战后成为主要产业。

英国

引入了新产品和新服务，大大增加了国际贸易。蒸汽机设计的改进和廉价钢材的广泛普及，意味着较慢的帆船被更快的轮船所取代。

随着更复杂，更高效的机器的发展以及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1910年以后），大大提高了产量并降低了生产成本。结果，产量经常超过国内需求。在新的情况中，欧洲工业国家的先驱英国更明显地体现了1873年至1896年严重的长期萧条的影响，此后15年经济一直处于严重的不稳定状态。1873年以后，几乎每个行业的企业都遭受了长期的低利润率和价格下跌的困扰。

美国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后二十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最高。然而，人口增长放缓，而生产力增长在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美国的镀金时代以工厂，铁路和煤矿等重工业为基础。标志性事件是1869年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开通。

在镀金时代，美国的铁路里程在1860年至1880年之间增加了两倍，到1920年再次增加了两倍，为商业农业开辟了新领域，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全国市场，并激发了煤炭开采和钢铁生产的繁荣。大型干线铁路对资本的旺盛需求促进了华尔街国家金融市场的巩固。到1900年，经济集中的过程已扩展到大多数行业分支机构中——一些大型公司，其中一些组织为“信托”（例

如，标准石油），主要集中在钢铁，石油，糖，肉类包装和农业机械制造中。第一家市值达十亿美元的公司是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由金融業者JP 摩根（JP Morgan）于1901年成立，后者收购并合并了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等人建立的钢铁公司。

工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工人效率的提高，提高了工厂的生产率，同时减少了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分批和连续处理等机械创新在工厂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机械化使一些工厂变成了：一群不熟练的工人，在熟练的工头和工程师的指导下执行简单而重复的任务。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机械化的发展完全替代了低技能工人。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非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的数量都增加了。大学成立工程学院是为了满足对专业知识的巨大需求。伴随着小型企业的快速发展，新的中产阶级也在迅速增长，特别是在北部城市。

德国

在此期间，德意志帝国成为英国的对手，成为欧洲的主要工业国。由于德国后来进行了工业化，因此能够模仿英国的工厂进行建模，从而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本，并避免了传统方法向技术的飞跃。德国在科研方面的投入比英国大得多，尤其是在化学，电机和电力方面。高度集中的“德国关注系统（称为Konzerne）”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本。继1871年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之后，它吸收了法国工业基础的一部分。

到1900年，德国化学工业主导了合成染料的世界市场。巴斯夫（BASF），拜耳（Bayer）和赫斯特（Hoechst）这三大公司与五家较小的公司一起生

产了数百种不同的染料。在1913年，这八家公司生产了近90%的世界染料供应，并将其生产的约80%销往国外。这三大公司已将上游整合到基本原材料的生产中，并开始扩展到其他化学领域，例如制药，照相胶片，农用化学品和电化学领域。最高级别的决策掌握在专业的受薪经理手中，这使钱德勒将德国染料公司称为“世界上第一家真正的管理工业企业”。有很多从科研中衍生出来的东西，例如制药业，是从化学研究中衍生出来的。

比利时

比利时在Belle Époque时代展示了铁路在加速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价值。1830年后，当比利时脱离荷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它决定刺激工业。它计划并资助了一个简单的十字形系统，该系统将主要城市，港口和矿区连接起来，并与邻国相连。比利时因此成为该地区的铁路中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Revolution

数字革命（又称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于20世纪后半叶，由模拟电子技术以及数字电子技术的发展，直至计算机的发展，持续到今天。该术语还指在此期间由数字计算和通信技术带来的全面变化。数字革命标志着信息时代的开始。

这场革命的中心是大规模生产和广泛使用数字逻辑器件，MOSFET（MOS晶体管），集成电路（IC）芯片及其派生技术，包括计算机，微处理器，数字蜂窝电话和Internet。这些技术创新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商业技术。

简要历史

贝尔实验室的数学家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在其1948年的开创性文章《通信的数学理论》中奠定了数字化的基础，因而受到赞誉。数字革命将技术从模拟格式转换为数字格式。通过这样做，可以制作与原件相同的副本。例如，在数字通信中，中继硬件能够放大数字信号并将其传递，而不会丢失信号中的信息。这场革命同样重要的是能够轻松地在媒体之间移动数字信息，以及远程访问或分发数字信息的能力。

革命的转折点是从模拟音乐到数字录制音乐的转变。在1980年代期间光的数字格式光盘逐渐取代模拟的格式，例如乙烯基记录和录音带，作为选择的流行平台。

1947–1969年：起源

1947年，第一个晶体管在贝尔实验室被发明。这导致了更高级的数字计算机的发展。从1940年代后期开始，大学，军队和企业开发了计算机系统，以数字方式复制和自动化以前手动执行的数学计算。LEO是第一台商用通用计算机。

其他重要的技术发展包括1959年由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在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发明的单片集成电路芯片。这是第一个成功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继开发MOS集成电路后，在60年代初的MOS芯片达到更高的晶体管密度和更低的制造成本。在1960年代后期在单个MOS芯片上具有数百个晶体管。MOS LSI芯片在计算中的应用是第一个微处理器的基础，因为工程师开始认识到完整的计算机处理器可以包含在单个MOS LSI芯片中。1968年，飞兆半导体的工程师Federico Faggin开发了硅栅MOS芯片，从而改进了MOS技术，后来他将其用于开发第一个单芯片微处理器Intel 4004。它由英特尔于1971年发布，为1970年代开始的微计算机革命奠定了基础。

MOS技术还导致了适用于数码相机的半导体图像传感器的发展。第一个这样做的图像传感器是电荷耦合器件，该器件是由Bellards的Willard S. Boyle和George E. Smith在1969年基于MOS电容器技术开发的。

1969–1989：互联网的发明，家用计算机的兴起

1969年，当通过ARPANET发送消息时，第一次向公众引入了导致Internet的概念。1960年代末期开发了分组交换网络，例如ARPANET，Mark I，CYCLADES，Merit Network，Tymnet和Telenet。特别是ARPANET导致了互联网协议的发展；在该协议中，多个单独的网络可以合并为一个网络。

1960年代的“整个地球”运动提倡使用新技术。

在70年代，家用电脑推出时，也出现了分时计算机，视频游戏控制台，第一投币式游戏机，街机视频游戏。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从模拟记录向数字记录的转换成为业务的新标准，一种相对较新的工作被普及，即数据录入员。数据录入员从几十年前的秘书和打字员中脱颖而出，其工作是将模拟数据（客户记录，发票等）转换为数字数据。

在发达国家，计算机在1980年代进入学校，家庭，企业和工业界时已普及到半数。自动柜员机，工业机器人，电影和电视中的CGI，电子音乐，公告板系统以及视频游戏都推动了1980年代的时代精神。数以百万计的人购买了家用计算机，从而使早期的个人计算机制造商（如Apple，Commodore和Tandy）家喻户晓。时至今日，Commodore 64通常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计算机，在1982年至1994年之间共售出了1700万台。

1984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开始在美国收集有关计算机和Internet使用的数据。他们的第一项调查显示，1984年，美国所有家庭中有8.2%拥有个人计算机。到1989年，美国所有家庭中有15%拥有一台计算机，而有18岁以下儿童的家庭中有近30%拥有一台计算机。到1980年代后期，许多企业都依赖计算机和数字技术。

摩托罗拉于1983年推出了第一款手机，即Motorola DynaTac。但是，该设备使用了模拟通信功能-直到1991年2G网络在芬兰开始开放时，数字手机才开始在商业上出售，以适应市场对手机的意外巨大需求。

第一台真正的数码相机创建于1988年，第一台真正的数码相机于1989年12月在日本和1990年在美国上市。到2000年代中期，他们已经使传统胶片的知名度黯然失色。

1989-2005：万维网的发明，互联网的主流，Web 1.0

万维网在1991年开始可以公开访问，其中只有政府和大学可用。1993年，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和埃里克·比纳（Eric Bina）推出了Mosaic，这是第一个能够显示嵌入式图像的Web浏览器，并且是后来的浏览器（例如Netscape Navigator和Internet Explorer）的基础。

斯坦福联邦信用合作社于1994年10月成为第一家为其所有成员提供在线互联网银行服务的金融机构。1996年，OP金融集团（OP Financial Group）也是一家合作银行，成为全球第二家和欧洲第一家在线银行。

互联网迅速扩大，到1999年，几乎每个国家都建立了连接，几乎有一半的美国人和其他几个国家的人们定期使用互联网。然而，在整个1990年代，“上线”需要复杂的配置，而拨号上网是个人用户唯一可以负担的连接类型。

在2000年代初期，手机已像计算机一样普及，电影院开始放映广告，告诉人们让手机保持静音。它们也比1990年代的电话先进得多，1990年代的电话大多只接听电话或最多只允许玩简单的游戏。

短信在1990年代就存在，但直到2000年代初才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直到现在才得到广泛使用。

在这一时期，数字革命也真正成为了全球性的革命。在1990年代发达国家对社会进行了革命之后，数字革命在2000年代席卷了发展中国家。

到2000年，大多数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台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在2002年，大多数美国受访者表示拥有手机。

2005年至今：Web 2.0，社交媒体，智能手机

在2005年底，互联网人口达到10亿。2007年9月，大多数美国受访者表示在家中拥有宽带互联网。

到2012年，超过20亿人使用互联网，是2007年使用互联网的人数的两倍。到2010年代初，云计算已成为主流。2013年1月，大多数美国受访者表示拥有智能手机。到2016年，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已经联网，而到2020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67%。

1980年至2020年，计算机对数字技术的使用不断上升

模数转换1986-2014

在1980年代后期，世界上不到1%的技术存储信息是数字格式的，而在2007年则是94%，到2014年则超过了99%。

1990

手机用户：1,250万（1990年占世界人口的0.25%）

互联网用户：280万（1990年占世界人口的0.05%）

2000

手机用户：15亿（2002年占世界人口的19%）

互联网用户：6.31亿（2002年占世界人口的11%）

2010

手机用户：40亿（2010年占世界人口的68%）

互联网用户：18亿（2010年占世界人口的26.6%）

2020年

手机用户：47.8亿（2020年占世界人口的62%）

互联网用户：45.4亿（2020年占世界人口的59%）

技术基础

数字革命的基本组成部分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或MOS晶体管），这是有史以来制造最广泛的器件。它是商业用途中每个微处理器，存储芯片和电信电路的基础。MOSFET的定标（MOS晶体管的快速小型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摩尔定律的实现，该定律预测晶体管的数量将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

随着数字个人计算机的发展，MOS微处理器和存储芯片，其性能和存储量不断提高，已使计算机技术能够嵌入到从照相机到个人音乐播放器的各种物体中。同样重要的是传输技术的发展，包括计算机网络，互联网和数字广播。3G手机在2000年代，其社交普及率呈指数级增长，在数字革命中，它们同时提供了无处不在的娱乐，通讯和在线连接，因此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担忧

尽管数字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特别是在信息的可访问性方面，但仍存在许多问题。扩大的通信和信息共享能力，对现有技术的增强功能以及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许多潜在的开发机会。数字革命帮助迎来了大规模监视的新时代，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公民权利和人权问题。数据的可靠性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信息很容易复制，但不容易验证。例如，引入加密货币为非法贸易提供了可能性，例如毒品，枪支和黑市交易。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PANET>

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ARPANET）是第一个具有分布式控制的广域分组交换网络，也是最早实现TCP / IP协议套件的网络之一。两种技术都成为Internet的技术基础。ARPANET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建立。

基于JCR Licklider的思想，Bob Taylor在1966年启动了ARPANET项目，以实现远程计算机的访问。泰勒任命拉里·罗伯茨（Larry Roberts）为项目经理。Roberts做出了有关网络设计的关键决定。他结合了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Davies）的数据包交换概念和设计，并寻求Paul Baran的帮助。ARPA向Bolt Beranek & Newman授予了构建网络的合同，后者为网络开发了第一个协议。罗伯茨与伦纳德·克莱因洛克（Leonard Kleinrock）邀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发用于分析分组网络技术的数学方法。

第一台计算机于1969年连接，网络控制程序于1970年实施。进一步的软件开发使远程登录，文件传输和电子邮件成为可能。该网络迅速扩展，并于1975年将控制权移交给了国防通信局，并宣布开始运行。

后来DARPA导致传输控制方案的制定。随着这项工作的进展，制定了一个协

议，通过该协议，可以将多个单独的网络合并成一个网络网络。1983年1月，美国国防部将TCP/IP的第4版安装在ARPANET中以用于生产，此版本已成为所有军用计算机网络的标准。

1981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了计算机科学网络（CSNET），扩大了对ARPANET的访问。在1980年代初期，NSF资助了几所大学建立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并于1986年通过NSFNET项目提供了网络访问和网络互连。ARPANET在与电信和计算机行业的合作得到保证之后，于1990年正式退役。私有部门的扩展以及扩展后的Internet导致全球网络的未来商业化。

历史

灵感

从历史上看，语音和数据通信的基于电路交换的方法，如传统电话网络中的端对端的电子连接，通过在呼叫期间在这些系统之间连接多个中间呼叫分支的交换系统来建立连接。

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Davies）的工作在1967年10月的操作系统原理研讨会上引起了ARPANET开发人员的注意。1968年8月5日，他创造了分组交换一词，进行了首次公开演示，并将其纳入英格兰的NPL网络。NPL网络和ARPANET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分组交换的两个网络，并在1973年相互连接。罗伯茨说，ARPANET和其他已建立的1970年代的分组交换网络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与戴维斯（Davies）最初的1965年设计相似。

创作

1966年2月，鲍勃·泰勒（Bob Taylor）成功游说了ARPA的董事查尔斯·M·赫兹菲尔德（Charles M. Herzfeld），以资助一个网络项目。赫兹菲尔德将一百万美元的资金从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中转移到泰勒的预算中。泰勒（Taylor）于1967年1月聘请拉里·罗伯茨（Larry Roberts）作为ARPA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的计划经理，从事ARPANET的工作。

罗伯茨请弗兰克·韦斯特维尔特（Frank Westervelt）探索网络的最初设计问题。1967年4月，ARPA举行了关于技术标准的设计会议。讨论了识别和认证用户，传输字符以及错误检查和重传过程的初始标准。罗伯茨的建议是，所有大型机都应直接相互连接。其他研究人员不愿意将这些计算资源专用于网络管理。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提议将微型计算机用作创建消息交换的接口网络。罗伯茨（Roberts）修改了ARPANET计划，以纳入克拉克（Clark）的建议，并将其命名为小型计算机接口消息处理器（IMP）。

该计划在1967年10月举行的首届操作系统原理研讨会上提出。Donald Davies在同事（Roger Scantlebury）的介绍下在数据包交换和NPL网络方面的工作引起了ARPA研究人员的注意。会议。Roberts为ARPANET应用了Davies的分组交换概念，并寻求Paul Baran的帮助。NPL网络使用的线速为768kbit/s，而ARPANET的建议线速从2.4kbit/s升级到50kbit/s。

到1968年中，Roberts和Barry Wessler根据斯坦福研究所（SRI）的报告编写了IMP规范的最终版本，该报告由ARPA委托编写了描述ARPANET通信网络

的详细规范。罗伯茨于6月3日向泰勒提交报告，泰勒于6月21日批准该报告。经ARPA批准后，向140个潜在投标人发布了报价请求（RFQ）。大多数计算机科学公司都将ARPA提案视为不合时宜的，只有十二个提交了建立网络的投标。在十二家公司中，ARPA仅将四家视为顶级承包商。到年底，ARPA只考虑了两个承包商，并将建造网络的合同授予了Bolt, Beranek和Newman Inc.（BBN）。

最初由7人组成的BBN团队在响应ARPA RFQ方面的技术特殊性为他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因此迅速建立了第一个工作系统。该团队由弗兰克·哈特（Frank Heart）领导，其中包括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BBN提出的网络紧紧遵循罗伯茨的ARPA计划：由称为接口消息处理器（或IMP）的小型计算机组成的网络，类似于后来的路由器概念，其作用是互连本地资源的网关。在每个站点，IMP执行存储和转发数据包交换功能，并通过电信数据集（调制解调器）与租用线路互连，初始数据速率为56 kbit / s。主机通过自定义串行通信接口连接到IMP。该系统（包括硬件和数据包交换软件）在9个月内完成了设计和安装。BBN小组继续与NPL小组互动，他们之间的会议在美国和英国举行。

BBN Technologies使用Honeywell DDP-516计算机构建了第一代IMP，该计算机版本配置了24 KB的可扩展磁芯内存和16通道直接多路控制（DMC）直接内存访问单元。DMC与每个主机和调制解调器建立了自定义接口。DDP-516计算机还具有一组特殊的24个指示灯，用于显示IMP通讯通道的状态。每个IMP最多可以支持四个本地主机，并且可以通过早期的Digital Signal 0与多达六个远程IMP进行通信。该网络将犹他州的一台计算机与加利福尼亚的三台计算机相连。后来，美国国防部允许大学加入网络以共享硬件和

软件资源。

实施

四个节点被指定为开发和调试1822协议的测试平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然它们在1969年以电子方式连接，但直到1970年实施网络控制程序后，才可以使用网络应用程序，从而启用了前两个主机-主机协议，即远程登录（Telnet）和文件传输（FTP）。到1973年左右，大多数站点都建立了电子邮件服务后，网络流量开始增长。

=====

=====

=====

=====

=====

=====

=====

=====

美国、西欧、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地的经济腾飞

Handwriting practice lines consisting of multiple sets of three horizontal lines (top, middle, and bottom lines) for letter formation.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history_of_the_United_States

美国的经济史

这一发展使经济产业得以发展，便利了贸易并促进了人们的经济开放，全球基础设施的需求很大。重点是经济表现以及它如何受到新技术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提高生产率的新技术，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还涉及经济部门规模的变化以及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影响。美国商业史涵盖了专门的商业史。

殖民地经济

殖民地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地区的经济显着不同，因为美国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丰富，但劳动力稀缺。

从1700年到1776年，十三个殖民地的产量增长了12倍，使殖民地的经济规模达到了独立时英国的30%。人口增长占英美殖民地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三以上。自由白人人口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生产率几乎没有变化，新商品和服务的引进也很少。

人口统计

北美最初的殖民化非常困难，大多数定居者在1625年之前就去世了。定居者必须依靠他们可以狩猎和收集的东西，他们带来的东西以及不确定的食物，工具和补给品的运输，直到他们能够建造庇护所和要塞，清理土地，种植足够的食物以及建造磨坊，锯木厂，铁工厂和铁匠铺要自给自足。他们还必须捍卫自己，抵御来自敌对印第安人的袭击。1629年以后，由于高出生率（每个家庭有8个孩子，欧洲有4个），人口增加非常快，除移民外，死亡率也低于欧洲。殖民者的预期寿命长是由于食物和薪柴供应充足以及人口密度低限制了传染病的传播。在温暖潮湿的南部殖民地，疾病（尤其是疟疾）的死亡率要高于寒冷的新英格兰。

较高的出生率归因于更好的就业机会。白人定居者的数量从1650年的40,000人增加到1700年的235,000人。1690年，估计有13,000名黑人奴隶。在整个18世纪，人口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增长，每隔25年或更短的时间增长一倍。到1775年，人口已增长到260万，其中210万是白人，54万黑人和50,000美国原住民，使殖民地约占英国人口的三分之一。1775年，人口最多的三个殖民地是弗吉尼亚，占21%，宾夕法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各占

11%。

经济

后来成为美国的殖民地经济是工业化前的工业，其主要特征是自给农业。农场主也从事手工业的生产，主要用于家庭消费，但也出售一些商品，主要是黄金。

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提取和加工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供当地消费，如采矿，gristmills和锯木厂，和农产品的出口。最重要的农业出口产品是原料和加工饲料（小麦，印度玉米，大米，面包和面粉）和烟草。烟草是切塞皮克湾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水稻是南卡罗来纳州的主要农作物。干鱼和咸鱼也是重要的出口产品。北卡罗来纳州是海军商店的主要生产商，其中包括松节油（用于灯），松香（蜡烛和肥皂），焦油（绳索和木材防腐剂）和沥青（船体）。另一种出口是钾肥，钾肥是从阔叶树灰中提取的，用作肥料和制造肥皂和玻璃的原料。

殖民地依赖英国生产许多制成品，部分原因是1660年的航行法禁止在殖民地生产多种类型的制成品。这些法律达到了为英国创造贸易顺差的预期目的。殖民地货物贸易平衡极大地有利于英国。但是，美国托运人用大英帝国各港口之间的船运收入获得了大约一半的货物贸易逆差。

最大的非农业部门是造船业，占总就业人数的5%至20%。约有45%的美国制造的船舶被出售给外国人。

在革命之前的十年中，出口和相关服务约占收入的六分之一。在革命之前，烟草大约占出口价值的四分之一。同样在革命时期，殖民地生产了世界铁的约15%，尽管与谷物和烟草相比，出口的铁价值很小。当时开采的美国铁矿石不是很大的矿床，也不是全部都是高质量的。然而，巨大的森林为制造木炭提供了充足的木材。英国的木材变得稀缺，焦炭开始代替木炭。英国鼓励殖民地生产生铁和生铁，但在1750年禁止建造新的殖民地铸铁加工厂，但该禁令在很大程度上被殖民者所忽视。

殖民时期的定居稀少，由于缺乏改善的道路，交通受到严重限制。城镇位于沿海或通航的内河航道上或附近。即使在殖民时期很少见的改善道路上，货车运输也非常昂贵。将低价值农产品运输到通航水道的经济距离各不相同，但仅限于少于25英里的范围。在少数几个小城市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较大种植园中，一些必需品和几乎所有的奢侈品都是进口的，以换取烟草，大米和靛蓝的出口。

到18世纪，区域发展模式已经明确：新英格兰殖民地依靠造船和航行来创造财富。在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卡罗来纳州的种植园（许多人使用奴隶劳动）种植了烟草，大米和靛蓝；纽约，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等中部殖民地则运送普通农作物和毛皮。除了奴隶之外，生活水平甚至比英格兰本身还要高。

新英格兰

在新英格兰地区，地区经济稳步增长，在整个殖民时代尽管没有可能被种植的主食作物。所有省份和许多城镇都试图通过补贴改善道路，桥梁，旅馆和渡轮等基础设施的项目来促进经济增长。他们给锯木厂，碎石厂，铁厂，拉炼厂，制盐厂和玻璃厂提供赏金，补贴或垄断。最重要的是，殖民地立法机关通过解决争端，执行合同和保护财产权建立了有利于企业的法律体系。清教徒和扬基人赞同“新教伦理”，这是该地区的努力工作和企业家精神，这使人努力工作，这是他们神圣召唤的一部分。

增长带来的好处在新英格兰广泛分布，从商人到农民再到雇工。迅速增长的人口导致缺乏可供年轻家庭安居的良好耕地；一个结果是推迟了婚姻，另一个结果是搬到了更西边的新土地。在城镇，企业家精神很强，劳动力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1775年之前，男性的工资稳步上升；妇女的新职业正在开放，包括织造，教学和剪裁。该地区与新法兰西接壤，英国人投入资金购买物资，修路和支付殖民地士兵的费用。沿海港口开始专门从事渔业，国际贸易和造船业，并在1780年后开始捕鲸。

康涅狄格州的经济始于17世纪的自给自足农业，并随着多样性的发展和对遥远市场尤其是加勒比海英国殖民地的生产的关注而发展。美国独立战争切断了从英国的进口，并刺激了制造业，该行业大量利用人民的企业家精神和机械技能。在18世纪下半叶，由于良好的耕地短缺，周期性的货币问题以及出口市场的价格下降而引起了困难。殖民政府不时试图促进各种商品，例如大麻，钾肥和木材作为出口商品，以促进其经济发展并改善与英国的贸易平衡。

市区

历史学家卡尔·布莱登博（Carl Bridenbaugh）深入考察了五个主要城市：波士顿（1760年人口16,000），纽波特罗德岛（人口7500），纽约市（人口18,000），费城（人口23,000）和查尔斯镇（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敦，人口8000）。他认为，他们从小村庄成长为在促进贸易，土地投机，移民和繁荣，以及医学和技术新方法方面起主要领导作用。此外，他们开发了独特的美国教育体系，并开始了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照顾的系统。

革命前夕，95%的美国人居住在城市以外，这对英国人的挑战很大，英国人用皇家海军占领了这些城市，但缺乏占领和征服农村的人力。在解释城市在塑造美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时，本杰明·卡尔普比较了海滨工人，小酒馆，教堂，血缘关系网络和地方政治的重要作用。

政治环境

西班牙坚持旧式的重商主义，主要是通过积累金和银（主要来自其殖民地的矿山）。荷兰人，特别是英国人的做法更有利于私营企业。

自由企业

英美殖民地的国内经济享有很大的自由度，尽管其中一些自由是由于缺乏对英国关于工商业的规定的执行所致。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殖民地为例，说明了自由创业的好处。殖民者缴纳了最低税。

一些殖民地，例如弗吉尼亚州，主要是作为商业企业而建立的。英格兰在北美海岸线上建立定居点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使用特许公司。宪章公司是一群股东（通常是商人和富裕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寻求个人经济利益，也许还想推动英格兰的国家目标。在私营部门为公司提供资金的同时，国王还向每个项目提供了具有经济权利以及政治和司法权威的宪章或赠款。但是，殖民地没有盈利，失望的英国投资者经常将殖民地宪章移交给定居者。政治含义虽然在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但却是巨大的。殖民者被留下来建立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经济。

税收

殖民地政府的支出很少，税收也很少。

尽管殖民地为在英国制造或由英国商人采购并从英国运送的制成品提供了出口市场，但英国人承担了为防止海盗行为提供保护的费用，以及英国海军的其他军事费用。早期税收被称为1733年《糖蜜法案》。

在1760年代，伦敦政府通过对殖民地征收新税款来筹集少量资金。这引起了巨大的轩然大波，历史学家从中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的起源。问题不在于税收的数额（它们很小），而是议会的宪法权威与殖民地议会对税收进行表决的问题。新的税收包括1764年的《糖法》，1765年的《邮票法》以及茶和其他殖民地进口商品的税。历史学家们对《航行法》所施加的成本进行了来回辩论，这些成本鲜为人知，很少有人抱怨。然而，到1795年，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共识是，“航行法令的贸易限制对[美国]殖民者施加的成本很小。”

美国革命

十三殖民地的美国人要求他们拥有英国人的权利，如他们所见，他们必须选择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和征税，而英国拒绝了。美国人试图通过抵制英国制成品来抵抗，但英国人拒绝了美国的权利和1774年的《不可容忍的法案》。反过来，美国人发动了美国革命，导致了新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性。英国试图通过封锁所有港口来削弱美国经济，但由于90%的人口从事农业，而只有10%的城市人口，美国经济表现出了韧性并能够支持持续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1775年至1783年。

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带来了不可剥夺的权利，以“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强调个人自由和经济创业，同时向政治价值观承诺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强调自然权利，所有公民依法享有的平等，公民品德和义务以及促进一般福利。

英国对美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战争耗资约1亿英镑。财政部借入了所需资金的40%，并通过有效的税收系统筹集了其余资金。巨额支出使法国濒临破产和革命的边缘。

国会和美国各州没有为战争筹集资金的困难。1775年，殖民地最多存有1200万美元的黄金，不足以覆盖现有交易，更不用说发生大规模战争了。英国政府对每个美国港口实施严格封锁，使几乎所有进出口贸易中断，使情况更加恶化。一种局部解决方案是依靠民兵的志愿者支持和爱国公民的捐款。另一个是推迟实际付款，以贬值的货币向士兵和供应商付款，并保证在战后将其偿还。的确，在1783年，向士兵和军官提供了土地赠款，以支付他们在战争期间所赚取的但未被支付的工资。直到1781年，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被任命为美国财务总监，国家政府在财务事务上才有强有力的领导者。莫里斯（Morris）在1782年用法国的一笔贷款

建立了北美私人银行，为战争提供资金。为了提高效率，莫里斯（Morris）减少了民事清单，通过使用竞争性合同招标来节省金钱，收紧了会计程序，并要求联邦政府从各州获得全部金钱和物资。

国会采用了四种主要方法来支付战争费用，其中大约价值6600万美元的金币（黄金和白银）。国会在1775年至1780年和1780年至81年发行了两期纸币。第一期发行总额为2.42亿美元。据说可以将这笔纸币兑换成州税，但最终在1791年以1美分兑1美元的汇率还清了持有人。同时，各州，特别是弗吉尼亚州和卡罗来纳州发行了超过2亿美元的本国货币。实际上，纸币是对人民的一项隐性税，确实是当时唯一可能的征税方法。暴涨的通货膨胀对少数有固定收入的人来说是一个难题，但是90%的人是农民，并不受该通货膨胀的直接影响。债务人受益于用折旧纸还清债务。最大的负担是由大陆军的士兵承担的，他们的工资（通常是欠款）每月价值下降，削弱了他们的士气并增加了家庭的苦难。

从1776年开始，国会试图通过有钱人的贷款筹集资金，承诺在战后赎回债券。这些债券实际上是在1791年以票面价值赎回的，但该计划筹集的资金很少，因为美国人的钱不多，而且许多富商都是皇室的支持者。从1776年开始，法国人秘密地向美国人提供了金钱，火药和弹药，以削弱其主要敌人英国。当法国于1778年正式参战时，补贴继续，法国政府以及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为美国的战争努力提供了大笔款项。这些贷款在1790年代已全额偿还。

从1777年开始，国会一再要求各州提供资金。但是各州也没有征税制度，

也无济于事。到1780年，国会开始征用特定供应的玉米，牛肉，猪肉和其他必需品，而这种低效率的体系使军队几乎无法生存。

这些城市在煽动美国独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1775年至1783年的战争中受到重创。由于皇家海军的封锁，他们失去了作为海洋港口的主要作用。此外，英国人占领了城市，特别是1776-1783年的纽约，而其他城市则占领了较短的时期。在占领期间，他们被切断了与内陆贸易和陆上交通的联系。当英国人于1783年最终离开时，他们带走了大批富有的商人，他们在大英帝国的其他地方恢复了商业活动。

联邦：1781-1789年

战后有短暂的经济衰退，但繁荣在1786年恢复了。大约有60,000至80,000的忠于英国王室的美国人忠诚主义者离开美国，前往大英帝国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加拿大。他们带走了奴隶，但留下了土地和财产。有些人在1780年代中期返回，尤其是返回纽约和南卡罗来纳州等更受欢迎的州。在经济上，大西洋中部各州的复苏特别迅速，并开始制造和加工商品，而新英格兰和南部的复苏则更为不平衡。与英国的贸易恢复了，战后英国的进口量与战前的水平相当，但出口急剧下降。担任英国部长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要求征收报复性关税，以迫使英国商定一项商业条约，特别是在进入加勒比市场方面。但是，国会缺乏监管外国贸易或迫使各州遵循统一贸易政策的权力，英国不愿进行谈判。虽然与英国的贸易没有完全恢复，但美国扩大了与法国，荷兰，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尽管有这些良好的经济条件，许多商人还是抱怨每个州征收的高额关税限制了

州际贸易。许多债权人还遭受了国内政府未能偿还战争期间产生的债务的苦难。尽管1780年代经济增长温和，但许多人都感到焦虑不安，国会因未能建立起更强大的经济而受到了很多责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各州赋予国会对西部土地的控制权，并建立了有效的人口扩张体系。1787年的《西北条例》废除了俄亥俄河以北地区的奴隶制，并承诺当一个领土达到足够人口数量时就像1803年的俄亥俄一样成为州。

新国家

1787年通过的《宪法》确立了整个国家是一个统一的或共同的市场，没有针对州际贸易的内部关税或税收。联邦权力的范围存在很多争议，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总统执政期间担任财政部第一书记时持广泛看法。汉密尔顿成功地提出了“隐含权力”的概念。他在接管国家债务的基础上成功建立了强大的国民信用体系并将它们与旧的国债捆绑在一起，出售给富人，他们现在对保持新的政府有兴趣，汉密尔顿通过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和对威士忌征收高争议性税来为这些债务提供资金。汉密尔顿认为，美国应该通过多元化的运输，制造和银行业务来追求经济增长，他在1791年寻求并获得了国会授权，建立了美国第一银行；该宪章一直持续到1811年。

战争结束后，较旧的城市终于恢复了经济基础。新兴城市包括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和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华盛顿政府在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领导下于1791年成立了一家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开始在所有城市中蓬勃发展。企业家精神蓬勃发展，是城市繁荣的强大动力。

世界和平仅持续了十年，因为1793年英法及其盟国之间爆发了长达二十年的战争。作为领先的中立贸易伙伴，美国与双方都有业务往来。法国对此很不满，1798-99年的准战争破坏了贸易。杰斐逊和麦迪逊政府对英国强加于美国商船和水手的做法感到愤怒，他们在1807- 1812年与英国进行了经济战，然后在1812至1815年进行了全面战争。

工商业

运输

在新国家，城市以外的道路很少，没有运河。据报告，在1792年，许多农作物运输到海港的成本是其成本的五分之一到一半。最便宜的运输方式是通过水，沿着海岸或在湖泊和河流上。

自动面粉厂

1780年代中期，奥利弗·埃文斯（Oliver Evans）发明了一种全自动磨粉机，几乎不需要人工或操作员就可以加工谷物。这是两个方面的革命性发展：1）它使用了斗式提升机和传送带，最终将彻底改变物料搬运方式；2）它使用了调速器（现代自动化的先驱）进行控制。

轧花机

棉花最初是南方的一种小规模作物。埃利·惠特尼（Eli Whitney）改良轧花后，棉花种植业蓬勃发展。去除种子的效率是滚子的50倍。

机械化纺织品制造

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英国开始进入工业革命的快速增长时期，但是世界其他地方完全没有任何类型的大型机械化工业。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在英国的一家棉纺厂担任机械师的工程师。1789年，Slater开始在罗德岛的Almy & Brown担任顾问，他们试图在最近购买的某些设备上成功地纺棉。斯莱特确定机器无法生产高质量的纱线，并说服业主让他设计新机器。斯莱特（Slater）到达美国后没有发现任何机械师，因此很难找到有人来制造机械。最终，他找到了Oziel Wilkinson和他的儿子David，为该机器生产铸铁和锻件。根据戴维·威尔金森（David Wilkinson）的说法：“Slater先生为棉花机械制造的所有熨斗的旋转都是用手动凿子或车床中由手摇曲柄旋转的工具完成的。”到1791年，斯莱特开始使用某些设备。1793年，斯莱特和布朗在罗得岛的波塔基特（Pawtucket）开设了一家工厂，这是美国第一家成功的水力罗拉纺纱棉工厂。戴维·威尔金森（David Wilkinson）继续发明了金属加工车床，并为此赢得了国会奖。

金融，金钱和银行业务

美国第一银行成立于1791年。它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设计的。

十九世纪初

在整个19世纪的前三分之一，美国一直处于工业化之前。大多数人生活在农场上，并消费了大部分食物。非农业人口中有很一部分从事出口货物

的处理。该国是农产品出口国。美国建造了世界上最好的船只。

纺织工业在新英格兰成立，那里有丰富的水力资源。蒸汽动力开始在工厂中使用，但在内战之前，水一直是工业动力的主要来源。

道路和运河的建设，汽船的引入和第一条铁路是交通革命的开始，整个世纪都在加速。

政治发展

美国系统的体制安排最初是由财政部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制定的，他提议创建政府资助的银行并提高关税以鼓励工业发展。汉密尔顿去世后，亨利·克莱（Henry Clay）和辉格党（Whig Party）在战前时期拥护美国政治经济学派。

形成美国体系的具体政府计划 and 政策包括：1802年成立专利局；1807年创建了海岸和大地测量局，并采取了其他措施来改善河流和港口的航行；各种陆军远征队从西边出发，从1804年的刘易斯和克拉克的发现军团开始，一直延续到1870年代，几乎总是在陆军地形工程师团的军官的指导下进行，并为随后的陆路先驱者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指派陆军工程师负责协助或指导早期铁路和运河的勘测和建设；成立的美国第一银行和美国第二银行以及各种保护主义措施（例如，1828年的关税）。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反对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及汉密尔顿的大部分经济政策），但他们无法阻止汉密尔顿，后者在华盛顿政府中拥有巨大的权力和政治影响力。但是，在1801年，杰斐逊（Jefferson）成为总统，并转向推广一种更

分散的农业民主制度，即杰斐逊民主制（Jeffersonian民主）。（他的哲学是保护平民免受政治和经济暴政的侵害。他特别称赞小农是“最有价值的公民”。）但是，杰斐逊并没有改变汉密尔顿的基本政策。麦迪逊

（Madison）担任1811年总统后，让银行宪章到期，但1812年战争（War of 1812）事实证明，有必要建立一家国家银行。美国第二银行成立于1816年，具有20年的特许经营权。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于1803年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从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领地，尽管当时的国库只有1000万美元。这大大扩展了美国的范围，添加了非常好的农田，密西西比河和新奥尔良市。从1793年到1814年的战争导致大多数外国船运从美国撤出，使加勒比海地区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贸易开放给美国，这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导致法国和英国没收了美国船只，从而导致1807年《禁运法案》的实施。1812年战争几乎切断了所有对外贸易，为美国制造的商品创造了本国市场（即使价格更高），将早期的自由贸易趋势转变为以民族主义和保护性关税为特征的贸易保护主义。

诸如坎伯兰派克（1828）和伊利运河（1825）之类的国家项目中，修建了道路和水路，为西方农产品开辟了市场。辉格党支持克莱的美国体系，该体系提议进行内部改进（例如道路，运河和港口），保护工业，并建立强大的国民银行。辉格党的立法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遭到民主党的阻挠，但大多数州在两党的基础上制定了类似的现代化计划。

最高法院在Gibbons诉Ogden案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牢固确立了联邦政

府在规范州际贸易中的作用，该裁决决定不准许各州授予在州之间运营的汽船公司专有权。

新民主党领导人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1829–1837）反对美国第二银行，他认为这有利于富人根深蒂固的利益。当杰克逊连任第二任期时，他阻止了该银行宪章的续期。杰克逊反对纸币，并要求政府以金和银币付款。1837年的恐慌制止了三年的业务增长。

农业，商业和工业

人口增长

尽管从欧洲移民的情况相对较少，但定居点向西方的迅速扩张以及路易斯安那州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交易，开辟了广阔的边疆土地。高出生率和廉价土地的提供使人口迅速增加。人口平均年龄在20岁以下，到处都是孩子。人口从1800年的530万人增长到960万；86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到1820年达到1,749,000平方英里。到1840年，同一土地上的人口已达到1706.9万。

新奥尔良和圣路易斯加入了美国并迅速发展。全新的城市开始于匹兹堡，玛丽埃塔，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列克星敦，纳什维尔，并指向西部。1810年后汽船的到来使主要河流，尤其是哈德逊河，俄亥俄，密西西比河，伊利诺伊，密苏里，田纳西和坎伯兰河的上游运输变得经济。历史学家理查德·韦德（Richard Wade）强调了新城市在向西扩展农田定居的重要性。它们是运输中心，是向西扩张的迁移和融资节点。新开放的地区道

路很少，但是河流系统非常好，所有的水都向下游流入新奥尔良。随着1815年以后汽船的到来，有可能将从东北和欧洲上游进口的商品转移到新的定居点。伊利运河的开放使布法罗成为湖泊运输系统的起点，该运输系统使重要城市克里夫兰，底特律，尤其是芝加哥连接起来。

劳动力短缺

正如许多当代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初的美国经济以劳动力短缺为特征。劳动力短缺的原因是土地便宜，农业收益高。对各种类型的劳动力都有很高的需求，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力和经验丰富的工厂工人。美国的劳动力价格通常比英国高30%至50%。女工厂工人尤其稀缺。劳动力的弹性很低，部分原因是缺乏运输和人口密度低。相对的劳动力稀缺和高昂的价格是资本投资的诱因，尤其是在机械方面。

农业

在19世纪初期，美国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向西扩展，加上运河建设和汽船的引入，开辟了新的农业领域。在密西西比河谷和阿拉巴马州，许多土地被清理开并种植棉花，中西部地区也有新的谷物种植区投入生产。最终，从1820年到1823年，再到1840年、1843年，这特别给棉花价格带来了严重的下行压力。

在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棉花都是在产地附近纺纱和编织的，几乎没有供国际市场使用的原棉。由于工业革命的机械化纺纱和织造技术，世界棉花

需求强劲增长。尽管棉花生长在印度，中国，埃及，中东以及其他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但美洲（尤其是美国）拥有足够的合适土地来支持大规模的棉花种植园，这些种植园可带来高额利润。1806年从墨西哥带到密西西比州纳奇兹的棉花种子菌株将成为当今世界90%以上的棉花生产的父本遗传材料；它产生了铃挑选速度要快三到四倍。在1830年代，棉花贸易，不包括融资，运输和销售，占国民收入的6%或更少。棉花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商品。

甘蔗在路易斯安那州生长，在那里被提炼成颗粒状的糖。生长和精制糖需要大量资金。美国一些最富有的人拥有制糖厂。

在战前几十年中，人均粮食产量与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和工业劳动力并驾齐驱。

道路

19世纪初，城市外只有几条道路，但正在修建收费公路。每吨货车的成本在1819年介于30至70美分之间。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对典型货车的估计为每吨英里32美分。将小麦或玉米运输到费城的成本分别超过了218英里和135英里。为促进向西扩张，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于1801年开始进行纳奇兹（Natchez）工程，该工程将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的荒野之路与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相连，该河与密西西比河相连。

19世纪初期的公路建设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并且是1819年至1821年通缩的一个因素，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紧缩之一。

一些收费公路是木板路，通常每英里的成本在1,500美元至1,800美元之间，但很快就用光了。纽约的Macadam道路平均每英里成本3500美元，而优质道路的成本则为每英里5,000美元至10,000美元。

运河

运河的运输成本为每吨英里2至3美分，而货车的运输成本为17至20美分。修建一条典型的运河的成本在每英里20,000至30,000美元之间。

到1816年，美国仅修建了100英里的运河，只有很少的长度超过了2英里。早期的运河通常在财务上是成功的，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运送煤炭的运河，运河建设一直集中到1820年。

325英里长的伊利运河于1825年开始运营，该运河将哈德逊河上的纽约奥尔巴尼和伊利湖上的纽约州布法罗连接起来。1817年从布法罗到纽约市的货车价格为每吨英里19.2美分。伊利运河（Erie Canal）1857年至1860年的成本为0.81美分。伊利运河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对区域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特拉华河和力登运河也非常成功。同样重要的是2.5英里长的运河绕过1830年开放的路易斯维尔的俄亥俄河上的瀑布。

一些早期运河的成功导致了运河建设的繁荣，在此期间，许多运河的工程开始了，这在财务上被证明是不成功的。1820年代后期，随着运河热潮的进行，正在修建少量的铁路铁路。紧随其后的是1830年代的第一条蒸汽铁路。

蒸汽动力

1780年，美国拥有三台主要的蒸汽机，全部用于抽水：两台用于矿井，一台用于纽约市的供水。在1840年引入后，美国的大部分动力是由水车和水轮机提供的。到1807年北河汽船（非正式地称为Clermont）首次航行时，据估计，在美国运行的蒸汽机少于12台。直到185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电力才能够取代水力发电。

奥利弗·埃文斯（Oliver Evans）开始研发高压蒸汽机，该发动机比英格兰的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大约在同一时间研发的蒸汽机更实用。高压发动机取消了单独的冷凝器，因此不需要冷却水。它还具有更高的功率重量比，使其适合为汽船和机车提供动力。

埃文斯（Evans）在1801年至1806年间开办了一些定制的蒸汽机，当时他在

费城开设了铸铁厂和工厂，在那里他又生产了其他发动机。1812年，他生产了成功的哥伦比亚发动机。随着业务的增长和订单的发送，埃文斯和一位合伙人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成立了匹兹堡蒸汽发动机公司。蒸汽机很快在公共供水，锯木厂和面粉磨中变得很普遍，尤其是在水力很少或没有水力的地区。

机械动力传递

1828年，保罗·穆迪（Paul Moody）用皮带代替了工厂中的齿轮。在工厂中，使用线轴皮带进行皮带输送是从蒸汽机和水轮机分配动力的常用方法。在19世纪后期的工厂热潮中，大型工厂通常会有许多英里的生产线轴。皮带一直在使用，直到20世纪初期几十年被单元驱动电动机取代。

造船

造船业仍然是一个庞大的行业。美国建造的船舶设计精良，所需人员更少，建造成本比欧洲造船低40%至60%。在19世纪中叶引进铁壳船之后，英国人在造船业中取得了领先地位。

汽船

第一艘汽船由Boulton和Watt型低压发动机提供动力，相对于较小的高压发动机而言，它们非常大且笨重。1807年，罗伯特·史蒂文斯（Robert L. Stevens）开始使用Phoenix发动机，该发动机使用高压发动机和低压冷凝发动机。第一艘仅由高压驱动的汽船是由奥利弗·埃文斯（Oliver Evans）设计和建造的。

在1811至1812年的冬天，新奥尔良号船成为第一艘从匹兹堡到新奥尔良顺着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航行的汽船。该企业于1814年证明了汽船在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上的商业可行性。

到1815年富尔顿去世时，他在美国大约30艘汽船中操作了21艘。汽船的数量稳步增长到数百艘。密西西比河谷的汽船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多。

早期的汽船从新奥尔良到路易斯维尔需要30天的时间，而龙骨乘船的时间是后者的一半到四分之一。由于汽船技术的进步，到1830年，从新奥尔良到路易斯维尔的时间减少了一半。1820年，龙骨船的运费为每吨英里5美分，汽船的运费为2美分，到1830年降至二分之一。

萨凡纳（SS Savannah）于1819年从萨凡纳（Savannah）航行到利物浦（Liverpool），这是第一艘跨大西洋的轮船；但是，直到开发出更高效的发动机之前，跨洋轮船所载煤炭燃料比货运要多。早期的跨洋轮船也用于运输乘客，不久，一些公司开始提供定期的服务。

铁路

铁路是英国的发明，1830年代第一批企业家进口了英国的设备。到1850年代，美国人已经开发了自己的技术。1830年代和1840年代初期的线路是当地资助的，将附近的城市或农场连接到通航的水道。他们主要处理货运而

不是旅客。第一批机车是从英国进口的。在等待装配时，设计并制造了非常成功的固定式蒸汽机的马蒂亚斯·W·鲍德温（Matthias W. Baldwin）能够检查零件并获得测量值。鲍德温（Baldwin）于1832年生产了第一台机车。他继续创建了鲍德温机车厂，这是最大的蒸汽机车制造商之一。在1833年，美国的机车很少时，四分之三在英国制造。1838年，美国记录了346台机车，其中四分之三是在美国制造的。

俄亥俄州在1840年代建造的铁路数量超过任何其他州。俄亥俄州的铁路使运河停业。一条典型的一英里铁路成本为30,000美元，而运河每英里成本为20,000美元，但是铁路可以承载50倍的流量。铁路在运河繁荣时期出现，导致其突然结束，尽管有些运河又兴盛了半个世纪。

制造业

从1790年代的纺织品开始，建立了工厂来供应区域和全国市场。动力来自瀑布，大多数工厂都建在新英格兰农村和纽约北部的河边。

1800年以前，大多数布料是在家庭作坊中制成的，而家庭主妇则将其缝制成衣服以供家庭使用或与邻居交易。1810年，财政部长估计，三分之二的农村家庭服装，包括袜子和亚麻，是由家庭生产的。美国纺织工业是在1793年至1815年建立的，当时无法从英国进口廉价的布料。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秘密地从英国引进了复杂纺织机械的计划，并在罗得岛建立了新工厂。当时是1807年的《禁运法》中断与英国的贸易后，有15家棉纺厂在运营。这些都是小型企业，通常只有不到50名员工，并且大多数都是由小溪带动的Arkwright水框架。他们都位于新英格兰东南部。1809年，工厂的数量已发展到62家，其中25家正在建设中。

到1827年，福尔里弗河地区有10家棉纺厂，很快成为该国领先的印花棉布生产商。

美国从1830年代开始出口纺织品。美国人专门生产粗布，而英国人则出口较细的布，从而进入了某种不同的市场。布的生产（主要是棉花，但也包括羊毛，亚麻和丝绸）已成为美国的主要工业。纺织机械的建造成为先进机械设备发展的主要动力。

制鞋业开始由工匠的生产向分工的工厂制过渡。

可互换零件的开发

标准化和零件可互换性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异常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军备标准化的思想起源于法国将军让·巴蒂斯特·瓦奎特·德·格里博瓦尔（Jean-Baptiste Vaquette de Gribeauval），他于1765年开始建立格里博瓦尔系统。曾任法国三个武库督察长的奥诺雷·布兰科（Honoré Blanc）在担任法国大臣期间开始在法国生产带有可互换锁的步枪。杰斐逊（Jefferson）在1785年就这些事态发展写信给约翰·杰伊（John Jay）。军备标准化的思想是路易斯·杜沙德（Louis de Tousard）提倡的；他逃离了法国大革命，1795年加入美国大炮兵和工程师兵团，在那里他应用了在法国学习的火炮和工程学。在乔治华盛顿的建议下，图萨德一直在编写炮兵手册，并以《美国炮兵的同伴》（1809年）的形式出版。图萨尔的手册是军官培训的标准教科书，强调了标准化军备系统的重要性。

美国于1798年开始提供现金预付合同，向私人生产商购置小武器。这些合同中与可互换零件有关的两个著名倡导者是埃利·惠特尼和西缅·诺斯。尽管惠特尼无法制造可互换的零件，但他还是提倡使用机械制造枪支。但是，他只使用了工厂中最简单的机器。诺斯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互换性，并开发了专用机械。

1812年战争的经历使战争部发出了要求采购具有可互换零件的枪支的合同提议的请求。以前，每个枪支的零件都必须仔细定制。几乎所有步兵团都必定包括可以进行这种复杂枪械制造的工匠。可互换零件的需求迫使现代金属加工机床的发展，包括铣床，磨床，整形机和刨床。联邦军械库通过开发固定装置来正确定位要加工的零件，并通过夹具引导切割工具走过正确的路径，从而完善了机床的使用范围。还开发了量块和量规系统，以检查加工零件的准确性和精度。开发联邦军械库制造可互换零件的制造技术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但是，第一个可互换的小臂零件的制造精度不是很高。直到该世纪中叶或更晚，美国步枪的零件才可以被认为具有一定的精度，可以真正互换零件。

机械师的技能被称为军械库练习，该系统最终被称为美国制造业体系。军械库的机械师最终将该技术推广到其他行业，例如钟表，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直到19世纪末，可互换零件才在美国制造业中广泛使用。使用可互换零件的物品中有一些缝纫机品牌和自行车。

这些现代机床和机械加工方法的发展使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的现代工业得以发展。

金融，金钱和银行业务

美国第一银行的宪章于1811年到期。由于缺少新英格兰银行家的帮助，试图为1812年战争筹集资金的国民政府遇到了严重困难。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总统推翻了杰斐逊（Jeffersonian）先前对银行业的反对意见，并确保开设了新的国家银行。美国第二银行于1816年获得特许。其主要执行人员是费城银行家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

在19世纪初期，发生了三场经济衰退。第一个是1807年《禁运法案》的结果，该法案由于拿破仑战争而关闭了大多数国际运输和贸易。禁运使依赖欧洲贸易的城市和工业陷入萧条。其他两次低迷是在19世纪初期，伴随着显着通缩时期的萧条时期。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818年至1821年的萧条时期，当时农产品价格下跌了近50%。由英国金融危机引起的信贷紧缩使大笔钱从美国撤出。美国银行也与它签订了贷款合同。农产品价格从1815年的高点下降到1821年的低点，降幅近50%，直到1830年代末才恢复。最具破坏性的是美国主要出口棉花的价格。

第三次经济下滑是在1837年恐慌之后的1830年代末至1843年的萧条时期，当时美国的货币供应量收缩了约34%，价格下降了33%。这种收缩的幅度仅与大萧条相提并论。1837年恐慌的根本原因是墨西哥银矿的枯竭。尽管通货紧缩和萧条，但从1839年到1843年，GDP增长了16%，部分原因是人口的快速增长。

为了抑制土地投机活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于1836年签署了行政命令，即《通函》，要求出售政府土地时要用金和银支付。在新奥尔良的分支造币厂；佐治亚州达洛尼加；以及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Charlotte）于1835年获得国会授权，并于1838年开始运作。

英格兰正在从美国撤出黄金，银也被撤出了美国，因为1834年的“铸币法”相对于黄金低估了白银的价值。运河工程开始失败。结果就是1837年的金融恐慌。1838年发生了短暂的恢复。商业周期回升发生于1843年。

十九世纪中叶

19世纪中叶是向工业化过渡的时期，尤其是在东北，那里生产棉纺织品和鞋。西部人口（通常指从俄亥俄州到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爱荷华州和密苏里州，南部则包括肯塔基州）的人口迅速增长。西部主要是谷物和猪肉的产区；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附近发展着重要的机床工业。南部经济以种植园农业为基础，包括棉花，烟草和糖。

市场经济和工厂体系在1850年以前并不典型，但沿运输路线发展。在本世纪初引入的汽船和铁路，已经广泛普及并向西扩展。电报机于1844年推出，到1850年代中期被广泛使用。

机床工业发达，机械成为主要工业。缝纫机开始生产。制鞋业变得机械化。马拉收割机被广泛引入，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内战之后，用于制造的蒸汽机数量增加，蒸汽动力超过水力。煤炭取代木材成为主要燃料。

铁路，电报，机械和工厂的结合开始创造工业经济。

美国最长的经济扩张发生在1841年至1856年的无衰退时期。一项2017年的研究将这种扩张归因于“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之后运输商品投资的繁荣”。

铁路

铁路开辟了偏远地区，并大大降低了运输货物和乘客的成本。到1860年，长途散货运价下降了95%，其中不到一半是由于价格普遍下跌所致。运输成本的大幅下降引发了“国内商业的重大革命”。

随着交通的改善，新市场不断开放。铁路极大地提高了亚特兰大，比林斯，芝加哥和达拉斯等枢纽城市的重要性。

铁路是一项高度资本密集的业务，每英里的典型成本为30,000美元，其范围取决于地形和其他因素。1830年至1860年期间，铁路的私人资本不足。州授予宪章，资金，税收减免，土地赠款，并提供了一些资金。在某些

州，铁路被授予银行特权和彩票。私人投资者提供了少量但并非微不足道的股份或铁路资本。国内外投资与黄金的发现以及美国公共和私人财富的重大承诺相结合，使该国得以发展大规模的铁路系统，为该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按州组划分的铁路里程增长（英里）

	1850年	1860年	1870年	1880年	1890年
新英格兰	2, 507	3, 660	4, 494	5, 982	6, 831
中间国家	3, 202	6, 705	10, 964	15, 872	21, 536
南方州	2, 036	8, 838	11, 192	14, 778	29, 209
西部州和地区	1, 276	11, 400	24, 587	52, 589	
	62, 394				
太平洋沿岸州和地区	23	1, 677	4, 080	9, 804	
美国总计新铁路线	9, 021	30, 626	52, 914	93, 301	
	129, 774				

铁路高管们发明了用于大规模商业运营的现代方法，创造了所有大公司基本上都遵循的蓝图管理标准。由于这些根本性的创新，铁路成为了第一个大型商业企业和大多数公司的典范。铁路几乎创造了美国的每一个主要行业：煤炭，石油，天然气，钢铁，木材，农业设备，谷物，棉花，纺织工厂，加州柑桔。

钢铁工业

19世纪中叶最重要的技术创新是采用热风技术，该技术于1828年在苏格兰开发并获得了专利。热风技术是一种利用高炉废气中的热量预热燃烧空气的方法，可节省大量的燃料。它导致更高的熔炉温度并增加熔炉的容量。热风技术使得高炉可以使用无烟煤或低品位煤。

铁被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在1860年，大量的消费者使用了多种类型的铸件，尤其是炉具。在生产的3200万美元的棒材，薄板和铁路用铁中，铁路用铁略少于一半。

煤炭取代木材

在十九世纪中叶，煤炭取代了木材。1840年，木材是主要燃料，而煤炭产量却很小。在1850年，木材消耗了90%的燃料，其中90%用于家庭取暖。到1880年，木材仅占燃料消耗的5%。铸铁炉灶，低效的壁炉，用于加热和烹饪。木材是土地清理的副产品，被放置在沿河两岸的汽船上。到本世纪中叶，森林已经枯竭，而汽船和机车则使用了足够的木材，造成沿途的木材短缺。但是，铁路，运河和通航的内部水道能够以远低于木材成本的价格将煤炭推向市场。在辛辛那提，煤炭的售价为每蒲式耳（94磅）10美分，在新奥尔良的煤炭为14美分。

制造业

在19世纪中叶，制造业逐渐成熟。在美国，劳动力成本高昂，工业界竭尽全力通过使用机械来实现节约。约瑟夫·惠特沃思（Joseph Whitworth）报道，诸如圆锯，高速车床，刨床和榫眼机之类的木工机械以及其他各种机械使英国游客感到惊讶。

在19世纪初期，机械主要由带有铁零件的木材制成。到上世纪中叶，机器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铁，这使它们能够以更高的速度和更高的精度运行。对机械的需求导致了机床行业，设计和制造车床，刨床金属，塑造等精密金属切削刀具。

制鞋业是从1840年代开始的第二个机械化的产业。缝纫机是为缝制皮革而开发的。一台皮革滚压机消除了手工锤击，速度提高了三十倍。Blanchard车床在1850年代开始用于制造鞋模，从而可以制造标准尺寸的鞋。

到1850年代，缝纫机的开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有几家公司根据许多专利来制造缝纫机。1856年，缝纫机组合项下合并了多项重要专利，每台售出的机器按固定费用许可专利。

缝纫机行业是机床和联邦军械库开发方法的受益者。到1860年，两家缝纫机制造商开始使用可互换零件。

缝纫机将缝制布的生产率提高了5倍。

在1860年，就雇用的工人，资本投资和生产的产品价值而言，纺织业是最大的制造业。那一年，美国有500万锭纺纱。

蒸汽动力

财政部1838年的蒸汽机报告是直到1870年人口普查之前对蒸汽功率最有价值的调查。根据1838年的报告，估计有2,000台发动机总计40,000马力，其中64%用于运输，主要用于汽船。

科利斯蒸汽机，于1848年获得专利，被称为詹姆斯·瓦特蒸汽工程以来最显著的发展。Corliss发动机比以前的发动机效率更高，并且响应于负载变化而保持了更均匀的速度，使其适用于多种工业应用。这是第一台适用于棉纺的蒸汽机。

在19世纪后期，随着大型工厂的兴起，蒸汽网络的扩大以及早期的电气照明和电气街道和铁路，蒸汽动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汽船和轮船

美国西部河流上的汽船从1830年的187艘增加到1860年的735艘。美国汽船的总登记吨位从1830年的63,052艘增加到1860年的770,641艘。

在引进铁船之前，美国船只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国船只的设计要求较少的

船员进行操作。美国造船的成本是欧洲造船成本的40%至60%，而且使用寿命更长。

螺旋桨于1841年在安大略湖上进行了测试，然后在远洋船上使用。螺旋桨于1845年开始在大湖区船上使用。铁制船变得普遍，并且开发了更高效的多重扩展引擎。引进铁船之后，英国成为主要的造船国。美国试图通过建造木制快船来竞争，这种快船快，但是太狭窄了，无法运送大量的低价值货物。

电报

国会批准了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特区的一条简短示范电报线的资金，该电报线于1844年投入运营。该电报很快被铁路行业采用，铁路行业需要快速沟通以协调火车时刻表；避免火车碰撞的重要性凸显了这一点。电报于1841年在Western Railway上运行。铁路还需要通过庞大的网络进行通信，以便跟踪货物和设备。因此，铁路在其现有的通行权上安装了电报线路。到1852年，美国的电报线路已经达到22,000英里，而铁轨的里程为10,000英里。

城市化

到1860年，在内战前夕，有16%的人居住在2500人或以上的城市，而全国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制造业。城市化工业主要限于东北地区。棉布生产是主导产业，鞋子，羊毛服装和机械的生产也在扩大。新工厂中的大多数工人是移民或他们的孩子。在1845年至1855年之间，每年约有30万欧洲移民

到来。许多人留在东部城市，特别是工厂镇和采矿营地，而那些有农场经验和一些积蓄的人则在西部购买了农场。

农业

在战前时期，美国提供了英国80%的棉花进口。就在南北战争之前，棉花的价值占从美国出口的所有商品的61%。

随着新铁路的发展，农业经济向西扩展到了高产的心脏地带；西部的人口和谷物产量都大大增加了。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由于欧洲收成不佳而导致谷物价格上涨，乌克兰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谷物价格也有所上涨，但是当战争结束时，美国对欧洲的出口急剧下降，压低谷物价格。较低的谷物价格是1857年恐慌的原因。恐慌过后，棉花和烟草价格回升。

农业是最大的单一产业，在战争期间兴旺起来。价格高涨，这是由于军队和英国的强劲需求拉动的，而英国的粮食进口量依赖美国小麦的四分之一。

约翰·迪尔（John Deere）于1837年开发了一种铸钢犁，该犁很轻，并且有一个刮土板，可以有效地翻倒和撒下犁过的土地。一匹马很容易拉扯，非常适合切割中西部厚厚的草原草皮。他和他的兄弟查尔斯（Charles）创立了迪尔公司（Deere and Company），该公司持续到21世纪，是最大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收割机和其他农具的制造商。

脱粒机在18世纪末是一种新颖事物，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开始广泛使用。机械化脱粒所需的劳动少于手工脱粒的一半。

内战起到了促进作用，促使人们迅速采用了马拉机械和其他工具。即使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参军，收割机器和割草机等新发明的迅速普及也使劳动力队伍变得高效。许多妻子代替了他们的位置，并经常通过邮件向他们咨询如何做；他们越来越依赖社区并扩大亲属的意见和帮助。

1862年的《宅基法》免费开放了公共领域的土地。铁路的土地赠予意味着他们可以以低廉的价格向家庭农场出售大片土地（80至200英亩），并提供长期信贷。此外，政府还通过新成立的农业部和《莫里尔土地补助学院法》（Morrill Land Grant College Act）赞助了大学的建设，促进了科学方法和最新技术的传播。

奴隶劳动

1860年，有450万非洲裔美国人，其中400万是奴隶，价值30亿美元。它们主要归南方棉花和甘蔗种植商所有。在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估计农场价值的60%为奴隶，土地和建筑物不到三分之一。

在1857年的恐慌之后，许多北方工厂工人失业，到了为获得面包而暴动的地步，奴隶制的支持者指出，与许多自由工人相比，奴隶通常有更好的饮食和更好的生活条件。据估计，奴隶获得的估算工资比自由市场高出

15%。

金融，金钱和银行业务

美国第二银行宪章到期后，联邦收入从1846年开始由独立财政部处理。美国第二银行也对其他银行保持了一定的控制权。

银行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纸币的过度发行。当人们对银行失去信任时，他们急于赎回其票据，并且由于银行发行的票据超过了其储备金，银行无法赎回这些票据，常常导致银行倒闭。1860年，有8,000多家州立特许银行发行票据。1861年，美国开始发行美国纸币作为法定货币。

银行开始支付存款利息，并将所得款项用于主要向股票经纪人提供的短期看涨贷款。

纽约银行在1853年成立了票据交换所协会，会员银行在本周结束时与其他城市银行共同结清帐户。票据交换所协会还处理了该国其他地区银行的票据。该协会能够检测到由于无法结算而发行过多票据的银行。

1857年的恐慌

恐慌是由备受赞誉的俄亥俄人寿保险与信托公司（Ohio Life Insurance

and Trust Co) 于8月24日倒闭引发的。纽约市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纽约分行的一名经理挪用了资金，并提供了过多的贷款。该公司总裁宣布中止赎回实物货币，这导致人们急于赎回钞票，导致许多银行因缺乏实物货币而倒闭。

美国一直存在贸易逆差，将黄金排到国外。由于关税收入，美国财政部持有大量黄金，这使黄金无法流通。9月12日，“中美洲SS号船”背负着来自加利福尼亚的150万美元黄金沉没海底，沉船事件引发了恐慌。财政部长霍威尔·科布 (Howell Cobb) 通过回购一些国家债务来资助纽约的商业利益。9月25日，宾夕法尼亚银行暂停了实物支付，开始导致了全国性的银行挤兑。

当银行不得不调用向股票经纪人提供的贷款时，计息存款的危险变得很明显，其中许多人无法付款。然后，银行不得不减少对商业和工业客户的信贷。许多企业无法偿还工人的工资，因为他们持有的钞票现在已经一文不值。

中断了俄罗斯小麦出口的克里米亚战争于1856年结束。这场战争造成了小麦价格居高不下和美国的过度扩张，而美国一直在向欧洲出口小麦。1857年西部地区丰收，导致谷物价格下跌。英格兰，法国和俄罗斯的丰收导致1858年和1859年美国谷物需求暴跌。这导致西部各州的铁路运输量下降，导致部分铁路破产。

西部各州无力出售农作物，这伤害了其他地区的业务，例如新英格兰地区，该地区生产的鞋子在西部各州销售。棉花和烟草价格下跌，但与谷物不同，价格很快就恢复了。

恐慌使许多北方工薪族失业，大部分是暂时的，但高失业率持续了几年。

移民潮

大饥荒（爱尔兰）之后，欧洲向美国的移民激增。在1850年代的十年间，大约有300万移民。他们主要来自德国，爱尔兰和英国。

内战经济

联盟

战争期间，联盟经济增长并繁荣起来，同时部署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和海军。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对工业国家抱有怀旧的愿景，拥有大城市，高效率的工厂，生产性农场，所有国家银行，都由现代铁路系统编织在一起，由铁路动员美国军事。南方曾抵制诸如关税以促进工业发展和抵制宅基地法以促进农业之类的政策，因为奴隶制不会受益。在南方消失而北方民主党人软弱的情况下，共和党制定了立法。同时，他们通过了新的税收来支付部分战争费用，并发行了大量债券来支付其余大部分费用。经济史学家将剩余的战争成本归因于通货膨胀。国会制定了详尽的经济现代化计划，其双重目的是赢得战争并永久改变经济。

在1860年，财政部像是一家小型企业，通过低价的土地销售和关税来为政府提供资金。与全面战争的费用相比，和平时期的收入微不足道，但是萨蒙·P·蔡斯（Salmon P. Chase）掌管的财政部在资助战争而又不削弱经济的情况下表现出了非凡的独创性。征收了许多新税，而且总是以爱国为主题，将经济上的牺牲与生命和肢体上的牺牲进行了比较。政府以官方货币购买了物资，这鼓励人们向政府出售商品，而不论其政治立场如何。总体而言，北方金融体系在筹集资金和将爱国主义转化为利润方面非常成功，而南方同盟体系使其支持者陷入贫困。

美国需要31亿美元来支付为对抗内战而筹集的庞大军队和舰队，仅在1862年就超过了4亿美元。除关税外，迄今为止最大的收入来自对每种制成品征收的新消费税。其次是通过若干莫里尔关税法提高了关税。第三是国家征收的第一笔个人所得税。只有有钱人付了钱，战争结束时它就被废除了。

土地赠款

美国政府拥有大量的优质土地（主要来自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和1846年与英国签订的俄勒冈条约）。挑战在于使土地对人民有用，并为将用来偿还战争债务的财富提供经济基础。土地赠款给了铁路建设公司，以开拓西部平原并与加利福尼亚州相连。加上《宅基法》向农民提供的免费土地，土地赠款提供的低成本农地加速了西部商业农业的发展。

1862年的《宅基法》免费开放了公共领域的土地。铁路的土地赠予意味着他们可以以低廉的价格向家庭农场出售大片土地（80至200英亩），并提供长期信贷。此外，政府还通过新成立的农业部和《莫里尔土地补助学院

法》（Morrill Land Grant College Act）。

北方相对于南方的工业优势帮助确保了北方在美国内战（1861-1865年）中的胜利。北方的胜利印证了国家及其经济体系的命运。工业家开始统治国家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社会和政治事务。

政治发展

从1830年代到1860年，国会一再拒绝辉格党提出的提高关税的呼吁，以及其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其中包括加强国家控制，监管和基础设施的宏观经济发展。例如，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没有续签美国第二银行的章程。内战之前，关税一再降低。资助西部大型铁路项目或为宅基地提供免费土地的提议遭到南方人的反对，他们担心这些政策会加强北方。内战改变了一切。

从1775年到1855年，向美国退伍军人发放了赏金土地令。土地赠款被广泛用于解决密西西比河以东的路易斯安那州购买土地，包括俄亥俄州，西北地区 and 密苏里州。

在1850年至1871年之间，大约有1.8亿英亩土地被授予了铁路建设公司。1850年的《土地补助法》规定向各州提供375万英亩土地，以支持铁路项目；到1857年，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铁路已经使用了2100万英亩的公共土地，并且已经为国会对未来的铁路提供了更大的补贴奠定了基础。

《太平洋铁路法》首次通过直接向公司授予土地来资助了几条跨大陆铁路。除了营业收入外，铁路还可以通过出售靠近铁轨的已授予财产来为跨远距离的网络筹集资金。由于容易获得长途运输，这些将成为新定居者和企业的理想之地。

从1860年开始的《莫里尔土地授予法》使高等院校受益。

各种《宅基法》几乎免费地分配了土地，以换取诸如建造房屋，种田或种树的改善。从1862年到1934年，联邦政府发放了160万户宅基地，并分配了2.7亿英亩（420,000平方英里）的联邦土地私有化。这是美国全部土地的10%。下一个此类计划的实施在1986年结束，是在阿拉斯加。土地局在1850年至1900年期间在美国西部实现了约1亿英亩的直接销售，使养牛业者和投机者受益。

教育

英国议会委员会成员约瑟夫·惠特沃斯和乔治·沃利斯对美国工人的教育水平印象深刻，他们评论说：“…… 每个人都可以阅读……信息渗透到社会的最低阶层。”

19世纪末

工商业和农业

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进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阶段，在此期间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到1895年，美国的制造业产值超越英国。第一次，机械和消费品的出口变得很重要。例如，标准石油在出口煤油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俄罗斯是其国际贸易的主要竞争对手。辛格公司（Singer Corporation）引领了其缝纫机全球营销战略的发展。

使用新的炼钢工艺生产的廉价钢轨，大大扩展了铁路网络，大大降低了无法通航水道的地区的运输成本。低运费使大型制造设施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性。机械成为一个大产业，并且开发了许多类型的机械。企业能够在广阔的区域内开展业务，并建立了连锁店。邮购公司开始运营。

公司创建了新的管理系统以大规模开展业务。公司整合了流程，以消除不必要的步骤并消除中间商。

发生了许多新发现和新发明，这一过程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电灯，电话，蒸汽轮机，内燃机，汽车，留声机，打字机和制表机是这一时期的许多发明中的一些部分。发明了制造钢铁和化学制品的新工艺，例如染料和炸药。充气轮胎，改进的滚珠轴承，机床和最新开发的金属冲压件技术使1890年代的自行车得以大规模生产。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在1890年代广泛引入了电动街道铁路（无轨电车或有轨电车）。

运输的改善和其他技术进步导致价格下跌，特别是在所谓的长期萧条时期，但由于开采的黄金和白银数量上升，最终导致1890年代及以后的通货

膨胀。

美国十大主要产业的增加值（以1914年的百万美元计）

1860年		1880年		1900年		1920年	
行业	增值	行业	增值	行业	增值	行业	增值
棉制品	59	机械	111	机械	432	机械	576
木材	54	铁和钢	105	铁和钢	339	铁和钢	493
靴子和鞋子	53	棉制品	97	印刷出版	313	木材	393
面粉和饭	43	木材	87	木材	300	棉制品	364
男士服装	39	靴子和鞋子	82	服装	262	造船	349
机械	31	男士服装	78	酒	224	汽车行业	347
毛纺品	27	面粉和饭	64	棉制品	196	杂货店建设	328
皮具	24	毛纺品	60	砌体和砖	140	印刷	268
出版	268						

铸铁 23	印刷 58	杂货店建设 131	电气机械 246
印刷 20	酒 44	肉类包装 124	服装 239

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铁路在新轨道上取得了最大的增长。在这段时间里，铁路也获得了高生产率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采用了使钢价格便宜的新工艺。钢轨的使用寿命大约是铁轨的十倍。随着钢价下跌，钢轨变得越来越重，这使机车变得更重，更强大，可以拉动更长的火车。钢制的钢轨车厢可以制造得更长一些，并且机车车厢的载重与机车车厢的重量比为2：1，是铁质机车车厢的两倍。

1890年，戴维·埃姆斯·威尔斯（David Ames Wells）估计，公路货车运输每吨英里的成本为16美分，而铁路运输量每吨英里的成本不到1美分。

铁路通过扩大路线而在乘客和货运方面展开激烈竞争，这种路线常常变得越来越利润边缘化。竞争和市场承受力驱使扩张所需的高资本加上低利率，导致铁路铁道破产的比例很大。

1881年推出了一种实用的冷藏（冰冷却）铁路车。这使得运输牛肉和猪肉成为可能，其重量仅为活体动物的40%。古斯塔夫·富兰克林·斯威夫特（Gustavus Franklin Swift）开发了一个综合的网络，包括牛的采购，屠宰，肉类包装以及将肉类运往市场。斯威夫特发展了一项大型业务，随着一些竞争对手的加入，其规模不断扩大。

钢铁

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钢铁成为领先的行业，其增加值排名第二，而机械则排名第一。贝塞麦过程用于生产钢，这是能够以低成本做的第一件大规模生产项目。美国第一家获得许可的Bessemer工厂于1865年开始运营。Bessemer钢主要用于铁路。由于难以控制质量和因时效而变脆，因此Bessemer钢不适合用于建筑结构目的。

西门子-马丁工艺（或称为平炉工艺）生产了合适等级的结构钢。1880年代，用开放式炉膛钢取代了锻铁作为结构材料。开放式炉底钢开始用于各种应用，包括高层建筑，船舶，机械，管道，铁路和桥梁。

电灯和电街铁路

早期的电气化太有限了，以至于无法对19世纪后期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由于燃料到动力的转换效率低，发电厂规模小以及大多数公用事业公司仅提供夜间服务，因此电价也非常昂贵。引入交流电动机后，白天服务在20世纪初期变得很普遍，这种交流电动机在白天通常会使用更多，以平衡负载。在此之前，产生了大量电力应用，例如工厂，旅馆或电气街铁路（电车或有轨电车）。

1888年，弗兰克·斯普拉格（Frank J. Sprague）设计并建造了第一个实

用系统，即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里士满联盟客运铁路，在美国引入了电街轻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电街轻轨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城市。

早期的电气街轻轨公司通常自己产生电力，也可以作为电力公用事业运营，这可以平摊日常负荷。

直到1880年代初，电力主要用于电报和电镀。高效的发电机于1870年代问世，1879年以后开始用于为碳弧灯供电。1880年，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发明了一种长效白炽灯泡和一种用于分配电力的系统。1882年，他在曼哈顿开设了珍珠街电站，这是美国第一个中央电站。

使用直流电会由于功率损耗而对距离的传输施加严格的限制。使用直流电无法将功率转换为高压，这将减少电流并降低传输损耗。可以安全地产生大约2000伏的电力，但这对于家庭使用来说是一个危险的电压。使用交流电可以使用变压器来改变电压的大小。交流电源在1890年代开始广泛使用。

通讯

在1858年第一条寿命短的跨大西洋电报电缆失效后，第二条更耐用的电缆于1865年完成，将新斯科舍省与英格兰连接起来。到1890年，已经有了一个国际电报网络。

自1876年发明电话以来，还需要进行其他开发工作才能使其在商业上可行。第一批电话用于拨打本地电话。长途电话在1890年代应运而生，但是进行跨大陆呼叫的技术直到1915年才投入使用。

自动电话交换功能于1892年问世，它消除了电话接线员在电话总机上手动接通本地电话的麻烦。然而，它几十年来并没有广泛传播。

现代企业管理

在铁路业之前，大多数企业都是由独资经营或合伙经营。业主通常负责日常运营。铁路行业是第一个采用现代业务管理实践的企业，以响应在广阔地区运营，保持连续的长途通信，管理复杂的网络，跟踪火车和货运的需求。铁路公司聘请了专业经理，并将工作划分为多个公司部门，并制定了组织图。

另一个现代业务创新是垂直整合，垂直整合使公司扩展到业务的各个阶段，从生产原材料到将其加工成可销售的产品再到销售成品。钢铁和石油工业中有明显的例子。

农业

农业发生了戏剧性的扩展。农场的数量增加了两倍，从1860年的200万增加到1905年的600万。住在农场的人数从1860年的大约1000万增加到1880年的2200万，再到1905年增加到3100万。农场的价值从1860年的80亿美元增

加到1906年的300亿美元。

联邦政府根据1862年的《宅基法》向定居者免费发放了160英亩（65 公顷）的土地。甚至更多的定居者从试图建立市场的新铁路上以非常低的利率购买了土地。铁路公司在欧洲做了大量广告，以低廉的价格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北欧的农民。

尽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普遍的繁荣，但19世纪的美国农民经历了反复的苦难循环，这主要是由于世界棉花和小麦价格下跌所致。

随着机械技术的进步，单位面积的单产大大增加，整个世纪下半叶，随着铁路开辟了西部新的定居地区，耕地的数量迅速增长。从1876年到1881年，当欧洲的歉收使世界价格居高不下时，小麦农户获得了丰厚的产量和丰收的佳年。然后，当欧洲的状况改善时，他们在1880年代遭受了低迷。在南北战争到本世纪末之间，各种类型的马收割机的销售量急剧增加。收割机的改进包括自动割草机，该割草机允许单人操作，并且结合了收割机和捆扎机功能。

联邦土地赠款帮助每个州建立了农业学院和推广代理人网络，向农民展示了现代技术。

石油，矿产和采矿

在1850年代，照明的进步是将煤油灯与玻璃烟囱一起使用，以相对可承受的价格生产了高质量的灯。煤油照明有效地延长了白天的时间，使夜间阅读更容易。塞缪尔·基尔（Samuel Kier）也从宾夕法尼亚州的原油中蒸馏出了煤油。

乔治·比塞尔（George Bissell）从宾夕法尼亚州看到了“岩油”的样本。他怀疑该油可能具有发光作用和润滑作用，因此组织了一个投资人小组。1853年，比塞尔（Bissell）的小组改名为宾夕法尼亚州岩石油公司（Pennsylvania Rock Oil Co.），聘请耶鲁大学化学教授本杰明·西里曼（Benjamin Silliman, Jr.）进行“岩石油”分析。西里曼（Silliman）在1864年4月的报告中指出，“岩石油”可以产生极好的照明油。但是，没有经济的方法可以生产足够的商业数量的石油。

在股东意见分歧之后，比塞尔和其他投资者乔纳森·埃弗莱斯（Jonathan Eveleth）于1858年成立了塞内卡石油公司。该公司聘请了股东埃德温·德雷克（Edwin Drake）进行石油钻探。选择钻探的地点是在宾夕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附近的Oil Creek上，那里有一口水井正在生产石油。德雷克选择使用自1820年代后期到达西方以来的远古时代以来在中国使用的盐水井钻井技术，只是德雷克使用铁缆，铁井套管和蒸汽机。1858年8月27日，德雷克井（Drake Well）在69.55英尺的深度出油，从而在该地区开始了钻探工作。

开工的众多炼油厂中，有几条沿新铁路线通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他的合伙人莫里斯·克拉克

（Maurice Clark）在那里拥有杂货运输业务。洛克菲勒和克拉克也涉足了炼油业务，1865年，合作伙伴决定在两者之间举行一次私下拍卖，洛克菲勒成为中标者。炼油业竞争异常激烈，到1869年，产能已达到所需容量的三倍，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炼油厂数量达到6000家。

1870年，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其兄弟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亨利·弗拉格勒（Henry Flagler），奥利弗·伯尔·詹宁斯（Oliver Burr Jennings）和合伙人史蒂芬·V·哈克尼斯（Stephen V. Harkness）组成了标准石油公司。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是系统计划的总体规划者和组织者，该系统计划与竞争对手形成合并或收购竞争对手，并进入石油工业的各个阶段，从生产到运输，精炼和分销，这就是垂直整合。标准石油公司寻求超越其竞争对手的所有可能优势。一种方法是利用Standard的高运输量来确保铁路的折扣费用。到1879年，标准石油控制了美国炼油能力的90%。Standard继续垄断美国的石油工业，直到1911年最高法院新泽西石油诉美国的Standard Oil Co. 案将其打破。

从1880年代开始，高效的气罩和电照明侵蚀了照明油市场。然而，以前低价值的炼油副产品是汽油，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20世纪初期煤油的作用。

煤炭

从宾夕法尼亚州南部到肯塔基州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大量发现了煤炭。

铁矿石

在中西部上部的苏必利尔湖地区开设了大型铁矿。钢铁厂在可以将这些煤和铁矿石聚集在一起生产钢铁的地方蓬勃发展。大型铜银矿山开业，随后是铅矿山和水泥厂。

金融，金钱和银行业务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的衰退。1869年的经济衰退是由股市恐慌导致的，股市恐慌使股票价格下跌了20%，并将小麦价格短暂地削减了一半。这是美国经济史上最短和最温和的衰退之一。

1873年的恐慌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最长的萧条之一，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各个方面，并使铁路扩张停滞不前。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闭了十天。在该国的364条铁路中，有89条破产，在1873年至1875年之间共有18,000家企业倒闭，到1876年失业率达到14%，这一时期在英国被称为长期萧条。从政治上讲，民主党于1874年控制了国会，1876年的选举陷入僵局。

镀金时代的结束恰逢1893年的恐慌，这场严重的萧条一直持续到1897年。西部和南部的小麦和棉花种植者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并走向激进主义。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被迫要求华尔街银行家帮助保持美国财政部的流动性。农业发言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呼吁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即使用廉价白银有效替代昂贵的黄金。在1896年的选举中，布莱恩（Bryan）在一次重大政治调整中失

败，转而支持保守派亲金的共和党人。

供水和下水道

到1870年代中期，欧洲已经安装了大量的供水和下水道基础设施。1880年，只有0.3%的城市家庭使用了滤水器，这一数字在1890年上升到1.5%，在1900年上升到6.3%。

工会

美国工人运动始于1869年第一个重要的工会：劳动骑士团。骑士团在1880年代垮台，并由强大的国际工会取代，这些工会联合起来组成了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领导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工会为拒绝社会主义而与业主谈判，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联盟的增长一直缓慢持续到1900年，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顶峰。

政治发展

由于担心铁路的不公平做法，例如运费有利于某些托运人，导致产生了1887年的《州际贸易法》，该法案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监管机构，即州际贸易委员会。

20世纪初

经济增长与1910年突破

1890年至1910年是经济增长超过4%的时期之一，部分原因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但是，从1910年到1929年，增长率急剧下降至2.8%左右。经济学家不确定是否由供求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的，但生产率增长强劲，使得单位产出的人工成本从1910年到1929年以工作小时数计算的增长率下降了57%，而产出增长率则下降了27%。人们普遍接受的是，新技术和更有效的商业方法永久性地改变了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劳动力处于过剩状态。1910年以后普及的技术，例如电气化，内部动力运输和批量生产，节省了资金。由于建筑投资减少，1910年后非住宅固定业务总额下降。

工业，商业和农业

在早期的几十年中，广泛采用了该世纪的两种最具变革性的技术：电气化，由高压锅炉和蒸汽轮机提供动力，以及由内燃机提供动力的汽车和卡车。

连锁店发展迅速。

商务部敦促对床罩和螺丝钉等消费品进行标准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布了简化的标准化程序。

电气化

电气化是20世纪初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之一。电力工厂的革命性设计导致了制造业生产率最高的时期。电力行业增长迅速，电力生产率也很高。

20世纪初，电力主要用于照明，大多数电力公司都不提供白天服务。白天使用的电动机，例如为街道铁路提供动力的直流电动机，有助于平衡负载，许多街道铁路公司自己产生电力，也可以作为电力公司使用。

美国的电气化始于1900年左右的工业，到1930年，工业中约80%的能源用于电力。带有使用蒸汽轮机的中央发电站的电力公司大大降低了电力成本，城市中的企业和房屋也变得电气化。在1900年，只有3%的家庭有电，到1930年增加到30%。到1940年，几乎所有城市家庭都有电。诸如熨斗，炊具和洗衣机之类的电器逐渐被家庭所采用。家用机械冰箱于1919年问世，但到1930年，这种冰箱仅进入8%的家庭，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成本很高。

电力行业的生产率增长很高。1913年后开始建造许多配备高压锅炉和蒸汽涡轮发电机的大型中央电站。这些中央电站的设计目的是有效地处理从铁路场到输送机系统的煤炭。它们还具有更高的燃油效率，将每千瓦时的电量耗煤减少到原来的一小部分。1900年，7磅煤才能产生1千瓦时的电能。1960年是0.9磅/千瓦时。

制造业

20世纪初期的几十年中，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归因于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

工厂电气化彻底改变了制造业。单元驱动，这意味着使用单个电动机为单个机器提供动力，省去了以前用于传输少量蒸汽机或水轮机动力的线轴。线轴对建筑物的布置产生了限制，阻碍了物料的有效流动，因为它们带来了交通障碍，并且需要多层建筑才能经济。大型制造厂拥有许多英里的生产线轴并不少见。就能源效率和操作员的关注难度而言，电动机比蒸汽机更经济地运行。电动机的资本成本也较低。

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 Taylor）是19世纪后期在科学管理领域最著名的先驱，他精心安排和规划了各种工人的职能，然后为他们设计新的，更有效的工作方式。福特汽车公司使用科学管理技术，尽管亨利·福特声称不了解泰勒的系统。福特汽车竭尽所能减少工人的工作量和移动量，以减少制造零件，移动零件和将零件组装到汽车中所需的时间。福特使用了电动工厂，1913年福特引入了生产线，这一过程中被称为批量生产。福特T型车的价格从1908–1909年的900美元下降到1916年的360美元，尽管工人工资翻了一番，在1914年每天达到5美元。产量从1909年的13,840增加到1916年的132,702。T型工人的人均产量增长了150%。

福特向工人提供了非常丰厚的工资（每天5美元），他认为，如果普通工人买不到这些商品，那么大规模生产企业将无法生存。

引入了汽油动力拖拉机。在1917年开始批量生产。

电动街道铁路

电动街道铁路已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交通方式，而城际电气服务则连接了东北和中西部的许多城市。电动街道铁路也运载货物，这在卡车被广泛引入之前很重要。在1920年代，汽车和电动客车的广泛采用阻止了电街铁路的扩张。

电化学

电化学物质是通过电解过程产生的化学物质和金属。重要的例子包括通过Hall-Héroult工艺制造的铝以及氯和苛性碱（钠和钾的化合物）。氯和苛性碱是通过化学方法生产的，但是以这种方式生产铝的价格过高。1888年，在美国匹兹堡开设了一家采用Hall-Héroult工艺的大型工厂，并在全球范围内开设了其他工厂。20世纪初电价下跌大大降低了电化学的制造成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随后的商用航空业对飞机的铝需求很高。

其他一些电化学物质是铬，锰和钨。

氯开始用于处理家庭用水以杀死微生物。

铁路

20世纪初，铁路网络已经过分扩展，出现了许多英里的无利可图的路线。1906年，国会授予州际商务委员会监管运费的权力，该行业无法增加收入以弥补不断上涨的成本。到1916年，铁路里程达到了顶峰，全国铁路里程的六分之一破产了。

事实证明，铁路不足以弥补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货运量增加。系统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关键的供应出现延误。1917年12月，铁路被政府接管，并由美国铁路管理局（USRA）进行控制。USRA订购了1,930台新的标准化蒸汽机车和100,000余辆火车。USRA对铁路的控制权于1920年3月结束。

汽车和卡车

到20世纪初，汽车已开始取代马拉的马车。许多公司都在制造汽车，但汽车制造却充满挑战。因此，价格高而产量低。1910年代中期的批量生产技术降低了汽车的成本，销售额急剧增长。到1919年，汽车注册量为660万，卡车注册量为898,000。

用汽车和卡车代替马匹可以消除城市街道上大量的马粪和尿液，从而大大减少了街道清洁工作，并改善了卫生条件和生活条件。减少了运输用马的数量，使之减少了所需农田的代价。

公路系统

1900年，美国城市以外的柏油路只有200英里。到1920年代后期，汽车逐渐普及，但是连接城市的高速公路却很少。联邦道路建设计划于1818年结束，直到1916年《联邦道路法》颁布之前，各州一直在修建道路。1926年，当州际计划（不要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国家道路系统相混淆）开始了国家高速公路系统建设时，州际公路和国防公路开始，此时有2310万辆汽车和350万辆卡车。当美国于1941年12月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该系统几乎完成。

供水和下水道

在世纪之交，大约三分之一的城市家庭拥有自来水。然而，大多数未经处理并携带引起疾病的微生物。水处理厂的广泛建设以及向城市家庭进出水的管道是在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发生的。供应自来水的城市家庭数量从1900年的6.3%增加到1910年的25%和1925年的42%。1908年，新泽西州的泽西市自来水厂率先使用次氯酸钠对水进行消毒（氯漂白剂）。到1930年代，饮用水的氯化已成为城市供水中的普遍现象，并导致许多疾病的急剧减少，例如甲型肝炎，伤寒，霍乱和痢疾。

农业

拖拉机出现在农场上，农民开始使用汽车和卡车拖运农产品。与使用黏合剂和固定式脱粒机相比，联合收割机-脱粒机将人工成本降低了85%。在美国，农场数量有所减少。美国的农场数量已从1930年代的700万下降到2000年的200万略多一点。下降速度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最为迅速。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农场中不断增加的创新，新技术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产品，因此需要更少的农场。同样在1950到1960年代期间，人们从较大的城市和农场

迁移到郊区，因此这些较小的农场将被出售，人们将离城市更近。

通讯

电话

1900年以前，电话主要用于企业。1900年，每100户家庭的电话数量约为2台，但数量稳步增长，直到1929年达到45台的峰值，然后在1933年下降至33台。1892年引入的自动电话交换功能在未来消除了对电话交换的需求。否则，电话接线员必须手动在总机上连接本地电话。到1929年，贝尔系统的31.9%是自动交换的。

收音机

使用摩尔斯电码的无线电通信是在20世纪前十年引入的。它们的主要用途是与船进行通信。自RMS泰坦尼克号于1912年沉没后，船舶无线电就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

无线电技术迅速发展。三极管真空管使得可以制造用于广播和接收器的放大器。无线电电路设计也得到了改进，可以产生更好的信号，同时降低噪声。到1920年代初，收音机开始大量生产，并且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商业广播电台。

金融，金钱和银行业务

1906年的一次重大经济衰退终止了1890年代后期以来的扩张。随后是1907年的恐慌。1907年的恐慌是1913年成立美联储的一个因素。

1890年代的温和通货膨胀归因于采矿业的黄金供应增加；通货膨胀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期间，通货膨胀急剧上升，战时物资短缺，劳动力也短缺。战后通货膨胀率下降，但价格仍高于战前水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经济繁荣，部分原因是向欧洲销售了战争用品。股市在1916年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在1913年至1918年之间翻了一番，导致价格水平上涨。为了使战争债券的利息降到最低，利率一直保持较低水平，但是在1919年出售了最后一次战争债券之后，美联储将贴现率从4%提高到6%。利率上升，货币供应萎缩。经济进入1920-21年大萧条。到1923年，经济恢复了充分就业。

战争之后，债务激增的热潮发展了。

1920年代还存在房地产和住房泡沫，尤其是在1925年泡沫破裂的佛罗里达州。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指出，1920年代的住房建设超过了人口增长25%。

债务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股票投机将价格推至前所未有的估值水平。

1929年10月下旬，股市崩盘。

政治发展

1906年纯食品和药品法是最早的一系列立法，导致建立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同年通过的另一项此类法案是《联邦肉类检验法》。新法律帮助了大型包装商，并损害了缺乏规模经济或质量控制的小型企业。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允许联邦政府征税所得税，于1913年获得通过。

《紧急配额法》（1921年）建立了按原籍国划分的移民配额制度，根据1910年美国人口普查，一个国家的年度移民人数上限不得超过居住在美国的该国背景人数的3%。1924年的《移民法》将配额从3%减少到2%，并对某些国籍增加了其他限制。

在美国历史的早期，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都不愿让联邦政府过多地参与私营部门，但交通领域除外。总体而言，他们接受自由放任的概念，这是一种反对政府干预经济，除非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学说。这种态度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改变，当时小企业，农场和劳工运动开始要求政府代为干预。

到20世纪初，中产阶级已经发展起来，他们既对商业精英持偏见，又对中西部和西部的农民和劳工进行了激进的政治运动。这些人被称为进步主义

者，他们认为政府对商业行为的监管有助于他们确保竞争和自由经营。国会于1887年制定了一部法律，对铁路进行管制（《州际贸易法》），并于1890年颁布了一项防止大型企业控制单一行业的法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但是，这些法律并未得到严格执行，直到1900年至1920年间，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年），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3–1921）和其他同情进步派观点的人上台。在此期间，当今许多美国监管机构都成立了，其中包括州际商务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艾达·塔贝尔（Ida M. Tarbell）撰写了一系列反对标准石油垄断的文章。该系列节目为垄断的瓦解铺平了道路。

Muckrakers是记者，他们鼓励读者要求对业务进行更多的监管。厄普顿·辛克莱尔（Upton Sinclair）的《丛林》（The Jungle, 1906年）向美国展示了芝加哥联合货场（Chicago Union Stock Yards）的恐怖景象，后者是1870年代发展起来的庞大的肉类加工场。联邦政府通过新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辛克莱的书作出了回应。

威尔逊总统于1913年使用关税，货币和反托拉斯法来“启动加油站”，并使经济运转。

1913年，批准了《第十六修正案》，并在美国开始征收所得税。威尔逊解决了有关关税和反托拉斯的长期辩论，并创立了美联储（Federal Reserve），这是一种复杂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目前在金融界占主导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涉及大量的货币，税收和银行资源的动员，以支付美国的战争努力，并通过政府间借贷来支付大部分盟军的战争努力。

咆哮的二十年代：1920–1929年

在共和党总统沃伦·哈丁（Warren G. Harding）呼吁保持正常状态并结束高额战时税的背景下，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提高了关税，削减了边际税率，并利用巨额盈余将联邦债务从1920年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到1930年，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致力于通过规范商业惯例来提高效率。这段繁荣时期与当时的文化一起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刺激了石油，玻璃和道路建设等行业。旅游业猛增，有汽车的消费者购物范围更广。小城市繁荣起来，大城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十年，其办公楼，工厂和房屋兴旺发展。新的电力行业改变了商业和日常生活。电话和电力流传到农村，但农民从未从战时的土地价格泡沫中恢复过来。数百万人迁移到附近的城市。但是，在1929年10月，股票市场崩溃了，在1929年的华尔街崩溃中，银行开始倒闭。

生活质量

20世纪初期的几十年对于改善美国的生活质量而言是非凡的。住房的质量得到了改善，住房提供了更好的防寒保护。每人占用的建筑面积增加。通过建设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以及通过过滤和氯化处理饮用水，极大地改善了卫生条件。内燃机车使马离开了街道，并消除了马粪和尿液以及它们所吸引的苍蝇。食品和加工的联邦法规，包括政府对肉类加工厂的检查，有助于降低与食品有关的疾病和死亡的发生率。

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并随后持续下降。

1900年平均每周工作53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持续下降。减少了家务劳动的负担。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再需要每天将水和柴火拖入房屋。

电灯比煤油灯便宜得多，质量也更高。电灯还消除了烟雾和烟雾，并减少了火灾隐患。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29年至1945年

战前工业，商业和农业

尽管经历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20世纪中期仍是生产力增长最高的时期。通过美国工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非正式合作开展的研究迅速增长，到1930年代后期已经超过了英国进行的研究的规模（尽管美国研究的质量尚未与英国和德国当时的研究相提并论）。

制造业

从上世纪初的电气化时代开始，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有所放缓，但仍处于中等水平。随着工业对新开发的仪器和控制设备的投资，工厂自动化在上世纪几十年变得普遍起来，这使得更少的工人可以操作大型工厂，精炼厂和化工厂。

大萧条：1929–1941年

在大萧条期间，许多流离失所者移居加利福尼亚寻找工作。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在《愤怒的葡萄》中描述了这种情况。

股市崩盘后，全球经济陷入了大萧条。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开始收缩三分之一。贸易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煽动了加拿大，英国，德国和其他贸易伙伴的报复。1932年，国会担心赤字和国债的迅速增长，并提高了所得税税率。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些措施加深了本已严重的危机。到1932年，失业率为25%。重工业，伐木业，出口农业（棉花，小麦，烟草）和采矿业的情况更为恶劣。白领阶层和轻工制造业的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

消费

政府支出从1932年胡佛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8.0%增加到193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0.2%。罗斯福平衡了“常规”预算，紧急预算由债务提供资金，债务从1932年的33.6%增加到1936年的40.9%。一些经济学家建议赤字支出，最著名的是英国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罗斯福会见了凯恩斯，但没有注意他的建议。在与保持绘制图表的凯恩斯会面之后，罗斯福说：“他必须是数学家，而不是政治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处理大萧条的方法本来可以解决问题。他的方法是使美联储尽可能多地花在随机购买上的钱，但是钱必须不断增加。人们认为，如果美国通过约翰·凯恩斯计划，大萧条本可以完全避免。罗斯福总统任期结束后，联邦政府在1932年将所得税税率提高了一倍，美联储

开始增加支出。政府税收总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29年的10.8%激增至1933年的16.6%。消费和总需求减少。

银行危机

1929–1933年，经济因银行倒闭而不稳定。最初的原因是投资银行业务大量亏损，其次是银行挤兑。当大量客户对他们的（没有保险的）存款失去信心并急于提取他们的存款时，便发生了银行挤兑。挤兑破坏了许多银行的稳定性，使其面临破产的境地。在1929年至1933年之间，所有银行中有40%（23,697家银行中的9490家）破产了。大萧条的大部分经济损失是银行挤兑直接造成的。

胡佛已经考虑过采取冻结行动，以防止进一步的银行挤兑，但由于他害怕引发恐慌，因此拒绝了这一提议。罗斯福上任后立即采取了行动。他关闭了该国所有的银行，直到他可以通过新的立法为止。3月9日，罗斯福向国会发送了《紧急银行法》，该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胡佛的高级顾问起草的。该法案于同日获得通过并签署成为法律。它提供了在财政部监督下重新开放健全银行的系统，并在需要时提供联邦贷款。美联储系统中四分之三的银行在接下来的三天内重新开放。一个月内有数十亿美元的货币和黄金流入其中，从而稳定了银行体系。到1933年底，有4,004家本地小型银行被永久关闭，并合并为大型银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限制了商业银行的证券活动和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之间的从属关系，以规范投机活动。它还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该公司为最多25万美元的存款提供保险，从而消除了银行挤兑的风险。

失业

在1932-1933年最糟糕的日子里，失业率达到25%，但分布不均。与男性相比，妇女在非耐用行业（如食品和服装），服务和销售以及政府工作中的失业率没有男性严重。在大萧条中，有数百万人被录用，但资历较弱的人从未被录用，并陷入了长期失业陷阱。在1920年代，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城镇居民迁徙到大城市的移民突然扭转了方向，因为失业使这些城市失去了吸引力。

1930-31年，在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强烈鼓励下，市政府试图通过扩大公共工程项目来应对萧条。然而，税收锐减，到1931年，城市和私人救济机构完全不堪重负，无法提供更多的额外救济。1933年后，新的营业税和联邦资金的注入帮助缓解了城市的财政困境，但直到1941年，预算才完全恢复。

胡佛（Hoover）发起的，继任联邦总统罗斯福（Roosevelt）的《新政》（New Deal）大大扩展了联邦计划，其中使用了大规模的建筑项目来试图启动经济并解决失业危机。代理机构ERA，CCC，FERA，WPA和PWA以惊人的方式建造和维修了公共基础设施，但对促进私营部门的恢复却无济于事。FERA，CCC，尤其是WPA致力于为长期失业的男性提供非技术性工作。

193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32年增长了34%，在战争前夕的1940年增长了58%。在和平时期的8年中，经济从1932年到1940年增长了58%，然后在战争时期的5年中从1940年到1945年又增长了56%。失业率从1932年的25.2%下降到1940年的13.9%。战争期间，经济在多种条件下运作，以至于无法

与和平时期进行比较，例如巨额支出。

战时输出和控制：1940–1945

失业率下降到2%，救济计划在很大程度上结束，随着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战争中心找到新工作，工业经济迅速发展到新的高度，并且有1600万男人和30万女人被征募或自愿参加兵役。

战争期间所有经济部门都在增长。农场的产量从1939年的106（按体积计算）到1943年的128。煤炭产量从1939年的4.46亿吨增加到1943年的6.51；石油从13亿桶增加到15亿桶。制造业产出翻了一番，从1939年的109上升到1943年的239。铁路竭力将其全部推向市场，从1939年的1.36亿载重汽车英里增加到1943年的23.3。

战时生产局协调国家的生产能力，使军事优先得到满足。转换后的消费品工厂履行了许多军事命令。例如，汽车制造商制造的坦克和飞机使美国成为“民主军火库”。为了防止国民收入的增加和稀缺的消费品引起通货膨胀，新成立的价格管理办公室对从糖到肉，衣服和汽油等消费品的价格进行了定量和设定，并试图抑制价格上涨。

600万妇女从事制造和生产工作；大部分是新创建的弹药临时工作。有些人正在替换军队中的人员。战争结束后，许多妇女返回家务劳动，而男性则

从服兵役返回。国家终于转向郊区，对新住房的压抑需求终于得以释放。

家用燃气，水，电，卫生，供暖，制冷

到1940年，将近100%的城市家庭有电，80%的家庭有抽水马桶，73%的家庭有暖气或做饭，58%的中央暖气，56%的家庭有机械冰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时期：1945-1973年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年代初期，是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2000亿美元的战争债券已经到期，《地理标志法案》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提供了资金。中产阶级，GDP和生产率都有所增长。这种增长在各个经济类别之间平均分配，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这一时期的工会力量。在这种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中，美国的工会会员人数在1950年代曾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增长的大部分来自低收入农场工人向城镇中薪资更高的工作的转移，这一过程在1960年基本完成。

国会成立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以促进高就业，高利润和低通胀。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年）支持采取激进主义的反周期方法，该方法有助于将凯恩斯主义确立为该国的两党经济政策。亚瑟·伯恩斯（Arthur F. Burns）和尼尔·雅各比（Neil H. Jacoby）在制定CEA对经济衰退的应对措施（加快公共工程计划，放松信贷和减少税收）方面尤其重要。1969年，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宣布自己是“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者。”

婴儿潮——在1942年至1957年期间生育急剧增加；这是由于在萧条时期的婚姻和生育延迟，以及战后经济的繁荣，对郊区独户住宅的需求（相对于城市内公寓而言），和对未来的新乐观主义所造成的。婴儿潮在1957年达到顶峰，然后逐渐下降。

农业

农业机械，肥料和高产种子品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的用于制造炸药的工厂产生的氨可用于制造肥料，导致实际肥料价格永久下降。1950年代初期是美国拖拉机销售的鼎盛时期，剩余的少量马匹和骡子被淘汰了。农业机械的动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展。1949年引进了成功的棉花采摘机。该机器可以完成50个人手工采摘的工作。

植物育种的研究产生了谷物作物的新品种，这些作物可以在大量肥料的投入下获得高产。这导致了始于1940年代的绿色革命。到本世纪末，玉米的产量增长了四倍多。小麦和大豆的单产也大幅上升。

政府政策

新政时代的农场计划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和1950年代，目的是支持农民获得的价格收益。典型的计划包括农业贷款，商品补贴和价格支持。农场人

口的迅速减少导致其在国会的声音较小。因此，组织良好的农业局和其他游说者在1970年代努力通过针对穷人的免费食品券计划吸引城市背景的议员。到2000年，免费食品券计划已成为农业法案中最大的组成部分。

飞机和航空运输业

航空运输是战争的主要受益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是战斗机的主要生产国，在战争结束时，美国拥有大量的机床和飞机制造设施。还有经验丰富的飞机制造和维修人员。此外，雷达是在战前开发的。

飞机工业是所有主要工业中生产率最高的，在1929–1966年间每年以8.9%的速度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雇用了数十万名工人，将他们全部安置在4个主要工厂中，政府预算超过30亿美元（2019年相当于443.25亿美元）。B-29项目要求美国陆军空军具有空前的组织能力，因为该项目包括几个主要的私人承包商和工会。美国的飞机生产是战争经济中最大的部门，耗资450亿美元（几乎占战争生产1830亿美元支出的四分之一），雇用了惊人的200万工人，最重要的是生产了125,000架飞机。

选定的美国军用飞机的生产（1941–1945）：轰炸机49,123，战斗机–63,933，货运14,710总计–127,766。

房屋

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战争工业附近的紧急住所外，几乎没有建造房屋。普遍的情况是公寓人满为患。一些郊区在大城市附近发展，那里有通往市区工作的铁路运输。但是，郊区的实际增长取决于汽车，高速公路和廉价住房的可用性。从1930年代到1945年，平均建造了316,000个新的住房非农业单位，而从1946年到1955年，每年建造了1,450,000个单位。

《地理标志法案》保证了为退伍军人提供低成本贷款，首付非常低，利率也很低。有1600万合格的退伍军人，买房的机会突然来临。仅在1947年，就有540,000名退伍军人购买了房屋。他们的房屋的平均价格是\$7300。建筑行业通过标准化来降低价格—例如，标准化厨房橱柜，冰箱和火炉的尺寸，以允许大量生产厨房家具。开发商购买了城郊的空地，根据少量通用设计建造了房屋，并提供了街道和公用设施，而当地公职人员竞相建造学校。最著名的发展是Levittown，位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它提供了一套新房模式，首付为1000美元，每月为70美元。它设有三间卧室，壁炉，煤气灶和煤气炉，以及75乘100英尺的景观美化场地，全部价格为10,000美元。退伍军人可以获得比市场首付低得多的首付价格。

州际公路系统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6年开始建设州际公路系统。从长远来看，州际公路系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在维持艾森豪威尔的正面声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尽管有人反对清除城市社区的负面影响，但该系统已广受欢迎。客运和货运铁路系统急剧下降，但卡车运输急剧扩大，运输和旅行成本急

剧下降。与人满为患的中心城市相比，易于获得的、更大、更便宜的住房的快速增长使郊区化成为可能。旅游业也急剧发展，对更多服务站，汽车旅馆，饭店和游客景点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计算机技术

在1950年代，随着晶体管的制造，大型机商用计算机系统被引入。大型计算机在1960年代被广泛使用。这些计算机处理各种会计，计费和薪资应用程序。

Sabre航班预订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程序，该系统于1960年首次投入使用。使用Sabre预订可以使用电传打印机进行远程下单，并且所有功能都是自动完成的，包括机票打印。这消除了手动处理文件卡的麻烦。

财政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对收入，利润和薪资征收的税率上升到很高水平，并且仅被缓慢削减。国会在1964年降低了税率。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1963-69）梦想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并为此目的开始了许多新的社会计划，例如针对穷人的免费医疗计划Medicaid和Medicare。

军事和太空支出

艾森豪威尔总统担心过多的军事开支会损害经济，因此他在朝鲜战争之后缩减了陆军的规模，并将重点转移到了导弹和核武器上（这比陆军要便宜得多）。他还促进了国防需要的州际公路系统，并将太空探索作为优先事项。他的继任者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将载人登月任务列为国家优先事项。新支出中的大部分流向了加利福尼亚和西部，这是战时支出的延续。

南部地区产生了更大的变化，它刺激了经济的现代化，从棉花转向制造业和高科技。例如，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萨凡纳河场有原子能委员会的技术复杂的大型装置；位于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红石兵工厂；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核研究设施；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太空设施，在休斯敦的约翰逊航天中心，以及在密西西比的斯坦尼斯航天中心。

国防部资助了一些私营企业的研发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ARPANET（将成为互联网）。

20世纪末

后工业（服务）经济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制造业就业人数和名义经济增加值份额一直在稳步下降。在1960年代后期，制造业在就业人数和名义增加值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6%，到本世纪末分别降至约11%和12%。

美国的人均钢铁消费量在1977年达到顶峰，然后下降了一半，然后才开始缓慢回升至远低于峰值的水平。

服务业扩张

制造业相对规模的下降与服务业规模的上升同时发生。

20世纪后半叶的技术创新意义重大，但不及本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技术创新强大。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仍比前几十年有所放缓，但整体生产率因政府和服务业规模的相对增加而受到拖累。

通胀困境：1970年代

战后的繁荣以197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事件而告终：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崩溃

进口制造业产品（例如汽车和电子产品）的大量涌入

1973年的石油危机，

1973年以后生产率增长下降到较低水平，直到1990年代一直保持低水平，

1973-1974年的股市崩盘，

随之而来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货币主义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领导的自由市场芝加哥经济学院所取代。同时，专家们的共识是反对新交易式的监管，而主张放松监管。

在1960年代后期，对某些人而言，这种明显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并在1970年代初期开始变得显而易见。在1970年产量达到顶峰之后，美国越

来越依赖于OPEC的石油进口，从而导致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供应冲击。滞胀席卷了整个国家，政府在尼克松总统的领导下进行了工资和价格控制的试验。《布雷顿森林协定》于1971-1972年崩溃，尼克松总统关闭了美联储的黄金窗口，使美元完全脱离了黄金标准。

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引入了口号“立即鞭打通货膨胀”（WIN）。1974年，生产率下降了1.5%，尽管很快就恢复了。1976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赢得总统职位。后来，卡特将为未来更加动荡的经济时代承担更多责任。通货膨胀继续攀升。生产率增长很小。利率居高不下，1981年1月最高达20%。阿特·布赫瓦尔德（Art Buchwald）打趣说，1980年将成为历史，那一年从黑手党借钱要比当地银行便宜。

从1975年到1979年，失业率基本稳定下降，尽管随后开始急剧上升。

在此期间，环境和消费者运动的兴起也有所增加，政府建立了新的法规和监管机构，例如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核监管委员会等。

放松管制和重组经济学：1976-1992

在生产率增长缓慢以及几个关键部门的运营和资本成本增加的刺激下，放松管制的势头在1970年代中期得到了加强。直到1978年，国会才批准了第一个有意义的放松管制立法，即《航空放松管制法》。1980年，随着铁路和卡车运输的放松管制，运输管制的放松加速了。1982年，放松了对州际

巴士的管制。

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经济最初是从1973-75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的。即将到任的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于1977年制定了一项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通货膨胀率从1978年末开始急剧上升，并在1979年能源危机之后上升了两位数。为了对抗通货膨胀，卡特任命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为美联储成员，后者提高了利率并在1980年前六个月引起了严重的衰退。1980年3月，卡特（Carter）推出了自己的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美联储（Fed）降低了利率以与这些计划合作。

在1980年的经济衰退期间，制造业减少了110万个工作岗位，而服务业则完好无损。尤其是汽车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受到了影响，到经济衰退结束时减少了33%。总的来说这些因素有助于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联邦储备再次开始于1981年提高利率。失业率在1982年12月达到了10.8%的峰值，这是战后的最高水平。

1981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引入了Reaganomics。那就是，财政上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将边际联邦所得税率降低了25%。由于短暂的经济衰退和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对货币供应和利率的更严格控制，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每年13.5%急剧下降到1983年的每年3%。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1980年和1982年萎缩之后开始增长。失业率在1982年末继续上升至10.8%的峰值，但在1989年1月里根总统任期结束时，失业率下降到6%以下。

在里根担任总统期间，创造了2000万个工作岗位-这些工作由82%的高薪和

长期工作组成。从1982年到1987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982年的776点上升到1987年的2722点，涨幅超过1900点，增幅约为350%。从1983年到1990年开始出现经济繁荣。在1983年至1989年之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减少了380万人。

繁荣时期见证了计算机，手机，音乐播放器和视频游戏等电子设备的日益普及。信用卡是繁荣的象征。里根的减税措施似乎奏效，美国人能够在1988年初摆脱1987年的经济危机。在经历了七年的股市增长和中上层阶级的繁荣之后，这种增长在1990年结束了。他的政策产生的联邦债务增加了两倍（从1981年的9300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2.6万亿美元），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尽管在20世纪后半叶，几乎每位总统的债务总会增加，但在1950年之后和里根之前，债务在所有总统中的占GDP的百分比下降了。除了财政赤字，美国也开始出现巨额贸易赤字。也是在他第二任任期内通过了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

布什总统初期的经济政策有时被视为里根政策的延续，但在1990年代初，布什与国会民主党人妥协，增加了税收。1992年，布什和第三方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输给了民主党人克林顿（Bill Clinton）。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去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使收入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1968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386。2005年，

美国基尼系数达到0.469。

全球化的兴起：1990年代至2000年底

在1990年代，政府债务增加了75%，GDP增长了69%，以标准普尔500指数衡量的股票市场增长了三倍多。

从1994年到2000年，实际产出增加了，通货膨胀率是可以控制的，失业率下降到了5%以下，从而导致了被称为互联网繁荣的股票市场飞涨。1990年代后半期的特点是广为宣传的高科技公司和“.com”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但是，到2000年，很明显股票的估值泡沫已经出现，从而开始在2000年3月，市场急剧下跌。

21世纪

2001年经济恶化，产出仅增长0.3%，失业和企业倒闭大幅增加，并引发了通常归因于911袭击的衰退。

美国市场下滑和投资者信心的另一个因素包括许多企业丑闻。

在2001年至2007年期间，美国各地炙手可热的住房市场加剧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实力的错误安全感。

经济大萧条和后果（2007–2019）

2008年，一系列相关的经济灾难袭击了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体系。全球住房

泡沫的破裂使衰退开始了。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州房地产泡沫的终结导致房价暴跌和建筑业萎缩。数以百万计的抵押贷款（平均每个抵押贷款约200,000美元）被捆绑在称为抵押债券的证券中，并在全球范围内转售。许多银行和对冲基金已经借入了数千亿美元来购买这些有毒的证券。

美国和欧洲的一系列最大的银行倒闭了。有些破产，例如拥有6900亿美元资产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其他如领先的保险公司AIG，领先的银行花旗集团，而两家最大的抵押贷款公司已被政府接管纾困。国会投票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Fed）承诺提供数万亿美元来支撑金融体系，但这些措施并未扭转下降的趋势。尽管注入了联邦资金，银行还是大幅度收紧了贷款政策。政府首次在大型银行担任主要所有权职位。股市暴跌了40%，抹去了数十万亿美元的财富。全国范围内的房价下跌了20%，并抹去了数万亿美元。到2008年底，困境已蔓延至金融和住房领域，尤其是汽车行业的“三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而零售业则表现出重大弱点。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批评者表示愤怒，因为分配给银行的大部分TARP资金似乎都无法说明，银行对此事保密。

2009年2月，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签署了《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该法案通过支出和减税措施相结合，提供了7,870亿美元的刺激措施。该计划主要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即政府支出应抵消经济衰退期间私人支出的下降。否则，私人支出的下降可能使自身被困，并且浪费了生产资源，例如失业者的劳动时间。批评人士声称，政府支出不能抵消私人支出的下降，因为政府必须向私营部门借钱才能增加资金。

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这种“挤出效应”是一个问题。反对者还指出，如此庞大的支出可能导致未来通货膨胀和政府债务的问题。

大锁定和后果（2019年至今）

美联储于2019年9月16日宣布，由于一系列技术因素限制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隔夜贷款利率跃升至8%以上后，美联储将开始充当投资者的角色，以便在回购市场中提供资金。做出决定五个月后，由于对冠状病毒大流行和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石油价格战的担忧，美国股票市场经历了美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崩盘。尽管2009年至2019年期间失业率大幅度下降，但收入不平等现象继续增加。2019年9月，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已达到50年来的最高水平，基尼系数从2017年的48.2上升至2018年的48.5。尽管失业率低，但ISM制造业指数在2019年8月跌破50%，在当年10月创下48.3%的历史新低（这是自2009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崩溃之前的几个月中，它将继续保持在50%以下。

=====

=====

=====

=====

=====

Handwriting practice lines consisting of multiple sets of three horizontal lines (top, middle, bottom) for letter form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History_of_Europe_\(1000_AD
_%E2%80%94Present\)](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History_of_Europe_(1000_AD%E2%80%94Present))

欧洲经济史（公元1000年至今）

中世纪

农业

在第一个千年初，技术的进步就开始出现。修道院遍布整个欧洲，成为收集有关农业和林业知识的重要中心。

到了公元900年，发展炼铁导致增加生产，导致生产农具的发展，如犁，手工工具和马鞋。犁得到了显著改善，发展为翻板犁，能够翻开北欧厚重而潮湿的土壤。这导致该地区的森林被砍伐，农业生产大幅度增加，从而导致人口增加。欧洲的农民从两田轮作转向到三田轮作。由于轮换的变化导致种植了不同的农作物，包括豆类（如豌豆，小扁豆和豆类），因此提高了生产力和营养。改良的马具等发明也改变了耕种方法。

水车最初是由罗马人开发的，在整个中世纪中，风车得到了改进，并提供了将谷物磨成面粉，砍柴，加工亚麻和羊毛以及灌溉田地所需的动力。

田间作物包括小麦，黑麦，大麦和燕麦。它们被用作面包和动物饲料。从

13世纪开始，豌豆，豆类和水禽就已作为食物和动物饲料作物而流行。它也具有固氮施肥的特性。作物产量在13世纪达到顶峰，直到18世纪一直保持稳定。尽管曾经认为中世纪耕种的局限性为中世纪的人口增长提供了上限，但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中世纪农业技术在正常情况下基本上总是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饥荒和瘟疫

大约1300年，欧洲几个世纪的繁荣和增长停滞了。发生了社会动荡；这些事件被称为中世纪晚期危机。

技术

从8世纪到12世纪，远程导航取得了重大技术进步。维京人的突袭和十字军对中东的入侵导致了对海外旅行有用的技术的传播和完善。人们改善了船舶。用于导航的星盘极大地帮助了海上长途旅行。旅行的改善反过来又增加了贸易和消费品的扩散。

工艺品和城市发展

从11世纪到13世纪，农民和手工艺品的小规模生产商越来越多地在城镇见面以买卖商品。他们在季节性贸易展览会上见面，或者持续进行交易。被称为行会的手工艺品协会促进了技能的发展以及特定商品贸易的本地增长。在此期间的几个世纪中，城镇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长，首先出现在英格兰，法兰德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北部的核心地区。

直到十二世纪中叶，男人开始以更先进的工业结构和技术接管某些职位之前，纺纱，织造，缝纫和切割一直被视为女性的工作。在法国北部的大城市，中世纪的纺织品生产中心，向男性主导的生产的转变甚至早在11世纪就开始了，当时垂直织机被水平脚踏织机取代。尤其是公会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制衣厂，裁缝，染料和挂毯制造商。有些妇女确实参加了行会，但这很少见。多数商业职位由男性担任，而女性则更适合担任家庭职务。

13世纪，北欧和南欧的广泛地理区域的经济活动开始加剧。

贸易在意大利蓬勃发展，尤其是在13世纪。来自欧洲热那亚和威尼斯港口城市的商人主导了地中海欧洲的贸易。意大利产生的财富促进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汉萨同盟

在与北海和波罗的海相连的城市中，汉萨同盟发展了贸易垄断。这促进了靠近这两个海洋的城市之间的贸易增长。在吕贝克（Lübeck）的领导下，主要的贸易城镇聚集在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中，波罗的海的远距离贸易得到加强。

联盟是由贸易城市及其行会组成的商业联盟，它主导着北欧沿海地区的贸易，并从1200年发展到1500年。主要城市是莱茵河上的科隆，北海的汉堡

和不来梅，以及波罗的海的吕贝克。

每个汉萨同盟城市都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自主权。汉萨同盟是德国北部和波罗的海的城市在中世纪的联盟。建立汉萨同盟的目的是为了联合起来促进商业利益，防御力量和政治影响。到14世纪，汉萨同盟在波罗的海，尤其是与诺夫哥罗德和斯堪的那维亚的贸易中几乎垄断了贸易。

法国

罗马帝国的瓦解使法国经济与欧洲其余部分脱钩。城镇生活和贸易减少，社会开始以自给自足的庄园为基础。丝绸，纸莎草纸和银等奢侈品存在一些国际贸易。它是由Radanites等外国商人处理的。

由于新作物的到来，农业生产的改善和良好的天气条件，加洛林时代的农业产量开始增加。但是，这并没有导致城市生活的复兴。实际上，由于内战，阿拉伯袭击和维京入侵，城市活动在加洛林时代进一步下降。在中世纪早期，加洛林时代的农业热潮延续。此外，在此期间，城市生活有所增加。巴黎急剧扩张。

从1335年到1450年，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灾难，收成不好，饥荒，瘟疫和战争使四代法国人不知所措。人口增加了，粮食供应更加不稳定。百年战争中的法国和英国军队在土地上来回穿梭；他们没有屠杀平民，但他们消耗了粮食供应，破坏了农业和贸易。随着当地贵族成为强人，与邻国争夺对

当地的控制权，皇家权威被削弱。最终，从1450年代开始，休养生息的漫长周期开始了。

近代欧洲：1500–1800

从1600年代起，商业中心和制造业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边缘的航运中心：17世纪的意大利和土耳其的经济活动相对减少—但对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共和国和英格兰/英国等国家有利。在东欧，俄罗斯镇压了塔塔尔的奴隶贸易，扩大了来自西伯利亚的高档皮草贸易，并与波罗的海的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各州相抗衡。来自美洲的食糖和烟草等商品开始在欧洲经济中发挥作用。同时，金融惯例的变化（尤其是在荷兰和英国），英国的第二次农业革命以及法国，普鲁士和英格兰的技术创新不仅促进了自身的经济变革和扩张，而且还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开始。

法国

1800年以前，法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17世纪和18世纪城市人口稳步增长，尽管法国仍然是一个深耕的乡村国家，只有不到10%的人口位于城市地区。1754年，巴黎是欧洲最大的城市。

农业扩大了各种食品的生产：橄榄油，葡萄酒，苹果酒，和藏红花。1500年之后，出现了新世界农作物，例如豆类，玉米，南瓜，西红柿，土豆和甜椒。生产技术仍然与中世纪的传统息息相关，且单产低。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更多的适合耕种的土地变得稀缺。

尽管法国不得不进口铜，青铜，锡和铅，但法国东北部引入的高温锻造技术导致了矿产开采。大约二十年来，矿山和玻璃制品从皇家免税中受益匪浅。丝绸的生产（1470年的图尔和1536年的里昂引入）使法国得以加入蓬勃发展的市场，但法国产品的质量仍低于意大利丝绸。羊毛的生产是广泛的，亚麻和大麻（都是主要的出口产品）的生产也很普遍。

里昂曾是法国银行业和国际贸易市场的中心。一年四次的市场交易会促进了法国商品（例如织物）的出口以及意大利，德国，荷兰和英国商品的进口。它还进口奇特的商品，例如丝绸，明矾，玻璃，羊毛，香料，染料。区域市场和贸易路线将里昂，巴黎和鲁昂连接到该国其他地区。在弗朗西斯一世国王（1515-1547年在位）和亨利二世国王统治下（在1547年至1559年在位），法国对英国和西班牙的进出口之间的关系对法国有利。与荷兰的贸易大致平衡，但由于意大利的丝绸和奇特商品，法国与意大利的贸易逆差持续不断。

到16世纪中叶，法国的人口增长，对消费品的需求增加以及来自非洲和美洲的金银快速涌入导致通货膨胀（从1520年到1600年，谷物的价格上涨了五倍）和工资停滞。尽管在繁荣时期，许多拥有土地的农民和进取的商人得以致富，但农村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他们被迫同时应对收成不好的情况。这导致购买力下降和制造业下降。货币危机导致法国在1577年放弃国债作为其记账货币，转而使用écu流通，并禁止大多数外币使用。

同时，法国在意大利的军事冒险和灾难性的内战需要大量现金，这些现金

是通过船尾税和其他税种筹集的。金融危机屡屡冲击皇室，因此1523年，弗朗西斯一世在巴黎建立了政府债券体系。

工业革命：1750年代至1840年代

在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从1750年代到1830年代的经济转型时期，其特点是新系统的发展，包括使用新技术的工厂，铁路，煤矿和商业企业。新系统首先在纺织品上运行，然后传播到其他部门，到19世纪中叶完全改变了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它传播到美国和欧洲的部分地区，并使世界经济现代化。它在世界范围内对移民和贸易，社会和政治，城市和乡村产生了影响，并影响了最偏远的地区。

1790年后成功制造出更大，效率更高的蒸汽机，这意味着能源成本稳步下降。企业家发现固定式发动机可用于转动工厂中的机器或矿井中的泵，而移动式发动机则可用于机车和轮船（在那里它们使桨或螺旋桨转动）。水力的使用也在增长，以至于在1830年，蒸汽磨和水磨几乎相等（每台功率165,000马力）。到1879年，英国从蒸汽机获得210万马力，从水获得23万马力。

比利时

没有人能想到比利时-似乎是传统主义的“呆滞”和“文化休眠”的堡垒-会跃

升到欧洲大陆工业革命的最前沿。然而，比利时是仅次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地国家，它为整个欧洲大陆设定了步伐，而将荷兰抛在了后面。

比利时工业化发生于1820年代中期，特别是1830年后的瓦隆（讲法语的比利时南部）。廉价煤炭的供应是吸引企业家的主要因素。在列日（Liège）和沙勒罗瓦（Charleroi）周围的煤矿区建造了许多工程，包括炼焦高炉，水磨和轧机。领袖是一位英国人约翰·科克里尔（John Cockerill）。他的工厂早在1825年就整合了从工程到原材料供应的所有生产阶段。到1830年，铁变得很重要时，比利时的煤炭工业就已经使用蒸汽发动机进行抽水。煤炭不仅销往当地的工厂和铁路，还销往法国和普鲁士。基于棉花和亚麻的纺织工业在整个工业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雇用了大约一半的工业劳动力。根特一直是比利时的主要工业城市，直到1880年代，其发展中心转移到列日（Liège）并发展了钢铁工业。

廉价且容易获得的煤炭吸引了生产金属和玻璃的公司，这两者都需要大量的煤炭，因此煤田周围的地区变得高度工业化。在现代的临海INDUSTRIEL（工业谷）是钢铁工业的中心，直到20世纪40年代。

铁路

工业的发展很快就暴露出了对更好的运输系统的需求。尽管运河和公路确实有所改善，但很快被前景光明的交通方式所掩盖：铁路。铁路可能是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因素。铁路早在1500年就已存在，但在1700年代，原始

的木轨被锻铁代替。这些新的栏杆使马匹能够相对轻松地牵引更大的负载。但是对马力的依赖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804年，第一台以蒸汽为动力的机车以每小时5英里的速度牵引了10吨矿石和70人。这项新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改进。机车很快达到了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铁路彻底改变了交通方式。

钢铁

在整个中世纪，铁都是用木炭冶炼的，但是在18世纪，发现了新的铁生产方法。由此产生的铁的质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这些进步，例如亨利·科特（Henry Cort）在1780年代开发的工艺，极大地鼓励了在其他行业中使用机械。

铁非常耐用，以至在1860年被钢取代之之前，它已成为工具和设备的首选金属。英国拥有铁矿石，但缺乏大量生产铁的方法，直到1760年约翰·史密顿（John Smeaton）发明了一种可以快速而廉价地冶炼铁的高炉。他的发明使用了由水车运转的风扇产生的鼓风。1783年，亨利·科特（Henry Cort）引入了水化炉或混响炉，其最终产品为糊状固体而不是液体。将其轧制成球，压榨并轧制以除去杂质或炉渣。结果是大量的可锻铸铁。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 1728-1808年）是最伟大的早期铁匠，他们发明了新的机械来加工铁。1779年，在塞文河上建造了第一座铸铁桥。1790年，第一艘铁船下水。到1830年，英国年产量为70万吨铁。这个数量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翻了四倍，在苏格兰，南威尔士和斯塔福德郡设有中心。铁路建设者是主要客户。在1847-48年间，他们购买了300万吨铁路车辆，桥梁建筑和车站建筑，用于2000英里的新里程，再加上以前修建的3000英里的铁路的维护建设需求。

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

一战结束后，德国应根据《凡尔赛条约》支付所有战争赔偿。该政策激怒了德国人，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尤其是纳粹利用的那种不满。但是，实际支付的金额并不大，并且是通过Dawes计划中来自纽约的贷款提供的。付款于1931年结束，但在1950年代西德确实支付了所有赔偿。由于政府大量抽出纸币，导致1923年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重建期以私人投资和需求为基础。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时，为德国提供资金的投资者撤出了市场，失业率飙升至25%，严重打击了德国的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全面战争，最终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的工厂和工作场所决定，它的表现比轴心国强得多。的确，德国和日本的生产或多或少地依赖于掠夺。大国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0%至61%用于弹药生产。盟军生产的弹药大约是轴心国的三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马歇尔计划

在马歇尔计划（正式的欧洲复兴计划或ERP）是1948–1951年美国对西欧的经济援助体系。它在欧洲的经济复苏，现代化和统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三年的时间里，ERP捐赠了124亿美元（约占1948年美国2700亿美元GDP的

5%)，用于实现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现代化以及重建饱受战祸的欧洲的工业和人力资本，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较小的国家。它要求每个政府制定一项国家经济计划，并要求各国在资金和贸易流动方面进行合作。这笔钱不是贷款，也没有还款。从长远来看，顺理成章，繁荣的欧洲会更加和平，并使其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更加繁荣。斯大林拒绝允许他的任何卫星国参加马歇尔计划，该计划因而成为西欧独有。但是，美国同时向日本扩大了类似的财政援助计划。

ERP和北约（1949）的有力结合使欧洲确信美国对西欧的安全与繁荣的承诺，并帮助受援国避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悲观和绝望。欧洲是不可阻挡的“不断上升的期望革命”，这是经济学家，高级ERP官员Harlan Cleveland在1950年提出的醒目的短语。

欧洲煤钢共同体

六个欧洲国家，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迈出了具有形成经济一体化的步骤——建立煤炭和钢铁的共同市场。他们于1951年成立了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其构想是简化煤炭和钢铁生产。附带利益将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因此，成员国之间进行经济战乃至开战的风险将会降低。

工业衰退

从196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中，欧洲等发达国家，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经济

出现了下滑。与亚洲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在精炼原材料（例如钢）和成品中的地位下降。几个亚洲国家利用比较优势，专门生产某些商品，同时使用了相对便宜的劳动力。这首先发生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到1980年代后半期，工业生产的转移开始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发生。首先，这种转变发生在廉价，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上，例如纺织品。然后，这种转变发生在高科技产品上，例如冰箱或汽车等“耐用品”。国际工业生产从欧洲转移是全球化的重要结果。

欧元

2001年1月1日欧元成为欧盟成员国某些国家的共同货币。欧元背后的最初想法是，它消除了欧洲国家之间的汇率并使货币波动风险降至最低。

参与初始条约的国家是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国家原则上在1999年加入了欧洲货币联盟（EMU），并在2001年1月1日设置了欧元作为其货币。后来加入的国家包括斯洛文尼亚（2007），塞浦路斯和马耳他（2008）和斯洛伐克（2009），其次是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2011，拉脱维亚2014，立陶宛2015）。只有在满足欧洲货币联盟规定的某些要求的情况下，才允许各国开始使用欧元。标准包括“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汇率稳定和健全的公共财政”。之所以采用这种标准，是因为实现经济成功的最佳方法是确保价格稳定。

Handwriting practice lines consisting of multiple sets of three horizontal lines (top, middle, and bottom lines) for letter formation.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history_of_Germany

德国的经济史

直到19世纪初期，德国由大小不等，发展不定的众多州组成的联邦，保留了其前工业时代的特征，即以许多自由城市为中心的贸易。在1840年代铁路网络的广泛发展之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激发了工业化的进程。到1900年，已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已在化工，钢铁生产等几个关键领域确立了首要地位。高产能，持久的竞争力以及随后与美国和英国展开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德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该国的经济基础设施被完全摧毁。西德在马歇尔计划的财政支持下开始了其重建计划，并在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经济原则指导下，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经济奇迹中表现出色。作为战争赔偿计划的第一步，苏联占领军拆除了东德最后剩余的经济设施。东德被嵌入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东方集团体系中。当代德国在欧洲最大的国民经济中拥有高技能的劳动力，是欧洲最大的高质量商品出口国，例如汽车，机械，制药，化学和电气产品，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3.67万亿美元。

中世纪德国

中世纪的德国位于开放的北欧平原上，分为数百个相互竞争的王国，公国，主教/主教区和自由城市。经济繁荣并不意味着地域扩张。它需要与某些机构合作，与其他机构竞争以及政府，商业和生产之间的深入了解。在德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不确定性经验中也产生了储蓄的愿望。

城镇

城镇逐渐兴起，并在12世纪沿贸易路线和帝国要塞和城堡附近建立了许多新城市。这些城镇受制于市政法律体系。拥有自由城市地位的科隆等城市，享有更大的商业和法律自由。城镇通常由商业精英组成的贵族议会领导。工匠组建了行会，受到严格的规章制度的控制，以寻求对城镇的控制；一些对妇女开放。社会已经多样化，但被划分为神职人员，医师，商人，各种工匠行会，非熟练的日工和农民。政治上的紧张是由于税收，公共支出，业务监管，市场监管以及公司自主权的限制等问题引起的。科隆在莱茵河的中心位置使其位于东西方主要贸易路线的交汇处，这是科隆发展的基础。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科隆的经济结构以该市作为莱茵河上主要的港口和交通枢纽的地位为特征。

汉萨同盟

汉萨同盟是商家的商业和防御同盟行会；包括欧洲北部和中部的城镇和城市，波罗地海，北海，以及沿着中世纪晚期期间所连接的通航河流地区。每个附属城市都保留了其主权国家的法律体系。从吕贝克和汉堡的城市协议开始，行会进行了合作，以加强和合并其经济资产，例如获得贸易路线和税收优惠，以控制价格并更好地保护和销售其本地商品。重要的商业中

心，例如莱茵河上的科隆和北海上的不来梅，加入了该联盟。到14世纪后期，强大的联盟在必要时通过军事手段实现了其利益。这在1361年至1370年与丹麦王国的主权战争中达到了高潮。在1450年之后，由于许多因素（例如15世纪的危机，领主将政策转向更严格的商业控制，白银危机和更广泛的欧亚贸易网络中的边缘化），该联盟的实力有所下降。

变革与改革

城市的崛起和新的汉堡阶级的出现侵蚀了封建制度的社会，法律和经济秩序。越来越多的以金钱为基础的经济也激起了骑士和农民之间的社会不满，掠夺性的“强盗骑士”变得普遍。

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1618年至1648年）对两千万平民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并使代代相传的经济倒退，因为掠夺性的军队焚烧并摧毁了他们无法夺取的东西。战斗经常失控，成百上千的挨饿士兵的行军团伙散布瘟疫，掠夺和谋杀。军队年复一年地在农村各地来回移动，对城市征收沉重的税款，并没收农民的牲畜和粮食。由于杀害，疾病，农作物歉收，出生率下降和随机破坏以及受惊吓的人移民，三十年来巨大的社会动荡导致人口急剧下降。

根据约翰·加利亚多（John Gagliardo）的说法，恢复期持续了大约五十年，直到1700年代。然后，有一段稳定但相当缓慢的增长时期，直到1740年代。随后出现了快速但并非例外的经济扩张时期，该时期主要发生在东部的大州（奥地利，萨克森，普鲁士），而不是在德国中部或南部的小

州。

农民与乡村生活

农民继续以村庄为中心，并帮助管理社区资源和监测社区生活。在整个德国，尤其是在东部，他们是农奴，被永久地绑在这块土地上。在德国大部分地区，耕种由租户农民处理，他们向地主支付租金和义务服务，而地主通常是贵族。农民领导人监督田野，沟渠和放牧权，维护公共秩序和道德，并支持处理轻微罪行的乡村法院。

农奴的解放始于1770年至1830年。普鲁士随着十月法令废除了农奴制。1807年的《土地保护法》提高了农民的个人法律地位，使他们有机会用现金购买他们正在工作的部分土地。他们还可以出售他们已经拥有的土地。该法令适用于所有拥有一定规模以上的农民，包括王室土地和贵族庄园。农民免除了向主人提供的个人服务和年度会费的义务。1815年后，其他德国州效仿普鲁士。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习俗和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改变，包括尊重贵族的旧习惯，这些贵族的法律权威在村民中仍然很强大。尽管农民不再像农奴一样被束缚在同一片土地上，但东普鲁士的古老家长制关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

工业革命

1850年之前，德国落后于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工业发展的领导者。但是，该国拥有大量资产：技术熟练的劳动力，良好的教育制度，强大的职业道德，良好的生活水平以及基于佐尔韦莱因的稳健的贸易保护主义战

略。到本世纪中叶，德国各州开始追赶，到1900年，德国与英国和美国一道成为工业化的世界领导者。1800年，德国的社会结构不适合任何形式的社会工业发展。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现代化的统治（1790到1815年）进行了重要的体制改革，包括取消了对出售大面积地产的封建限制，减少了城市行会的权力，以及引入了新的，更有效的商业法。尽管如此，传统主义在德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很强。直到本世纪中叶，行会，贵族阶层，政府官僚机构都有如此多的规则和限制，以至于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程度不高，并且几乎没有发展的机会。

从1830到1840年代，普鲁士，萨克森州和其他州重组了农业，引进了甜菜，萝卜和土豆，从而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使过剩的农村人口迁移到了工业区。德国的工业革命始于纺织工业，并于1834年开始通过Zollverein消除关税壁垒而得到了推动。1840年代的铁路革命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腾飞阶段，为铁路打开了新的市场。增加了对工程师，建筑师和熟练机械师的需求，并刺激了对煤炭和铁的投资。

地区

德国北部各州的自然资源比南部州更多。他们拥有从西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到东部的普鲁士的广阔农业区。他们在鲁尔河谷也有煤和铁。通过实行长子继承制，大庄园和财富在增长。业主与地方以及国家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是如此。

德国南部各州的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因此这些德国人更多地从事小型经济企业。他们也没有长子继承制，但将土地划分为几个后代，导致这些后代

留在自己的家乡，但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自给自足。因此，德国南部各州促进了家庭手工业，以及与政府联系不紧密的更加独立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煤炭

第一个重要的煤矿出现在1750年代，位于鲁尔河，英德河和乌尔姆河的河谷，那里的煤层露头，可以进行平顶开采。1782年，克虏伯家族开始在埃森附近开展业务。1815年后，鲁尔地区（后来成为普鲁士的一部分）的企业家利用关税区（Zollverein）开设了新的矿山和相关的炼铁厂。英国工程师在1850年左右修建了新的铁路。大量的小型工业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主要使用当地的煤炭作为炼铁厂。1854年以后，这些综合性的煤铁公司（“Huettenzechen”）变得无数；1900年以后，他们成为了混合公司，名为“Konzern”。

1850年，一个普通矿山的产量约为8500吨；它的就业人数约为64。到1900年，这一产出已增至280,000，就业人数约为1,400。

鲁尔地区的矿工按种族（德语和波兰人）和宗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划分。矿工们分成几个工会。结果，社会主义工会（隶属于社会民主党）与天主教和共产主义工会竞争，直到1933年纳粹接管了所有工会。

银行和卡特尔（垄断）

德国银行在为德国工业提供融资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不同的银行在不同的行业中形成卡特尔。卡特尔合同被德国法院接受为具有法律效力和约束力的合同，尽管在英国和美国被认为是非法的。

卡特尔化（垄断）进程开始缓慢，但卡特尔运动在1873年后的统一大投机泡沫之后的经济萧条中占据了上风。它开始于重工业，并蔓延到其他所有行业。到1900年，有275个卡特尔在运作；到1908年，超过500家。

位于城市的德国中产阶级呈指数增长，但它从未获得过在法国，英国或美国拥有的政治权力。

铁路

政治分裂和普遍的保守主义使得在1830年代建造铁路变得困难。但是，到1840年代，干线确实连接了主要城市。每个德国州都应对其自己境内的界线负责。

起初，德国人缺乏技术基础，从英国进口了他们的工程和硬件，但很快就学会了运营和扩展铁路所需的技能。在许多城市，新的铁路车间是技术意识和培训的中心，因此，到1850年，德国已经能够自给自足地满足铁路建设的需求，铁路成为新钢铁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观察家发现，甚至到1890年，他们的工程技术还不如英国的工程技术。但是，1870年德国的统

一刺激了整顿，国有化为国有公司，以及进一步的快速增长。鲁尔（Ruhr）和其他工业区纵横交错，并与汉堡和不来梅的主要港口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到1880年，德国拥有9400辆机车，运送43000名乘客和30,000吨货运，并领先法国。

农业

农民很快就放弃了传统的，效率低下的做法，而采用了现代新方法，包括使用新肥料和新工具。到1914年，密集种植糖和其他块根作物所获得的知识 and 工具使德国成为欧洲最高效的农业生产国。意外的后果是对移民工人的依赖增加，尤其是来自德国波兰地区的移民。

化学品

重工业（尤其是煤炭和钢铁）在鲁尔区变得越来越重要；制造业在城市，鲁尔区和西里西亚也不断增长。基于其在大学和工业实验室中化学研究的领导地位，德国在19世纪后期成为世界化学工业的主导者。在Wilhelmine时代，巴斯夫和拜耳等大企业在人造染料和药物的生产和分销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导致德国垄断了全球化学品市场，到1914年占化学产品国际贸易总量的90%。

钢铁

在19世纪末，德国成为欧洲主要的钢铁生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关税和卡特尔对美国 and 英国竞争的保护。领先的公司是克虏伯家族经营的“Friedrich Krupp AG Hoesch-Krupp”。“德国钢铁联合会”成立于1874

年。

外商直接投资

十个国家被认为是主要投资者，分别是：奥地利-匈牙利，英国，其次是法国，美国，意大利，俄罗斯，波兰（是邻国的一部分），瑞士，荷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奥地利的一部分）。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是市场环境（例如关税和市场开放）以及公司规模。有趣的是，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或距离对外国直接投资没有重大影响。

20世纪初

1926年，四家主要公司合并为Vereinigte Stahlwerke（联合钢铁厂），其模式是效仿美国的美国钢铁公司。其目标是通过同时在一个公司内部合并预付款来超越旧卡特尔体系的局限。新公司强调管理结构的合理化和技术的现代化；它采用了多部门的结构，并以投资回报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

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在1880年至1913年间从38.2%下降到30.2%，而德国的份额在同一时期从17.2%上升到26.6%。在1890年至1913年之间，德国的出口增长了两倍，到1913年，德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为14.8%，领先于英国的13.6%。到1913年，由于英国下滑至第三位，美国和德国的出口主导了世界钢铁市场。1914年，德国钢铁产量为1760万吨，大于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总产量。1914年，德国的煤炭产量达到2.77亿吨，仅次于英国的2.92亿吨，远超奥地利-匈牙利的4700万吨，法国的4000万吨和俄罗斯的3600万吨。

在机械，钢铁和其他行业中，德国公司避免了激烈的竞争，而是依靠行业协会。德国之所以成为世界领导者，是因为它具有盛行的“企业主义心态”，浓厚的官僚传统和政府的鼓励。这些协会规范竞争，并允许小公司在大公司的阴影下运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

出乎意料的是，德国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它迅速动员了民用经济来开展战争。

德国开发了自己的自然资源和其被占领土的自然资源，以填补因英国封锁而造成的进口缺口，而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样的中立邻国则出口了小麦等重要食品，以维持德国人口的粮食供应。有一些商品，例如橡胶，棉花和硝酸盐（Saltpeter），德国很难从内部取代，也不能从中立贸易伙伴那里获得，因为盟国将它们归类为违禁品。硝酸盐进口的减少对炸药和化肥的生产至关重要，事实证明这对德国农业来说是灾难性的。德国化学公司转向生产合成硝酸盐，但产量仅足以维持炸药工业。没有肥料，农业生产率急剧下降。1916–17年冰冷的“萝卜冬”只会加剧日益严重的生存问题。小麦和马铃薯作物歉收，德国人不得不转向萝卜以满足其营养需求，这种萝卜以前是用作牲畜饲料的一种蔬菜。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经济的累积影响是灾难性的。战争期间，德国经济萎缩了约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比战前下降了40%。

魏玛共和国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他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谴责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对德国乃至全球的繁荣都是毁灭性的。凯恩斯说，该条约是一次错误的、企图代表法国的复仇心理来摧毁德国，而不是遵循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中规定的更持久的和平的公平原则。凯恩斯称，要求德国赔偿的款项是德国可能支付的款项的许多倍，而且这些款项将造成严重的不稳定。法国经济学家埃蒂安·曼图（Étienne Mantoux）对凯恩斯先生的分析提出异议。最近，有经济学家认为，德国在1920年代限制一支小部队为它节省了很多钱，足以支付赔偿金。

事实上，后来实际支付的德国赔偿金总额远远少于任何人的预期。总数仅达到200亿德国马克，价值约为50亿美元或10亿英镑。德国的赔偿金于1931年结束。

战争之后，是1920年代初的过度通货膨胀；这对德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稳定造成了严重破坏。在那次通货膨胀期间，该国货币的价值从1918年的8.9元兑1美元暴跌至1923年11月的4.2万亿元兑1美元。

在纽约提供的大量银行贷款的支持下，德国在1923–1929年进入繁荣期。到1929年，人均GDP比1913年提高了12%，并且在1924年至1929年之间，出口翻了一番。净投资达到近12%的高平均水平。但是，到1928–1929年冬季，失业人数已超过200万。

从1927年最后几个月开始，大萧条对德国造成了沉重打击。特别是在纽约的银行、外国贷款在1930年左右停止。失业率飙升，尤其是在大城市，随着中央政治范围的减弱，极右和极左的极端主义和暴力加剧。资本流动最终在1931年逆转，随之而来的是货币危机。在德国遭受银行危机的同时，德国第二大银行达纳特银行倒闭了。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美国胡佛单方面宣布暂停所有赔偿和战争债务，为期一年。在1932年被洛桑会议暂停时，德国支付了大约八分之一的战争赔款。1931年，德国和奥地利的主要银行倒闭，加剧了全球银行业危机。

德国是受大萧条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为主要行业的复苏是由不可持续的外国贷款资助的。战争赔偿义务降低了投资倾向，也许最重要的是，政府实施了严格的紧缩政策，导致通缩。

当失业率达到很高的水平时，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积累了政府权力，并开始对犹太人少数民族，政治左翼分子和许多其他团体实行不人道的政策。

纳粹经济

在希特勒时代（1933–1945年），德国政府大力补贴了那些倾向于赋予德国军事实力和经济自给自足性的部门。在战争本身期间，德国经济是通过对被征服领土和人民的剥削来维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几年是德国人苦苦挣扎的岁月。700万强迫劳动者离开自己的土地，但大约有1400万德国人从东方进入，在惨淡的营地中生活了多年。在西部，农业生产下降；从德国东部（受苏维埃控制）切断了粮食供应。生活水平下降到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粮食始终供不应求。高通胀使储蓄（和债务）损失了其价值的99%，而黑市却扭曲了经济。在东部，苏维埃镇压异议人士；可怕的斯塔西（Stasi）雇用前纳粹分子。苏联人从东德国民生产总值中提取了约23%进行赔偿。

在西德，马歇尔计划在战后恢复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48年，情况有所改善，工人的收入增加了20%以上。由于该计划，在1952年，工农业增加了35%。

1951年，西德同意次年加入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ECSC）。这意味着国际鲁尔当局的作用已由欧共体安全委员会接管。

充分利用德国战后机会的经济学家是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他决心塑造一种崭新的德国经济。美国官员给了他机会，他看到他的许多想法与他们自己的想法吻合。艾哈德（Erhard）废除了德国旧马克（Reichsmark），然后在1948年6月21日，在得到西方盟友的同意后，又创造了一种新的货币德国马克（Deutsche Mark），但同时也利用了废除

大多数纳粹和占领法规的机会。它为西德经济和西德国家奠定了基础。

马歇尔计划和生产力

马歇尔计划是在西德1948-1950实现的一种现代化业务流程的最佳实践。

《马歇尔计划》使西德有可能迅速恢复其具有强大出口部门的传统工业生产模式。

1950年之后，德国在整个经济中的相对生产率水平超过了英国，这主要是由于服务业的趋势而不是工业的趋势所致。

社会市场经济

德国经济自定义为“社会市场经济”。该名称强调，该系统在魏玛时代和1945年以后发展，既具有物质维度，又具有社会维度，以责任为重。“市场”一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自由企业被认为是健康经济的主要动力。国家在新的西德经济中仅扮演次要角色，例如保护竞争环境、避免垄断或寡头垄断趋势。之所以强调“社会”一词，是因为西德人想要一种经济，它不仅可以帮助富人，而且可以照顾工人和其他可能无法应付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需求的人。选择“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将其制度与国家指导经济或干预经济的制度区分开来。

除了社会市场经济的这些原则之外，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更为传统的德国

概念，即Ordnung的概念，可以直接翻译的意思是秩序，但实际上是指结构化的、但不是独裁的经济、社会和政策。社会市场经济的创立者坚持认为，在奥德宁根（Ordnungen）的登肯（Denken）—从秩序制度的角度进行思考—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还谈到了Ordoliberalism，因为该概念的本质必须是自由选择的命令，而不是强迫命令。

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一词开始占据了重要性。它使西德经济朝着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发展，该体系已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社会福利体系之一。此外，西德联邦政府和各州开始庇护和支持某些部门和产业，以弥补经济周期中的不规则现象和世界生产的转移。政府成为维护现有产业的工具，而不是复兴的力量。在1970年代，国家在经济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1980年代，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试图减少这种国家角色，但仅仅他取得了部分成功；而且德国统一再次迫使德国政府在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社会”和“市场”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德国辩论的一个要素。

考虑到其经济哲学内在的矛盾，德国经济既保守又充满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保守的，它借鉴了德国传统中的一部分，该传统设想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对投资和冒险行为的谨慎态度。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它又是针对增长的，是动态的，即使增长可能缓慢、而不是惊人的。它试图将市场体系的优点与社会福利体系的优点结合起来。

经济奇迹及其他

经济改革和新的西德体制得到了许多方面的有力支持：欧洲复兴计划下的

投资基金，通常被称为马歇尔计划；成功的基本要素是艾哈德（Erhard）的改革和新货币带来的信心恢复。

1950年开始的西德繁荣确实令人难忘。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在1950年为25.0%，在1951年为18.1%。尽管偶尔出现放缓，但在19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增长率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到1960年，工业生产已增长到1950年的两倍半，而且远远超过了纳粹在1930年代在整个德国所达到的水平。在同一十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三分之二。就业人数从1950年的1380万上升到1960年的1980万，失业率从10.3%下降到1.2%。

繁荣也适时地使劳工受益。尽管起初工资要求和加薪幅度不大，但在1949年至1955年之间，工资和薪水增长了80%以上，追赶了增长的速度。1957年，在大选前夕，德国政府决定启动一系列社会方案，并扩大其他社会方案。

1957年，西德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央银行，即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通常简称为德国联邦银行（Bundesbank），该银行在货币政策上拥有更大的权力。那年还成立了Bundeskartellamt（联邦卡特尔办公室），旨在防止德国垄断企业和卡特尔的回归。六年后的1963年，在艾哈德（Erhard）的敦促下，德国国会下议院联邦议院（Bundestag）建立了经济专家委员会，以提供客观的评估，以此作为德国经济政策的基础。

西德的经济在1960年代没有像1950年代那样快地增长，部分是因为无法维

持如此艰巨的步伐，部分是因为东德的新鲜劳动力供应被切断了。柏林墙（Berlin Wall）建于1961年。继康拉德·阿登纳尔（Konrad Adenauer）担任总理的埃哈德（Erhard）于1966年12月被投票罢免，主要是（尽管不是完全）由于联邦共和国的经济问题。他被新总理库尔特·基奥尔·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取代；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CSU）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组成执政大联盟。

在经济放缓的压力下，新的西德大联盟政府放弃了艾哈德的广泛自由放任取向。新任经济部长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强烈主张立法，该立法将赋予联邦政府及其部委更大的权力来指导经济政策。1967年，联邦议院通过了《促进稳定与增长法》，即《大宪章》。该法律一直有效，它规定了联邦，土地和地方预算计划的协调，以使财政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该法律还对衡量西德的经济成功的四个基本标准设定了一些乐观目标：货币稳定，经济增长，就业水平和贸易平衡。这些标准被广为人知，称为Magerches Viereck，即“魔术矩形”或“魔术多边形”。

席勒遵循了与艾哈德不同的概念。他是稀有的德国凯恩斯主义者之一，他坚定地相信政府既有义务也有能力塑造经济趋势，并甚至消除商业周期，这是他坚定的信念。席勒选择的公式是Globalsteuerung（全面指导），即政府不干预经济细节而是建立广泛的指导方针以促进不中断的非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

席勒在大联盟中的成功帮助SPD赢得了1969年的选举胜利，并有机会与

Willy Brandt领导的自由民主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FDP）组建新的联合政府。SPD-FDP联盟扩大了西德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大增加了社会预算的规模 and 成本。在19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计划成本每年增长10%以上，在预算中引入了不可改变的义务，降低了财政灵活性（尽管席勒和其他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会产生反周期性影响）。席勒本人不得不在1972年辞职，当时西德和全球经济处于低迷时期，而他所有的想法似乎都无法复兴西德的繁荣。两年后，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辞职。

勃兰特的继任者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对经济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包括1973-74年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1975年，西德的GDP下降了1.4%（按固定价格计算），这是自FRG成立以来首次出现如此急剧的下跌。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全球需求下降以及贸易条件恶化，西德的贸易平衡也下降了。

到1976年，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西德的经济恢复了增长，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尽管没有达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期理所当然的有利水平，但在几年的动荡之后，它被认为是可以忍受的。

但是经济再次陷入低迷，尽管通过政府赤字刺激增长，但仍未能迅速复苏。直到1978年，施密特和德国央行才得以使经济达到平衡。此后，经济在1979年和1980年大部分时间持续扩张，帮助施密特在1980年连任。但是，随着1970年代中期的问题迅速重现，经济增长被证明是不平衡且毫无回报的。到1981年初，施密特（Schmidt）面临着最糟糕的情况：增长下降，失业率上升，但通货膨胀并没有减轻。

到1982年底，随着FDP退出加入由CDU/CSU领导人Helmut Kohl领导的联盟，施密特的联合政府瓦解。政府开始实施新的政策以减少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并在一年之内赢得了支持新路线的民众投票。

新政府在其广泛政策范围内有几个主要目标：通过削减支出和税收减少联邦赤字，减少政府的限制和法规，以及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绩效。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私有化措施，出售了VEBA，VIAG，大众，汉莎和萨尔茨吉特等各种国有机构的股票，卖出了近100亿马克（以德国马克的价值计算）。根据所有这些步骤，根据德意志银行的统计数据，在1982年至1990年期间，国家在西德经济中的作用从GDP的52%下降到46%。

尽管政策重建了一定的信心，但进展却不平衡，停滞不前。在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有关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数字有所改善，但增长缓慢，而有关失业的数字几乎没有变动。到世纪末，工作岗位几乎没有增长。

自1950年代以来，增长率一直在下降，自1960年代以来，失业率呈上升趋势，通货膨胀率逐渐上升，除非在严重下滑期间或之后。

全球经济统计数据还显示，西德的产量和活力都在下降。西德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从1965年的6.6%增长到1975年的7.9%。但是十二年后的1987年，它下降到7.4%，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增长更快。

直到1980年代后期，西德的经济才终于开始更快地增长。西德GDP的增长率在1988年上升到3.7%，在1989年上升到3.6%，是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尽

管有大量的国外工人涌入，但1989年的失业率也下降到7.6%。降低税率带来了更大的活力和收入。

从1990年开始，德国统一产生了正面和负面的扭曲，西德的经济开始重新定位与东德的经济和政治联盟。经济逐渐从其最初的西欧和全球导向转向大规模集中于对需求和机遇的统一。

德国在前东德的复兴中投资了超过2万亿马克，帮助其过渡到市场经济并清理了恶化的环境。到2011年，结果好坏参半，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这与德国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快速经济增长形成鲜明对比。东部的失业率高得多，通常超过15%。

21世纪

德国的经济奇迹在1990年代逐渐消失，因此到本世纪末和2000年代初，它被嘲笑为“欧洲的病夫”。它在2003年经历了短暂的衰退。从1988年到2005年，经济增长率每年都非常低，仅为1.2%。尽管刺激性支出巨大，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尤其是在东部地区。

莱茵和德国北部的旧工业中心也落后了，煤炭和钢铁工业的重要性逐渐减弱。经济政策主要面向世界市场，出口部门仍然非常强劲。出口拉动了繁荣，2011年出口达到创纪录的1.7万亿美元，占德国GDP的一半，约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尽管其他欧共体在金融问题上苦苦挣扎，但德国在2010年后基于非常强劲的经济而采取了保守的立场。劳动力市场表现出灵活性，出口行业适应了世界需求。

Handwriting practice lines consisting of multiple sets of three horizontal lines (top, middle, and bottom lines) for letter formation.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history_of_France

法国的经济史

法国自18世纪末革命以来的经济历史与三个主要事件和趋势相关：拿破仑时代，与英国及其邻国在“工业化”方面的竞争，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全面战争”。

中世纪法国

罗马帝国的瓦解使法国经济与欧洲脱钩。城镇生活和贸易减少，社会成为自给自足的庄园的基础。在Merovingian时代存在的有限的国际贸易（主要是丝绸，纸莎草和白银等奢侈品）是由Radhanites等外国商人进行的。

由于新作物的到来，农业生产的改善和良好的天气条件，加洛林时代的农业产量开始增加。但是，这并没有导致城市生活的复兴。实际上，由于内战，阿拉伯袭击和维京入侵，城市活动在加洛林时代进一步下降。当贸易恢复时，这些中心成为新城镇的核心，商人和工匠的郊区在此发展。

在中世纪早期，加洛林时代的农业热潮延续。此外，在此期间，城市生活有所增加。巴黎等城镇急剧扩张。

近代法国

文艺复兴

在18世纪的上半个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以人口动态增长以及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为特征。直到1795年，法国还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第三大人口的国家，仅次于中国和印度。1400年的人口估计为1700万，17世纪为2000万，1789年为2800万，其人口甚至超过了俄罗斯，是英国和荷兰共和国的两倍。在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特征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尽管总的来说，法国仍然是一个深耕的乡村国家，只有不到10%的人口位于城市地区。巴黎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到18世纪末，估计人口为65万。

农业生产的各种食品扩大了：橄榄油，葡萄酒，苹果酒，羊毛“淡粉”（一种蓝色染料的来源）和藏红花。南方种植朝鲜蓟，瓜，长叶莴苣，茄子，婆罗门参，芹菜，茴香，欧芹和苜蓿。在1500年代之后，新世界作物出现，例如豆类，玉米，南瓜，西红柿，土豆和青椒。生产技术仍然与中世纪的传统息息相关，且单产低。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更多的适合耕种的土地变得稀缺。1550年代反复的灾难性收成使情况更加恶化。

工业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印刷（于1470年在巴黎推出，1473年在里昂推出）和冶金学。尽管法国仍然有必要进口许多金属，包括铜，青铜，锡和铅，但法国东北部引入高温锻造和增加矿产开采是重要的发展。大约二十年来，矿山和玻璃制品从皇家免税中受益匪浅。丝绸的生产使法国得以加入蓬勃发展的市场，但法国产品的质量仍低于意大利丝绸。羊毛生产很普遍，亚麻和大麻均为主要出口产品。

继巴黎之后，鲁昂是法国第二大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港口。马赛是法国的第二个主要港口：它极大地受益于1536年法国与苏莱曼（Suleiman）签署的贸易协定。为了增加海上活动，弗朗西斯一世于1517年建立了港口城市勒阿弗尔。其他重要港口包括土伦，圣马洛和拉罗谢尔。

里昂是法国银行业和国际贸易市场的中心。每年举行四次市场交易会，这促进了法国商品（例如布料和织物）的出口以及意大利，德国，荷兰和英国商品的进口。它还允许进口奇特的商品，例如丝绸，明矾，玻璃，羊毛，香料，染料。里昂还拥有欧洲大多数银行业家族的房屋，包括Fugger和Medici。区域市场和贸易路线将里昂，巴黎和鲁昂与该国其他地区联系在一起。在弗朗西斯一世和亨利二世的统治下，法国的进口与对英国和西班牙的出口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法国的青睐。与荷兰的贸易大致平衡，但由于意大利的丝绸和奇特商品，法国与意大利的贸易逆差持续不断。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英国，荷兰和佛兰德的海上活动将与法国贸易产生竞争，最终将主要市场转移到西北部，从而导致里昂的衰落。

从1524年开始，弗朗西斯一世开始赞助对新世界的探索。挥舞着法国国旗的著名探险家包括乔瓦尼·达·韦拉扎诺和雅克·卡地亚。后来，亨利二世赞助了尼古拉·杜兰德·德维格盖尼翁（Nicolas Durand de Villegaignon）的探险活动。

农村社会

在17世纪，与市场经济有联系的富农提供了农业增长所需的大部分资本投资，并经常在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或城镇）流动。地域流动性直接关系到市场和对投资资本的需求，是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法国社会的“稳定”核心，包括行会成员和乡村劳工。

1597年后，法国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天气温和有助于农业生产。亨利四世和他的部长马克西米利安·德·贝松（Maximilien de Béthune）、德·苏利（Duc de Sully）进行了货币改革。这些措施包括更好的造币，减少债务（1596年为2亿里弗）以及减轻农民的税负。亨利四世着手进行全面的行政改革，增加了官职，购回了已被割弃的王室土地，改善了道路，并为修建运河提供了资金。在亨利四世时期，主要由奥利维尔·德·塞雷斯（Olivier de Serres）发起了农业改革。

路易十四的荣耀与两个大项目联系在一起：军事征服和凡尔赛宫的建造，这两个项目都需要巨额资金。为了资助这些项目，路易创建了几种附加的税制，包括“人头税”（始于1695年），该税法向包括贵族和神职人员在内

的每个人征税。路易十四的财政部长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建立了一个商业体制，该体制利用贸易保护主义和政府资助的制造业来促进整个经济领域的奢侈品生产。国家建立了新的产业，接管了成熟的产业，保护发明者，从国外邀请工人，并禁止法国工人移民。为了在国外市场上保持法国商品的特色，科尔伯特（Colbert）拥有依法确定每件商品的质量和标准的权利，并严惩违反规定的行为。对奢侈品和宫廷生活（时尚，装饰，美食，城市改善等）的大量投资，使法国升格为欧洲品位的仲裁者。

由于无法取消各省之间货物运输的关税，科尔伯特尽其所能诱使各省实现货物均等化。他改善了道路和运河交通。为了鼓励像重要的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64年）之类的公司，科尔伯特授予与黎凡特，塞内加尔，几内亚和其他地方进行贸易的特殊特权，以进口咖啡，棉花，紫檀木，毛皮，胡椒和糖，但是这些冒险都没有成功。科尔伯特（Colbert）建立法国皇家海军取得了长久的影响。他重建了土伦（Toulon），创建了罗什福尔（Rochefort）的港口和军械库，以及罗什福尔（Rochefort），迪耶普（Dieppe）和圣马洛（Saint-Malo）的海军学校。在沃邦的协助下，他设防了许多港口，包括加来，敦刻尔克，布雷斯特和勒阿弗尔。

科尔伯特的经济政策是路易十四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和促进政府荣耀的关键要素，包括在建设出现了许多经济上的失败：对工人的限制过于严格，抑制了创造力，必须支付高昂的关税。

本世纪末的战争和天气使经济濒临崩溃。从1680年代到1720年代，农村地

区的形势严峻。为了增加税收，增加了行政管理和司法系统中官员职位的价格。国际贸易受到严重阻碍。法国绝大多数人口（主要是简单的农民）的经济非常不稳定，小冰河世纪导致进一步的农作物歉收。歉收导致饥饿。许多农民不愿出售或运送急需的谷物给军队，他们叛逆或攻击了谷物运输车队，但遭到国家的压制。同时，有谷物储备的富裕家庭却毫发无损。

十八世纪

在路易十四于1715年去世后的头几十年里，法国庞大而富裕，经济和人口的复苏缓慢。出生率很高，婴儿死亡率正在稳步下降。法国的整体死亡率从1750年的每10,000人平均死亡400人，降至1790年的328人，以及1800年的每10,000人298人。

该国的国际商业中心设在里昂，马赛，南特和波尔多。由于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增加，南特和波尔多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法国与她的加勒比殖民地（圣多明各，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之间的贸易在1715年至1789年之间增长了十倍，到1789年圣多明格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领土。从加勒比海进口的许多利润丰厚的产品再出口到其他欧洲国家。到1780年代后期，从加勒比地区进口到波尔多的87%的糖，95%的咖啡和76%的靛蓝被重新出口。加的斯是法国印花织物向印度，美洲和安的列斯群岛（咖啡，糖，烟草，美国棉花）和非洲（奴隶贸易）出口的商业中心，其中心位于南特。

工业持续发展，从1740年代开始平均每年增长2%，并在革命前的最后几十

年加速发展。这个时期最活跃的产业是矿山，冶金和纺织业（特别是印花织物）。这些领域的进步通常归功于英国发明家。例如，约翰·凯（John Kay）发明的飞梭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蒸汽机改变了纺织业。然而，对于商业企业而言，仍然难以筹集资金，而且法国政府仍然实行高度保护主义和干预国内经济。

1749年，颁布了一项以“狄克西米”为蓝本的新税种，称为“Ventitième”（或“二十分之一”），以减少皇室赤字。这项税收一直持续到古代制度结束为止。它仅基于收入，需要土地，房地产，商业，工业和官方机构净收入的5%，并且旨在触及所有公民，无论其身分如何。

交通的改善，例如不断扩大的道路和运河网络，以及尽职的驿马车服务（到1780年代已大大减少了巴黎与各省市之间的旅行时间），对扩大法国内部的贸易大有帮助。然而，大多数法国市场绝大多数都是本地市场（到1789年，只有30%的农产品在生产地以外的地方出售）。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和严重的内部关税壁垒导致了高昂的物流成本，这意味着像英国这样的统一国家市场仍然遥遥无期。在法国革命前夕，一批货物从洛林出发前往地中海沿岸的航行将被停止21次，并承担了34种不同的税负。

农业

从1730年代末和174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到接下来的30年，法国的人口和经济得到了扩展。农民的所有权份额基本上与上个世纪相同，在1789年，大约1/3的耕地由农民小农掌握。一种新的趋势是进入耕地的土地数量增加了。土地所有权的稳定使它成为一项极具吸引力的投资，因为它带来

了社会声望。

以英国和意大利的成功为蓝本的现代农业轮作和化肥等农业的重要发展已开始法国部分地区引入。但是，这些改革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传播到整个法国。在法国北部，三田制轮作制度仍然盛行，而在南部，则采用两田制制度。在这种方法下，农民每年闲置三分之一或一半的耕地作为休耕地，以恢复周期性的肥力。在任何时候，这都是相当大的土地浪费。

包括玉米和马铃薯在内的新世界农作物的种植继续扩大，并为饮食提供了重要的补充。但是，这些农作物的传播受到地理限制（马铃薯到阿尔萨斯和洛林，而玉米在法国南部更温带），大部分人口过分依赖小麦维持生计。从1760年代后期开始，更恶劣的天气一直导致小麦收成不佳（1770年至1789年之间只有3季被认为足够）。

造成不好的收成的苦难主要影响了占法国农民大部分的小业主和小农。土地价格上涨和需求旺盛，大型土地所有者继续繁荣。更为严重的经常性威胁是面包短缺和价格急剧上涨，这可能导致大规模破坏和骚乱。在富裕时期，法国的平均工资收入者可能仅将收入的70%花费在面包上。在短缺期间，当价格可能上涨多达100%时，对法国家庭来说，遭受贫困的威胁急剧增加。法国政府进行了调控谷物市场的尝试，但没有成功，在1760年代末取消了价格控制，在1770年代初重新实施了价格控制，然后在1775年再次取消了价格控制。在前一年的歉收之后，1775年放弃了价格控制。巴黎谷物价格暴涨50%；结果爆发的骚乱（称为“面粉大战”）席卷了法国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必须用武力平息。

奴隶贸易

来自于奴隶制的利益集中在1763年至1792年的南特，拉罗谢尔，波尔多和勒阿弗尔。“黑人”是专门从事资助和将黑人俘虏货物运送到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商人，这些国家的死亡率很高，需要持续的新鲜供应。这些黑人与彼此的家人通婚。他们对黑人的贬损使他们免受道德批评。他们坚决反对将《人的权利宣言》适用于黑人。当他们嘲笑奴隶们既肮脏又野蛮的时候，他们常常带着一个黑人情妇。法国政府向出售给殖民地的每只俘虏支付了赏金，这使该类企业获利并且爱国。

1770-1789

1770年代和1780年代的农业和气候问题导致贫困状况显著增加：在北部的一些城市，历史学家估计，贫困人口的比例达到了城市人口的20%以上。流离失所和犯罪活动（主要是盗窃）也有所增加，而土匪群体的增长成为一个问题。总体上，约有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口生活在贫困中，约有800万人。在歉收和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期间，这一数字可能会增加几百万。尽管贵族和富裕的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受到萧条的影响，但在这一时期受打击最大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

1788年残酷的冬天，路易十六将钱分配给凡尔赛的穷人。

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法国工业不断发展。引入了机械化，建立了工厂，垄断变得更加普遍。但是，由于英国在纺织和棉花行业的竞争，这种增长变得复杂。1786年签订的《英法商业条约》从1787年中期开始向英国

商品开放法国市场之后，法国制造商的竞争劣势得到了极大的体现。廉价和优质的英国产品削弱了国内产品的生产，并促成了1788年法国正在发生的严重工业萧条。1788年夏天，灾难性的收成歉收加剧了萧条，这种萧条在整个经济中都得到了反映。由于农民和打工仔被迫将其收入的较高比例用于面包，对制成品的需求也随之消失。

路易十五统治后期，经济出现了一些挫折。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导致皇家债务增加，法国几乎所有的北美资产也流失，但直到1775年，法国经济才真正开始进入危机状态。在过去的十二年中，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下跌，在1777年和1786年急剧崩溃，再加上诸如1775年至1789年的灾难性冬季等气候事件的加剧，造成了这一问题。由于政府负债累累，路易十六国王被迫允许Turgot和Malesherbes进行激进的改革。但是，贵族的不满导致了Turgot被解雇，Malesherbes于1776年辞职。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取代了他们。路易（Louis）在1778年支持美国独立战争，但《巴黎条约》（1783年）对法国的贡献很小。政府被迫增加税收，包括“vingtième”。内克于1781年辞职，由卡洛讷（Calonne）和布赖恩（Brienne）暂时取代，但他于1788年重新上台。

1789–1914年

自18世纪末革命以来的法国经济史与以下三个主要事件和趋势相关：拿破仑时代，与英国及其邻国在“工业化”方面的竞争，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全面战争”。对产出数据的定量分析表明，法国的人均增长率略低于英国。但是，英国人口数量增加了两倍，而法国仅增长了三分之一，因此

整个英国经济增长更快。弗朗索瓦·克鲁佐特 (FrançoisCrouzet) 简要总结了1815-1913年法国人均经济增长的起伏：

1815-1840：不规则，但有时快速增长

1840-1860：快速增长。

1860-1882年：放慢脚步；

1882-1896年：停滞；

1896-1913年：快速增长

在1870-1913年时期，安格斯·麦迪逊 (Angus Maddison) 给出了12个西方先进国家的增长率。就人均增长而言，法国大约是平均水平。但是，其人口增长仍然非常缓慢，以至法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率仅次于意大利，位居倒数第二。这12个国家/地区的总产值平均每年为2.7%，而法国仅平均为1.6%。

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旧政权时期出现的许多经济制约因素。它废除了行会制度以及税收耕种制度。自从13世纪，政府建立的基金为医院，贫困救济和教育提供了年度收入来源。法国大革命以后，该国大部分的慈善机构和学校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

1790-96年间，经济状况不佳，工农业产量下降，外贸锐减，物价飞涨。政府决定不废除旧债。取而代之的是，它发行了越来越多的纸币（称为“分配资产”），这些纸币据称是对应于被没收的土地。结果是通货膨胀加剧。政府实施了价格控制，并在黑市上迫害投机者和交易员。随着政府年度赤字从178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增加到1793年的64%，人们越来越拒绝纳税。到1795年，在1794年歉收和取消价格管制后，通货膨胀率达到3500%水平。整个1795年1月和2月，塞纳河（当时货物进出口的主要来源）冻结了，因此无法通过该处运输任何东西，例如食品，奢侈品和工厂赖以维持运转所需的材料。许多工厂和车间由于无法运营而被迫关闭，这导致失业人数增加。随着失业率的飙升，许多穷人（大多数人口）被迫出售自己的财产。另一方面，很少有钱人有钱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市场上存货充足，但只能以高价购买食物”。

资产的价值“从1794年7月的白银货币的31%跌至1795年3月的8%”。资产贬值的主要原因是历届革命政府过度发行货币，他们转向印刷更多货币，以及用更多的纸钞来资助不断增加的支出，尤其是在1792年革命战争爆发后。到1797年，已经印制了价值450亿里弗的纸币，这些纸币的总价值不到以1790年价格计算的七分之一。转让资产的贬值不仅导致通货膨胀加剧，而且对整个经济产生连锁反应。贷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导致他们收紧信贷并提高了利率。同样，与转让人挂钩的国家土地的实际价值也下降到其面值的25%。1803年，拿破仑终于用金法郎作为新货币结束了通货膨胀。

贵族和神职人员经济实力的下降也对法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随着诸如图尔（Tours），阿维尼翁（Avignon）或巴约（Bayeux）等城镇的修道院，分会和大教堂的关闭，成千上万的仆人，工匠或商人被剥夺了

生计。同样，贵族的外流破坏了奢侈品行业，给仆人以及依赖贵族消费的工业和供应网络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对于留在法国的那些贵族来说，激烈的反贵族社会环境要求人们穿衣和消费的模式更为适度；而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大大降低了所有人的购买力。例如，丝绸市场的暴跌意味着里昂丝绸之都的产量在1789年至1799年间下降了一半，造成了几乎三分之一的里昂革命前人口流失。

在城市中，随着限制性垄断，特权，壁垒，规则，税收和行会的消失，小规模的企业家精神蓬勃发展。但是，从1793年开始的英国封锁严重破坏了海外贸易。国民大会当年颁布的战时紧急情况，通过禁止必需品出口和禁止中立航运进入法国港口，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尽管这些限制在1794年解除，但英国人同时设法掌控了跨大西洋的运输路线，进一步减少了法国商品的市场。到1796年，对外贸易仅占法国经济的9%，而1789年仅为25%。

农业

革命改变了农业。它废除了欠当地教会的什一税和欠当地地主的封建会费。结果伤害了租户，他们支付了更高的租金和更高的税金。它使所有教堂土地以及流亡的保皇党敌人的土地国有化。巴黎政府计划通过发行转让物将这些没收的土地用于支出。随着由教会和贵族控制并由雇工工作的大庄园的瓦解，法国农村永久性地成为了小型独立农场的土地。

战时法兰西共和国在1792年至1802年之间的征兵需求导致农业工人短缺。农民也不得不面对军队来征用他们的牲畜；随之而来的粪便流失对土地的肥力和生产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总体而言，“革命”并没有极大地改变法国的商业体系，并且可能帮助冻结了小企业主的发展前景。典型的商人在一家人的帮助下拥有一家小商店，工厂或店铺，并有几名带薪雇员。大型工业并不像其他工业化国家那样普遍。

拿破仑：1799-1830

1799年后，拿破仑从金融体系开始，以多种方式为他的昂贵战争付出了代价。他招募了低工资的士兵，提高了税收，提供了大笔贷款，出售了天主教堂以前拥有的土地，将路易斯安那州卖给了美国，掠夺了被征服的地区并没收了当地粮食供应，并剥削征用了他控制的国家，例如意大利。

拿破仑时代（1795- 1815年）不断发生的战争以投资和增长为代价刺激了生产。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生产，防御工事，以及社会对建立和维持大规模军队的一般方式，经过几年的革命，暂时增加了经济活动。革命时代的通货膨胀因没有尽快印刷新货币而被制止。1815年，法国军队遭受了最后的挫败，战争基础崩溃。这导致整个欧洲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直到1914年。在此期间，可以实施重要的体制改革，例如实行高度合理化的法律制度。

从长远来看，拿破仑对法国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他确实清除了旧的行会和垄断以及贸易限制。他引入了度量系统并促进了工程学的研究。最重要的是，他通过创立不可或缺的法国银行开辟了法国金融界现代化。但是，

企业家几乎没有机会利用这些改革。拿破仑通过有系统地排除所有从英国进口的产品，提供了一个受保护的大陆市场。这样做的结果是鼓励了在工业革命已经进行得很好的英国的创新，并消除了法国对创新的需求。法国发生的创新集中在军队的军备上，在和平时期没有多大价值。在法国，1810-1812年的商业危机破坏了企业家所取得的成功。

随着波旁王朝在1814年的恢复，反叛贵族对企业家精神不屑一顾，重新掌权。英国商品泛滥成灾，法国以高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作出回应，以保护其既有的业务，特别是手工艺品和纺织品等小规模制造业。铁商品关税达到120%。

以前，农业从来不需要保护；但现在要对俄罗斯粮食等进口食品的较低价格进行征税以保护法国本地粮食种植者。法国的葡萄种植者坚决支持关税，他们的葡萄酒不需要关税，但他们坚持对茶进口征收高关税。一位农业代表解释说：“茶将使得经常饮用它的人转变成冷酷而烦闷的北欧人的类型，来打破我们的民族特征，而葡萄酒则唤起灵魂的那种温和的欢乐，使法国人具有和蔼可亲的机智。”法国政府篡改了统计数据，声称出口和进口在增长—实际上是停滞不前，而1826-1829年的经济危机使工商界幻灭，并将要使得他们支持1830年的革命。

银行和金融业

也许唯一成功和创新的经济部门是银行。巴黎在19世纪中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仅次于伦敦。它拥有强大的国家银行和众多积极进取的私人银行，为整个欧洲和扩展的法兰西帝国的项目提供资金。拿破仑三世的目标是超

越伦敦，使巴黎成为世界上首要的金融中心，但1870年的战争减少了巴黎金融影响的范围。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建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主要分支。

1812年，詹姆斯·梅耶·罗斯柴尔德（James Mayer Rothschild）从德国地区的法兰克福到达巴黎，并成立了“罗斯柴尔德·弗雷斯（De RothschildFrères）”银行。这家银行为拿破仑从厄尔巴岛的复辟提供了资金，并成为欧洲金融领域的领先银行之一。法国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家族为法国的主要战争和殖民扩张提供了资金。成立于1796年的法兰西银行帮助解决了1848年的金融危机，并成为强大的中央银行。国家科特迪瓦 Escompte 巴黎（CNEP）成立于1848年金融危机和共和革命期间。其创新包括为大型项目提供资金的私人 and 公共来源，以及建立了覆盖更多存款人的地方办事处网络。

PEREIRE兄弟创立了动产信贷公司。它成为法国，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大型项目的强大而有活力的融资机构。它专门从事采矿开发；它资助了其他银行，包括奥斯曼帝国银行和奥地利抵押银行；它资助了铁路建设。它还资助了保险公司和建筑承包商。该银行在跨大西洋轮船生产线，城市燃气照明，报纸和巴黎地铁公共交通系统上进行了大量投资。其他主要银行包括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Générale）和里昂信贷银行（CréditLyonnais）。

法国在1871年被击败后，不得不向德国支付巨额赔偿，德军继续占领直到偿还债务。赔款为50亿瑞士法郎，相当于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是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几乎是法国常年出口额的两倍。观察人士以为，赔偿金实际上是无法支付的，其目的是削弱法国，并为长期的军

事占领辩护。但是法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就偿付了它。黄金支付起到了强有力的刺激作用，极大地增加了法国的出口量，总体上为法国带来了积极的经济利益。

在巴黎交易所，证券交易成为一个关键市场，投资者在这里买卖证券。它最初是一个期货市场，并且开创了共同担保基金，从而使主要经纪人的破产不会升级为毁灭性的金融危机。

工业化

1815年的法国绝大多数是农民农场，拥有一些手工业。巴黎和其他规模较小的城市中心几乎没有工业。在19世纪初，法国的人均GDP低于英国和荷兰。这可能是由于更高的交易成本，主要是由于产权效率低下以及运输系统更适合军事需求而非经济增长所致。

历史学家不愿意在法国使用“工业革命”一词，因为缓慢的步伐似乎对整个法国来说都是夸大其词。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的工业革命进行得很顺利，并很快传到了比利时，在较小程度上传到了法国东北部。其余的变化不大。增长区域发展了以纺织品为主的工业，以及一些采矿业。工业化的步伐远远低于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自从1685年迫害新教徒以后，导致了大规模的企业家和机械人才的流失，这些人被证明是无法替代的。取而代之的是，法国商业惯例的特征是家族企业关系紧密，它们强调传统主义和家长制。这些特征支持强大的银行体系，并使巴黎成为豪华手工艺的世界中心，但它减慢了大型工厂和巨型公司的建设。拿破仑促进了工程教育，并获得了训练有素的毕业生的回报，他们开发了运输系统，尤其是

1840年以后的铁路。

零售

巴黎因将消费主义作为社会优先事项和经济力量而闻名世界，特别是通过其高档商店，豪华商店和大型百货商店来实现。这些是“梦想机器”，为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上乘消费设定了世界标准。巴黎在精致的百货商店中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以新颖且高度诱人的方式向高档消费者提供奢侈品和高品质商品。巴黎百货商店起源于magasin denouveautés或新奇商店；第一家是Tapis Rouge，创建于1784年。在19世纪初期，La Belle Jardiniere（1824），特洛伊斯区（Aux Trois Quartiers）（1829）和小圣托马斯（Le Petit Saint Thomas）（1830）蓬勃发展。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塞萨尔·比罗陶（CésarBirotteau）”中描述了它们的功能。在1840年代，新的铁路将富裕的消费者从广阔的地区带到了巴黎。奢侈品商店的规模不断扩大，并设有平板玻璃展示窗。

企业家阿里斯蒂德·布库卡特（Aristide Boucicaut）于1852年购买了巴黎的一家小商店Au BonMarché，设定了固定价格（无需与店员协商），并提供了兑换和退款的保证。他在广告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增加了各种各样的商品。1860年，销售额达到了500万法郎。1869年，他搬到了更大的地方。1877年，公司的销售额达到7200万。该多部门企业占地5万平方米，拥有1788名员工。一半的雇员是女性；未婚女雇员住在较高楼层的宿舍中。这一成功激发了众多竞争者，他们都在争夺高端客户。

法国人赞扬巴黎大商店带来的全国声望。伟大的作家埃米尔·佐拉（Émile Zola, 1840–1902年）在一家典型的百货商店摆放了他的小说《金·邦希尔（Au Bonheur des Dames）》（1882–1883年）。Zola将其表示为改善社会以及改善新技术的象征。这本小说描述了商品推销，管理技术，市场营销和消费主义。

其他竞争者降低规模以吸引更多的购物者。Grands Magasins Dufayel以低廉的价格提供服务，并致力于让工人懂得如何在新的非人性化的环境中购物。它在广告中承诺将有机会以合理的价格参与最新，最时尚的消费主义。诸如电影院和留声机的发明等最新技术得到了展示。自1870年以来，商店的雇员越来越多地包括年轻女性。尽管薪水低，工作时间长，但他们可以使用最新，最时尚的商品以及与高档客户互动。

到21世纪，大型巴黎百货商店在新的经济世界中难以生存。在2015年，仅剩4个。现在由奢侈品公司LVMH拥有Au BonMarché；BHV；老佛爷百货公司和巴黎春天百货公司。

铁路

在法国，铁路已成为落后地区现代化的一种国家媒介，诗人政治家拉蓬汀（Alphonse de Lamartine）就是这种方法的主要倡导者。一位作家希望铁路能改善“落后现代同胞两三个世纪的其他法国人口”的状况，并消除“孤独和痛苦带来的野蛮本能。”因此，法国建立了一个从巴黎辐射的集中铁路

系统（加上在南部从东向西切割的铁路线）。此设计旨在实现政治和文化目标，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经过一番整合后，六家公司控制了其地区的铁路垄断，受到票价，财务甚至是详细技术细节方面的政府严格控制。Ponts etChaussées的中央政府部门（桥梁和道路公路部门）引进了英国工程师和工人；英国人负责处理了大部分建筑工作：提供了工程专业知识和规划——涉及土地征用以及永久性基础设施（如轨道）的建设床，桥梁和隧道。它还对德国边境沿线的军事必需线进行了补贴。1878年，公共工程部长查尔斯·德·菲欣纳特（Charles de Freycinet）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计划，通常称为“菲欣纳特计划”，以应对1870年代后期出现的经济萧条。该计划涉及国家购买铁路以及为新铁路，水路和公路筹集资金。根据该计划建造了约150条铁路线，到1914年几乎完成。

私人运营公司提供管理，雇用劳动力，铺设轨道以及建造和运营车站。他们购买并维护了机车车辆，1880年有6,000台机车投入运营，平均每年有51,600名乘客以及21,200吨货运。许多设备是从英国进口的。尽管立即启动整个系统在政治上合宜的，但它延迟了完成时间，并甚至更加依赖从英国带来的临时进口。融资也是一个问题。解决方案是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筹集资金的狭窄基础以及巴黎证券交易所（Bourse）的封闭圈子，因此法国没有发展出与伦敦和纽约一样繁荣的国家股票交易所。

该系统确实帮助实现了其到达的法国乡村地区的现代化，但并没有帮助创建当地的工业中心。像埃米尔·佐拉（ÉmileZola）这样的批评家抱怨说，它从未克服政治体系的腐败，反而为之做出了贡献。

铁路通过促进原材料，葡萄酒，奶酪和进口制成品的全国市场而推动了法国的产业革命。然而，法国人为其铁路系统设定的目标是文化，政治和军事而不是经济。结果，与诸如英国，比利时或德国这样的快速工业化国家相比，货运列车更短，重量更轻。由于铁路的昂贵，法国农村地区的其他基础设施需求（如更好的道路和运河）被忽略了，因此对那些火车无法服务的地区似乎有净负面影响。

全面战争

与俾斯麦的德国相比，1870年法国工业实力的相对衰落在法普战争中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在这场冲突中，法国的彻底失败，不是法国弱点的体现，而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工业实力的体现。这与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对德国的占领形成了鲜明对比。到1914年，德国军备和一般工业化不仅超越了法国，而且超越了所有邻国。就在1914年之前，法国的煤炭产量大约是德国的六分之一，钢铁产量是德国的四分之一。

农民现代化

法国直到1840年还是一个乡村国家，但是在1850至1860年代铁路开始到来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学家尤金·韦伯（Eugen Weber）在他的开创性著作《农民法国人》（1976年）中追溯了法国乡村的现代化过程，并指出法国农村从落后，孤立到现代的变化进程，以及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所具有的法国民族感。他强调铁路，学校和普遍征兵的作用。他的研究结果基于学校记录，移民方式，兵役文件和经济趋势。韦伯认为，直到1900年左右，法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在各省中还很薄弱。然后，韦伯研究了第三

共和国的政策如何在农村地区建立法国国籍感。这本书广受赞誉，但遭到了特德·W·玛格丹特（Ted W. Margadant）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1870年前各省已经存在一种法式意识。

法国的国家政策在农产品方面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通过1892年的梅琳关税，以保护庞大的农业人口。法国维持着两种农业形式，即东北的现代，机械化，资本主义农业制度，以及其他地区。该国依靠低收入的非常小的农场来维持生计。生计部门的现代化始于1940年代，尽管保护主义措施仍然是国家政策，但法国农村人口迅速减少。

1914-1944年

1900-1999年法国的经济增长率

十年 年平均增长率

1900年代 2.27%

1910年代 1.89%

1920年代 4.43%

1930年代 0.63%

1945-49 2.16%

1950年代 3.85%

1960年代 4.98%

1970年代 3.10%

1980年代 2.02%

1990年代 1.30%

法国经济的整体增长率在1920年代和1960年代再次表现出非常强劲的表现，在1910年代，1930年代和1990年代则表现不佳。

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占领了法国东北部的的主要工业区，严重打击了法国经济。虽然1913年的占领区仅占法国工业工人的14%，但其生产的钢铁却占58%，煤炭仅占40%。1917-1928年间，美国粮食，金钱和原材料的大量涌入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缓解。1915年8月的《达比兹法》（Dalbiez Law）设定了战争经济各个部门所需的工人人数，试图在工业的劳动力需求与军队的征兵要求之间取得平衡。根据达比兹法律，在战争部控制下的“军事工人”被从前线部署到战争经济中去工作。

法国的信贷在1916年崩溃，英国开始向巴黎提供大笔贷款。纽约的摩根大通（JP Morgan & Co）银行在1916年秋季控制了法国的贷款，并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参战时将其移交给了美国政府。经济得到了由用于购买食品和制成品的美国贷款的帮助，这些食品和制成品使人们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战争造成的损失约占1913年GDP的113%，主要是生产性资本和住房的破坏。国债从1913年占GDP的66%上升到1919年的170%，大量使用债券发行来支付战争费用。通货膨胀严重，法郎兑英镑贬值了一半以上。

1919年至1929年

战争和德国对法国领土的占领对法国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与1913年相比，1919年法国工农业总产值下降了45%。被占领地区的基础设施—城镇，村庄，工厂，矿山和铁路—遭受了广泛的破坏或过度开发。北部和东北部10个省的91%的定居点遭受了物质破坏，有620个市镇被摧毁。原始的农业用地被毁，牲畜损失了。人口中的18%的不到27岁的年轻人中有27%被杀，这对婚姻和生育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将影响1930年代的劳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加上战争造成的伤亡人数，法国的人口比战争前少了280万人。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对战败德国的报仇是法国的主要主题。法国要求德国全额赔偿在德国占领区所遭受的损失。它还希望获得战后退伍军人的全部费用。克雷门梭（Clemenceau）总理在抵御英美两国适度影响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法国获得了大笔（但未指定）赔偿，重新获得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获得了统治非洲前德意志殖民地的部分授权。

1923年1月，作为对德国未能运送足够煤炭作为补偿的一部分的回应，法国（和比利时）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德国采取消极抵抗措施，包括印刷大量

马克货币以支付占领费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失控。通货膨胀严重损害了德国中产阶级（因为他们的银行账户变得一文不值），但同时也损害了法国法郎。法国煽动分裂运动，倾向于建立一个独立的缓冲国家，但在流血冲突后崩溃。法国于1924年夏接受了道威计划（Dawes Plan）中所表达的美国对赔偿问题的解决方案。

到1924年，法国工业生产率恢复到战前水平，到1929年，工业生产率比1913年提高了40%。法国政府放宽了移民规定，以弥补人手短缺的问题—结果约有200万工人抵达法国。通货膨胀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是由于政府的高额借贷和流通货币的大量增加（1920年底的流通量为379亿瑞士法郎，而1914年为60亿法郎）。消费者价格在1922年至1926年间翻了一番，法郎不断贬值（1914年，一英镑价值25法郎，到1926年7月，一英镑价值243法郎）。贬值是出口的福音，而通货膨胀减轻了债务负担。雷蒙德·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政府于1926年7月上台，通过减少政府支出，提高利率，提高税率和部分在1928年6月恢复金本位制，设法稳定了法国的金融状况。法郎的价值相当于战前水平的五分之一，这使法国商品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

大萧条

1929年后的世界范围经济下降对法国的影响稍晚于其他国家，大约在1931年左右。法国的萧条相对温和：失业率低于5%的峰值，生产下降最多比1929年的产出低20%；没有银行危机。但是，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法国的萧条持续时间也更长。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法国在19世纪引入了黄

金标准，这意味着通常可以用银行纸币兑换黄金。与其他国家（例如，英国于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不同，法国一直坚持金本位制直至1936年，这在衰退和通缩时期造成了许多问题。当法国放弃金本位制时，法国经济开始复苏。终止固定汇率制度为扩大的货币政策打开了机会，从而影响了消费者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这对国内需求至关重要。

但是，萧条对当地经济产生了一些影响，部分导致了1934年2月6日的骚乱，甚至是由SFIO社会主义领袖莱昂·布卢姆（Léon Blum）领导的人民阵线的形成，该阵线在1936年赢得了选举。

法国相对较高的自给自足程度，意味着所遭受的损失要比德国这样的国家要少得多。

人民阵线：1936年

艰苦的生活和失业率很高，足以引发骚乱和社会主义人民阵线的崛起，该阵线在1936年的选举中赢得了社会党和激进党联盟的支持，并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莱昂·布卢姆（Leon Blum）成为第一位社会主义总理。

选举带来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涉及200万工人，并导致许多工厂和商店被没收。罢工是自发的，无组织的，但是商业界感到恐慌，并秘密地与布卢姆会面，布卢姆通过谈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然后给予工会《马蒂尼翁协

议》的荣誉。新法律包括：

确认罢工权

广义集体谈判

颁布法律，规定带薪年假为12天

颁布法律，将每周工作时间限制为40小时（加班除外）

提高工资（收入最低的工人为15%，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人为7%）

规定雇主将认可商店管理员

确保不会对罢工者进行报复

建立了一个国家级的防务办公室（谷物委员会或小麦办公室，政府通过该办公室帮助以公平的价格向农民销售农产品），以稳定价格并遏制投机活动

军备工业国有化

向中小企业贷款

开始了一项重大的公共工程计划

提高了公共部门工人的工资，退休金和津贴

被左派反对对消费者征税的1920年销售税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生产税，生产税被认为是对生产者的征税，而不是对消费者的征税。

布鲁姆说服工人接受加薪，然后重新上班。工资急剧上升，两年内全国平

均水平上升了48%。然而，通货膨胀率也上升了46%。实施每周40小时的工作被证明是效率低下的，因为行业很难对其进行调整。经济混乱阻碍了改组工作，德国军备的迅速增长使布鲁姆感到震惊。他发起了一项重大计划，以加快军备生产。付出的代价迫使人民阵线放弃了社会改革计划，而这项计划已经成为人们的重担。

人民阵线的遗产

经济历史学家指出，许多不良的金融和经济政策，例如延迟的法郎贬值，使法国的出口失去竞争力。经济学家尤其强调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不利影响，这使加班被定为违法，迫使雇主在达到该40个小时的限制时停止工作或以劣等和经验不足的工人代替他们最好的工人。人们普遍认为，面对糟糕的经济状况，商业界的恐惧以及纳粹德国的威胁，法国无法承担劳动力改革的责任。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从经济学，外交政策和长期政治稳定方面来看，人民阵线是失败的。杰克逊说：“失望和失败是人民阵线的遗产。”但是，它的确鼓舞了后来的改革者建立了现代法国福利国家。

维希法国，1940-1944年

维希法国在德国占领下的条件非常恶劣，因为德国人剥夺了法国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作为战俘和“自愿”工人），并剥夺了许多粮食供应，同时要求巨额现金支付。在极权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一个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

1940年，政府直接控制了所有生产，这与德国人的要求保持同步。它用强制性的国家工会取代了自由工会；规定了劳工政策，但没有考虑工人的声音或需要。对法国经济的集中、官僚化控制并不成功，因为德国的需求越来越重，而且越来越不切实际；被动的抵抗力和效率低下的现象成倍增加；盟军轰炸机袭击了铁路。但是，维希为法国经济制定了第一个全面的长期计划。政府从未尝试过进行全面概述。戴高乐临时政府在1944-45年间悄悄地以维希计划为基础，制定了自己的重建计划。1946年的莫奈计划（Monnet Plan）建基于维希（Vichy）计划。因此，战时团队和战后早期的计划者都否决了战前的自由放任做法，并接受了急剧的经济改革和计划经济的体制。

强迫劳动

在整个战争期间，纳粹德国保留了将近250万名法国陆军战俘，作为强迫劳动者。他们增加了被占领国家（特别是金属工厂）的强制性（自愿）工人。维希政府于1941年9月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有效地将法国工人驱逐到德国，到1943年8月，法国人在德国的劳动力已占劳动力的17%。在埃森的克虏伯巨型钢铁厂工作的人数最多。低薪，长时间工作，盟军频繁轰炸，拥挤而糟糕的住房，加热不足，食物有限和医疗保健的不愉快，所有这些都由纳粹严厉的纪律加重了。他们终于在1945年夏天返回了家。二战期间，强迫劳动草案鼓励了法国抵抗运动，并破坏了维希政府。

粮食短缺

平民遭受各种消费品短缺。配给制度虽然严格但管理不善，导致营养不良，黑市交易，以及对国家食品供应管理的敌意。德国人夺取了法国约

20%的粮食产量，这严重破坏了法国人民的家庭经济。由于缺乏燃料，化肥和工人，法国的农场产量下降了一半；即使如此，德国人也没收了一半的肉，20%的农产品和2%的香槟。供应问题迅速影响了缺少大多数商品的法国商店。政府通过配给来解决问题，但是德国官员制定了配给政策，饥饿普遍存在，特别是影响到城市地区的年轻人。商店前面排长队。包括德国士兵在内的一些人受益于黑市，那里的食物不用配给票、而是以很高的价格出售。农民尤其将肉类转移到黑市，这对公开市场而言意味着食物商品更少。伪造的食品券也在流通中。从农村的农民那里直接购买农产品和以香烟为易货贸易已经很普遍了。但是，这些活动被官方严格禁止，因此有被没收和罚款的风险。在大城市，粮食短缺最为严重。然而，在偏远的乡村，秘密屠宰，菜园和奶制品的供应使人们得以更好地生存。

从1944年起

战时以及战后不久的艰辛历险岁月之后，是一段稳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法国，如今经常被人们亲切地回忆为“三十光辉岁月”（Les Trente Glorieuses）。“干预主义”和“自由市场”思想的交替政策使法国得以建立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可以取得工业和技术上的进步，同时也可以建立和保护工人的安全和特权。1946年，法国与美国签署了一项条约，免除了其大部分债务。它被称为布鲁姆-伯恩斯协议，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James F. Byrnes）和法国政府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代表让·莫奈（Jean Monnet）于1946年5月28日签署的法美协议。这项协议消除了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欠美国的部分债务（20亿美元）。

到20世纪末，法国再次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大国。

重建与福利国家

重建工作于1945年战争结束时开始，并恢复了对未来的信心。随着婴儿潮的发展（早在1942年就开始了），出生率迅速上升。为了解决战争造成的损失，花费了数年的时间—战斗和轰炸摧毁了数座城市，工厂，桥梁和铁路基础设施。1,200,000座建筑物被摧毁或损坏。

1945年，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建立起来。经济计划是由让·莫奈（Jean Monnet）领导的粮食计划署于1946年发起的。1947年至1952年的第一个《现代化计划》，重点是基本经济活动（能源，钢铁，水泥，运输，农业设备）；第二个计划（1954-1957年）的目标更广泛：房屋建设，城市发展，科学研究，制造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债务自1931年以来一直暂停付款，该债务在1946年的布鲁姆-伯恩斯协定中进行了重新谈判。美国免除了全部28亿美元的债务，并向法国提供了6.5亿美元的新贷款。作为回报，法国谈判代表让·莫内（Jean Monnet）制定了法国恢复和发展五年计划。现在，每月可以在法国电影院放映三周的美国电影。

国有工业

主要工业的国有化发生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但从未完成。铁路在1937

年被国有化，因为它们亏损，但在战略上却很重要。同样，航空和军械工业也被国有化。战争期间，维希政府冻结了工资，冻结了价格，控制了对外贸易，并监督了原材料向制造业的分配。法国经济在没有重大政治反对的情况下接受了越来越高的国有化水平。战后，电力，天然气和电力产业在1946年被国有化，目标是提高效率。银行和保险业与钢铁业一起被国有化。但是，人们并不认为石油如此重要，也没有将其国有化。

Monnet计划

为了帮助法国经济重建，根据蒙奈特计划，从战败的德国收回了被盗资源的价值。作为这项政策的一部分，德国工厂被拆散并搬到了法国，煤炭丰富的萨尔保护国被法国占领，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在萨尔盆地。因此，在1947年至1956年期间，法国得益于萨尔州的资源和生产，并继续从Warndt煤炭矿床中提取煤炭，直到1981年。萨尔州于1957年回归德国。欧洲煤钢共同体（欧盟的前身）在战后欧洲和法国的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济复苏

尽管1945年法国的经济形势严峻，但到1950年代经济又恢复了正常增长。美国政府曾计划实施一项重大援助计划，但在1945年夏末意外终止了Lend Lease（租借条约），美国国会在1945-46年阻止了额外的援助。但是，有2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法国得益于成功的生产战略，人口激增以及技术和政治创新，从而重新获得了国际地位。经济恢复状况因公司行业而异。有些被摧毁或破坏，被国有化或被征用，但大多数仍在进行生产，有时比战

前更努力，更有效地工作。

Monnet计划提供经济政策连贯的框架，并得到马歇尔计划的强烈支持。它的灵感来自于凯恩斯主义的温和自由贸易思想，而不是国家控制。

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帮助法国经济复兴，从而给了法国23亿美元援助款项而无须偿还。法国同意减少贸易壁垒并使其管理体系现代化。1946-1953年，美国对法国的所有赠款和信贷总额达到49亿美元，而低息贷款又增加了20亿美元。马歇尔计划邀请了法国人对美国工业的密集考察。法国组织了4700名商人和专家，派出了500个考察团，参观了美国的工厂，农场，商店和办公室。美国工人的繁荣给他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美国工人能够以九个月的工作时间购买廉价的新汽车，而法国工人需要30个月。一些法国企业抵制了美国化，但另一些企业则抓住了机会来吸引美国的投资并建立更大的市场。美国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包括化学，石油，电子和仪器仪表。他们是最具创新性和最赚钱的行业。

Les Trente Glorieuses: 1947年至1973年

1947年至1973年之间，法国经历了让·富拉斯蒂·特伦特·格洛耶兹（Jean Fourastié 《Trente Glorieuses（荣耀的三十年）》）所说的繁荣时期（平均每年增长率5%）；该书于1979年出版。1946年至1960年代末，法国人口增长了达到创纪录的30%。到1967年，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年龄在20岁以下。人口增长不仅是由于较高的出生率，而且是由于医疗，住

房和营养状况的改善推动了死亡率的下降。婴儿死亡率从1950年的52.0下降到1970年的18.2。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和工作时间的增加。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1950年代的每年约20%上升到1974年的峰值24.7%，是欧洲最高的。由于货币管制和“国际资本流动性有限”，放贷人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进行投资。投资推动了生产方法的不断改进，使汽车之类的产品对普通民众而言更便宜。

法国政府通过“指示性计划”将其权力引导至目标行业，地区和特定产品。该国关注刺激持续的现代化和结构调整，并通过改善沟通，税收政策，出口信贷以及确保企业获得廉价贷款的方式来鼓励这种发展。被认为具有“战略性国家重要性”的项目和产业也可以依靠法国政府的支持。其中包括核电计划，军备工业，基础设施和航空航天工业。

在1950年代，农业生产力猛增。法国已从为满足其人口需求的食品进口国转变为自给自足和剩余产出。1957年至1961年的第三个现代化计划着重于对法国北部和巴黎地区的主要农产品进行投资：肉类，牛奶，奶酪，小麦和糖。为这种盈余寻找出口市场的愿望是法国于1957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决定的重要因素。法国赢得了诸如价格支持，对农民的收入支持以及其成员国承诺提供的让步等优惠。作为交换，法国向德国的非农产品出口开放了市场。到196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之间的关税实际上已被取消，法国消费者受益于意大利家用电器的进口，例如冰箱和洗衣机，以及来自西德的机床。EEC成员资格导致经济结构变化，高水平的增长，法国与其EEC合作伙伴之间的贸易水平飞涨以及高水平的投资。商人和农民在适应更大的竞争和共同市场的同质性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中，会员制的“变革刺激”最为有效：农业，食品加工，飞机和汽车制

造业。

生产力的提高来自追赶美国。1950年，法国的平均收入是美国人的55%，到1973年达到80%。在1960年至1975年之间，人均收入几乎翻了一番。在主要国家中，在这个时代，只有日本和西班牙的增长快于法国。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被用来支持法国的产业。

法国历史学家雅克·马赛（Jacques Marseille）坚持认为，这段时期不是经济奇迹，而只是在经济滞后之后迎头赶上。

乡村生活

在政府的支持下，活跃的农民收购了土地，扩大了财产，并使用了最新的机械化技术，新的种子，肥料和新种植技术。结果是农业产业的革命，并将活跃的农民人数从1946年的740万急剧减少到1975年的200万。这也导致了数百万空置的旧农舍。它们迅速被法国人购买和升级，他们希望远离城市的喧嚣。对于许多人来说，对家庭生活的怀旧使城市居民回到了乡村。

经济危机

到1960年代后期，法国的经济增长虽然强劲，但开始失去动力。全球货币危机意味着法郎对1968年的西德马克和美元贬值，这是该年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

经济动荡标志着吉斯塔德·德斯坦政府以及总理雷蒙德·巴雷（Raymond Barre）的上台（1974-1981）。1976年，他们倡导了许多复杂而严格的政策（“Barre计划”）。第一个Barre计划于1976年9月22日提出，其首要任务是制止通货膨胀。其中包括三个月的价格冻结；减少增值税；工资控制；减少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并增加所得税，汽车税，奢侈品税和银行利率。采取了恢复贸易平衡，支持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措施。对价格上涨的石油进口量进行限制。为出口提供了特殊援助，并设立了一个行动基金来援助工业。对遭受干旱的农民和社会保障的财政援助有所增加。

经济问题一直持续到弗朗索瓦·米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担任总统的初期。19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导致采取更加务实的经济干预方法。在这十年的后期恢复了增长，但由于1990年代初期的经济萧条而减缓了增长。在1990年代后期的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领导下的自由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在2005年之后，世界经济停滞不前，2008年全球危机，导致了尼古拉斯·萨科齐的保守政府，他于2012年反对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

法国最近的经济历史没有其他许多国家那么动荡。在长期稳定之后，法国的平均收入在1700年至1975年之间增长了11倍，年增长率为0.9%。法国的工资等于或略高于EEC（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平均水平。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后果

[illegible]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history_of_the_United_Kingdom

英国的经济史

苏格兰，英格兰和威尔士从1601年开始共享君主，但它们的经济是分开经营的，直到1707年《联邦法》将它们统一为止。爱尔兰于1800年至1920年并入英国经济；从1921年起，爱尔兰自由国（现代的爱尔兰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并制定了自己的经济政策。

1600年和1700年之间，英国尤其是欧洲最繁荣的经济区域之一；从十八世纪中叶发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这些事态发展使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成为欧洲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杰出的工业强国和主要政治强国。它的工业家是机器的主要创新者，例如蒸汽机（用于泵，工厂，铁路机车和轮船），纺织设备和工具制造。英国人开创了铁路系统，并建立了许多系统，制造了其他国家/地区使用的大多数设备。它的商人是国际贸易和银行业，贸易和航运业的领导者。它的市场既包括独立地区，也包括不断扩展的大英帝国的各个部分。1840年以后，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自由贸易，几乎没有关税，配额或限制。强大的皇家海军保护英国的商业利益，航运和国际贸易，而英国的法律体系提供了相对廉价的解决争端的系统，伦敦金融城成为经济首都和世界经济的焦点。

从1870年到1900年，英国的人均经济产出上涨了50%。然而，尽管经济取得了显著增长，但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由于美国和德国的工业扩张，英国在19世纪后半叶经历了相对的经济衰退。1870年，英国的人均产出是世界第二高的国家，仅次于澳大利亚。1914年，英国人均收入是世界第三高，仅次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有着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遗产。1950年，英国的人均产出仍比欧洲经济共同体六大创始成员国的平均水平高30%，但在20年内，它已被大多数西欧经济体所超过。

历届英国政府对这一问题表现的反应是在后来的欧盟内寻求经济增长的刺激；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此后，英国的相对经济表现大幅改善，以至于在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英国人均收入超过了法国和德国；此外，英美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显著减少。

16-17世纪

在16和17世纪，发生了许多基本的经济变化，这些变化导致收入增加，并为工业化铺平了道路。1600年以后，北海地区从地中海地区接管了欧洲领先的经济中心的角色，在此之前，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以及地中海是欧洲最发达的地区。

约翰·利兰（John Leland）在1531年至1560年的旅行中留下了丰富的当地经济描述。他描述了市场，港口，工业，建筑物和运输联系。他表明，一些小城镇正在通过新的商业和工业机会而扩大，特别是在布料制造方面。他发现其他城镇的数量在下降，并建议企业家和捐助者的投资使一些小城镇得以繁荣发展。税收是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因为它不是对消费而是对资本投资而征收。

根据德里克·赫斯特（Derek Hirst）的说法，1640年代和1650年代经历了复苏的经济，其特征是制造业增长，金融和信贷工具的完善以及通讯的商业化。绅士们有时间从事休闲活动，例如赛马和保龄球。在高级文化中，重要的创新包括发展大众音乐市场，增加科学研究和扩大出版。

货币供应量的增长

曼彻斯特大学的努诺·帕尔玛（Nuno Palma）博士说，有多种结果都促进

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增长模式的关键特征包括专业化和结构变化，以及市场参与度的提高。货币（银和黄金）的新供应增加了货币供应。商业交易不是由未来的期票付清，而是由实物支持。这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覆盖范围，并为参与现金交易提供了激励和机会。对亚洲奢侈品的需求出现了，例如丝绸和胡椒，这创造了新的市场。

存在各种通货膨胀压力；一些是由于新世界黄金的涌入和人口的增加。通货膨胀对大多数家庭的实际财富产生负面影响。

出口

出口显着增加，特别是在大英帝国内部。大多数私有公司与西印度群岛，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地进行贸易。主要业务是布料的出口，特别是白色（未染色）羊毛宽幅布的出口。这使他们能够进口各种各样的外国商品。

羊毛业

羊毛布是继农业之后的主要出口产品。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是威尔特郡羊毛工业的黄金时代。在中世纪时期，原羊毛已经出口，但是现在英格兰有了一个以其1100万只绵羊为基础的产业。伦敦和城镇从经销商那里购买羊毛，然后将其发送到农村家庭，在那里，家庭劳动将羊毛变成了布料。他们洗了羊毛，将其梳理并纺成线，然后在织机上变成了布。出口商人被称为商人冒险家，他们向荷兰和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出口羊毛。来自法国的Huguenots（躲避法国天主教政治势力迫害的法国新教徒们）的到来带来了新技能，从而扩大了该行业。

贸易和工业在16世纪蓬勃发展，使英格兰更加繁荣，并改善了上层和中层阶级的生活水平。在17世纪，粮食供应有所改善。从1650年到1725年，英国没有粮食危机，当时法国异常地容易遭受饥荒。

18世纪

贸易国

18世纪繁荣昌盛，企业家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了业务范围。到1720年代，英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虽然其他主要大国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领土利益和保护其王朝（例如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以及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但英国拥有一系列不同的主要利益。它的主要外交目标（除了保护祖国免受入侵之外）是为其商人，制造商，托运人和金融家建立一个全球贸易网络。这需要皇家海军如此强大，以至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能够从世界贸易路线上掠夺船只或入侵不列颠群岛。伦敦政府通过纳入众多伦敦私人融资公司来建立贸易站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开设进出口业务，从而增强了私营部门的实力。

英国参与了1740年至1783年的四次主要战争，在贸易方面取得了可观的回报。与新美利坚合众国的非常有利的贸易关系弥补了13个殖民地的损失。

出口从1700年的650万英镑猛增到1760年的1470万英镑和1800年的4320万英镑。其他大国也建立了类似的专营企业，但规模更小。只有荷兰和英国一样重视贸易。

重商主义时代

重商主义的目标是保持贸易顺差，以便黄金和白银涌入伦敦。政府通过关税和税收分担了一部分，其余的则流向了英国的商人。政府将大部分收入用于一支精湛的皇家海军。

制造业

除羊毛之外，棉花，丝绸和亚麻布的制造在1600年以后也变得很重要，煤和铁也是如此。

1709年，亚伯拉罕·达比一世（Abraham Darby I）建立了一个用焦炭燃烧的高炉，用于生产铸铁；焦炭代替木炭，但仍继续使用高炉。随之而来的廉价铁的供应是导致工业革命的因素之一。到18世纪末，因为铸铁更便宜，从而代替了锻铁。直到18世纪，铁的碳含量才被了解到是锻铁，铸铁和钢的性能差异的原因。

工业革命

从1770年代到1820年代，英国经历了加速的经济变化过程，该过程将原本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英国转变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经济体。这种现象被称为“工业革命”，因为这种变化在英国许多地区，尤其是在发展的城市中，影响深远且持久。

经济，体制和社会变革是工业革命兴起的基础。专制主义在整个欧洲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正常的治理形式，而在英国，则在1640年和1688年光荣革命

后建立了基本的权力平衡。新的体制设置确保了财产权和政治安全，从而支持了经济繁荣的出现。另一个因素是年轻人获得更多的教育，从而在人口中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这些变化增强了已经相对发达的劳动力和金融市场，为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英国提供了法律和文化基础，使企业家能够开创工业革命。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以前的部分体力劳动和以畜牧业为基础的经济开始向机器制造过渡。它始于纺织工业的机械化，炼铁技术的发展以及精炼煤的增加使用。通过引入运河，改善公路和铁路，扩大了贸易。工厂将成千上万的人从农业的低生产率工作拉到了高生产率的城市工作。

引入以煤为燃料的蒸汽动力，广泛使用水车和动力机械（主要是在纺织制造业），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19世纪前二十年，全金属机床的发展促进了更多生产机器的制造，从而可用于其他行业。这种影响在19世纪蔓延到西欧和北美，最终影响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一过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持续。历史学家艾玛·格里芬（Emma Griffin）特别强调了蒸汽机在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作用。

根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这种变化过程的基础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清教徒伦理。它产生了适应创新并致力于职业道德的现代人格，推动了土地产业和商人精英现代化，并建立了能够生产日益廉价的粮食供应的农业体系。清教徒运动（使人们阅读圣经）增加了识字率，并在技术熟练的工匠中展开“新教工作道德”。

从18世纪上半叶开始，长期丰收，导致可支配收入增加，对制成品（尤其是纺织品）的需求随之增加。约翰·凯（John Kay）发明的飞梭技术使较宽的布料能够更快地编织，但也带来了无法满足的纱线需求。因此，与初期工业革命有关的主要技术进步与纺丝有关。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创造了Spinning Jenny，这是一种能够执行许多纺车工作的装置。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了水框架可以由水车提供动力。阿克赖特（Arkwright）在英国广泛引入了工厂体系，是英国历史上成功的纸厂所有者和工业家的第一个例子。水框架很快就被塞缪尔·克伦普顿（Samuel Crompton）发明的旋转子（水框架和Spinning Jenny的结合）所取代。“穆勒鞋”后来由斯托克波特的霍罗克斯先生用铁具建造。

当这些纺织机械由水驱动时，第一批工厂是在溪流或河流附近的农村地区建造的。在它们周围创建了工人村庄，例如苏格兰的New Lanark Mills。

蒸汽机的发明，成为一个新动力，它很快超过瀑布和马力。第一台可行的蒸汽机是Thomas Newcomen发明的，用于从矿井中抽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发明了一种更强大的蒸汽机；它有一个能够为机械提供动力的往复式发动机。第一家蒸汽驱动的纺织厂开始出现在18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这将工业革命转变为一种城市现象，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城镇的出现和快速发展。

纺织品贸易的进展很快超过了原材料的供应。到19世纪初，尽管羊毛仍然是约克郡的主要纺织品，但美国进口的棉花取代了英格兰西北的羊毛。在

这一时期，纺织品被确定为技术变革的催化剂。蒸汽动力的应用刺激了对煤炭的需求。对机械和轨道的需求刺激了钢铁工业；运输原材料和成品的运输需求刺激了运河系统和铁路系统（在1830年之后）的发展。

如此空前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仅靠内需来维持。技术的应用和工厂系统创造了如此高的批量生产水平和成本效率，使英国制造商能够向全球出口廉价的布料和其他物品。

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认为1790年代是工业革命的“起飞”时期。这意味着它成为持续的工业和技术扩张的不可阻挡和不可逆转的过程。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一系列技术进步引发了工业革命。英国作为世界顶级贸易商的地位帮助资助了研究和实验。美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储备，这是新革命的主要动力。

它也被称赞为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即，强调技术进步、生产率、自由贸易】。反对重商主义【即，强调贸易顺差，积累金银货币收入】的斗争由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约瑟夫·休姆（Joseph Hume），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和约翰·罗巴克（John Roebuck）等许多自由派思想家领导。

一些人强调了英国从其许多海外殖民地获得的自然或财政资源的重要性，

或从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英国奴隶贸易中获利的重要性，这有助于推动工业投资。但是，已经指出，在工业革命时期，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种植园提供的英国国民收入不到5%。

工业革命见证了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变。以前，大型工业必须靠近森林或河流才能获得动力。使用燃煤发动机可以将工业放置在大型城市中心。事实证明，这些新工厂比以前的家庭手工业更有效地生产商品。这些制成品销往世界各地，原材料和奢侈品进口到英国。

帝国

在工业革命期间，帝国变得不那么重要，人们对其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低。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中的失败使它失去了最大，最发达的殖民地。这种损失使人们意识到，殖民地对本国经济并不是特别有利。人们已经意识到，占领殖民地的费用往往超过了纳税人的财务收益。换句话说，无论海外政治实体名义上是否归属大英帝国统治，只要贸易可以继续，大英帝国对海外政体的实际统治权力并不会带来额外巨大利益。美国革命通过证明英国仍然可以控制与这个北美前殖民地的贸易、却不必为防御和治理而付出代价，证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原则鼓励英国授予其殖民地自治权，首先是加拿大（加拿大在1867年成为统一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政体），而澳大利亚在1901年也随之效仿。

拿破仑战争

英国在与拿破仑对抗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其优越的经济状况。它能够调动该国的工业和金融资源，并将其用于击败法国。英国拥有1600万人口，几乎只有法国（3000万）的一半。就士兵数量而言，法国士兵的数量上虽然多，但是，英国支付相当大的比例的奥地利和俄国士兵参战，在1813年达到45万人的峰值。

最重要的是，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保持强劲。纺织品和铁增长迅猛。由于对大炮和军需品的需求，因此钢铁产量有所增长。农产品价格飞涨，这是农业的黄金时代，尽管一些地方出现了粮食短缺。总体而言，在1795年至1815年间，农作物的产量增长了50%。

将制成品走私到非洲大陆的制度破坏了法国通过切断市场来破坏英国经济的努力。井井有条的商业部门将产品带到了军队需要的地方。英国生产商不仅为英国人提供制服，还为盟国以及法国士兵提供衣服。英国利用其经济实力扩大了皇家海军的实力，将护卫舰数量增加了一倍，并将大型舰艇的数量增加了50%，同时在1793年战争爆发后的八年中，水手人数从15,000人增加到133,000人。与此同时，法国的海军萎缩了一半以上。

1814年英国的预算达到6600万英镑，其中包括海军1000万英镑，陆军4000万英镑，盟国1000万英镑和3800万英镑的国债利息。国家债务飙升至6.79亿英镑，是GDP的两倍以上。尽管土地税和新所得税增加了，但它还是得到了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和纳税人的支持。战争的全部费用达到了8.31亿英镑。相比之下，法国的金融体系不完善，拿破仑的军队不得不部分依靠对于征服土地的剥夺。

长期有利影响

奥布莱恩考察了1793–1815年战争的长期经济影响，发现除了对工人阶级的损害之外，战争总体上是有利的。劳动力转移到海军中并没有损害经济；事实证明，英国对海洋的控制是建立自由贸易全球经济的最佳选择，并帮助英国获得了全球运输贸易和金融支持服务的最大份额。除建筑业外，对农业和大多数工业都是积极的。资本形成的速度有所放慢，如果没有战争，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甚至可能更快。最不利的影响是城市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下降。

十九世纪

19世纪，英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先进的经济体。在1780年至1870年的90年中，人均实际GDP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人均\$3263。这比美国的人均GDP高出三分之一，比法国和德国高70%。其经济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到1870年，三分之一的人口从事于制造业（当时，美国有六分之一的劳动力从事于制造业）。1880年，可量化的蒸汽动力水平（在工业和铁路旅行中）达到了7,600马力，这是美国所无法比拟的。城市化进程如此激烈，到1901年，80%的英国人口居住在城镇中。人口超过50,000的城镇数量在1847年至1850年间达到了32个，是德国的两倍，几乎是美国的五倍。到1901年，英国有74个城镇达到了50,000最低门槛。

自由贸易

关税税率（法国，英国，美国）

由于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等政治理论家的非凡强大影响力，自由贸易在1780年从思想上建立、并在1840年代开始实施。他们有说服力地指出，重商主义的旧政策阻碍了英国经济，如果不受重商主义限制，那么，英国经济将主导世界贸易。如预料的那样，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在1850年代就已显现。

1840年后，英国致力于经济发展，实行自由贸易，没有任何壁垒或关税。这在1846年《玉米法》的废除中最为明显，该法曾经对进口谷物征收严格的关税。这些法律的终结使英国市场不受限制地面对竞争，谷物价格下跌，食品变得更加丰富。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政府于1842年以每磅7便士的税率对于收入超过150英镑的人重新征收所得税，以此补偿因取消700多种商品的进口税而导致的政府收入损失。

从1815年到1870年，英国收获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工业化国家的好处。它称自己为“世界的生产车间”，这意味着其成品的生产是如此高效和廉价，以至于它们经常可以在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市场上出售，其竞争力可以超过那些地方的本地制造产品。

如果特定海外市场的政治状况足够稳定，那么英国可以仅通过自由贸易来主导其经济，而不必诉诸正式统治或重商主义。英国甚至满足了德国，法国，比利时和美国等国家的制成品需求的一半。到1820年，英国的出口额中有30%用于其帝国海外领地，到1910年缓慢上升至35%。直到19世纪后期，印度在进口和出口方面仍是英国的经济重地。1867年，当英国向她的

帝国海外领地出口总计5000万英镑货品时，仅印度市场就有2100万英镑。仅次于印度，但紧随其后的是澳大利亚；其从英国的进口总额为800万英镑。其次是加拿大（580万英镑），香港（250万英镑），新加坡（200万英镑）和新西兰（160万英镑）。虽然这些数字无疑是巨大的，但它们仅占英国总出口的三分之一，与四十年前相同。

除了煤炭，铁，锡和高岭土外，大多数原材料都必须进口，因此在1830年代，主要进口是（按顺序）：原棉（来自美国南部），糖（来自西印度群岛），羊毛，丝绸，茶（来自中国），木材（来自加拿大），葡萄酒，亚麻，皮革和牛脂。到1900年，英国的全球份额已飙升至进口总额的22.8%。到1922年，其全球份额已占全球总出口的14.9%和制成品出口的28.8%。

然而，尽管在1890年代英国坚持其自由贸易政策，但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和德国分别转向高关税和适度高关税。美国重工业的增长快于英国，到1890年代，它已在世界市场上与英国的机械及其他产品竞争。

农业

1846年废除《玉米法》（Corn Laws）的背后驱动因素是进口食品的自由市场，随着世界农业生产的增加，英国消费者获得了长期利益。到1870年代，随着美国中西部和加拿大内部对机械耕种的开放，加上较低的全球运输成本，谷物的全球价格开始急剧下降。这降低了生活成本，使英国能够

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需求（1870年至1914年间英国谷物进口量增长了两倍，而1871年至1901年间人口增长了43%）。它还导致了1870年代后期英国农业在农村的大萧条，那里一系列的歉收加上外国谷物价格便宜得多，导致英国农业部门长期下滑。像东安格利亚这样的小麦产区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小麦总种植从1870年农业总产值的13%下降到1900年的4%。土地所有者主张重新引入《玉米法》以保护家庭农业，但是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首相拒绝了；他辩称，恢复贸易保护主义将危害英国的制造业至高无上的地位。

除了需求的普遍下滑之外，英国农业的更大机械化（以蒸汽动力打谷机，割草机和收割机的引入为代表）也增加了农村工人的失业率。结果是加速了人口从乡村到城镇的迁移，那里的工厂，家政服务和其他职业提供了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机会。在1861年至1901年间，农村男性劳动力减少了40%，而农业在国民财富中所占的比例从1851年的20.3%下降到1901年的6.4%。萧条并不仅仅适用于国内食品产业，也包括羊毛生产商（这曾经是英国国内至关重要的行业），因为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进口的廉价羊毛大量涌入。在19世纪后期，只有精选的必需农产品（如牛奶和肉类）才具有强劲的国内产业需求。

在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农业的盈利能力下降，使英国土地所有者难以维持其习惯的生活方式。数百年来一直支撑着英国贵族制的土地所有权和财富之间的联系开始不可避免地下降。1870年代中期至1890年代中期，租金下降了约26%，而耕地的数量下降了约19%。在1809年至1879年之间，有88%的英国百万富翁被定义为土地所有者；在1880年至1914年间，这一比例下降到33%，原因是工业和金融领域出现了一类新的富豪阶层。

铁路

英国发明了现代铁路系统，并将其出口到世界。在此以前，英国精心设计的运河和公路系统，都使用马来运煤。煤炭点燃了纺织工厂安装的新型蒸汽机。英国还拥有创建和资助铁路系统所需的工程师和企业家。1815年，乔治·史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发明了现代蒸汽机车，掀起了一场技术竞赛：使用越来越高的蒸汽压力的更大，更强大的机车。伦敦将钱投入到铁路建设中。托马斯·布拉西（Thomas Brassey）将英国的铁路工程技术带到了世界各地，其施工人员在1840年代在欧洲雇用了75,000名工人。每个国家都效仿英国的模式。

布拉西扩展到整个大英帝国和拉丁美洲。他的公司发明和改进数千种机械设备，并发展了土木工程科学来建造道路，隧道和桥梁。尽管电报是单独发明和开发的，但它被证明对于铁路的内部通信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使较慢的火车在特快列车驶过时停下来。电报使得一条铁路轨道进行双向交通成为可能，并可以方便地确定铁路需要维修的地点。英国的伦敦金融体系优越，到1914年资助英国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其他地区的铁路。繁荣时期是1836年和1845-47年，当时国会批准了8,000英里的里程、预计未来总额为2亿英镑的铁路建设计划；这大约相当于英国一年的GDP总值。

到1850年，英国已经有了一个完善的，设计精良的铁路系统，该系统可以快速，准时，廉价地将货物和人员运送到每个城市和大多数农村地区。煤

炭的运费已降至每吨英里一分钱。该系统直接或间接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工程师，指挥，机械师，修理工，会计师，车站代理和经理，使业务复杂性达到了新的高度。这种业务管理模式可以应用于许多其他行业，并帮助许多大小企业扩展它们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因此，铁路对工业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降低运输成本，铁路降低了所有行业运输供应品和制成品的成本，并且增加了对铁路系统本身所需的所有投入品的生产需求。该系统一直在增长；到1880年，已经有13,500台机车，每机车每年运送97,800名乘客，或31,500吨货运。

第二次工业革命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工业家取代商人成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主导人物。在19世纪下半叶，当大型工业的最终控制权和方向交到金融家手中时，工业资本主义让位于金融资本主义和公司。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建立庞然大物的工业帝国，其资产由脱离生产的人控制和管理。到19世纪中叶，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工业化的国家，英国的产出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不到一半。

还推出了新产品和新服务，大大增加了国际贸易。蒸汽机设计的改进以及廉价铁（以及1870年以后的钢铁）的广泛普及，意味着可以将慢速航行的船替换为轮船，例如Brunel的 SS Great Western。尽管英国落后于美国和德国，但电力和化学工业变得很重要。

工业卡特尔合并为大公司，独立公司的合并和同盟以及技术进步（特别是电力和汽油驱动的内燃发动机的使用增加）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对英国企业来说是好事。随之而来的是更复杂，更高效的机器的开发以及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产量并降低了生产成本。结果，产量经常超过国内需求。在新的情况下，严重的长期萧条的长期影响在英国（欧洲工业国的先驱）表现得更为明显。在1873年至1896年间经历了长达15年的严重经济动荡。1873年以后，几乎每个行业的企业都遭受了长期的低利润率和价格下跌的困扰。

到1870年代，伦敦的金融机构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行业控制水平。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期，服务业（例如银行业，保险业和航运业）开始受到重视。在19世纪末期，英国的服务业增长比工业增长强劲。工业仅增长了2%，而服务部门的就业增长了9%。

对外贸易

1870年至1914年间，国际贸易量增长了两倍。大多数贸易增长发生在其他工业化国家。英国在1860年是排名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到1913年，它已经输给了美国和德国：英国和德国的出口总额分别为23亿美元，美国的出口额超过24亿美元。尽管与竞争对手相比而言，她自己的出口在减少，但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1914年，她的进出口总额比德国大三分之一，比美国大50%。英国是食品，原材料和制成品的最大进口国，其中大部分被转口到欧洲或美国。1880年，英国购买了交易的茶叶，咖啡和小麦，约占世界总量的一半，而肉类出口量占世界的一半。同年，英国拥有

世界航运的50%以上，而英国造船厂在1890年代建造的新船约占世界的五分之四。

其广泛的贸易往来，对农业的投资以及商船运输使它能够远程交易大量商品。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出口到欧洲大陆以外的贸易也按比例增加。

1840年，其在欧洲以外进行的出口额为770万英镑，进口贸易额为920万英镑；1880年，数字分别为3840万英镑和7300万英镑。欧洲与更广阔世界的经济往来日益增多，这与英国多年来所做的一样。在这个时代，南北之间的洲际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例比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时期高。

美国入侵和英国反应

美国对英国国内制成品市场的某些部分的“入侵”引起了商业上的反响。尽管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进行了持续的政治保护运动，但关税只是在1930年世界贸易崩溃之后才普遍征收。例如，靴子和鞋子的制造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美国鞋类进口，而美国人进入了制鞋机械市场。英国制鞋商意识到，要想参加这场竞争，就必须重新审视其传统的工作方法，劳动利用和劳资关系。他们还必须对时尚的要求更加敏感。

资本出口

伦敦金融城加强了其作为世界金融之都的地位，资本的出口一直是英国经济1880年代的主要基地，到1913年，进入国际金融的“黄金时期”。到1913年，全世界约有50%的资本投资在伦敦筹集，使英国成为最大的资本出口

国。尽管英国的贸易赤字扩大了（1851年为2700万英镑，到1911年为1.34亿英镑），但投资和金融服务的收入弥补了这一缺口，并产生了可观的国际收支顺差。金融服务最初繁荣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制造业在1880年代开始的利润减少，这是由于这些年世界市场的低迷，再加上美国和德国制造业的扩张。由于某些制造业的外国竞争力比本世纪中叶更为激烈，因此，英国的工业家和金融家更有利可图地将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海外。1911年，海外投资收入达1.88亿英镑。来自保险，运输和银行等服务的收入总计约1.52亿英镑。这标志着金融服务业的显著转变；在1900年至1913年间，英国在海外的总投资翻了一番，从20亿英镑增加到40亿英镑。

英国的海外投资在拉丁美洲的独立国家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这些国家渴望改善基础设施，例如铁路和港口（这些通常是由英国承包商建造的），电报和电话系统。同时，英国商人主导了拉丁美洲的国际贸易。不可避免地，并非所有这些投资都能得到回报；例如，许多英国投资者在破产的美国铁路公司投资后遭受了巨大损失，甚至苏丹的一些矿业也被证明是无利可图的。

商业惯例

在英国，大企业的成长要比在美国慢得多，其结果是，到19世纪后期，规模更大的美国公司发展得更快，并且可能使英国的小型竞争对手面临竞争劣势。关键是纵向整合。在美国，典型的公司通过向后进入原料供应链和向前进入分销系统发展来进行扩张。在福特汽车公司，一端是生铁和煤炭，另一端是由各地经销商交付T型车；而英国公司没有试图拥有那些可以在市场上购买的原材料来源。他们没有建立自己的分销系统，而是与知名的批发商合作。尽管降低成本和价格变得更加困难，但英国商人却更加舒

适和小众化。此外，美国人拥有迅速增长的国内市场，而投资资本则更容易获得。

组织

随着工业化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生效，英国拥有强大的国民政府，该政府提供了标准货币，有效的法律体系，有效的税收以及对大英帝国内部和海外企业的有效支持。议会废除了限制商业企业的中世纪法律，例如规定用一块羊毛布可以穿多少根纱线，或者规定利率。自《1801年通用住房法》颁布以来，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并为不断增长的城市工业劳动力提供了来源。《航行法》在1820年代仍然很重要，由皇家海军实施，促进了国际贸易。道路系统是通过政府资助的当地收费公路体系开发的。

1929年，荷兰人造黄油商Unie和英国肥皂制造商Lever Brothers合并产生了联合利华，这是第一家现代跨国公司。就市场价值而言，联合利华拥有25万名员工，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公司。但是，在1945年以后，企业家精神在英国商业中的重要性下降了。

会计

在管理和会计领域的新业务实践使大公司的更有效运营成为可能。例如，在煤炭和钢铁公司中，19世纪的会计师使用复杂的，完全集成的会计系统来计算产量和成本，以满足管理信息的要求。

=====

19世纪衰退的最后一次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是从1873年的金融恐慌开始的长期萧条，引发了长达23年的全球衰退周期，直到1890年代末才结束。通过伦敦大量资助的美国铁路投机泡沫的破裂，是造成最初冲击的主要因素。报酬率的下降和普遍不利的经济环境意味着，投资在英国国民财富中所占的比例，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从1870年至1874年的平均水平下降到1875年至1896年的9.7%。英国的五年期出口平均水平直到1895-99年才恢复到1873年之前的水平（1870年至1874年为2.35亿英镑），1879年曾跌至1.92亿英镑。此外，复苏程度不及本世纪中叶的出口增长，因为在德国和美国等国家，英国制造商正努力与其国内生产的产品竞争，这些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而实施了严格的排他性关税。英国的商品价格在1870年代下降了多达40%。

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的经济困难是结构弱点的征兆，这种弱点在1870年代开始显现出来。经济学家用新古典增长模型解释了19世纪后半叶增长的相对放缓，其中数十年增长的势头已经不可避免地放缓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这种放缓是由于国家机构和条件（如企业家精神，自然资源和对外投资）引起的，而不是受制于自然发生的外部模型。因此，自然资源显著增加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19世纪末之前的生产量应该已经超过英国，就不足为奇了。英国依靠进口来弥补自身某些自然资源的不足，但高昂的运输成本使英国在与资源丰富的巨头美国竞争时不切实际。英国在1873年至1913年之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8%，而美国和德国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8%和3.9%。历史学家批评文化和教育因素导致工业革命的“企业家精神”下降。19世纪末，第一代和第二代工业家的后代享有特权，并在贵族统治的公立

学校接受教育，由于对从事制造业或“贸易”工作的污名化，对采用其父亲的职业表现出很少的兴趣。此外，公立学校和大学的课程绝大多数以经典研究为中心，这使学生对在制造业中进行创新的准备不足。许多人放弃了工业，进入了更为“绅士”式的金融部门，法院或帝国的公务员队伍。

但是，统计证据与任何在19世纪后期出现的经济停滞现象均不符：就业人口增长，1874-1890年间的平均失业率仅为4.9%，1870年代的经济衰退后生产率继续上升，尽管下降幅度较小。年利率为1%，而1873年恐慌之前的年份为2%。此外，由于总体价格下降，在“长期萧条”的几十年中，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这一年内有所波动，但总体上从1873年的3870美元稳步上升到1900年的5608美元，人均财富超过了所有国家，澳大利亚和美国除外。

1873年之前的沉重投资水平开始产生回报，因此英国从国外获得的收入超过了对外投资，并创造了稳定的顺差来支持不断扩大的贸易平衡。资本投资的出口尽管占国民财富的比重较小，但从1879年开始迅速复苏，在随后的十年中达到创纪录的最高水平（1876年至1895年为5615万英镑，而1851年至1874年为3374万英镑）。在19世纪后期，将英国资本投资到国外的趋势（到1913年，约35%的英国资产已在国外持有）被指责为实质上使投资本国产业陷入饥饿，这本来可以用来维持竞争力和提高生产率的。

1900-1945年

到1900年，美国和德国经历了规模可与英国媲美的工业化，并且还在发展大型制造公司。英国的相对经济优势有所减弱。伦敦金融城仍然是世界的

金融和商业资本中心，直到纽约1918年后的挑战。

1900–1914年

爱德华七世时代（1901–1910）代表了一个和平繁荣时期。没有严重的萧条，各行业繁荣昌盛。英国的增长率，制造业产出和GDP总额（但不是人均GDP）落后于其竞争对手美国和德国。尽管如此，该国在贸易，金融和航运方面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并在制造业和采矿业中拥有强大的基础。采矿业增长强劲，煤炭行业在世界能源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石油工业的发展和内燃机的持续发展将挑战这一突出地位。尽管农业部门对总体经济的相对贡献不再那么重要，但英国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却相对较高。

按照国际标准，在英国的所有部门中，英国的服务部门表现出较高的劳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一百年后的情况更是如此；服务业在1900年为英国经济提供了相对优势。

有人提出，工业部门适应全球变化的步伐很慢，精英阶层对休闲而非工业企业家的兴趣明显突出。1910年，大英帝国占世界工业能力的份额为15%，仅次于德国的16%，不到美国35%的一半。尽管有迹象表明英国经济的某些部门相对疲软，但爱德华时代的主要成就应予以强调。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其效率和范围比纽约，巴黎或柏林要广得多。英国在爱德华时代的海外投资翻了一番，从1900年的20亿英镑增加到1913年的40亿英镑。英国在其正式帝国以及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的非正式帝国中建立了庞大的海外信贷储备。英国人在美国拥有大量金融资产，尤其是在铁路方

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资产被证明对支付物资至关重要。社会便利设施，特别是在城市中心，正在积累；繁荣是显而易见的。在工人阶级中，对获得更大的政府发言权的需求在不断增长。

工运

在英国爱德华时代，强大的，协调一致的，在政治上有效的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主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在此期间，工会会员增加了一倍多，从1901年的200万人增加到1913年的410万人。在1906年大选中，工党首次在议会中获得了积极的立足点，拥有30名工党议员，从而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行更大程度的推动。

通货膨胀和停滞的工资始于1908年，这加剧了工人阶级的不满，特别是随着中上层阶级所享有的繁荣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年，罢工急剧增加，主要发生在裁员的棉花和造船业。1910年，由于失业率达到3%的历史最低水平，工会对自己的议价能力感到信心更足；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和稳定工作。全国各地爆发了罢工，包括威尔士的煤炭开采场，以及英格兰东北部持续的铁路工人罢工。1911年，全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在全国各地的港口组织了第一次全国性的铁路工人罢工，以及一般码头工人的罢工。在利物浦，码头和运输工人的夏季罢工在8月13日至15日期间与当局发生一系列冲突，最终导致两名男子死亡和350多人受伤。在1912年，全国煤炭罢工和另一波交通运输罢工使英国经济损失了约4000万个工作日。

劳工运动的主要要求是工资上涨，全国最低工资和就业稳定。伦敦政府的确做出了一些让步，以响应有组织劳工的要求，最著名的是《1909年贸易

委员会法》，该法案授权委员会为工人设定最低工资要求，监督工作条件并限制工作时间。最初，这仅适用于极少数行业，但在1912年为煤矿业创建了委员会，并且在几年之内，所有“出汗劳动”的职业都受到了此类委员会的监督，从而确保了最低工资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1912年的煤炭罢工是如此具有破坏性，以至于英国政府通过单独的立法（《1912年煤矿（最低工资）法》）为矿工保证了最低工资。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英国用尽其金融储备并向美国借入大笔资金。美国原材料和食品的运输使英国得以养活军队，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生产力。融资总体上是成功的；伦敦强大的财务状况将通货膨胀的破坏性影响降到了最低，而德国的情况则很糟糕。

从1914年到1919年，消费者的整体消费下降了18%。为了筹集用于战争的重要资金，税收也急剧增加。战前大部分税收来自间接税收，到1920年，税收的60%来自个人所得税和“超级税”征税，例如对收入超过10,000英镑的人的征税。战前所得税仅占6%，仅适用于113万英国人，到1920年，有300万所得税纳税人，税率为30%。

工会受到鼓励，会员人数从1914年的410万增加到1918年的650万，在1920年达到顶峰的830万，之后又恢复到1923年的540万。在苏格兰，造船业增长了三分之一。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停滞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英国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损失是巨大的。其中包括745,000名军人和24,000名平民丧生，170万人受伤。总共损失的运输量为790万吨（其中大部分被新建筑所取代），帝国因此遭受了75亿英镑的财务损失。德国欠下数十亿美元的赔偿金，而英国欠美国数十亿美元的贷款需要偿还。

在1919年至1920年间，英国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这是由于战争年代积蓄的大量投资和另一批新船订单的涌现，以弥补上百万吨运力的损失。但是，随着战争命令的结束，到1922至22年，严重的萧条打击了经济。出口下降到1913年水平的一半，失业率达到17%的峰值。造成经济萧条的因素一方面是恢复到战前的金本位制，英国北部工业中心即将出现结构性问题。导致1920年代英国工业相对衰落的另一个因素是英国出口市场的流失，主要是在远东和拉丁美洲。1914年至1918年间，运输和生产转向战争，这意味着诸如拉丁美洲、美国或远东的日本这样的区域生产者篡夺了英国商品的重要市场。英国从未恢复过1914年以前的出口量，到1929年，出口仍然仅是1913年出口量的80%。

的确，即使与遭受重创的欧洲相比，英国的境况要好得多，但经济停滞持续了整整十年。在1920年代，整体平均每年增长1.8%，虽然略有下降，但与美国相当。增长缓慢的部分原因是英国对出口的严重依赖，而整个1920年代世界贸易增长缓慢。它也过分依赖所谓的“主食”产业，这些产业在19

世纪带来了巨大的繁荣，但到1920年代，却经历了动荡的需求和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例如，在1922年，棉花出口量仅为1913年的一半，而煤炭出口量仅为1913年水平的三分之一。最熟练的工匠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因为他们的专业技能几乎没有其他用途。在贫困地区，主要的社会指标，例如健康状况不佳，住房状况不佳以及长期的大规模失业，都表明社会和经济最终将陷入停滞，甚至呈下降趋势。对过时的重工业和采矿业的严重依赖是一个中心问题，没有人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使地方企业和政治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时接受了中央政府经济计划的新传统。

生产力与就业

1919年，英国将主要行业的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周48小时。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这一举动是否压低了劳动生产率并助长了经济衰退。斯科特（Scott）和斯帕达维奇亚（Spadavecchia）认为，生产率在某些方面得到了提高，特别是通过提高每小时的生产率，英国的出口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大多数其他国家也减少了工作时间。考察煤炭，棉花和钢铁，他们发现英国在这些行业中没有遭受任何重大的相对生产力损失。到1924年，工人恢复了1913年的生产力，但与战前相比，工时大大减少了。到1938年，即使考虑到减少工作时间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英国的工业生产率仍比1914年之前的水平提高了75%。

战后政府的货币政策也导致了高失业率。到1925年4月，英国财政部实行了多年严格的通缩政策，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使英镑重返战前的4.86美元汇率。高汇率导致廉价的消费价格和英国工人的高实际工资。但是，利率也很高，这使得经商的成本变得更加昂贵，而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不可避免地被裁员和减少雇用人数的雇主所抵消。

到1921年，由于战后经济衰退，超过300万英国人失业。当经济在1922年至1923年复苏的同时，英国发现自己在1926年再次陷入困境，那年的大罢工对其不利。在十年的时间里，增长变得不稳定，短暂的停滞不断地中断了增长。劳资关系短暂改善，但随后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大萧条。1930年底，失业人数不到180万，但到1931年底，急剧上升至260万以上。到1933年1月，超过300万英国人失业，占劳动力的20%以上-某些地区的失业率超过50%，特别是在南威尔士和英格兰东北部。1930年代其余时间，私人住房刺激了经济的温和复苏。1938年的失业率降至10%，是五年前水平的一半。

钢铁

从1800年到1870年，英国生产了世界上半以上的生铁，其炼铁企业继续开发新的炼钢工艺。1880年，英国钢铁产量为130万吨，1893年为300万吨，到1914年产量为800万吨。德国于1893年迎头赶上，并于1914年生产了1400万吨。1900年后，随着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钢铁生产经济体，英国冶金学家率先开发了特种钢。奥利弗·阿诺德（Oliver Arnold）教授等学术专家利用电炉和其他创新技术，研究了磷磁钢和其他特种高强度合金的开发，并减少了烟尘污染。该行业培训了一批专家，这些专家使大型公司在科学上取得了进步。世界领先的钢铁公司的领导人继续将目光投向位于伦敦的钢铁协会，以传播前沿的科学技术研究。

新兴产业

一些新兴产业，包括汽车，化学制品和人造丝，都处于早期状态。在两次

世界大战之间，新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创造了包括汽车，飞机和摩托车制造在内的有利可图的新产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的汽车制造业一直是仅限于生产昂贵的豪华车的精品产业。该行业在1913年生产了34,000辆汽车。到1937年，生产了超过一百万辆汽车。其中大多数是价格适中的车型，例如Austin 7（于1921年推出），Morris Minor（1928年）以及英国福特公司生产的Model A和Model Y汽车。在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采用简化的自动化流程以及制造商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汽车价格下跌了50%，使汽车的价格更加实惠（到1930年，私人拥有汽车超过100万辆）。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经由德国和美国主导的化学工业也在英国蓬勃发展。到1939年，它雇用了100,000人，生产化肥，药品和合成材料。电气工程也如雨后春笋：1926年中央电力委员会的建立使全国范围内的高压电网得以发展。到1939年，三分之二的家庭拥有电力供应，这反过来又为诸如吸尘器，冰箱，收音机和火炉的电动设备开辟了新的消费市场。

从1923年到1938年，最成功的新兴产业是：汽车生产，电气工程，机械工程，金属制品和印刷。这些在1923年至1938年之间总共创造了557,920个新工作岗位，占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创造的所有新工业工作岗位的96%。这些行业绝大多数集中在伦敦周边地区和西米德兰兹郡的城市，特别是考文垂和伯明翰，那里有一支熟练的工人队伍，熟练生产高质量的金属产品。

1920年代的“消费者热潮”

尽管重工业困扰着严重的问题，但1920年代标志着英国消费行业史无前例

的增长时代。尽管在同一个十年中没有创造出像美国那样成熟的“消费者文化”，但它对英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是对中产阶级产生了影响。私人汽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增加了十倍（从1919年的约500,000辆增至1929年的约300万辆和1939年的约500万辆）。由于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信贷和贷款的增长，电器的销售迅速增长。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时间也导致了娱乐活动的兴起：留声机唱片，收音机。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机动化的中产阶级和中下阶层的度假者的数量迅速增加，以及大量的美国游客涌入，旅游业迅速增长。布莱克浦（Blackpool），布赖顿（Brighton）和斯凯格内斯（Skegness）等海滨度假胜地尤其受欢迎。

在过去的十年中，电力，天然气，管道和电话服务也变得很普遍，即使在某些工人阶级家庭中也是如此。

1929–1939年：大萧条

尽管1929年的“华尔街大崩溃”对英国股市几乎没有直接影响，但它导致的美国经济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贸易紧缩在1930年代初严重影响了英国。到1930年代初，萧条再次标志着英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在此期间，失业率飙升；从1929年的10%多一点到1933年初的20%以上（或超过300万劳动力）。但是，到1936年初，这一比例下降到13.9%。重工业跌至新低，但消费者工业1934年恢复，1933年至1937年之间的生产增长了32%。1930

年代零售商的增长充分说明了消费市场的强劲增长。例如，马莎百货（Marks & Spencer）的营业额从1929年的250万英镑增加到1939年的2500万英镑，因此有必要开设数十个新地点来满足郊区迅速增长的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193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在动员国内战线方面取得了非常成功的记录，即动员了最大比例的潜在工人，最大化产出，为正确的任务分配了正确的技能，以及保持人民的士气和精神。

工业生产转向弹药，产量猛增。以钢铁为例，政府材料委员会试图平衡民政部门的需求和战争努力，但战略考虑比任何其他需求都优先。由于英国皇家空军处于德国不断施加的沉重压力下，飞机生产成为重中之重。政府决定只专注于五种飞机，以优化产量。它们获得了非同寻常的优先权；涵盖了材料，设备，必需零件和制造资源的供应。劳力从其他飞机工作转移到从事指定类型的工厂。成本不是问题。新战斗机的交付量从1940年4月的256架增加到9月的467架，足以弥补空战损失；而战斗机司令部在10月的不列颠战役中胜利地崛起；飞机数量超过了最初的数量。从1941年开始，美国通过借贷提供了总计155亿美元的弹药。

1939年9月英德之间的战争爆发后，英国实行了外汇管制。英国政府动用黄金储备和美元储备来支付弹药，石油，原材料和机械，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到1940年第三季度，英国的出口量与1935年相比下降了37%。为从美

国获得近100亿美元的订单，英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几乎用尽。罗斯福政府致力于为英国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支持，并于1941年初颁布了《出借协议》，美国将向英国提供总计314亿美元的补给，而这些补给永远都不需要偿还。

1945年至2001年

尽管英国在战争中取得了最终胜利，但经济损失却是巨大的。六年的长期战争和商船运输的严重损失意味着，到1945年，英国已经失去了战前出口贸易的三分之二。出口市场的丧失也造成了美元的严重短缺，这是至关重要的。英国大部分的黄金和货币储备都已耗尽，政府被迫出售英国的海外资产以资助战争。当美国的《租借协定》于1945年8月终止的时候，英国无力支付从美国进口的基本用品的费用。尽管美国同意取消2000万美元的借贷债务，但英国还是在1945年12月被迫以2%的利率从美国获得了37.5亿美元的贷款。美国/英国的贸易失衡对英国而言非常危险，这迫使英国在国内扩大消费配额，以减少外贸不平衡并保留宝贵的美元，用于偿还贷款。

在接下来的15年中，英国经历了一些有史以来最快速的增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然后迅速扩大到过去的经济规模。到1959年，减税措施已帮助提高了生活水平，并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

英国的经济一直保持强劲，直到1960年代失业率一直很低，但是到1960年代末，这种增长开始放缓，失业率再次上升。

在1970年代期间，英国经历了长期的相对经济萎靡不振，长期受到失业率

上升，频繁的罢工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困扰。

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5年作为保守的领导者成功地当选上台。她削减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削弱了工会的力量。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服务提供者的数量增加，制造业和重工业的数量下降，同时经济的某些部门实现了私有化。这种变化使一些人将其形容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尽管该术语并未得到广泛使用。

1945–1951年：紧缩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再次失去了大量绝对财富。它的经济完全是出于战争的需要，需要一些时间进行重组以实现和平生产。与遭受重创的欧洲邻国相比，英国的经济地位相对较强—1947年，英国的出口额相当于法国，西德，意大利，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出口总额。

战后英国的主要经济重点是增加出口以资助英国的美元赤字。由于英国商品和产品优先用于出口市场，因此这需要延长国内消费配给体制。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后者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内放弃了配给制，而英国实际上收紧了配给限制，直到1954年才完全放弃。美国开始实行马歇尔计划赠款为英国经济注入了33亿美元。但是，马歇尔·艾德（Marshall Aid）未能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刺激经济的预期效果，因为97%的资金用于偿还英国的债务。这使英国相对于法国和西德等竞争对手处于相对劣势，后者能够将资金直接投资于工业和基础设施，从而长期创造更具竞争力，效率更高的经济体。

国有化

1945年至1951年的工党政府制定了一项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政治计划，其中包括工业国有化和国家对经济的指导。两次战争都表明了更大程度的国家参与可能带来的好处。这突显了战后经济的未来方向，同时也得到了保守党的主要支持。但是，国有化的最初希望没有实现。随着广泛的国有化计划的实现，采用了英国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管理方法。

在战后工党政府的帮助下，人们进行了全面的经济规划尝试，旨在彻底改革英国长期处于低迷的地区。根据《1940年巴洛报告》的发现，1945年《工业分配法》将英格兰东北，苏格兰和威尔士指定为“发展区”，该报告建议对其所确定的地区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1945年至1950年间，英国政府向这些地区的481家新工厂注资约3亿英镑。此外，在伦敦政府的积极鼓励下，在该地区建立了505家私人工厂。这项活动估计创造了200,000个新职位。

原则上，在1945年选举之前，业主和矿工都接受了将煤矿国有化的政策。业主获得了1.65亿英镑的报酬。政府成立了国家煤炭委员会管理煤矿；它借了150,000,000英镑来更新该系统。多年来，煤炭工业的总体状况一直不尽人意，生产率低下。1945年，煤矿工人比1890年多28%，但年产量仅增加8%。年轻人避开了煤矿。从1931年到1945年，年龄超过40岁的矿工所占比例从35%上升至43%，而65岁以上的矿工为24,000人。在1938年至1945年期间，地表工人的数量仅减少了3200，但与此同时，地下工人的数量减少了69,600，从而极大地改变了矿山中的劳动平衡。矿山的事故，故障和维修在1945年的生产成本几乎是1939年的两倍。到1946年夏天，很明显，该国在即将到来的冬天面临煤炭短缺的问题。国有化暴露了既没有为公有

制做准备，又没有在变革之前稳定行业。缺乏保持或增加煤炭产量以满足需求的任何重大诱因。

1950年代的繁荣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繁荣的时期，见证了经济的持续现代化。例如，第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英国维持并增强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财务作用，并使用英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推广其教育体系。在此期间，失业率相对较低，生活水平继续提高。丘吉尔和保守党在1951年大选后重新掌权，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工党在1940年代后期制定的福利国家政策。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黄金时代”，英国的失业率平均仅为2%。随着繁荣的恢复，英国人变得更加以家庭为中心。战后，更多人可以参加休闲活动。假日营地最初于1930年代开放，在1950年代成为热门的度假胜地—人们越来越有钱追求自己的爱好。在1950年，只有1%的家庭有电视机。到1965年，这一比例达到了25%。

小型邻里商店越来越多地被连锁店和购物中心所取代，因为它们具有种类繁多的商品，精巧的广告和频繁的销售。汽车已成为英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平均生活水平急剧上升，从1950年到1965年，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40%。传统上收入较低的半熟练和非熟练职业的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得到了特别显着的改善。在消费方面，存在更多的平等性，特

别是在土地绅士被迫缴税并不得不降低其消费水平的情况下。由于工资上涨，同期的消费者支出也增加了约20%，而经济增长仍保持在约3%。此外，最后的食物配给在1954年结束，同年放宽了购房控制。

享受各种附带福利的权利得到了改善。1955年，96%的体力劳动者有权享受两周带薪假期，而1951年为61%。到1963年，所有私人家庭中有82%拥有电视，72%有吸尘器和30%有冰箱。专业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消费差距已大大缩小。家庭设施的提供稳步改善。从1971年到1983年，使用固定浴缸或淋浴的家庭从88%增至97%，而内部厕所的家庭比例从87%增至97%。此外，同期集中供暖的家庭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从34%增加到64%。到1983年，有94%的家庭拥有冰箱，81%有彩色电视机，80%有洗衣机，57%有深冷室和28%有干衣机。

1960–1979：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去工业化

英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830年的9.5%上升到1870年代的22.9%。到191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6%，到1938年下降到10.7%，到1973年下降到4.9%。国外竞争，工会主义，福利国家，工业衰退，和缺乏创新都被提出来作为对此的解释。到了1970年代，全球能源危机，高通货膨胀以及来自亚洲的低成本制成品大量涌入，这已经达到了一个危机点。到21世纪，煤矿开采迅速瓦解，几乎消失了。

1979–1990：撒切尔时代

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大选标志着战后共识的结束和经济政策的新方法，包括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劳资关系改革和税收变更。强调竞争政策而非产业政策。撒切尔与工会的斗争在1984年的矿工罢工中达到高潮。

政府采取了货币主义政策，以减少通货膨胀并减少公共支出。在1980/81年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采取了通缩措施。1980年，通货膨胀最糟糕的时候超过20%，但到1982-83年，它下降到不足10%，并持续下降，直到1987年秋天稳定在4%左右。

主要的国有控股公司被私有化，包括英国航空航天公司（1981），英国电信（1984），英国利兰德（1984），劳斯莱斯（1987）和英国钢铁公司（1988）。电力，天然气和英国水行业被拆分并出售。

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一直实行的外汇管制于1979年被废除。英国的海外净资产从1979年底的120亿英镑增长到1986年底的近1100亿英镑，增长了约九倍。国有工业的私有化增加了英国的股份所有权：拥有股份的成年人口比例从1979年的7%上升到1989年的25%。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签署的《单一欧洲法》（SEA），允许在欧盟区域内货物自由流通。表面上的好处是刺激了英国经济的竞争，并提高了其最终效率。

1986年的金融服务法案导致了放松管制，后来被称为大爆炸（Big Bang）。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sheet of white paper with horizontal ruling lines.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run across the width of the page. There are no margins,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per.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history_of_Japan

日本经济史

日本的经济史研究最多的是明治维新后1800年代惊人的社会和经济增长。它成为第一个非西方大国，并稳步扩张，直到二战战败。二战后日本从灾难中复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2010年开始落后于中国。

史前和古代日本

弥生时代

迄今为止，人们普遍接受弥生时代是从公元前300年到公元300年。在此期间，日本过渡到一个定居的农业社会。随着弥生人口的增加，社会变得更加分层和复杂。他们编织纺织品，住在永久性的农村，并用木头和石头建造建筑物。他们还通过拥有土地和储存粮食来积累财富。这些因素促进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发展。九州部分地区的弥生酋长似乎赞助并在政治上操纵了青铜和其他物品的贸易。从中国南方的长江口经琉球群岛或朝鲜半岛引进灌溉湿稻农业。

古坟时代（250–538）

古坟时代记录了日本最早的政治集权，当时大和氏在日本西南部掌权，建立了皇室，并帮助控制了整个地区的贸易路线。古坟时代的许多物质文化表明，日本通过朝鲜半岛与亚洲大陆有着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在对马海峡两岸都发现了用同一模具铸造的铜镜。灌溉、养蚕和织布由中国移民带到日本，在日本古代历史中被提及；中国的哈达氏族介绍了养蚕和某些类型的编织。

古典日本

明日香时代（538–710）

随着大和统治者镇压其他氏族并获得农业土地，大和这个名字成为全日本的代名词。基于中国模式（包括采用中国书面语言），他们开发了贸易道路系统和中央管理机构。到7世纪中叶，农业用地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

领域，受中央政策的约束。大多数人是农民；其他人是渔夫、织布工、陶工、工匠、军械匠和仪式专家。

奈良时代（710–794）

在太和法制定之前，由于古代认为死地会被污染，因此习惯上在皇帝死后迁都。政府的改革和官僚化导致在公元710年在平城京或奈良建立了一个永久的皇都。740–744年，首都很快（出于本节稍后描述的原因）迁至国京（今木津川），744–745年到浪速京（今大阪），745年到信乐宫（紫香乐宫，今信乐宫），745年迁回奈良。奈良是日本第一个真正的中央城市。它很快就拥有20万人口（占该国人口的近7%），约有10,000人在政府部门工作。

奈良时代的经济和行政活动有所增加。道路将奈良与省会相连，税收更有效、更常规地征收。硬币是铸造的。然而，在奈良地区之外，几乎没有商业活动，在各省，旧的圣德土地改革制度衰落了。到8世纪中叶，作为史前日本最重要的经济机构之一的shōen（有地庄园）开始兴起，因为寻求更易于管理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地方行政逐渐变得更加自给自足，而旧的土地分配制度的崩溃和税收的增加导致许多人失去或放弃土地，成为“浪人”（furōsha）。

整个奈良时代，宫廷的派系斗争一直在继续。皇室成员、藤原等宫廷名门、僧人都在争夺影响力。在此期间的早些时候，长谷亲王在藤原不仁死后夺取了朝廷的权力。Fuhito由四个儿子Muchimaro, Umakai, Fusasaki和Maro继承。他们让不仁女儿的王子圣武天皇即位。729年，他们逮捕了长屋

并重新获得了控制权。然而，随着735年九州爆发的天花病大爆发，两年后四兄弟都去世了，导致藤原的统治地位暂时下降。740年，藤原氏的一员广次从九州福冈的据点发动叛乱。虽然叛乱失败，但毫无疑问，天皇对这些事件感到非常震惊，从公元740年开始，他在短短五年内三次搬迁了宫殿，直到他最终回到了奈良。

奈良时代后期，国家的财政负担加重，宫廷开始解雇无关紧要的官员。792年，普遍征兵制被废除，区长被允许为地方警察工作建立私人民兵部队。尽管奈良时代进行了改革，但权力下放成为了规则。最终，为了将控制权交回皇族手中，首都在784年迁至长冈京，并于794年迁至平安京（字面意思是和平与安宁的首都），位于奈良以北约26公里处。到11世纪后期，这座城市被普遍称为京都（首都），此后一直沿用这个名称。

平安时代（794–1185）

一方面，平安时代是一段异常漫长的和平时期，但也可以说，这一时期在经济上削弱了日本，导致除极少数居民之外的所有人陷入贫困。对稻田的控制为藤原等家族提供了重要的收入来源，也是他们权力的基础。

整个平安时代，朝廷的权力都在下降。宫廷在权力斗争和宫廷贵族的艺术追求中变得如此自私，以至于忽视了首都以外的政府管理。随着各种贵族家庭和宗教团体成功地为他们的私人shōen庄园获得免税地位，作为ritsuryō国家一部分的土地国有化逐渐衰落。到11世纪，日本的更多土地

被shōen控制，所有者而不是中央政府。朝廷因此被剥夺了税收来支付其国民军队。作为回应，shōen的所有者建立自己的武士军队。两个强大的皇室后裔，平氏和源氏，在首都以外获得了大量军队和许多圣地。中央政府开始利用这两个武士氏族来镇压叛乱和海盗。日本人口在经历了数百年的衰退后，在平安时代后期趋于稳定。

封建日本

镰仓时代（1185-1333）

全民族的武士军队在1274年和1281都被调动起来迎战忽必烈的的蒙古帝国军队。蒙古舰队被台风摧毁。尽管镰仓幕府取得了胜利，但国防军的财力已经耗尽。这对幕府与武士阶级的关系产生了永久性的负面影响。尽管如此，日本还是从1250年左右开始进入繁荣和人口增长时期。在农村地区，更多地使用铁制工具和肥料、改进灌溉技术和双季作物，提高了生产力，农村也在发展。饥荒和流行病的减少使城市得以发展，商业繁荣。

室町时代（1333-1568）

尽管经历了战争，但从镰仓时代开始的日本相对的经济繁荣一直持续到室町时代。到1450年，日本人口达到1000万，而13世纪末为600万。商业蓬勃发展，包括与中国和韩国的大量贸易。由于日本境内的大名和其他团体正在铸造自己的硬币，日本开始从以物易物为基础的经济过渡到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在此期间，日本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发展起来，其中

包括水墨绘画，插花花艺，茶道，日本园艺、盆景和能剧。虽然第八代足利幕府将军吉政是一位无能的政治和军事领袖，但他在促进这些文化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日本与明朝（1368-1644）的接触始于室町时代；中国寻求支持在中国沿海地区镇压倭寇后，中国复兴。这个时代和地区的海盗被中国人称为倭寇（Japanese wakō）。足利义满想改善对华关系，摆脱日本的倭寇威胁，并接受了与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关系。1401年，他重新开始朝贡制度，在给中国皇帝的一封信中称自己为“你的臣民，日本国王”。日本的木材、硫磺、铜矿石、剑和折扇被用来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书籍和硬币，中国人认为这些是进贡，但日本人认为是有利可图的贸易。

与欧洲的第一次接触（16世纪）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在16世纪到达日本时就非常钦佩日本。日本被认为是一个拥有极其丰富的贵金属的国家，这种观点主要归功于马可波罗对镀金寺庙和宫殿的描述，但也由于火山国家特有的相对丰富的地表矿石。在此期间，日本将成为铜和银的主要出口国。

日本也被认为是一个复杂的封建社会，拥有高雅的文化和先进的前工业技术。它人口稠密，城市化。

与欧洲的贸易

第一批抵达日本的葡萄牙船只（通常每年大约有四艘船）的货物几乎全是
中国商品（丝绸、瓷器）。日本人非常期待获得这些货物，但被禁止与中
国皇帝有任何接触，作为对和光海盗袭击的惩罚。葡萄牙人因此找到了充
当亚洲贸易中间人的机会。

这种贸易几乎没有中断，直到1638年，当时以葡萄牙船只将神父载送到日
本为由而被日本官方禁止。

荷兰人于1600年乘坐Liefde号首次抵达日本。他们的驾驶员是威廉亚当
斯，第一个到达日本的英国人。

江户时代

江户时代的经济发展包括城市化、商品运输的增加、国内和最初的国外商
业的显着扩张以及贸易和手工业的扩散。建筑业蓬勃发展，银行设施和商
人协会也兴盛起来。当局越来越多地监督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村手工艺品的
传播。到18世纪中叶，江户人口超过100万，大阪和京都各有超过40万居
民。许多其他的城下町也成长了。大阪和京都成为繁忙的贸易和手工业生
产中心，而江户则是食品和城市必需消费品的供应中心。大米是经济的基
础，因为大名以大米的形式向农民征收税款。税收很高，约占收成的40%。
大米在江户的fudasashi市场出售。为了筹集资金，大名使用远期合约出售
尚未收获的大米。这些合约类似于现代期货交易。

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建造了她的第一艘远洋西式军舰，圣胡安包蒂斯塔号（San Juan Bautista），这是一艘500吨级的大帆船，将长仓常长为首的日本大使运送到美洲，然后继续前往欧洲。也是在那个时期，幕府派遣了大约350艘红海豹船、三桅武装贸易船，用于亚洲内部的贸易。山田长政等日本冒险家在整个亚洲都很活跃。

为了消除基督教化的影响，日本进入了一个被称为sakoku的孤立时期，在此期间其经济稳定而温和地发展。不久之后，在1650年代，中国内战使其主要的瓷器生产中心景德镇几十年来停产，因而日本出口瓷器的生产大幅增加。在17世纪的剩余时间里，大部分日本瓷器在九州生产，通过中国和荷兰出口。到1740年代，在中国产品重新竞争的情况下，日本出口贸易减少，然后在19世纪中叶日本开放后又恢复了。

在此期间，日本通过荷兰商人收到信息和书籍，逐步研究西方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主要领域包括地理、医学、自然科学、天文学、艺术、语言、物理科学（如电气现象研究）和机械科学（以日本钟表的发展为例，或受西方技术启发）。

明治时期

1854年，德川幕府首次向西方开放日本后，日本经历了两个经济发展时期。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明治政府成立，日本的西化正式开始了。第一个阶段是战前的日本，第二个阶段是战后的日本。

明治上半叶，劳资纠纷多发生在矿业和纺织业，以小规模罢工和自发暴动的形式出现。后半期工业化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许多封建工人向雇佣劳动转变。

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纺织品上，包括棉花，尤其是丝绸，这些纺织品以农村地区的家庭作坊为基础。到1890年代，日本纺织品主导了国内市场，并在中国和印度成功地与英国产品竞争。日本托运人与欧洲贸易商竞争，将这些货物运往亚洲甚至欧洲。与西方一样，纺织厂主要雇用女性，其中一半年龄在20岁以下。日本在很大程度上跳过了水力发电，直接转向了蒸汽动力磨坊，后者的生产力更高，并导致了对煤炭的需求。

明治时期给经济带来的最大影响之一是封建制度的终结。由于社会结构相对松散，日本人比以前更容易在社会阶层中前进。他们能够通过发明和销售自己的商品来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日本人现在有能力接受更多的教育。随着受教育人口增加，日本的工业部门显着增长。在20世纪初，将西方资本主义理想应用于技术发展并将其应用于军事，帮助日本成为军国主义和经济强国。

明治时期，领导人开创了面向所有年轻人的新的西方教育体系，将数千名学生送往美国和欧洲，并聘请了3000多名西方人在日本教授现代科学、数学、技术和外语。政府还修建了铁路、改善了道路，并启动了土地改革计划，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

为促进工业化，政府决定在帮助私营企业配置资源和规划的同时，私营部门最有能力刺激经济增长。政府的最大作用是帮助提供商业繁荣的经济条件。简而言之，政府是引导者，企业是生产者。在明治初期，政府建造了工厂和造船厂，这些工厂和造船厂以价值的一小部分出售给企业家。许多这些企业迅速成长为更大的企业集团。政府成为民营企业的主要推动者，制定了一系列亲商政策。

银行

自明治时代以来，银行业的发展和对银行融资的依赖一直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核心。1868年之前，封建领地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称为hansatsu。政府派观察员到美国，一开始复制了没有中央银行的去中心化美国体系。1871年的新货币法废除了当地货币，将日元确立为新的十进制货币。它与墨西哥银元持平。1884年，国家银行获得了控制货币供应的垄断权，到1904年，以前发行的票据全部报废。银行开始采用银本位制，但于1897年采用金本位制。金本位制于1917年暂停，1931年取消。1973年采用浮动汇率。

铁路

1868年后明治新政权大力鼓励铁路建设。这一现代化举措有多个目标。它会削弱封建制度。铁路将使对入侵威胁的快速军事反应成为可能，就像俄罗斯一样。大米的运输将变得更便宜，对外贸易将增长。从更广泛的意义

上讲，现代化的交通将鼓舞人心，促进增长。政府在1870年做出了建造该系统的最终决定，使用了来自英国的百万英镑贷款和英国工程师。日本公共工程部负责实际施工。

1868年，苏格兰商人托马斯·布莱克·格洛弗(Thomas Blake Glover)负责将第一台蒸汽机车“铁公爵”带到日本，并在长崎大浦区的8英里轨道上进行了演示。然而，经过几个世纪的“不信任外国人”的文化，非日本人建造的主要铁路的建设在政治上被日本新政权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利用英国资金和300名英国和欧洲技术顾问（土木工程师、总经理、机车制造商和司机）建造一条从横滨主要港口到东京的铁路。为了进行建设，聘请了外国专家，具体目的是让这些专家对日本同事进行教育，使日本能够在铁路建设专业知识方面自给自足，届时外国承包商将离开该国。1872年末，新桥（后来的汐留）和横滨（现在的樱木町）之间的第一条铁路开通。单程旅行需要53分钟，而现代电动火车需要40分钟。服务从每天九次往返开始。

英国工程师Edmund Morel（1841–1871）监督了第一条铁路的建设。美国工程师 Joseph U. Crowford（1842–1942）于1880年在北海道监督了一条煤矿铁路的建设。德国工程师 Herrmann Rumschottel（1844–1918）于1887年开始监督了九州的铁路建设。三名受过训练的日本工程师承担了铁路建设项目。克劳福德（Crowford）训练的两名男子后来成为日本国家铁路公司的总裁。

网络扩展

下一条线路是从另一个港口神户到主要商业城市大阪（1874年开通），然后到京都（1877年）和琵琶湖南端的大津（1880年）。一条从日本海的敦贺经琵琶湖北端的长滨到大垣（连接一条通往名古屋的运河）的线路于1884年开通，并利用水轮转运连接日本海到大阪、京都和名古屋。

将东京与名古屋和京都连接起来成为下一个优先事项。最初提议的路线是内陆，从东京向北到高崎，然后向西通过白井山口到达轻井泽和木曾河谷。此时，日本铁路公司（NRC）获得特许经营权，经营从上野到青森的东北干线，以及从大宫到高崎的支线。两条线路的建设均由政府承担，费用由公司承担，政府拥有高崎-上野段的运营权。到高崎的线路和远至宇都宫的东北线路于1884年开通。

NRC还资助了一条连接横滨线的新线路，该线路从赤羽经新宿到品川（NRC获得了品川政府车站的轨道使用权）。这是山手线的第一段，于1885年开通。

1885年，从高崎开始的政府资助线路到达白井山口底部的横川。

另一条从日本海出发的线路也开始建设，从直江津开始，并于1888年通过长野向轻井泽开放。

随着穿越日本山区内陆的建设成本越来越明显，1886年东海道线的建设获得批准，该线大致平行于南部海岸线（和东海道公路）直至名古屋。虽然长约238公里，但预计成本会降低13%，然后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建造一条从天津沿琵琶湖东侧到长滨的线路，以消除 1889年开通的转运需求。直到1964年东海道新干线开通为止，这是日本最重要的干线。

巩固网络

1888年，山阳铁路公司（SRC）获得特许建造从神户西部到下关的山阳干线，该港口提供与九州门司港的连接。九州铁路公司（KRC）于1889年至1891年间开通了通往博多和熊本的线路，并于1896年延伸至八代。SRC线路于1894年到达广岛，1901年到达下关。

日本铁路公司和其他私营公司的成功导致了类似于英国铁路狂热的日本局势。从1880年代中期到1891年，新的铁路公司在吸引资金方面几乎没有困难，通常是通过发行股票。

不断发展的政策

1887年，日本陆军提议建立自己的路线，以确保优先考虑具有军事意义的路线。铁路部门通过开始制定综合全国网络的政策来改变该建议。1889年东海道干线建成、国民议会成立后，日本政府对政策制定越来越感兴趣。

1892年的铁路建设法（RCA）列出了本州、九州和四国的一系列优先路线（北海道在1896年的立法中单独涵盖），具体政策是私人建设这些路线受到鼓励，日本政府只资助不能私人建造的路线。到那一年，私有网络约为2,124 公里，而政府拥有的路段总计约为887公里。

日本国铁于1907年由17条私营铁路国有化而成，积极推行统一化和科学化管理。

20世纪初

1918年至1921年，一波重大劳资纠纷标志着有组织的劳动力达到顶峰。随之而来的长期经济不景气导致重工业就业减少。到1928年，按现价计算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65.06亿日元的峰值。1930年代中期，日本名义工资率是美国的十分之一（按1930年代中期的汇率计算），而物价水平估计约为美国的44%。

1935年东亚国家地区与美国人均GDP（美元）对比：

国家 GDP/人均，1935年美元 GDP-PPP/人均，1990年美元

美国 540 5,590 5,590

日本 64 1,745 2,154

台湾 42 1,266 1,212

朝鲜 24 662 1,225

中国 18 543 562

军国主义

二战前，日本建立了广泛的帝国，包括台湾，韩国，满洲和中国北部部分地区。日本将这一势力范围视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必要，防止外国通过阻止其获得原材料和关键的海上航道来扼杀日本，因为日本拥有很少的自然资源和矿产，尽管它进口了大量来自韩国、满洲国和中国被占领地区的大量煤炭。日本庞大的军事力量被认为对帝国的防御至关重要。

自1868年以来，日本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的快速增长和结构变化。在第一个时期，经济最初仅适度增长，严重依赖传统农业为现代工业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当1904年日俄战争时，日本就业的65%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8%，仍然以农业为主，但现代工业已经开始大幅扩张。到1920年代后期，制造业和采矿业占GDP的23%，而所有农业为21%。交通和通讯的发展是为了维持重工业的发展。

1930年代，日本经济受到大萧条的影响比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要小，其GDP以每年5%的速度快速增长。制造业和采矿业占GDP的比重超过30%，是农业部门的两倍多。然而，大多数工业增长都是为了扩大国家的军事力量。

从1937年在中国大量征服土地开始，1941年以后，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

吞并和入侵创造了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政府寻求获得和开发重要的自然资源。日本攫取和开发的自然资源包括：中国的煤炭、菲律宾的甘蔗、荷属东印度和缅甸的石油，以及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的锡和铝土矿。日本还购买了泰国、缅甸和交趾支那的大米生产。

在日本扩张的初期，日本经济大幅扩张。同期钢铁产量从6,442,000吨增加到8,838,000吨。1941年，日本飞机工业有能力每年制造10,000架飞机。这种经济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使大型工业集团“财阀”受益。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的经济和被占领土全部吃尽苦头。通货膨胀猖獗；日本重工业被迫将几乎所有的生产都用于满足军事需要，无法满足日本的商业需求（日本以前依赖与西方国家的制成品贸易）。当地工业无法以足够高的水平生产以避免严重短缺。此外，帝国非常依赖的海上贸易因日本商船队在战争过程中受到的破坏而急剧减少。

到战争结束时，日本帝国的剩余部分受到短缺、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影响。运输几乎不可能，日本破碎城市的工业生产陷入停顿。战争造成的破坏最终使日本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根据2020年的一项研究，日本利用其皇权来促进其工业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这场战争抹去了日本自1868年以来取得的许多成就。全国约40%的工业厂房和基础设施被摧毁，生产恢复到约15年前的水平。众人惊愕不已，纷纷行动起来。新工厂配备了最好的现代机器，这使日本比现在拥有旧工厂的战胜国具有最初的竞争优势。随着日本第二个经济发展时期的开始，数百万退伍军人加入了一支训练有素、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队伍，重建日本。日本的殖民地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丧失，但从那时起，日本的经济影响力扩展到整个亚洲及其他地区。

盟军占领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盟军，主要是美国人，迅速开始抵达日本。几乎立即，占领者开始了旨在使日本民主化的法律改革密集计划。一项行动是确保制定工会法，第一次允许工人组织、罢工和集体谈判，日本国会于1945年12月22日通过了该法。虽然法律是在日本被占领期间制定的，但法律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的作品。它是由以法律学者出太郎末广为首的大型法律顾问委员会制定的。该委员会相当庞大，由“三名福利部官员和两名学者组成，一个由30名成员（包括共产党煽动者德田圭一）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以及代表大学、企业、政党、政治和社会组织的130多名成员的全体成员。其中也有官僚、社会工作者和劳工。”在占领期间，美国的援助总额约为19亿美元，约占该国进口的15%和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4%。大约59%的援助是食品形式，15%是工业材料，12%是运输设备。然而，美国的赠款援助在1950年代中期迅速减少。美国从日本的军事采购在1953年达到相当于日本GNP的7%的峰值，1960年之后下降到1%以下。占领期间美国支持的各种措施，如土地改革，为日本后来的经济表现做出了贡献。

战后工业领袖的清洗使新人才在国家重建工业的管理中崛起。

“来自天堂的礼物”

二战结束后，日本国民普遍饱受战争的疲惫和绝望之苦，被称为“kyodatsu”，造成大规模的沮丧和沮丧。“来自天堂的礼物”一词是漫画家加藤悦郎在美国军事占领下的第一幅插图中创造的。这些礼物指的是美国军队自上而下进行的不流血的民主革命，结束了一场使社会衰弱的战争。在自上而下的革命的许多方面中，将选举权扩大到妇女、加强工会化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是时至今日最持久的变革之一。

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经济改革之一是将农村土地分配给日本佃农。以前，财产属于地主，农民在封建制度下从事这项工作。现代资本主义理论认为，这种封建实践没有激励增长。农村地主阶级解散了。除了地主阶级解体，有效控制日本经济近100年的被称为“财阀”的庞大商业集团也被瓦解，面临市场竞争。《消除经济过度集中法》（1947年12月通过）规定解散任何被认为具有垄断性的公司，1948年1月的《财阀附属控制权驱逐法》强制要求与财阀家族有密切关系的财阀董事会成员辞职，同时采取措施禁止其附属公司兼任董事会职务。此外，制定了政府雇员法，任命了第一批日本最高法院法官，重组了地方政府和警察，取消了内政部、海军部和战争部，对刑法，土地改革取得进展。最后，美国占领军鼓励日本工人加入工会，迫使公司在技术和创新方面展开竞争。

重建

战后初期致力于重建失去的工业能力：在电力、煤炭、钢铁和化工领域进行了重大投资。到1950年代中期，产量达到战前水平。摆脱了以军事为主导的政府的要求，经济不仅恢复了失去的动力，而且超过了早期的增长率。1953年至1965年间，GDP每年增长9%以上，制造业和采矿业增长13%，建筑业增长11%，基础设施增长12%。1965年，这些部门雇用了超过41%的劳动力，而只有26%留在农业部门。

日本备受赞誉的战后教育体系为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世界上最高的识字率和高教育水平是日本成功实现技术先进经济的主要原因。日本学校还鼓励纪律，这是形成有效劳动力的另一个好处。

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在一些行业向国际竞争开放，重工业和化工制造业发展，经济迎来了一种新型工业发展。纺织品和轻工业在国际上保持盈利能力，而其他产品，如汽车、电子产品、船舶和机床则具有新的重要性。1965年至1970年间，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增加值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1970年至1973年间，增长率放缓至8%左右，并在工业和服务业之间保持平衡，如零售贸易、金融、房地产、信息技术和其他服务行业精简了运营。

石油危机

日本在1970年代中期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1973年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遭受打击；它已成为依赖进口石油的经济体。日本经历了战后工业生产的首

次下滑，以及严重的价格通胀。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复苏重新唤起了大多数商业领袖的乐观情绪，但在能源成本高昂的情况下保持工业增长需要产业结构的转变。

不断变化的价格条件有利于工业能源的保护和替代来源。尽管投资成本高昂，但许多能源密集型行业在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成功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提高了生产力。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微电路和半导体的进步导致了消费电子和计算机行业的新增长，并提高了原有行业的生产力。这些调整的最终结果是提高制造业的能源效率并扩大知识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在日益后工业化的经济中扩张。

然而，随着经济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成熟，结构性经济变化无法阻止经济增长放缓，年增长率仅为4-6%。但是，在一个石油价格昂贵且自然资源稀少的国家，这些比率是显着的。例如，日本在80年代后期的平均增长率为5%，远高于美国3.8%的增长率。尽管1979年石油价格上涨幅度更大，但日本经济的实力还是显而易见的。它没有出现困扰其他工业国家的两位数通胀（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困扰日本本身）。日本在1980年代中期经历了缓慢的增长，但在80年代后期维持了经济繁荣，许多陷入困境的行业复苏了。

日本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它的可用性和识字率，以及合理的工资要求。二战前后，大量农业工人向现代工业转移，导致生产力提高，工资仅适度增长。随着人口增长放缓和国家在1960年代中期日益

工业化，工资大幅上涨。然而，工会合作一般将工资增长保持在生产率提高的范围内。

高生产率增长在战后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高技能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非凡的储蓄率和随之而来的投资水平，以及日本劳动力的低增长是生产率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该国还受益于规模经济。尽管中小型企业创造了全国大部分的就业机会，但大型设施的生产力最高。许多工业企业合并形成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单位。二战前，大型控股公司形成了财富集团，或财阀，主导了大多数行业。财阀在战争以后被解散，但现代工业企业集团出现了。这些集团内活动的协调以及较小的分包商融入集团提高了工业效率。

日本公司制定了有助于其巨大增长的战略。抓住机会的成长型企业在竞争中取得了成功。产品多样化成为许多keiretsu增长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公司在市场需求出现之前就增加了工厂和人力。寻求市场份额而不是快速获利是另一个强大的策略。

不断变化的职业结构

直到1955年，大约40%的劳动力仍在从事农业工作，但随着日本越来越多地进口粮食，这一数字到1970年下降到17%，到1990年下降到7.2%，21世纪下降到5%。小型家庭农场消失了。

日本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经济增长基于汽车、钢铁、造船、化学和电子等领域的重工业快速扩张。到1970年，第二产业（制造业、建筑业和采矿业）扩大到劳动力的35.6%。然而，到197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开始从重工业转向服务导向型（第三产业）基地。1980年代，批发、零售、金融、保险、房地产、交通、通讯、政府等就业岗位快速增长，而第二产业就业岗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占劳动力的比例从1970年的47%增长到1990年的59.2%。

1980年代

整个1970年代，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 位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苏联，1990 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23,801美元，在主要工业国家中排名第一，较1980年的9,068美元大幅上升。在1980年代中期经济出现温和衰退后，日本经济在1986年开始了扩张期，一直持续到1992年再次进入衰退期。1987年至1989年间平均5%的经济增长率使钢铁和建筑等行业复苏，在1980年代中期相对休眠，并带来了创纪录的薪水和就业。然而，在1992年，日本的真正GNP增长放缓至1.7%。甚至在1980年代经历了惊人增长的汽车和电子等行业也在1992年进入衰退期。日本汽车的国内市场萎缩，同时日本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下降。国内外对日本电子产品的需求也在下降，日本似乎正在将其在世界半导体市场上的领导地位输给美国、韩国和台湾。

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经济繁荣不同，当增加出口在经济扩张中发挥关

键作用时，国内需求在80年代后期推动了日本经济。这一发展涉及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调整，从依赖出口转向依赖国内需求。始于1986年的繁荣是由公司决定增加私人工厂和设备支出以及消费者继续疯狂购买而产生的。日本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日本战后的技术研究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是军事发展。1980年代高科技产业的增长是由于国内对电子等高科技产品以及更高的生活、住房和环境标准的需求增加；更好的医疗和更多的福利；扩大休闲设施；并改进了适应快速老龄化社会的方法。

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的重点从初级和次级活动（特别是农业、制造业和采矿业）转移到加工，电信和计算机变得越来越重要。信息成为重要的资源和产品，成为财富和权力的核心。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的兴起是由对高度复杂技术（例如先进计算机）的重大研究带动的。信息的销售和使用对经济非常有利。东京成为了一个主要的金融中心，一些世界主要银行、金融公司、保险公司和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所在地。然而，即使在这里，经济衰退也造成了损失。1992年，日经年初股价平均为23,000点，但在8月中旬跌至14,000点，然后在年底稳定在17,000点。

自冷战结束

1989年经济泡沫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日本实施了严格的关税和政策，以鼓励人们储蓄收入。随着银行里的钱越来越多，贷款和信贷变得更容易获得，加上日本有大量贸易顺差，日元兑外币升值。这使得本地公司比海外竞争对手更容易投资资本资源，从而降低了日本制造的商品价格并进一步扩大了贸易顺差。而且，随着日元升值，金融资产变得有利可图。

有这么多资金可供投资，投机在所难免，尤其是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和房地产市场。1989年12月29日，日经股指触及历史最高水平。住房、股票和债券的利率大幅上涨，以至于政府一度发行了100年期债券。此外，银行发放的贷款风险越来越大。

在泡沫最严重的时候，房地产被极度高估。1989年东京银座区的价格最高，精选物业每平方米超过150万美元。东京其他地区的价格仅略低。到2004年，东京金融区的优质“A”级物业已经下滑，东京的住宅仅是其高峰期的一小部分，但仍被列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房地产。随着东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共同崩溃，数以万亿计的资产被抹去。

由于日本经济受到高再投资率的推动，这次崩盘的打击尤为严重。越来越多的投资被引向国外，日本制造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技术优势。随着日本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下降，一些人认为低消费率开始对经济产生影响，导致通货紧缩。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的容易获得的信贷仍然是一个问题，直到1997年，银行仍在发放低偿还保证的贷款。贷款官员和投资人员很难找到任何可以带来利润的投资。与此同时，为存款提供的极低利率，如0.1%，意味着普通日本储户喜欢把钱放在床底下，就像他们把钱放在储蓄账户里一样。随着政府开始补贴倒闭的银行和企业，产生了许多所谓的“僵尸企业”，纠正信用问题变得更加困难。最终是套利交易从日本借钱，投资到别处获得回报，然后日本人得到回报，交易者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泡沫破裂后的时间是逐渐发生的，而不是灾难性的，在日本被称为“失落的十年或20世纪末”（失われた10年, ushinawareta jūnen）。2003年4月，日经225指数最终见底。日经指数的下跌可能是由于全球和国家经济问题。

从1990年代到现在的通货紧缩

日本的通货紧缩始于1990年代初。2001年3月19日，日本银行和日本政府试图通过降低利率（其“量化宽松”政策的一部分）来消除经济中的通货紧缩。尽管利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接近于零，但这种策略并没有成功。2006年7月，零利率政策结束。2008年，日本央行的利率仍然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通货紧缩还在继续。

日本通货紧缩的系统性原因可以说包括：

资产价格下跌。1980年代日本的股票和房地产都出现了巨大的价格泡沫（在1989年末达到顶峰）。

资不抵债的公司：银行向投资房地产的公司和个人提供贷款。当房地产价值下降时，许多贷款没有偿还。银行可以尝试收集抵押品（土地），但由于房地产价值下降，这无法偿还贷款。银行推迟了收取抵押品的决定，希望资产价格会有所改善。这些是国家银行监管机构允许的。一些银行向这些公司提供更多贷款，用于偿还他们已有的债务。这种持续的过程被称为维持“未实现的损失”，在资产被完全重估和/或出售（并实现损失）之前，它将继续成为经济中的通货紧缩力量。

资不抵债的银行：其贷款中有很大部分是“不良”但尚未注销的银行。这

些银行在增加现金储备以弥补不良贷款之前无法放贷。因此，贷款数量减少得更快，可用于经济增长的资金也更少。

害怕银行破产：日本人害怕银行倒闭，所以他们更愿意购买黄金或（美国或日本）国债，而不是将钱存入银行账户。人们还通过投资房地产来储蓄。

《经济学人》建议完善破产法、土地转让法和税法将有助于日本经济。据NHK报道，2009年10月，日本政府宣布计划增加烟草和绿色税，同时降低中小企业的税率。

2000年代后期的全球经济衰退严重损害了日本的经济。该国2008年实际GDP下降了0.7%，随后在2009年严重下降了5.2%。相比之下，世界实际GDP增长数据在2008年增长了3.1%，然后在2009年下降了0.7%。

日本过去几个季度的经济政策受到了“安倍经济学”辩论的影响，政府追求激进的政府基础设施支出增长和日元大幅贬值。

时间轴

1600年，德川幕府成立，近代工业化开始

1868年，明治维新，工业化开始

1930年代，受控经济

1945年，日本投降：经济萧条；美国职业

1948年，保守党政府

1950年代，恢复和增长。

1960年，收入倍增计划

1971年4月25日，金本位制结束

1985年9月22日，广场协议

1989年12月29日，日经225平均高点为38,915

1990年代，“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的时间。日经225股票指数在2003年4月在7603.76见底。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产互助人寿、八佰伴等多家公司倒闭

日本央行开始量化宽松策略

2011年东北地震和海啸的余波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后果

首相安倍晋三国家经济复苏的计划

2020年，COVID-19大流行，安倍宣布日本遭遇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

=====

Handwriting practice lines consisting of multiple sets of three horizontal lines (top, middle, and bottom lines) for letter formation.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cover the majority of the pag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history_of_Taiwan

台湾经济史

17世纪，欧洲人意识到台湾地处远东和东南亚之间的战略要地。台湾也成为西欧与东亚国家之间贸易的中间目的地。

在20世纪50年代，中华民国退守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政策，如375减租。1960年代，随着中小企业的形成，农业经济被轻工业取代。1966年至1980年，台湾经济逐步稳定，十大建设工程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1980年代以后，随着许多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逐渐减弱。

史前

根据考古证据，台湾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起就有人类居住。最早发展起来的文明之一是台湾南部的长滨文化。这一时期的经济活动是捕鱼、采集和耕作，没有文字。

大约2000年前，台湾北部进入青铜时代。冶金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加强了经济活动。十三行文化在这一时期兴起并拥有编织技术。直到汉人的到来才

结束。人们普遍认为，台湾原住民部落在经济上以捕鱼、狩猎和刀耕火种的农业为主。

与欧洲的联系

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初只沿佩斯卡多尔群岛进行贸易。然而，明朝声称该群岛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驱逐了荷兰人。荷兰人被迫撤退到台湾的主要岛屿，当时被称为福尔摩沙。他们在大望安（今台南市）设立了一个贸易站。

荷兰人认识到蔗糖作为出口产品的重要性，并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广泛发展了该行业。荷兰的糖出口迅速增长，到1660年达到1,300吨，是1636年的十倍。到1658年，该公司将糖出口到波斯、日本和雅加达，并在亚洲拥有约35个贸易站。Tayuan获得了25.6%的利润，在所有荷兰贸易站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长崎。

当时，日本人也对台湾的商业活动感兴趣。由于来自日本的经济挑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日本商人征收重税。1628年，日本人绑架了荷兰驻台湾总督彼得·努伊茨，关闭了长崎的贸易站。在努伊茨被引渡到日本入狱后，它于1632年再次重新开放。

中国早期行政

明朝派郑成功打败了荷兰人。但随后明朝被清朝代替。郑成功在台湾的统治导致了清朝重振海禁令，切断海上贸易，企图削弱郑成功。郑成功将台湾作为独立的东宁王国统治，建立了土地分配制度，以有效地为军队提供食物。大英帝国和日本继续与台湾进行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甚至与之建立了通商条约。

清朝在收复台湾以后，对改善台湾经济没有兴趣，称其为未开化之地（化外之地）。因此，经济活动主要来自移民定居点。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是灌溉系统和水利工程项目的建立。这些改良造成的农业过剩导致大米出口到中国大陆。另一方面，主要贸易港口的商业活动仍在继续。台南，鹿港，班卡（位于今台北）成为台湾三大城市。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安平（今台南），艋舺（今高雄），基隆和淡水（今台北）开放。这些通商口岸出口台湾茶叶和樟脑，进一步拉动了台湾经济。

日本行政

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经济。例如，台湾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被用来帮助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发展。这一政策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达到顶峰。1920年代之前，制糖业主导台湾经济，而1920年至1930年，大米成为主要出口产品。在这两个时期，总督府（OGG）的主要经济政策是“日本工业，台湾农业”。1930年以后，由于战争需要，OGG开始推行工业化政策。

台湾中部的一大片沼泽被改造成一座巨大的水坝，以建造一座工业化的水力发电厂。大坝及其周边地区，今天被称为日月潭，已成为外国游客到台湾旅游的必游之地。

虽然每个时期的主要焦点不同，但整个时期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台湾的生产力以满足日本国内的需求，这一目标已成功实现。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新的思想、概念和价值观被引入台湾；此外，还实施了若干公共工程项目，例如铁路、公共教育和电信。随着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政治逐渐开放，民众对殖民政府的支持开始增加。正如1935年台湾博览会期间所展示的那样，台湾因此成为日本宣传整个亚洲殖民努力的一个展示。

近代史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台湾社会在50年代是相对稳定的政治。然而，由于二战期间的大规模破坏和1940年代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它在经济上面临一些障碍。国民党从大陆迁徙造成的人口骤增，也影响了台湾经济。

面对经济压力，国民党政权制定了多项经济计划 and 政策。对于该经济的长期增长而言，最重要的是对教育的承诺，从普及小学教育开始，随着基本识字水平的实现，扩展到高中教育。成功的土地改革也发生了，这得益于国民党作为新移民而不是既得土地所有者的角色。此外，美国的援助也有助于台湾经济的改革。

政府还实施进口替代政策，以农业获得的东西支持工业部门，以农产品出口换汇进口工业机械，从而发展工业部门。政府提高关税、控制外汇和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到1960年代，台湾进口交换业面临国内市场饱和的问题。与此同时，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工厂，由于工资上涨等原因，慢慢转移到一些既有基础工业、又有低劳动力成本的地区。

台湾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在1970年代。1971年中华民国（台湾）被联合国驱逐，1973年石油危机，以及美国外交关系的转变，严重影响了台湾的经济。但蒋经国的十大建设工程却是台湾重工业发展的基础。

1980年代后，台湾经济开始趋于稳定。它最终成为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2002年台湾加入世贸组织。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Taiwan

台湾经济

台湾的经济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多数政府公司都被私有化。台湾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计算机微芯片制造商。

历史

台湾已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期的美国援助接受国转变为援助捐助国和主要外国投资者，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台湾在中国大陆的私人投资总额估计超过1500亿美元，官方统计显示台湾在东南亚的投资额与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相当。

台湾历史上受益于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中国人移居岛上：在清朝初期，前明朝的支持者在台湾短暂流亡；而在1949年，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大陆，两百万国民党支持者逃往岛上。

工业化的第一步是土地改革，这是经济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拥有资本的土地所有者阶级，他们可以投资于未来的经济活动。美国的援助对战后台湾的稳定也很重要，从1951年到1962年，它占国内投资的30%以上。这些因素，加上政府计划和普及教育，为工农业和生活水平带来了巨大进步。经济从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1952年占GDP的 32%）转变为以工业为导向的经济（1986年占GDP的47%）。1952年至1961年间，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21%。

台湾经济的转型离不开更大的地缘政治框架。虽然援助在1970年代被削减，但在形成时期至关重要，刺激了工业化，并维持了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安全 and 经济联系。美国承诺的不确定性加速了该国从1950年代的补贴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型增长的转变。外贸和出口的发展有助于吸收农业在经济中重要性下降带来的过剩劳动力。台湾在1970年代从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例如纺织品和玩具）转向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扩张，然后到随后十

年的先进电子产品。到1980年代，经济日益开放，政府开始将政府企业私有化。科技发展导致1981年新竹科学园成立。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刺激了两岸贸易，降低了台湾对美国市场的依赖。1981年至1995年，经济年均增长7.52%，服务业以51.67%成为第一大部门，超过工业部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国际贸易由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委员会正式协助。

经济展望

截至2018年，台湾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包括电信、金融服务和公用事业。台湾经济在2015年全球创业指数（GEI）中位列亚洲第一。自二战以来，出口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保持在低位，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四。

台湾现在面临许多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同的经济问题。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经济体转移的前景，如中国大陆、菲律宾和越南，台湾未来的发展将不得不依赖进一步向高科技和服务型经济转型。近年来，台湾成功实现贸易市场多元化，对美出口占比从1984年的49%降至2002年的20%。亚洲和中国大陆发展壮大，其开发欧洲市场的努力取得了成效。台湾加入世贸组织及其成为亚太“区域运营中心”的愿望正在推动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

台湾经济在世界经济中面临经济边缘化、去国际化和较低的工资。这导致人力资源人才在其他地方寻找职业机会。台湾企业受害最大的是中小企业的规模，这阻碍了台湾政府对台湾经济转型的尝试。

台湾经济的间接税制包括Gross Business Receipts Tax (GBRT) (总收入税) 和增值税。根据万事达卡2014年全球目的地城市指数, 台湾经济在国际过夜游客(2014年) 全球前20名最佳目的地城市中排名第15位。

全球金融危机

台湾从2007年至2010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迅速复苏, 此后经济一直稳步增长。由于严重依赖出口, 其经济在2009年面临低迷, 这反过来又使其容易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失业率达到20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经济在2008年第四季度下降了8.36%。作为回应, 政府推出了 56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占GDP的3%), 提供财政支持。并引入税收减免。一揽子刺激计划侧重于基础设施发展、中小企业、新投资的税收减免以及低收入家庭。增加对俄罗斯、巴西和中东等新海外市场的出货量也是刺激计划的主要目标。此后经济缓慢复苏; 到2010年11月, 台湾的失业率已降至4.73%的两年低点, 并在2011年底继续降至4.18%的40个月低点。私人消费也在增加, 与2009年相比, 零售额增长6.4%。在2010年经济增长10.5%之后, 世界银行预计2011年将继续增长并达到5%。

对外贸易

40年来, 外贸一直是台湾高速增长的引擎。台湾经济仍以出口为导向, 依赖于开放的世界贸易体制, 容易受到世界经济下滑的影响。贸易总额在1960年代增加了五倍多, 在1970年代增加了近十倍, 在1980年代再次翻了一番。1990年代的增长温和, 略低于两倍。出口构成从主要是农产品转变为工业产品(现在为98%)。电子业是台湾最重要的工业出口部门, 也是美

国投资的最大接受者。

台湾是众多贸易协定的成员，中国、日本、美国、欧盟和香港是2010年的前5大贸易伙伴。台湾拥有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和高房价。由于台湾人口下降速度快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劳动力短缺、国内需求下降和税收下降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作为一个岛国经济与缺乏自然资源和相对较低的国内总需求，台湾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将大大推动增值创新管理，扩大台湾国际贸易。

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2002年1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作为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的单独关税区（通常简称为“中国台北”——这两个名称都是由于中国干预世贸组织而产生的）。在商业环境风险情报（BERI）的2011年报告中，台湾的投资环境在全球排名第三。

台湾是全球最大的合约计算机芯片制造供应商（代工服务），也是领先的LCD面板制造商，DRAM计算机内存、网络设备以及消费电子设计和制造商。主要的硬件公司包括宏基、华硕、宏达电、富士康、台积电和和硕。纺织品是另一个主要的工业出口部门，但由于劳动力短缺、管理费用增加、土地价格 and 环境保护，其重要性正在下降。

进口以原材料和资本货物为主，占进口总量的90%以上。台湾大部分能源需

要进口。美国是台湾第三大贸易伙伴，占台湾出口的11.4%，供应台湾10.0%的进口。中国大陆最近成为台湾最大的进出口伙伴。2010年，大陆占台湾出口的28.0%和进口的13.2%。随着两个经济体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这个数字正在迅速增长。从中国大陆进口的主要是农业和工业原材料。对美国的出口主要是电子产品和消费品。随着台湾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进口优质消费品的需求增加。2002年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87亿美元。

中华民国（台湾）与台湾贸易伙伴之间缺乏正式外交关系似乎并没有严重阻碍台湾快速扩张的商业。中华民国在60多个与台湾没有正式关系的国家设有文化和贸易办事处，以代表台湾的利益。

台湾是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成员。台湾也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观察员和国际商会的成员。台湾于2010年6月29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台湾还与新加坡和新西兰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台湾于2015年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政府也在寻求与新加坡和美国建立贸易协定。

工业

工业产值从1986年占台湾GDP的一半以上逐渐下降到2002年的31%。工业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中电子和信息技术占35%的产业结构。台湾的工业主要由许多中小企业（SME）组成，大型企业较少。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向海外转移，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和技术

密集型产业。产业技术研究所是台湾经济应用技术的先进研究中心。

政府发起的“e-Taiwan”计划，拟斥资18.3亿美元，在政府、生活、商业、交通、宽带五个主要领域改善台湾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该计划旨在提高行业竞争力，提高政府效率，改善生活质量，旨在将岛上宽带用户数量增加到600万。2010年，台湾软件市场增7.1%，达到40亿美元，占亚太地区市场价值的3.3%。数字内容制作行业在2009年增长了15%，达到140.3亿美元。2010年光电子工业（包括平板显示器和光伏）总额为新台币2.2万亿，比2009年增长40%，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五分之一。台湾经济是全球电子产业价值链的合作伙伴。电子元件和个人电脑是台湾资讯科技产业的国际实力领域。

半导体产业

在半导体产业，包括集成电路制造，设计和包装，形成了台湾IT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凭借其强大的代工晶圆制造能力和完整的产业供应链，已经能够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2009年行业产值达到390亿美元，在全球IC制造、封装和测试市场份额排名第一，IC设计市场份额排名第二。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和联华电子（UMC）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合同芯片制造商，而联发科是全球第四大晶圆厂供应商。1987年，台积电开创了晶圆代工模式，重塑了全球半导体产业。从工研院于1977年建成的第一家3英寸晶圆制造厂和联电于1980年成立，到2002年，该行业已发展成为拥有40家工厂的世界领先者。2007年，半导体产业超过美国，仅次于日本。尽管2007年至2010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了销售和出口，随着公司

在2010年公布创纪录的利润，该行业已经反弹。半导体制造业的国际产业预测，这是台湾经济的旗舰产业，面临着与美国同行的激烈竞争。台湾拥有全球最大的300纳米、90纳米和60纳米制造能力，预计到2011年年中，其IC晶圆厂总产能将超过日本。

信息技术

在过去的20年中，台湾的信息技术产业在全球IT市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0年，台湾的电子工业几乎不存在。随着政府专注于发展高科技专业知识，以及建立行业的营销和管理知识，诸如台积电和联电等公司成立。该行业利用其行业资源和产品管理经验，与主要国际供应商密切合作，成为亚太地区的研发中心。台湾的产业结构包括少数几家顶级公司以及许多中小企业（SME），占工业总产值的85%。这些中小企业通常在原始设备制造商（OEM）或原始设计制造商（ODM）的基础上生产产品，从而减少了用于研发的资源。由于强调OEM/ODM模式，企业往往无法对新产品的投资、生产和营销进行深入评估，而是依赖于从美国日本进口关键零部件和先进技术。20家顶尖资讯及通讯科技（ICT）公司在台湾设有国际采购办事处。作为信息技术协议的签署国，台湾自2002年1月1日起逐步取消对IT产品的关税。

台湾是全球计算、电信和数据管理的中心，运营着许多大型服务器群。谷歌在彰化的数据中心被认为是亚洲最大的数据中心。台湾与全球海底光缆网络连接良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农业

农业是台湾经济奇迹的坚实基础。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为3%，服务业占经济的73%。1945年光复后，政府宣布了“以农兴业，以工兴农”的长期战略。因此，农业在早年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并成为工商业增长的支柱。1951年农业生产占台湾GDP的35.8%，到2013年占GDP的1.69%。截至2013年，台湾的农业是农作物（47.88%）、畜牧业（31.16%）、渔业（20.87%）和林业（0.09%）的混合体。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随后的贸易自由化以来，政府实施了新政策，将该部门发展成为更具竞争力和现代化的绿色产业。

台湾土地面积虽然只有四分之一左右适合耕种，但几乎所有的耕地都是密集耕种，有的地方一年可种两茬甚至三茬。然而，农业生产的增长远低于工业增长。农业现代化因农场规模小以及缺乏投资于更好的设施和培训以发展更有利可图的业务而受到抑制。台湾农业人口从1974年到2002年稳步下降，促使农业委员会引入现代农场管理，提供技术培训，并为更好的生产和分配系统提供咨询。推进农业机械化有助于缓解劳动力短缺，同时提高生产力；水稻和甘蔗生产都已完全机械化。台湾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甘蔗、水果（其中许多是热带的）和蔬菜。虽然大米生产自给自足，但台湾进口大量小麦，主要来自美国。肉类生产和消费急剧上升，反映了高水平的生活。台湾已出口大量冷冻猪肉。其他农产品出口包括鱼类、水产养殖和海产品、罐头和冷冻蔬菜以及谷物产品。

能源

由于岛上缺乏自然资源，台湾的许多能源需求被迫进口（目前为98%）。2002年能源进口总额为115.2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虽然工业部门历来是台湾最大的能源消费市场，但近年来其份额从1986年的62%下降到2002年的58%。台湾的能源消费以原油和石油产品为主（48.52%），其次是煤炭（29.2%）、天然气（12.23%）、核电（8.33%）和水电（0.28%）。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供应台湾大部分天然气需求。它目前拥有三座运行中的核电站。

台湾是全球第四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国和最大的LED制造商。2010年，台湾安装了超过166万平方米的太阳能集热器，安装密度位居世界第三。政府已经建造了155套风力涡轮机，能够产生281.6兆瓦的能源，并且正在计划或正在建设其他项目。截至2010年，可再生能源占台湾能源使用量的6.8%。2010年，绿色能源部门创造了109.7亿美元的产值。政府还宣布计划投资8.38亿美元用于推广可再生能源，另外投资6.35亿美元用于研发。

钢铁和重型制造业

截至2017年，台湾是全球第十三大钢铁出口国。2018年，台湾出口钢材1,220万吨，比2017年的1,200万吨增加1%。根据现有数据，台湾出口约占2017年全球钢材出口总量的3%。台湾2018年钢材出口量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中国的六分之一，是第二大出口国日本的近三分之一。按价值计算，钢铁占台湾2018年出口商品总量的3.6%。台湾向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钢铁。从2009年到2019年的十年间，台湾的钢铁出口增长了24%。2018年，美国进口管材产品30万吨。台湾的2018年不锈钢出口量约为50万吨。

台湾是世界第四大机床和机床零部件出口国。大台中地区聚集了一批机床制造商。台湾公司Techman Robot Inc. 是全球第二大协作机器人生产商。台湾的汽车产业意义重大，台湾公司越来越多地投资于汽车电气化，特斯拉公司75%的供应商是台湾。

海运业

2017年台湾出口162艘游艇。2018年，台湾是继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之后，按建造游艇英尺数计算的第四大游艇建造国。台湾是地球上最大的渔业国家之一，相关的鱼类加工业也很重要。

劳工政策

工会政策

在台湾民主化之前，工会的功能在严格的管制和国家法团主义下受到限制。根据工会法，工人只能在公司组织，这意味着行业层面的工会是被禁止的。此外，每个公司或地理区域内只能存在一个工会。教师等特殊职业群体不得成立工会。罢工和集体谈判的权利也受到法律的限制。1930年的集体谈判协议规定，未经政府批准，集体谈判在法律上无效。1986年的民主化给工会参与和政策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从1986年到1992年，加入工会的工人增加了13%。出现了一些自治的、非官方的工会，包括台湾总工会（TCTU），该工会于 2000 年获得法律承认。修改后的《工会法》取消了对特殊职业群体集体代表制的限制。2008 年的《集体谈判协议法》保证了

工会与雇主谈判的权力。

就业保障

台湾的劳工权益和就业保障随着1980年代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而增加，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其就业保障水平仍然较高。1984年8月实施的《劳动基准法》是台湾第一部全面保障劳动者就业的法律。在实施之前，《工厂法》是管理劳工事务的主要法律，但由于其涵盖的业务和问题范围狭窄，而且没有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因此在实践中无效。相比之下，《劳动基准法》涵盖的企业和劳动事务范围更广，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也很详细。它规定了解雇员工前的通知期，并且还要求更高水平的遣散费。其他劳动问题也受到法律的规范，包括合同、工资、加班费、工伤赔偿等。法律也明确了对雇主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了罚款和刑事责任。劳工事务委员会(CLA)成立于1987年8月1日，以协助劳工监察和劳工标准法的执行。

在台湾，至少有一名雇员的公司有义务缴纳保险公司的就业服务保险费。劳动保险的份额按雇主、雇员和国家之间的比例为7:2:1。就社会保障缴款而言，公司应至少按雇员工资的6%缴付社会保障。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由于全球化和去工业化导致的经济结构变化，台湾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实施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失业率在2002年和2009年增加并达到约5%。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帮助失业者和提供就业机会。2002年的就业保险法给予失业期间的收入保障，但同时要求受益人利用所有可用资源寻找工

作。多面就业创造计划于1999年首次推出，为第三部门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在非营利组织中。它资助这些公司提供职业培训和工作机会。公共部门临时就业创造计划直接解决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多方面创造就业计划不同，公共部门临时就业创造计划在政府本身创造就业机会。从2008年到2009年，政府估计通过该计划创造了102,000个就业机会。还实施了一个创造就业项目，通过补贴在大学和私营公司雇用年轻人来帮助年轻人。

工作时间

1984年12月台湾人均GDP低于5000美元，2018年12月达到25026美元，创历史新高。1984年7月30日，台湾根据总统令第14069号实施了八十六条劳动标准法。该法案将标准工作周定义为40个劳动小时，每天限制为8小时，允许每周最多48小时的加班时间。

科技园区

为了促进工业研发，政府开始建立科学园区、经济区，提供租金和水电费减免、税收优惠和专门的贷款利率以吸引投资。其中第一个，新竹科学园由国家科学委员会于1980年建立，重点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它被称为台湾的“硅谷”并已扩展到六个校区，占地1,140公顷（11.4平方公里）。430多家企业从业人员超过13万人都位于园内。台积电和联华电子公司，世界上最大的和第二大合同芯片制造商，总部都在园区内。自1980年以来，政府已在园区基础设施上投资了超过10亿美元，并进一步扩大了更专业的园区。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总部位于园区内，是台湾最大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致力于为工业开发应用技术研究，包括台湾许多传

统产业（如纺织）。

继第一个园区成功后，由台南科技园和高雄科技园组成的南台科技园（STSP）于1996年成立。除公司外，还有多家研究机构（包括中央研究院）以及大学在园区内设立分支机构，重点是集成电路（IC）、光电子和生物技术。台湾中部科学园（CTSP）于2003年成立。虽然CTSP仍在开发中，但许多公司（包括友达光电）已经搬入园区并开始制造业务。与其他园区一样，CTSP 也专注于集成电路、光电子和生物技术，光电子产业占其2008年收入的78%。仅这三个科技园区就吸引了超过4万亿新台币（137亿美元）资本流入，2010年园区内总收入达到新台币2.16万亿（728亿美元）。

1960年在高雄成立的临海工业园区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区，拥有490多家公司，专注于其他行业，包括贱金属、机械维修、非金属矿产品、化工产品、食品和饮料制造。彰滨工业区，位于彰化县，是一个较新的工业集群，包含许多不同的行业，如食品生产，玻璃，织物，和塑料。

台湾工业园区及科技园区的完整名单如下：

中台科学园

新竹科学园

高雄科学园

南康软件园

内湖科技园

台南科技园

经济研究机构

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台湾经济研究所

中华经济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产业技术研究所

台湾畜牧研究所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iwan_Miracle

台湾奇迹

台湾经济奇迹是指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台湾。它与新加坡、韩国和香港一起发展，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背景

受美国人在占领日本时期颁布的同一法律的启发，一项土地改革法消除了地主阶级（类似于日本发生的情况），并创造了更多的农民，他们在国家的帮助下大幅增加农业产量。

它还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帮助下，创建了庞大的工业基础设施、通信和发展教育系统。成立了几个政府机构，并制定了四年计划。1952年至1982年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7%，1983年至1986年间为6.9%。国民生产总值在1965年至1986年间增长了360%，1986年在全球出口中的比例超过了2%，超过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贫富差距下降（基尼系数：1953年为0.558，1980年为0.303），甚至低于一些西欧国家，但在80年代略有增长。医疗保健、教育和生活质量也得到改善。其中大部分是通过美国的经济援助实现的，它补贴了国内生产的更高成本。生产体系和产业结构的灵活性意味着台湾企业有更多机会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和全球经济。

1959年，经济和金融改革的19点计划放开了市场管制，刺激了出口，并制定了吸引外国公司和外国资本的战略。在高雄设立了出口加工区；1964年，美国通用仪器公司率先在台湾将电子组装外包化。日本公司搬进来，受益于低工资、受过良好教育和有能力的劳动力以及政府的支持。

但产业结构的核心是全国性的，他们以补贴和银行贷款的形式得到政府的支持。大多数这些会社第一次出现在靠近大都市区的农村地区，在那里家

庭分担工作（同时在他们拥有的地块和工业车间中）。例如，1989年在彰化，小企业生产了世界上近50%的雨伞。

外国投资从未成为台湾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市场除外。例如，1981年，外国直接投资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外国公司雇用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4.8%，其产量占总产量的13.9%，出口占全国出口的25.6%。日本公司和美国进口商为进入全球市场提供了便利，他们希望与台湾品牌建立直接关系。

没有创建大型跨国公司（例如新加坡），也没有创建大型国家集团（例如韩国财阀），但一些工业集团在政府的支持下成长起来，并在90年代成为完全国际化的大公司。

大部分的发展都归功于家族企业的灵活性，这些企业为在台湾建立的外国商人企业和在中间人的帮助下为国际贸易网络生产。但国家是协调工业化进程的中央有机体，它创造基础设施，吸引外国投资，决定战略重点。

全球化时代

在20世纪70年代，保护主义呈上升趋势，而联合国承认中国政府为大陆的唯一合法代表。它在所有联合国机构中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

在国民党开始产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主要集中在高科技（如微电子，个人电脑和外围设备）。最大、最成功的科技园之一建于新竹，台北附近。

政府还建议纺织和服装行业提高其产品的质量和价值，以避免通常以数量衡量的限制性进口配额。

在几十年的镇压之后，这十年也见证了真正独立的工会运动的开始。1977年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这对新工会起到了推动作用。

1980年代，台湾经济成熟多元，国际市场稳固，外汇储备庞大。其公司能够进行国际化的生产，在亚洲大规模投资（主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经济体合作，主要是在美国。

1952年，台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170美元，使该岛的经济处于扎伊尔和刚果之间。到 2018年，台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经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飙升至53,074 美元，接近或高于一些发达的西欧经济体和日本。

根据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说法，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使快速增长成为可能，而不是效率的提高。换句话说，储蓄率提高了，工作时间延长了，更多的人，比如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

Dwight Perkins认为台湾的大部分增长可以归因于生产力的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提高是通过土地改革、结构变化（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及促进出口而非进口替代的经济政策实现的。

未来增长

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增长变得更加温和。理解这种新环境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的崛起，它提供了与40年前实现台湾奇迹相同的条件（安静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廉价且受过教育的工人、缺乏独立工会）。为了保持增长，台湾经济必须放弃无法与中国、越南或其他次发达国家竞争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继续创新和投资信息技术。自1990年代以来，台商获准在大陆投资，越来越多的台商要求两岸更容易沟通。

总体来说，交通基础设施非常好，并且还在不断完善中，主要集中在岛的西侧。目前正在进行许多基础设施改进，例如第一条捷运线路于2008年在高雄开通，到2013年台北捷运系统规模扩大一倍，目前正在进行中；高速公路非常发达，维护良好，并继续扩建，特别是在欠发达和人口稀少的东海岸，最近实施了有争议的电子收费系统。

连接西海岸所有主要城市的台湾高铁服务的建成，从台北到高雄，被认为是台湾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补充。中华民国政府选择在这些项目的建设筹集私人资金，走建设 - 运营 - 转让路线，但仍然需要大量公共资金，并且已经揭露了一些丑闻。尽管如此，还是希望这些项目的建成能够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刺激作用，就像台北的地铁重振了那里的房地产市场一样。

技术部门

台湾继续严重依赖其技术部门，即外包专家。最近的发展包括在品牌建设和设计方面向食物链上游移动。LCD制造和LED灯是台湾公司正在进军的两

个较新的领域。台湾也想进军生物科技领域。台湾也是兰花的主要种植者。

自1980年代以来，台湾的信息技术（IT）和电子行业一直负责提供大量产品。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在1973年创建，以满足新兴的高科技产业新的需求。这导致了像台积电（TSMC）这样的初创公司和新竹科学工业园（HSP）的建设，其中包括大约520家高科技公司和 150,000 名员工。到2015 年，主板（89.9%）、Cable CPE（84.5%）和笔记本电脑（83.5%）的大部分全球市场份额包括离岸和国内生产。台湾仍然严重依赖离岸资本和技术，从中国大陆进口高达250亿美元的机械和电气设备，从日本进口160亿美元，从美国进口100亿美元。

虽然中小企业的发展允许更好的市场适应性和公司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但台湾的大多数公司仍然是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并没有扩展到原始设计制造（OBM）。

=====

=====

=====

=====

=====

=====

=====

Handwriting practice lines consisting of multiple sets of three horizontal lines (top, middle, and bottom lines) for letter form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South_Korea

韩国经济

韩国的经济是高度发达的混合经济体，由称为财阀的家族企业集团主导。它是亚洲第4大 GDP和世界第10大GDP。到21世纪中叶，它有可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被列入“下一个11大国家”。

韩国严格的教育体系、高积极性、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该国的高科技繁荣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韩国境内几乎没有自然资源，人口密度高，阻碍了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庞大的内部消费市场的形成，韩国调整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来推动经济发展，并在2019年，韩国是世界第八大出口国和第八大进口国。韩国银行和韩国发展研究院定期发布主要经济指标和韩国经济的经济趋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知名金融组织称赞韩国经济在应对各种经济危机时的韧性，称其国家债务低，财政储备高，可以迅速调动以应对任何预期的金融紧急情况。韩国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能够避免经济衰退的少数发达国家之一，2010年经济增速达到6.2%，较2008年2.3%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0.2%的经济增速大幅回升。

尽管韩国经济具有高增长潜力和明显的结构稳定性，但由于朝鲜在严重军事危机时期的好战，韩国股市的信用评级受到永久性损害，这对韩国的金融市场产生了不利影响。此外，财阀的主导地位也被许多韩国人视为高度腐败和在政治体系中具有影响力，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并导致韩国经济转型放缓的风险。

腐败也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有四位在职的韩国前总统因滥用职权、贿赂和挪用公款等各种罪行被判处监禁；目前仍有两名在服刑。

历史

概述

继朝鲜战争后，韩国仍然是最贫穷的国家。1960年，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9美元。工业部门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1986年，制造业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和劳动力的25%。得益于国内的大力鼓励和外援，首尔的工业家们迅速将现代技术引入过时或新建的设施中，增加了商品的生产——尤其是在国外市场销售的商品——并将所得收入重新投入到进一步的工业扩张中。结果，工业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将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吸引到城市制造中心。

1989年韩国经济因出口和国外订单锐减而出现下滑，引起了工业界的深切关注。贸易和工业部分析师表示，出口表现不佳的原因是国家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包括韩元过强、工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高、罢工频繁和高利率。结果是许多电子、汽车和纺织品制造商以及供应零件的较小公司的库存增加和生产严重削减。引入工厂自动化系统是为了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以更少的劳动力提高生产力，并提高竞争力。

从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的快速增长

随着1961年朴正熙将军的政变，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开始实施，推动在国家阴影下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重新激活内部市场。为促进发展，实行外向型

工业化政策，禁止除原材料外的各种外国产品进入该国。土地改革是在没有补偿日本大庄园的情况下进行的。朴将军将金融体系国有化，以壮大强大的国家机构，后者通过五年计划对经济进行干预。

现代、三星和LG等多元化的家族企业集团获得了国家激励措施，例如税收减免、过度开发系统的合法性以及廉价或免费融资。

1961年，韩国收到美国31亿美元的捐款，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这种经济和军事支持的政策持续了几十年。财阀开始主导国内经济，并最终开始具有国际竞争力。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稳步改善，从而增加了国内消费。到1980年代，该国从低收入状态稳步上升到中等收入状态。

韩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以上，从1962年的27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2300亿美元，2006年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名义GDP人均从1962年的103.88美元增长到1989年的5,438.24美元，在2006年达到了20,000美元的里程碑。制造业从1962年占国民生产总值14.3%增长到1987年的30.3%。

快速工业化的最重要因素是1960年代初期采取的外向型战略。由于韩国自然资源禀赋差、储蓄率低、国内市场狭小，这一战略特别适合那个时代。该战略通过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促进经济增长，韩国可以在其中发展竞争优势。政府举措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韩国政府鼓励企业开发新技术并提高生产效率，以便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竞争。通过遵守国家规定和要求，公司获得补贴和投资支持，以在快节奏、不断发展的国际舞台上快速发展其出口市场。此外，还大力鼓励外资流入，以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这些努力使韩国实现了出口的快

速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收入增长。

通过强调工业部门，首尔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农村部门相对欠发达。在此期间，钢铁和造船业在韩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采矿业外，大部分工业都位于西北和东南部城市地区。重工业一般位于该国南部。1978年，首尔的工厂贡献了所有制造业增加值的25%以上；加上京畿道周边的工厂，首尔地区的工厂占当年所有制造业的46%。首尔和京畿道的工厂雇佣了全国210万工厂工人的48%。尽管政府努力提高农业收入和改善农村生活水平，但到1970年代，工业和农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并且仍然是一个问题。

80年代初期，为控制通货膨胀，采取了保守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财政措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从1970年代的30%水平下降到15%。首尔甚至暂时冻结了预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大减少，进口和外国投资政策放开以促进竞争。为了减少城乡之间的不平衡，首尔扩大了对道路和通讯设施等公共项目的投资，同时进一步促进了农业机械化。

十年初期实施的措施，加上世界经济的显著改善，帮助韩国经济恢复了1980年代后期失去的动力。韩国在1982年至1987年间实现了9.2%的平均实际增长率，在1986年至1988年间实现了12.5%。1970年代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从1980年到1988年，批发价格平均每年上涨2.1%；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4.7%。首尔在1986年首次实现国际收支的重大顺差，1987年和1988年分别录得77亿美元和114亿美元的顺差。这一发展使韩国开始降低其外债水平。

1990年代和亚洲金融危机

1990年代前半期，韩国经济在私人消费和GDP两方面继续保持稳定强劲增长。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在其他几种亚洲货币受到投机者的攻击后，韩元于 1997年10月开始大幅贬值。韩国许多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加剧了这一问题。到1997年12月，IMF批准了210亿美元的贷款，这将是584亿美元救助计划的一部分。到1998年1月，政府关闭了韩国三分之一的商业银行。整个1998年，韩国经济将继续以平均-6.65%的速度每季度萎缩。1999年，韩国财阀大宇因债务问题被政府解散，成为危机的牺牲品。美国公司通用汽车设法收购了电机部门。印度企业集团塔塔集团收购了大宇的卡车和重型车辆部门。

韩国政府的行动和国际贷款机构的债务互换遏制了该国的财政问题。韩国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复苏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调整（即具有灵活工资率的充满活力和生产力的劳动力市场）和替代资金来源。到199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已上升至5.4%，此后强劲的增长加上货币的通货紧缩压力导致年增长率为10.5%。1999年12月，金大中总统宣布货币危机结束。

2000 年代

韩国经济从中央计划、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转向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模式。这些由金大中总统推动的经济改革帮助韩国保持了亚洲少数几个正在扩张的经济体之一，1999年的增长率为10.8%，2000年的增长率为9.2%。

经过九十年代末危机的反弹，2000年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GDP增长

9.08%。然而，韩国经济受到了911袭击事件的影响。全球经济放缓、出口下降以及企业和金融改革停滞不前的看法导致2001年增长回落至3.8%。最近经济企稳并从 2003 年起保持4-5%的增长率。

在工业和建筑业的带动下，2002年的增长率为5.8%，尽管全球增长乏力。韩国企业集团（财阀）的重组、银行私有化以及建立更加自由化的经济——为破产企业提供退出市场的机制——仍然是韩国最重要的未完成改革任务。2003年增长再次放缓，但由于对高清电视和手机等主要出口产品的需求旺盛，2006年产量增长了5%。

2010年，韩国经济强劲反弹，增长率为6.1%，标志着经济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2010年前11个月韩国出口额达到4240亿美元，已经高于2008年全年出口额。

韩国政府于2013年12月5日签署了韩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KAFTA），澳大利亚政府寻求使其众多行业受益，包括汽车、服务、资源和能源，并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并驾齐驱，例如美国和东盟。韩国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贸易伙伴，2012年贸易额为320 亿澳元。该协议包含一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条款，该条款允许韩国公司在其贸易权受到侵犯时对澳大利亚政府采取法律行动。

从2004年到2011年，政府根据公司的规模将工作周从六天减少到五天。到2013年，公共假期的数量增加到16个。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的高科技产业

1990 年，韩国制造商计划将未来的生产计划向高科技产业转移。1989 年 6 月，由政府官员、学者和商界领袖组成的小组就新材料、机电一体化（包括工业机器人）、生物工程、微电子、精细化学和航空航天等产品的生产举行了规划会议。然而，这种重点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汽车和船舶生产等重工业的立即衰退，这些工业在 1980 年代主导了经济。

韩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来推动其经济增长，电子产品、纺织品、船舶、汽车和钢铁等制成品是其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尽管近年来进口市场放开，但由于大米等国内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存在较大差距，农产品市场仍以保护主义为主。截至2005年，韩国大米价格约为国际市场大米平均价格的四倍，普遍担心开放农产品市场会对韩国农业部门造成灾难性影响。然而，在 2004 年底，与世贸组织达成了一项协议。其中韩国大米进口量到 2014 年将从消费量的 4% 逐渐增加到 8%。此外，到 2010 年，高达 30% 的进口大米将直接提供给消费者，而此前进口大米仅用于加工食品。2014年后，韩国大米市场将全面开放。

此外，如今的韩国被称为成熟移动市场的 Launchpad，在那里开发人员可以从几乎没有技术限制的市场中获益。在韩国，使用 4G 和 5G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新型媒体或应用程序的发明呈增长趋势。韩国今天拥有满足人口密度和文化密度的基础设施，能够创造强大的地方特色。

部门

造船

造船业是韩国自 1960 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旗舰产业。

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韩国成为船舶的主要生产国，包括石油超级油轮和石油钻井平台。该国的主要造船厂是现代，它于 1970 年代中期在蔚山建造了一个 100 万吨容量的干船坞。大宇于 1980 年加入造船业，并于 1981 年年中在釜山南部巨济岛的玉浦完成了一座 120 万吨的工厂。由于石油过剩和全球经济衰退，该行业在 1980 年代中期衰落。

韩国最终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造船商，截至 2008 年，占全球造船市场 50.6% 的份额。著名的韩国造船商是现代重工、三星重工、大宇造船和海洋工程，以及现已破产的 STX Offshore & 造船业。

电子

电子产品是韩国的主要产业之一。从 1980 年代到 2000 年代，三星、LG 和 SK 等韩国公司引领了韩国电子产品的发展。2017 年，韩国 17.1% 的出口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生产的半导体。三星和 LG 也是电视、智能手机、显示器和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的主要生产商。

汽车

汽车工业是 1980 年代韩国的主要增长和出口产业之一。到 1980 年代后期，韩国汽车工业的产能自 1984 年以来增长了 5 倍多；1988 年超过 100 万辆。1989 年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制造总投资超过 30 亿美元。1988

年总产量（包括公共汽车和卡车）总计 110 万辆，比 1987 年增长 10.6%，并增长到1989 年估计有 130 万辆汽车（主要是乘用车）。1985 年生产了近 263,000 辆乘用车——这一数字在 1989 年增长到大约 846,000 辆。1988 年汽车出口总量为 576,134 辆，其中 480,134 辆（480,113%）送到美国。在 1980 年代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韩国的大部分增长 汽车工业是出口激增的结果；然而，1989 年的出口比 1988 年下降了 28.5%。

今天的韩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之一。

采矿

朝鲜半岛的大部分矿床位于朝鲜，而南部仅拥有钨和石墨。韩国有煤炭、铁矿石和钼，但数量不多，采矿作业规模较小。韩国的大部分矿产和矿石都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大多数韩国煤炭是无烟煤，仅用于为家庭和锅炉供暖。

施工

自 1960 年代初以来，建筑业一直是韩国重要的出口产业，并且仍然是外汇和无形出口收入的重要来源。到1981年，海外建筑项目，其中大部分在中东，占韩国建筑公司承担的工作的60%。当年的合同价值为 137 亿美元。

韩国最大的建筑公司包括三星物产公司，它建造了一些最高的建筑和最引人注目的摩天大楼，例如台北101和哈利法塔。

军备

韩国显着的技术进步和工业化使韩国能够生产越来越先进的军事装备。

在 1960 年代，韩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来供应其武装力量，但在 1970 年代韩国开始制造许多自己的武器。

自 1980 年代以来，韩国拥有比前几代人更多的现代军事技术，已积极开始将其国防工业的兴趣领域从以前以国土防御为导向的军事化努力转向促进军事装备和技术的发展。其一些关键的军事出口项目包括土耳其的T-155 Firtina自行火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K11气爆步枪；孟加拉国 Bangabandhu级导弹护卫舰；舰队油轮，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委内瑞拉海军的天狼星级；印度尼西亚的望加锡级两栖攻击舰；以及用于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秘鲁的KT-1教练机。

韩国还将其国防工业外包给其他国家先进军事硬件的各种核心部件。这些硬件包括现代飞机，如F-15K战斗机和AH-64攻击直升机，新加坡将使用它们，其机身将由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与波音公司共同制造。韩国的国防出口在 2008 年和 2009 年分别为 10.3 亿美元和 11.7 亿美元。

旅游业

2012 年，有 1110 万外国游客访问韩国，使其成为世界上第 20 位访问量最大的国家，高于 2010 年的 850 万。

首尔是游客的主要旅游目的地；首尔以外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包括雪岳山国

家公园、历史名城庆州和亚热带的济州岛。2014 年韩国举办了英雄联盟第 4 季冠军赛，然后在 2018 年举办了第 8 季冠军赛。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racle_on_the_Han_River

汉江奇迹

汉江奇迹是指在韩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时期；在此期间，韩国从发展中国家转化到发达国家。20 世纪后半期韩国经济的快速重建和发展伴随着韩国成功举办1988年夏季奥运会和共同举办2002 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等事件。财阀家族企业集团崛起，例如三星，LG和现代。

继汉江奇迹之后，韩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视为经济楷模并于 2010 年 11 月加入G20，成功完成了六十多年的重建和现代化。

历史

背景

1910年至1945年间，朝鲜被吞并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部分由于日本资本投资，特别是在 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期间，它经历了适度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阶段。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开始，日本在经济上剥削韩

国，韩国经济开始衰退。太平洋战争结束时，韩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1948-1960：第一次共和国和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造成的领土分割进一步损害了韩国财产25%，并导致韩国第一共和国的建立，由李承晚政府统治至1960年。此时，经济主要是农业。通过1950年的农田改革法案，驻韩美军军政府重新分配了以前日本拥有的土地，允许产生私人资金。

1960-1961：第二共和国

韩国的第二共和国存在只有一年，但通过思想和政策对经济和韩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张敏总理和民主党持有极端反共的立场（第一共和国也是如此），但也主张以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优先政策，促进与日本的友好和经济合作。

1961-1963：SCNR

1961年朴正熙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民主党，结果是SCNR下的军政府。在此期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1966）实施，成为汉江奇迹的重要因素。它旨在通过扩大农业和煤炭、电力等能源产业来发展国家经济；发展化肥、水泥、炼油、钢铁等基础产业；扩大社会间接资本包括公路、铁路和港口；充分利用闲置资源，包括增加就业；土地的保护和利用；促进出口改善国际收支；和促进科学技术。虽然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没有带来立即自力更生的经济，但它带来了一个增长和现代化的时期，为长

期的经济成功和政策改革做准备。

朴正熙“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员工”的座右铭被认为提高了韩国劳动力的生产力，从而为国家的经济成功做出了贡献。

朴正熙认为韩国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也没有准备好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正如他所说，“没有经济革命就不可能实现民主。”朴认为，国家的贫困会使它变得脆弱，因此当务之急是消除贫困而不是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情报局成为一个令人恐惧的机构，政府经常监禁持不同政见者。朴正熙的统治于 1979 年 10 月 26 日结束，当时他被他的安全部门负责人金载圭杀害。

1963–1972：第三共和国

在第三共和国期间，韩国以财产要求从日本获得了 8 亿美元，并且主要依赖外国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以换取韩国参与越南战争。政府用这笔钱实现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发起了新村运动以发展农村地区。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尽管被批评为镇压和强硬）以及廉价劳动力的有效利用是韩国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1972–1981：第四共和国

第四共和国期间，政府支持的重工业，电子，钢铁等行业蓬勃发展。政府支持的一个好处是，工业部门的领导者可以自由地花钱，而不会受到预算的限制。随着消费者对重工业的信心增强，资金随后涌入经济。

1981-1997：市场重组

到 1995 年底，韩国已成为世界第 11 大经济体，与战争结束时黯淡的经济格局形成鲜明对比。然而，系统性问题仍然存在于其政治和金融体系中。早些时候，每当出现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时，军政府就会骚扰富人以获得资金。军政府还聚集了一群高收入者，他们因与李承晚的腐败关系而获得财富。这些人被称为“非法奸商”。

美国财政部长 罗伯特·鲁宾和其他高级官员同意以 570 亿美元的救助计划换取韩国市场的大幅重组，韩国从美国获得了短期救济，因此金融问题加剧。由于该国面临着重组金融部门并使其更加透明、以市场为导向和更好监管的压力，其公司不得不以一种允许国际组织对其进行审计的方式进行重组。

1996 年 12 月左右，金泳三总统宣布韩国通过加入由顶级工业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经济获得了认可。金总统随后制定了一项新的劳动法，将韩国工会联合会（一个由国家控制的大型工会）保留为五年内唯一官方批准的劳工组织，而独立的韩国工会联合会则被冷落。

1997-1999：货币危机

1997年，韩国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形式面临经济灾难。该国的储备严重受限于 6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下个任期的支出。30 年来第一位非军事总统金永三未能保护当时的经济，金大中总统（1998-2003）接任，并

修复了相当大的损坏。与经历过类似情况的其他国家相比，韩国的金融危机虽然严重，但时间相对较短。

财阀集团在韩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财阀是指韩国的企业集团，主要由家族经营，对产品线和行业实行垄断或寡头控制。它们可以与美国的企业集团和日本的财阀相提并论。在韩国工业化时期，朴正熙总统支持财阀集团的崛起，促进这些集团的成长，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在财阀集团的运作中，有许多家族成员控制和运作的分支机构。每个韩国财阀企业都是由一个家族集团和 70% 的财阀发起的；仍然由家庭成员管理；为了让这些集团的权力和地位变得更加强大，许多财阀通过联姻结成联盟，例如三星和现代。许多政治派别是在财阀集团内部形成的。三分之一的财阀在政府的三个部门担任高级职务。财阀厌倦了军政府夺取他们的财产或指导他们投资有利的行业，与中产阶级朝着民主选举和法治的方向前进。

据称，在汉江奇迹期间，10 个财阀家族贡献了韩国经济增长的 60%。在政府的帮助和协会的帮助下，财阀仍然对韩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尽管他们也被指责为通过不道德行为和腐败行为抑制小企业或独立创业。金泳三政府（1993-98）试图通过提供更多贷款来帮助小企业，但这并没有阻止财阀的扩张。1992 年，韩国在工资率和税收负担或缺乏税收方面获得了最高 100 分（西班牙以 71 分位居第二，美国以 55 分位居第三）。换句话说，韩国政府仍然为其大型企业集团提供相对的资本主义避风港。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rst_Republic_of_Korea

韩国的第一共和国是从1948年8至1960年4月。第一共和国成立于1948年8月15日（美军自从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接管了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并于1948年把权力转交给韩国民选政府），成为韩国第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共和政府。继1948年5月举行大选，李承晚成为第一个韩国总统。7月，首尔国民议会颁布了韩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民主总统制政府。

第一共和国声称对整个朝鲜半岛拥有主权，但仅在38度线以南拥有权力，直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边界被修改。第一共和国的特点是李承晚的威权主义和腐败、有限的经济发展、强烈的反共主义，以及 1950 年代后期日益增长的政治不稳定和公众对李承晚的反对。四月革命在1960年4月导致了李承晚的辞职，并过渡到韩国的第二共和国。

政治

李承晚在选举中得到了朝鲜民主党的支持，但在他的内阁中没有包括任何该党成员。作为报复，该党成员组成了一个团结的反对党民主民族主义党，并开始倡导取消总统权力的内阁制度。这导致李承晚派系重组为国民党，国民党后来成为自由党，并在李承晚执政期间一直是他的基地。该国第二次议会选举于 1950 年 5 月 30 日举行，多数席位给了独立人士。

李承晚政府继续对济州起义采取严厉的军事行动。它还镇压了顺天和丽水的军事起义，这些起义是受命驶往济州岛参与镇压的。

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入侵韩国，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的领导下，联合国采取了首次集体行动。战线摇摆不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并造成巨大破坏。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51 年代表朝鲜进入，战斗在接近最初的分界线时陷入僵局。

停战谈判于 1951 年 7 月开始，最终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在板门店结束，现在位于非军事区（DMZ）。停战后，韩国政府在1953 年 8 月 15 日返回首尔。

战后事件

停战后，韩国经历了李承晚政府多年的政治动荡，并于 1960 年因学生叛乱而结束。在他的统治期间，李承晚试图采取更多措施来巩固他对政府的控制。李承晚推动通过宪法修正案，使总统职位成为直选职位。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宣布戒严并将他认为会投票反对的议会成员监禁。他在1954 年的选举中重新控制了议会，于是推动了一项修正案，免除自己的八年任期限制。

在 1956 年总统竞选期间，李承晚连任的前景最初似乎暗淡。公众对他寻求第三个任期的幻想破灭越来越多，主要反对派候选人申益熙在竞选期间吸引了大量人群。然而，申在竞选期间突然去世，让李承晚轻松赢得了总统职位。那次选举的亚军进步党的赵奉岩后来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并于 1959 年被处决。

1960 年的事件，被称为四月革命，是由 3 月 15 日总统选举当天马山的学生示威遭到暴力镇压引发的。最初，这些抗议活动被当地警察镇压，但后来在一名学生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港口之后，抗议又爆发了。随后，非暴力抗议活动蔓延至首尔和全国，李承晚于 4 月 26 日辞职。

教育

即使在朝鲜战争动荡期间，这一时期也见证了各级教育的爆炸性增长。第一共和国全面实施了由 USAMGIK 领导下的韩国教育委员会制定的教育体系。这种教育是由弘益仁干的理想塑造的，他试图让学生为参与民主社会做好准备。一些人认为，这种民主教育促成了 1960 年推翻李承晚专制政府的学生抗议活动。

第一部《教育法》于 1949 年 12 月 31 日生效。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在小学阶段推行普及义务教育。这一要求导致了广泛的学校建设；到第一共和国末期，小学入学率已超过 95%。此外，日本占领政府使用的双阶梯制被单阶梯制取代，小学教育 6 年，中学教育 3 年，高中教育 3 年，大学教育 4 年。

这一时期还采用了韩国第一个国家课程。

经济

这一时期的经济深陷困境。

1945 年至 1950 年期间，美国和韩国当局进行了保留私有财产制度的土地改革。他们没收并重新分配了日本殖民政府、日本公司和日本殖民者个人持有的所有土地。韩国政府进行了一项改革，拥有大量土地的韩国人必须剥离大部分土地。一个新的独立的家族企业主阶层诞生了。

国际关系

李承晚试图让他的政府与美国结盟，同时反对朝鲜和日本。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cond_Republic_of_Korea

韩国的第二共和国是从1960年4月至1961年5月。

第二共和国结束了李承晚的专制和镇压，形成了自由民主，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来发展被忽视的经济。第二共和国未能改善韩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不稳定13 个月后，它在5 月 16 日朴正熙领导的政变中被韩国军队推翻。第二共和国被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下的临时军政府所取代，导致韩国第三共和国。

短命的第二共和国是韩国历史上唯一的议会制政府。

成立

虽然第一共和国在官方上是代议制民主，但李承晚采取了强烈的反共立场，并利用共产主义的威胁制定了严厉镇压所有政治反对派的政策。1950 年代中后期，由于韩国公众对镇压和有限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不满，李承晚政府开始衰落。1960 年 4 月，李承晚被称为“四月革命”的广泛抗议活动推翻。

李承晚倒台后，权力由以许正为首的看守政府短暂掌权，直到 1960 年 7 月 29 日举行新的议会选举。

第二共和国是韩国政府使用内阁制而不是总统制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例子。

政治

自由

第二共和国废除了李承晚政权对政治表达的严厉限制，结果自由回归，政治活动增加。大部分活动来自左派和学生团体，他们在推翻第一共和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会成员和活动在 1960 年的后期迅速增长。据估计，在第二共和国的八个月期间举行了大约 2,000 次示威活动。

在左翼的压力下，张政府对曾参与反民主活动或腐败的军警官员进行了一系列清洗。1960 年 10 月 31 日通过了与此相关的特别法。大约 40,000 人受到调查；其中，2,200 多名政府官员和 4,000 名警察被清洗。此外，政府还考虑将韩国军队的规模减少10万人，尽管该计划被搁置。

经济

第二共和国政府在经济方面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失业率和批发价格也在此期间上涨。从1960 年秋季到 1961 年春季，韩元兑美元贬值了一半。政府制定了一项以农业和轻工业为基础的五年经济计划，以减少失业，尽管在此之前尚无法采取行动就已被推翻。

解散

第二共和国遭受了许多新的和继承自第一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未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导致政治不稳定加剧，因为民主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加上反对派和激进团体的活动日益增多，导致韩国政治崩溃。

5月16日政变

许多韩国军方高层指责韩国的发展停滞不前。军方人士指出，韩国是如何在日本殖民制度下得到密集发展的，日本出现了“经济奇迹”，这与李承晚总统任期内几乎没有大力发展经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经济仍然停滞不前，贫穷且以农业为主。在李承晚的领导时期，缺乏发展激起了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反应，要求进行彻底的社会重组和彻底的政治和经济重组，拒绝统治精英所追求的模式。

韩国陆军少将朴正熙（Park Chung-hee）的政治倾向明显模棱两可，深受这种正在展开的知识分子反应的影响。1961年5月12日，朴正熙成为军队内部改革派的领导人，策划了反对第二共和国文职政府的政变。该阴谋在泄露后流产，但四天后，军方又企图发动政变；5月16日成功，解散第二共和国。他们接着播放了一份宣言，概述了政变的政策目标，包括反共、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消除政治腐败，建设自治的国民经济，朝鲜统一，以及清除当代政治家。朴正熙和他的支持者随后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军政府，后来更名为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朴正熙作为理事会主席成为韩国事实上的独裁者。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ird_Republic_of_Korea

韩国的第三共和国是从1963年12月至1972年11月。

第三共和国被认为是国民议会下的文职政府的回归，但实际上是朴正熙、最高委员会成员和民主共和党领导下的独裁统治。第三共和国优先考虑韩国的经济发展，反共，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1967年的总统大选和国民大会被迫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他寻求第三个任期，并在1971年的总统大选中被选。朴正熙于 1971 年 12 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于 1972 年 7 月在与朝鲜的联合公报中宣布了朝鲜统一计划。1972年10月朴发起了十月复辟，宣布戒严，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制定新宪法的计划。第三共和国于1972 年 11 月立宪公投后解散，由大韩民国第四共和国取代。

历史

背景

1961 年 5 月，由朴正熙少将领导的最高国家复兴委员会在5 月 16 日的政变中推翻了韩国第二个共和国，以应对其在推翻大韩民国后无力防止政治不稳定的情况。最高委员会成立了以张道勇将军和大韩民国军队5 月 16 日政变支持者为首的军政府，希望启动韩国的经济发展（这在第一共和国时期被忽视了十二年），并清除了所谓的“解放贵族”——参与朝鲜独立运动的保守政治家的统治阶级。最高委员会内部的权力斗争使朴正熙得以策划将权力从张逐渐转移到自己身上。7月，朴正熙正式接替张出任主席，成为韩国事实上的独裁者。最高委员会暂停了国民议会，加强了韩国的反共立场，并进行了一系列以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帮助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发展，包括第一次五年计划。

最高委员会的军政府立即遭到韩国主要盟友美国的反对，而朴正熙早期安抚美国人的尝试也被置之不理。到 1962 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他的政府开始向朴正熙施压，要求他在韩国恢复民主和文官统治。1962 年 12 月 2 日，举行了关于恢复总统制的全民公投，据称以 78% 的多数通过。作为回应，朴正熙最终放弃了他的军事职位，以有资格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以文职身份参选，尽管他和其他军方领导人承诺不竞选公职。朴正熙在 1963 年 10 月的总统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接替尹潽善成为韩国总统。

成立

大韩民国于 1963 年 12 月 17 日成立，正式解散最高委员会，结束三年的宪法真空。第三共和国被呈现为国民议会下自由民主的文职政府的回归，以及一个新的强大的总统制度，总理是总统下的第二高行政职位。理论上，朴总统和他的民主共和党是通过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民主选举产生的多数席位运作的。然而，实际上，第三共和国是军事独裁的延续。在朴领导下，他的政府主要由最高委员会的前成员组成，这些委员会经常行使重要的专制权力。

1967年5月，朴正熙在1967年的总统选举中重新参选，以51.4%的投票击败了新民主党的POSUN。韩国宪法将总统的任期限制为两个四年，这意味着朴正熙在 1971 年任期结束时没有资格竞选连任。然而，1969年民主共和党主导的国民议会被迫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朴正熙参加了1971 年 5 月的总统选举，并以 53.2% 的选票击败了他的新民主党对

手金大中。

1971 年 12 月，朴正熙“基于国际形势的危险现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1972年7月4日，朴正熙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发表了7月4日的南北韩联合声明，确立了朝鲜统一的三项原则，即独立、和平、全国统一。

解散

1972 年 10 月 17 日，朴正熙发动了名为“十月光复”的自我政变，解散国民议会，暂停宪法，并宣布全国戒严。大学关闭，新闻、广播和电视等媒体受到更多审查，言论受到严重限制。朴正熙委托制定了一部全新的宪法，并于 10 月 27 日由国务院紧急完成。被称为维新宪法的新宪法在设计上是高度专制的，没有关于总统任期限制的规定，选举延长至每六年一次——基本上保证了朴正熙的终身总统任期。

1973年11月21日，维新宪法在1972年韩国立宪公投中以92.3%的票数通过并生效，解散第三共和国，建立大韩民国第四共和国。

经济

朴正熙从 1963 年到 1972 年担任第三共和国总统。

韩国经济在第三共和国期间迅速增长，政府继续执行最高委员会确定的经济发展重点。日本和美国提供贷款，而且还提供了工业项目，如建设资金支持浦项钢铁厂。第三共和国见证了自日本殖民时代以来南朝鲜的第一次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全国各地修建了许多新的公路、铁路和机场。

第三共和国见证了财阀的首次重大增长，财阀是韩国的大型工业集团，由所有者或家族经营和控制。1961 年最高委员会上台时，他们承诺解决困扰第一共和国的商界腐败问题，新政府继续这样做。然而，尽管一些实业家被捕并被指控腐败，但新政府意识到需要企业家的帮助。政府达成了妥协，许多被指控的企业领导人向政府支付了罚款。随后，企业和政府领导人在经济现代化方面加强了合作。

韩国的经济繁荣是以对工人权利的严格限制为代价的，工业化期间为确保工人得到更大保护而兴起的劳工运动受到第三共和国政府的积极镇压。

教育

第三共和国对韩国的教育体系进行了几项改革。1968年取消了中学入学考试，所有中学都处于平等地位。同样在 1968 年，通过了《国民教育宪章》，在教育中强调民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该宪章概述了教育的四个目标：民族振兴、培养自力更生的人、树立新的合作国家形象、支持反共。

第三共和国政府试图减少推翻第一共和国的大学生中的政治激进主义，并计划通过增加学术竞争来破坏激进主义。政府允许大学和学院最多招募

130% 的毕业配额，这样学生活动家将被迫相互竞争才能毕业。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学生激进主义继续保持高水平，但有所下降。

国际关系

第三共和国开始在国际政治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并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新的关系。

韩国与日本的第一个外交关系是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建立的，韩日关系在 1965 年 7 月 22 日签署的《基本关系条约》和 1965 年 8 月 14 日批准的协议中实现正常化。日本同意向韩国提供大量补偿、赠款和贷款，两国开始经济和政治合作。

第三共和国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并继续接受大量外援。此后不久，在“多旗计划”的鼓励下，韩国以参战者的身份加入越南战争，最终派出总计 30 万名士兵（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国特遣队）为南越抗击共产主义北越及其盟友。

与西方和亚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更大尝试发生在第三共和国，包括韩国国家元首首次对欧洲进行国事访问。1960年代，韩国与比利时、希腊、荷兰、葡萄牙、冰岛、瑞士、卢森堡、奥地利、梵蒂冈和马耳他建立了关系。韩国与中华民国保持密切关系（台湾）和西德分别声援其敌对的共产主义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德。第三共和国普遍拒绝试图与共产主义国家建立关系，其中大多数不承认首尔政府。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ourth_Republic_of_Korea

韩国的第四共和国是从1972年11月至1981年3月。

第四共和国成立于1972年立宪公民投票通过的维新宪法，结束了朴正熙总统拥有的事实上的独裁权力，并接替了第三共和国。朴正熙于1979年10月26日被暗杀。

第四共和国于 1981 年 3 月通过新宪法而解散，并由大韩民国第五共和国取代。

历史

背景

朴正熙自 1961 年 7 月起担任韩国的领导人和事实上的独裁者，在领导5月 16 日推翻大韩民国的政变两个月后上台。朴和他的支持者成立了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这是一个临时军政府，优先考虑韩国的经济发展，但面临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要求恢复文职政府。1963 年，朴辞去军职，以文职身份参选 1963年10月总统大选，击败现任总统尹潽善。韩国的第三共和国于十二月、两个月后宣誓就职，并表示恢复文官政府国民大会。实际上，这是朴军事独裁的延续，因为政府主要是最高委员会的成员，国民议会由他的民主共和党主导。朴在1967 年总统大选中连任，（国民议会通过

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允许他连任第三个任期），并在1971 年总统大选中以微弱优势获胜。

朴的声望在 1970 年代初开始下降，他面临着来自公众和竞争对手政客的日益增长的国内反对。1971年的总统选举表明，新民主党在选举中对民主共和党取得了显着的胜利，从1968年的32.7%上升到44.4%。随着1960 年代快速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公众对朴专制统治的不满增加。此外，朴对冷战政治的变化感到焦虑，尤其是美国尼克松总统的共产主义政策。朴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坚定的反共主义，韩国盟友对这一政策的任何缓和都会威胁到他的统治基础。1971年12月，朴“基于国际形势的危险现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成立

1972 年 10 月 10 日，朴发动了名为“十月复辟”的自我政变，解散了国民议会，中止了 1963 年宪法，宣布全国戒严，并委托制定全新的宪法。朴的灵感来自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后者几个星期前策划了类似的政变。

维新宪法

根据维新宪法，总统职位有效地将所有执政权力集中在朴手中。

维新宪法是一个严重的专制文件，以授予总统广泛的行政和立法权力为标志。他的任期延长至六年，连任没有限制。总统是通过全国统一会议间接选举产生的，这是一个选举团，其代表由公众选举产生。然而，总统候选人的要求非常严格，以至于会议的选票只能有一名候选人。他被授予中止

宪法自由和法令统治的广泛权力。他还有权任命三分之一的国民议会议员，有效地保证了议会多数席位。出于所有意图和目的，维新宪法将朴自去年 12 月以来行使的紧急权力编成法典，有效地将他的总统任期变成了合法的独裁统治。新文件引发了广泛但无效的抗议。

1972年韩国立宪公投以令人难以置信的92.3%的票数和91.9%的投票率通过了《维新宪法》，1973年11月21日生效，解散了第三共和国，建立了第四共和国。1972年和1978年，朴当选为韩国总统。

随着朴的声望和对其威权主义的容忍度在 1970 年代稳步下降，第四共和国出现了更大的不稳定。维新宪法允许朴合法地、更公开地侵犯公民自由，特别是压制日益增长的反对派，但这加剧了对他的政权的抵抗。朴一再承诺向完全民主过渡。然而，由于他日益赤裸裸的独裁统治，这些承诺都落空了。

绑架金大中

金大中在 1971 年总统大选后不久遭遇车祸，导致他的髌关节永久性受伤。金认为这次事故是朴的一次失败暗杀企图，他为了自己的安全逃往日本并在那里组建了异见的韩国民主运动。1972 年维新宪法颁布后，金在日本永久流放。1973 年 8 月 8 日，金在东京大皇宫酒店举行的民主统一党会议上被绑架。据金说，他的绑架者可能打算在朝鲜海峡淹死他、在前往韩国的途中将他扔到海里。然而，就在绑架者将金带到甲板上时，日本海上自卫队开始追击并向船只发射发光炮弹，绑架者被迫放弃了这一计划。金随后在釜山获释，并在首尔家中被绑架五天后被发现还活着。

人民革命党事变

1975 年 4 月，人民革命党事件重新浮出水面，情报局根据《国家安全法》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逮捕了 1024 人。被捕者被指控试图重建一个由朝鲜支持的激进社会主义组织，即人民革命党，根据韩国的反共产主义法律，8 人因于 1965 年 8 月罪名成立而被捕。与最初的事件相似，被捕者中的大多数被无罪释放，其中 253 人被监禁。4月9日，韩国最高法院判处八名被捕者死刑：都业宗、杨正南、金永元、李燮英、河在完、徐道元、宋尚镇和吴洪善。所有八人在宣布死刑后仅 18 小时就被处决。都业宗是 1965 年最初被捕的八人之一。

人民革命党事件引起了韩国以外的关注，并为朴政权带来了重大负面新闻。在内部，由于该国严格的审查法，有关该事件的知识仅限于通过大学和教堂秘密分享的外国报纸的信息。大多数人认为人民革命党是朴镇压民主活动人士而非共产党人的闹剧，事件的消息在国内外传播并助长了民主化运动。

刺杀朴正熙

1979 年 10 月 26 日，朴在青瓦台总统府内的一个安全屋内被情报局（KCIA）局长兼总统安全负责人金载圭暗杀。朴、他的四名保镖和司机因不明原因被金和其他 KCIA 特工杀害。朴在独裁统治18年后去世，立即引发韩国政治动荡。自 1975 年以来担任总理的崔圭夏，担任代理总统，但几乎立即被军队中的竞争派系边缘化。在朴死后宣布戒严后，将军郑承和担任政府首席行政官，并于同日任命全斗焕少将领导联合调查总部。10 月

27 日，全斗焕单方面控制了 KCIA 政府情报机构。12月6日，全国统一委员会根据维新宪法的框架确认崔圭夏为总统，但六天后，全斗焕率先发动了12月12日的政变，强行逮捕并拘留了郑将军。到那时，崔在政府中已经失去了任何有意义的权威，1980 年初，全斗焕将自己任命为情报局局长。

1980年5月，全斗焕发动5月17日政变，在全国统一委员会下建立军事独裁并解散国民议会，次日光州起义开始。作为回应，他收紧戒严，并出动军队猛烈镇压抗议活动，估计约有 200 至 600 人在骚乱中丧生。光州起义虽然被成功镇压，但巩固了韩国全国支持民主的势头。1980年8月，崔辞职，由国民议会投票选举全斗焕为总统。他赢得了 99.37% 的选票。10 月，全斗焕废除了所有政党并建立了自己的民主正义党，这实际上是对自 1963 年以来统治韩国的朴的民主共和党进行了重新命名。全斗焕颁布了一部比朴宪法较不专制的新宪法，但仍然赋予总统相当广泛的权力。

第四共和国于1981年3月3日解体，第五共和国成立。

经济

第四共和国的经济继续显着增长，尽管速度比五年计划后的第三共和国慢。朴政府从被认为高度发达的轻工业转向重工业投资计划，称为“重化工业驱动”。重工业的转变主要是由1966 年至 1969 年的韩国非军事区冲突推动的，这导致韩国领导层担心如果没有美国的大力援助，韩国就缺乏自给自足的能力来抵御朝鲜。在 1960 年代后期，美国越来越多地参与越南战争导致韩国领导层相信，将足够的军队从驻韩美军转移到印度支那将使韩国容易受到朝鲜的影响，朝鲜已经集结了庞大的军队。因此，韩国将重

工业的发展视为抵御朝鲜潜在侵略的必要条件，并着手建设可以支持现代化军队的工业基础设施。朴决定将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用于发展几个重点行业：钢铁、石化、汽车、机床、造船和电子。朴招募财阀，大型家族企业集团，因为他们拥有发展这些行业的资本。韩国的重化工业驱动是以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反响为代价的。由于他未兑现的民主化承诺，来自工业工人阶级的罢工，以及学生对朴的抗议变得越来越频繁，据信这促成了他在1979年被暗杀。环境破坏和工业事故造成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被称为温山病，一种污染疾病影响了主要城市蔚山郊区的温山周围的人们。

世界石油价格上升增加了韩国重工业的经济发展压力，但韩国建筑公司在中东地区非常活跃，外汇大量涌入。

国际关系

国际外交中的各种事件促使朴政权重新考虑其外交立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这使人们怀疑韩国能否依靠美国的冷战支持。韩国政府开始与加拿大等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此外，韩国与朝鲜举行了第一轮红十字会谈。朴还宣布了最终统一的计划。

社会

1974年12月，韩国最大的报纸之一《东亚日报》及其子公司开始发布空白广告位，以抗议朴的严格的审查法。东亚日报长期以来一直蔑视和抗议韩国的专制政府，自他领导国家复兴最高委员会以来一直与朴发生争执。情

报局开始逼迫《东亚日报》主要广告商退出，该公司依赖小广告商，直到七个月后最终在政府的压力下结束其抗议活动。该事件导致员工被解雇，其中许多人共同创办了受欢迎的报纸《韩民族》。

1975 年，朴下令将无家可归者从首尔街头清除，数千人被警察抓获并送往 36 个集中营。被拘留者随后被当局用作奴工，并受到有辱人格的待遇，许多人死于酷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Hong_Kong

香港经济

香港的经济是高度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其特点是低税收、近乎自由的港口贸易和完善的国际金融市场。其货币称为港币，由三大国际商业银行合法发行，与美元挂钩。利率由香港的个别银行决定，以确保它们是市场驱动的。没有官方认可的中央银行系统，尽管香港金融管理局发挥金融监管机构的作用。

其经济实行积极的不干预主义，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和金融。因此，它被认为是最适合创办公司的地方之一。事实上，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香港已从 2014 年的 998 家注册初创企业增至 2018 年的 2800 多家，其中包括电子商务（22%）、金融科技（12%）、软件（12%）和广告（11%）。2015 年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将香港列为排名第一的国家地区，得分为 8.97。

香港的经济优势包括健全的银行体系、几乎没有公共债务、强大的法律体系、截至 2017 年年中约 4,080 亿美元的充足外汇储备、严格的反腐败措施以及与中国大陆的密切联系。它的大小，法规和现有金融工具，堪比伦敦和纽约。

香港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1961 年至 1997 年间增长了 180 倍，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同一时期内增长了 87 倍。它的经济稍微大于以色列和爱尔兰。2009 年，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香港实体经济增长下降 2.8%。

到 20 世纪末，香港是世界第七大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仅次于纽约和鹿特丹。香港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

香港也有来自附近地区的大量劳动力供应。熟练的劳动力加上现代英国/西方商业方法和技术的采用，确保了对外贸易、投资和招聘的机会最大化。香港的物价和工资相对灵活，视香港经济的表现和稳定性而定。

由于其低税收政策，香港通过土地的销售和征税以及通过吸引国际企业为其公共财政提供资金来增加收入。根据 Healy Consultants 的说法，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FDI) 而言，香港拥有东亚地区最具吸引力的商业环境。2013年，香港是全球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

香港在税务司法网络的 2011 年金融保密指数中排名第四。在世界经济论坛的网络就绪指数 (NRI) 中，香港政府是排名第四的亚洲政府，（该指数是 2016 年衡量政府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指标），在全球排名第 13。然而，传统基金会已将香港从经济自由指数中删除，近年来，它的经济政策最终被北京控制。经济自由指数表示，香港将在中国的背景下被考虑，表明独立性受到侵蚀，国家对这座城市的资本主义制度有更大的控制。

经济预测

自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的经济未来更加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来自中国大陆城市的直接竞争。尤其是上海号称拥有地理优势。上海市政府早在2010年就梦想把这座城市变成中国的主要经济中心。

积极的不干涉主义

香港的经济政策经常被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卡托研究所等经济学家引用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例子，将香港的成功归功于该政策。然而，其他人则认为其经济战略并没有充分地被自由放任一词来描述。他们指出，政府参与经济的方式还有很多，其中有些甚至超过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参与程度。例如，政府参与公共工程项目、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福利开支。此

外，尽管按照国际标准，个人和企业收入的税率很低，但与大多数其他国家不同，香港政府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土地租赁和土地税收。香港的所有土地均归政府所有，并按固定期限出租给私人开发商和用户，费用上缴国库。香港政府通过限制土地租赁的出售，将土地价格保持在一些人认为人为的高价，这使政府能够以较低的收入和利润税率支持公共支出。

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度指数衡量对商业、贸易、投资、金融、产权和劳动力的限制，并考虑了 183 个经济体中腐败、政府规模和货币管制的影响。香港是唯一一个在 2014 年和 2018 年获得 100 分或以上得分的经济体。2021 年，传统基金会将香港作为一个独立于中国的实体从其最自由的经济学名单中删除。世界援引中国政府越来越多的干预体现在香港的政府体制和民主进程中。因此，香港和澳门失去了几十年来在该指数中的地位。美国传统基金会负责人表示，香港有更多的经济自由得到保障，但这些经济政策最终仍由北京控制。

贫困

香港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昂贵的城市之一，部分人口生活在贫困中也就不足为奇了。最近的数据显示，有 137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线为：一个人家庭每月 4,000 港元（510 美元）、两人家庭收入 9,800 港元、或三人家庭每月 15,000 港元。香港的贫困率高达 20.1%，但最近政府计划的努力已将这一数字降至 14.7%。

2012 年 12 月，扶贫委员会（CoP）重新成立，以预防和减轻贫困，具有三个主要职能：分析贫困状况，协助制定政策并评估政策有效性。现金发放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贫困，但减轻贫困的程度仍然值得怀疑。尽管现金补助使家庭摆脱了贫困线，但由于香港的生活成本稳步上升，他们仍难以达到某些标准。

加上这些现金支付，法定最低工资将在过去 10 年中第二次上调。法定最低工资（SMW）于 2011 年 5 月 1 日生效，自 2017 年 5 月起，法定最低工资为每小时 34.5 港元。香港立法会最近批准将法定最低工资修订为每小时 37.5 港元，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生效。尽管香港的总统计数据显示贫困正在下降，但由于儿童与家人、他们年迈的父母同住，导致家庭规模扩大，儿童贫困率最近增加了 0.3 个百分点，达到了 23.1%。随着经济增长预计在未来几年放缓，贫困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

除了通过发放现金和提高最低工资使年轻一代受益外，还实施了扩大的老年人津贴，以增加无法工作的老年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截至 2019 年 2 月 1 日，合资格长者每月应付金额为港币 1,385 元，以提高与长者同住的家庭收入。尽管香港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但大部分人口仍在努力跟上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影响低收入家庭的最大问题之一是经济适用房的可用性。在过去十年中，香港住宅物业价格上涨了近 242%，今年的增长终于开始放缓。考虑到住房是基本必需品，价格不断上涨，而可支配收入几乎保持不变，随着经济适用房数量的减少，家庭寻找住房变得更加困难。政府已经实施了公共住房

计划，但延迟建设和不断增加的候补人名单并没有达到他们计划的程度。香港智库最近的结果显示，到 2022 年，普通市民可能需要等待长达 6 年才能得到公共住房。有证据表明，经济适用房的供应量已经下降，迫使家庭在住房上花费更多，而在其他必需品上花费更少。这些问题可能导致更糟的生活条件和不平衡的饮食，这两者都会带来超出财务状况的问题。

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交所是世界第六大，市值约为US \$ 3.732万亿。2006年，在香港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价值仅次于伦敦，位居全球第二。2009年，香港筹集了22%的IPO资金，成为全球最大的IPO中心。按营业额计算，该交易所全球排名第十，在中国排名第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Singapore

新加坡经济

新加坡的经济是高度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新加坡的税率很低并且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人均GDP位居世界第二。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总部设在新加坡。

除了商业友好的声誉外，国有企业在新加坡经济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权财富基金 淡马锡控股持有一些该国最大的公司的多数股权，例如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电信，新科工程和新传媒。新加坡经济是世界上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流出融资国。近年来，新加坡也得益于其极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从全球投资者和机构的直接投资流入中受益。

新加坡耕地有限，这意味着新加坡必须依靠农业技术园区进行农业生产。

新加坡依靠中间贸易的扩展概念进行转口贸易，通过购买原材料并将其精炼再出口，例如在晶圆制造行业和炼油行业。新加坡拥有一个战略港口，这使其在开展此类转口活动方面比许多邻国更具竞争力。新加坡的贸易占 GDP 的比率是世界上最高的，2008-2011 年间平均约为 400%。按货物吨位计算，新加坡港是世界上第二繁忙的港口。

为了在 21 世纪保持其国际地位并促进其经济繁荣，新加坡采取了促进创新、鼓励创业和再培训劳动力的措施。人力部(MOM) 具有设定，调整和执行外国工人移民规则的主要责任。大约有 243,000 名外籍家庭佣工(FDW) 在新加坡工作。

英国殖民

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建立一个贸易站。莱佛士一直在寻找可以用作大英帝国前哨的新定居点。他离开加尔各答，开始探索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当时，荷兰和大英帝国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莱佛士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定居点来取代马六甲，以提供比荷兰帝国更重要的经济优势。马六甲在维也纳条约期间被移交给荷兰人。莱佛士发现新加坡是一个完美的地点，坐落在马六甲海峡的边缘，马六甲海峡如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航道之一。

此外，该地拥有有利于英国的关键经济资源。那里有丰富的木材和淡水，还有一个对英国舰队有利的天然深水港。他到达新加坡河口，那里有一个小的马来人聚居地。当时，在威廉法夸尔的陪同下，莱佛士会见了定居点的领导人阿卜杜勒，商讨在大英帝国统治下在岛上建立贸易站的权利。该岛由柔佛苏丹东姑拉赫曼统治，他深受荷兰人和武吉士人的影响。然而，苏丹国被他的人民内部的派系分裂削弱了，而阿卜杜勒和他的官员忠于拉赫曼的流亡在廖内的哥哥东姑侯赛因。在阿卜杜勒的帮助下，莱佛士设法将侯赛因偷运回新加坡。他提出承认侯赛因为柔佛的合法苏丹，并每年向他提供报酬；作为回报，侯赛因将授予英国在新加坡建立贸易站的权利。1819 年 2 月 6 日，莱佛士成功地在该地建立贸易站。

贸易扩张

1869 年 11 月 17 日，苏伊士运河开通，连接地中海和红海。这大大地缩短了贸易航线，从而导致贸易量增加。苏伊士运河开通仅一年后，新加坡贸易就增加了 3200 万美元。

1879 年：贸易额达到 1.05 亿美元。

独立

1950 年：该地区出现社会动荡，导致殖民国家决定放弃某些决策。在种族骚乱的刺激下，殖民国家试图授权并建立一个强大的地方政府。由于大部分动乱是由高失业率引起的，当地政府被指示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委员会是旨在创造就业机会的组织的正式名称。

1965 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后，面临着国内市场狭小、失业率和贫困

率高的局面。新加坡 70% 的家庭生活在极度拥挤的环境中，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失业率平均为 14%，人均 GDP 为 516 美元，一半的人口是文盲。

工业化的繁荣与变化

在李光耀任职期间，结构性变化推动了经济发展。新加坡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小国，自然资源很少，向外发展的空间也很小。认识到这一点，李确定新加坡拥有的主要优势是其人力资本，以及提供能够在全世界工业和贸易中竞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的能力。1961 年 8 月 1 日，新加坡政府成立了经济发展局，以带头推动投资，使新加坡成为吸引外国投资的目的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大幅增加，到 2001 年，外国公司占制成品产出的 75% 和制成品出口的 85%。与此同时，新加坡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升至全球最高水平，而家庭消费和工资占 GDP 的比重则下降至最低。李的任期开始就取得了成功，从1965年到1973年，实际GDP年增长率为12.7%。他将支出用于维修和改善基础设施。这一努力提高了经济生产力，并为建立基础工业奠定了基础。截至 2019 年，新加坡的基础设施在质量方面排名第一，得分为 95.4 分（满分 100 分）。1973 年至 1979 年期间，新加坡经历了一场斗争，因为他们从基本基础设施支出转向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1973 年的石油危机提高了政府对经济集中度等问题的认识。它迫使政府召开新的论坛来讨论如何使国家经济适应经济变化。这段时间的 GDP 增长率略低于前几年，年增长率为 8.5%。然而，失业率几乎为 0%，大多数人口的生产力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府强调将技术和教育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浪潮。此外，他们将金融服务确定为新加坡可以实现多元化和吸引新增长的关键领域。在此期间，政府对其新兴的金融服务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它设法将通货膨胀降至最低，并为工人提供适当的设备和机器来维持增长。

服务业的增长

由于这种投资驱动，新加坡的资本存量到 1992 年增长了 33 倍，资本劳动比率实现了 10 倍的增长。生活水平稳步提高，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家庭从低收入状态转变为中等收入保障。

1987 年：李光耀声称（根据房屋所有权标准）80% 的新加坡人现在可以被视为中产阶级。在李的领导下，新加坡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很低。然而，与希腊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大不相同，新加坡奉行的是将社会安全网个性化的政策。从长远来看，这导致了高于平均水平的储蓄率和非常可持续的经济。没有一个繁重的福利国家或它的可能性，新加坡已经发展了一支非常自力更生、技术娴熟的劳动力队伍，他们精通全球经济。

1990 年代给新加坡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即他们将如何重塑经济。尽管在制造业中苦苦挣扎，但新加坡在全球金融、贸易和贸易中蓬勃发展，并且是一个工业国际贸易中心。

从 1960 年到 1999 年，新加坡的经济战略产生了年平均 8.0% 的实际增长。自 1965 年国家独立以来，新加坡的 GDP 每年平均增长了 9.5%。然而，美国经济放缓、日本和欧盟，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电子产品不景气，已将 2001 年的估计经济增长降低至负 2.0%。

截至 2013 年 6 月 8 日，新加坡的失业率约为 1.9%，该国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按季度计算，增长率为 1.8%，而 2010 年为 14.8%。

2015 年和 2016 年，随着 GDP 增长萎缩至仅 2%，该国经济出现下滑。尽管增长在放缓，但该国尚未出现负增长，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在经济增长递减的同一时期，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也有所下降。

截至 2017 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为 3239.07 亿美元。

由于美国和中国提高关税，预计新加坡 2019 年经济将放缓，GDP 增长将从 2018 年的 3.1% 放缓至 1.9%。

国有企业与投资

公共部门既是投资者，又是经济发展和创新的催化剂。新加坡政府有两个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控股和GIC 私人有限公司，用于管理该国的储备。最初，国家的角色更多地是为了管理工业以促进经济发展，但近几十年来，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的目标已转向商业基础。

政府关联公司在新加坡的国内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截至 2011 年 11 月，在新加坡上市的前六家官联公司约占新加坡交易所（SGX）总资本的

17%。这些完全和部分的国有企业在商业基础上运营，与私营企业相比没有竞争优势。国家所有权在经济的战略部门尤为突出，包括电信、媒体、公共交通、国防、港口、机场运营以及银行、航运、航空、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截至2014年，淡马锡在新加坡持有690亿新元资产，占新加坡上市公司总市值的7%。

部门

尽管工资上涨，但为了保持其竞争地位，政府寻求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附加值活动。它还已经或正在向外国服务供应商开放金融服务、电信、发电和零售业，并加强竞争。政府还尝试了一些措施，包括工资限制措施和释放未使用的建筑物，以控制不断上涨的商业租金，以期在 2006 年中央商务区办公室租金增加两倍时降低在新加坡开展业务的成本。

银行

许多领先的金融分析师、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将新加坡视为全球金融中心，新加坡的银行提供世界一流的企业银行账户设施。在 2020 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新加坡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金融中心中排名第六，在亚洲最具竞争力的金融中心排名第四。这些包括多种货币、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支票账户、储蓄账户、借记卡和信用卡、定期存款和财富管理服务。

新加坡还吸引了以前在瑞士银行持有的资产，原因有几个，包括对瑞士账户征收的新税和瑞士银行保密制度的削弱。瑞士第二大银行瑞士信贷于

2005 年将其国际私人银行业务主管移至新加坡。为此，该国也被称为“亚洲的瑞士”。

生物技术

新加坡一直在积极发展其生物技术产业。数亿美元投资于该行业，用于建设基础设施、资助研发和招募国际顶尖科学家到新加坡。领先的制药商，如葛兰素史克（GSK）、辉瑞和默克公司，已在新加坡设立工厂。2006 年，葛兰素史克又投资 3 亿新元建立另一家生产儿科疫苗的工厂，这是其在亚洲的第一家此类工厂。药品现在占该国制造业产量的 8% 以上。

能源和基础设施

新加坡是亚洲的定价中心和领先的石油贸易中心。石油工业占新加坡 GDP 的 5%，新加坡是世界三大出口炼油中心之一。2007 年，它出口了 6810 万吨石油。石油工业带动了化学工业和油气装备制造的发展。新加坡在自升式钻井平台和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装置的转换方面拥有世界市场的 70%。它拥有全球 20% 的船舶维修市场，2008 年海洋和近海行业雇佣了近 70,000 名工人。

房地产

新加坡政府拥有该国 90% 的土地，以及 80% 人口居住的住房。

旅游业

旅游业在新加坡的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加坡是世界上访问量最大的城市之一。

贸易、投资和援助

新加坡 2014 年的贸易总额达 9820亿新元。新加坡虽然面积小，但目前是美国第十五大贸易伙伴。2014年，新加坡的进口总额为4640亿美元，出口总额为5190亿美元。马来西亚是新加坡的主要进口来源地，也是其最大的出口市场，吸收了新加坡18%的出口，美国紧随其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来自马来西亚的蔬菜供应商试图走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马来西亚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2012年双边贸易总额约为910亿美元，占东盟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以上。2012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中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有所增长，而与欧盟27国、美国、香港和日本的贸易额在2012年有所下降。自2009年以来，新加坡对华贸易额出口额超过进口额。相比之下，自 2006 年以来，新加坡与美国的贸易进口额超过了出口额。

2000 年，再出口占新加坡对其他国家总销售额的 43%。新加坡的主要出口产品是电子元件、精炼石油、黄金、计算机和包装药物。新加坡的主要进口产品是电子元件、精炼石油、原油、黄金和计算机。

新加坡的贸易得益于广泛的贸易协定网络。根据 Healy Consultants 的说法，新加坡可以通过自由贸易进入整个东盟网络，在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文莱、缅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打交道时降低了进口关税。

尽管该市的运营环境成本相对较高，但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继续为该国内大规模吸引投资资金。美国在外国投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占 2000 年制造业新承诺的 40%。截至 1999 年，美国公司在新加坡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累计投资达到约 200 亿美元（总资产）。美国投资的大部分是电子制造、炼油和储存以及化学工业。超过 1,500 家美国公司在新加坡开展业务。

新加坡基本上清廉的政府、熟练的劳动力以及先进高效的基础设施吸引了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的 3,000 多家跨国公司（MNC）的投资。外国公司几乎遍布所有经济部门。跨国公司占制造业产出和直接出口销售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尽管某些服务部门仍由政府关联公司主导。

新加坡劳动力

2000 年，新加坡约有 220 万劳动力。由于获得自然资源的机会有限，新加坡被迫投资于其人民。该国的英语使用者，使其成为跨国公司的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根据蒂拉克·阿贝辛哈（Tilak Abeysinghe）的说法，在

1970 年代，“2.4% 的劳动力拥有学位”，到 1990 年，这一数字上升至 6.3%。2013 年，拥有学位的劳动力人数已增至 31%。国家对高技能劳动力工作的指示促进了该地区的增长和教育。全国工会大会 (NTUC) 是唯一与执政党有共生关系的工会联合会，几乎占有组织劳工总数的 99%。政府政策和积极活动而非劳工立法控制一般劳工和工会事务。

虽然新加坡政府已采取反对最低工资和失业救济计划的立场，但政府于 2007 年推出了一项工作福利收入补助 (WIS) 计划，以补充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为支持雇主雇用年长的新加坡工人，特别就业信贷 (SEC) 于 2011 年推出。它于 2012 年首次得到加强，为雇主雇用年长的新加坡工人和残疾人 (PWD) 提供支持。它帮助雇主应对与提高老年工人中央公积金 (CPF) 缴费率相关的成本。5 年 SEC 计划进一步延长直至 2019 年，以鼓励雇主自愿重新雇用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工人。

新加坡政府和职总尝试了一系列计划，以提高落后的生产力并提高女性和老年工人的劳动力参与率。然而，服务业以及建筑和电子行业的许多低技能职位仍然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外籍工人帮助弥补了这一不足。2000 年，新加坡约有 60 万外劳，占总劳动力的 27%。结果，所有工人的工资都相对受到抑制或没有上涨。为了进行一些控制，政府征收了雇主为家庭佣工和建筑工人等低端工人支付的外劳税。2012 年，贸易和工业部 (MTI) 报告说，随着该国继续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新加坡应继续微调其外国流入的校准。新加坡议会接受了其经济战略委员会 (ESC) 关于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的移民和外国劳动力水平的最佳比例的建议。政府认识到目前的整体外籍劳动力应补充本地居民劳动力，而不是取代新加坡核心概念，并通过业务重组和劳动力再培训极大地帮助企业提高生产力，提高居

民劳动力参与率。

贫困和经济不平等

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均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基尼系数较高。收入不平等的统计数据由新加坡统计局公布。在不考虑税收和社会转移支付的情况下，新加坡的基尼系数将该国置于中等水平。尽管如此，该国在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IHDI）中仍处于“非常高”类别，该排名类似于人类发展指数（HDI），但不平等也被考虑在内。

2018 年 10 月，乐施会在其 2018 年减少不平等指数承诺中将新加坡列为 157 个国家中的第 149 个，在该指数中排名倒数十位的国家，该指数根据减少经济不平等的努力对国家进行排名。在其报告中，乐施会指责新加坡鼓励“有害的税收做法”，没有普遍的最低工资（除了看门人和保安人员），以及在劳工权利方面表现不佳。政府回应报告称，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实际结果”，例如新加坡的高房屋所有权、健康、教育和就业，而不是公共支出或税率，还表示报告“假设高税收和高公共支出反映了消除不平等的承诺”。

政府通过各种社会援助计划提供社会支持。在社会和家庭发展部运行社区关怀，它通过各种方案提供支持低收入家庭市民对短期至中期的援助，以及提供长期援助，子女抚养费，并紧急经济需要的程序。社区发展理事会也在他们的辖区内运行各种当地援助计划。人力部运行银牌服务计划，该计划为低收入老年人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同时，卫生部还经营 MediFund，以帮助尽管有政府补贴和其他医疗融资计划但仍难以支付医疗

费用的家庭。此外，全国社会服务理事会协调450个非政府志愿福利组织提供社会服务，同时通过新加坡公益金筹集资金。

如今，中低收入群体现在获得的公共补贴是十年前的 2.5 倍。

公共财政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加坡的政府支出一直在上升，从 2008 年占 GDP 的 15% 左右上升到 2012 年的 17%。政府总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在国际上排名最低，并允许有竞争力的税收制度。根据宪法，新加坡必须在每个政府任期内保持预算平衡。新加坡政府债券是为投资目的发行的，而不是为支出提供资金。

在新加坡，收入超过 320,000 新元的个人所得税从 0% 到 22% 不等。新加坡没有资本利得税或遗产税。新加坡的公司税率为 17%，对小型企业有豁免和激励措施。新加坡实行单级企业所得税制度，这意味着股东不会被双重征税。

该国被认为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税务天堂。个人财富为 8.35 亿澳元的澳大利亚百万富翁零售商Brett Blundy和亿万富翁 Facebook 联合创始人 Eduardo Saverin是两个在新加坡定居的富人例子（Blundy 于 2013 年，Saverin 于 2012 年）。此外，澳大利亚矿业巨头Gina Rinehart在新加坡拥有财产。美国投资者Jim Rogers2007 年移居新加坡。

新加坡于 1994 年 4 月 1 日引入了初始税率为 3% 的商品和服务税 (GST)，使政府收入增加了 16 亿新元。应税商品及服务税在 2003 年增至 4%，2004 年增至 5%，2007 年增至 7%。

新加坡政府拥有两家投资公司，GIC Private Limited和淡马锡控股，管理新加坡的储备。两者都是独立于新加坡政府的商业投资控股公司，但李显龙总理和他的妻子何晶分别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GIC 在海外投资，淡马锡持有其在新加坡的投资组合的 31%，持有该国几家最大公司的多数股权，例如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电信、新科工程和新传媒。截至2014年，淡马锡在新加坡持有690亿新元资产，占新加坡上市公司总市值的7%。

货币政策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是新加坡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其现任主席是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2011 年 5 月至今）。它管理与货币、银行、保险、证券和一般金融部门以及货币发行有关的各种法规。MAS 已被授权担任政府的银行家和金融代理人。它还被委托促进货币稳定，以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信贷和外汇政策。

